

# 目录

(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刚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转换 .....	1
陈爱华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技伦理观 .....	14
陈灯杰	德勒兹的内在性概念 .....	23
陈良斌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解读：从《巴黎手稿》到《大纲》 .....	32
陈忠	从后真相到新秩序：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 .....	43
董慧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城市权利的建构 .....	49
付清松	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学”逻辑 .....	52
哈维	资本的可视化：运动中的价值 .....	58
胡尼奥迪	作为伦理选择的代词性视角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成果 .....	71
蓝江	拟对象的谱系学：数字对象理论的序曲 .....	80
李乾坤	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拜物教批判 ——西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家衍生论争 .....	94
林哲元	从当代资本主义四种对抗到新无产阶级 ——论齐泽克革命主体论	107
刘冰菁	景观、资本自治与生命治理 ——德波景观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	116
刘怀玉	在发展的历史视野中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问题 ...	127
穆尔	“多巴胺分泌”与失调：上瘾与（数字）资本主义 .....	142
奈格里	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 .....	147
普殊同	当代危机与价值的不合时宜 .....	155
全温迪	电子评估的数据，相互关联的自我 .....	168
斯蒂格勒	作为知识型以及熵纪的资本主义 .....	182
宋晓杰	内在性的诸众和超越性的人民 ——奈格里与拉克劳根本对立的革命主体性模式 .....	191
孙乐强	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 .....	214
孙亮	拜物教、拜物教化与反拜物教 ——约翰·霍洛威基于资本主义“分离论”的解放理念重构 .....	236
唐正东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哲学意义 .....	245

汪行福	马克思“现实抽象”批判三维度 .....	254
王南湜	《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267
王志刚	马克思《大纲》中的空间思想 .....	278
维诺拉	（你并不被）欢迎来到“特朗普纪”。在一般智力的过去与未来之间 .....	288
吴晓明	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 .....	295
吴晓明	《资本论》哲学的方法问题——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实在主体” .....	300
郝戈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提纲） .....	307
夏莹	资本概念的跨越式批判 .....	312
许煜	论机器的跨个体性——与西蒙东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 .....	322
薛稷	探析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理论 .....	324
张佳	论大卫·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	333
张梧	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与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 .....	343
张晓萌	商品美学：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的新维度 .....	354
张雄	二律背反的金融化世界 .....	360
张一兵	非物质劳动与创造性剩余价值——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 .....	363
张一兵	好莱坞文化殖民的隐性逻辑——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 .....	380
周嘉昕	公共财富还是地租？（讨论纲要）——评哈维与哈特、奈格里之间的分歧 .....	392
庄友刚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积累 .....	398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转换

白 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在经济学史上, 真正把价值和劳动联系起来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提出了以“劳动创造财富”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财富(资本)”为核心内容的“劳动价值论”, 这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自身难以逾越的“两个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两个教条”的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 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从而实现了从“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的转变, 最终找到了解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和经济学最复杂问题的“钥匙”。在此意义上, 《资本论》不是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剩余价值论”, 而是用“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劳动价值论”。正是借助“剩余价值论的逻辑”, 《资本论》才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关键词:** 《资本论》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革命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 马克思没有“政治经济学”, 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就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而这一标题后来又成了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 不是致力于阐明如何建构共产主义的经济学, 而是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缺点和问题, 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和暂时性。而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变换和革命性变革, 主要就是通过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向“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转变实现的。对此,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 马克思曾专门强调自己的《资本论》一书“最好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 二是研究了作为一般形态的“剩余价值”。<sup>1</sup>由此可见, 《资本论》的真正创建并不在于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 并以此为基础改造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进而将“劳动价值论”升华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富有内容的超越和根本的逻辑转换, 由此才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彻底的革命”。

##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标志，作为货币来源的“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而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有所进步，否认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认识到“生产领域”才是财富的源泉，但它也只是把农业生产当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否认其他形式的生产的意义。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真正把商品的价值和劳动联系起来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其实质是产业资本代替了商业资本的统治，也即是“生产”而不是“流通”成为了财富的基础和源泉。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通过批判重商主义而确立自己的基本理论的。不同于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流通”从其在商业资本统治时期的一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看成是生产的从属因素，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货币观被重新探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再是外在的“货币”，而是内在的“生产”。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代表产业资本家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在重商主义者所描述的流通领域的货币现象背后，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其内在规律。就价值问题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有必要透过重商主义的市场价格这个“流通表象”，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寻求其形成的“自然基础”。在此基础上，它才发现了作为一切国民财富源泉的“劳动”是决定价值的最终因素，“劳动价值论”终于代替“货币财富论”出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出现，既标志着经济学理论探讨从“流通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过渡，也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言：“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sup>2</sup>

在劳动价值论创建之前，“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好像和财富（价值）无关。如货币主义就把财富看成自身之外的“他物”，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存在于货币之中。同货币主义相比，重商主义的很大进步在于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因此，他们只是抓住了劳动的假象，而不能发现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同重商主义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生产——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和劳动一般的成果了。在重农学派这里，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已经要呼之欲出了，但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既不是农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工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或者干脆就是劳动本身。“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

---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5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sup>1</sup>所以说，正是以斯密为创始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真正开始了从“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过渡，实现了从“劳动”而不是“货币”来探讨国民财富性质和来源的先河。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步迈得虽然艰难，却是意义巨大。由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科学才得以诞生：“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sup>2</sup>

在经济学史上，亚当·斯密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他第一次撇开了具体劳动的特殊形式，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劳动一般，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圣经”的《国富论》中，斯密明确提出了自己“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规定：一是劳动创造财富，“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二是等量劳动获取等量财富，“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sup>3</sup>在这里，斯密完全站在产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一方面批判了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来源的观点，强调“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另一方面又矫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强调商品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商品所有者）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遗憾的是，由于对价值量的分析几乎吸引了斯密的全部注意力，所以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在探讨商品和商品之间交换的“量”的比例关系下，也即在探讨“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下展开的。由此可见，明确区分作为“物品效用”的使用价值和作为“购买力”的交换价值，初步认识到商品具有二重性，这是斯密的历史功绩。但“效用”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因此斯密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所意味的恰恰就是商品的“购买力”。对此李嘉图曾指出：“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sup>4</sup>可见，在斯密这里劳动价值论是具有“投下的劳动量”和“交换的劳动量”这“双重尺度”的。在此意义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甚至也被称为“二元论”的。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斯密虽然超越了其前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的劳动及其数量关系，但他并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仍然缺少对其进行深入的“质”的区别和分析，因而他在进一步考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劳动怎样衡量商品的价值时，就陷入了不可避免的混乱。由此可见，斯密无法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和衡量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来：“斯密仍在迷宫般未经区分和未加消化的思想中犹豫不定地摸索着前进。”<sup>1</sup>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两个规定”，却成了其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难以逾越的“两个教条”。

从斯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这“两个教条”虽然是抽象的和概念化的，但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遵循的“最高原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李嘉图是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3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26页。

4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9页。

在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他坚持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最高原理，但一直反对斯密把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须的相应劳动量与劳动的报酬混同起来。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明确强调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商品的价值或其所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sup>2</sup>对这一决定商品价值的“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李嘉图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一切商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拥有生产资料之人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生产资料之人的“较大量劳动”。<sup>3</sup>在这里，李嘉图把决定商品价值的必须的劳动量，主要归结为雇佣劳动者的“较大量劳动”，而不是物化为生产资料的“较小量劳动”，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斯密“投下的劳动量”和“交换的劳动量”一起决定商品价值的“二元论”，又同时比较明确地区分了生产耗费的劳动和购买得到的劳动，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通过转移和直接生产耗费劳动一起决定商品的价值。所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其不可逾越的发展界限内的虽不充分但是最好的分析”。<sup>4</sup>但是，李嘉图和斯密一样，过于迷恋劳动和价值的数量关系，最终还是把不同种类的劳动间质的差别归结为量的差别，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仍缺乏深入分析。正是由于“李嘉图对于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姿容，它的特殊的决定性，即劳动的性质，没有去研究。……在他看来，自始就只有价值量成为问题。他以为诸商品的价值之比，等于它们生产上必要的诸劳动量之比。”<sup>5</sup>由此导致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也仍然是徘徊不前的，在本质上，他仍然坚持和完善着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并没有比斯密高明和前进多少。

由此可见，作为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体现了经济学的重大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sup>6</sup>而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过多沉迷于“商品价值量”的分析；另一方面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特殊生产类型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形式”所致。正是此局限，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辩证关系，也不能在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发现劳动的二重性，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的奴役和剥削本质。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只是说一些或写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而那些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社会主义者，

---

1 [美] 恩斯特·温特曼：《〈资本论〉普及简读本》，金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2—103 页。

2 [英]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7 页。

3 [英]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60 页。

4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 页。

5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2 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5 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8—99 页。

也仅是指出矛盾而已，他们谁也没能和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本身不仅有量的自然方面，而且还有质的社会方面：“既有如亚当斯密所见到的产品数量关系；又有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另一种关系，即隐藏在数量关系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sup>1</sup>但不无遗憾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阐释了商品价值的劳动起源，却又掩饰了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存在，截断了从劳动价值论通向剩余价值论的“桥梁”。所以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是矛盾的和不相容的。而只有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陷入困境和止步不前的地方，揭示出了“劳动的二重性”，继续探寻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并一直追溯到它的真实根源，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在马克思看来，单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为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合理与有效的理论基础，必须通过“劳动的二重性”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和完善。

## 二、《资本论》“劳动二重性”对“劳动价值论”的推进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发现了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并以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的形式，初步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它却没能发现和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什么样的“劳动”衡量价值，也即无法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sup>2</sup>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具体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抽象劳动，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其结论就是“具体劳动”等于“抽象劳动”。紧接着斯密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是“第一性价格”。<sup>3</sup>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而“物品的真实价格”则意味着耗费的一般劳动。这样，作为“辛苦和麻烦”的劳动——具体劳动和“物品的真实价格”的劳动——抽象劳动，显然具有截然不同含义。但在具体的叙述和阐释过程中，斯密却将二者时而等同、时而替换，最终混淆了二者。

李嘉图虽然继承了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一般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并认可其商品二

---

1 [美]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42 页。

2 [英]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6 页。

3 [英]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6—27 页。

重性的初步划分,但他一直反对斯密在劳动本身问题上的混淆。李嘉图比较明确地区分了“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sup>1</sup>在劳动价值论上确实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李嘉图看不到“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sup>2</sup>所以,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杰出代表的李嘉图,也没能分清劳动的二重性。尽管他认识到商品的价值不仅决定于直接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活劳动,而且也决定于包含在生产资料和原料中的劳动,但当需要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原有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时,他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李嘉图这里,他的劳动价值论依然不能明确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更不能说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既用活劳动创造价值,又把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转移到商品中去。可见,从斯密到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明确地和合理地“分解”劳动。为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sup>3</sup>而对劳动的这一自觉区分,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大贡献。

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当马克思声称社会确定一般交换比率的原则是蕴含在每一种商品中的劳动量,包括存储于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或机器中的劳动量时,他只是在踏着李嘉图的足迹(并且沿着斯密开辟的道路)前进而已。<sup>4</sup>但马克思的进步在于,《资本论》决不是简单地拷贝和重复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是改造和推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改造和推进,主要体现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对此马克思本人曾明确强调: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二重性”,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sup>5</sup>而马克思则围绕这一“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深入揭示和分析,阐明了价值的形成及其交换的可能:一切劳动,一方面是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也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形成商品价值;另一方面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也即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sup>6</sup>在马克思这里,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相应地,商品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正是这一“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使“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了合理的说明,才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抽象的“两个教条”得到了克服和破除,也

1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4 [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0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才使劳动价值论得以改造和推进，并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对此，马克思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声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sup>1</sup>实际上，马克思一直对自己做出的劳动二重性的这一区分而感到骄傲。即便是逝世前，马克思在其“最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还依然强调：在分析商品的时候，自己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性，而是立即进一步验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性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有用劳动，和作为一般劳动力消耗的劳动——抽象劳动；进而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sup>2</sup>由此可见，正是劳动二重性的区分，才使马克思在“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从而根本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地租和利润等来源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而与“劳动”无关的观点。

正是由于紧紧抓住了“劳动二重性”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才拥有了既不同于“显微镜”，也不同于“化学试剂”的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批判武器”，才彻底回答和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剩余价值论不相容的难题和矛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划分，揭示出“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价值。”<sup>3</sup>在这里，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同商品流通过程的价值规律完全矛盾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那里仍然表现为工资形式，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正是劳动力进行了有用的劳动，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出去，生产出自己价值的等价物，最后还生产出剩余价值。但工人获得的工资仅是自己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不是自己剩余劳动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虽有所意识，但却不能明确地揭示。所以，正是“工资并不等于全部产品这一事实迫使李嘉图（偶尔还有斯密）去寻找另一个公式，它将价值生产能力归因于作为凝固的劳动的资本。”<sup>4</sup>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是将（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为死劳动——资本，而不是活劳动——工人。但这却是马克思批判和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在批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时就明确指出，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具有如下特征：劳动的社会性质被歪曲地当作物的“属性”；社会关系被当作诸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位拜物教徒却把这个假象当作现实，并且事实上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对此，马克思紧接着还进一步讽刺：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自然研究者曾经发现，鼻烟草和画像由何种自然属性依照一定比例相互成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页。

4 [美] 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14页。

为“等价物”。<sup>1</sup>由此可见，紧紧抓住假象的李嘉图虽然没能澄清其劳动价值论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学范畴，如抽象劳动、商品价值、工资、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真实的分析性与结构性差异，但其真正错误却在于他没能在其理论中形成现代劳动概念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基础。也就是说，其交换价值理论并没有同时承担起一种抽象劳动理论，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本质与历史形式。李嘉图分析劳动的方法是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sup>2</sup>因此，它导致了一种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纯粹数量上的理解和解释，即一种基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来加以实证论的说明。马克思拒斥了李嘉图等有关利润、工资和价值的古典解释，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解释在说明实现于商品中的劳动和商品应得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时，未能得出利润依赖于剥削的结论，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深信不疑并在《资本论》中竭力论证的。

实际上，从斯密和李嘉图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正要义关注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但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强调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同等重要性。与之相反，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主体和核心的角色赋予了广大工人阶级及其劳动。正是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社会性质的分析，而不是什么主观成见或伦理原则，使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实体。”<sup>3</sup>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决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价值的来源问题，其“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sup>1</sup>可以说，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就在于其劳动价值论不再仅仅是一种关于价值来源的学说，而成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性的主张、动力和作用的客观规律分析。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和起点，但给它以准确而明白的表述，并加以发挥，以他自己独创的、精辟的批判性风格，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才是马克思实现的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严密的论证和透彻的发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这里其劳动价值论内在地蕴含着和必然通向剩余价值论；或者说，剩余价值论是其劳动价值论必然的、合理的理论发展和逻辑延伸。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提供了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尚未解决的难题的“钥匙”。因此，“剩余价值”问题才是马克思《资本论》关注和分析的核心及实现政治经济学伟大革命之真正所在。

### 三、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转换

马克思《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是由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

---

1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4—115页。

2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3 [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5页。

论的辩证否定——创立剩余价值论实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探讨了利润、地租等价值的分割，并把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一完整的独立范畴，他们都只是在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转化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剩余价值的实质及来源，而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犯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批评的：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因而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只是在其中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而不是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sup>2</sup>但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回避的这个非常危险的“爆炸性问题”，却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关注和竭力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剩余价值的发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和资本增殖的秘密：资本作为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sup>3</sup>而资本作为“吸血鬼”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能，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从而导致资本主义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在这里，马克思正是通过从“劳动价值论”转向“剩余价值论”，才避免了以往经济学家的错误，才解开了“资本之谜”和“历史之谜”。也因此，剩余价值学说才既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对经济学所做的独特贡献，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甚至也不是把劳动价值论应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而是他下面的这种主张：资本家在正常的需求条件下所购买的劳动力，其使用价值是比劳动力本身所具有的交换价值来得更大的交换价值的源泉，并认为利润、地租和利息是从劳动力以交换价值用劳动力所生产的交换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中得来的。<sup>4</sup>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揭示出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来源及其阶级剥削本质。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就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和创建了剩余价值论。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强调：“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sup>1</sup>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是看到剩余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而不能从这些特殊形式中把它抽象出来作为一个一般形式的独立经济学范畴。更重要的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所以

---

1 [美]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2 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0 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9 页。

4 [美] 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4 页。

他们只关注剩余价值量的变化原因，而从不考虑剩余价值的起源，更根本无法触及剩余价值的阶级本质。为此，马克思在批评斯密和李嘉图对剩余价值的理解时指出：“斯密对于剩余价值，在事实上，虽然在一个确定的和其特殊形态有别的范畴上研究，但在表现上没有这样做。他是把剩余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利润形态，直接混而为一了。这个缺点，在李嘉图以及一切他的后继者的场合，是保留着。这个缺点，引起了许多不一贯，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许多无思想的见解。对于这种不一贯和矛盾，李嘉图学派只能经院式的，用一种空洞的语句，尝试去解决。粗率的经验主义，激变为谬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了。”<sup>2</sup>在这里，斯密和李嘉图的共同错误在于：他们不是明确探讨利润或地租等种种特殊剩余价值形态，将其抽象和上升为独立的一般形态，而是把那种特殊形态直接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当作“劳动者在原料上面应用的劳动”的扣除额来考察。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不能明确地分割“劳动”，却能相对明确地分割“(剩余)价值”。但这一“分割”的结果，却使剩余价值这一完整的独立形态及其剥削本质被以利润或地租之名所分化和掩盖，并同时被数量化、进而形而上学化了。

在马克思这里，价值和价格的量化问题并非《资本论》真正的关注所在。马克思没有兴趣去探究商品的使用价值问题，或者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数量问题。马克思的兴趣在于考察劳动产品之为商品的历史和社会机制的基础——一个基于商品交换、抽象劳动与利润的经济体系得以可能的历史条件与结构条件。问题不在于一个特定商品中凝聚了多少劳动，而在于是什么社会劳动形式使得一种商品和货币得以可能。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sup>3</sup>这才是马克思的核心关怀所在，也是其劳动价值理论的真正目的所在——不是去确定一个商品的价格，而是确定商品生产背后真实的经济—社会原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而揭示和建构一种“剩余价值论的逻辑”。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给出一套直接的劳动价值论逻辑来建立其对资本的批判，而毋宁说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把从斯密到李嘉图的传统劳动价值论重新改写进入一种社会学的、历史的价值理论当中，从而发展出一种反映阶级关系的剩余价值论逻辑：马克思“在李嘉图使用利润这个名词的地方使用了剩余价值”。<sup>4</sup>由此可见，只有像马克思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人，才能够和敢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止步的地方接踵而起，推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走向“剩余价值论的逻辑”。也就是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较来说，马克思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关系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已经是“剩余价值论”了。

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真正革命性组成部分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其在马克思那

---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0页。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2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4 [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里出现的完满形式——既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的范例(它核算出资本主义按规定对工人所进行的诈骗),也不是从道德上利用经济学要求资本家退还工人“完全的劳动收入”中被侵占的部分,更确切地说,它作为经济学理论是由此出发的:资本家通过公平的交易“正常地”获得在其企业中由他利用的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在此交易中工人在工资里换进了对于他出卖的“商品”来说完全的等价物。资本家在此交易中的优势不是产生于经济,而是产生于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资本家作为实际的生产手段的垄断占有者,把为了按其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买到的劳动力,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而用于生产商品。<sup>1</sup>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通过劳动的“公平交易”而自然而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实质和秘密。正是马克思对这一剩余价值实质和秘密的发现,在根本上揭示和阐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等价交换之价值规律的“悖论”——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并存。本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作为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生产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下,却出现了表面的商品交换平等和实际的劳动力交换不平等,也即所谓的价值规律与不等价交换现实的矛盾。斯密对这个“悖论”采取了由劳动价值论转向以“劳动的支配权”为基础的价值论的态度,这样一来,就把价值规律的真正实现归结于前资本主义了。李嘉图虽然前进了一步,阐述了商品的等价交换与劳动力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间的区别,并把它当作“价值规律的例外”来叙述,但他未能说明这个“例外”是怎样与价值规律相一致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sup>2</sup>而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刻剖析,准确地揭示和说明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的现代不平等现象,指出所谓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一个幌子和骗局,是为了保证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由此可见,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值规律的确是等价交换的规律,但一旦它得以实现并居于主导地位,便暴露出其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规律的实质,也即必然会从劳动价值论走向剩余价值论。但对这一最本质而重要的根本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接触到了边缘,却由于其阶级立场所限,最终难以发现问题的实质而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对此马克思强调:“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sup>3</sup>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中开辟新出路,将剩余价值自觉地完整揭示和阐述出来的,正是剥开资产阶级的皮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取剩余价值的所有商品交换背后深层的特殊经济运动规律和支配逻辑。在马克思这里,剩余价值不单是劳动的产物,而且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支配结构的产物。也就是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1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7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

指向的是要瓦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整个“拜物教”进路，以期发展出政治经济学具体的社会历史范畴，并借之解开“资本”作为普遍永恒概念的魔咒，进而发现和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版本的劳动价值规律戏剧性地解开了一个古老的关于市场的谜（人们何以能从公平交易中获利？）”<sup>1</sup>——剩余价值之谜。剩余价值问题才是马克思“四大卷”（其中第四卷直接就以“剩余价值理论”命名）《资本论》关注和研究的核心主题。为此，恩格斯既强调关于“剩余价值”的一章是《资本论》第一卷中写得“最光辉的两章”之一，又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发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包括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sup>2</sup>因为正是由于剩余价值及其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在《资本论》这里“豁然开朗了”。马克思第一次揭开了剩余价值的庐山真面目，并在此基础上第一个合理阐明了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和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趋势。所以，剩余价值之谜的解决是马克思《资本论》“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sup>3</sup>

《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的批判与超越，是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不能达到的。因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转变”和“逻辑转换”。而这一主题和逻辑的变换，实际上就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逻辑”，向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逻辑”的转变。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商品、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范畴才得到了合理的阐释及其历史性内涵，也最终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资本论》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恩格斯语）。由于《资本论》的出版，使得马克思第一次在经济学史上发现并科学地解释了剩余价值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和“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sup>4</sup>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都被暴露无遗了，剩余价值学说成了射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脑袋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语）。所以说，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才是经济学上“最伟大的革命颠覆”。马克思不是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剩余价值论”，而是用“剩余价值论的逻辑”来解释“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真正是用“人体”解剖“猴体”而不是相反。在此意义上，促使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剩余价值论”。正是借助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才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改造和彻底超越，才最终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

1 [美] 詹姆斯：《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 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2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4 页。

语)。也因此,《资本论》才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作者: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通信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 号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130012)

E-mail: baigang1972@126.com      手机: 18243118861

#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技伦理观<sup>1</sup>

陈爱华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马克思非常重视大工业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资本论》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以当时大工业的发展为背景,阐发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何以促进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生成、加剧其社会伦理关系实体内在矛盾,进而蕴涵了对其社会伦理关系实体解构。就其本质而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技伦理观亦蕴涵了丰富的历史辩证法。

**关键词:**大工业; 伦理关系实体; 科技伦理观

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不仅在其三部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阐述了他的科技伦理思想,而且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2</sup>出发,以当时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的发展为背景,从历史辩证法的视域,论述大工业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实体形成及其科技伦理观。

## 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何以促进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生成?

首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生成了人与人(人—机器—人、工人(包括妇女、儿童)与资本家)、人与工厂、手工工场、人与大工业包括科学技术这些诸多伦理关系实体的社会伦理关系体系。

马克思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sup>3</sup>。在当时的工厂中,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

<sup>1</sup>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承担的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12BZX078)、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531页。



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然而，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切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

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所生成的伦理关系，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上。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就有一种依附性的伦理关系，这样，“其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旦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sup>1</sup>。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因为事实上，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因而，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秘诀(mysteries)，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字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字谜。然而，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sup>2</sup>。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sup>3</sup>。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时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sup>4</sup>。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的消极方面表现为，它在其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样，就使生成的与之相应的伦理关系始终处于动荡的变化之中。因为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所蕴涵的绝对的矛盾，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2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

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与此同时，这个矛盾又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

其次，资本主义大工业生成的伦理关系实体亦导致人们劳动伦理观的变革。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一方面，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必须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sup>1</sup>，并且使各种伦理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另一方面，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这种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sup>2</sup>。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与伦理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道路。

与此同时，马克思阐述了大工业对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变更的影响。过去人们要求“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这是手工业智慧的“顶峰”，也是职业伦理规范的要求。然而，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上述的这种职业伦理观及其规范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sup>3</sup>。

再者，大工业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工人—资本—资本家、工人—资本—机器、工人—机器（科学技术）—工人的伦理关系实体得以生成，而且生成了与之相应的伦理运作机制即使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关系的过渡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sup>4</sup>。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同时，又形成了相应的管理伦理规范：迫

<sup>1</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sup>3</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9页。

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从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这样，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sup>1</sup>。这种管理伦理规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 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何以加剧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内在矛盾？

首先，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促进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生成，而且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其伦理关系实体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人（工人）—机（机器体系、科学技术）伦理关系的对立，智力同体力劳动的分离，其本质是工人与资本—资本家伦理关系的对立。马克思揭示道，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工人的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其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其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sup>2</sup>。因此，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它在劳动过程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又由于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sup>3</sup>。

其次，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农业资本主义的伦理关系的生成，而这种伦理关系的生成过程充满了矛盾，是生产者的殉难史。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洞悉到，就当时的某些结果来看，“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末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sup>4</sup>。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

<sup>1</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464页。

<sup>3</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页。

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与此同时，劳动资料表现为这种伦理关系运作的手段，即成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一种异化的伦理关系：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所不同的是，由于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因而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sup>1</sup>。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伦理关系运作的代价，“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sup>2</sup>一个国家的例子，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复次，大工业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表现为，它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进而使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的伦理关系得到了保证。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深刻地揭示道，“资本主义生产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sup>1</sup>但是在殖民地，则是另一种情形。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由于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

---

<sup>1</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553页。

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

再者，马克思还从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聚的过程，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社会伦理关系实体之间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sup>2</sup>这样，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离和独立。而资本的积聚，则是以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

至于资本和劳动的中间结合体的丧失资本，“不过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sup>3</sup>生产则以异化的形式，在取得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的同时，转化为社会生产。这就是社会劳动以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公共使用。资本家作为上述过程，即同时加速这一社会生产，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义为自己刮取收入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和封建主一样，封建主的要求连同他们的服务，就曾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sup>4</sup>。

此外，马克思还就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其后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社会伦理关系实体之间的内在矛盾影响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他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以不断增长的资本积聚为前提，因而以较小的资本家日益丧失资本为前提。一般说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规律的结果。”<sup>5</sup>如果我们摘除这个事实的对抗性质，即摘除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所具有的那个特点，那末这个事实，即这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集中化过程，将表明什么呢？不外是，生产丧失自己的私有性质并成为社会过程，并且这是现实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即不象在任何交换中那样，生产具有社会性是由于生产者的绝对的相互依赖性，由于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表现为抽象的社会劳动（货币）。因为生产资料现在是作为公共的生产资料被使用，因而——不是由于它们是单个人的财产，而是由于它们对生产的关系——作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被使用；各个企业的劳动现在同样也是以社会规模来完成。这样，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的解构。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8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8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348页。

<sup>4</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349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494页。

### 三、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何以解构其社会伦理关系实体？

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之所以解构其社会伦理关系实体，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与生产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同时使科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sup>1</sup>一般说来，“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是形成一般利润率的现实前提。然而，这种灵活性以劳动的确定形式无关紧要为前提。马克思揭示道，在这里，实际上发生了（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以下两种情况之间的磨擦：一方面，分工和机器赋予劳动能力以片面性，另一方面，这种劳动能力只作为任何一种劳动的现实的的可能性和资本相对立{这就使资本同它在行会工业中的不发达形式有了区别}，劳动投向这个方向还是投向另一个方向，要看在这个或那个生产领域里能获得什么样的利润，因此，各种不同的劳动量能够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sup>2</sup>。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伦理关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对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解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条件的这种分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工具变成了机器；劳动者在工厂劳动等等。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分散状态<sup>3</sup>。再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据此，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实体解构的必然性，“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sup>4</sup>。

其次，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实体解构具有必然性，而且指出了这种伦理关系实体解构的可能性。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通过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489页。

<sup>2</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490页。

<sup>3</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589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9页。

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sup>1</sup>。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增加，使资本的积累也迅速增加。由单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但是“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sup>2</sup>。这样，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再者，这种伦理关系实体解构的可能性还表现为，上述的那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1</sup>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技伦理观的考察，可以体悟到以下几点：一是在马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806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马克思的科技伦理观中，蕴涵了丰富的历史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既贯穿于对商品、资本等经济学范畴的分析之中，又贯穿于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等历史的分析之中，同时也蕴涵了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无产阶级（工人）的历史生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生成的反思之中，进而使马克思的科技伦理观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丰富的层次性、系统的综合性、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这正如一位研究《资本论》的学者所说，“《资本论》的作者不是用教条的、说教的方法去说明那些现成的……结果，而是让读者看到获得这些结果的全过程，看到引向这些结果的全部研究过程”<sup>2</sup>。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人本主义的科技伦理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标志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技伦理观的生成。二是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技伦理观中蕴涵了马克思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伦理关系实体生成的论述和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造成的种种负效应的揭示中可以深切地感到，他对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深切的同情，对探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的坚持不懈的求索精神，进而透露出他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对人类解放的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三是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对社会发展的革命作用的充分肯定，这是《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中所阐释的科技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伦理关系实体的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坚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而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及其科技伦理观，正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正负效应，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使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sup>2</sup> 艾·瓦·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 德勒兹的内在性概念

陈灯杰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德勒兹被称为“创造概念的大师”,其思想的大厦是由一系列概念构筑而成的,因而,对其哲学的理解应建立在对其所创造的概念的把握的基础上。“内在性”作为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贯穿在德勒兹几乎所有的著作当中,通过对“内在性”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德勒兹哲学。

**关键词:** 德勒兹; 内在性; 本体论; 伦理

德勒兹的思想包罗万象、十分庞杂,举凡哲学、文学、心理学、绘画、电影、建筑等诸多领域,他都有涉猎。在这些著作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能够代表德勒兹哲学特色的概念,即“内在性”。因此,有学者干脆把德勒兹哲学称作“内在性哲学”,把德勒兹的伦理学称作“内在性伦理学”。

“内在性”这一概念其实并不是德勒兹的首创,他只是将这个古老的概念重新激活,并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内涵。早在德勒兹之前,柏拉图、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福柯等,都对内在性作过相应的论述。不过,在德勒兹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性肇始于康德主义的哲学传统。<sup>1</sup>其中,尤其深受康德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

那么,究竟何谓内在性?对于这个问题,德勒兹本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在其后期著作《什么是哲学》一书中对这个概念作了一些相应的描述。书中,他一方面从宏观的层面道出了内在性与哲学的关系:“为哲学构拟平面”;<sup>2</sup>另一方面,他又从微观的层面给出了内在性的具体特征:“思维和本质”。<sup>3</sup>概括地说,内在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规定——形式的层面和本体论的层面。从形式上讲,内在性作为一种哲学,它不诉诸于任何超验的存在,而只从自身得到规定;从本体论上讲,内在性哲学坚持思想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思想能够充分地表达存在。<sup>4</sup>德勒兹的内在性思想,从形式上来说,主要是受到康德先验哲学的启发,从本体论上来说,主要是吸收了斯宾诺莎实体概念之精华和要义。

---

作者简介:陈灯杰(1983-),男,汉族,安徽省滁州市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

<sup>1</sup> Christian Kerslake, *Immanence and the Vertigo of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Deleuz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

<sup>2</sup>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组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sup>3</sup>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组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sup>4</sup> Christian Kerslake, *Immanence and the Vertigo of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Deleuz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 一、“内在性”概念的理论来源一：康德

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建构主义：创造概念和构拟平面。他说：“一个内在性平面是哲学的绝对土壤、它的地球或者它的脱离领土的活动、它的基础，哲学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创造概念。”<sup>1</sup>

这里，德勒兹把内在性平面视作哲学的基础和起点，坚持有什么样的内在性平面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很明显，就这一点而言，德勒兹所从事的工作和康德所致力的事业是相同的——都是一些奠基性的工作，即为哲学寻找可靠的起点或基础。不同的是，关于这个起点或基础，康德给出的是先验性，而德勒兹给出的是内在性。

德勒兹表明，哲学真正开始它的事业——理性的奠基——是从休谟、康德和后康德主义开始的。<sup>2</sup>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西方哲学脱胎于希腊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带有泛神论的影子，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更是将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超验性在这个时候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近代，为了对抗这种外在性或超验性，将哲学应有的权利归还给它本身，哲学家纷纷开始倡导内在性（人的理性）在哲学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哲学寻找一个新的起点和可靠的基础。而康德正是这一阵营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主张用客体必须服从主体的原则来代替主体对客体（超验的存在，如上帝）的依赖，从而把一种内在性引入哲学，实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反转。从此，主体不再作为对客体的反映，不再作为一种隶属于客体的被动的存在并从客体那里得到解释；相反，主体从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成为一股自由的、积极的、肯定的力量，开始为自然立法。因此，我们说“哥白尼革命”体现的正是一种内在性的原则：不是通过外在来论证内在的合理性，而是一切外在的事物均需通过这个内在而得到解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休谟的习惯的主体不同，康德的主体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经验的主体，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的、先验的主体。这个主体先天地具有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具有知性和理性，正是通过内、外这两种直觉，我们感受到万物的存在和时间的流逝，正是通过知性和理性，我们能够进行判断和推理，赋予宇宙以秩序。总之，正是主体所具有的这些内在的、先验的形式使得外在的、经验的存在成为可能。

康德的贡献是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内在性思想，从而为德勒兹内在性概念的创造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对于康德的这一贡献，德勒兹曾毫不隐晦地说，内在性就是先验性除去主观性。可见，康德的内在性思想对他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把康德的内在性等同于德勒兹的内在性，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事实上，德勒兹对康德的内在性思想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德勒兹一方面肯定康德对内在性思想的发展所作

---

<sup>1</sup>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组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sup>2</sup> Christian Kerslake, *Immanence and the Vertigo of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Deleuz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

出的贡献，即拒斥超验性，并在此基础上把内在性（先验性）引入哲学，重建内在性哲学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于康德的保守性及其主观性，认为康德的纯粹先验性还不够纯粹，还带有主观的、意识的色彩，尽管这种主观性是纯粹的主观性（逻辑的而非心理的），但正是这种主观性扼杀了内在性，让内在性在取代超验性（客观的超验性）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超验性（主观的超验性）。套用海德格尔评论尼采的话：康德在反对客观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主观的形而上学。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康德跑到内在性的内部去寻找超验性，从而把内在性变成了内在于某物（这里指主体）了。内在性只是内在于其本身，与客体或主体无关，客体或主体充其量只是内在性运动的结果而已。这正如德勒兹所说的那样：“主体是一种习性或习惯，仅仅是内在性领域里的一种习惯而已，一种说‘我…’的习惯。”<sup>1</sup> 所以，康德的内在性思想仍需继续向前迈进，直到将主体彻底消融掉，不再有说“我…”的习惯为止。

康德之后，后康德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内在性这个主题。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紧接着福柯宣告人也死了。他说，无论是上帝，还是人或者意识，都不能作为认知的基础或起点，因为他们都不是从内在性出发来解释世界的，自己尚待解释。德勒兹十分赞同福柯的观点：人的意识也是一种外在性，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子，所以不能作为哲学和认知的起点，必须将之从内在性中剔除。所以，只有当内在性将超验性从自身中层层剥离，不再屈从于任何形式的超验性——客观的或主观的，仅从自身得到规定时，内在性就接近其真实情况了。

## 二、“内在性”概念的理论来源二：斯宾诺莎

如果说康德的贡献在于开启现代意义上的内在性概念，让内在性从此不再屈从于超验性（客观的超验性），从而使内在性从形式上得到规定，那么，斯宾诺莎则是从本体论层面奠定了内在性概念的思想内涵。

德勒兹关于内在性的本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一书中。书中，德勒兹将内在性与表现性关联起来，通过揭示内在性与表现性之间的关系——“内在性具有表现性，表现性就是内在性，内在性所处的是一个表现性的逻辑体系。”<sup>2</sup>——来阐释内在性概念。德勒兹首先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从内在性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来一步步地抵达斯宾诺莎的内在性思想。他指出，内在性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起源于柏拉图，具体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分有说”。<sup>3</sup> 可是，“分有的原则总是从分有者那里去讨论。这分有者总是像一个从外面

<sup>1</sup> [法]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组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sup>2</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3页。

<sup>3</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6页。

施加于被分有的偶然性，被分有者承受了这个暴力。”<sup>1</sup>诚然，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理念是事物模仿和分有的原型，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非运动性，即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力量。试想一个不动的存在如何解释运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全部的力量来自于外部——“分有者”。因此，分有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与内在性“内在于自身”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也是后来亚里士多德驳斥理念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期柏拉图学派则致力于将此种倾向加以反转。他们不再从分有者那里开始，来思考藉由什么外在的力量使分有成为可能，而是在被分有者本身中发现分有之基础的内在原则与运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不仅描述了世界，还对世界的起源作了说明：“太一必然在其所给与的诸物之上，太一给予它所不是者，或说它并非其所给与之物。”<sup>2</sup>他的流溢说成功地逆转了柏拉图的分有说，使得被分有者即太一获得了分有说不曾拥有的潜能与力量。不过，说太一所生产的结果不在自身之内，亦即结果并不留在流溢因之中，这又与内在因相去甚远。因为，斯宾诺莎在定义内在因的时候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因或理由在生产事物同时仍留在自身之中。即是说，在内在因中，结果仍在原因之中，内在因并不高于其所生产的事物。“内在因指涉了一种纯粹的本体论……太一只是实体及它之所是的性质……纯粹的内在性要求存有的平等性……第一因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事物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远隔的因果性。”<sup>3</sup>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内在性的两个要义：第一，内在性拒斥超验性，它既不从属于外在的超验性，也不从属于内在的超验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必然是一种本体论：太一/上帝并不外在于它所创造的世界，而是存在于它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并和它所创造的世界一起存在；<sup>4</sup>第二，超验性和平等性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内在性拒斥超验性所达到的就是一种平等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相同属性下的诸样态并非以其等级高下，亦即以其离上帝距离的远近被区分。它们是透过其各自本质之量的程度或能力而达致在量上的区分，每个样态的本质的程度或能力直接分有了神的实体。”<sup>5</sup>即是说，这种平等性不是从外部来说的——因为从逻辑上讲，属性与上帝之间的距离确实要比样态与上帝之间的距离近，而是从内部来说的，即上帝根据样态的“本质的程度或能力”赋予其相应的“神的实体”，这里，分配在每一个样态头上的份额可能是不等的，但对于每一个样态的本质或完满程度来说则是相等的。

纯粹内在性要求一种平等性，且这种平等性与接近因或远隔因无关。除此之外，纯粹内在性还要求一单义的存有，“该存有形成自然，并且包含诸多肯定性的形式，这些形式对生产者及其产物、原因和结果是共同的。”<sup>6</sup>单义性在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就是内在性作为一种本体论进行生产的非超验性和肯定性。超验性是含混的：它在预设一种外在世界的存在者的同

<sup>1</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66 页。

<sup>2</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68 页。

<sup>3</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70 页。

<sup>4</sup> Miguel de Beistegui, *Immanence: Deleuze and Philoso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0.

<sup>5</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81 页。

<sup>6</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71 页。

时又预设了一种认知的或再现的存在者——心灵或“人”。而单义性只预设一种没有基础和认知者的生成的平面。在单义性中，“生产者和其产物、原因和结果”无论作为虚拟的存在还是作为现实的存在，都具有真实性和肯定性，这里不曾有外在的、否定的因素存在。

流溢说给予了我们内在因的观念。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内在性是在包含和展开这一对概念中得到体现的。“所有事物都向上帝呈现，后者包含前者。上帝向所有事物呈现，后者展开并暗含前者。”<sup>1</sup>“新的内在性原则的重点便是表现观念。”<sup>2</sup>内在性具有表现性，表现性就是内在性。内在性在表现性的逻辑体系中得到表达和呈现。不过，表现主义的倾向在基督教神学当中并未得到彻底的发展。因为神存在的超越性是基督教的必要前提，通过抬高这个前提，基督教的理论仍在压抑表现。表现观念最终是在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中得到充分体现的。

斯宾诺莎的表现观念是通过实体的三种呈现方式体现出来的。首先，实体在自身之内表现自身。这第一个表现是实体通过属性来表现本质，这一表现发生在实体内部，因而是形式的、质性的。“第一个表现，它先于所有的生产，是实体自身的构建。平等性原则在这里一体适用：不仅实体等于其所有属性的总和，各个属性也彼此相等，没有哪一个属性高于或低于其它属性。”<sup>3</sup>所以，第一个表现体现的是内在性的一种平等性。其次，实体向其自身表现自身。这第二个表现指的是，实体在上帝的观念中表现自己，并且上帝在表现自己的同时也理解自己。“它（第二个表现）关涉平等性原则的一种新的应用方式：一方面是与上帝观念相应的思想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相应于诸属性之存在的力量，而这两者是等同的。”<sup>4</sup>第二个表现体现的是内在性的本体论内涵，即思想和存在的一致性，思想能够表达存在。最后，实体再表现自身，即诸属性在诸样态中表现自身。“这第三个表现是样态自身的生产：上帝的理解与上帝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他理解自身的同时不可能不生产无限的事物，也不可能不理解一切他所生产的东西。”<sup>1</sup>这第三个表现从本质上来说与第二个表现所传达的是同一个信息：上帝在表现自身的同时也理解自己。只不过，这后一个表现越出了实体自身的范围，将上帝的存在和理智体现在样态之中。

通过“表现”概念，内在性思想在斯宾诺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斯宾诺莎那里，神不外乎是表现的实体，实体不外乎是它的表现。并不是先有实体然后才有实体的不同表现方式。仅仅存在的是不同的表现，没有任何表现外在于或以其他表现为基础。实体不需要假借外力，仅仅通过自身表现自己。上帝/实体通过表现呈现自身，这体现的正是内在性作为一种本体论的理论特征。不过这种本体论不是从基础或根基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通过内在性所具有的表现性来说的，即通过实体的自我呈现表现出来的。

<sup>1</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73 页。

<sup>2</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84 页。

<sup>3</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84 页。

<sup>4</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84 页。

### 三、内在性概念的特质

德勒兹的内在性概念导源于康德的哲学传统，成型于斯宾诺莎哲学，并与哲学史上的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性思想发生遭遇、碰撞、修剪、剥离、共振，最终形成了这个专属德勒兹的内在性概念。德勒兹本人没有对内在性概念做过专门的定义，只是作了一些零星的描述，分布在他的一些著作当中。通过对德勒兹相关文本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德勒兹内在性概念的特征归结如下：

（一）反超验性。德勒兹创造出内在性概念，进而建立一种内在性哲学，其目的和康德当初创立先验哲学是一样的，是出于对超验性的不满和对真理的执著，以及为哲学寻找一个可靠的起点和基础。只不过，德勒兹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他比康德走得更远：他不仅反对客观的超验性，同时也反对主观的超验性。为了说明内在性反超验性的这一特征——内在性只内在于其本身，而不内在于某物或人，德勒兹甚至说，只有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才有真正的哲学。可见他的这种反超验性的决心和立场是如何之坚定。

（二）内在性是一种本体论，并且思想和存在是同一回事。德勒兹在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了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内在性的要义：上帝/实体是无限和全能，具有理智和实存的两面，二者是平行的，上帝/实体通过表现将自己的本质呈现在属性和样态当中，而无需假借外力。作为一种内在因，内在性在生产事物时候不仅自己没有离开自身，而且其生产的结果也在自身之内。作为一种本体论，内在性坚持思想和存在的同一，且思想能够充分地表达存在。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就是坚持内在性，因为如果思维和存在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一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那么无论是谁从属于谁，都会把内在性的内在于其本身变成内在于某物，从而陷入超验性。因此，从内在性所具有的表现性、平等性及其所实现的肯定性这个意义上讲，内在性是一种本体论。

（三）虚拟性。内在性本身就是虚拟性。不过，“我们所说的虚拟不是没有现实的东西，而是致力于按照赋予其特殊现实性的平面进行现实化的过程。”<sup>2</sup> 德勒兹认为，此前哲学家们把虚拟与真实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虚拟不是与真实相对立，而是与现实相对立。作为一种结构的虚拟性与作为一种形式的内在性一样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是潜在的。“虚拟就其虚拟性而言完全是真实的。现实是事态、身体、身体的混合和个体性。虚拟是非物质的事件和连续的平面上的惊奇，它属于纯粹过去——从未被完全呈现的过去。”<sup>3</sup> 德勒兹在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上看待过去，把过去视作纯粹的本体。这样，过去作为一种虚拟的存在，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是所有特殊的现在“转变”的条件，并且，永远是过去决定现在和将来，而不是现在或将来决定过去。“我们

<sup>1</sup> [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4页。

<sup>2</sup>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陈永国、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sup>3</sup> Adrian 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96-297.

不是从现在走向过去，从感知走向回忆，而是从过去走向现在，从回忆走向感知。”<sup>1</sup>和内在性一样，虚拟性也是一种本体论，“它是生产生存现实的基础，与内在于理式的时间和空间相一致的”。<sup>2</sup>不同的是，内在性是相对于超验性来说的，而虚拟性是相对于现实性来说的。

#### 四、内在性：一种伦理

内在性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它不在某物之中，也不朝向某物，它即不依赖于某个客体，也不依赖于某个主体。而是立足于自身，肯定自身存在和价值，主张生命的自由流淌。内在性就其不让自身受到任何外在形象的奴役来说，它是一种伦理，一种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相对的内在性伦理。

德勒兹在柏格森、尼采和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了这种内在性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内涵。在德勒兹看来，柏格森所开创的从生物学而非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探讨生命的全新视野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观，尼采的虚无主义则终结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将一种内在性的标准引入伦理学，而斯宾诺莎明确把内在性视为一种伦理学，并对内在性伦理的内涵特征作了系统的阐述。

德勒兹认为，柏格森的虚拟与现实、刺激与反应等概念，作为一种全新的配置形式，体现的是一种能够在时间中呈现，并且不是把普遍的原则强加到变动的环境之上的新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虚拟与现实分别代表了生命的两种形态。虚拟是生命的潜在状态、微观结构；现实是潜在生命的现实化，是生命的客观呈现。刺激-反应表明了生命的运作模式：直觉的，而非认知的。这些概念表明，在柏格森那里，个体生命不再朝向某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只是作为一个配置、一架机器，并且这个配置或机器只有通过与其他配置或机器的连接和相互作用，才能增强我们的行为能力。

在西方伦理史，尼采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哲学家，他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破而不立的思想家。其实，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只是手段，它的作用就像锤子一样，目的是摧毁那些旧的、形而上学的偶像——先验的理念，从而诉诸于一种内在的价值形式或评价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价值或评价并不是作为一个不变的原则而存在，而是暗含着批判性的颠覆，其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问题，或者说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评价究其本质不是价值，而是存在方式，是那些作出判断和评估的人的生存模式，它充当价值的原则，人们以这一价值原则为基础进行判断。”<sup>1</sup> 尼采摒弃一切外在的、超验的理念，以个体自身的“信念、情感与思想”作为生存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这对德勒兹的内在性伦理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德勒兹认为，真正实现内在性和伦理学的通联，从而建立一种内在性伦理学的是斯宾诺

---

<sup>1</sup> [法]吉尔·德勒兹：《康德柏格森解读》，张宇凌、关群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sup>2</sup>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陈永国、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莎。其实，在斯宾诺莎那里，内在性和伦理学是一个回事，它们共通与一个本体论。内在性主张通过自身来表达自己，它是一种本体论。而伦理学也是一种本体论：“本体论和伦理学，性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之间没有距离，也不存在中介。”<sup>2</sup>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中，德勒兹使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把伦理学表述为“存在之内在诸样式之类型学”<sup>3</sup>，明确把伦理学和道德区别开来。依照德勒兹的观点，道德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这些外在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遵循的是善恶的原则，体现的是一种超验的价值。道德所关注的是个人对社会的既定规则或价值的服从，它完全是社会性的，仅仅与服从和不服从有关。而伦理学作为一种内在的生活方式，它关乎的是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而与之相关的存在的诸样式之质的好坏才是伦理学的评判标准。内在性伦理所关乎的好-坏标准才是宇宙中唯一真正的法则。

#### 4

那么，究竟何谓伦理学意义上的好坏？它的依据是什么？这就要从斯宾诺莎向哲学家提供的那个新的模式——身体，或存在的样式——说起了。我们知道，传统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身心二元对立、抑身扬心这一二值逻辑的基础之上的。斯宾诺莎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人们大谈特谈意识及其指令，意志及其结果，心灵如何驱使身体，——但是连身体能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这岂不是一种悖论？<sup>5</sup>为此，斯宾诺莎一改规范伦理学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取消意识和身体二元对立以及身体对意识的服从，主张把身体作为伦理学的主题，把好坏作为伦理学的标准。他指出，伦理学与价值、判断或职责无关，它只与身体的潜能、力量等状况有关。斯宾诺莎把伦理学的好坏标准具体表述为：“所谓好就是指一个物体[身体]把它的关系直接与我们的关系相组合，而且以它的力量之全部或一部分，增益我们的力量。”“所谓坏就是指一个物体[身体]消解我们的身体之关系，即使它还与我们的诸部分相组合，但是以不符合我们的本质的方式，如破坏血液的毒药。”<sup>6</sup>。不难看出，斯宾诺莎和柏格森、尼采一样，主张一种被称作自然主义的伦理观——把身体的强度作为伦理学的前提，把好坏而不是善恶作为伦理学的标准，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观。

德勒兹在吸收前辈们的思想的基础上，后来又提出了“欲望”这个更加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概念，以作为伦理学的主题。这样一来，伦理学的问题就集中围绕着“欲望”这个概念而被表述为：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德勒兹沿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指出“人的本质是欲望”。不过，德勒兹的欲望概念已不再是传统哲学中的那个从属于理性的二级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本源意义的概念，甚至理性都要从欲望这里得到解释。德勒兹的“欲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为了突出欲望作为一种本源性力量的生产性特征，德勒兹将欲望和机器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褶子：欲望-机器。如此一来，

<sup>1</sup> [法]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sup>2</sup> Miguel de Beistegui, *Immanence: Deleuze and Philoso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05.

<sup>3</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7 页。

<sup>4</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7 页。

<sup>5</sup> 《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二，附释。

<sup>6</sup> [法] 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 页。



整个世界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机器的世界：“各种东西都不过是一架机器。”<sup>1</sup> 而宇宙的运行不过是机器的生产过程：“当下并不存在或是人或是自然之类的东西，而是有一种过程，它在彼者中产生此者，并将有关机器搭配起来。”<sup>2</sup>

德勒兹用机器来表述欲望，看似疯狂至极，实则让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德勒兹用机器描述生产：不是某人对某物的生产，而是为了自身的生成而进行的生产。并且，生命无一不是机器，所有的生命唯有通过与其他机器的连接、作用，才会成为它自身所是的东西。机器的生产性特征与伦理学反超验性的内在性特征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经由一种横向的连接而实现的自身的生成与发展。所以说，德勒兹的欲望机器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内在性伦理学：“没有主体性或组织化的中心，它只是它自身所生产的连接的生产，它就是它自身所为。”<sup>3</sup>

作者简介：

陈灯杰（1983-），男，汉族，安徽省滁州市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学橘园 5 栋

邮编：211189

手机：15851858159

邮箱：chendengjie\_0201@163.com

---

<sup>1</sup>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2.

<sup>2</sup>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2.

<sup>3</sup>[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丛书：导读德勒兹》，龚重林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0 页。

#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解读：从《巴黎手稿》到《大纲》<sup>1</sup>

陈良斌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黑格尔的承认概念旨在解决自由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问题, 借助承认中介, 自由通过财产权及其内在环节(占有、交换与劳动)走向一种现实化的可能。马克思承认理论的抱负则在于无产阶级解放, 围绕着解放及其现实化的目标, 在批判黑格尔以及国民经济学的同时, 马克思主张扬弃私有财产, 实现生产交往基础上的真正的承认, 同时对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及其承认现象予以激烈批判。进入《大纲》的写作之后, 马克思意识到《巴黎手稿》及其《穆勒评注》所持的异化逻辑停留在表象的价值评判上, 不能历史地解开异化承认的症结, 只有通过资本的逻辑, 尤其是资本与劳动的“小流通”等关键环节, 才能真正抓住异化承认生成问题及其本质, 从而在根本上揭示工人阶级解放及其承认的现实化必须建立在彻底打破资本统治的基础上。

**关键词:**黑格尔; 马克思; 承认; 异化; 资本

**作者简介:**陈良斌(1981-)男, 江苏海门人, 法学博士,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与空间哲学。

“‘承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词。”<sup>2</sup>它其实拥有与政治哲学同样悠久的历史传统。正如福山所指出的那样, 从柏拉图的“激情”到马基雅维利的“追求荣耀的欲望”, 从卢梭的“自尊”到尼采的“红面野兽”,<sup>3</sup>都表达了承认的意蕴。当然, 承认概念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达到了空前的形而上高度。相较于近来黑格尔承认哲学的复兴, 人们却鲜少关注到马克思那里同样大量存在着有关承认概念的论述。那么, 马克思为何会提出承认概念? 马克思承认思想的发展是断裂的还是一以贯之的?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何种区别与联系? 厘清这些问题, 不仅有助于我们丰富和深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科学内涵的认知, 而且为我们重新梳理和理解承认概念思想史, 反思和回应承认概念背后所隐含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学理上的启示。

<sup>1</sup>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承认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3CZX012)、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项目(留金发[2015]3012号)的阶段性成果。

<sup>2</sup> [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 还是承认: 一个政治哲学对话》, 周穗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页。

<sup>3</sup>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 陈高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78页。

## 一、承认概念的缘起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源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章》中，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主奴关系”的承认形态。后经科耶夫、伊波利特、福山等人的阐发，“承认辩证法”成为《精神现象学》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甚至构成了黑格尔承认理论的一种标签式注解。但如果仅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关系”来理解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就主张抛开“主奴关系”的承认形态，以黑格尔早期的《耶拿手稿》（这里特指《伦理体系》和《实在哲学》）为依据，提出了“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态。尽管学界对霍氏的解读众说纷纭<sup>1</sup>，但是需要肯定的是，黑格尔的承认概念显然存在着多种形态，而非“主奴关系”这一种。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会提出承认概念？罗伯特·皮平（Robert B. Pippin）曾鲜明地提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本质上是为了回答自由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问题。<sup>2</sup>埃伦·伍德（Allen W. Wood）也认为，自由是黑格尔所谓的终极的善，为了论证人格的抽象自由也即抽象法权，黑格尔才引入了承认概念的探讨。<sup>3</sup>不同于自由主义传统中不受他者干预的自由，黑格尔的自由无疑是一种关系属性，包含了自我和他者。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自由的具体概念”就是“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他物中，守在自己本身那里……既守在自己身边而又重新返回到普遍物”。<sup>4</sup>这里的“守在自己身边”（bei sich selbst）是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自由就是自我“在他者之中守在自己身边”，这是黑格尔对于自由的一种全新表达，而承认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相较而言，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则凸显了承认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黑格尔明确指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sup>5</sup>在这里，黑格尔无疑吸收了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中“交互性关系”的承认形态，将他者作为自由的落脚点，使他者与自我的交互承认成为自由与自我意识的前提。但黑格尔超越费希特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将承认为自我意识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相反，在他看来，承认是一个‘过程’，是从‘生死斗争’开始的，并且经历过一个不对称的‘主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的自我为他人所承认，又不用以承认他人作为回报。在此过程中，自我获得了关于成为自由的自我意味着什么的更深刻的观念，并且这一过程的合乎理性的结果就是自由的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的交

<sup>1</sup> 霍耐特的观点直接引发了其与南希·弗雷泽的“再分配与承认”之争，弗雷泽认为霍耐特的承认模型具有严重缺陷，缺少了再分配的维度，而罗伯特·皮平则认为霍耐特的承认解读最终堕入了心理学解释的窠臼中。参见[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Robert Pippin,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 Agency as Ethical Life*,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3.

<sup>2</sup> Robert Pippin,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 Agency as Ethical Life*,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3.

<sup>3</sup> [美]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29页。

<sup>4</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sup>5</sup>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2页。

互意识，即彼此意识到对方都是拥有抽象法权的人格。”<sup>1</sup>可见，“主奴关系”的承认形态在本质上是为论证自由而服务的。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自由虽然经历了劳动的教化，却仍然停留在斯多葛主义阶段，仅仅是思想的或概念的东西的实现，而尚未现实化。黑格尔认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sup>2</sup>那么，如何来使自由意志现实化？黑格尔的回答是，“自由意志必须首先给自己以定在，而这种定在最初的感性材料就是事物，即外界的物”。<sup>3</sup>换言之，自由意志是将自身体现在外界的对象中，从而使其外化为定在。而自由的这一外化的最初过程就是所有权，确切而言，就是财产权。<sup>4</sup>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明确指出，“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sup>5</sup>

其实，财产权的论证思路在耶拿早期的《实在哲学》中就已经成型。在这里，黑格尔显然提出了一种新的承认形态——财产权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的本质就是承认。“一件物品之所以是我的财产是由于它被他者承认。但是究竟他者承认的是什么？这就是我所拥有的，也是我所占有的。”<sup>6</sup>因此，黑格尔的财产权概念虽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不尽相同。它是以相互承认或社会共识为前提，占有是个体主义的偶然行为，而财产则表现为必然的社会特质。此时，我的财产在获得承认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排他性。也就是说，我不能从第三方那里占有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已经被承认为他的所有物。如果我依然想获得这些他者的财产，那就不能通过“生死斗争”的方式，而可以采取交换的方式来取得。

在交换中，“每一方提供自己的所有物，否定（作为他的）自身存在，这种存在是以被承认的方式内蕴其中；另一方首先同意并接收它。双方都获得了承认；每一方都从另一方那里，收到了对另一方的占有……同意通过中介，接收它作为财产。”<sup>7</sup>在这里，一方面，财产因占有行为而具有的偶然性被彻底扬弃了，借助交换过程的相互承认而得以获得普遍性；另一方面，交换的本质还关系到两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在承认过程中的平等性，“自我面向另一自我的活动以及被他者承认，当一个自我关涉到所有物时，他想拥有的仅仅是我的意志的（同意），就像我自身面向他的所有物时，仅仅根据的是他的意志。（这就引起了）双方作为承认方的平等——（赋予）一种价值，物品的意义。”<sup>8</sup>

除了占有和交换来获得财产权，“一件存在的物品成为我的（财产），是通过一些符号的

<sup>1</sup> [美]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7-138 页。

<sup>2</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2 页。

<sup>3</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42 页。

<sup>4</sup> 财产权的引入，标志着黑格尔已经自觉地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尽管财产权概念的使用仍然是在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上。

<sup>5</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54 页。

<sup>6</sup> 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1806) with commentary*, Ed. & trans. Leo Rau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2.

<sup>7</sup> 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1806) with commentary*, Ed. & trans. Leo Rau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2.

<sup>8</sup> 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1806) with commentary*, Ed. & trans. Leo Rau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2, note 6.

方式，比如，我在上面付出的工作。”<sup>1</sup>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工作，就是劳动。黑格尔认为对象形式的真正消灭是通过劳动活动本身。<sup>2</sup>在他看来，劳动是原始享受的升华，它将欲望由最初的消灭性欲望改造为建设性欲望。<sup>3</sup>同时，劳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劳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互作用和教化……是一种相互承认，或是最高的个体性”。<sup>4</sup>劳动具有承认的特质，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以他人作为前提，从而使相互承认内化于劳动的过程之中。“劳动是人人为了我、我为人人的（活动），劳动成果享受是众人的享受。当每个人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服务时，个体才会作为个体而存在，此前，个体只是某种抽象、不真（的概念）。”<sup>5</sup>此后，在“主奴辩证法”中，奴隶就是经过劳动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受到了陶冶，意识到自由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对劳动与承认的论证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指出劳动对于承认的过度依赖将必然导致异化的出现，进而提出了一种劳动的辩证法。黑格尔颠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劳动的常识，即劳动是第一性的，交换是以劳动产品的剩余为前提，而这里劳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劳动是社会性的劳动，每个人都为众多的社会需求而劳动，每个人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但是，这种普遍依赖就会导致个体的劳动内容完全超出了其自身的需求。人们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其自身所需求的对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用于交换的商品。人的劳动就越来越沦为一种纯粹抽象的、机械的生产活动。具体而言，“α. 劳动的分工提高了制造物的积聚。……但是随着生产数目的提高，劳动的价值也开始下降；β. 劳动开始越来越死，它变成了机器的劳动，简单劳动者的技能越来越受到限制，工厂劳动者的意识不断枯竭，直至最后的麻木；γ. 同时劳动特殊种类与无限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完全不可想象，并变成了一种盲目的依赖性。因而会出现一些远在天边的行为切断了整个阶层的人群的劳动，而这些人都是通过它（他人的劳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而使得劳动变成剩余和无用的。”<sup>6</sup>其结果就是，原本旨在获取他人承认来达到普遍性，进而实现自由的劳动过程，竟然变成了奴役人们的桎梏。

## 二、异化劳动、生产交往与承认的非现实化

历史的机缘是如此地巧合：当青年黑格尔以自由为方向，借助承认概念的中介，引发了

---

<sup>1</sup> 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1806) with commentary*, Ed. & trans. Leo Rau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2-113.

<sup>2</sup> G. W. F. Hegel, *System of Ethical Life (1802/3)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 (Part III of the System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03/4)*, trans. H. S. Harris and T. M. Knox,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9, p.106.

<sup>3</sup> [以]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sup>4</sup> G. W. F. Hegel, *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Rechtsphilosophie*, ed. G. Lasson, Leipzig, 1913, S. 430. 转引自[以]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sup>5</sup> G. W. F. Hegel, *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1806) with commentary*, Ed. & trans. Leo Rauch,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0.

<sup>6</sup> G. W. F. Hegel, *System of Ethical life(1802/3)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Part III of the system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03/4)*, Ed. & trans. H. S. Harris & T. M. Knox,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有关异化劳动的探讨，竟会成为四十年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所着力研讨的主题。而马克思显然没有看过黑格尔的《耶拿手稿》，正如多年以后的卢卡奇未看到《巴黎手稿》却能准确推得马克思的主题一样。有趣的是，这三人在这里的关联竟然都围绕着异化劳动而展开。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对异化的理解上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卢卡奇曾在《青年黑格尔》中明确指出，黑格尔认为异化是劳动对象化的必然趋势，是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结构性宿命；而马克思则认为，劳动的异化存在着救赎的可能性，因为异化并不是生产过程本身所固有的，而只是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sup>1</sup>作为对比，黑格尔虽然同情并控诉工人的悲惨命运，但他的希望却放在官僚等级（阶级）身上，因为在他看来，官僚等级才是普遍的等级，他以社会状态的普遍利益为业。而在马克思看来，官僚等级表面上是服务于社会的普遍性利益，实际上却在追逐个体私利，中饱私囊，而只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才是普遍的阶级，因为他是一个“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sup>2</sup>的阶级，“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sup>3</sup>，更是一个“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sup>4</sup>的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承认概念——无产阶级解放，通过解放来打破无产阶级身上被侮辱、受蔑视的枷锁，恢复人的本质及其尊严，实现普遍承认。承认概念也就从抽象的思辨哲学转化为具体的政治目标。因此，自1843年起，马克思终生奋斗的事业就已经十分清晰。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承认概念“不仅对黑格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以不同形式变成了一项漫长的事业”。<sup>5</sup>

在这项漫长的事业提出明确目标之后，马克思基于《精神现象学》开始审视和批判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首先是从作为自由定在的私有财产开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承认，而是劳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sup>6</sup>而私有财产的关系则是由劳动、资本以及两者关系构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始终强调自由及其财产权的现实化，但最终实现的却是两者的非现实化，私有财产不是对自我的承认抑或人格的实现，而是异化的承认或人格的否定。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不管是自我还是他者，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动，它的必然的趋势都是从直接或间接的统一走向相互对立以及与自身的对立。“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sup>7</sup>在此次意义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其矛头直接指向私有财产。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丰富特性的彻底解放。

---

Press, 1979, p.248.

<sup>1</sup> Geor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p. 383-384.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sup>5</sup>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正是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马克思重新确立了对承认内涵的理解——“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sup>1</sup>在这里，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黑格尔抑或费希特那里，通过“自我是为他的存在”来继续表达一种主体间性的承认形态，而是力图在“当前的经济事实”中，揭示了一种复归人的本质（即生产劳动）的承认形态，即真正的承认。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借助生产劳动进一步详细探讨了这种承认状态——“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具体而言，“……（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sup>2</sup>除了第一层次主要针对经过扬弃的劳动是自由生命的体现，马克思分别从需要的交互满足、类活动与类意识的证实、社会本质的实现这三个层次阐释了承认概念的应然状态。

可见，马克思虽然明确地意识到要将承认概念引入历史的现实中，但是马克思此时对承认状态的评判标准以及私有财产的理解依然建立在与黑格尔相似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上，其理想状态中的类意识和类本质的引入更是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式印记。因此，潜在的逻辑就表现为由人的本质（类本质）的歪曲向人的本质（类本质）的复归这一人本主义的思维路径。这就体现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认为承认的现实化恰恰是一种非现实化，也就是一种极端的双重异化。具体而言，“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sup>3</sup>这里的自我异化是指异化劳动，也即自我的劳动产品不再是对我作为人的本质的承认，而相互异化则是指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异化承认。由此，我们发现这种人本主义的思维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此时对于承认的探讨只能围绕着承认的非现实化（异化）这个表象而展开，而无法有效地介入到表象背后的本质，来真正地解答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承认会必然走向非现实化。相较而言，黑格尔在此则是虚晃一枪，直接抛开了《耶拿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的现实揭示，诉诸抽象哲学的方式，在其客观精神（国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之中将自由的现实化与承认的本质相嫁接。

马克思拒斥黑格尔式“形式的抽象的理解”，他同样使用了黑格尔的交换环节作为分析对象，却以更为激烈的批判和更为丰富的视角向我们揭开了交换过程如何从人的本质需要的交互承认沦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和相互欺骗。一开始，交换的前提是出于双方的需要，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sup>2</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sup>3</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因为“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但是，你的需要或愿望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这是由于相互异化导致了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因此你并不具有支配这种产品的权力，相反，你还要依赖于我的中介，于是就赋予了我来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这就导致原本是我为你的需要而进行劳动成为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变成了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至此，“我们的交换无论从你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于是双方就不可避免地相互欺骗。“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sup>1</sup>

### 三、交换价值、“小流通”与资本逻辑

1856-1857年，由欧陆蔓延到美国所形成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给马克思带来极大的触动，他认为世界性的革命即将到来，其所预言的承认目标将以“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sup>2</sup>，因此，马克思开始加紧自己的研究工作。

摆在马克思面前，首当其冲的就是早期承认论述中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比如《巴黎手稿》中未曾阐释清楚私有财产与异化承认的内在逻辑关联，对于黑格尔的回应依然停留在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和表象的笼统批判上等等。马克思显然已不再满足于基于价值判断高度的抽象批判方式，转而开始思考如何以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从历史发展的源头对普鲁东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什么是财产”进行回应，并藉此将资本问题深入到对承认问题的探究中。这一工作其实最早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已经开始，但最终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完成的。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财产最初意味着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的，看作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sup>3</sup>就个体而言，他只能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如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的成员，才能将财产视为自己的。所以，财产的这种共同体属性（社会属性）就决定了财产不仅具有涉己性，而且还具有涉他性。就此而言，黑格尔的结论似乎并没有问题。因为在古代共同体社会中，财产关系的出现天然伴随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交互承认。

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以及斯密、李嘉图的出发点都是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

<sup>1</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虚构”<sup>1</sup>，其实际所指向的显然是现代市民社会，而不是古代社会。更有趣的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似乎古代社会与市民社会天然地并无二致，在财产关系上都会涉及到主体间的交互承认。但是，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观点与市民社会相比要崇高得多！这是由于在古代社会中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现代市民社会则相反，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则是生产的目的。虽然马克思接下来继续以类似《巴黎手稿》的论述方式来揭露 18 世纪市民社会的承认关系，但叙述的侧重点已经由权力之争转变为利益之争，比如马克思明确提出“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sup>2</sup>

那么，为什么古代共同体社会的承认关系不存在异化现象，而到了现代市民社会就会出现异化承认？是《巴黎手稿》所提到的私有制还是劳动异化？当我们带着上述疑问再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轨道上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扬弃了一切先入为主的回答，而客观地站在历史的立场来审视古代向现代转型中财产关系的嬗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代共同体的解体，财产关系的核心——所有权关系也随之解体，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与作为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之间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关系的解体以及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作为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解体。尤其是第三层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直接导致了自由劳动的出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划时代时刻的到来，因为一切要素皆已齐备，呼之欲出的便是资本！当资本的身影开始在现代社会的崛起时，马克思迅速地由财产关系的讨论过渡到资本的原始形成条件——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并从中挖掘出隐含其中的异化承认的成因。在《大纲》的《资本章》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表示，“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sup>3</sup>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端！由此，马克思开始采取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揭开承认问题的本质。

让我们回到《穆勒评注》中所讨论的物物交换过程，也即简单流通中，虽然是同一个议题，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发现出现异化承认的一个关键其实隐藏在交换价值的假象之中，确切地说就是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诚然，交换价值遵循的一个前提就是等价交换原则，因此，表面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依然是一派交互承认的自由平等，“他们交换的兑现给交换价值，等价物，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sup>4</sup>，“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sup>1</sup>马克思继续以抽丝剥茧式的手法向我们揭开这个等价交换背后的谜团：首先，“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2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9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4 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6 页。

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sup>2</sup>表现到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对于劳动力商品的拥有者——工人来说，劳动本身不能给他带来财富，只有拿它进行交换过后，才能带来收益，也即只有交换价值。其次，这一交换过程不仅不是自由的，更不是平等的。因为“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sup>3</sup>，相形之下，工人却依旧贫穷，因为他是不可能通过交换所获的那点工资来致富，这是由于工人的价值“由包含在他的商品中的对象化劳动决定的”<sup>4</sup>，它存在于工人的生命力之中，那么所谓的价值就是工人为了保持生命力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换句话说，资本所付出的报酬仅仅够工人维持自身的生命以便保持其使用价值。但是，资本却彻底攫取了活劳动的支配权，从而掌控了自身增殖的决定权！

为了进一步揭开资本的真面目，马克思直接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从流通领域中剥离开来，把它命名为“小流通”加以专门论述。他认为资本的“小流通”是“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sup>5</sup>也即资本对工人的巧取豪夺。因此，“价值过渡到资本时，等价物的交换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变成纯粹的形式，而相互性完全成了单方面的了。”<sup>6</sup>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是市民社会中承认关系的一个缩影。承认关系产生异化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它的相互性已经被资本所取消，正如“主奴辩证法”所形成的虚假承认一样，所不同的是，资本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而工人则充当了奴隶。在这里，资本对于工人的单方面承认（也即工资）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承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资本的野心显然是要永久地固化这种不平等的承认关系，从而维持资本的统治。为此，资本已经着手从建立世界市场和世界工厂这两个方面进行紧锣密鼓地筹备。一方面，是在空间上扩大交换的规模，建立起资本的世界市场。人们在世界市场中似乎建立起一种日益紧密和相互依赖的普遍性联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紧密关联联系并不是建立在自由的自主交往的基础上，而是被动地受到资本的操控。所以，“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sup>7</sup>另一方面，通过大工业的方式消除工人的独立分散性，全面建立起资本的世界工厂。“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通过这种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被集合起来，联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劳动是彼此独立进行的，”<sup>8</sup>资本就成为工人们共同的中心。同时，资本将工人们集中到一个生产地点，使工人们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的基础就只在于工作地点、监工的监督以及苛刻的工作纪律。除此以外，工人们是以异己的方式相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互集聚，“即使在工作之余，人与人之间也很难发生交往关系，只会出现彼此越来越冷漠、每个人都倍感孤独的局面。在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之下，工人的地位与机器无异，无产阶级陷入了绝对的贫困之中，不仅物质上极度的匮乏，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彻底地奴役，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承认都已经丧失殆尽，因此，无产阶级想要获得人的承认和尊严，就必须将资本的统治彻底地打碎。”<sup>1</sup>

## 四、简要的结论

综合上文对马克思承认概念的梳理和解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马克思前期的承认思想与后期的承认思想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在论证思路，《巴黎手稿》是在哲学人类学视域下，遵循着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首先在生产交往领域中设定真正的承认/承认的应然状态，然后刻画异化的承认/承认的实然状态，马克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在扬弃异化状态后，向真正的承认状态复归。而在异化承认的批判过程中，沿着自我异化（异化劳动）→相互异化（交换/生产交往异化）的线索而展开。异化逻辑虽然能直观地切中市民社会现实的矛盾，但是其缺点在于只限于表象的描述，而无法解释问题的本质，只能诉诸道德的批判，而不能彻底解释异化产生的原因，同时其复归的人本假设在本质上是抽象的。而《大纲》则是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遵循着历史主义的资本逻辑，沿着财产的历史形态→原始共同体财产关系的解体→自由劳动的出现→交换价值的虚假性→资本与劳动的“小流通”→资本的全面统治这一思路，具体地展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中资本是如何造成承认的异化。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推进主要体现在他已经自觉地扬弃了异化逻辑，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替代笼统的道德判断，将承认发生异化的关键原因及诸环节都历史地还原出来，这恰恰是资本逻辑优越于异化逻辑之处。

其次，马克思的承认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巴黎手稿》到《大纲》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承认概念演进的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条线索不断地发展推进。其中，主线是异化承认的批判，当早期承认概念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陷入表象性描述的困境之后，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继续追问异化承认的原因，最终借助资本逻辑成功解决异化承认之谜。此外，承认概念的演进还存在两条支线索：第一条是劳动的线索，劳动范畴串起了早期和后期承认概念的基本内涵。早期真正的承认概念因劳动产品的中介而获得意义，因劳动产品的否定而走向异化劳动和异化承认，到了后期，马克思意识到这种劳动的理解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因而将劳动范畴细化为自由劳动，并提出雇佣劳动（活劳动）问题和劳动者的联合问题；第二条是交换的线索，交换范畴则是承认概念生成的关键场所。早期承认概念是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而产生，并在市民社会条件下的现实交换过程中出现异化。交换范畴发展到后期，

<sup>1</sup> 陈良斌：《承认哲学的历史逻辑：黑格尔、马克思与当代左翼政治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1 页。

则演化成政治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等价交换）以及“小流通”中的形式交换。可见，马克思的承认概念正是经过上述多线索的演进得以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因此，霍耐特认为承认思想只存在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sup>1</sup>

再次，马克思的承认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克思的承认概念存在着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目标的承认与作为社会交往实践的承认这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无产阶级作为被蔑视的普遍阶级，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将争取无产阶级的普遍承认作为解放政治的目标来提出，所以，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抱负在于工人的解放事业，而普遍的承认始终是其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实践提出了承认概念的应然状态，也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肯定和人之交往关系本质的确证，并最终将其落实到一种面向现实的历史活动中来探讨。作为对比，21世纪以来承认政治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承认概念也通常表达为指向平等的话语诉求。对此，马克思承认概念的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告诉我们，承认是通过实践活动、通过劳动去赢得的，而绝不是纯粹的话语问题抑或心理问题。这一点恰恰是当代承认理论最大的症结所在。

---

<sup>1</sup>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154 页。

# 从后真相到新秩序：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

陈 忠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00）

**摘要：**后真相是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复杂化的一种表现，是对既有秩序构成方式、既有知识生产方式、既有政治合法性、既有利益结构等的新型别样挑战。后真相，反映与对应于当代复杂社会实在与社会结构中的别样社会性，一种处于主流社会建构之外的别样共同性。后真相是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利益性与情绪性的统一，生成性与土壤性的统一。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在总体上有可能加速向好，也有可能加速向坏。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新秩序，推动社会建构方式与运行方式的进一步合理化，对于应对后真相问题、规范后真相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别样社会性；别样共同性、公共领域、公共治理

“后真相”似乎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概念与现象，但反思现实与历史，后真相其实并不神秘，有其踪迹、趋势与规律可循。厘清后真相的别样社会实在、社会情绪属性，分析后真相产生的语境、技术、体系等原因，把握“后真相”挑战既有体系、走向“后秩序”的内在机理，对于应对、规范、治理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一、后真相：复杂社会的别样共同性

这是一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后真相是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复杂化的一种构成、表现、特点。当代社会，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传媒化、传统化、区域化、本土化等趋势相互交织、相互纠结、相互嵌入。在这种复杂的交织中，人们的利益、情感、生存、发展等需要不断地具体化、多样化；旧的需要还未满足，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人们之间的生存、发展、利益、情感等关系不断地裂变、重组。在这个变迁加速、日益复杂的社会，每个人都成为一种叠加状态的复杂主体，成为由日益多样的需要、能力、关系相互叠加的复杂人；每个人都同时性地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又可能同时性地不归属于任何具体类型的共同体。虽然，进入社会、进入共同体是人类的历史宿命、终极命运，虽然，现代社会的综合建制日益完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建构已经完备、已经可以关照到所有的社会共同性，不意味着社会建构不再需要变化。现时代，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在稳定的背后，表现出深刻的流动性、易变性、叠加性、互嵌性。后真相，其所反映与对应的正是当代复杂社会实在结构中的别样社会性，一种处于主流社会建构之外的别样共同性。

以日益发达、普及的传媒技术与日益便捷的交通条件为支撑，为了特定某种目的和需要，

人们日益有条件如“闪客”一般即时性地快速进入、结成某种行动共同体，又快速地退出这个行动共同体。一方面，各类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相互叠加；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也在不断生成。一方面，每个人都被多重而变化的多样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所叠加与嵌入；另一方面，相互叠加与嵌入的主体需要，又会生成、聚集成新的游离于既有体系之外的并产生社会后果的社会共同性。所谓后真相，其实是一种既具有流行特性，又会产生特定知识行动，并产生特定社会与政治后果的社会共同性。不管是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社会、后真相文化或其他以“后真相”冠名的对象，其本质都是一种社会共同性，一种没有被现有体系和公共领域充分关注到的“别样共同性”、“别样社会性”。后真相的深层本质是一种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认知、规范的共同主体需要、共同利益诉求、共同情感需要。

任何对象特别是整体性对象都有其趋势、节奏、规律可循，以后真相命名的流动社会性、别样共同性也是如此。

其一，城市社会是后真相生成的综合场域。后真相是一种特定的空间与社会存在，是城市型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思社会史、文明史，任何历史阶段都会有其后真相，都会有不被主流体系、主流社会所把握、认同的社会共同性。但在城市社会语境下，主流之外的共同性、社会性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过程是多样异质文明的聚集过程，也是多样社会性、多样共同性向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过程；另一方面，多样异质文明在聚集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要素、结构，新的主体需要，新的社会共同性。也就是说，城市化是聚集与变化的统一，在聚集与变化的叠加中，产生既有社会体系、社会建构、公共领域所没有反映、掌控、规范的另类社会性、别样共同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城市社会的推进，不断出现不同类型的后真相可能是一种常态。

其二，现代传媒是后真相生成的技术条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社会实在，后真相也是一种知识与情绪存在，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社会后果的共同情绪、集体无意识。在传统的知识传播条件下，即使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体制之外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利益情感诉求，这种体系之外的共同性也往往处于分散状态，很难形成集体行动，很难造成社会与政治后果。当代新媒体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化，则深刻地改变了这种状态。以新媒体为中介与手段，原来处于分散、离散状态的潜在的别样共同性，有条件迅速成为具体的集体知识、集体情绪，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催化某种集体行动、知识行动，对既有的社会建制、体系秩序、公共领域构成挑战。

其三，体系固化是后真相生成的制度原因。秩序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而由不同、具体公共部门构成的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与维护秩序的载体。但体系、建构、公共领域往往有天然的固化倾向。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科层制、专业分工、专业流程在公共领域中的推行，既提高了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使公共领域成为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催生、强化了公共领域的独立化、保守化、固化倾向。在应然的意义上，社会建构、公共领域需是反映、规范、守护、发展社会多样需要、共同利益的重要设置。但实践运行，

面对变化的社会，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需要、新情绪，公共领域、公共机构往往表现出具体的惰性、滞后性。体系、公共领域的固化是导致新出现的社会共同性、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规范、引导、疏导，而成为一种对既有体系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的“后真相力量”的制度原因。

## 二、后秩序：对既有体系的别样挑战

后真相往往走向“后秩序”。后真相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体系外的力量，对既有的秩序、体系构成了威胁与挑战，有可能使艰难建立起来的现有秩序进入一种失序、无序的“后秩序”状态。对既有体系而言，问题的难度与关键在于，后真相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可能不再采取传统的方式。而是借助新的媒体工具，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知识隐性传播的方式瓦解现有体系与秩序的知识合法性、信仰与信念的神圣性。在反思的意义上，在知识策略上，后真相力量自身，或假借、操纵、利用了后真相力量的某种力量，所直接瓦解与挑战的是现有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通过质疑现有体系所建构的已有真相的真实性，通过还原所谓的真相背后的真相，通过追求所谓更为真实甚至细节真实的背后真相，让人们对现有体系所建构、尊重的知识、真相、道德、伦理、信仰、信念等产生质疑、怀疑。瓦解了一个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一个体系的制度合法性、秩序合理性，瓦解了这样秩序本身。后真相对既有体系的挑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方式的别样挑战。其指向的一种没有得到反思与确认的未来，其发泄是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其导向的是对现有秩序的瓦解，而不是新秩序的建立。所以，与后真相对应的不是新秩序，而是“后秩序”——对现有秩序的简单破坏。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实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隐性、分散的社会共同性，其本身就具有无序性、情绪性、离散性、非理性等特征。把握后真相自身的构成性特征，对于把握后真相对既有秩序的别样挑战，把握后真相的可能秩序走向，具有基础意义。

其一，后真相是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后真相是当代城市社会、传媒社会所催生的一种别样共同体，反映、代表了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新的利益与情感诉求，并指向对固化、僵化体系与既得利益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是一种合理甚至积极的力量。但同时，后真相又是一种具有相当非理性特征的共同诉求，是一种处于自在状态，而不是自觉状态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后真相作为一种力量，是一种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自我知识、自我反思的相对离散性的力量。在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特别是后真相天然的离散性、非理性，使后真相所代表的力量、群体、个体有可能无序行动，或被某种力量、组织所代表、象征甚至利用，成为某种力量借力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反思历史与现实都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同后真相的真正群体的真正利益相偏离、背离甚至矛盾。

其二，后真相是利益性与情绪性的统一。后真相的深处是利益。虽然利益不是后真相的

全部，但利益性却是后真相的必然属性。表面看来，作为一种策略，后真相所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真相，后真相似乎并不追求或代表什么利益，但在所谓追求真相的背后总有利益的影子。没有同利益无关的真相，也没有同利益无关的后真相。当人们挑战某种真相时，其真正挑战的往往是代表、建构这种真相的主体的利益，当人们追求某种真相时，其真正追求的也往往是这种真相背后的或象征的利益。后真相所挑战不仅是既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既有的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更是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但也应该看到，后真相的这种利益追求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还没有凝成成熟的情感，还处于相对情绪化的阶段。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甚至强烈的情绪发泄色彩，这各行动并不希望追求真正的真相，而往往只是以追求所谓真相的名义的“污化”、“归罪”现存体系，其所采用的手段也往往并不道德，甚至不把道德性、真实性作为自身的原则和标准。

其三，后真相是生成性与土壤性的统一。在每个时期，都可能生成后真相情绪，都有生成后真相的条件与土壤，但后真相成为一种普遍甚至漫延的社会现实，则只可能生成于变化加速、时空压缩的当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种新对象、新现象、信息人们还未来得及熟悉与把握，又产生了更新的对象、现象、信息，这种快速的变化给人留下没有真相、来不及追求真相、追求真相没有价值的印象和感觉。也就是说，社会变化与信息变化的速率过快，是后真相情绪生成的重要土壤。同时，当后真相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时，又成为催生当代社会产生更多变化、更多信息、更多确定性的土壤。作为这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之生成物的后真相，又成为使这个社会产生更多不确定的土壤。一方面，生成物在土壤中生成，另一方面，生成物本身又成为了土壤。在这种相互生成、相互反哺、互为土壤中，人与群体的各类合理与不合理需要都可能不断生成、膨胀甚至裂变，由此，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从未有过的“传媒型风险社会”、“情绪型风险社会”，一种“后秩序”社会。

### 三、新秩序：营建开放包容公共领域

在土壤性与生成性、利益性与情绪性、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后真相是利与弊的统一。一方面，后真相作为一种另类的知识和另类的情绪，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结构性问题，并促使人们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后真相毕竟是一种非建设性、情绪化的社会存在，一种流动方式、行为结果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力量，会对社会的整体秩序产生作用方式与发展方向都具有不确定性的威胁。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实然性的后真相时代，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在总体上有可能加速向好，也有可能加速向坏。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能否合理应对、治理。

其一，营建更具弹性、共享、规范的发展格局。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发展机会的固化以及与此相位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当主流社会建制不能反映、规范、满足新产生的社会利益诉求时，就会产生游离于主流社会建构之外的社会共同性、社会群体甚至集体行动。后真相正是这种体系外的社会共同性的一种形式与表现。建构更为开放、平等的机会与财富共享机制，克服利益固化，为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使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机会与发展成果，对应对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营建更具确定性、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作为一种特定的情绪、知识、意识形态，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成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主流社会相对忽视了营建更具确定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或没有找到适合现时代特征的文化与信仰营建方式，没有找到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方式，从而使各类非主流的意识、信仰相对随意生长、无序发展。营建传统与现代相统一，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更具有包容性、确定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体系，是应对后真相问题的重要知识行动路径。

其三，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全媒体环境。当代新媒体是催生后真相问题的重要基础，正是以各类新媒体为介质，后真相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和后果的知识实在。反思文明史，每一次知识传播方式、传媒技术的变革，都伴随、催生新的社会甚至政治变革。如何评估、预判、适应、规范当代新媒体技术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后果，具体用什么方式推进与规范新媒体的发展，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发展与规范、自由与责任相统一，是治理新媒体的重要原则。营建开放与规范相统一的全媒体环境，对于减少后真相的减效应，引导其向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虽然，现代社会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公共领域，比如政府部门、工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似乎已经发育、建构得比较完备，但相对于当下快速推进的城市社会、媒体社会而言，目前的公共领域、公共部门的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都表现出一定的问题，并不能及时反映、掌握社会已然产生的变化。当公共领域不能反映、代表社会需要，社会就会生产游离开体系之外的公共性，并可能对现有公共领域的公信力、合法性产生置疑和挑战。公共领域的固化、僵化，公共领域对社会变迁的反应速度过慢、反应能力不足，是导致后真相向失范、无序方向发展的重要体制性原因。改善政府部门、工会、社会组织等各类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建构更为开放、规范的公共领域，对于应对、规范后真相时代具有制度意义。

总之，作为一种实存，也作为一种概念，后真相社会是对历史终结论、社会终结论的深层别样挑战，也是对既有秩序方式、既有知识生产方式、既有政治合法性、既有利益结构等的新型别样挑战，是社会变迁特别是现代性之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又一次呈现。但以“后真相”被命名的不确定性其实并不神秘，其本质是一种处于特定的潜在状态，被主流建制所忽视、漠视的社会实在、社会共同性，是一种不同于既有社会共同性的“别样的共同体”。以当代新媒体为介质，这种“别样的共同性”有可能或正在生成为一种“别样的公共性”。针对特定的问题，这种别样共同性会生成一种别样的集体行动，一种另类的集体知识行动，并

产生特定甚至巨大的社会后果、政治后果。面对这种后果，受限、依附于既有知识、政治、利益体系的人们，把这种问题与价值兼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别样公共性”有些否定甚至歧视性地归类为、称之为“后真相”。但这种所谓的后真相并不是假象，而是一种另类、别样的真相，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性、社会公共性、共同知识与利益诉求，也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力量。后真相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问题性。以漠视、排斥、压制、简单否定的方式应对后真相，效果不会理想。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新秩序，推动社会建构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的进一步合理化，对于应对后真相问题、规范后真相力量，具有根本意义。

#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城市权利的建构

董慧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结合了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理解当代复杂社会图景的解放性及启发性理论范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力量造就了一系列空间问题、难题和困境：空间剥削、空间排斥、空间集聚、空间隔离、空间霸权、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悬殊的社会空间被强化，空间经济重构引起政治的持续紧张，资本的力量侵蚀剥夺着城市权利。因此，在城市化的空间实践中，建构与发展一种关于正义、平等、民主、宽容、多元、反霸权话语的城市权利，激发生命性的空间乌托邦潜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作是“主要建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也掺杂着一些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论的推论。”<sup>1</sup>的一种物质性、基础性的批判范式。这一批判范式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根源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大都市视野的转变：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城市空间社会出现新的变化，遭遇日趋严重的空间问题，如住房、交通、就业等，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和反政府主义运动。现实的空间不平等、紧张的空间等级制度、不平衡的福利计划、城市贫穷等这些问题刺激了有自觉意识的地理学家寻找更为激进的道路和方法，以新的方式去思考，如何加强地理与社会的关联，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与安全的社会”。<sup>1</sup>怀着对空间的政治敏感，力图对抗主流地理学的空间拜物主义，着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与地理、城市空间问题的关联性，旨在创造公正的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对当时社会关系进行空间探索，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的强有力的批判话语。

这一批判路径恢复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批判敏感性，强调用空间的思维方式，从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中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关照历史的建构与空间的生产，尝试解决城市社会变迁的现实问题。它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考察资本循环、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主要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结合了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想象的批判性视角，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成为我们今天理解当代复杂社会图景的解放性及启发性理论范式。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路径，是由空间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与分析空间，分析空间形式、地方环境如何整合到剥削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资本的积累与生产、消费、再生产空间环境如何关联，以及阶级关系与其它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

---

<sup>1</sup>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1页。

系。这一路径是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它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也探究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伴随经济活动的个体行为和社会历史。这一批判路径的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他们大多数继承了马克思、韦伯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及批判思想，围绕资本主义组织和积累之间展开逻辑性的描述，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空间非正义作出新的框架分析和回应，以此提出城市权利的空间解放策略。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都市社会背景下，分析城市问题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理论视角，打开了当代城市问题生成的核心环节。城市问题的空间性生成逻辑及其产生的空间非正义，使得空间与权利的双向建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成为当代城市解放政治的有力话语和尝试性实践策略。空间转向和资本主义内在的非正义使当代城市社会的空间与权利关系凸显了出来，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空间的扩张和空间的生产是当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而资本主义非正义则是其内在的必然性。这种空间非正义内在的暗示着空间的某种主体性维度的缺失，人们获得自由生存空间的权利，以及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和类需要创造空间、建立正义的空间分配秩序从而免受空间压迫和奴役的权利等等，在现实中并没得到有效的尊重、实现和保护。因而城市权利是对城市之中空间非正义问题的直接回应，进而为应对空间非正义提供可能的路径。

而权利在当代都市社会的空间变革中则需要延展出其空间的意蕴，本文集中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霍菲尔德及沃尔德伦思想中权利的空间内涵，马恩认为权利的内涵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经济有关，而且根本的就是关于社会经济的内容，社会经济关系在理论上的反应之一就是权利关系，而在当代就表现为空间的生产分配权利。霍菲尔德阐述的“自由权”思想，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积极的而非被动免受的权利，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行动和改变，权利的此种内涵契合了人们的空间实践，权利的要义在当代社会表现的形式之一就是空间性的权利。而沃尔德伦则认为，参与是权利中最为核心的内涵，也是解决分歧的有效途径。参与、集体、权利分享、公共决策等成为其中的关键词，而当今社会管理中，城市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方面，从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城市空间的运转实际上是资本逻辑的结果，资本主宰者城市空间的生产。那么，对城市的公共决策制定就是如何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对资本城市化的管理当中，规范资本作用的方式。通过这三方面的梳理凸显其空间维度之于权利在当代语境中的重要性，进而在空间与权利双向建构中走向城市权利。

那么，城市权利如何具体地实践？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列斐伏尔、哈维及索亚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都进行过有益而深入的探讨。列斐伏尔首先提出了城市权利这一概念，并对城市权利的主体方面及城市权利的内容及特征等作了重要的分析。哈维则强调了城市权利是从整体上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创造不一样的城市空间的权利。索亚在吸收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相互建构，城市权利的核心内涵在于寻求空间正义。虽然三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于空间政治经济

---

<sup>1</sup>Morrill, R. 1969-1970, Geograph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tipode 1: 6-9.

学批判这一理论视角来解读和分析问题，以此探讨城市问题的根本解放策略。

# 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人学”逻辑

付清松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对资本的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物的逻辑”，正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物化或资本化，造成了“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对人的统治，从而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过程。

**关键词：**人学逻辑；物的逻辑；资本批判；异化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自我解放和实现自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产生的秘密。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逻辑”，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于现实社会的革命，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批判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理论的不同“人”的基质，因此，马克思对于商品和资本的分析 and 批判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下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是无法分割的，也因此必将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对于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分析方式和逻辑结构框架（资本、阶级、货币、商品等）也就能够被人们广泛用于社会分析理论当中。

## 一、从“商品”到“资本”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中心，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类的关系却是处于异化状态，使得人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资本主义制度扫除了封建制度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桎梏，尤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宗教改革使得每个人拥有自己信仰的权力，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另外宗教改革使得宗教事务改变了过去繁琐的仪式规定，把世俗的事务和行为也看作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宗教世俗化。这一方面摧毁了宗教事务的神圣性，使得宗教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加速了世俗事务的神圣化即用人间的上帝取代了天国的上帝继续对人实行统治和束缚，这个人间的上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由于马克思的物质观既不导向形而上学的神秘说教，也不导向实证的知识，它导向的乃是对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拜物教的批判。<sup>1</sup>

<sup>1</sup> 俞吾金：《马克思物质观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正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制度。以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价值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但是无法解决工人劳动和资本家财富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无法解释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剥削的秘密。马克思把商品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使用价值，它反映的是商品的具体属性，而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工人的劳动不但创造商品的具体属性，更创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工人自身也称为商品，是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但是工人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在于他不但创造出自己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为资本家创造出来比自身更大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工人在劳动中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反而受到产品的束缚，从而失去了自由，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主要表现为工人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社会本质的异化几个方面。资本主义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生产的产品成为无法克服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它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人格化即“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就是“物化的人”即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统治。它是一种剥削和压迫，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无法得到解决，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而要消灭私有制只在哲学变革和宗教幻想中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依赖于现实的实践与革命活动才能完成。

资本主义一方面是“资本”占统治地位并因而实现对人的宰制的社会，是物的逻辑在社会中的体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物化”，正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物化或资本化，造成了“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对人的统治，从而遮蔽了人们真正关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作是天然的和永恒的制度，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发展阶段，它是人类更高一个社会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类由史前史到真正历史的过渡阶段。因此对物的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于商品、人的异化和阶级关系的批判理论中。

## 二、“人学”逻辑下的资本批判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但是科技文化发展与进步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历史发展模式即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sup>1</sup>资本

---

<sup>1</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变化，自由、多元与世界性成为普遍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常见的事物，但是正是这个平常的事物却又有极不寻常的秘密，通过它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人们社会关系真正发展的秘密。商品的平常之处是在于它的来自于自身的使用价值，而它的不寻常之处来自于它的社会价值。正是这一价值使得商品充满了“神学的怪诞”，它可以使普通的桌子跳舞，也可以使商品具有神圣的魔力，从而完成对人的支配，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的基础和起点，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逻辑具体展现和内容。通过对于商品本质的揭示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工人成为“物”化的过程，这就是“物的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物的逻辑”这就意味着“对付自然的逻辑里必然蕴含着对付人的必然性，即统治对象必然从自然延伸到人！”<sup>1</sup>

马克思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历史的真正开始，以前的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只是史前史阶段。因此在人的在社会发展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阶段区分开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人的解放理论，贯穿于其中的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即“人的逻辑”和“物的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体现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包括生产力、科学知识和经济文化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发展只是一种历史性，它为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这种社会的发展目的是对于外在“物”即剩余价值的追求，它在内容上是物统治人，把人当作物的附属物即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sup>2</sup>资本家对于物的追求就是剩余价值。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既提高了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又加剧了阶级矛盾。因为在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工人是作为生产剩余价值而存在，工人作为劳动者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资料，在这一意义上，工人和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价值是一样的。作为“物”存在的工人失去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存在，这就是工人的“异化”。他们的区别在于机器是作为不变资本而存在，而工人则是可变资本存在。

物统治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逻辑”的体现，它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经济形式，商品之间的交换是以等价物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经过了最初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交换，当金银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也就是说，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只不过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它可以使我们得到需要的东西。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物的逻辑使“物”在功能与现象遮蔽了它的本质，这样货币就显示出了它的神性，一个普通的桌子在商品的光辉下也会跳舞，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货币与资本本身具

<sup>1</sup> 刘森林：《实践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86 页。



有了力量。本来是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而成为人的统治者，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人格化，工人成为物控制下的生产资料。真正的社会关系被遮蔽，物的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表现，这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就由生产的“物化”发展为“物象化”，这是资本主义物的逻辑支配下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资本主义总是把我们推向类似于宗教的结构中去。不揣冒昧地说，动摇我们的不是理念，也不是现实的需要和欲求，而是蕴含在交换或者商品形态中的形而上学和神学。马克思所思考的共产主义，正来自于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它将从属于地区共同体的人们分离开来，又是这些被分离的人们相互结成“社会性”的关系。<sup>1</sup>

### 三、作为“资本”的“人”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sup>2</sup>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其实就是人对于物的控制在社会中的延伸，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离不开自然的物质资源和生活资料，于是对于外物的认识和利用就成为人类基本生存的前提和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人和客观外在事物的二元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的特点其一，就在于把事物区分为对立两个方面：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等。其二，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对立的双方中其中一方是在事物中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其三，这一思维方式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上是按照预定的模式和途径进行发展的，这种发展途径是必然如此，具有排他性。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一种“物”的思维方式，它根本没有看到人与物的区别，进而无法认识到人与社会在历史进程的独特性。把人混同于物，既抹杀了人的独特性存在，也无法认清物所具有的真正特性，因此要摆脱物的逻辑思维的支配首先就在于人和物的区别。一般的外物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它是有限的、自在的。有限性决定了无法形成自我的发展，它是不会主动寻求变化与发展的存在即“定在”。

对于这种事物及其本质的认识常常是观察法、实验法以及结构分析法等等，但是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又和其他生命体又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sup>3</sup>人与周围的世界既是对立关系，又有着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表现。具体来说，人类的存在除了生存意义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的世界，这种意义体现在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如果说动物生存的是外在的自然界，而人类生活与发展的世界就是“社会”，人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4</sup>人的社会性不但体现在人们之间的关系

<sup>1</sup>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sup>2</sup>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sup>3</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发展过程之中即实践和历史。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与社会、实践、历史总是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个整体又统一而的概念，它是人的本质展现的不同内容。具体来说社会是人得以活动和发展的场域，实践是人的本质社会中形成、发展和实现的方式，而历史则是人的本质展现和完成的具体过程。

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把人从神学和专制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废除了关税壁垒，统一了商品市场，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但是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sup>1</sup>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的专制，但是这种平等与自由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自由不是人的自由，而是作为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它表现为劳动力商品，人是作为资本进行生产的一种“物”。

马克思进一步把资本区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样在总不至于社会中，人就是和生产中所使用的机器、原料一样成为资本进行增殖的条件，从而成为生产资料即“物”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不是工人劳动产物，而是资本家剩余价值的需要，是为了资本家的而进行的生产，而不是工人自身的需要，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它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自身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它是工人自身自由的失去以及资本家对于工人的统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逻辑，这种逻辑的进一步延伸就是在阶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征服，这既是资本扩张本质的需求，也是物的逻辑发展必然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正是从人与物种的历史承继的联系中，明确了人的类特性及其能动作用；正是从“人与它物的不同之处”发现了人之为人的类意识及其对象性；正是从“物的逻辑”出发，揭示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sup>2</sup>

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表现为一种物象化，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不是人类自身的历史而是史前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开始了人自己真正的历史，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人不再受物的控制，而是实现了对于物的利用，物只是人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在未来的社会，人不会再是单方面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sup>3</sup>那将是人类自由的实现，而且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人的条件，当然这种发展是一种无限的过程，它不是作为一种既定性与完成性，而是一种通向未来的过程与运动，这正是以人为本的逻辑在社会中的运用和实现，它体现的是过程性、历史性以及无限性。“生存性”和“现成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维度，彰显着“人”和“物”的根本区别。“生存性”意味着存在者不断地自身否定和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sup>2</sup> 赵卫：《“类哲学”、“物的逻辑”与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超越，向世界敞开自己，同时面向未来敞开；它“放逐”“永恒性”和“必然性”，终结先验的本质规定，在未来的“可能性”中得到“自由”。而“现成性”则意味着存在者将自身封闭于先验的本质和固有的规定中，坚守抽象的“自身同一”；它拒绝可能性，追求利用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永恒”。<sup>1</sup>

#### 四、资本批判中“人学”逻辑的价值与启示

在资本批判基础上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人”的基质，这决定了它在历史中是作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理论和指导思想，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始终和共产主义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过程，它是同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因此这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以及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价值意义：

一、“人学”逻辑决定了大众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体，他们的需求和生活马克思主义当今具有活力和继续发展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拒绝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它始终是朝向所有的民族和文化开放，它的宗旨就是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而作为斗争的主体不是脱离群众之外的少数精英，而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源泉。

二、“人学”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着大众立场和意识，为大众谋利益是它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以及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要结果与逻辑，它也是党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体现。因此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上的知识化意义上通俗化与大众化，而首先是在大众立场为大众服务的并为大众谋利的学说。但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出现了偏离大众立场、为大众谋利以及为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特质，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化、学院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学和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人学逻辑的最终目的。

三、“人学”逻辑要求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是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对象化、学科化和知识化，因而任何对于人学逻辑的背离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失去马克思主义人学目的导致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其直接危害就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以及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泛滥。

作者简介：付清松，哲学博士，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空间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联系方式：futsingsong@163.com；1391456797

<sup>1</sup> 葛宇宁：《“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新解》，《理论月刊》2013年第1期。

# 资本的可视化：运动中的价值

大卫·哈维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焦一达 译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sup>170</sup>

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把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多卷本论著系统化,这些论著包括三卷本的《资本论》,同样有三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更早些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有最近编辑出版的《大纲》的笔记本,以及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艰苦地重构(并非没有批评和争议)《资本论》后两卷所使用的笔记本。接着,我需要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来展示马克思的基本发现。

在自然科学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对于复杂过程的简化表示,在一些研究领域这无疑能够帮助将正在发生的状况可视化。这些表示中我发现有一种尤其有意思,而且我将用它作为一个模板来描绘资本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水循环(表1)。我发现极其有趣的一点是,H<sub>2</sub>O的循环运动包含了形态的转化。海洋中的液态水在太阳的照耀下蒸发,作为水蒸气向上运动,直到冷凝成为形成云的水滴。如果这些小水滴形成于足够高的高度,它们就会结晶为冰粒,正是这些冰粒形成了高空中的卷云并给我们带来了美丽的日落景观。在特定环境下,这些水滴和冰粒会结合,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重,它们就会由于重力作用从云层中坠下形成降水,降水往往有多种形式(雨、雾、露水、雪、冰、冰雹、冻雨)。一旦返回地表,有一部分降水直接落入海洋,有一部分以运动得非常缓慢的冰的形式被封存于高海拔或严寒地区,而剩下一部分则以河流的形式流过大地(有一些会被蒸发进入大气层)、或以地下水的形式再流回海洋。一些水会被动植物使用,而蒸发和分泌会通过蒸腾作用把其中的一些直接还给大气层。另有一大部分水被储存在冰原或地下的含水层。这一切并非都在一个节拍上运动。冰川以众所周知的冰川速度移动,激流则猛冲而下,地下水有时几年才移动几英里。

我之所以喜欢这一模型,是因为它描绘的H<sub>2</sub>O在回到大海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前,以不同

---

<sup>170</sup> 本段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1页。

的速率经历了不同的形式和状态，这与资本运动非常相似。运动以货币资本开始，接着以商品的形式经过生产体系，然后以有待出售（货币化）的新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中，在再次回到货币资本之前，还要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要求部门（以工资、利息、租金、税、红利的形式）间分配。然而，水循环与资本流通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水循环的动力是来自于太阳的基本上恒定的（尽管有时稍稍波动）能量。它向热量的转化在過去的变化非常之大（将地球置入冰河时代或者酷热时期）。在当代，温室气体（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的截留使得被保存的热量显著增加。纵然存在冰盖融化以及人类使用导致的地下水干涸，循环中的水当量的总量依旧保持相当稳定或者缓慢地改变（以历史而非地质时间测算）。至于资本，正如我们所见，能量的来源更为多样，并且由于增长的需求，运动中的资本的总量以复利的方式持续地扩大。水循环更为接近真正的循环（尽管由于全球变暖出现了加速的迹象），而资本的循环则是一种持续扩张的螺旋，我们接下来会解释原因。

## 运动中的价值

所以，运动中的资本的流动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如何能帮助我们将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论述可视化呢？

我将从马克思所喜爱的对资本定义——“运动中的价值”——开始。在这里我计划使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对其加以定义。他的一些术语并不寻常，并且从表面上看来是混乱的，甚至故弄玄虚地技术化。事实上，只要得到适当的解释，它们并不会困难到不可理解。我在这里真正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讲述资本的故事。

运动中的“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意图是非常特别的，因此这是他的术语里第一个需要加以阐述的。我将试图在我们行进中展示它的完整含义。但是它的最初含义是：通过一个价格竞争的市场中的商品交换，我们有组织地为他人贡献的社会劳动。这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也并不是无法领会的。我有鞋，但我制造这些鞋是为了卖给别人，然后我用我得到的钱去别人那里买衬衫。在这样的交换中，实际上是我用我花在做鞋子上的劳动时间来换取别人花在做衬衫上的劳动时间。在一个有很多人做鞋子、衬衣的竞争性的经济中，值得考虑的是，如果做鞋子相较于做衬衫平均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那么鞋子就要比衬衫更加昂贵。鞋子的价格会向某个平均值靠拢，衬衫的价格亦然。标识出这些平均值之间差异的就是价值，例如，它可能会表现为一双鞋子等于两条衬衫。但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劳动时间才算数。如果我花费了过多的劳动时间在我做的鞋上，我不会在交换中得到等价的回报，因为那将鼓励低效。我将仅仅得到平均劳动时间的等价物。

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花费在制造被他人购买、使用的商品上的劳动时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像重力一样，是一种非物质的但却客观的力量。我永远没法把一件衬衫切开然后在其中找到价值原子，就像没法把一块石头切开然后在其中找到重力原子。

这两者都是非物质的关系，但都能产生客观的物质效果。怎么强调这个概念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当它披上了经验论的外衣，倾向于否认无法被物理地证明和直接测量的事物或过程，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使用“价值”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说“政治权力在中国高度地去中心化了”，大部分人都能明白我的意思，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走进街巷直接地测量它。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这类非物质的但却客观的力量的重要性。我们诉诸它们来解释柏林墙的倒塌，特朗普的当选，民族认同感，或者原住民对于按照自己文化规范生活的渴望。我们用权力、影响、信念、地位、忠诚、社会团结这些非物质的术语来描述某些特质。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正是一个这样的概念。“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并不是物质要素，”马克思写道，相反，“资本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是价值，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与其物质一致性关系不大。”

鉴于此，出现了对于价值的物质表现——一些我们能够触摸、持有、测量的东西——的强烈需求。作为价值的表达和表现的货币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价值是社会关系，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无法被直接的物质研究把握。货币是这一社会关系的物质再现和表达。

如果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那么它们怎样运动、在哪里运动、为何运动？为何采取这些不同的形式？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根据马克思的描绘构造了一般资本流动的图示（图 2）。这一图示乍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并不比水循环的标准可视化图示更难理解。

## 货币形式的资本

资本家占有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这预设了已经有一个发达的货币系统，在社会上四处流动的货币可以并且已经有了很多种用途。在巨量的已经在使用的货币之海以外，有一部分货币被吸出成为货币资本。并非所有货币都是资本，资本是总货币中有特定用途的一部分。这一区分对马克思来说是基础性的。他并不支持（尽管他有时把它当做通常理解来引用）对资本耳熟能详的定义，即认为资本是用来制造更多货币的货币。马克思更喜欢他“运动中的价值”这一定义，其中缘故稍后会明白地显示出。这使他能发展出关于货币是什么的批判性视角。

带着货币资本，资本家进入市场购买两种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预设了雇佣劳动已经出现并且等待被购买。这同样预设了雇佣劳动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因此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其在一定标准下完成再生产的花费，它与劳动力过活和再生产所依靠的市场上的商品的价值相等。但请记住，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劳动者（那就成了奴隶制），而是在一段固定时间内（例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对劳动者劳动力的使用。

生产资料乃是来源多样的商品：作为大自然的免费礼物被直接获取的原材料，汽车配件或硅芯片这样的半成品，机器以及驱动它们的原料，工厂以及周边的基础设施（道路、下水道、供水设施等等，或许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或者是由很多资本家和其他使用者共同支付

的)。虽然其中的一些可以被共享，但大部分商品还是被贴上代表它们的价值的价格放进市场当中。所以不仅必须存在一个货币系统以及劳动力市场，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复杂的商品交换系统以及合适的物理基础设施来被资本利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只有在货币、商品、雇佣劳动的流通体系已经建立后才能产生。

流通进程中的价值在此刻经历了一次形式变化（非常像液态水在水循环中成为水蒸气）。资本一开始是货币的形式。现在货币消失了，价值以商品的形象登台：等待部署的劳动力和为了生产聚集起来的生产资料。将价值概念置于思考的中心使马克思能够探寻将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模式的变形的本质。这一变形会产生问题吗？马克思邀请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它在其中看到了危机的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

## 商品生产与剩余价值生产

一旦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资本家的监督下成功地结合起来，它们就被投入为了出售的商品的劳动过程。正是在这里，价值以新的商品的形式被劳动生产出来。价值被一个运动过程生产出并维持着，这一运动从事物（商品）到过程（将价值凝结于商品中的劳动过程）再到事物（商品）。

劳动过程包括对一种特定技术的使用，这种技术的角色在于决定资本家先前在市场中购买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机器的总量。明白无疑的是，随着技术的变革，生产性投入的比率也随之改变。同样明白的是，生产中所部署的劳动力的生产力，决定于技术手段的复杂程度。少量配备精致技术的劳动者相比于数百名操着原始工具的劳动者能制造出更多的部件。前一种技术水平下每一个部件蕴含的价值要少于后一种。

对于马克思来说，技术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几乎出现于所有形式的经济分析中。马克思的定义是宽泛的。技术并不仅仅指投入运动中的机器、工具、能源系统（似乎就是硬件）。它同样包含组织方式（分工、协作结构、法人形式等）、控制系统的软件、工效研究、无库存生产体制、人工智能以及诸如此类。在一个竞争组织起来的经济中，公司间对技术优势的较量产生了技术和组织形式跳跃式创新的模式。由于这个原因（其他原因将在下文详细阐述），资本成为世界历史中永恒的革命性力量。生产活动的技术基础在持续地改变。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马克思极为重视的重要矛盾。技术愈加尖端，每件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就会越少。更麻烦的是，如果商品的全部产出的增速并不足以抵销单个商品价值的下降，所创造出的总价值便会减少。如果生产力翻倍，为了保持可获得的总价值恒定，就不得不生产并售出两倍数量的商品。

但是在物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还出现了别的状况。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回到劳动价值论。如我们所说，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在一定的生活标准下使其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成本。这一价值会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但是在一个给定的契约时间内它是可知的。在劳动过

程的某一特定点上，劳动者创造出了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等的价值。与此同时，劳动者成功地将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新的商品中。用马克思的符号来表示，当劳动者创造了与  $v$ （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相等的价值并将  $C$ （生产资料，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到了新的商品形式中时，一个特定的点到达了。

劳动者在这个点到达后也并不会停止劳动。他或她的合同说他或她应该为资本家工作十小时。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已经在前六个小时被覆盖，那么劳动力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就是在无偿为资本家工作。这生产无偿产品的四个小时创造了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他称为  $S$ ）。剩余价值实际上是货币利润的根本。困惑政治经济学许久的难题——利润从何而来——刹那间被解决了。商品的总价值是  $C+v+S$ ，资本家的支出仅仅是  $C+v$ 。

这里有重要的一点值得注意。被生产出来的是物质商品。价值与剩余价值凝结在了商品形式中。当我们按照理论寻找运动中的价值的时候，它仅仅是工厂地面上的一堆小部件。而且无论我多么用力地去刺、去捅这些部件，也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运动中的价值。在此刻唯一算得上运动就是资本家匆忙地把这些部件带到市场，为了把它们隐藏的价值转换为货币形式。

但是在我们跟随“钱袋先生”——马克思喜欢这么称呼他——去市场之前，我们还需要在生产过程的隐秘处辨识出一些东西来。在这里被生产出的并不仅仅是新的物质商品，而且有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属性，它不仅包括用于使用的物质商品的生产，也包括为了资本家利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在一天结束之时，资本家仅仅关心剩余价值，它们将会以货币利润的方式实现其价值。他们对于他们生产出的商品本身并不太关心。如果这里有一个毒气市场，无疑他们将会制造毒气。资本循环在这一时刻不仅包括商品的生产，而且还有剩余价值形式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个体之间在市场（在其中一切都是透明的）中平等交换的虚构想象被维持着（劳动者获得劳动力的公允价值），但不断增多的剩余价值确实生产过程中为资本家生产出来，这一切并不是透明的，资本家费尽力气去掩盖这一切。外在地看，仿佛是价值自身有神奇的能力能够使自身增加。但生产才是这个神奇的时刻，马克思所谓资本的“增殖过程”发生于其间。当劳动力（ $v$ ）——价值只有通过它才能扩充——被投入使用来生产马克思所谓的“绝对剩余价值”时，呆滞资本（不变资本  $C$ ）被给予了新的生命。很简单的一个手段是：延长工作时间，使其超过恢复劳动力价值所需。工作日越长，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

这是资本的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它通过两百年来关于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甚至工作寿命的斗争得到了丰富的阐明。这一斗争从未止息，其消涨取决于阶级力量的权力平衡。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随着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在很多地方受挫，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每周工作八十小时（两份工作）以生存。

资本每通过生产过程都会产生出剩余以及价值上的增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暗示着永恒的增长，而这也就是资本以螺旋形式运动的原因。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愿意



经受组织生产小部件中的所有这些磨炼和麻烦，只为了在一天结束时口袋里的钱与开始时一样多。动机在于以货币利润形式表现的增额，途径则是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的创造。

## 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

商品被带到市场上是为了出售。在一个成功的市场交易中，价值回到它的货币形式。为了使之能够发生，必须存在依附于支付能力（有效需求）的对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渴望、需求和欲望。这一状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创造渴望、需求和欲望的历史。此外，有效需求并不会独立于我们一会儿将要提及的货币分配。马克思称这一价值形式的核心转变为“价值的实现”，但价值从商品形式向货币形式的变形可能并不顺利。例如，如果没有人渴望、需要或欲望某个特定商品，那么无论在它的生产中花费了多少劳动时间，它也没有价值。马克思从而提到，如果价值的流动想延续下去的话，在生产与实现间会呈现出“矛盾的统一体”。务必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因为它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非常重要。我们在下文会回到这里，更加仔细地考察发生在实现时的危机的诸种可能性。

马克思区分了为了价值实现的两种形式的消费。第一类是他所谓的“生产性消费”，这里关乎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销售，资本需要它们来作为生产资料。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生产所需的半成品必须由其他资本家生产，而且这些产品会直接流回生产过程。所以，社会的总的有效需求的一部分是由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资本组成的。资本家对这些商品的渴望、需求和欲望是依于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而不断变化的。制造犁、拖拉机、客机所需投入的商品是极其不同的。

第二类属于最终消费，包括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工资商品，主要由资产阶级内部各部门消费的奢侈品，以及维持国家机器所需的商品。不像生产资料的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商品是彻底从流通中消失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几章就着力于比例关系的详尽研究，即价值之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资商品、奢侈品、生产资料的生产间的比例关系。如果这些比例关系没有被很好地遵守，那么有些价值就会被破坏掉以保持经济以平稳的步伐增长。正是在实现以及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语境中，马克思建立了有效需求维持、甚至在某些事例中是推动价值作为资本的整体运转的理论。

## 价值以货币形式分配

一旦价值在市场上出售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就会在一系列的参与者间分配，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能够宣称自己应该分得一杯羹。

## 雇佣劳动者

劳动者将会以货币工资的形式对其价值提出要求。阶级斗争状况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因素之一，劳动者可以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善其工资和居住状况。相反地，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的反扑则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价值。但是如果工资商品（劳动者用这些商品来为生并再生产）变得便宜（例如通过进口更便宜的商品或者技术变革），那么价值份额的下降就可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并行不悖。这已经成为近期资本主义历史的关键特征。工人们一般而言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他们现在拥有手机和平板电脑。与此同时，收入最高的1%在总产值中拿走的部分则不断增加。如马克思极力指出的，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法则，这就是资本在没有对立力量时的所作所为。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进行分配，依据的则是他们相互间组织力量的强弱，个人则依据在工作中的技术、身份和职位被有区别地犒劳，另外像性别、族群、种族、信仰、性取向也会造成区别对待。还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将人类的技术、能力、力量无偿占有。储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学问、经验、技术等是劳工力量的重要特点，资本往往要依靠它们。

以工资形式流向劳动者的货币以购买工资商品的有效需求的形式重新返回资本的总循环。这一有效需求的强度取决于工资水平以及雇佣劳动力规模的大小。在返回循环的过程中，劳动者变成了买方，资本家成了卖方。因此，消费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工人的有效需求也借此表达出来。如果工人习惯于烟草，马克思说，那么烟草就成了工资商品！这里对于文化表达的可观余地，以及人群中对于社会培养的倾向的运用，又被资本发现是有利可图的。

工资商品支撑着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完成了价值与剩余价值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再生产行为。事实上，资本依赖于工人及其家人负责好自己的再生产（或许也有国家的援助）。马克思一边跟随着资本，一边论及独立且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其中的活动乃是工人在返回工作地时尽可能地适合于继续工作，这事实上就是为资本准备的免费礼物。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和其中发生的社会斗争形式非常不同于增殖过程（在这里阶级关系起支配作用）或实现过程（买方和卖方在这里对抗）。诸如性别、父权制、亲属、家庭、性方面之类的问题在这里更为突出。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方面，它通过教派、政治、教育以及邻里和社区内各种形式的集体组织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编织而成。雇佣劳动有时是为了家庭的和关怀的目的，这里的有些工作就是自愿的和无酬的。

## 税赋

价值和剩余价值会有特定一部分被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占有、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机构以捐税的形式（例如教堂）拿走、或用慈善捐助来支持某些关键部门（例如医院、学校等）。马克思并未对这些提供任何详细的分析，关于税收方面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我猜测马克思之所以忽视的原因，是他有意（根据《大纲》中列出的计划）去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分别写一本书。他的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直至完成一项工作之前不会对其进行系统的考虑，例如征税。由于马克思从没开始这项工作，这仍旧是他理论体系中缺失的部分。然而，在他著作的很多地方，国家都被视作确保资本继续循环的能动主体和要素。例如，它保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管理的法律与司法基础，并且维护着劳动政策（工作日长度以及工厂行为）、货币（硬币与法定货币）与金融系统制度框架的功能运作。根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笔记，马克思被最后一个问题占据了很久。国家通过其指令获取军事设备、各类监视工具、管理和官僚行政产生了有效需求并进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同时也参与了生产性的活动，尤其是对公共物品和集体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道路、港口、港湾、给排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从事各种功能，例如资助研究与发展（最主要的是军事目的），同时也像一个再分配的中介一样，通过给工人们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来完成对社会福利工资的资助。国家行为可以变得如此广泛，尤其当它追求对于经济命脉国有化的政治时，一些分析家的理论喜欢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依据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规则而运行，后者在追随亚当·斯密的马克思看来，预设了他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发现。国家参与程度以及与其相关的税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它同样也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包括国家干预资本循环的好处和弊端，以及国家制度中的地缘政治力量以及位置。紧随严重危机（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对更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呼吁往往会增加。在地缘政治威胁之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于军事存在及其相关支出的需求也会倾向于激增。军事-工业的复合体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资本的循环无疑受到这些力量的运用。

通过税收从分配中拿出的国家支出影响着商品需求，这有助于价值在市场中的实现。国家干预来支撑有效需求的策略（如凯恩斯的理论所设想的）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尤其当资本的循环看起来遇到困难或者缺乏活力时。一种典型的对增殖过程中利润过低故而私人投资乏力状况的对策，就是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通过一般是国家主导的措施来为经济注入强劲的有效需求。为了能够这样做，国家通常是向银行家和金融家借钱（以及通过他们向一般大众借钱）。

然而，在其他事例中，这些资金直接涌向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再投资，虽然是在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在1960年代的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经济部门都是国有制的，当今的中国依旧如此。尽管这些存在名义上与国家权力是相对独立而有自主权的，但他们是为了

公共福祉而组织起来的，这一公共事业的导向使其与资本循环的关系有别于以逐利为导向的公司。有相当一部分资本循环会经过国家机器，而且没有流通中的资本能够在不考虑这一事态的情况下而能保持完整。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未想将这一部分整合进他的整体理论。他坚持关于资本运作的完全竞争模型，而大部分情况下都把国家干预放在一边。

## 资本不同部门间的分配

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者和国家拿走一部分后余下的部分，会被资本的不同部门分配。单个的资本家将会收到的总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份额，取决于他们预付的资本而非他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原因将会在下文解释。一部分剩余价值被财产所有者以土地和资产租金的形式，或作为知识产权的特许权、版税被吸走，因而有了寻租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性。商人资本家也像银行家和金融家一样获得他们的份额，后两者组成了货币资本家的核心，他们在促进货币转化回货币资本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进而完成循环并接着流回增殖过程。所有这些行为者都对剩余价值有所要求，形式则包括工业资本的利润、商业资本的利润、土地和其他财产权的租金以及货币资本的利息。

所有这些分配的形式都有古代根基，它们早于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资本循环形式的兴起。马克思在他的历史研究的章节中清晰地辨识出他所谓资本的“远古”形式的重要性。他对于这些范畴的理解进路以及主张是相当特别的。事实上，他问道，“工业资本家”——商品形式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为何会在他们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货币化后愿意与其他要求者分享呢？简单说来，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内，商人、地主、银行家不可替代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最终要让位于另一个问题。这些其他要求者通过何种方式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他们自己？竟能不知羞耻地竭尽所能从工业资本家那里夺出剩余价值，但这远无法辩护说他们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资产阶级内部部门间的斗争事实上到处都存在，马克思在其关于银行和金融的初步研究中就确知了这一点。但是他最扎实的贡献在于他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方式，留下我们应付交接处的状况和力量平衡，这些疑难的解答对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里有一个将分配视作剩余价值生产的被动最终产物的倾向，但马克思的描述却显示事情并非如此。金融和银行并不仅仅是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的消极接受者，他们是通过生息资本的循环使货币流通返回剩余价值生产的积极中介人和代理者。中央银行位居顶点的整个银行系统，就是一个无视生产中价值创造活动而只是一味创造货币的大熔炉。鉴于此，金融家和银行家既是价值进一步循环的驱动者，又是以往剩余价值生产的受益者。生息资本的流通需要以所有权为基础才能返回，而这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单线的价值运动引入了一种双重性。工业资本家内化了这种双重角色：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组织者他们从事了一系列的活动，同时作为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依靠预付的货币的利息来给自己报酬。或

者如此，或者他们从别人处借来钱来开始他们的生意然后付给别人利息。

这为资本循环引入了一个日益重要的区分：所有者与管理人员的区分。股票持有者希望能从他们投资的货币资本那里获得回报，管理人员则通过积极地组织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要求他的份额。一旦生息货币资本在“资本”的概念下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那么作为运动中的价值的资本，其动力就会崩溃。股票持有者和投资人阶级借由投资归他们支配的货币资本来寻求金钱收益。这一阶层加速、压缩从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换过程。没有这一运动的话，就不会有生产中的资本增殖过程，不会有增长，也不会有货币资本的回报。与此同时，就资本的这个强有力的部分而言，它同样蕴含一个货币导向——借由货币本身而不必依靠生产的增殖就能获得回报。如果投资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市场或商业资本操作的货币收益率很低，那么他们就会投资这个领域。如果购买国债比生产领域收益更大，那么货币资本就会倾向于流入这些部门而非流入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看出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出于下述原因倾向于不予理会：如果所有人都投资到地租或者商业资本却没有人投资到价值生产，那么后者的回报率将会猛增，直到资本回到马克思所认为的它们理应的功能去。最坏的可能是，马克思倾向于承认工业资本和其他分配形式间的利润率会随着时间展开而倾向于平均化。即使如此，作为运动中价值的资本仍旧失去了其单一结构，分散成为多重且有时互相对抗的力量。这与水循环中以不同形式降水时所发生的非常相像。例如，在最近，价值生产中的资本流倾向于减少，而货币资本则在土地和资产投机这样的地方寻求更高的金钱回报率。其效应，就是加剧价值生产中在 2007-2008 年的大破坏后一直形塑着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

这其中的矛盾成分就是，金融系统中的债务创造成了进一步积累的持续动力。对利润疯狂的追逐被对偿债的疯狂需求补充。对利润的疯狂追逐者其中有一部分不得不找到方法来增加生产中的价值增殖。价值并不会回到从前增殖过程的诸多实践中，这个新的价值增殖过程并不采取我们最初开始分析它时的那种形式。随着它的运行它不断进化，随着它的进化它不断扩张。但是它的扩张现在不仅包含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且还有额外的偿还债务的必要性，这些债务在分配的网络中堆积起来并使资本循环有效地运行。

## 价值运动的驱动力

当然，呈现在这里的资本之流的可视化是一种简化，但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简化。它描绘了资本总体流通过程中的四个基础性进程：增殖过程，资本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实现过程，当价值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被转换回货币形式；在不同的要求者之间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后，捕获一些在要求者间流转的货币，然后将其转化回货币资本，在那里它将继续价值增殖的进程。每一个独特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他们所有都在整体中与价值的流通有关。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在作为整体的价值运动中

做出这样的区分在解析《资本论》的文本结构时将有重要作用。第一卷关注价值增殖过程，第二卷关注流通过程，第三卷仔细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分配。

还是需要来简短地探讨一下保证资本运动之流的各种力量。最明显的驱动力建立在如下的事实之上，没有一个理性的货币资本家会情愿承担所有这些与组织商品及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工作并经受不利的状况，除非他们在增殖过程结束时能获得比开始时更多的货币。简单说来，是个体获取利润的动机驱使着他们。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归因于人性的贪婪，但是马克思在多数情况下都克制住而没有将其视作道德缺陷。如果我们要生产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那这是社会必要的。由于利润源自剩余价值的生产，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内在的动机来永久地持续下去，其基础就是生产中对于活劳动的不断剥削，这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的永恒扩张。资本再生产的循环成为了永恒增长与扩张的螺旋。

马克思大体上来说并不重视与价值实现过程有关的驱动力的想法。可是，并没有什么固有的理由不让我们这么做。这种驱动力可以来自于公众对于不同使用价值的希望、需求和渴望的转变。马克思倾向于将渴望、需求和欲望的状态视作被资本、环境定义的“理性消费”。例如，当总人口中有可观的一部分（工人或资产阶级无所谓）表达了与自然建立另一种关系的渴望，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恶化、栖息地消失、气候变化等问题就可能被反转，资本的总循环进程或许就会被替代性的道路取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渴望、需求和欲望是由支付能力支撑的（在这里国家刺激和补贴确实是有意义的），因而环境保护和再生能源或可开始替代化石燃料。

马克思并未考虑这类问题，但是这里所构造的建基于他的思考上的可视化，是能够轻松地将这些问题纳入考虑的。此外，国家亦可以通过其对有效需求的有力影响成为积累的驱动力，军事装备、警察和监视技术、社会控制的一系列仪器属于这些有效需求，常规行政和统治的需求更是不在话下。这一影响可以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分析家喜欢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将军事凯恩斯主义视为积累的主要推动者。国家在实践中对于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价值实现领域事实上充满了政治和社会斗争，但是它们与增殖领域里的斗争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这是由于价值实现时所呈现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买方与卖方间的，不像价值增殖时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关系。

同样难以忽视的是在分配领域爆发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但是为了把这个搞清楚需要我们走得比马克思更远些，他仅仅把自己的分析局限在这个问题：为何这种分配形式能够、而且应该在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下存在。一个更为动态的视角将食利者、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看做相互区别的力量集团，他们都根据自身利益行事，寻求能够成功地占据尽可能多的价值。接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是什么动机让商人、金融家与地主对增殖过程进行再投资？他们明明可以让别人去操心生产活动，自己坐在家收取不义之财就可以了。如果能靠地租为生，干嘛要在生产上费心呢？

在这里，生息资本流动的不同形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创造债务，也包括完全

独立于价值创造的银行创造货币的活动，分配领域通过增殖过程将永恒流通的巨大动机内化了。偿还债务的动机与推动未来价值生产以获利的动机一样重要，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债权，同样，也排斥了未来的价值增殖过程。无法偿还债务造成了资本体系所有危机的根源。

然后来看一下整个的流通过程，多种刺激来保证运作体系的完好，不缺少驱动力来保证价值的运动；同样，价值运动中的多种威胁和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将在下文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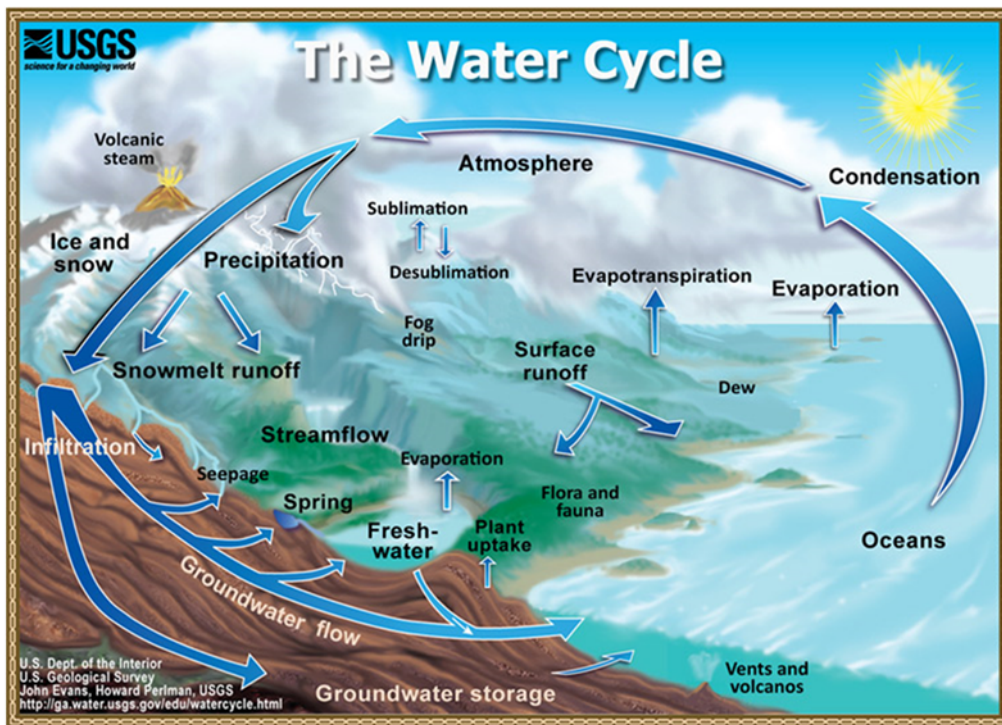


表 1 水循环





# 作为伦理选择的代词性视角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成果

马克·胡尼奥迪

(比利时鲁汶大学)

黄可以 译 陈嘉琨 校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众所周知，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长期以来总是困扰着马克思的解读者，即马克思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不言明的伦理学理论，若有，那么是哪一个。<sup>1</sup>下文中，通过展现马克思作品中的伦理元素并非由其著作中暗含的伦理学理论所产生，也不是需要我们去阐明的掩藏起来的信仰声明，我希望为这场争论做一点贡献。确切地说，这些元素源自马克思对于社会现实的普遍方法论的研究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以显著的恒在性贯穿了所有对于马克思的分析，无论是尚显青涩，还是具有极大成熟性的著作，皆是如此。

根据其特征，我将这一马克思方法论定义为代词性视角学说（le perspectivisme pronominal）。它不仅旨在增加对于现实的观点（劳动者观点、资本家观点、经济学家观点），而且认为每一种观点均对应具体现实的一个领域，换句话说，每一种观点都构成其固有客观性领域。在得出有关数字化世界的若干最终论述前，我将效法马克思对于劳动的分析，对该学说作出解释和说明，这一做法也使我得以指出，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经验是如何成为典型的伦理经验的。

## 代词性视角学说

首先需要阐明什么是我所说的代词性视角学说。

其最普遍的原理在于对某个人称代词（我 / 你 / 他 / 我们等）对于现实所持观点的特征进行描绘。因此我们能够或以第一人称“我”的观点，或以第三人称“他”的观点出发描写现实：自己在奥运会上跑 100 米与在电视上看某人跑 100 米完全是两回事。赛跑运动员以第一人称目睹并描写这一经历，因为他自身就是其中的参与者，而观众则始终处于旁观者的外

---

<sup>1</sup> 例如可见之于 Derek Allen, « *The Utilitarianism of Marx and Engels*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0, 1973 ; Richard W. Miller, *Analyzing Marx. Morality, Power an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tephen Lukes,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最近 Mathieu de Nanteuil 也在 *Rendre justice au travail*, Paris, P.U.F., 2016, pp. 71 sqq. 中探讨了这一点。

部位置，也就是第三人称位置。但是“我”和“他”并不是关于现实的唯一可能的视角：而且哈贝马斯的哲学已经使我们熟悉了“你”的视角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是对话情境所固有的，其中“我”被放在了与另一个“我”融洽相处的位置上，因此每个人对于他人来说都变成了“你”；更不用说“我们”这一视角，这一视角还会额外地产生许多公平性问题。哈贝马斯的整个交往理论哲学都建立在这一代词性视角的互换性之上。

这些东西在基础社会学的认识论中被广为熟知(例如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便从中得益<sup>1</sup>)。不过，我们应当将一个更为本体论的论点与这一纯认识论的论点联系起来：就像我说过的，要知道每一个代词视角都对应一个固有的客观性领域。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特定的现实只存在于特定的代词视角中。于是，本体论自身被衍射成了多个代词的本体论。因此，别人牙疼，我们是感受不到痛苦的：疼痛，以及疼痛实有的现实性只可能出现在第一人称身上，即遭受痛苦的“我”。观察某个经受痛苦的人，并非检验痛苦的现实性；即使是一个因为孩子受苦而痛苦不堪的母亲或父亲也不能真正体会到孩子所受的痛苦。同样，确切地说，情感同化这样的现象只能存在于第二人称“你”的角度；如果我们是严格意义上自我隔绝的一个个小岛，那么我们绝对不能体会到对他人产生的、类似于情感同化的感受，也做不到信任某个人。故而情感同化或信任只能出现和存在于第二人称“你”的角度。至于一般的科学现象或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现象，例如统计学现象，它们完全依附于第三人称“他”的角度，所以：如果不存在“我们对现实采取客观化角度(即第三人称“他”的代词视角)”这一可能性的话，它们就不会作为现象而存在。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应当肯定，每一个代词视角都构成了其固有客观性的领域。

## 马克思的代词性视角学说

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在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分析中运用了代词性视角学说的方法，而他并不知情，或者说没有进行阐述。而且从最早期的著作开始，他就以高度的严谨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写作。他对于劳动的分析尤其彰显了这点。虽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整个经济背景与亚当·斯密的相同，但这一研究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将他彻底地与后者对劳动的分析区分了开来。与其繁复阐述，马克思早期所写的散落于1843-1844年读书笔记2中的这一文段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假设我们人类一直在进行生产活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生产中都表现出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1)在我的生产中，我实现我的个性，我的特殊性；在劳动中，我感受到我生命中个人彰显的快乐，在对客体的冥想中，我带着个人的快乐认识到我的人格作为一种真

<sup>1</sup> 我们可以在他未完成的关于莫扎特的书中找到一个例证，书中对这两种角度的区别构成了整部著作的红线。Norbert Elias, *Mozart, sociologie d'un génie*, trad. de Jeanne Etoré et Bernard Lortholary, Paris, Seuil, 1991.

<sup>2</sup> 马克思读的书为出版于1823年的法译版的James Mill的*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实的力量，它具体可察，脱离一切怀疑。2) 在你对我生产的产品的享受和使用中，我通过劳动满足了一项人类的需求，实现了人类的本质，也为他人提供了必需品，从而得到即时的精神快乐。3) 我会意识到自己在你和人类之间充当的中间人角色，作为你的自我存在的附属品，也作为你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被你承认和感知，在你的精神中如同在你的爱中一样被你所接受。4) 在我的个人彰显中，我会因为造就了你生命的彰显而得到快乐，也就是说在我的行动中实现与确认我真正的本质、我的人际社交性。我们的生产将会是一面面镜子，镜子中我们的存在从一个向另一个延伸扩散。”<sup>1</sup>

他在文段的开头说“假设我们人类一直在进行生产活动”，意思是：不论哪个经济系统都是如此。因此他谈的是人类劳动，是不受任何经济约束的、被解放了的劳动。不过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所作描述的动态性：它有条理地遵从人称代词的逻辑性：

从第一人称“我”的观点来看，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有表现力的潜能，它既能在自我考验的过程中带来生命的愉悦，又能通过客体的产出获得对自我的具体肯定。我们会注意到“脱离一切怀疑”的反笛卡尔内涵：脱离一切怀疑的，不是像“我思故我在”那样对思想本身思考的自我反思，而是像在既生产客体又生产自我的劳动中自我实现这样的第一人称生命活动；

从第二人称“你”的观点来看，更严谨地说：和第一人称“我”的观点一样出现的第二人称“你”的观点，劳动看起来就像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因此是一种人的需求（因为我们不会像为狗投食一样为他者生产客体），这种需求本身也是对生命、对人类生命的表达；

在这一“我-你”关系之外，我的劳动还促成了人类的“他”的介入，因为在满足“你”的需求的同时，我的劳动还完成了某些属于人类性的东西。既然我的劳动是你的存在的附属品，那么通过我，你就与人类和普遍人性的“他”联系到了一起。

最后，这一相互的补充性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我们”。劳动是人际社交性的实现，因为在协助你自我实现的同时，我作为交际性的存在也完成了自我实现。那句像镜子一样的隐喻由此总结了这一段。

快速阅读过后，在我看来，需要记住两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一方面，真正人类的劳动使所有代词视角能够充分发展：一项让劳动者发展“我”、完善“你”、完成“我-你”关系、

---

<sup>1</sup> “Let us suppose that we had carried out production as human beings. Each of us would have in two ways affirmed himself and the other person. 1) In my production I would have objectified my individuality, its specific character, and therefore enjoyed not only an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 of my life during the activity, but also when looking at the object I would have the individual pleasure of knowing my personality to be objective, visible to the senses and hence a power beyond all doubt. 2) In your enjoyment or use of my product I would have the direct enjoyment both of being conscious of having satisfied a human need by my work, that is, of having objectified man's essential nature, and of having thus created an object corresponding to the need of another man's essential nature. 3) I would have been for you the mediator between you and the species, and therefore would become recognised and felt by you yourself as a completion of your own essential nature and as a necessary part of yourself, and consequently would know myself to be confirmed both in your thought and your love. 4) In the individual expression of my life I would have directly created your expression of your life, and therefore in my individual activity I would have directly confirmed and realised my true nature, my human nature, my communal nature. Our products would be so many mirrors in which we saw reflected our essential natur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james-mill/) Written: in the first half of 1844; First published: in full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Berlin, 1932;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emens Dutt for the *Collected Works*.

实现与“他”的斡旋、使“我们”具体化的劳动。另一方面，年轻的马克思作为“代词现象学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逐个分析代词观点，如同它们于“我”而言依次出现（“在你的欣喜中，我也将得到快乐”等）。后来，马克思增加了“我”的观点的数量，尤其是为了展现它们如何能够成为幻想的牺牲品：在资本家看来是利润和工资，在工人看来是薪酬，在分析家看来是增值，等等。总之，马克思最后的本体论论文便是以这种方式论述的，其中指出，唯一具体的现实就是以第一人称所体验的、在实践（la praxis）和行动主体（le corps）中的现实。其余一切（尤其是经济学抽象概念）只是象征（représentation）、理想性或意识形态；唯有以第一人称经历的现实才是真实的。

这便是被解放的、使人的才干充分发展的、真正人类的劳动。正是这一能够在所有人称代词之上展开的劳动表达了人类真正的人性。因此，要将它与经济的、分工的劳动进行对比是很容易的，后者与之相反，使人失掉人性：经济的劳动不会促进劳动者的充分发展，而是对资本的增长作出贡献；它不会维持“我-你”关系，但它在劳动分工中服从于它的功能；它仅仅通过一种调解对人类产生作用，而这种调解对劳动者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在远不能实现一个“我们”的情况下，它承认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以及各生产者之间的人类分裂。正因为如此，在我所引用的文段中，马克思首先想要观察独立于任何经济系统之外的劳动！换一种说法，经济劳动结构性地阻碍了一项能够在其所有代词视角下充分发展的劳动的开展。这是一种异化劳动，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个不同于“我”的视角，并且别无选择地将这种视角强加于这一劳动之上。

## 经济的双重抽象性

此处应当重提一下双重抽象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双重抽象性是经济的基础，也是一切交换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实用价值的抽象性转向交换价值，以第三终点的名义，无限的使用价值之间得以互相交换，而对于寻找这一第三终点来说，这是必要的抽象性。显然，马克思正是在该第一抽象性的层面转而赞同了他与亚当·斯密共享的劳动价值理论。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便是从根本上将他的分析与亚当·斯密的分析区别开来的方面），这回轮到对该交换价值的计算需要一个抽象性，即从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变的抽象性。马克思多次强调，具体劳动就是作为主体活动、作为实际生理消耗（体力消耗或脑力消耗）的劳动：以第一人称经历的劳动是以其他措辞进行表述的，如同真正经历和体验且作为表达生命本身的主体活动的劳动不能与其他任何一种劳动相比较，就像我所感受到的疼痛不能和你所感受到的疼痛进行比较一样。这是因为具体劳动，即第一人称劳动，从根本上说是主体性的，因此其不可类比性导致它不能作为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为了能够计算交换价值，必须用另一种劳动取代它，准确地说就是抽象劳动，对此，马克思告诉我们，抽象劳动是同质的、未分化的、无性质的。这一劳动遮蔽了劳动活动的整个主观层面，整个第一人称的实际经验层面：

所以确切地说，这便是被视作第三人称的劳动，这项劳动从“他”的视角出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则将之放在其唯一的生产因素的实用层面来考虑。不过当然，抽象劳动属于客观化的劳动，但它仍然需要被某一个人完成，即需要一个“我”来执行；但是在计算价值时，这个“我”就不能再被考虑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抽象性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1867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透露，“整个关于事实的智慧都建立在这个论点之上”，从《资本论》第一章就被论证，“劳动的双重特性，要看它表现的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sup>1</sup>。作为交换价值时，劳动就是劳动者能够从中获得收入的一种商品；作为由资本家所购买并支配的使用价值（即“对劳动力的使用”，“use of his labour-power”）时，劳动就是价值的创造者，因此便是金钱向资本转变的唯一来源。<sup>2</sup>

## “他”的控制

换句话说，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际上是同一份劳动，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这一劳动：从“我”的视角出发考察到的劳动是具体的，以第一人称经历和检验的，从“他”的视角出发考察到的劳动是抽象的，且只考虑到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客观面，即劳动的长度和强度，而不考虑相对独立的、第一人称体验到的为劳动付出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这里两次发挥效用的是劳动力（force de travail）”，而不是资本家为购买劳动力支付的金钱。因此，抽象的经济劳动是一种异化（aliène）的劳动，因为它让劳动者依附于单一的“他”视角，而这种视角宿命般地强加于劳动者。抽象劳动的支配，是“他”视角的支配，经济的支配，不具名的强权的支配，这一强权为了自身利益完全控制了劳动者的客观劳动力，

---

<sup>1</sup> 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Lettre à Engels du 24 août 1867)。引用于 Karl Marx, *Economie*, II,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68, Introduction, p. CXXX. 马克思补充道：“2、除去诸如利润、利率、地租等特殊形式，已经分析了剩余价值。这将会在第二卷中着重论证。”“我的书中最棒的点包括：1、（这于所有对事实的理解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其表达的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劳动的双重特性在第一章中被讨论；2、除去诸如利润、利率、地租等特殊形式，已经分析了剩余价值。这将会在第二卷中着重论证。”（“The best points in my book are: 1. (this is fundamental to 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s) the two-fold character of labour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is expressed in use-value or exchange-value, which is brought out in the very First Chapter; 2. the treatment of surplus-value regardless of its particular forms as profit, interest, ground rent, etc. This will be made clear in the second volume especially.”）  
([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marx/works/1867/letters/67\\_08\\_24.htm](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marx/works/1867/letters/67_08_24.htm))

这些“特殊形式”每次都对应一个不同的观点（工业资本家的观点、金融资本家的观点、地主的观点），这些观点分别构成了它们固有的经济客观性领域，即利润、利率、定期租金，而根据代词透视法学的假设，我要从另一方面为这一想法作辩解。

<sup>2</sup> 这体现的依然是马克思如何在这一点上将代词构成的观点与现实区分开来：“我们必须区分：在工人手中，劳动力属于商品，不属于资本，且对他来说，劳动力构成了收入，只要他有能力，他就能不断重复出售他的劳动力；只有在售出后，劳动力才能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在资本家手中运作。此处两次发挥作用的，正是劳动力：在劳动者手中，劳动力作为商品根据其价值出售；在购买者，即资本家手中，劳动力则作为价值和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力量。”（Pléiade, *Economie* II, pp. 742-743.）（“We must make this distinction: The labour-power is a commodity, not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the labourer, and it constitutes for him a revenue so long as he can continuously repeat its sale; it functions as capital after its sale, in the hands of the capitali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tself. That which here serves twice is labour-power: as a commodity which is sold at its value, in the hands of the labourer; as a power-producing value and use-value, in the hands of the capitalist who has bought it.”）(<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5-c2/ch19.htm#2.4>)

让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为压榨他的系统而工作。<sup>1</sup>

这种“他”的控制因科技发展，特别是自动化设备的出现而加强，从而更为凸显。当“他”描绘劳动分工时——社会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以及手工业分工（“division of labour in manufacture”）——马克思将演变层级解读为劳动组织和科技发展对劳动者客观性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对劳动经验产生的影响。这一影响出现在社会演变的不同阶段：

——这样，劳动的社会分工虽然将个体局限于单一的劳动中，但是它仍保留了一些原初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划分中劳动活动是完整的，既可以看到劳动成果（比如医生看到自己的病人痊愈，农民看到自己的作物生长）也可以体察到劳动意义。主导着每一个行业、每一项工作的生产活动由使用相应工具的劳动者自身的才能决定。这就是手工业者的模式。技术为作为对劳动者来说有意义的整体活动（*activité totale*）的行业服务，这样的整体活动对其自身的开展、目标和结果都有所掌控。

——至于手工业分工（*la division manufacturière*），这一处在生产活动自身内部的劳动之中，活动不是整体的，而是片段化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提到了“个体工人”（« *detail labourer* »），因为其中每一个部分工序都是由一名工人完成的；个体在非常特殊的任务中相互独立，而不是完成一个完满的整体工作（这成为了其特性；特性代替了行业）。而且，与他人的合作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愿的，相反，是由劳动者自身以外的力量强迫的；劳动者没有工具（生产手段），因为工具属于资本家。总的来说，劳动者因此处于被剥夺的状态，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劳动者本身什么也不能掌握。他不再属于自身，因为他完成的任务不再是自主选择的，他的劳动目标不是自己的目标，他也不清楚这一目标是什么，他使用的工具、借助的技术不属于他，和谁一起工作也不是自己的选择。这完全是剥削的过程——因为他人的利益而异化。“他”以外在权力形式强加于“我”。

——但是，马克思仍然将手工生产描绘为劳动划分中与主观准则相关的部分，也就是说劳动划分在这里仍然和劳动的主观性相连结。为什么？因为在生产部分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和劳动者的个人能力与才干相关。在“机械生产”，即机器代替工具的工业中一切都变了。这时，劳动变得客观，也就是说它完全摆脱了劳动者个人才能：对劳动者来说，生产组织成了纯粹客观和非人的组织。马克思强调这一反差：“在手工生产活动中，工作的划分是纯粹主观的，是一种“个体工人”的组合。而在机器系统中，大型工业建立起一种完全客观和非人的生产组织，工人在车间中被视作一种完全准备好的物质条件”（P1 I,9302）。因此，我们利用的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工人的灵活度，而是他们服务于连接他们的机器的劳动力：“在

---

<sup>1</sup> « The money which the labourer receives is spent by him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 labour-power, or — viewing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 working-class in their totality — in order to preserve for the capitalist, the instrument by means of which alone he can remain a capitalist.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5-c2/ch19.htm#2.4>)

<sup>2</sup> « In Manufacture,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social labour-process is purely subjectiv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detail labourers; in its machinery system, modern industry has a productive organism that is purely objective, in which the labourer becomes a mere appendage to an already existing materi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Capital-Volume-I.pdf> p. 268.

手工业中，工人们组成一个活的机制，每个人都是机制的成员。在制造业中，工人们被编入一个死的机制，这一机制独立于他们而存在。”（P1 I,9551）这就是工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诞生于手工业，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技术、即机器的诞生，尖锐地改变了劳动划分的性质，也因此改变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劳动划分采用的这一形式的更迭描绘了“他”视角对于“我”、系统的客观性对于劳动者的主观性的控制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演变。

## 作为伦理选择的视角学说（perspectivisme）

马克思这些关于劳动的研究最突出展现的是视角主义学说的方法论选择，或者说是凸显出代词现象学这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选择。对他来说，这些研究不是为了针对劳动者的经历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将他们的第一人称视角经历作为其道德内在论的准则。马克思并没有表达强烈的道德准则或是以此为标准来解读和批判现实，他更多的是以代词视角解读经济现实，这一解读让他看到劳动者面对的现实是怎样的。对劳动者来说，这一现实以对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他”的服从的方式呈现，后者剥夺、压迫他们，让他们受苦。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劳动的划分非常清晰，主观性划分出现在最后的分析中。<sup>2</sup>正是这种经历本身，这种“我”的视角下的经历为劳动者们搭建了一种向他们加强限制和痛苦的伦理体验。

这一视角的差异——人称的差异，或者说本体论的差异——出现在《大纲》和《资本论》最核心的分析中，马克思将“生产成本”，即资本家眼中的资本的客观支出（因此这是一种第三人称的视角）与他所称的“真正的”（réels）生产成本加以区分：“商品的成本在资本家看来就是资本支出，但真正的成本是劳动支出<sup>3</sup>”，而这一支出被薪酬的形式所掩盖。价值过程和生产过程不同，前者可以由主观劳动活动表达，而这一活生生的劳动活动被使其客观化的第三人称视角掩盖。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伦理方法论”的，而这种伦理不“仅仅”是实践层

---

<sup>1</sup> « In manufacture the workmen are parts of a living mechanism. In the factory we have a lifeless mechanism independent of the workman, who becomes its mere living appendage.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Capital-Volume-I.pdf> p.285.

<sup>2</sup> 这是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两卷本《马克思》（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的主要研究主题之一，而这一研究始终没有得到马克思研究批评的注意。亨利视马克思为实在生活的现象学家，他的研究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至今无人能及。但是，对其研究的精度让我一点点感觉到他轻视了马克思贡献的精华之一，就是对社会对象这些“象形文字”的理解：他的代词性视角旨在回到这一独特的解释性原则，即个体主观性，真实是由不同的代词性关于真实的视角构成的。

关于作为主观性分工的劳动分工，参见《资本论》中这一论述：« Not only is the detail work dis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s, but the individual himself is made the automatic motor of a fractional operation, and the absurd fable of Menenius Agrippa, which makes man a mere fragment of his own body, becomes realised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pdf/Capital-Volume-I.pdf> p. 249.

<sup>3</sup> 《作品集 II》，七星丛书，p. 881. 英文版本：« The capitalist cost of the commodity is measured by the expenditure of **capital**, while the actual cost of the commodity is measured by the expenditure of **labour**. »

面上加之于现实的伦理标准。“他”的控制以其加于劳动者主体经历的影响得到体现。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这种控制与剥削（exploitation）无关：技术发展或工作划分本身都不具有剥削性。更多的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资本主义政权造成了剥削。马克思甚至用一些篇幅赞扬了劳动的划分，因为当这样的划分不在资本主义剥削的前提下时是有利于人类充分发挥所长的。当他改变角度，即不再从劳动者视角出发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甚至还赞扬了现代工业革命性的功绩，称现代工业“从不将现行的生产方式视为定论”（PI I, 990：《资本论》，IV, XV, ix）。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才会在《共产党宣言》中赞扬资产阶级。而当他寻找一个特定的标准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时，他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得到了答案，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自身视角出发。这一标准，就是暴利（vol），这一交换经济中最重大的罪恶，准确来说是作为完成了但不被支付报酬的劳动的暴利。这里同样，代词性视角学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是这一方法使得马克思破除牺牲者工人的迷思，他们以为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报酬（因为他们的确有工资），但是这份报酬只与其劳动力相匹配（而剩余价值被隐藏了）。这里同样，资本主义者看到的现实和劳动者看到的全然不同，支付工资的表象让劳动者看不到未被支付的劳动实质。<sup>1</sup>

因此，是代词性视角学说让马克思得以揭示对劳动者来说作为伦理经历的劳动，这种经历既被劳动划分和技术发展异化，又被资本主义强加的工资形式剥削。工业劳动的条件没有被批评，因为虽然它们违背了人类的尊严和权利，但在劳动者视角的主观体验和生理体验中这一问题并不严重。因此，马克思思想中是否有一种潜在的道德理论（Stephen Lukes）这样的问题并不恰当；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构劳动的企图——这也是贯穿他全部研究的方法论——在劳动本身构建了一种“我”的层面的、从经历的体验出发的、作为社会演变标准的伦理姿态，社会演变将根据其加以这种体验的影响而被以一种总体的方式把握。

经济上越来越无法逃避的“他”对主观经历的“我”的控制回到了贯穿马克思全部作品的基础二分法，即将经济与生活对立。经济破坏生活，且经济不得不破坏生活；我上文提到的作为经济的基础的双重抽象性是必须的，因为它就是经济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所有经济都是如此：经济只能在这些抽象的基础上实现。但更准确地说，这些“他”的抽象与“我”的生活相对立，因此应该废除这些抽象，让“我”可以充分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独自的、个体的、自我肯定的发展，而是在主体人的层面上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大力宣扬的，他称之为“个体的普遍发展”（«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并希望在废除经济和权利之后，劳动”不仅仅是生活手段，更是生活的首要需求“（Pl. I, 1420）。也就是说：将劳动放回“我”的那端，使其重新成为人的劳动，而不再是经济的掌控工具。”

---

<sup>1</sup> 的确如此。《作品集 II》，七星丛书，p. 881。英文版本：« The category of cost-price, on the other h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ation of commodity-value, or with the process of self-expansion of capital. (...) The investigation will show, however, that in capitalist economics the cost-price assumes the false appearance of a category of value production itself. »



如今，经济的掌控力不满足于采掘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数据采掘（l' extraction de données）更是与日俱增，从而占据了生活本身。目标对象不再只是工作的独立性和对劳动这一社会活动的特定区域内的体验产生影响，而是针对存在本身，针对在我们全部社会活动和私人行为中的存在。数字经济的“他者”试图插手我们主观体验的核心，它想尽可能多地取代我们的思想。机器不再只在工作中代替我们，它们还想要精神生活自动化，就像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深刻的分析所表达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就是“注意力经济”（l' économie de l' attention）运动，它体现出的对思想层面上“注意力”的捕捉成为了数字经济的核心关键。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数字控制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又在寻求马克思奠基的代词性视角伦理新的发展、延长和深化。因为如果我们简单地停留在尊重个人权利和尊严基础上的传统伦理准则，我们也就局限在所谓“狭义伦理”（« la Petite éthique » ou « éthiquette »），即一种关注权利保护和个体自由的伦理。那么我们会聚焦在例如个人数据保护、私人生活保护、商业交易安全等全世界数字立法考虑的问题上，然而，在关注数字对我们存在的控制的人类学层面，这些都是小问题。这里不需要细述这一控制的扩张和机制，但我想有很多人都将这种控制视为思想生活摧毁的标志。不过，妙的是，思想和自然不同，它总是以第一人称被体验、被感知、被证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算法，也不是一些算法的总和。因此，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对现代劳动体验主观性诊断推广到思想生活，从第一人称视角——只有我们谈论自己活生生的思想时才能实现——保护一种未受算法和计算机奴役的主观性，一种能够在所有视角引导下展开且不受任何一种异化的主观性——这里的“我们”是数字系统中不具名的“我们”。

# 拟对象的谱系学：数字对象理论的序曲

蓝 江

(江苏南京 南京大学哲学系 210046)

**摘要:**如何思考对象问题一直是哲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从启蒙早期开始,人们已经基于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来思考对象,而这种二分体制下的对象实际上导致了某种特殊的“似自然物”或“拟对象”的发生,当代法国理论家塞尔和拉图尔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架构经过不同行动元所形成的拟对象问题,但是拉图尔缺少一种总体的维度,导致他的理论成为当代的莱布尼茨主义。相反,西蒙东从关联环境下的对象的个体化和具体化来引申出现代技术对象的问题。这样,拉图尔和西蒙东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去思考今天的诸多数字对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将数字对象同时视为一种行动者网络中的转化器和关联环境下的个体化,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拟对象,我们才可能理解数字对象的独特性。

**关键词:**拟对象、数字对象、拉图尔、西蒙东

谈起对象或物,往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印象,一杯水、一张纸、一只小狗、一台机器、一幢建筑。在以往的哲学中,这些对象物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与作为主体的我们并存的被动的客观性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模式只能以被我们的意识或我们的行为所认识或激活。而在这个认识或激活背后,存在着一种实在论式的根基,即有一种无法为我们意志所转移的惰性。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徜徉于网络空面,面对大数据和云计算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和界面时,这种基于传统主客体二元论和实在论根基的哲学是否仍然可以帮我们洞悉其中的一切?

##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1959年9月,英国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讲座,对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sup>1</sup>,表现得极为忧虑。这两大集团一方面是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将自己树立为现代社会进步的标榜,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科学文化”。在人们看来,科学家往往带有一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他们将自己的锋芒指向一个那个自然界,正如斯诺本人所说:“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

<sup>1</sup> [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3页。

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冲力。”<sup>1</sup>而被斯诺视为分裂的另一极是人文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们不同，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那种冲动和乐观，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多充满着忧虑。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所处的现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像自然一样的给予物，而是人类自己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也正是出于人类自己的有限性，充满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科学家们努力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面对自然，去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不同，人文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去摆脱现代社会的藩篱和羁绊，在斯诺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的卢卡奇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去突破和摆脱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约束，实现一种“摆脱社会的自由”<sup>2</sup>。这样，科学文化或者人文文化（斯诺称之为“非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这道鸿沟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

当然，斯诺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思想家。早在十七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就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已经进行了一场争论。在法国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 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就提到了著名的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真空泵的实验研究产生了巨大争议。因为波义耳的科学不再是简单诉诸一种数理的推论，而是坚持用实验室的方式将某种事实展现出来，与之前的实验不同，波义耳更关心他所需要的实验是否能被人们所看见。“波义耳的设备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在一系列构思巧妙的封闭空间和容器的帮助下，它们能够使观察者看到玻璃试管内部的情况，并允许人们引导甚至控制实验的发展。”<sup>3</sup>这样，波义耳树立的是一个现代实验科学程序，即科学结论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学、数学和修辞学（这些学科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充当科学的主要依据），而是“依赖于一种准司法性的隐喻：在实验场地获得可靠之人、可信之人甚至是有钱人的证言，就可以证实事实的存在。”<sup>4</sup>简言之，波义耳的实验程序梳理的不是以某个人的权威或者看不见的演算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而科学的依据在大家共同能够观测得到的事实（fait），也正是波义耳的事实权威成为他与霍布斯争论的焦点，而霍布斯批评波义耳的基础恰恰是哲学。而在美国科学哲学家夏平（Shapin）和谢弗（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Air-Pump*）指出：“‘每个人自做的实验’是经验。霍布斯说过，由于这只是‘感官和记忆’，实验在由此经验的人心中产生确定性，但却无法产生集体的确定性，而那是哲学的特权。”<sup>5</sup>说得更确切些，霍布斯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社会权力关系构造的利维坦哲学。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哲学研究自希腊兴起之后，意见互异，问题纷杂，除自然物之外，亦涉及到的政治，人人

<sup>1</sup> [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64 页。

<sup>2</sup> [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93 页。

<sup>3</sup>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20 页。

<sup>4</sup>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21 页。

<sup>5</sup> [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122 页。

各取所好之议，每每视旁人之见为异端，然异端不过一己私见，不涉真伪。”<sup>1</sup>，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基于自利算计的公民将权力让渡，在契约之下，将关于问题的决定权让渡于契约形成的利维坦之下，而这个人工建构的利维坦，而不是波义耳的事实，成为确定真理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在霍布斯的命题下，关键的不是事实和经验，而是算计和权力，而最终对于事物对象及其真理性的裁量，让渡于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物——利维坦。

事实上，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如何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对象问题，而是将对象撕裂为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自然对象，在以波义耳为代表的科学家之下，决定自然对象的是科学性的客观事实，它们需要在实验室树立的标准程序之下，将某个对象转化（translate）为一个科学的对象，并纳入到现代科学体系的话语当中。而在另一边，是社会或政治的对象，霍布斯的对象更适合用政治或法律的范畴术语来把握，更多地我们需要将对象视为一种社会联系，正如拉图尔所说：“利维坦仅仅是由公民所构成。简言之，除却社会联系，别无他物。或者说，多亏了霍布斯及其继承者，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社会关系、权力、力量和社会的含义了。”<sup>2</sup>在拉图尔和夏平、谢弗等人看来，所谓的现代性的诞生是两套平行的体系，一套是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体系，另一套是依赖于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的个体（naked calculating individual）所达成的契约而造就的社会或政治体系，一边是波义耳的空气泵，一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边是试图摆脱人类社会污浊的纯粹自然，一边是完全依赖于公民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连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真理既是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偏见的纯粹自然规律，也是一种基于各种算计而达成最终协议的人工产物（语言游戏），这两套体系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拉图尔那里，这是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碰巧，这也正是拉图尔影响力最大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的副标题），而在法国新一代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那里，这就是自然与人类本身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

然而，这种彼此对称的自然与社会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缔造了互为颠倒镜像的科学体制和人文体制，也塑造了两种对应的架构对象的方式。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里，是先天的观念首先建立了我们认识的基本框架，也只有在这个先天的框架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具体的物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具有了关于房子的概念，我们才能在现实之中将某个物视为一个房子，相反，倘若没有这个房子的范畴或概念，房子就不可能作为对象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也不能形成我们的意识。费尔巴哈试图颠倒这个关系，他将这种做作的观念论改造成为一种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问题也恰恰是现代性这种二分的另一种表象，即在他坚持一种只能被我们感性直观所把握的自然对象的时候，虽然克服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再返回自身的观念式循环，但是他选择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式的自然对象，即一种纯粹化而不受人类意识干扰的感性世界的形式，正如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那样：

<sup>1</sup> [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80页。

<sup>2</sup>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页。

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sup>1</sup>。

马克思的评论对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以及那种十分坚持自然对象和社会（或人为）对象区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让自然存在物可以通过科学方式来纯粹地加以认识，无论是科学上的实验方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实际上都试图将自然对象加以提纯，变成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社会而纯粹理解的对象。马克思随后以德国莱茵地区的樱桃树为例，告诉这位学究气十足的费尔巴哈，他眼前所能直观到的樱桃树，并不是因为樱桃树是自然直接的给予物，恰恰相反，是因为德国莱茵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处于商业上的利益，人们从其他地区将樱桃树移栽到莱茵地区，德国教授的眼中才能直观一种叫做樱桃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是一种从具体的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来架构现实对象的方法，从而以此来克服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分裂。自然对象的纯粹化，以及我们能够以纯粹直观的方式来审视自然，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正如拉图尔指出，只有在波义耳和拉瓦锡的化学之后，氯化钠的提纯才在化学上成为可能，作为盐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的氯化钠表面上是一种自然对象，但确实是一种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一个更为精准的例子是货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研究了商品的二重性之后，将目光指向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对象。显然，无论我们是从纯粹自然的角度的角度，还是纯粹观念的角度，都无法深入理解货币的本质。作为对象的货币，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它依赖于商品交换体系，马克思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sup>2</sup>也就是说，货币有着天然物外衣（如金银或其他贵金属），但是它却表征的是一种被掩盖的社会关系，货币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如果我们将货币的纯粹物质形式孤立出来，得出的绝对不是货币，而是一个特殊的自然物（贵金属）。相反，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即作为对象的货币，恰恰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网络关系中起作用而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成为一种杂合物（hybris），它同时包含着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的表征。

不过，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特殊对象的存在，它构成了二元对称现代性的一个中间项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6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93页。

的杂合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使用一个特殊的概念，将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提出的纯自然对象和政治或社会对象区分开来。不过，在后来《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sup>1</sup>，在这个层面上，张一兵教授将货币对象解读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物的社会存在物，张一兵教授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的原意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某种特殊性，即人类主体社会生活颠倒地表现为非主体的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化经济力量奴役的自发进程，人类主体异在地表现为客体经济过程的人格化，所以人类主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如同无主体的自然进程一样，变成了不以人类主体意愿为转移的类似自然史的过程（我在这里称之为‘似自然性’）。”<sup>2</sup>这里的使用的“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正好可以用来弥补马克思在概念上的这个空缺，简言之，在现代社会中二元对称的人类学的谱系下，在表面上我们获得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然物或人为物（社会物），但实际上，这种纯粹的自然物和人为物依赖于一个更为根本的中介，这种中介不仅仅同时由自然成分和社会成分杂合而成，它也位于自然和社会那道难以弥合鸿沟之间，成为二者间唯一的沟通路径，就如同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和人类社会交往链接起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以物与物的关系来表征人与人关系的货币，货币就是最典型的杂合物，也是看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最为自然的东西，仿佛它有着自己的自然规律和属性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是对现代体制下的货币这种特殊的杂合物最好的说明。

## 二、拟对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似自然性”翻译为英文，可以翻译为 quasi-naturality，这个词的用法，很接近于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和拉图尔的一个关键概念拟对象（quasi-object）。无论在塞尔那里，还是在拉图尔那里，拟对象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物或对象，而是依赖于一种建构的体系所生成的对象。

实际上，拟对象概念的产生，与法国独特的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过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洗礼之后，整个社会过程和结构被视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宣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直接将从主体层面来把握自然和历史的的可能性排除了。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真正决定对象的，并不是那个被称为主体的东西，相反对象的属性和内涵取决于它在一个具体的结构网络中的关系。例如福柯将对象直接转化为一个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结果，如福柯曾以一本手中的书作为例子，而进一步指出：

<sup>1</sup> [德]马克思，《资本论》法文修订版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4 页。

<sup>2</sup>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5 页。

我手上这本作为对象的书，收缩在这个限定它的平行六面体当中，它的统一体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它只能通过话语阈（le champ de discours）来建构、指示，最终得到描述。  
[8]P731

福柯的意思是，所谓的对象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依附于一种话语体系，福柯说：“每一种话语，依次建构出自己的对象，它一直会起作用，直到实现对象彻底的转变。”<sup>1</sup>这里的关键在于，和罗兰·巴特一样，福柯认为对象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构型建构出来，重要的不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话语与对象的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只能在话语构型中来理解。这样，对象与一种抽象的话语构型或者话语布局（dispositif）构成了一种神秘性的对应关系，物-对象是在这种特殊的布局或构型成为对象的。而后来的鲍德里亚的《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实际上也正是秉承了福柯这种从话语或象征符号角度来架构物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正的架构不是物的架构，物所形成的体系根本不是物自身的物质性或功能性的体系，而是一种符号性的体系，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鲍德里亚说：“我们所有的实践对象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结构元素，但与此同时，它们不断摆脱技术的架构，走向它们的第二重意义，摆脱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抽象’体系。”<sup>2</sup>鲍德里亚这里批评了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仅仅将对象看成是技术对象，而不是文化和符号的对象，从而为他重新从文化结构上来建立“对象体系”（即物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与福柯一样认为，对象只能在话语和符号构成的体系中，物才能成为具有某种意义和内涵的对象，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能还原为话语和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才能成为一个对象的物体系。

从福柯和鲍德里亚对物或对象体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 对象并不是一种稳固的实在。它的实存，依赖于一个体系。更准确地说，对象的实存实际上是相对于某个实存模式（le mode d'existence）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福柯才强调对象的实存是“可变的”和“相对的”。

2. 福柯和鲍德里亚所依赖的实存模式是话语或符号的实存模式，这一点在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以及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问题在于，对象和一种作为看不见的框架基底的话语或符号体系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符号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增殖？显然，无论是福柯，还是鲍德里亚，甚至其他坚持从符号结构主义来理解对象的法国思想家来说，对象与语义符号和话语结构被神秘化了。在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物理属性和社会功能的二分之外，福柯和鲍德里亚都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符号和话语的领域，这个领域被结构主义认为是凌驾在自然和社会二分之上的，并具有支配性的价值，鲍德里亚说：“基于这样一种抽象以及这样一种整体性

---

1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75, Paris: Gallimard, 2001, P739.

2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P14.

的趋于体系化的趋势,这样一种分析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反过来也是对生产的社会逻辑分析,在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sup>1</sup>。也正是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坚持认为在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存在一个符号价值,在鲍德里亚这里,传统的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以符号交换为核心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符号的肯定性价值作用之下,产生了功能性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意义操控,由此,意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物化观念。其中存在着要素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表现方式是将符号体系扩张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对意义的操纵之中。所有压抑性的和还原性的权力体系的策略都已经在符号的内在逻辑中显现,同样也在交换价值的路基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显现。”<sup>2</sup>

因此,在福柯和鲍德里亚那里,对象就是符号所架构的对象,所有的对象物最终都需要被还原为一种符号的结构体系,并且在这种符号体系之外,对象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的意义,这种被符号或话语架构的对象,事实上已经脱离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变成了三元关系,而这种用来消弭自然和社会分离的符号体系,恰恰被建构为一种同时与自然与社会分裂的第三体系,成为一种神秘化的权力。

或许,这正是塞尔和拉图尔等人对福柯不满的原因所在,尽管塞尔和拉图尔也坚持认为对象必须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中构成,但是,从一个外在于对象,以及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外的话语体系来架构,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对于塞尔来说,即便没有福柯意义上地方话语体系,或者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体系发生作用,对象仍然会将自己建构为一个有效的体系,这种方式更多不是语义性或话语性的,而是体验性的。在《万物本源》(Genèse) 塞尔说:

我体验过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这些对象。我认为,我是听到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触摸到,也不是想象到这些对象。我听到这些声音,却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也猜不出这些声音从何而来。听觉的归并能力胜过了分析能力,耳朵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当然,我用耳朵、颞骨、锥部、鼓膜和耳廓来听,但是也用我的全身和我的全部皮肉来听。我们沉浸在声音之中,就和在空气和阳光中完全一样,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声音的漩涡之中。<sup>3</sup>

一个“漩涡”,一个声音,触感,乃至身体与万物结合在一起的漩涡。在2017年新书《火与故事》(The Fire and the Tale)中,阿甘本对此评价道:“我们不能将主体和对象思考为一个实体,而是要看成在生成之中的一个漩涡,它们唯一具有的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在漩涡中,它拥有了自己的形象、姿态和运动”<sup>4</sup>。在漩涡当中,所有的对象生成为一个具体

<sup>1</sup>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97页。

<sup>2</sup>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19页。

<sup>3</sup> [法]米歇尔·塞尔,《万物本源》,蒲北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9页。

<sup>4</sup> Giorgio Agamben, *The Fire and the Tale*, Lorenzo Chiesa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1.



化的形象，并在其中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形象，并不是稳定的，一旦存在着另外的漩涡，这种形象也会随之而改变。我们再次面对了福柯所强调的对象的“可变性”和“相对性”，不过，在福柯那里，对象的相对于具体的话语体系而变化，在塞尔这里，对象是相对于一个身体性或者体验性互动的漩涡而发生变化。

在这个互动性的漩涡的基础上，塞尔界定了他独特的拟对象的概念。在《寄生》(Parasite)中，塞尔以白鼬为例，说明了这种体验式的漩涡网络关系：

白鼬味道很大，闻起来像臭鼬，而臭鼬多为杂交。那么白鼬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回到其属性上。白鼬喜欢吸兔子的血，它会跟随兔子跑到兔子洞穴里，它会压在兔子身上，噬咬兔子的鼻子或脖子，吮吸兔子的血。我们可以驯化白鼬，这样白鼬不再是野生品种。我们拿驯化的白鼬来捕猎，就像使用秃鹰和鹰隼一样，我们寄生于它们。我们给白鼬带上嘴套之后，让白鼬进入兔子洞穴，吓傻的兔子们会四处逃窜，然后兔子就会落入到设好的陷阱。再说一遍，这是网络中的一词漂亮的演化。<sup>1</sup>

在这里，被驯化的白鼬已经不是在自然界中自由自在吸食兔子血的白鼬，而是变成了一种与人的共生结构，驯化的白鼬，成为了人类捕捉兔子的工具，而白鼬也形成了与人类的依存关系。这样，这种循环的白鼬，在人类的驯化和成为人类捕捉兔子工具的行为网络当中，成为一个拟对象，塞尔说：“拟对象并不是对象，因为它不是主体，因为它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他是一个拟对象，因为它标示或指示出一个主体，没有拟对象，主体就不成为主体。”<sup>2</sup>简言之，白鼬、兔子、捕猎者成为了这个行动网络的中的漩涡，白鼬的驯化是的在这个漩涡中成为一个拟对象。我们同样可以说，货币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拟对象，因为购买的主体，在没有作为拟对象的货币时，他便无法完成购买的行为，因为也无法将自己建构为一个行动的主体，所以货币是在整个商品交换活动中，而不是在抽象的符号和话语中被建构为拟对象的，它的拟对象存在模式依赖于商品交换中，各个人与物之间的行为关系，而货币被建构为各个行动者和物之间的中介通道。然而，商品经济下的货币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中介性关系。在后来的拉图尔看来，货币的存在模式已经从简单的中介物(intermediary)变成了一个转化器(translator)，也就是说，一切人与物，都必须经过这个特殊的拟对象的转化器来转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一般等价物即作为转化器的拟对象，成为另一种掌控整个自然和社会对称性结构的控制器或算子(operator)。

塞尔的分析已经让之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露出了雏形，在八十年代，巴黎高科矿业学院的两位学者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以及

1 Michel Serres, Parasite, Lawrence R. Schehr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P225.

2 Michel Serres, Parasite, Lawrence R. Schehr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P225.

来访的英国学者约翰·洛（John Law）基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面的集体工作的方式，提出了 ANT 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德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不仅仅是巴斯德本人的发现，其中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相互交流彼此的发现，以及实验室里的模式的更替，以及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同行以及专业学术机构可以很快地认可和接受巴斯德发现，使得巴斯德发现细菌的事件成为一个行动者-网络。拉图尔说：“将它们联系起来需要工作和运动。这些东西并不是在逻辑上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按照一种特殊方式展开的。巴斯德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工作，让自己忙碌一些他交给别人去做的基础性工作。他或许也会在某一时刻‘退缩’——事实上他已经迟疑了。他或许不会选择狂犬病作为他第一个病例，他或许会认为约瑟夫·梅斯特的案例不足以建立一个研究所。……然而他做了这些事情，成为了一种运动，也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他自己，巴斯德。”<sup>1</sup>巴斯德、他所选择的实验室的同行、那些对巴斯德的研究提出质疑的人、以及作为巴斯德第一个病例的那位叫做约瑟夫·梅斯特的孩子，甚至最终作为发现成果的细菌，还有最终制造出来细菌的疫苗，并成功接种的那些病人，都构成了这个偶然而不确定的行动者-网络的整体。因此，拉图尔这样来描述他的行动者-网络：“于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出乎其间的中介节点组成的巨大的星状网络所带来的行动。它由诸多关系所组成：首先是依附关系，其次才是行动者。”<sup>2</sup>那么，最终为巴斯德带来巨大荣耀的细菌，实际上是这个行动者-网络的拟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者-网络，不仅仅是巴斯德不可能发现细菌，甚至我们无法看见、无法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到细菌的存在。细菌，作为一个拟对象，依附于巴斯德的行动者-网络，而拟对象就是一种在这个网络当中形成的自然和文化的杂合物。

### 三、走向数字对象理论

尽管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概念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数字对象的理解，即数字对象依赖于一个产生于数字技术时代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衍生出某些拟对象，而对数字时代物质实在和精神主体的理解，都需要通过这些转化器转化为一种被各个中介节点所把握的对象。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行动者-网络中是否存在一种差别关系？在某些地方，有人曾用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来比喻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其改造为行动元-块茎（actant-rhizome）理论，拉图尔表示这个说法他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关心的实际上是非常细微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元，而所谓的整体无非是在偶然情况下，这些行动元可以在某种关联下聚集为一个关系网络，对象就是在这个

---

<sup>1</sup>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Alan Sheridan & John Law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0.

<sup>2</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17.

以行动元为基准的网络中形成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种先于这些行动元而存在的整体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作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代表之一的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曾经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批评：

拉图尔完全没有单一整个世界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不过是世界衍生出来的碎片（有可能他的血浆理论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似乎将血浆看成是一个无形式的总体）事实上，他的那些特殊的行动者彼此是完全割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两个对象如果要发现联系，就必须需要一个中介——我们从来不会从巴门尼德那里听说需要这么一个中介。<sup>1</sup>

或许也正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引起了太多争议，在2013年的《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中，拉图尔似乎没有继续用行动者-网络来作为他唯一的思考模式，对于行动者产生的争议，拉图尔保留了最简洁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世界的实存模式。拉图尔说：“从现在起，研究实体的第一种模式需要另一种实体的实存，我们记作NET，即网络。在整个研究中，为了避免发明新词，我决定保留传统维度上的一些习惯用的名词——如法律、宗教、科学等等；然而，一旦我想要给出这些词的准确含义时，我就会使用三个字母的写法。”<sup>2</sup>，新的NET的模式，就是拉图尔用来打开其他12种实存模式的“钥匙”，不过，在哈曼看来，尽管拉图尔极力摆脱人们将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批判为新的单子论，但是在《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实际上仍然回到物与物的关系，仍然丧失了对非关系的实在性的把握。正如哈曼所说：“尽管拉图尔提出了新的模式计划十分重要，但它仍然用来思考整个世界，而对世界的思考需要一种外在于任何网络的非关系性深度。”<sup>3</sup>换言之，拉图尔的失误在于，他首先将彼此分离的行为者或行动元看成预先给定的东西，整体的网络是他们经过中介物链接的结果。相反，对于哈曼这样的思辨实在论来说，一个世界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彼此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变现为一种无法被辨识，无法分割的无分差(indifferent)的世界，对象或个体并不是先天地从其中析离出来，它从其中的分离，或者某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分离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拉图尔显然将这些前提条件当成自然而然的给定。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重新从形而上学上阐释了对象在世界上的发生。在2006年出版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中，他从集合论的角度论述了对象是如何在世界上发生的。在巴迪欧看来，对象是一种特殊的集合，它并不是预先给定

---

1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17.

2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therine Porter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5.

3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therine Porter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

的孤立的存在物，相反，对象从世界中的分离，需要一种函数或指标，巴迪欧称之为超验的实存函数 *Id*，*Id* 规定了某种属性，而一旦在世界中符合该属性的元素都被汇聚为一个内在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巴迪欧意义上的对象。巴迪欧的对象定义是：“已知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对象，是由一个多和这个多的超验指数构成的配对。”<sup>1</sup>在巴迪欧的对象概念中，需要一个界定属性的函数 *Id*，这个函数与实在中的某些元素组合成的集合对应，让这个集合变成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对象，在本体论上，这有点类似于集合论数学中的分离公理，但在根本上，在巴迪欧看来，对象的形成依赖于那个可以决定其是否可以实存的函数 *Id*，这是一个配对关系，也就是实在世界中的某个符合函数的集合 *A* 与函数 *Id* 的对应，写作  $(A, Id)$ ，成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再是拉图尔意义上的拟对象，而是巴迪欧意义上的真原子 (*atome réel*)，这个真原子构成了巴迪欧所谓的“唯物主义假设” (*postulate du materialisme*)，由于实在的集合 *A* 与超验上的函数 *Id* 的对应，所有能够确立起来的对象都是“真原子”，从而确定了所有对象的实在性。

不过，巴迪欧关于对象的考察，实际上没有真正面对技术所产生的生产性变化，在这个方面，巴迪欧成为费尔巴哈的现代映射，尽管巴迪欧的超验函数确保了一种预先给定的行动个体的状况，并用函数的模式让对象从一个未分化的世界中析离出来，但是这种析离是一种类似于静态直观的析离，而对于突然出现的事物，巴迪欧完全诉诸于一个不能预测，也不能及时得到认知的事件，而在事件之后，由于新的超验函数被确立起来，使得新的对象  $(A', Id')$  得以确立，而这个新对象与之前的对象是断裂的关系，但新对象仍然符合巴迪欧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假设，是一个真原子。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没有巴迪欧意义上的断裂性事件，我们是否就无法去生成一个新的对象，甚至是一个非“真原子”的对象。实际上，在 2006 年出版了《世界的逻辑》之后，所引起的最大争议，正是这个唯物主义假设和作为真原子的对象，也就是说，一旦对象都是真原子，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近乎静态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迟钝地等待着难得一见的事件的降临。

面对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带来的变革，思考数字技术的对象更适宜的资源恰恰是之前被鲍德里亚嘲讽过的西蒙东。相对于鲍德里亚带有南方外省农民式对技术的反讽，将一切技术，尤其是符号技术看成进一步奴役人的工具，西蒙东对科学技术则充满着狂热的憧憬。在 1958 年出版的《技术对象的实存模式》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中，与拉图尔直接将对象看成一种既定的关系下的拟对象不同，西蒙东更愿意将技术对象视为从抽象技术对象变成具体技术对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对象从一个关联环境 (*le milieu associé*) 个体化或具体化为一个对象的过程：

在一个集合中，技术对象的个体化 (*individualisation*) 原则就是在一个关联环境中发生周期性因果律 (*causalié récurrente*) 的原则，所有技术对象都有周期性的因果律，

---

<sup>1</sup> Alain Badiou, *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Seuil, 2006, P233.

它们彼此分离，又彼此连接，从而保持独立于关联环境。<sup>1</sup>

如何来理解西蒙东这段文字？首先，技术对象既不是一开始就给定的，也不是某个主体将其创造出来的，在西蒙东那里，主体也不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概念。相反，技术对象是在关联环境中生成的（devenir），这个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德勒兹的思考。所谓生成，并不是任意的，在西蒙东那里，技术对象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即周期性的因果律，这决定了技术对象不同于自然对象，“它拥有内在的严密性，是一个封闭的因果体系，并周而复始地在其封闭的内部循环，此外，它整合了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将其作为其发生的条件，因此这个部分也参与到其因果关系当中。”<sup>2</sup>我们可以将西蒙东的技术对象概括为如下几点：

1. 技术对象并不是预先给予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西蒙东与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的给予现象学保持了距离，简言之，技术对象就是此时此地世界中发生。

2. 技术对象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西蒙东所谓的“关联环境”，关联环境是技术对象发生的外部环境，并在技术对象发生之后为自然界提供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关联环境来把握和理解技术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关联环境很类似与福柯和鲍德里亚所说的话语构型和符号体系，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关联环境不一定是语义性或符号性，它可能就是技术对象与外部关联环境之间的直接触发（affect）关系。

3. 技术对象的生成关键在于个体化或者具体化。即技术对象必须具有一个内在的周期性循环的因果关系体系，也就是说，个体化代表着技术对象具有了不同自然界其他部分的独特的逻辑体系，这不仅仅是技术对象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观，也具有自身的内在运行因果关系结构，正如西蒙东以三极管为例说明三极管的出现，并不是二极管的延续，而是颠覆了之前“电极之间不可逆性”这个外部前提，“从而可以让电荷穿过真空”<sup>3</sup>。这样，三极管的出现，所基于的内在逻辑恰恰是“颠覆电极之间的不可逆性”，从而让它本身区别于二极管，以及其他半导体元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极管并非是一种隶属于二极管，它是一个独立于关联环境，具有自己独立的循环性因果关系的对象，于是，作为技术对象的三极管个体化了，这就是技术对象的具体化和发生。

相对于拉图尔的莱布尼茨主义，西蒙东的技术对象的发生学更类似于斯宾诺莎。实际上，十分崇拜斯宾诺莎的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Jakob von Uexküll）假定了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区分之前，存在着一个无法用认识和言语来表述的源世界（Umwelt），在这个源世界中，没有任何先定的可以贯穿这个源世界的逻辑，在尤克斯考尔那里，所有对象都是“自在的封闭统一体，它们是从环境（Umgebung）中作为样本的一系列元素和‘标记’选择出来的，而研究者看到一个动物也就是从构成环境的语义中找出其承载者。”<sup>4</sup>尤克斯考

1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Lonrai: Aubier, 2012, P78.

2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Lonrai: Aubier, 2012, P56.

3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Lonrai: Aubier, 2012, P39.

4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Kevin Attell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1.

尔对生物环境中的动物对象的出现，直接影响到西蒙东的思考，在他后来的《人与动物》的讲座中，西蒙东就强调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应强调是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而是人跨过了某道门槛，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心理学因果状态”，从而“人的个体化不再遵循其他所有东西的规律，而是实现了突然的飞跃”<sup>1</sup>，在这个过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个体化，从而可以在源世界或关联环境中，将自己生成为具有独特逻辑的对象，也同时将与之相区分的动物对象化。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蒙东的技术对象实存理论，实际上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思考数字时代的特殊的技术对象。首先，数字对象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的关联环境，这些环境决定了数字对象是以电子技术以及高密度集成电路技术为关联环境的。然而，当我们今天可以使用支付宝、微信、腾讯QQ等数字时代的产品，甚至当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络将我们购买行为进行数据运算，成为一个大数据资料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数字对象已经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关联环境。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认为在今天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确产生了一种不同以往，不同于传统哲学所设定的对象样态：

从现代对象思想角度来看（古典时代的实体观念）数字对象是有问题的：这个对象既不是经验的对象，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直观的对象……数字对象是由给定的数据组成的，但这个给定不能从让-吕克·马里翁的意义上理解，因为他重新将给定作为一个现象学概念。数字对象是由数据、元数据、数据形式、“本体论”以及其他形式组成的，这些东西都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这样形成了一个编制了各种关系以及各种对象的数字环境。<sup>2</sup>

按照西蒙东的设定，独特的数字关联环境的出现，已经为我们在今天讨论数字对象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许煜在他的《数字对象的实存》中列举了从IBM在六十年代创造GML语言开始，为网络信息技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基底，1991年，确立了标准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在这个新兴的标记语言之下，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创新，也是全面的算法和网络协议的更新，这个关联环境，可以让诸多符合其因果关联的对象从中生成出来。于是，当我们谈论某个网站页面，如亚马逊或淘宝的时候，这些对象实际上都是依附于HTML的数字对象。正如许煜所说：“HTML从一种文本表达变成了某种拟软件（pseudo software）形式……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对象之内，形式概念已经成为计算的技术趋势，而如今它亦成为普遍化的标准。形式是抽象的蓝图，而标准则是具体的对象。” [23]P67

我们站在一个面对数字对象的门槛上，西蒙东、拉图尔、斯蒂格勒、哈曼、许煜或许正在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是一个序曲，因为数字对象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从实体（Substance）或真实（Real）角度来认识对象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对象纳入考察。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数字对象甚至不能简单

<sup>1</sup> Gilbert Simondon, *Two Lessons on Animal and Man*,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1, P26.

<sup>2</sup> Yuk Hui,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Foreword by Bernard Stiegl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xi.

从鲍德里亚的虚拟和拟真对象来考察，这里并不具有真实和虚拟的二元论，因为虚拟对象即便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制造的结果，但在内在周期性因果逻辑上并没有触动之前的关联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对象仍然是一个旧范畴。真正的数字对象的问题，我们今天去面对第三方支付，大数据计算，乃至将我们每个人的实存数据化和计算化，需要从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西蒙东的技术对象重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同时从行动者-网络中拟对象和关联环境下的周期性因果关系角度思考数字对象的确立，而这条道路只是刚刚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缝隙，而它的降临势必会为我们带来关于对象理论的革命。

# 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拜物教批判

## ——西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家衍生论争

李乾坤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德发生的国家衍生论争,在西方左翼理论的国家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衍生论争在全新的历史时代接续了由帕舒卡尼斯提出的问题及其方向,即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形式外表,根源于商品形式的结构特征。《福利国家幻想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一文作为国家衍生论争的开端,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指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把握对于理解国家形式的关键意义。国家衍生论争的其他参与者还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化结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形式和财产权问题、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等角度,探讨了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产生的根源。国家衍生论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它只有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域内才能获得更强的批判能力。

**关键词:**国家衍生论争;资本逻辑学派;帕舒卡尼斯问题;福利国家;国家形式

**作者简介:**李乾坤(1987-)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联系方式:lihoughanyu@163.com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在西方左翼学界展开。这其中,尤其以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之间的争论为代表。然而,与此同时在西德学界发生的国家衍生(Staatsableitung)论争,却极少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这一论争发生于1971-1977年之间,提出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并在后期传播到英语学界,深刻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以约翰·郝洛维、索尔·皮西奥多、西蒙·克拉克以及鲍勃·杰索普等人的国家理论研究。国家衍生论争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因为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资本逻辑学派”,恰恰是我们以往借由英美学界的镜像所把握的“国家衍生论争”。<sup>1</sup>

西德的国家衍生论争,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战后的西德,随着经济奇迹的发生,民主宪政政治体制的确立,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国家采取了一种与德国历史上不同的,带着自由、平等和民主特征的形式,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如何面对这一全新的国家形式,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借助于对国家问题的探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一时期也在西德得到了强劲复兴,形成了“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运动。这场论争为何称作“国家衍生”论争呢?国家衍生这一概念中,“衍生”本身也有“推论”之意,“国家衍生”的意思,就是

---

<sup>1</sup> “资本逻辑学派”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1977年由约翰·郝洛维和索尔·皮西奥托发表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资本、危机与国家》一文中。在此文中两位作者最早向英国学界介绍了德国的国家衍生论争,并且首先将德国的这一论争称作了“‘capital-logic’ approach”(“资本逻辑”路径)。在此之后,英语学界开始广泛用“资本逻辑学派”来指称德国的国家衍生论争。其中,拉克劳和鲍勃·杰索普等人的贡献尤其大。直到九十年代,英语学界才逐渐将这一理论运动明确为具有德语学界本来含义的“The State Derivation”



国家形式本身是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的“衍生物”，国家是从价值形式和资本逻辑中“推论”得出的。<sup>1</sup> 在本文中，我们就对国家衍生论争的理论发展脉络和观点进行一个回顾，从而尝试探讨这一论争对于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意义。

## 一、“国家为何没采取它本来的样子？”帕舒卡尼斯问题

国家衍生论争参与者一再回到的一位思想家，就是苏联早期的法学家帕舒卡尼斯（1891-1937）。帕舒卡尼斯在1927年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的经典，然而作者在1937年殒命于政治运动之中，也使得这本书被封存了整整三十年。1967年，《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以德文出版，对当时西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帕舒卡尼斯的思想，从两方面深刻影响、推动了国家衍生论争的深入：一方面，帕舒卡尼斯提出了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形式外表的问题；另一方面，帕舒卡尼斯对国家形式的研究，建立在对商品形式内在逻辑的研究之上。我们具体来看帕舒卡尼斯这两方面的贡献。

### （一）资产阶级国家形式问题

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几乎都提到了帕舒卡尼斯1927年在他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关键问题：“为何阶级统治没有停留在它所是的东西之上，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民在实际上屈服于另一部分人？为何它要采取一种官方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为何同样是这一形式，这一国家强制的机构没有变成统治阶级的私人机构，为何它同后者分离开，并采取了一种非个人的，和社会分离开的公开权力的机构的形式？”<sup>2</sup>

在由恩格斯加以阐述，列宁进行系统化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帕舒卡尼斯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话，那么为何在资产阶级国家之中，其统治形式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反而以民主、平等、自由为价值追求，以法治、宪政统治方式了呢？资产阶级的国家为何表现出这样的形式？其实帕舒卡尼斯所提出的问题，在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就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列宁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解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制是财富和资本无限权力的最好的外壳：“‘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sup>1</sup>但是，列宁并未深入阐释这一机制究竟如何发生作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舒卡尼斯所做的理论工作是对列宁这一判断的深入阐发。

帕舒卡尼斯所提出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生动。

---

Debate”（国家衍生论争）。

<sup>1</sup> 除这一字面意思外，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计划中，已经拟定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但是马克思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对马克思国家问题的探讨，后人只能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文本群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中进行“推论”（Ableitung）。这也是这一概念的内涵。

<sup>2</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一套文明的外壳有史以来表现地尤其清楚，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似乎已经穿上了圣洁的外衣，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被确立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传统的国家理论面对最新的国家形式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当前的这种国家形式。也是在同一历史语境中，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德波认识到，在全新的资本主义政治景象中，资产阶级国家似乎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国家形式的另一种外壳。在前资本主义的“静态经济”中，国家还只是一种阶级压迫工具，然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首先以经济发展作为控制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阶级，“在‘物货通行，放任自流’时期已把自己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的现代国家，最终在经济过程的计划管理中，作为一种中心力量脱颖而出。”<sup>2</sup>德波把握住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全新特征。当独立的经济理论占据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全部国家机构之中时，这种国家的合法性也被重新奠定，似乎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和经济过程一起，具有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所以，究竟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外表，这种将合法性奠基于经济过程之中，采取平等、自由、民主的外在特征的政治外壳，就成为由帕舒卡尼斯揭示，由国家衍生深入阐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种全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机理呢？这种“资本关系”又是什么呢？帕舒卡尼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中作出了解答。

## （二）商品形式与国家形式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基本观点，就是商品形式决定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而法律形式则与国家形式密切相关。的第五章，即“法与国家”。法律问题素来和国家问题绑定在一起。如果说法律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是商品形式的意识形态反映，那么国家也必然和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帕舒卡尼斯在国家理论上的探索，在内在逻辑上与对法律形式的探索完全一致。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帕舒卡尼斯认为分析到此是不够的，而是要继续追问国家“这一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阶级统治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方式”<sup>3</sup>，换句话说，单单解释了国家起源于阶级矛盾，是一种阶级统治工具是不够的，还要追问的是，统治阶级为何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文明的国家形式。

在这里，帕舒卡尼斯初步揭示了国家形式产生背后的机理。资本主义时代所采取的国家形式，之所以区别于既往以自上而下的权力统治的国家，就在于，这种国家中，权力的主体，专断的力量，完全是借由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行为中“自发形成”的。国家的权威源自于市场，源自于每一个市场的主体及其市场行为：“在社会成市场的范畴内，国家机器的实现表现为一种非人格的意志集合、法治等等。在市场上，每一个买家和卖家。如我们所见，都是最卓越的法律主体。”<sup>4</sup>所谓主体，恰恰是市场活动中，交换行为中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与外在的权威天然相对，如果外在的权威干预了市场，那么“交换价值就不再是交换价值，商

<sup>1</sup>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页。

<sup>2</sup>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sup>3</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sup>4</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品也就不再是商品。”<sup>1</sup>

接下来帕舒卡尼斯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机制的根本内涵：“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对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的服从意味着对一种专断力量的服从，因为这与一个商品所有者对另一个的服从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把商品生产结构误以为是适合于每一个社会的永恒的、天然的结构，因此把抽象的国家权力认为是每一个社会的附属物。”<sup>2</sup>帕舒卡尼斯进而做出了如下判断：“宪政国家是一种幻境，但却十分符合资产阶级，因为它取代了消亡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大众眼中遮蔽了资产阶级的霸权。宪政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宗教意识形态更加有用，因为它没有完全反映客观现实，只是建立在这种现实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作为“集体意志”，作为法治，只有待到社会呈现为市场形式时才能实现。”<sup>3</sup>和法律形式一样，国家形式也是由商品形式“推演”出来的，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必然结果，是其外在保障。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深刻地刻画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层次，指出了意识形态超出观念之外的作为治理和规训体系的结构，并认为这一结构恰恰构成了生产条件（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工具。<sup>4</sup>然而在国家问题上，阿尔都塞尽管指出了国家作为“国家机器”的权力体系，却没有像帕舒卡尼斯一样，追问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

大体来看帕舒卡尼斯的论述还很粗略，他尽管提出了问题，并给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方向，却并未深入阐发商品生产和交换和国家形式之间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被三十年后国家衍生论争中的学者们回答了。

## 二、对福利国家幻象的批判：国家衍生论争的开端

1971年由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一同发表的《福利国家幻象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这篇长文，拉开了国家衍生讨论的序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德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福利国家调控措施。面对福利国家最新变化这一现实背景，穆勒和诺伊西斯认为有必要“对资本增殖的过程与资产阶级国家关系的规定性范畴做出澄清。”<sup>5</sup>这篇文章所要研究的是修正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但并不是对当时福利国家的现实经验分析，而是要揭示福利国家的幻象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在物质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中获得基础，以及这一理论如何会伴随着资本的历史而必然走向瓦解的。这篇文章可以提炼出如下几个主题：第一，对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第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福利国家幻象；第三，国家形式与价值形式的关系。这些主题也成为此后整个国家衍生论争中所始终围绕的。

### （一）对修正主义国家理论和福利国家幻象的批判

这篇文章首先细致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理论、国家垄

<sup>1</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sup>2</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sup>3</sup>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sup>4</sup>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6页。

<sup>5</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断资本主义理论和哈贝马斯与奥菲的政治危机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所有这些理论都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幻象之中，从而成为了修正主义理论。将国家视作一个与社会矛盾相对立的，并且在社会中或多或少独立的机构，始终是一切修正主义政策和实践的前提。<sup>1</sup>修正主义想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要通过现存社会基础上的合法的改良途径来实现，通过工人阶级逐渐掌握国家权力的途径——尽管在修正主义那里，工人阶级逐渐被“民主力量”所逐渐替代直至被拒绝使用。在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体现出了修正主义的和革命的观点的全部矛盾。穆勒和诺伊西斯指出，如果将国家视作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的话，那么国家就变成一个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情况被装进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内容的“圣杯”了，<sup>2</sup>这显然是荒谬的。这种荒谬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魏玛共和国，特别是二战后的联邦共和国，国家机器都采取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干预。这些现实背景造就了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工人阶级的对于国家的虚假意识。

穆勒和诺伊西斯指出，以往的理论中，过多将生产形式问题视作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最独特最重要的方面，而将分配领域和分配形式划进国家机器的领域。因此，修正主义国家理论恰恰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分割开来，将国家机器视作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相对立的独立的自动的存在。<sup>3</sup>正因此，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分配似乎就可以不再依赖于对经济规则的变革，而通过逐步加强对议会斗争的介入而得到改善。在这种观点之下，经济规律被排除出介入和变革的范围，政治调节似乎成了灵丹妙药，因此政治理论的领域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这其中，克劳斯·奥菲的政治理论就成为批判的典型对象。他的观点在穆勒和诺伊西斯看来，就是将从不同社群的社会政治形势，也就是从政治调节的角度考察个体收入问题，而放弃了生产方式的角度。<sup>4</sup>所以在修正主义对福利国家的认识之中，生产和分配被割裂开来，国家表现为一个与生产关系相对立的自主化的主体。<sup>5</sup>

对生产和分配的分离，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而忽视了经济学的分析。“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各类科学的理论研究分工之中，就已经蕴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的个别片段的绝对化。”<sup>6</sup>我们看到，在这里穆勒和诺伊西斯揭示了哈贝马斯等人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正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不懂也感兴趣，在理论上也就走向了对规范伦理，交往理性的诉求之上。这些理论诉求的思想前提，就是对生产和分配的割裂以及对一个独立的良善的国家机器和政治伦理的推崇。对此穆勒和诺伊西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的法律和组织形式，无外乎就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和增值过程的二重性的必要表达。而在修正主义者看来，这些形式就完全是纯粹偶然的附属物了。”<sup>7</sup>这里，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判断出场了，修正主义

---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7.

<sup>1</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7.

<sup>2</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8.

<sup>3</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13.

<sup>4</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14.

<sup>5</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15.

<sup>6</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16-17.

<sup>7</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的政治理论所推崇的政治伦理、法律和组织形式，并非与生产过程无关的外在的存在，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表达”本身！和商品内在矛盾要求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一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和需要，也必然需要二重化出法律、国家等一系列的再生产机构作为外在保障。仅仅将国家视作分配的主宰，脱离了生产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国家形式的拜物教。

在理论上对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条件的割裂在政治上的结果，就是多元民主的主张。正是多元民主的新情况之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才得以提出。哈贝马斯和奥菲面对国家权力分配活动的内容形式的变化，不是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出发，而是从政治意愿塑造的过程出发。<sup>1</sup>在他们那里，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资本和雇佣劳动本身内在于资本增值过程中的矛盾的人格化表现，而是被替换为一个个“个人”和一个个不同的社群，从而也为经济民主、同意等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根基。但是，这样的政治理论最终走向的还是对精英群体的倚重，因为一个全面干预操控社会生活的国家机构必然需要一批适合于领导资本的工业体系和官僚体系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勒和诺伊西斯指出，威权的福利国家和对被供给的“市民”的操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sup>2</sup>不断增加的福利只有以不断增长的操控为基础。改良主义因此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sup>3</sup>

那么，如何思考福利国家这一新情况之中的国家形式，思考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联系呢？

##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穆勒和诺伊西斯在《福利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中进一步从收入分配和资本循环角度入手，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如何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的。

在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之中，国家似乎成为了分配产品、干预主导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工人阶级和大众则作为被提供者成为了客体。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呢？对福利国家形式的探讨将从真实的过程出发，也就是从生产环节的有限形式出发。因此，如果说前一目探讨是穆勒和诺伊西斯对福利国家的幻象的认识的话，这一目将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资矛盾如何产生这种幻象的。

穆勒和诺伊西斯回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和货币以及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探讨之中，回到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去论证收入分配领域本身是生产领域不可分割的环节。他们首先指出，即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分配与再分配也完全是由经济本身决定的，而非由政治的规律性决定的。分配实际上只是再生产的一般循环过程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并不具有独立的、支配性的政治性特征。<sup>4</sup>甚至，政治的干预只会带来反作用，这就是增长与分配之间的目的冲突。所谓目的冲突，即资本回报率的底限是工人实际工资的上限，如果其底限无法满足这一上限，社会革命就会到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客观的基本规律。所以，资产阶级理

---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 18.

<sup>1</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27.

<sup>2</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28.

<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在他的《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一书中，首先分析的对象，恰恰就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国家衍生所面对的福利国家。所以，增长的福利与增长的操控相辅相成，这一观点穆勒和诺伊西斯在福柯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并准确提出了。

<sup>4</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33.

论家，要么在理论上完全撤回到国家的层面并将分配问题交给政治的法哲学去讨论，要么就只有小心周到地进行调控措施，并且不能让雇佣工人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显然第二点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商品的生产购买商品的一部分货币就是工人的工资，生产商品的工人同时也是消费商品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力是维系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流通中，工人的工资似乎只是满足于需要的，购买商品的收入，而其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并处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联系之中，在其中包含了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的一面，却被忽视了；进一步讲，资本家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预付资本中，支付劳动力商品的那部分（可变资本），也就是工资，这种二重性被忽视了。因此生产和分配的统一性就被割裂了。正因此穆勒和诺伊西斯指出，这就是分配可能性的幻觉产生的根源。

工资一方面作为工人私人消费的收入，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联系中的范畴，因此具有一种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昭示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在工资范畴之中就已经包含了，因此暗含在分配之中；如果它讨论个别收入的范畴（工资、利润、地租），那么在这一讨论之前工资和利润的问题就必须面对了。”<sup>1</sup>因此，社会产品的再分配实际上是资本积累和流通过程的必然过程，是维系再生产过程的必然需要。当工资的标准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无法被保障的时候，国家就要介入再分配来保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国家所进行的所谓的干预其实只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衍生而已，福利国家本身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干预，而只是资本生产过程本身的提线木偶而已。说到底，“分配的规律，同时也是准备积累和流通的规律”<sup>2</sup>。这就是福利国家幻象背后的真实逻辑，而这一逻辑，正是从价值形式之中推导出来的。

### （三）国家形式与价值形式

价值形式、货币，本身是一种形式外表和幻象，背后遮蔽的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分裂与矛盾；而福利国家的形式不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衍生出的维系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主体仍然是那个绝对的主体即资本而国家只是资本的手段。在这里，穆勒和诺伊西斯也以福利国家为分析对象，某种意义上直接回答了帕舒卡尼斯的问题。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采取了一套与直接的阶级压迫相反的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形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新的历史情况下需要采取这样一套方式来维系其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一套外表也绝非永恒的，一旦资本主义生产遭遇不同的情况，它就将很快带上另一种面孔。而修正主义理论恰恰就是脱离了资本增殖的生产过程，将这一切视作永恒。对此穆勒和诺伊西斯指出：“修正主义理论的共同点是：他们脱离了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的生产过程而将国家的不同功能，特别是福利国家政策，当做国家的独特本质。”<sup>3</sup>在修正主义的国家幻象之中，将国家当做了—一个“主体”，但是，这种主体性是虚假的，真正的主体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指出的资本本身。资本，在这一语境内成为国家形式的自主化、特殊化的必要前提，也正是因此，在国家形式上，展现出了和商品拜物教一样的内在逻辑。

穆勒和诺伊西斯进一步分析了国家形式的拜物教特征的剖析，建立在价值形式分析之上。他们将“国家的发展作为‘市民社会之外的特殊存在’”这一观点，回溯到了价值形式的辩

<sup>1</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36.

<sup>2</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45.

<sup>3</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证发展之中。在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二重性之中包含的矛盾，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商品才能够表现出来；商品的价值形式在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之中无法表达出来，而需要在一个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表达，因此货币就出现了；货币现在仅仅表现为独立的物，在这之上附着了价值的特殊的、历史的社会特征作为自然的或者人们通过一致的统一所定义的特征。价值形式之上的商品拜物教，同样在国家形式上也可以发现。在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国家要么就是始终存在的，人从本性出发就需要建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对于人（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或者国家就是通过契约被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sup>1</sup>与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就在于指出国家的形式性特征，拜物教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正因此，穆勒和诺伊西斯借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判断，“资产阶级国家”并非“真正的总资本家”，而是“理想的”、“虚构的总资本家”。<sup>2</sup>将国家视作“理想的总资本家”，说的就是国家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不可分，以及与价值形式的同构性。

穆勒和诺伊西斯的《福利国家幻象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一文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批判了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的“幻象”性特征。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将福利国家幻象的产生根源还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这开启了对国家形式问题的讨论起点和基本范式。在此之后，围绕国家形式的产生问题，一系列不同观点涌现出来。

### 三、国家衍生论争的其他代表性观点

国家衍生论争在西德前后延续七八年之久，有大量观点涌现出来，这里我们围绕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个概述。

#### （一）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化与国家的平等表象

针对穆勒和诺伊西斯没有对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sup>3</sup>的内在矛盾如何推导出国家形式进行具体阐述的不足，柏林自由大学的理论研究小组“阶级分析”项目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和国家的二重化。这具体表现为：“特殊的个体聚集起来的社会、普遍性，获得了在建构起社会的私人的总体之外的一种独立存在。这就是社会向社会与国家的二重化。所有共同的利益都被从社会剥离出来，社会成员独立性也被剥夺，作为与社会成员相对立的普遍的，由国家代表和追寻的利益。”<sup>4</sup>这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论述的市民社会

---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46.

<sup>1</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57.

<sup>2</sup> 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 Sonderband 1, 1971, S.57.“理想的总资本家”出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3页。

<sup>3</sup> 在本章语境中，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翻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而非“市民社会”更为妥当，因为这更接近于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语境内的使用，而非青年时期的使用。中译往往将青年马克思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使用译作“市民社会”，因为这更接近于黑格尔的法哲学的语境。

<sup>4</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87.

向国家的二重化，以及由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强调出来的商品的二重化概念再次出场。将价值形式辩证法中的二重化问题运用于对国家的分析之上，在穆勒和诺伊西斯那里就已经成为一个方法论的起点，这一方法论起点，在国家衍生论争的不同观点上都有所体现。<sup>1</sup>但是，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在这一起点上对国家问题的推论方式，在论争的参与者中则各有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向国家的二重化，其根源就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矛盾之中。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的社会性发展决定了共同的任务与利益，这种社会性特征是商品的私人所有者所无法独自完成的。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两个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就被勾画出来：生产资本的一般生产条件的功能，和通过运用经济之外的力量来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功能。<sup>2</sup>这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是为满足于私利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之中，本身有要求普遍的利益来作为这种私利的外在保障，国家也就因此产生。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究竟是如何展现的，换句话说，这里所指的“社会”概念究竟是什么？阶级分析项目小组并没有将“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将其是做一个固定的国家区域内的人口集合特殊的社会结构化。这种社会的结构化又是什么呢？

乍一看来纯粹由个别的私人的聚集组成的集合体，其内在联系的建立，就在于通过商品的相互交换而建立起的自我劳动结果的相互的实体化联系。对“个体商品占有者”和“个体商品生产者”概念的使用本身，在阶级分析项目看来就已经包含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推论，也就是说，社会二重化和国家特殊化的必要性的推论，建立在简单商品循环的系统层面之上：阶级分析项目进一步论述，只有在简单商品循环的系统范畴的条件下，个体商品生产者和商品占有者才同时发生；作为对劳动对象化手段和工具的私有者，以及作为对自己劳动结果，即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在 W-G-W 的循环过程中才能占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其他人劳动的结果。<sup>3</sup>于是，社会成员的利己性之上，因为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质同时生发出对共同利益的诉求。这种共同利益，就是商品之间等价交换关系之上建构起来的。等价交换原则所构成的私人间的共同利益，就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普遍的框架性条件”<sup>4</sup>，国家的产生，就是为提供并保障这一条件。

从市民社会内在矛盾中推导出国家存在的必然性，这种思路我们其实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探讨，以及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对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即公民和市民的二分中，都可以看到。阶级分析项目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之处，就是将其回溯到具体的商品形式、简单商品流通，特别是等价原则的条件下，更进一步阐发了“社会”向“国家”的“推论”。

但是，这种国家衍生方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就指出，它将国家视作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框架条件，这种保障等价原则的国家是服务于公益的，然而它却没有

<sup>1</sup> 如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指出，“正如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样，也就是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产生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一样，对国家的分析也从这里开始。”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94.

<sup>2</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87.

<sup>3</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88.

<sup>4</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89



解释清楚为何劳动力的所有者，无产阶级在其利益被损害的条件下，却仍接受这种国家形式的原因。<sup>1</sup>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基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来源的三位一体公式之上的“神秘化”过程<sup>2</sup>，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象的形成过程。通过劳动力的价值转换为劳动的工资，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利润转换为收益和利息，剩余利润转换为地租，通过这些神秘化过程，私人所有者在这一表象上建立起了平等、自由和独立的现实表象的领域，在这一表象之中，就隐藏着资产阶级国家展开的可能性。<sup>3</sup>阶级结构是财产和占有以及雇佣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结果；但是在社会化的形式之中，在商品交换、货币媒介和工资形式等等的形式之中被神秘化了，所有这些不平等似乎都具有了平等的表象。这就是劳动力商品所有者也就是工人阶级尽管遭受剥削压迫却无法认清其本质的原因。他们都被戴上了“公民”的面具，似乎在实质上也都是平等的了。在马克思“神秘化”分析基础上，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假设了由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建构的生产方式，和作为市民活动领域的社会塑形（Formation）之间的关系。二者一个是深层结构，一个是表象。它不仅建构起无产阶级虚假的意识，也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就是虚假的作为表象的公共利益的产物<sup>4</sup>。

## （二）国家形式的法律形式前提与财产权问题

如果将交换形式和法律形式以及国家形式联系在一起来看，那么就会认识到，法律形式以及国家形式就是保障财产的占有，以及商品交换原则的外在保障。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即国家只是市场的守夜人。但是这种国家观的问题在于，它假设了一个先于商品交换的国家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同样制造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政治和经济的二分。然而国家形式的变化是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的。在布兰克、于尔根斯和卡斯滕迪克在 1974 年发表的《论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和功能的最新马克思主义讨论》（以下简称最新讨论）一文中，布兰克等人申明，他们的主要理论任务，首先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权力和法的问题，特别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的反思，其次探讨对国家权力、法和社会的功能性联系的展开，如何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而无法进行。<sup>5</sup>正因此，布兰克等人对国家衍生论争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国家形式的法律形式前提进行了追问，所以他们对帕舒卡尼斯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引用和发展。

他们首先强调了法律形式的重要性。而在商品流通中，人需要一定的基本外在规定性，契约和意识形式来保障流通的进行。因此，“关键的东西是法律形式。这是一个必要形式，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社会联系具体是作为物化的（‘客观的’）强制而实现的，其实现却需要个体的（‘主体的’）行为。”<sup>6</sup>而为了使人承认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的形式，就

<sup>1</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90.

<sup>2</sup> 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强调，这种形式的平等和内容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简单循环之中就已经奠定了。这就是 G-PM 和 W'(PM) -G'环节是形式和内容上的平等，而 G-A 环节，也就是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的环节，则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在内容上的不平等。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98-99.

<sup>3</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107.

<sup>4</sup> Sybille von Flatow, Freerk Huisken (1973): 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Nr. 7, 1973, S.116-120.

<sup>5</sup> 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Hans Kastendiek: Zur neueren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die Analyse von Form und Funk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14/15, 1974, S.52.

<sup>6</sup> 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Hans Kastendiek: Zur neueren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die Analyse von

需要在货币之外设立其他一些形式。这就是法律形式产生的根源。简单讲，法律形式是保障商品流通的基本前提和外在规定，是交换活动的外在保障。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恰恰在于以一种外在形式保障了这种平等交换原则得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对私有财产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在此之上作为基本权利的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形式才表现出来。<sup>1</sup>而在资产阶级国家理论中的主体，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规定性，而是“私人所有者”，也就是法律主体。布兰克等人指出，国家的“特殊化”，即国家形式具有了一种独立性外在性的特征，首先是在法律意义上奠定的。<sup>2</sup>但是，到这里，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这就是财产权问题。

法律形式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财产权问题。将财产权问题引入国家衍生，是布兰克等人在国家衍生论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他们的基本判断是：国家即为财产提供法律保障的机构。国家形式的逻辑前提是法律形式，法律形式是商品交换活动的外在保障和强制力量。然而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用以交换的商品必须有人“占有”（Besitz），被占有的商品，就是私有财产，而保障这一占有的法律形式，即财产权的出现。即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也是“拥有”他的财产的，这就是他的劳动能力。无产阶级区别于奴隶的关键，就在于他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的劳动力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他人。正因此，财产权问题以及在此之上的法律形式问题，就是国家形式问题的逻辑前提。财产权是近代以来法哲学领域中极为关键的问题，霍布斯、洛克直到黑格尔，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马克思第一个将财产和占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了财产和占有的历史性特征。

布兰克等人指出，更为重要的是，财产权始终还是排除权（Ausschlussrecht）。就是说，财产权在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的同时，还需要权力将那些并不具有特定私有财产的资格的人排除出去。在此之上，所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获得了法律形式的维护。财产权和排除权，都是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律形式。这样就可以说，不仅财产所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自财产，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就是国家，同样产生自财产之上。<sup>3</sup>

### （三）在积累理论之上的国家衍生

相对于布兰克等人对法律形式和财产权的强调，国家衍生论争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艾尔玛·阿尔特法特，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理论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角度分析国家形式产生的根源。在《论国家干预主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阿尔特法特认为，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分析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有着极端重要的价值，如果资本增殖不能够得到保障的话，财产和占有权就不能够在政治上被保障，从而失去了经济上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就首先不是限制经济秩序的基础，而是更多干预经济的过程。这里显示出的是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在国家对其存在的形式保障和利润下降趋势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来临，国家往往会从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干预者的角色。从维护秩序，到干预过程。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对国

---

Form und Funk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14/15, 1974, S.54.

<sup>1</sup> 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Hans Kastendiek: Zur neueren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die Analyse von Form und Funk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14/15, 1974, S.71.

<sup>2</sup> Bernhard Blanke, Ulrich Jürgens, Hans Kastendiek: Zur neueren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die Analyse von Form und Funktion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PROKLA* 14/15, 1974, S.62.

<sup>3</sup> Elmar Altvater and Jürgen Hoffman, The West German State Derivation Deb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s a Problem of Marxist State Theory, in: *Social Text* 8/2, 1990.

家保障是有限制的，政治的努力是有规则的；另一方面，政治体系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从而有能力从政治上干预使资本。

阿尔特法特的理论任务，就是要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结构和过程出发来研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以政治的方式表现的阶级关系，以及在其中国家功能是如何被规定的<sup>1</sup>。阿尔特法特首先从“资本一般”、总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关系出发，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所指的都是总资本的运动规律，而非个别资本的运动规律；但是个别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总资本的存在条件：一般剥削条件、同等剩余价值率和平均利润率。个别资本间的竞争，因此就是资本内在规律展开的形式，它不是单纯的同时与内容相对的工具，而是“现实的概念上被把握的作为总资本的资本形成的必然环节。”<sup>2</sup>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需要之中，这是阿尔特法特的基本观点。宽泛地讲，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化”是国家衍生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在阿尔特法特这里具体表述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之中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表现了资本的平均利益的形式。国家因此既非单纯的政治工具，也非被资本掌控的机构，而只是在竞争之外的贯彻资本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以及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之中的本质环节。<sup>3</sup>

但是，对国家这一特殊存在形式如何表现了资本的利益的，则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一环节才是阿尔特法特观点的独特之处。通过对总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关系的探讨，为探讨资本主义的重要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提供了逻辑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危机就存在于积累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之中。国家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因为再生产的物质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却不能在资本增殖的个体流通条件下被生产。阿尔特法特指出：只有在个体资本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变成不获利的时候，国家的接管和调节才会出现。<sup>4</sup>在平均利润下降率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为重要的规律之中，国家以一种历史实体的维度补充了个体资本，“国家特殊化因此奠定于资本关系的‘本性’之中，但是真正的国家(wirklicher Staat)的产生却是一片土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sup>5</sup>这一历史维度具体表现在干预在物质上必要但是对于私人生产是产生利润的再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国家，为普遍的物质生产条件提供可能，如交通、通讯、医疗保障、教育等等。因此，国家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的非盈利的因素的管理，来为个别资本提供可能，来减缓私人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甚至在危机之中还会采取措施进行补贴甚至接管。<sup>6</sup>阿尔特法特举例说，德国铁路网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展现，在十九世纪时，修建铁路对于个别资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行业，而它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由国家接管承受损失的行业。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需要。

## 结语：打破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镜像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西德的这场论争，较之当时英法学界更为侧重阶级视角和结构主义视

<sup>1</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5.

<sup>2</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6.

<sup>3</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7.

<sup>4</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11.

<sup>5</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17.

<sup>6</sup> Elmar Altvater, 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Staatsinterventionismus, in: *PROKLA* 3/1972, Berlin, S.22.

角审视国家问题，具有着鲜明的特色。阿尔特法特和霍夫曼在回顾总结国家衍生论争时指出：“在这一论争内部的不同路径都考察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形式与内容的阐述，在理论上通过具体的、明确的推演步骤来重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因而从‘资本的一般概念的发展’（也就是价值形式问题）中推导得出；凭借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具体援引，国家衍生论争都将国家形式的问题置于核心位置。”<sup>1</sup>首先，这场论争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将理论关注点聚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特征之上；其次，这场论争中关于国家形式问题的研究，完全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域之内；再次，参与者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国家形式”的总问题式之中，可以说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我们看到，虽然较之于英法的国家理论研究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理论基本框架上，国家衍生论争其实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它独特的意义在哪里呢？

除了在理论上独树一帜以外，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回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如何面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是，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残酷压迫剥削本国和他国人民的，腐朽的和必然灭亡的。然而奠基于商品交换的基本结构，即形式平等之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却带着平等、自由和民主这些形式外壳愈发强大，这种外壳已经成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以一种文明的形象傲居于世界。这也成为当今自由主义政治学最大的合法性根源。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恰恰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国家形式拜物教背后的真实产生逻辑。这样的国家形式，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逻辑，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

然而，国家衍生论争这一问题式，只有进一步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够获得更强的说服力，而这恰恰是论争参与者们欠缺的视角。修正主义国家理论，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所立足的现实基础，不外乎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平等、自由和民主这些上层建筑方才可能，而这些经济基础，不外乎建立在对发达生产力和组织方式的占有之上，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剥削所完成的。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这个镜像，背后的真实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蚀的世界。

---

<sup>1</sup> Elmar Altvater and Jürgen Hoffman, The West German State Derivation Deb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s a Problem of Marxist State Theory, in: *Social Text* 8/2, 1990.

# 从当代资本主义四种对抗到新无产阶级

## ——论齐泽克革命主体论

林哲元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齐泽克的革命主体是拉康式否定性空无主体。从当代资本主义存在无法排除的四种对抗: 生态危机、知识产权私有、新科技伦理冲击和由新形式隔离、墙和贫民窟居民所组成的“排除者”。“排除者”是“无分者之分”; 是“个别的普遍”; 决定着前三种对抗的性质。新无产阶级一方面指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象征秩序都被剥夺的“无实体的主体”; 另一方面指以贫民窟居民为代表的“排除者”。贫民窟居民无所可失、不受国家控管、人数众多且被迫聚集, 具有革命的潜能。新的阶级斗争发生在排除者与象征阶级之间。齐泽克革命主体观富有新意, 也存在自洽困难的理论缺环。

**关键词:** 排除者、贫民窟、象征阶级

齐泽克的主体观继承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拉康认为主体并非实体, 而是否定性的空无。齐泽克的革命主体观则是将否定性空无主体观运用到激进政治领域, 从当代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对抗出发, 提出“排除者”即当代资本主义的“否定性空无”, 即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新无产阶级。

###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四种对抗

2007年齐泽克提出资本主义四种对抗 (antagonism), 指资本主义自身结构中无法排除和克服的四种矛盾, 而这四种形式的对抗具有阻止资本主义无限再生产的能力, 下面分述之。

第一种对抗——生态危机。1991年《斜目而视》提出生态危机是“真实界的应答”, 不应试图在其背后寻求更深的意义或信息。<sup>1</sup> 2007年以后, 齐泽克更多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角度思考生态危机问题。资本主义似乎能将生态灾难或危机转化为开拓新市场新的契机, 然而这种资本主义无限的适应能力依赖着一个根本预设前提: 对市场对象化或物化机制的信任, 也就是对“看不见的手”的信赖。然而, 在生态危机面前, 人们意识到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有毁灭的可能, 人们不能再放任历史的“理性狡计”(即市场) 决定一切。

---

<sup>1</sup> Žižek, Slavoj.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pp. 34-36.

2008年《捍卫失败的事业》中，齐泽克进一步深化生态危机问题的观点。首先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态学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sup>1</sup>，形成一种“忧虑生态学”（ecology of fear），强调人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应该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等。然而，这类观点往往形成对变革的拒绝，不信任任何彻底的改变。这样“畏惧生态学”就将生态学转变为一种反动主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取代宗教成为人民的新鸦片。简言之，这是“后政治”时代对大规模集体行动不信任的反映<sup>2</sup>。

齐泽克反对这种“畏惧生态学”，提出“恐怖的”（terror）生态学，其核心思想是接受我们的存在没有坚实的根基，“自然并不存在”，就像拉康主张“大他者不存在”。人类幻想的和谐自然已经是“第二自然”。对真正的自然来说，狂暴灾难才是第一性。人们想要拯救的自然已经太晚了，因为（原初）自然早已不复存在。<sup>3</sup>齐泽克主张唯有这种面死而生的态度才能扭转生态毁灭的、灾难性的命运。

第二种对抗是“知识财产”这种不恰当的私有财产形式。数字时代因特网等技术的发展，催生了颠覆资本主义的爆炸性能量。例如，对于微软公司这样垄断性的公司，正确的做法并非以反垄断的名义分割它，而是将其整体社会化。齐泽克认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制度在数字化工业时代已经过时<sup>4</sup>。

齐泽克受到内格里和哈特“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work）论述影响，同意当今数字时代的“利润的租金化”趋势。盖茨利用“一般智力”的私有化从中获取租金成为世界首富，成功地通过私有化控制了那个无数的智力工人参与的“一般智力”<sup>5</sup>。马克思没有想到“一般智力”自身私有化的可能性。“知识财产”的核心矛盾昭然若揭。

第三种对抗为新技术科学发展的伦理冲击，其中又以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影响最大。随着生物遗传学的发展，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可以通过基因控制手段干预，动摇了作为人的存在。例如，本来需要长期艰苦磨练而形成的某种品格，通过新的技术科学生物干预手段可以直接获得，这个漫长的过程消失了，品格的意义也被削弱。由小见大，与人类存在相关的整个意义宇宙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目前，生物遗传学已经可以对基因进行修补或改造，科学家们正在迈向创造生命的新形式——进入“生命2.0”的阶段。如果“生命2.0”被创造出来，那么“自然”出生成长的“生命1.0”也难保有自然的本质。齐泽克说：“这就是所谓‘自然的终结’的意义：合成生命不仅是自然生命的补充，并且是将自然生命转化为一个（混乱的、不完美的）合成生命的种。”

1

第四种对抗是新形式的隔离、新的墙和贫民窟。齐泽克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新形式的

<sup>1</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39.

<sup>2</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p. 439-440.

<sup>3</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42.

<sup>4</sup> Žižek, S. "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13.3-4 (2001): 197.

<sup>5</sup> 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p. 144-145.

隔离”和“新的墙”，仅仅指出新的墙出现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环绕着欧盟的边界、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国界线”<sup>2</sup>。在《活在末世》中，提及在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迪拜等金碧辉煌的城市外围，“看不见的”移民工人从事着肮脏的工作，这正是“新形式隔离”的典型<sup>3</sup>。

除了上述两种因不同原因产生的有形的墙或无形的隔离，齐泽克还提到另一对象——贫民窟（slum）。按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定义，贫民窟指“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人口聚居区”<sup>4</sup>。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到2030年将会达到20亿人。现存的几个巨型贫民窟都在第三世界的大城市，例如印度的孟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印尼的雅加达等。

近几年，贫民窟问题在左翼激进政治当中的地位和对革命的潜能成为齐泽克关心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他曾经提到贫民窟是城市的征兆<sup>5</sup>。随后于《贫民窟的……自由世界》首次直接讨论贫民窟问题，将贫民窟的兴起称为“当代关键性地缘政治事件”<sup>6</sup>。贫民窟居民的组成包括移住工人、失业者和离开土地的农民。贫民窟居民各种不同的方式卷入全球经济当中。例如，贫民窟居民人数急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欧美政府补贴的第一世界廉价粮食作物进口到第三世界，摧毁了本地传统农业生产体系，迫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贫民窟的一员。贫民窟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发展’、‘现代化’和‘世界市场’等口号背后真正的‘症候’”，是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sup>7</sup>。齐泽克结合“新形式隔离”、“新墙”及“贫民窟”三部分组成第四种对抗，提出与“纳入者”（the Included）相对立的“排除者”（the Excluded）。

## 二、“排除者”的革命潜能

齐泽克对“排除者”的思考始于1999年《棘手的主体》中关于朗西埃“无分者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的讨论。朗西埃提出：“政治存在于，社会的部分（parts）与组成分子（parties）的计算被那些无分者之分的算入所扰乱的地方。”<sup>8</sup>齐泽克吸收此观点进一步提出，“无分者之分”挑战了整个治理秩序。真正的“政治”包含“普遍”和“特殊”的短路——“个别的普遍”（singulier universel）悖论性存在。亦即，一个“个别”呈现为“普遍”的代替，而动摇了社会机体的“固有”功能<sup>9</sup>。“无分者之分”所体现的“个别的普遍”

---

<sup>1</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40.

<sup>2</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24.

<sup>3</sup>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 x.

<sup>4</sup> (美) 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

<sup>5</sup> (斯)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 页。

<sup>6</sup> Žižek, S. "The Free World ... of Slums". Dec. 30. 2009. <<http://www.inthesetimes.com/article/1090/>>.

<sup>7</sup> Žižek, S. "The Free World ... of Slums". Dec. 30. 2009. <<http://www.inthesetimes.com/article/1090/>>.

<sup>8</sup> (法) 洪席耶:《歧义》，刘纪蕙等译，台北：麦田出版 2011 年版，第 200 页

<sup>9</sup> Žižek, Slavoj. *The ticklish subject :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9. p.

才是真正的普遍性。当今全球化所高举的“普世人权”恰恰是排除“无分者之分”的“后政治”意识形态。

对“排除者”的认同不能沦为“纳入者”对“排除者”的同情。齐泽克坚信唯有“个别的普遍”才是真正的“普遍性”——普遍性奠基在“无分者之分”的基础之上。然而对“个别的普遍”或“无分者之分”的认同不应与自由主义者对弱势的同情混淆。齐泽克以美国作家梭罗为例。1846年夏天，梭罗为反对政府为美墨战争向人民征税，因拒绝缴税入狱，爱默生到监狱探望他，问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把自己搞到这里面？”梭罗回答：“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还在外面？”当我们面对“纳入者”同情地问“为什么这些人会在外面，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正确的回答是：“为什么那些人会在里面，被纳入公共空间之内？”<sup>1</sup>这样的回答所要传达的意思是“排除者”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纳入者”以及区分体系。现存的社会秩序之所以看起来完满和谐，正是因为排除了“无分者之分”。从这个角度说，目标不是将更多的“排除者”纳入到体系成为“纳入者”，而是彻底改造整个坐标系。

贫民窟居民便是“排除者”的典型代表，齐泽克称其为当代的“个别的普遍”。按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报告，全世界范围的贫民窟人口目前正以每年2500万人的陡升速度增长2。事实上，贫民窟居民的实际人数可能更多。一方面，许多国家为了掩饰问题虚报贫民人数；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根本无法掌握贫民窟确切的人口数。据此，齐泽克将贫民窟定义为国家无法控制的地区。他提出：

虽然当代社会往往被视为完全控制的社会，但贫民窟是在国土疆域内，国家（至少部分地）撤出其控制权的地方，是在官方地图作为白点和空白的国家领土。<sup>3</sup>

“空白”让人联想到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空无”。事实上“排除者”必然存在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拉康精神分析学中关于象征秩序不可能完满，即必然存在的裂缝。真实界代表“空无”，但不是消极的“没有”，而是具有否定性能量的创伤之地。所以齐泽克用“对象a”比喻“无分者之分”。<sup>4</sup>从与真实界的创伤性遭遇，到没有大他者保证的真实行动，再到“排除者”革命潜能的逆袭。这层层递进与传统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不同，是以否定性的“空无”为理论支点。

然而齐泽克也意识到“实存贫民窟”是由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组合而成——从深富魅力的领袖带领下的原教旨主义团体、犯罪团伙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组织都有。五旬节基督教派等各种邪教或原教旨主义成为贫民窟居民的思想和情感寄托，黑市经济和组织化的暴力盛行。尽管如此，齐泽克仍然从中看出贫民窟具有爆发革命的潜能，将之称为“事件性场所”（evental sites）<sup>5</sup>。在当今全球政治的谱系中，委内瑞拉已故领导人查韦斯被齐泽克奉为

188.

<sup>1</sup>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 124.

<sup>2</sup> (美) 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4 页。

<sup>3</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26.

<sup>4</sup> Žižek, Slavoj. *Iraq : the borrowed kettl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4. p. 144.

<sup>5</sup> Žižek, S. "Leninism Today: Zionism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Feb. 23 2010. <http://www.lacan.com/zizbarabajal.html>.



左翼介入贫民窟的典范。不同于其他人仅考虑“纳入者”的标准民主形式，查韦斯是真正面对“排除者”的左翼政治领袖。“他把被排除的贫民窟居民当作政治运动的基础，据此重建政治空间和政治组织形式，为排除者创造有利条件”。<sup>1</sup>从重构政治空间和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说，查韦斯的政治实践达到重写象征秩序的“行动”高度。

基于“排除者”革命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四种对抗不能等同视之，需区分为不平衡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包括环境问题、知识财产问题、新科学技术冲击的前三种对抗；第二部分是关于“排除者”问题的第四种对抗。两者有质的区别，后者是关键。齐泽克称第四种对抗是“零级对抗”（the zero-level antagonism），决定全体斗争的地形。<sup>2</sup>如果缺少了第四种斗争，另外三种斗争也会顿失批判的锋芒——生态危机被包装成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财产被简化为繁琐的法律问题，生物遗传学沦为纯粹的伦理学问题。<sup>3</sup>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一种反动的观点：一个人真诚地投入前三种对抗，但不触及第四种对抗，甚至将前三种对抗的原因推给“排除者”，发出如贫民窟居民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的右翼保守言论。

第一部分的三种对抗属于人类生存问题，而第二部分的“排除者”与“纳入者”的对抗属于正义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第一部分是剥夺主体存在的实体性内容，而第二部分则是被社会-经济空间排斥出去的特定主体的确切事实。并且，第一部分还涉及“共有”的概念，第二部分和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有关。

### 三、无产阶级再界定

齐泽克“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较大差异。1991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中，齐泽克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无实体的主体”，“没有任何肯定性内容和纯粹可能性的空无”，并且从拉康精神分析学角度将“划杠的主体”与“对象a”的关系来对比无产阶级及其与劳动产品的关系<sup>4</sup>。齐泽克无产阶级概念的核心可以对应到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空无”。

1999年《棘手的主体》中论及巴迪欧的“事件”时，齐泽克切割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概念。他认为“正确性”（veracity）和“真理”（truth）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真理”。而“真理”必须是投入斗争的主体才能从历史中识别出阶级斗争的踪迹，而这种“偏袒”（partiality）是真理的形成的条件。由此得出，工人阶级列位知识层次，无产阶级属于真理层次。齐泽克指出：

虽然马克思本人通常把“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做同义词来使用，但是我们在他

<sup>1</sup> 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102.

<sup>2</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28.

<sup>3</sup> 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98.

<sup>4</sup> Žižek, Slavoj.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57.

的著作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趋势，就是把“工人阶级”当做属于知识领域的描述性词汇（是“中立”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社会阶层）；“无产阶级”则是真理的操作者，亦即革命斗争的投入行为者。<sup>1</sup>

虽然齐泽克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基本区分仍有增补，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例如2002年的《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中将工人阶级界定为单纯的社会存在范畴，无产阶级则是真理范畴，是真正的革命主体<sup>2</sup>。2007年的《列宁重装上阵》中将工人阶级界定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预存在的社会群体”（preexisting social group），而无产阶级是一个主体位置<sup>3</sup>。只有注意到齐泽克关于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这个区分，才能够掌握他提出的新无产阶级概念。

在非物质生产日趋重要的今天，齐泽克提出不应抛弃无产阶级概念和立场，应将无产阶级的概念激进化到超出马克思想象的存在层次。<sup>4</sup>齐泽克从两个角度重新界定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第一个角度是从四种对抗的前三种（生态、知识财产、生物遗传学）出发。这三种对抗迫使所有人都面临失去一切的威胁，也就是让人变成失去一切实质内容的抽象主体：生态危机导致人们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不再适合人居，不合理的知识财产私有制度将破坏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传承，生物遗传学破坏人类的内在自然，使之成为可以人为操控的对象。这三种威胁导致人都成为“无产阶级”，成为“无实体的主体”<sup>5</sup>。从外部和内部自然及象征界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排除者”，我们的存在根基都逐渐被剥夺。这种“无产阶级”不再是特定的社会主体，而是不同主体的爆发性组合。这一划分与齐泽克先前一再强调的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非常不同。

第二个界定“无产阶级”的角度是从第四种对抗“排除者”出发，直接将“排除者”视为当代的“新无产阶级”。齐泽克将无产阶级界定为第四种对抗的“排除者”，甚至直接将贫民窟居民视为新无产阶级。从“无分者之分”出发，《活在末世》对“无产阶级”提出这样的定义：“‘阶级’不是肯定性社会实在范畴，不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而是政治斗争的范畴，它切断整个社会机体，阻挠社会机体‘整体化’（totalization）。”<sup>6</sup>这种“否定性”（空无）定义的“无产阶级”是齐泽克对“无产阶级”的第二种界定。

2006年《视差之见》当中齐泽克首次提出贫民窟居民是“新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代表，并进一步比较了“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不同特质。首先两个概念有相似。第一，贫民窟居民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一样都是自由的（除了锁链无

<sup>1</sup>（斯）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90页。

<sup>2</sup> Žižek, Slavoj.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 five essays on September 11 and related dat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81.

<sup>3</sup> Budgen, Sebastian, Eustache Kouvélakis, and Slavoj Žižek. *Lenin reloaded :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 Si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9.

<sup>4</sup> 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92.

<sup>5</sup> Žižek, Slavoj.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2009. p. 92.

<sup>6</sup>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 198.

所可失), 齐泽克甚至认为贫民窟居民比传统无产阶级概念更加自由。因为贫民窟居民具有双重自由: 不受财产羁绊、生活在国家警察控管之外的自由空间里。第二, 贫民窟居民和传统无产阶级一样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被迫聚集在一起, 他们被剥夺了传统、宗教、种族的支撑, 直接被抛进必须寻求链接的情境当中<sup>1</sup>。

相异之处在于划分的标准。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是严格按照经济“剥削”关系来定义。所谓“剥削”指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而剩余价值是通过劳动者不得不将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而创造。而贫民窟居民的划分是社会政治性的。贫民窟居民无法整合进入公民的合法空间, 比难民还要难民, 是制度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活死人”(living dead)<sup>2</sup>。当我们看到齐泽克提到“活死人”时, 马上就能领会他对贫民窟居民的无限期待。在拉康和齐泽克理论当中, “活死人”是真实界的返回, 是被象征秩序排除部分的回归与报复。拉康讨论安提戈涅的时候, 就曾经将最后被克瑞翁的城邦法律排除, 活活地关进墓穴洞里的安提戈涅定义为处于两种死亡(象征死亡和真实死亡)之间的“活死人”。而安提戈涅所产生的巨大行动能量, 正是齐泽克希望在贫民窟居民身上找到的。

从“无分者之分”的“排除者”或贫民窟居民作为新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新视角来看, 齐泽克给“无产阶级专政”赋予新的内涵。首先, 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也就是“无分者之分”)代表了真正的普遍性(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 “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无分者之分”定调的普遍性力量,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代表了“平等的普遍性”<sup>3</sup>。显然齐泽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来自对“无分者之分”的颠覆潜能的设定。因此, 齐泽克的“专政”代表政治空间中的霸权, “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脱节”(out-of-joint, 也有疯狂、紊乱的意思)的部分, 在社会中缺乏适当位置的“无分者之分”。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不是黑格尔所谓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普遍阶级”, 而是以否定性为特征的普遍性。各个阶级都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潜在)能力, 但只有无产阶级例外, 他们的解放只有彻底消灭自身(阶级划分)才能达成。<sup>4</sup>

最后, 齐泽克对阶级斗争的对立双方也提出不同观点。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发展为两大阶级的对立: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齐泽克则认为新的阶级斗争发生在无产阶级和“象征阶级”(symbolic class)之间。这里的无产阶级即是前面谈过的“无分者之分”或“排除者”。“象征阶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00年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齐泽克在书中反驳拉克劳对他的批评, 认为拉克劳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其他可能存在, 而他自许为“老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则认为, 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中同时暗藏着巨大的新矛盾, 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 即“分裂”, 包括种族的分裂以及全球的纳入者与排除者之间的分裂, 这种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关

<sup>1</sup> Žiž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p. 268-269.

<sup>2</sup> Žiž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 269.

<sup>3</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13.

<sup>4</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414.

于纳入者一方齐泽克提出了“象征阶级”的概念，其中包括经理人、银行家、学者、记者、律师等，虚拟的象征世界是他们工作的领域。<sup>1</sup>此时齐泽克还没有将“排除者”与“象征阶级”作为两大对立阶级，还提出第三个阶级，即依附于传统生产模式的“中产阶级”。三个阶级秉持不同的“世界观”：“政治正确”的“象征阶级”主张个人主义的、生态敏感的和“后现代主义”；“中产阶级”相信“现实的生活”；“排除者”则在享乐的虚无主义和激进的宗教（或种族）原教旨主义之间迷醉。三者的关系正如拉康的三界域：象征、想象、真实<sup>2</sup>。此时的齐泽克并未将“排除者”与“象征阶级”放在阶级斗争的两极。

2004年《贫民窟的……自由世界》中，齐泽克正式提出“排除者”和“象征阶级”是“阶级斗争新坐标轴”（the new axis of class struggle）。《没有器官的身体》里提到“象征阶级”的一个典型——“互联网贵族”（Netocracy）。作为信息精英的“互联网贵族”有取得信息的独家管道，以及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社会圈，这些人包括：高级学者、记者、设计师和程序员。他们有着“游牧”（nomadic）主体的气质。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的抵抗和边缘位置哲学正是这个刚刚浮现的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齐泽克仍然认为“互联网贵族”形成的资讯社会并不能和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等同视之。“互联网贵族”的关键是他们与资本主义联系的方式。<sup>3</sup>

2008年《捍卫失败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和“象征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新坐标轴”进一步深化。“象征阶级”的内涵又有变动：重新恢复了经理人，新加入公关人员，去掉了律师。齐泽克认为“象征阶级”将自己从现实中连根拔起，自视为直接的“普遍性”。贫民窟居民则是“象征阶级”的对立阶级，并且提出了一个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务的历史系谱：19世纪是政治化的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垄断，20世纪则是亚洲与非洲广大农民的政治觉醒，21世纪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政治-组织化，训练“非结构大众”的贫民窟居民，贫民窟的组织形式酝酿着未来社会形式的种子。<sup>1</sup>

## 四、评价

齐泽克从当代资本主义四种对抗引申出“排除者”，再将排除者定位为新无产阶级这套革命主体观仍有待历史检验。毫无疑问，左翼应该介入全球出现的贫困问题，简单地用旧理论范式将贫民窟居民视为流氓无产者显然过于粗糙简单。然而，光光从人数持续增加、被强迫聚集在一起、已经无所可失、国家无法控制（其实这一点还有争议，或许警察无法直接控管贫民窟内的社会秩序或经济活动，但他们通过与黑帮组织的公开或秘密的互利勾结合作，

<sup>1</sup> Butler, Judith,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00. p. 322.

<sup>2</sup> Butler, Judith,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00. p. 323.

<sup>3</sup> Žižek, Slavoj. *Organs without bodies :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93-194.

仍然有效地控制着贫民窟。更何况国家还有更强大的有组织性暴力军队作为必要时的介入工具，很难说贫民窟已经脱离了国家的掌控）等特征，便推导出贫民窟居民是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这条逻辑链稍显薄弱。笔者以为齐泽克忽略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个关键——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直接产物（最后形成两大阶级）和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贫民窟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并未占据整个生产循环的关键位置。从这一点反驳了齐泽克关于贫民窟居民是“新无产阶级”论断。

关于新无产阶级（排除者）论点的缺陷还表现在齐泽克提出的“阶级斗争新坐标轴”——“新无产阶级”和“象征阶级”之间的斗争。“象征阶级”理应批判，尤其是以“象征阶级”的概念挑战西方“激进理论学术圈”的主流意识形态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等观点。然而，我们可以从“象征阶级”内涵的不断变动发现该论点的致命缺陷。弗洛伊德在解析梦境的时候会让被分析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讲述同一个梦境，并特别关注每次讲述中不同的部分，认为那才是病人不自觉掩藏或问题得以暴露之处。借用弗洛伊德的这个方法来看齐泽克的“象征阶级”内涵的变化。齐泽克四次提到“象征阶级”，各自的内涵不尽相同：“银行家”第一次出现过，之后就消失了；“经理人”第一次出现，第二、三次消失，第四次又出现；律师和艺术家出现过两次；另外还有出现过一次的有设计师、程序员、公关人员。只有学者和记者四次都出现。第一次提出的“象征阶级”有代表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但往后就不再提了，这是整个“象征阶级”内涵变动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到，“尽管是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在不觉察中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成为尖锐对立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2</sup>，齐泽克自己也曾经从哲学角度出发强调过真正的对抗不可能是多元只能是二元<sup>3</sup>。然而，“象征阶级”与“新无产阶级”真的已经取代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斗争新坐标”？齐泽克的一系列论述存在一个理论缺环——在“阶级斗争新坐标”的谱系中，资产阶级的位置何在？

---

<sup>1</sup> Žižek, Slavoj.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p. 425-426.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sup>3</sup> 参见（斯）齐泽克：《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宋文伟、侯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 景观、资本自治与生命治理

## ——德波景观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刘冰菁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面对的不是中立的大众媒介时代, 而是: 资本主义从生产为主导的自由竞争阶段转向消费为主导的垄断阶段, 最终来到了资本把自己生产的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自治阶段, 它将实现自身所需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前提都纳入生产之中, 形成了全新的以人的存活总体为治理对象的剥削方式。从马克思的商品到德波的景观, 代表的是如今的主要课题是交换价值如何全面支配使用价值、如何建构起新的使用价值和人造需求, 以便动员人们消费更多他们所不必要的新类型的商品。这就撕开了马克思在在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第二阶段上的缺口, 即在马克思那里未被资本生产的社会化进程所直接介入的使用价值和需求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作为获取资本增值的全新的社会建构的场所。

德波称这种新的资本剥削方式为“增益的存活”, 它以人的存活的总体为治理对象, 其中生活的真实必然为景观的再现所代替、个体必然活成被动的存活者、世界必然成为无止境的人造物的堆积。在这里真实发生的是, 人们为存活下来、与自然相斗争的阶段已然过去, 存活的问题却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再次被提出, 获得了新的历史内涵——在当下商品生产远远超过人类基本需求的丰腴社会中, 人类的首要目的被悄然篡改了, 不再是存活下来, 而是要更好地活着, 这就是德波说的“增益的存活”, 是在存活的必然需要的基础上所做的增补。这种增补, 具体就是在丰腴社会所宣告的(真假与否尚未定论)其物质生产已经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下, 将人类存活的需求无限细分、扩大为工业流水线生产出的“伪需求”, 让人的存活本身变成了“可消费的存活”。并且, 这种增益的存活的根本特征在于, 它是没有止境的, 它永远处在不断分化和增长的进程中。因为人存活所需的最低需求是有限的, 但人更好地存活的最高需求是无限的。

因此, 景观虽然本义是指一种精彩的景致或是表演, 实则景观这一“褒义词”是在讽刺这个表面丰腴的消费社会中, 资本谋取自身增值, 将使用价值不断降低为零、将人的存在意义压制为虚无, 而商品却越来越采取各种绚烂、而无意义的再现形式。因此, 德波取景观之意, 是指一种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万物商品化下、意义被无限压缩取向为零的“奇观”, 是商品生产被符号差异所垄断下的必然景致。此处的奇观, 并不是取惊奇之意, 而是指资本主义丰腴社会所展现出的无限景观与意义被无限压缩之间矛盾的尖锐之极。更进一步来说, 景观(spectacle)一词, 还和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镜像理论中的“镜像”(specular)有着词源结构上的偶然相似性, 更加有着批判理论上的家族相似性, 都是适用于反映当代消费社会隐秘操纵人的需求和欲望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德波;《景观社会》; 马克思; 景观; 资本自治; 生命治理

**作者简介:** 刘冰菁, 女,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国哲学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稳定发展, 迎来了所谓的“丰腴社会”, 也就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普遍面临的“消费社会”。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新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过和平、软化阶级矛盾的方式不断趋向资本的无限积累。具体比如，赖希、马尔库塞等人提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为完成资本增值的主要方法，不在于资本主义组织劳动的方式，而在于如何将人的“剩余冲动”转化为“现实控制”、将人的“快乐原则”导向“现实原则”，即社会能够组织人们追求替代性的满足，从而“解放”过去被社会所压抑的力比多能量，将其转化为消费过程的动力。而阿尔都塞、福柯等人则是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各种社会日常的规训机器（学校、工厂、监狱、医院、社会福利系统等），完成对人的心理和身体的无意识规训，确保人们服从于社会理性划分的接纳和排斥机制，来构建越来越自由、和平但更单向的社会，即所谓的“生命政治”。而德波认为，马克思那里尚未被资本生产的社会化所直接介入的使用价值和人的需要，如今已经成为了资本社会建构的对象，这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自治阶段，它将实现自身所需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前提都纳入生产之中，形成了全新的以人的存活总体为治理对象的剥削方式。因而，景观就是用来指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入了高度自治的历史阶段，以致于人的存在、生活被奴役、操纵和规训的荒谬程度。

## 一、景观与资本自治：当使用价值成为社会建构的对象

资本，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实体性的物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剥削关系，其本质不断增值自身的运动过程。其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资本增值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生产领域对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但是，资本积累要实现自身必须依赖于市场的交换活动。负载着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商品，必须在市场的交换活动中被购买，资本才能顺利完成增值的过程。此为资本实现自身依赖于市场交换活动的第二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换价值作为市场活动的必要中介，颠倒地成为了主导使用价值生产的目的。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就不是创造符合人的基本需求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和实现更多可供消费的商品形式及交换价值。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才引入了抽象成为统治的拜物教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其在商品世界中最显著地表现为“拜金主义”，货币作为抽象的价值形式，物化且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其实从未放弃过作为人类社会必要前提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使用价值所代表的具体内容的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和交换价值同体而生，但却并未直接成为被社会组织和建构的对象；因而他所极力批判地并不是商品本身，不是具有有用性的物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物化现实。不过，马克思也曾经在比喻式的语言中描述过普遍商品化、万物商品化的世界，在那里，连人的信仰、爱情等没有具体使用价值的对象，都被卷入到商品生产的洪流中去。

马克思曾经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过商品交换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交换生产偶然超过消费的剩余物品，这是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第二是不仅包括剩余的物、而且包括所有的产品在内是生产，都取决于交换、都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这是进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第三是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商品化的历史阶段，“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是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只是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sup>1</sup>最后这个历史时期，恰恰就是商品生产在人类所有活动中主导地位的万物商品化阶段，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件事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无论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还是不具备具体使用价值的对象，都被卷入商品生产的序列之中，这就是资本逐渐将我们生活中原本不属于商品生产的具体内容、一步一步纳入到商品生产之中。马克思其实已经看到了在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第二阶段上，存在着交换价值全面支配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和需求可以被有效组织起来的极端趋势。这就是德波用景观社会发展马克思的商品社会的原因所在，商品自身的构成发生的变化，同时象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全面进入消费社会的现实，就见证了这一普遍商品化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的殖民。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大众媒介的兴起，西方全面进入了消费的黄金时代。为了更多地拉动消费需求和实现交换价值，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广告、宣传、包装、时尚等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的流行趋势。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摆脱过去商品的直接物质形态的新型商品，比如时尚、地位象征、服务、计算机软件等成为了新的商品，它们不具备实体，甚至不具备使用性，但却构成商品、具有交换价值。

德波正是看到了这一过程。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之中，自动化是其中发展最为先进的领域。伴随着自动化进程的蓬勃发展，自动化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取代了过去人类劳动的位置，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开始应对着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即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为了让自动化，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其他非极端形式，不至于在事实上减少社会广度上所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负责分配和歌颂现在的商品的大军；是用于动员的补充力量，在和这样类型的商品（即第三产业中的商品）相关的人造需求中，恰巧遇到了组织后台劳动的必要性。”<sup>2</sup>德波虽然调侃地比喻到，第三产业的兴起似乎是恰巧遇到了资本主义创造新形式的劳动的时代需要；实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出了新的剥削形式，如今的主要课题是交换价值如何全面支配使用价值、如何建构起新的使用价值和人造需求，以便动员人们消费更多他们所不必要的新类型的

<sup>1</sup> [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商品。这就撕开了马克思在在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第二阶段上的缺口，即使用价值和需求是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作为获取资本增值的全新的社会建构的场所。

过去，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因而并不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独立对象，它只有在被卷入到交换价值等商品经济运动时才被纳入分析范围。因此，德波说“过去使用价值被理解为是包含在交换价值之中。”<sup>1</sup>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属性不可分割的同生对象。如今，“在景观的颠倒世界中，必须清楚地说明使用价值，既是因为使用价值的真实的现实已经被过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所蚕食；也是因为使用价值现在是作为虚假生活的必要的伪-证明。”<sup>2</sup>在景观社会中，必须重新说明清楚使用价值，是因为：过去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虽然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但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仍然商品成为商品的基本前提，在交换活动中获取具体的使用价值仍是基本需求。如今，使用价值已经不再是物品的自然属性，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使用价值不仅为交换价值所垄断，而且成为商品经济建构的对象，“交换价值只有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因子时才能形成，但是它以自己的武器取得的胜利却创造出它自主统治的条件。通过动员任何人类所需的使用，通过垄断对人类所需的使用的满足，交换价值最终能够**领导使用**。交换过程自行认同于任何可能的使用，将使用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雇佣兵，最终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战斗。”<sup>3</sup>

这里需要分辨的关键之处在于，与以往马克思指出的交换价值成为商品交换中的主导因素不同，在景观社会中，使用价值和需求是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其背后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自治阶段，资本将自身实现所需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前提都生产了出来。

为什么说是交换价值通过对人的需求、对满足人的需求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和生产，创造出了自主统治的条件呢？德波指出，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倾向就是**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sup>4</sup>，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意义越来越被降低，过去所不具备使用价值的服务、心理、情感等元素都可以被建构成个体消费所需的对象；而在这一万物商品化的进程中，使用价值的意义被不断降低所腾出的空场，取而代之的是交换价值、资本所生产的“伪-需求”和“伪-使用性”——在颠倒的景观社会中，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使用价值都被总体地建构成了“伪-需求”和“伪-使用性”。“当经济用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代替这个社会基础时，它所代替的只能是人类最初需求的满足，这些需求是粗略认定的需求，是不断制

---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4</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造的伪需求，可以归结为维持经济统治的唯一伪需求。”<sup>1</sup> 此时，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再也不用顾虑生产商品时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任何没有使用功能的存在都可以被纳入到商品生产之中，甚至它可以独立自主地将它所实现自身所需要的前提都生产出来。这就进入了德波所说的资本主义所处的自治经济的时代，也就是交换价值自主统治的时代，它按照实现消费和资本增值为唯一也是终极目的，不断地将伪-需求和伪-使用性生产出来，从而组织化地生产出景观社会中的人及其所处的世界这一总体。

而这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资本主义从生产为主导的自由竞争阶段转向消费为主导的垄断阶段中，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来到了资本致力于把自己生产的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自治阶段。列斐伏尔在同期从“日常生活被殖民”到资本对空间的直接生产，所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增值自身的重点在于，对整个资本生产得以产生的自然、社会、文化等前提条件的商品化生产。而德波和鲍德里亚关注的是垄断资本主义中商品生产转向了对人的需求的生产，其手段和目的都统一为“制造欲望”、“欲望他人的欲望”，让人看到自己所匮乏的需求，从而将人的生存和意义都生产出来。正如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在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之中，一种仅注重生产增长的体系（如资本主义体系，但不仅限于资本主义）能够在最为深层的意义上，如自由、需要以及无意识等等层面上将人作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体系只能将个人作为体系的诸多要素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它不能容忍意外。”<sup>2</sup>

## 二、存活之处，即是景观：景观社会中的生命治理

如前所说，景观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使用价值和需求反而成为了交换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新的社会建构的对象，其揭示的是资本的实现问题，或是消费的过程问题，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景观对人的需求进行垄断以供资本的自治实现，在德波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资本剥削方式，它以人的存活的总体为治理对象，建构了一个“非现实”的社会生活。德波将这种景观以人的存活为治理对象的新的剥削方式，命名为“增益的存活”<sup>3</sup>（la survie augmentée），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波认为，在未进入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处于无意识的进程中，人们是为了维系生存而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活动。这就是“存活”的第一重内涵，不难理解，就是指人类为维系生存的所需的基本活动 and 能力。在生产力和物质资料都匮乏的历史阶段，人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存活下来，因而迫切地需要生产物质资料。和鲍德里亚不同，德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4 页。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波是肯定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类从几千年前知道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1</sup>而在自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个体生产者那里，客观留存着某些剩余的产品，导致偶然拥有不同剩余产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互相交换，从而发展出商品经济的萌芽。

而当商品生产遇到了大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历史条件之后，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商品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中，劳动者变成了劳动力，劳动变成了雇佣劳动，剩余产品变成了剩余价值。在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后，“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富足，在这个富裕中，存活的首要问题无疑已经得到解决，然而以这种方式出现的问题总是会重新出现；它每次都会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提出来。”<sup>2</sup>也就是说，在过去社会中生产相对不足的时代中，如何维系基本的生存，即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供给等问题，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现在商品形式普遍化的时代，“商品的**独立性**已经扩展到它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sup>3</sup>，人们为存活下来、与自然相斗争的阶段已然过去，但德波强调，存活的问题却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再次被提出，存活获得了新的历史内涵——在当下商品生产远远超过人类基本需求的丰腴社会中，人类的首要目的被悄然篡改了，不再是存活下来，而是要更好地活着，这就是德波说的“增益的存活”，是在存活的必然需要的基础上所做的增补。这种增补，具体就是在丰腴社会所宣告的（真假与否尚未定论），其物质生产已经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下，将人类存活的需求无限细分、扩大为工业流水线生产出的“伪-需求”，让人的存活本身变成了“可消费的存活”。并且，这种增益的存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永远处在不断分化和增长的进程中。因为人存活所需的最低需求是有限的，但人更好地存活的最高需求是无限的。

而在景观社会特有的增益的存活中，“使用价值……作为一种伪证明，变成了虚假生活所必要的部分。”<sup>4</sup>也就是，就是通过增益的存活这一新的剥削方式，资本主义成功地将人、人的存活的总体作为对象纳入了进来，结果是景观社会完成了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从主体到客体的造假和替换。

首先，需要多加分辨的是，关于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大量使用的“真”和“伪”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就是人类真实的活动和景观的虚假现实之间的对立。我们很容易会将其理解

---

<sup>1</sup>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4</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为，德波是在揭示真实的人类存在被景观的伪-现实所替代，这一论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德波强调，将景观和真实的社会活动对立起来是犯了抽象的错误，因为这就没有看到对立的双方本身都是处在异化之中，没有看到“看似固定在任何其中一方面的任何观念，其本质就是处在一方向另一方的过渡：现实在景观中出现，景观成为现实。这种相互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sup>1</sup>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真实的存在被景观的虚假所替代，而是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自治的历史阶段中，现实本身、人的存在本身必然只能在景观中得到实现，而景观即使再现的是伪-活动、伪-需要、伪-现实，它也必然是真实。“颠倒了现实的景观实际上是现实本身的真实产物。”<sup>2</sup>

因此，这里的“真”和“伪”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真实和虚假。德波所说的，真实被虚假所替代、消费者成为幻想的消费者，并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物的商品是被虚假构成的。而是我们确实被不为我们所控制的景观图像所包围而割断了直接认识现实、认识自身的其它可能途径，因而丧失了对人的本自具足、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认识和实践。因此，德波所说景观对人的社会生活的虚假和伪造，是对人的本自具足的否认，是对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的否认。景观社会看似提供了各种自由的选择，但实则是一种独白式的霸权。对此，鲍德里亚武断地认为，这个现实已经完全消失了，只剩下指向自身的符号差异生产的过程。

那么，在增益的存活中，景观社会是如何完成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造假和替换的呢？这就具体体现在：

第一，生活的真实（*vécu*）必然为景观的再现（*représentation*）所代替。

“曾经直接真实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再现。”<sup>3</sup>这种景观的再现，并不是具体指，生活所见之处所呈现的图像成为人们生活所追逐和消费的对象，而是在这一追逐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自治的阶段，它让自己生产出来的伪-需求成为人们生活中唯一的选择，从而所有人们真实的生活的地方，都被补偿性的消费活动中的虚幻形式所代替，这种虚幻形式会让人忘记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贫乏。明星，作为活人的景观再现，就是最佳例证。众多明星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可供模仿和消费的各种人类品质、生活方式，“消费的明星，在外部同时又是不同人格类型的表现，它展现出每个类型都可以平等到达消费的总体，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其幸福。”<sup>4</sup>人们就在对明星的崇拜、模仿和追逐中，将自己活成了别人，自觉地将自己改造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客体，嵌入到资本主义消费链条中去。我们不再是为了自身而生活，而是为了活出景观中的那个精彩的他者而奋斗。所以，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4</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德波才说，凡是人们本应真实和自由地生活的地方，都被景观再现中展示的存活所需的伪-现实所取代：“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真实经历的东西。”<sup>1</sup>

第二，个体必然活成被动的观众（spectateur）、活成存活者（survivant）。

前面已经提到，在景观社会之中，个体的自我繁衍、衣食住行、善恶美丑、高低贵贱，皆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所需要人的再生产，以致于人本身、人的生活成为了消费社会所要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和产品，“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sup>2</sup>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将自己的前提，包括人、人的需要、人的未来发展等前提都生产出来后，个体就必然只能活成一个被动的观众，全盘接受所有的外在规定性。在这里，德波所说的“观众”并不必然是指在观看的个体，这里的“看”也不必然是指视觉的行为，而是强调景观本就是一个生产被动性的现代机制，它让每个个体都被动地接受外在的存在和欲望，而越来越忘记自身。“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人相比，景观的外在性显示为这样，即人的自身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向他表现动作的另一个人。因此虽然观众在自己家中，却觉得自己不在任何地方，因为景观到处都在。”<sup>3</sup>

而这种观众，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同期和德波共同亲密合作的范内格姆所说的“存活者”，这也是后来被鲍德里亚使用的概念。存活者，就是德波所说的“商品的人道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承担起人类生存的全部”<sup>4</sup>的产物；人不再是作为人本身被生产出来，而是作为必须更好地存活着的生产力、消费力被生产出来：“人从来没有直面他自身的需要。这一点绝不仅仅对于‘次级’需要是有效的，对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同样是有效的。在这一情形下，人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被再生产出来：人只是作为一个存活者而被再生产出来（一个存活者的生产力）。”<sup>5</sup> 所有属于个体“自我”的内容，包括感性、欲望、意志、品味以及潜意识，都被动地成为景观所生产和组织的对象：“‘存活者’的自由将是能够负载起抽象的构成内容，即他选择将自己划归为哪些抽象的构成内容。存活就变成了生命被机械再生产的记忆所组织起来的最完满的阶段。”<sup>6</sup>

第三，世界必然成为无止境的人造物（artificiel illimité）的堆积。

增益的存活，似乎是最能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形式。因为它不是将人们的生存成本降到最低限度，而是不断提高其需求的水平，后者恰恰是无穷无尽的。人的需求不应该、也不能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4</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5</sup>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5 页。

<sup>6</sup> Raoul Vaneigem, *Banalité de base*, Éditions Verticales/Le Seuil, 2004, p.70.

被真正满足，可消费的存活必然要求不断开发新的人的需求。因此，我们面对的世界，必然是与其相对等的、不断升级换代的客体世界。今天，更高清、更大屏、更逼真的电影体验，不正是说明了这一问题么？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形式的多样、数不胜数的便利，人所面对的世界越是呈现出景观里的五彩斑斓，就越是对人的真实存在的剥夺。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在商品丰腴的地方，充满了对不同的商品、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但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人造假象，因为它们都只是服务于个体向资本主义唯一的消费模式的绝对认同。人所面对的客体世界越来越脱离于人的力量，而成为一个自主运动的景观，它越是丰腴，人的生活就越是贫乏：“商品的机械性累积解放出一种**无止境的人造物**，在它前面，活生生的欲望是束手无策。独立的人造物累积起来的力量导致到处是对**社会生活的造假**。”<sup>1</sup>

### 三、何谓“景观”：丰腴社会的奇观与镜像

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绝对自主的历史阶段，到它以人的存活总体为新的治理和剥削对象，这是德波所给我们描述的景观社会作为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些描述，我们越来越能清晰地把握，为什么德波会启用“景观”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来形容当下资本自治、消费先行的历史阶段。

景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比喻式的词汇，它先天就带有一种模糊性的特质，总是似是又非是。正是由于景观本身的指向不明确，又关联着对现代消费社会（同时也是大众传媒兴起的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观总是与各种类型的大众传媒相联系在一起。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尔纳在他的《媒体景观》中认为，景观描述的是媒体和消费社会围绕着图像、商品和事件的生产 and 消费而被组织起来。他将景观具体地指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媒介，将电视、体育节目、政治事件等具体内容赋予给了景观，从而讨论媒体景观是如何被生产、建构和传播，围绕着图像的生产 and 消费来组织社会活动。也就是说，本身就是用来比喻现代社会的景观，由于自身指向的模糊性，使它能够被用于指认大众媒介时代的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比如媒介景观、政治景观等等。关于这些“误读”，德波本人在生前就了然于心，他曾经在最后一部公开上映的电影作品中，截取了专家们在电视节目拿着他的书、争论“景观”内涵的图像，认为大部分冒失的知识分子们只是把景观看作是一种“媒介的多度”<sup>2</sup>的结果。

实际上，总体地回顾德波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下半页对景观概念的使用过程，就可以发现，景观之于德波，起于偶然，终于必然。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 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Guy Debord, *Œuvres*, Paris, Gallimard, 2006, p.1596.

首先，偶然在于：

德波对“景观”的最初接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布莱希特的剧场景观的表演，这也符合景观这一词汇的基本内涵。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相似性。比如，剧场表演中的观众，无干涉地接受表演中的内容，从而形成观众对景观的认同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个体的生活内容无条件服从于外在的虚假的必然性。正如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统治权力隐藏在工业文化之中，在那里人们被动地接受和重复着一种永恒现实，所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甚至音乐都在调整自身去适应文化工业的标准化要求。年轻的德波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欣欣向荣、却死气沉沉的生活情境。这种必然的沉默和无条件的顺从的状态，在布莱希特所描述的剧场表演中得到了最佳的比附。所以，德波最初对景观的偶然接受并不难以理解。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下，景观最终成为了德波用于揭露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必然选择：

因为，从上文的内容中已经看到，景观，本质上是德波用来发展和替代马克思商品社会的关键范畴，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在今天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景观，就是“为了自身而自行发展的经济”，是“经济已经让人们完成降服”，从而“景观让活着的人们服从于它”<sup>1</sup>。而之所以景观被德波用来指认这样一个“脱离了我们的力量，都能以其整个的威力向我们自行展示”<sup>2</sup>的世界，是因为在德波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之所以能够为了自身而自行发展，正是将消费所需的前提，包括人、人的需要、人的生存都纳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去。在这样的“商品的变成-世界，这也是世界的变成-商品”<sup>3</sup>之中，景观虽然本义是指一种精彩的景致或是表演，实则景观这一“褒义词”是在讽刺这个表面丰腴的消费社会中，资本谋取自身增值，将使用价值不断降低为零、将人的存在意义压制为虚无，而商品却越来越采取各种绚烂、而无意义的再现形式。因此，德波取景观之意，是指一种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万物商品化下、意义被无限压缩取向为零的“奇观”，是商品生产被符号差异所垄断下的必然景致。此处的奇观，并不是取惊奇之意，而是指资本主义丰腴社会所展现出的无限景观与意义被无限压缩之间矛盾的尖锐之极。

更进一步来说，景观(spectacle)一词，还和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镜像理论中的“镜像”(specular)有着词源结构上的偶然相似性，更加有着批判理论上的家族相似性，都是适合用于反映当代消费社会隐秘操纵人的需求和欲望的理论工具。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擅长于围绕景观、观众、图像等来比喻现代消费社会的种种现

---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3</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象。在这些语句中，消费者作为观众观看再现的景观图像这样的比喻，就不应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景观象征着商品通过广告中的图像的展示，来诱惑人们进入消费活动；或是，传统意义上摆在市场上以供挑选的商品，如今成了广告、宣传、电视等景观中展现出来以供消费的商品图像，只不过是更换了一种技术媒介和宣传方式而已。似乎大众媒介（包括电影、广告、宣传等）才是符合景观定义、决定景观产生的客观因素。因为，德波想要说的，并不是“观看景观中的图像”这一抽象事实，而是我们在景观中看到了自身的匮乏、看到了填补这一匮乏的他者的欲望而已。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制造欲望、欲望他人的欲望。这是对消费社会的统治方式的最佳注解，让人看到自己所匮乏的欲望和需求，从而将人的生存和意义都生产出来。我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我们生活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是在镜像中、在景观中的象征性符号和伪-需求，而那恰恰是资本权力所精心建构的内容。所以，德波才会认为，“景观在其整个广度上，是商品的‘镜像符号’。”<sup>1</sup>换用范内格姆更为具体的描述就是，“景观就是，强迫的劳动转变为同意的牺牲。以前是每个人应该追随你的劳动的世界，劳动是对存活的压迫，现在是追随你的需要的世界，所有的需要都被权力所决定。”<sup>2</sup>

最后，德波其实和同时代的其它思想家一样，都是在伺机观察着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或是“丰腴社会”，他们从景观乱花坠入眼的再现形式中，看到了社会关系的虚假维系、被默认的隐秘的意识形态、以及统治这个社会的霸权方式，它们都阻止着人们从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中走向人类真正自由的解放。在这个的时代中，德波选择用景观来比喻这个世界，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我们捧着棒棒糖、坐在木马上，永远处在温和的规训中乖巧着生活。我们从未从这里走出走过，我们从未长为成人。“童年？它就在这里啊！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过童年。”<sup>3</sup> 景观，不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好的比附么？

作者简介：

刘冰菁，女，籍贯江苏苏州，1990年2月生，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联系方式：15195806030, lbingjing\_helene@126.com，联系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大学哲学系，210023。

---

<sup>1</sup> [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译文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张新木老师所译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sup>2</sup> Raoul Vaneigem, *Banalité de base*, Éditions Verticales/Le Seuil, 2004, p.70.

<sup>3</sup> Guy Debord, *Œuvres*, Paris, Gallimard, 2006, p.543.



# 在发展的历史视野中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问题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

刘维春（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

**摘要：**“十月革命”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来备受关注也颇受争论。简单地否定与肯定态度都不足以正确地理解十月革命的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苏联的解体原因错综复杂，但不能归咎于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而在于用革命的方式搞建设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和体制的僵化。在发展的视野中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从革命和改革的双重逻辑出发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十月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更是对苏联革命建设传统的超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从革命式建设走向改革式发展。邓小平“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改革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成功之道。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新道路的最好实现方式之一，坚持走中国道路是纪念十月革命百年历史的最好方式与结论。

**关键词：**十月革命 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 改革发展 中国道路

本文是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而作。“十月革命”作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来备受关注也颇受争论。重温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发展的视野中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在革命和改革的辩证统一中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我们今天纪念十月革命的最好方法和途径。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既对立，又统一，从本质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改革打破了革命式建设的困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中国梦”则是社会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

## 一、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

1917年的十月革命作为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自其发生之日起就成为东西方世界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理论家们关注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有高歌猛进，也有挫折徘徊，更有革旧鼎新。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俄罗斯大量档案的开放和新鲜史料的发表，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是反对和否定？还是继续坚持苏式评价？抑或另辟蹊径？面对这个问题，政界学界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一直以来，对十月革命的反、否定，甚至恶意的诅咒、诋毁，各种色彩的批判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现象”。

**首先，来自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与第二国际的反对。**早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梦话”，宣称“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烤制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sup>1</sup>。孟什维克代表尼·苏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也曾经夹道欢迎列宁回国，但在后来所著《革命札记》一书的第3卷和第4卷（1922）中，却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sup>2</sup>为由，否定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17年10月10日，作为俄共领导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言反对起义并投了反对票，尽管他们后来对自己的错误做自我批评和检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的理论教皇，明确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缺少社会革命基础甚至政治革命基础的“内战”、“内乱”，是社会主义的“反面”，在一个经济上非常不发达、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sup>3</sup>。而另外一位第二国际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则更尖锐地攻击布尔什维克在一个没有发达民主传统与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国家里所发动的革命只能导致一种“专制社会主义”<sup>4</sup>。

**其次，西方自由派的攻击。**1920年代后期，由西方学者和俄国革命中流亡到西方的原俄国学者组成的自由派，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完全否定。他们在用“灾难”和“天灾”来咒骂和攻击十月革命的同时，认为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早产儿’”<sup>5</sup>，甚至把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视为十月革命“罪恶”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苏联解体后的“原罪”性责难。**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人们在寻找“现实社会主义”危机根源时，有人直接把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攻击十月革命犯了“原罪”性错误。俄罗斯“民主派”认为十月革命断送了俄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使俄国偏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前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亚·菲拉托夫则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一场政变，否认它的革命性。他认为，“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sup>6</sup>。1996年11月7日，俄罗斯总统甚至签署命令取消十月革命纪念日，宣布11月7日为和谐和解日。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废除“11月7日”的法令，随后又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

与上述的批评否定相反，以十月革命为题材，充斥欢呼、溢美之词的著作则汗牛充栋，数以万计。这里既有苏联人自己的肯定，中国学者的认真探讨，也有来自西方世界内部一些

<sup>1</sup>本段部分观点内容参看了郑异凡：《得民心者得天下——列宁和十月革命》，载于《读书》1992年第2期。

<sup>2</sup>转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三版，第777页。

<sup>3</sup>参看[奥]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何疆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sup>4</sup>参看[奥]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李宗禹等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8、71页等处。

<sup>5</sup>转引自孔寒冰：《十月革命：90年来任评说》，载于《世界知识》2007年第21期。

<sup>6</sup>转引自刘淑春：《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观点综述（一）》，载于《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9期。

试图打破西方否定十月革命主流或定论的合理认识。

**首先，苏联人自己的肯定。**对十月革命的界定和解说最初是由苏联人自己作出的。1917年，托洛茨基说“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则把十月革命定论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将十月革命作为世界历史的界碑，人类历史、俄国史要以此分为“新”“旧”两个时期。长期以来，斯大林的历史定论对苏联、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仅1967年（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苏联就出版了2000多种十月革命的论文集和专著<sup>1</sup>。代表苏联国家意识形态观点的苏联理论界和史学界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通史》等苏东官修史著作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最主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对后来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sup>2</sup>，“它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向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根本改变”<sup>3</sup>。苏联解体后，经过几年的实际体验和冷静的思考之后，学者们从学术性和史实性出发，开始对十月革命进行理性地反思。曾主管苏联科学院十月革命学术委员会的帕·瓦·沃洛布耶夫、和学者普列特尼科夫等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中国学者的认真探讨。**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始终是中国理论界的重点。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sup>4</sup>，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学者认为，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学者沈志华、于沛指出，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旺发达，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相继建立的前奏”<sup>5</sup>。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发，学者闻一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符合民情、顺乎民意、得乎民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sup>6</sup>。十月革命冲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一球两制”，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

**再次，打破传统的西方认识。**西方学者对十月革命的传统和主流的评价是贬低和否定。然而在西方大肆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的同时，也有部分西方人士试图以严肃的学理分析态度去认识和看待十月革命。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把十月革命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在1919年3月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约翰·里德坦言“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sup>7</sup>。西方“重评派”的重要代表，英国历史学家爱·阿克顿从“底层”革命原动力的视角出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在于它能

<sup>1</sup> 参看刘淑春：《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观点综述（一）》，载于《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9期。

<sup>2</sup> 孙凌齐：《国内外关于十月革命研究综述》，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sup>3</sup> [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67页。

<sup>4</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sup>5</sup> 沈志华、于沛：《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sup>6</sup> 闻一：《俄罗斯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sup>7</sup> 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郭圣铭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对民众的渴望和焦虑做出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来自它对苏维埃权力这一目标的认同。在‘十月’时，这一目标在城市和军队中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在农村也获得默许的支持”<sup>1</sup>。

在争论十月革命的是与非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当代视域对十月革命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主要围绕如下问题进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能否说明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趋势又是否证明十月革命的失败？

**首先，“胜利的失败”。**前南斯拉夫学者、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齐泽克认为，十月革命最大的失败恰恰是它的胜利，或者说十月革命被认为胜利了。在齐泽克看来，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已经不再是革命的道路了。十月革命的最后胜利让位于斯大林的官僚集体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沙皇俄国式的荣耀。齐泽克指出，革命在一个大家都不认为能成功地方发生了，如果革命被白色恐怖打败，革命者还有怒火，还有希望，还有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这种失败孕育着胜利；而胜利的失败则相反，胜利意味着解放的维度的消失，布尔什维克的计划被官僚制取代，这样，齐泽克说：“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彻底悲剧性的：真正的解放注定会因为其胜利变得彻底失败”<sup>2</sup>。

**其次，马克思思想的挪用和修正。**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认为十月革命不仅挪用了马克思，而且重新解释和修正了马克思，利用他的声望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德赛强调，“十月革命凭借自己的幸存挪用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以野蛮的、甚至凶残的顽强来捍卫自己对他的遗产的垄断。他们说，马克思是预知他们胜利的先知，是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征服整个世界的保障。”<sup>3</sup>德赛甚至指认，“马克思的话即使是在受到曲解时，也变得一贯正确。”<sup>4</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赛说，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当下的活力是马克思向所有那些曾经以他的名义进行说谎、欺骗和谋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复仇”，“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止，不仅不会使马克思感到痛苦，反而使他感到高兴，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的话（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sup>5</sup>

**再次，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需要十月革命。**西方激进左派认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需要十月革命的关键是要判断斯大林主义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实现。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实现，相反却代表着与列宁主义的决裂。阿兰·巴迪乌从当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对普通百姓的隐性盘剥。官方对经济危机进行大肆渲染和“救火式”的拯救银行，其实质是财富的掠夺。巴迪乌强调，正视资本主义

<sup>1</sup> 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sup>2</sup> Slavoj Žižek, *Lenin 2017: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 Verso Books, 2017, 序言第xiii页。

<sup>3</sup> [英]梅格纳德·德塞：《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郑一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sup>4</sup> [英]梅格纳德·德塞：《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郑一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sup>5</sup> [英]梅格纳德·德塞：《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郑一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的危机，我们会发现“成百上千的普通人失去了苦心挣来的薪水，而所有严酷的事实表明，他们彻底没有能力购买房子了。”<sup>1</sup> 为此，巴迪乌和卡利尼克斯深刻地意识到，人类解放的主题从来没有失去它的效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摆脱资本主义危机，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途径和方式。换言之，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十月革命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是鼓舞人们向前的有力武器。

总的来看，上述观点对我们全面认识十月革命、理性地考察十月革命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借鉴。然而，纪念十月革命是为了走出十月革命，对其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不足以正确地理解十月革命的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换言之，围绕十月革命的许多空泛抽象的争论往往既没有看到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的联系，也误读、曲解了革命、建设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苏联的易帜变质不在于革命道路的选择，也不在于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而在于用革命的方式搞建设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和体制的僵化。也就是说，苏联的历史问题出在苏联党和历届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改革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实现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这个道理，没有在发展的历史辩证视野中正确处理革命、建设与改革三者间的继承、转化和突破关系。

## 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三重奏：走出革命式建设模式

纪念十月革命不能孤立地固执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恩怨纠缠上或者是非功过的甄别上，而要在历史的发展的开阔的当代经验视野中来理解。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历史可能与道路固然不容否定，但把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是不正确的。尽管革命是解决矛盾与危机的直接途径，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非常规发展的有效动力。但是如果过分地相信革命的快速有效性，从而沉迷于“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则是错误有害的。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就是尊重历史、超越历史。苏联的历史是十月革命道路确立的，但也经历了一个超越革命走向建设的历史转向。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表明，继承十月革命精神传统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能固守于某种模式，而是在当代世界历史运动中以改革促发展，利用现代文明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的事业的成长壮大。

**革命的划时代性：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既颠覆了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又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是指革命领导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统治。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都在于突破封建等级制、狭隘的经济结构，为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广阔的条件。在俄国，1906-1911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在经济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尽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严重堵塞俄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死穴”，缓解了俄国资本主义经

---

<sup>1</sup>肖辉、张春颖译：《巴迪乌论当前的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8期。

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但是在政治上加强沙皇专制统治意图的反动性以及农奴制没有彻底废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此，短时间内高度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在使无产阶级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锻造出强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十月革命的领导重任自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而革命任务依旧是推翻封建统治。解开十月革命历史之谜的钥匙不是布尔什维克太能干了，而是资产阶级的无能：“假如作为旧俄国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被资产阶级解决了，假如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无论如何俄国无产阶级都不能在 1917 年夺得政权。”<sup>1</sup>正如英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所言，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且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高度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成为革命领导者。而列宁的建党学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及俄国革命时机论（《国家与革命》）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三个理论步骤。<sup>2</sup>因此，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在落后国家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权方式完成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历史事业。

列宁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sup>3</sup>。“‘世界性交替’，是指‘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sup>4</sup>。受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 至 1923 年间，欧洲国家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社会主义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诞生，均清楚地表明世界历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当下，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处在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既没有改变“一球两制”的基本事实，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仍然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不仅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基本力量，对于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格局也有着不可估价的积极意义。

**“革命式”建设：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十月革命是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历史突破，而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在短时间内把落后农业国变成发达工业国，这是历史的又一次突破转折。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在本质上是用革命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1905 年，生前死后备受污蔑的托洛茨基在《开端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说：“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sup>5</sup>。此后，在《总结与展望》、《“不断革命”论》、《苏联的发展问题》、《俄国革命史》和《被背

<sup>1</sup>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61-62 页。

<sup>2</sup> 参看（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下卷，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17-618 页。

<sup>3</sup>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 版，第 208 页。

<sup>4</sup> 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纪念十月革命 90 周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sup>5</sup> [苏]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79 年内部版，第 90 页。

叛的革命》等著作中，托洛茨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应该承认，“不断革命论”最初是托洛茨基用来指导俄国革命的理论，但经历了1905和1917年两次革命后，这一理论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托洛茨基看来，“不断革命”理论，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其中“世界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核心。托洛茨基强调，在单独一个国家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一切暂时的成就，但是那会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地步。因此，托洛茨基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单个国家显得太狭小了，更不能够成为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而且，对革命国家来说，其落后性增加了被往后抛向资本主义的危险。”<sup>1</sup>

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甚至列宁都认识到，在落后的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巩固革命、搞建设却要比先进欧洲国家要困难。“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sup>2</sup>如果说托洛茨基更多考虑的还是生产力落后对于俄国革命的优势意义，斯大林则更多的看到落后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劣势性，甚至提出了著名的“落后挨打论”：“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sup>3</sup>正是这种落后的现实危机感觉与紧迫感，才促使斯大林形成了超常规的高度集中管理、高速发展的战略意志。为了迅速改变苏联的落后状况，斯大林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斯大林看来，要装备农业和改造农民，必须发展工业，高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由轻工业开始。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同，斯大林指出，苏联要走的道路是依靠本国的内部力量来发展重工业，“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sup>4</sup>斯大林工业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工立国、以农辅建，高速发展、高度积累资金的工业化道路。这种由于落后国情的紧迫性促成的革命式动员与建设模式，对于迅速改变苏联的落后面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如同由此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历史后果甚至灾难，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倒还不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僵化理解，即把这个体制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直到晚年斯大林发表著名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他的真实想法仍然是：“苏联的经济关系并不存在进一步变革的可能，现存的体制将会使苏联一劳永逸地走向共产主义”<sup>5</sup>。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确立，也给中国指引了前进方向。这种历史性指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进程乃至建设都产生了巨大而深

<sup>1</sup>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84页。

<sup>2</sup>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卷，第343页。

<sup>3</sup>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第38页。

<sup>4</sup>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5页。

<sup>5</sup> [英]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远的示范性影响效应。也正是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也深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鼓舞，毛泽东萌生了经济大跃进的思想。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sup>1</sup>，由此掀起了一场规模遍及城乡的经济的“不断革命”——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指出：“我国人民的革命干劲‘高涨’和‘更加高涨起来’，‘已经做了并且还要做出更加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情’”<sup>2</sup>。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尽管经济大跃进的原初目的是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这一运动在本质上同样也是用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法搞建设的模式。虽然“抓革命促生产”在某些范围内有助于改变我国落后的发展状态，但总体上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更不用说像十年“文革”这样的长期动乱与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与倒退的历史灾难。对此，邓小平是作过一番深刻反省的：晚年斯大林矢口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与此明显不同，毛泽东不仅承认这些矛盾，而且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看成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sup>3</sup>历史表明，由于毛泽东晚年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进一步作出切合实际的具体分析和正确把握，错误地沿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解决矛盾，致使中国长达20年之久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改革：革命与建设的反思。**革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之一，但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唯一办法。十月革命的根本任务固然不是为资本主义自由地发展扫平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准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也并不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换言之，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不能用革命代替发展，也不能用革命方法搞建设。托洛茨基作为被遗忘的革命领袖，如果由他领导俄国革命，革命的最终结果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他的“不断革命”却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同世界革命等同起来。他指出“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并在世界舞台上完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在新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不断革命——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获得最终胜利之前，它不会得到完成。”<sup>1</sup>托洛茨基把革命看成是无可怀疑的“绝对命令”，而没有考虑革命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更重要的是他把革命状态与经验永恒化、教条化，把战时共产主义紧急状态永恒化、神圣化。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在落后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因此，革命胜利后的头等大事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也正是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战胜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极“左”空想的现实依据。

革命的任务是要促进生产力，不能无限制的反应。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在落后国家发

<sup>1</sup>参看逢先知等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sup>2</sup>转引自王治涛：《不断革命论：“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sup>3</sup>《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成了当时的重大课题。对此，斯大林提出了高速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大跃进”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在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究其本质都逃不开用革命方法搞建设的模式。当然，任何革命建设都不能脱离所处时代和本国国情，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和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思想都是当时落后的国情所致。

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的发动者忘了自己所代表的生产力，忘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忘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而试图用革命的方式对生产力进行拔苗助长。怎样克服“落后急迫症”，从托洛茨基、斯大林（包括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中走出来？这是一个摆在社会主义执政党面前的历史性难题。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由急而缓、由革命式建设逻辑转变为改革式发展逻辑的典范。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在把苏联经济建设带上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轨道的同时，也是一种体制的创新。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的谈话时，这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2</sup>。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改革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优先发展生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历史再次告诫我们，用革命促发展不可长久，以改革促发展创新文明乃是社会主义的长盛之本。

### 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双重逻辑：中国现代性问题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十月革命的继承，更是对苏俄革命建设模式的超越。尽管中国道路学习选择了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但是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上都有自己重新独立的探索。革命、建设、改革不是各自孤立的形态和阶段，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结合整体。虽然中国道路的探索一度用革命方式搞建设导致体制僵化，但最终用改革式发展成功突破了革命式建设，走上了超越传统革命建设道路，用改革创新促发展的良性自我完善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不仅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也是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因此，在今天语境下，准确、科学地认识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辩证关系，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性和自觉性的重要课题。

**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两种现代性逻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中国的殖民化，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迈出了决定性步伐。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则使中国走出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中华民

---

<sup>1</sup> [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读本》，郑异凡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13页。

<sup>2</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族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关键的基础。革命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过程，而改革的目标则是走向全球化现代化的民族发展。因此，革命和改革是两个不完全对立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包含着内在张力与冲突的现代性逻辑。革命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崇高事业，有时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换言之，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事件，而是所有危机都得不到有效缓解或解决时，成本很高、悲壮和辉煌交织于一处的“最后斗争”（《共产党宣言》、《国际歌》语）形式。甚至连十月革命精神最狂热的赞美者托洛茨基也不得不承认：“革命总是带有无礼的特征”，因为这是统治者总是对被统治者的暴力无礼统治所遭遇到恶性的报复<sup>1</sup>。也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意味深长地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sup>2</sup>。同革命的代价性较大相比，改革则是常态的、持久的、代价相对较小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改革是更切实的、更具体的、更能动地去解决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矛盾的方法。因此，同革命模式相比，改革模式则经常地、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具有人类历史的普遍性。正是意识到了改革的普遍性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在分析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在前进中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中，邓小平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的道理、改革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必然性，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辩证统一：“改革是一场革命”。**传统观点认为，改革和革命是表征社会变革程度、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通常指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利于保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局部环节作一些微调修补，并不具有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性质和意义。革命则不同，它指的是革命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和变方式，彻底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实现历史性飞跃。然而，在辩证法看来，改革与革命又有内在联系和转化趋势<sup>3</sup>。列宁曾经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sup>4</sup>”。邓小平在阶级对抗已经消失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具体地分析当代中国改革的实际，对改革和革命的界线和转化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sup>5</sup>”。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sup>6</sup>。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sup>7</sup>。革命通常包括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sup>8</sup>、即“双

<sup>1</sup> 参看[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第149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sup>3</sup> 参看徐必珍、刘怀玉：《邓小平改革思想中的辩证法理论及其时代意义》，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

<sup>4</sup>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168—169页。

<sup>5</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sup>6</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sup>7</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2页。

<sup>8</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轮革命”或“二元革命”（霍布斯鲍姆语）<sup>1</sup>。但是真正的革命不是政权的交替，不是表面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我们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体制，尽管在建国初期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步暴露出种种弊端，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sup>2</sup>这场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sup>3</sup>，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革命。体制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发展为了体制。体制建设不会一蹴而就而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需要不断地改革。因此，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改良，革命也不仅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根本上转变体制的改革也是伟大的革命。

**超越革命传统走向改革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矛盾、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从现代化的线性历史过程来讲，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等级制、官僚制、宗法制社会向经济上现代市场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等民主的法制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出封闭、走向现代社会的自觉要求，中国需要走向世界，同时这一需求也迎合、利用了资本主义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产业结构空间上的转移趋势，资本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新的血液、新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地方、新的生命力。因此，中国的民族现代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化的二重主题与节奏，是今天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中国在走向现代世界的同时，要保持中国主权、民族的独立性，而全球资本主义却想把中国从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国家肢解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四分五裂的区域或世界工厂，即把中国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支配下的各种碎片化的场所，而不再是一个国家。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在于遭遇到了一个流动着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精心布置的既是创新又是摧毁的双重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容置疑地面临着太多的、太复杂的困难、矛盾或者说潜在的危机。如何超越革命逻辑及其制度思维惯性、克服极“左”错误思潮对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干扰破坏影响，用改革的方法处置与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危机，这仍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

福柯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社会主义从来都不缺少的历史正当性或者政治道德上的合理性，它所缺少的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问题，即缺少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规定。“我们不能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推导出这种治理术。我们应该把这

<sup>1</sup>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sup>2</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sup>3</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种治理术创造出来”<sup>1</sup>

也许，福柯的批判过于实证主义了，但道出一个实情：社会主义制度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理想主义的“顶层设计”，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经验与实践精神，即如何落实为各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治理方法体系。邓小平早已经言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sup>2</sup>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本质不是某种抽象的社会制度，而是通过不断地改革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灵活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方式。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合理的治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与切实有效的运作。由于社会主义嫁接在一个治理技术上，所以提出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哪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从批判抽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的。问题关键是看社会主义嫁接在什么样的治理术上，社会主义嫁接在正常的或反常的树叉上，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问题关键是要创造出合适的、严格的、内在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术的某些方面为自己服务的。市场经济制度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提供治理技术支持<sup>3</sup>。

历史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邓小平晚年所探索与设计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作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实践核心逻辑与物质基础，而逐步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直接管理社会的权力造成过分集中而缺少社会活力与民主机制的弊端。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并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历史与实践已经验证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治理术进行嫁接的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程度，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民主公正并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专利，社会主义也一定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公平、民主、正义、自由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治理体系<sup>4</sup>。

## 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新道路的 最好实现方式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回答与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与挑战，不断地在认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与方法。换言之，

<sup>1</sup> 参看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卫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 页。

<sup>2</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 页。

<sup>3</sup> 参看莫卫民：“福柯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载《哲学研究》2012 年第 10 期。

<sup>4</sup> 参看刘怀玉：“三思毛泽东——革命传统、革命后民族国家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遗产”，载《现代哲学》2014 年第 3 期。

重思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模式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发展的视野中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之路，这就是历史的出路与结论。在这方面，邓小平“尊重生活和历史”的改革理论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所共同构成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理念，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们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既是时代的理论精华，又是社会主义走出传统模式的困境和现代性危机的成功之道。

**“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改革理论。**正确分析和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认识改革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必然性的思想理论前提。邓小平从中国当下的生产力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出发，在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第一个”、“最根本”、“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要大幅度地改变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sup>1</sup>”。改革势在必行，“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sup>2</sup>，“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sup>3</sup>。改革是多方面、全方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有重点、分层次、有秩序地逐步展开。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不是照搬前人的本本，而是实践经验的升华。改革是手段、是动力，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的革命。邓小平抓住了僵化的管理体制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通过改革破解了体制僵化，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sup>4</sup>的改革理论不仅实现了由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革命”理论形态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理论形态的转变，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sup>1</sup>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它不是几个观点的简单组合，而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观点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而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以往的理论观点相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强调了自觉适应与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性，深入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好、维护好与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方法、制度措施问题。总的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努力探索与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与驾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与辩证的思维方法论。

<sup>1</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sup>2</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sup>3</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sup>4</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追求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的发展，就是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都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保持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互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地准确把握。它着眼于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国梦的实质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十分复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也面临着最大的历史考验。中国梦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体制建设的继续和完善，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目标。也只有坚持“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战略，才能真正化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而西方资本主义要让中国殖民化、附庸化、两极分化图谋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尖锐与复杂的矛盾。从国际上看，中国梦是和平发展之梦，是合作共赢之梦；从国家和民族来看，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从人民群众个人来看，中国梦是构建一个平衡发展、公平正义的社会之梦。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每个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sup>2</sup>。“中国梦”的目标在于建构人们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人生出彩的幸福和谐社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指引中国百年发展的崇高理想，它彰显了“中国元素”，树立了“中国形象”，坚定了“中国自信”，体现了国家、民族、人民、个人的共同理想，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

**简短的结论：坚持走中国道路是纪念十月革命百年历史的最好方式与结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开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社会主义不断开辟新道路、不断创新的历史探索。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从推翻一个落后的旧制度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飞跃；而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到通过体制改革，改变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提高要求的旧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这又是一次重要的历史飞跃；而从有重点有步骤地促进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完善到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提高党与政府治国理政的能力水平，这则

---

<sup>1</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sup>2</sup>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是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动力的更加科学成熟的新阶段。不通过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自动地促进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找到最合适的、最能够促进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新体制，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体表现的新体制，最终要进一步具体化为一整套高效而公正的治理体系与方法。这样看来，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环环节相扣，制度建立、体制改革与治理完善层层落实、步步深入。这是不容割裂与违背的历史辩证法。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新道路的最好继承与发展方式之一。否认中国道路同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的历史关联是错误的，但止步于革命传统与计划体制建设经验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反过来说，今天中国走改革发展创新之路，不能忘怀革命建设之初心，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初衷，不能让改革发展道路沦为普世价值观的奴仆工具。总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既要反对僵化的思想体系与建设模式，又要提防遗忘初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式的发展与改革歧途。这正是纪念十月革命百年历史的最好结论与方式。

# “多巴胺分泌”与失调：上瘾与（数字）资本主义

杰拉德·穆尔

（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

王陈瑞 译

在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一书的导言性文章中，这位经济社会学家发布了重大宣言——一场终结性衰退正在“进行中”。我们的当下和将来将不会以新社会秩序的降临为标志，而是以“一段持续的空档期——新的世界平衡体系尚未出现……，它表现为一个被延长的社会熵阶段。”<sup>1</sup>这段空档期的特征已经在自我阐明中：工作变得更加缺乏和不稳定；在缺少团体机构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情况下，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展现其微观层面自愈的能力，也就是对晚期新自由主义的再达尔文（re-Darwinized）思潮的“或多或少自愿的适应”，我们的生存策略演变得明显更加达尔文主义。<sup>2</sup>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通过一个我称之为多巴胺分泌（dopaminizing），即从大脑榨取多巴胺的过程，受到剥削的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多巴胺分泌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发挥着作用，或许甚至还作为一个基本装置，但这些只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变得更加显而易见。数字的算法的自动化与人类神经系统的自动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加速了有毒环境的生产，以致于吸毒和服用麻醉剂成了最重要的甚至必需的生存手段。同样还因为计算工具为生产、销售和管理一类相当于为了在筋疲力竭的消费者-工人身份中努力维持生活的皮质醇注射的更适宜技术的设计提供了可能。

## 适应死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药物色情”（pharmacopornographic）的，也就是说它建立在性销售和用以销售的性功能之上。这一观点来自于性别理论家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其《睾酮上瘾者：性、药物与药物色情时代的生命政治》（Testo Junkie）一书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性-性别（sex-gender）工业的复合物”，<sup>3</sup>一个技术科学的、资本主义机器，

---

1 Streeck, Wolfgang.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2016, 13.

2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40.

3 Preciado, Paul B./Beatriz. *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trans. Bruce Benderso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2008, 28.



它的功能是通过负载过度因而萎缩的力比多进行填充来维持我们的消费。普雷西亚多认为，药物色情资本主义的技术手段剥削式地要求力比多作为战后消费者大潮的“基本能量”（fundamental energetics）去运作：与性高潮力或为任何一个有能力通过黑进人身体的愉快回路来攫取利润的人提供支援的进化的趋乐倾向相比，消费主义文化的“实际基础”更是古典意义上的蛮力。<sup>1</sup>但是，我们究竟在我们所谓的“享乐经济”的展现中找到多少乐趣呢？

经济自动化被认为缩短了每周工时，并减轻了曾一度压垮人的工作量。然而结果却并未达成一个“无需工作的世界”，而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无聊工作”（bullshit jobs）的大量涌现和同样耗人精力的工业拟物。<sup>2</sup>世界依赖其而建立的技能性的、职业性的劳动逐渐为表现得忙碌的必要、凝练于营业额目标中的“劳动的外在象征姿态”的展示、对业余时间的蚕食和邮件与定期自我评估的冗杂的官僚体系所取代。<sup>3</sup>被迫着去降低睡眠质量的我们通过消费来弥补超载的身体工作机制中出现的裂缝和扩大我们对高度技术性环境的波动形势的容忍限度。其结果就是一个“具有成瘾基因的社会”（addictogenic society）<sup>4</sup>的产生，症状表现为“白种人发病率”（white morbidity）的上升和工人中产阶级平均寿命的缩短，这些都可以借由各种压力的组合和抑制我们的适应性失效后严重后果的物质滥用率的上升得到解释。<sup>5</sup>然而一个通过消费来消除疼痛的社会和一个通过药物和色情受制于享乐追求的社会并不相同。在通过对享乐的药物色情式剥削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化时，普雷西亚多犯了一个在神经系统科学圈内确立的错误，他将愉悦与“喜欢”与“想要”的强制欲望进行了合并。<sup>6</sup>

上瘾者不是简单地与愉悦相连，而是被逼迫去消费到远远超过这样做所引发的痛苦尚还盖过其带来的快乐的程度。成瘾神经学中更新的进展教导我们将消费病理学与一个普遍的用于经验性学习的机械相联系，而非与大脑的报偿或多巴胺系统的缺陷或者此系统由暴露在有限数量的腐坏、有毒物质面前所引发的短路联系起来，而这一机械永远伴有陷入负反馈循环的风险。换句话说，上瘾是神经可塑性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上的可能，是它允许我们塑造我们的环境并被我们的环境所塑造。同时我们可以对任何事物上瘾，包括手机和媒体（虚假新闻！）。

大脑以重新组织自身从而专注于我们周围产生的主导性刺激的方式来适应既定环境的特定感官信号。习性的形成经由多巴胺神经传递素注入我们的突触回路完成，同时随着我们习惯性的增强，我们对刺激的反应会变得迟钝，导致我们渴求更大的刺激剂量。当我们越来

---

1 Preciado, *Testo Junkie*, 42-3.

2 Graeber, David.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3. Summer 2013.

3 Fleming, Peter. *The Mythology of Work: How Capitalism Persists Despite Itself*.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19.

4 Stiegler, Bernard.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f Pharmacology*. Cambridge: Polity, 2013, 27.

5 Case, Anne and Angus Deaton.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NAS*, vol. 112, no. 49, December 2015: 15078-83

6 For more on this conflation, see Robinson, T. E. and K. C. Berridge. 'The Neural Basis of Drug Craving: An Incentive-Sensitisation Theory of Addiction.' *Brain Res Reviews*, 18: 247-291

越习惯于一种环境，不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回路就越发被人遗弃并“修剪”裁去，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紧缩于一种重复-强制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周遭环境在其提供的刺激上缺乏多样性，或者它们被打乱以至于我们更倾向于从它们以外的其它渠道寻求刺激性，我们便面临着为限定的重复行为模式所幽闭的风险。由于无法产生新的神经元连接类型，一个多巴胺释放的恶性循环产生了，我们开始仅仅对触发多巴胺分泌的信号产生反应。<sup>1</sup>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设：1)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对愉悦的剥削，而且是并更是一个生产上瘾、俏皮话或别的什么的社会机器；2) 虽然第一点对于所有资本主义都成立，但更落实于当下的这种数字式的组合，竭尽所能的“扰乱”（disruption）的意识形态与认知消费主义愈加有效的算法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种以从作为基底的前脑伏隔核榨取多巴胺为基础的工业模式。这种多巴胺分泌并不为当代资本主义所特有，也不是灌输依赖性的唯一的病原因素。但是当用于制约消费的传统超我仪式受到的侵蚀为技术造成的过度刺激的无处不在所加重时，它达到了顶峰。与官僚化的、去专业化的和不稳定的工作中的不充分就业相结合，在一种格雷伯所说的“想象力的死区”（dead zones of imagination）<sup>2</sup>的环境中，渴求分散注意力成了一种标准做法。去抑制（Disinhibition）使我们能够从真实世界的混乱中撤离，进入人类学家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üll）分析为赌徒的“机器空间”（machine zone）的安全区所具有的那种消耗多巴胺、缓解焦虑的平静之中。<sup>3</sup>

当代成瘾学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换，其研究开始专注于消费的病理学和从一开始促使我们过度消费的毒性环境的类型。无需多言，资本主义显然要为这类“错位的”（dislocated）环境的产生、策划出应接不暇的文化变迁和技术体系与为确保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支持网络间的“失调”（disadjustment）负责。这一错位的后果就是使我们“无产阶级化”了，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只能被动地消费技术，而这一技术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建立一个使我们超越于仅仅日复一日地努力去适应环境的世界。<sup>4</sup>在当下环境中，物质滥用成了被迫经受无产阶级化存在僵局的人们一种“理性的”、“适应性的”反应。

5

## 资本主义与多巴胺分泌

上瘾与我们发展的神经生理学的联系意味着它的历史远远要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sup>6</sup>哲

---

1 Lewis, Marc. *The Biology of Desire: Why Addiction is Not a Disease*. London: Scribe, 2015, 189.

2 Graeber, David. *The Utopia of Rules*, London, Melville, 2015, 45.

3 Schüll, Natasha Dow. *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4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29-32.

5 Anderson, Bruce K. *The Globalisation of Addiction: A Study in the Poverty of Spir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9-60.

6 Simonti Corinne N., John Capra, et al. 'The Phenotypic Legacy of Admixture between Modern Humans and

学家卡瑟琳·马勒布（Catherine Malabou）主张“历史就是瘾史”，亦即大脑对外在世界和自身为适应这个世界而作出改变的两面性适应或习成（habituation）的历史；1是持续不断地将新的习性重新写入神经上可塑的大脑，这为使我们心理社会学上的再调整成为必需的周期性技术-环境变革波动所加剧。但是消费病理学的现代史与资本主义史大体上是共同扩张的。作为一个医学概念，上瘾伴随17至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显现，并随着生物史学家丹尼尔·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描述的一个“显著作用于精神的经济”的发展而明了。2资本主义贸易始自全球香料交易并在新的交通运输方式和酿造技术使咖啡因和之后的可卡因成为会计和财务领域中久坐工作产生的药理学条件时实现真正的扩散。3它挑起了与鸦片有关的战争，并且相互促生地开发出了吗啡和皮下注射器。从输送尼古丁的系统到按规定合成的鸦片和电视机，其它技术也在经由多巴胺系统对神经上可塑的大脑的习性进行重新编写上具有同等的决定性作用。灾难级别的18世纪英国和爱尔兰的“琴酒热”（Gin Craze）是烈酒净化法向早期工业时代刚刚城市化的、无秩序的工人们提供即刻生效的解忧功能的后果。在那之后不久，印刷工业的发展引发了对于中产阶级“阅读瘾”激增的数不清的忧虑，4而这一现象被我们过于草率地小觑为歇斯底里和隐喻式的。

我们在对“24/7封邮件”的超载的认知中、在更新订阅源和引诱点击素材中发现数字文化刺激多巴胺分泌，更不用说那些为社交媒体所开发的沉浸式的平行世界，日常生活的“游戏化”和精通算法的广告商们利用数据追踪个体消费者感受性、为他们精心打造量身定做的消费刺激的潜能。当上瘾成了利润的代名词，多巴胺分泌成了晚期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工业战略，元数据即是为一目的而累积的。在施特雷克自己的分析中，他阐述了“我们熵性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再生产”是如何为“不安的工人……向自信的消费者”的转变所确保的，这一过程因依次进行的“处理（coping）、希望（hoping）、嗑药（doping）、购物（shopping）”四阶段而可能。5多巴胺分泌和施特雷克的“嗑药”间的联系已经足够直接了，这将为了“行为-加强”和“行为-替换”、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帮助我们逃离生活的竞争而对技术的使用全部一起容纳进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多巴胺分泌是一个具有足够涵盖性的概念，它同样能将另外三个成分纳入其中。通过说服大众相信逆境解放了我们适应环境的进化了的

---

Neanderthals.’ *Science*, vol. 351, no. 6274, 2016: 737-41.

1 Malabou, Catherine. ‘The Brain of History, or, the Mentality of the Anthropocen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6, no. 1, 39-53, 46.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addictions’ appears in the closing minutes of several oral vers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Anthropocene: A New Histo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youtu.be/JkTGZ7l7jeM>

2 Smail, Daniel Lord.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83-4, 162.

3 Schivelbusch, Wolfgang.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New York: Vintage, 1993, 38-9.

4 Wellmon, Chad. *Organis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67-8.

5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2-3, 41.

趋向，“处理”涉及将不安全作为自我成长的机遇进行市场营销。对人造适应性的开发和贩卖是各式各样“嗑药”工业运营的燃料，它们包括了药物、赌博、娱乐、媒体，以及“购物”——另一著名的导致塑成习性的多巴胺释放的原因。就“希望”——创造一个关于更美好未来的信念——而言，如果我们能蒙上人们的双眼，不让他们看清原来他们并未被提供选择的自由这一事实，那么谁还需要这东西呢？将消费者的目光锁定在直接当下之中是更加经济、有效的做法：只需关注这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下一次风尚将会从哪里兴起？当然，这种做法不见得能够称心如意……

计算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来自环境的攻击和我们试图制服它的努力的欲望经济圈中最新的，或许还是最后的、终结性的阶段。它所促成的多巴胺分泌的增加对于维持用以保持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被生产出来的消费上瘾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却给这个星球带来了无力支付的代价。正如所有上瘾的典型特征，我们正见证一个虚假疗药剂量的增加仅仅使人们更沉迷于其毒性的熵循环：劳动中更新的危险性增加了更强烈的、更有目的性的麻醉药的销量，而这两者都可以夺取病人的性命。这个恶性循环能够被解开吗？接受诊断将会是一个开始。

# 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

安东尼奥·奈格里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荣休教授）

黄璐 译

## 一、数字化机器时代的劳动

在关于数字化对社会的影响的争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假设，即数字化机器的使用改变了工人和生产者，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刻地变革了生产方式以及认知和沟通的方式。关于数字化机器的心理-政治后果的讨论是如此广泛，所以它值得被牢记，尽管这项研究得出的结果还存在很多问题。

他们通常会提出工人对机器的被动臣服，普遍的异化，流行性的抑郁症特征，泰勒制算法的定义等等。在这些灾难性的新事物中，回响着一句纳粹的格言：“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向我们显现为一个将人类本质分割开来的废弃矿区。”通过询问工人的身体和思维是否能够或者可能会如何占有数字化机器来思考数字化的影响，似乎更为复杂一些。

如果数字化机器对生产者的新影响发生在资本控制的条件下，那么生产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不变资本的价值，而且在对生产效应的个人贡献和与数字化机器的合作这两种情况中他都是作为一个认知劳动力，当通过认知劳动的非物质流实现连接时，他和机器相连接并可以与机器融合。在认知劳动中，尽管活劳动在发展生产能力的时候是被制约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同时成为固定资本的材料和能动的工具来投资固定资本。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界，人们已经在数字化工作者（或认知生产者）方面谈论“固定资本的占有”。在分析数字化工作者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是“数字原住民”的生产能力时，这些主题和问题就会自发地呈现出来。它们仅仅是隐喻吗？

## 二、固定资本的占有

尤其是，它们只是政治隐喻吗？通过在生产者方面（不同于追求利润的企业）说明“固定资本的占有”，让人想起了过去 50 年里在政治和哲学领域有很大共鸣的主题。人类/机器

混合式(the hybrid human/machine)的主题在德国人类学(Helmuth Plessner, Arnold Gehlen, Heinrich Popitz)、法国唯物主义(Simondon)以及唯物女性主义(Donna Haraway and Rosi Braidotti) (cp. Braidotti 2013, Gehlen 1980, Haraway 1991, Plessner 1924, Popitz 1995, Simondon 2017)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贯穿于加塔利著作中的机械组合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千高原》(德勒兹和加塔利 1987 年合著)中的哲学结构。也许在这些哲学理论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们那些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但都是同一的唯物主义者的结构,显示出不可还原为任一过去之变体的新特征。当然,唯物主义早已放弃了从霍尔巴赫到爱尔维修的启蒙运动作家们所阐述的史诗形式,并且从 20 世纪的物理学中获得了动态特征。但是,在上述理论中,它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的印记,这一印记远非复活关于“人”的唯心主义辩护,而是以对身体以及对身体在思维和行动中的单一性和密集性的兴趣为特征。

当今唯物主义表现为一种生产理论,这种生产理论远非平衡地面向认知方面和生产本身合作性混合式的作用。那么是生产方式从物质性的生产的支配地位到非物质性的生产的霸权的这种转变,对哲学思想产生了这些影响吗?因为我不是反映论的追随者,所以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我确信唯物主义传统的这种显著变化是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固定资本的占有”是一个政治性隐喻吗?如果从这种假设出发我们提出权力(制宪权,如果需要的话)在政治角度的定义,并且固定资本的占有成为构建一个与当今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尚未到来的共产主义目的论相一致的伦理和/或政治主体的类似的基础,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

### 三、卡尔·马克思论固定资本

但是,“固定资本的占有”这个主题的发展并不总是隐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Marx 1867, 1885, 1894)中展示了,将工人置于生产资料(的控制)面前如何改变了他的生产能力、人格、天性和本体。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从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的叙述是一个经典。在工场手工业中,在劳动分工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主观的原则——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适应工人之后工人占有了生产过程;而在现代工业中,劳动分工只是“客观的”,因为对机器的主观的、手工性的使用被消除了,机器系统与人类相对立,机器成为工人的竞争者、对抗者,甚至使工人退化为一个工作着的动物。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另一个方面:他认识到工人和工作使用的工具也获得了一种混合式的结构,认识到生产过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的能动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他的生活条件”(Marx 1894, 180)。劳动生产率概念本身意味着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密切的动态联系,理论上的发现——马克思补充道——是通过工人的经验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的。我们稍后会看到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是如何预见生产者对固定资本的占有的。

现在让我们牢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都是依据《大纲》中的论断,即对作

为生产过程的实体和主体的一般智力的理论化(Marx 1857/1858, 706, 831): 这一发现表明中心认知是如何与生产相关,以及固定资本概念是如何被它改造的。当马克思断言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作为机器网络的固定资本,已经变成了“人本身”(Marx 1857/1858, 712)时,他预言了资本在我们时代中的发展。虽然固定资本只不过是资本所占有的劳动的产物;虽然被马克思称为“一般智力”的生产力和科学活动的积累被纳入到受资本控制的机器之中;最终,虽然资本无偿地占有这一切——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时刻,活劳动发挥出颠倒这种关系的力量。尽管未必能从这个过程中被单独拎出来,但活劳动在资本和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管理而言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优先权。换句话说,因为活劳动在资本控制的规训结构之外,变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会权力,作为一个越来越独立的活动——不仅仅是劳动力,而且更一般地说作为生命活动。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和它的智力积累、凝结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颠倒这一趋势,人们有能力在他们自身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固定资本在双重意义上都是“人自身”(Marx 1857/1858, 712)。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占有不再是隐喻,而是成为阶级斗争可以接纳并当作政治纲领的装置(apparatus)。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再是客观地包含生产者、凭借暴力强加其统治的关系。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现在包括一个终极的矛盾:不管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总之是已经有效地剥夺了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一个生产者、一个生产者阶级,使得自己成为霸权主体。与旧制度结构中第三等级的出现相类似,马克思将资本关系历史化,并明确地将其以爆炸性、革命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 四、劳动的社会网络和自治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点关注新的劳动人口,特别是那些工人自己在社会网络中创造的部分。这些工人的生产能力由于他们日益密切的合作而大幅度提高。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通过合作,工作越来越从资本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它自身有更大的自主组织生产,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生产的能力,即使它仍然从属于就资本而言的劳动的榨取机制。这与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初的自主工作形式的识别出的自治一样吗?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我们的假设是,现在存在着不仅仅涉及到生产过程,而且还将自己置于本体论层面之上的一定的自治——也就是说,工作即使在完全为资本主义所控制时,也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结构。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在空间上扩张并在时间中延续的生产性企业与工人方面集体合作的创造力,最终这两者一起被固定为资本榨取的价值。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困难的,除非我们摆脱线性和宿命论的方法,并采用通过装置相连接的方法。然后我们才可以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工人掌握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增殖与控制的手段日渐分离开来。工作的尊严和权力已经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它可能会拒绝强加给它的价值增殖形式,所以即便这种增殖形式处于控制之下,也仍可发展自己的自治权。

劳动权力的日益增加,不仅在合作的扩张和日益增加的自治权中,而且也在生产结构中

对劳动的社会性认知权力给予更多的重视中被确认。第一个特征是合作的扩张，这当然是由于在信息社会中数字化工作者之间直接接触的增加，但更是因为由语言和文化技能、情感能力和数字化力量所激发的“大众智力”的形成，正如 Paolo Virno 一直提出的那样。还有第二个特征：这些能力和创造力对工作的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一个巧合。因此，让我们来反思下知识的作用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史上有过多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匠的知识被生产当作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力量所雇用和吸纳，从属于一个等级制的组织结构。相反，在现代工业阶段，工人被认为不具备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因此生产是由管理层进行集中管理。在“一般智力”的当代阶段，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丰富的形式，尽管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像工匠的知识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中那样被分离出来。事实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即使成为生产的基础，工作的自我组织方式仍然是一个谜。

为了向前推进，让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在今天，一个强大的关联性劳动的作用在计算程序的运作中变得不可见。与对资本主义控制的必要性的不断宣扬，以及关于这一权力体系的不可替代性的布道一起，我们经常听到对计算程序所起作用的赞美。但是什么是计算程序？首先它是固定资本，是诞生于合作性的社会智能的机器，是“一般智力”的产物。虽然生产活动的价值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社会过程中是固定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活劳动是这个过程的根源。没有活劳动，就没有计算程序。

其次，计算程序还呈现出很多新特征。让我们来考察 Google 的网页排名，这也许是最有名的计算程序，也是最大的利润生产者。现在，一个网页的排名由其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高质量意味着这个链接指向的网页本身就具有高等级的排名。因此，网页排名是将用户对互联网对象的判断和价值衡量纳入其中的一种机制。Matteo Pasquinelli (2009,152) 写道：“网络上的每一个链接都包含了一些人类智能，那么所有的链接联合起来就包含了大量的智能。”但是，Google 的页面排名之类的计算程序的显著差异在于，工业机器是以相对固定和静态的形式凝结了过去的智能，但这些计算程序是不断地以创建一个开放和扩张的过程的方式将社会智能添加到过去的结果中。看起来似乎这种计算程序机器本身是智能的——但这并不是真的。事实是人类智力对它的不断修正。当我们说“智能机器”时，我们必须明白机器有不断吸收人类智能的能力。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由计算程序建立的榨取价值的过程本身在逐步积累的形式下是开放的，并且以这种方式进行社会化，以至于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Google 用户非常了解这一点。最后，马克思研究的生产过程和这种价值形成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在今天，合作已经不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强加的，而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引起的。今天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在自主社会控制之下的智能机器的一体化与工人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例如，与社会合作和生活再生产这两者的自我增殖相联系的、发生在计算程序的构建过程中的自主社会控制。

我们可以补充说，即使当控制论和数字化设备被投入到资本主义增殖中时，即使当社会智能为了产生顺从的主体性而被投入使用时，固定资本仍然被纳入了工人身体和大脑中，并



且变成他们的第二自然。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与资本家和机器的管理者相比，工人对机器及其体系具有更加直接和深入的知识。今天，工人对知识的占有过程变成决定性的。它们不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且在至关重要的流通和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生产性合作进一步加强和实施。工人在工作时可以占有固定资本，并且他们可以在与其他工人的社会性、共同合作和生命政治的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一个新的生产性本质，也就是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基础的新的生活形式。

## 五、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关系的变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个主题，并消除掉就算不损害我们的论证，有时似乎也会增加混乱的乌托邦主义外观，让我们分析那些研究认知资本主义的一些人如何构建固定资本占有的假设。David Harvey (2012)通过被投入使用的身体来分析大都市的街道和居所的空间，以此来研究这种占有——臣服的身体在劳动组织中既可以自主运动也可以自治，可变资本的运动对这种身体的境况和实践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然而，这种分析依然是肤浅的。更为尖锐的是 André Gorz (2010) 前段时间提出的观点，他通过强调生产的智力是在社会机构中形成的，以此推翻了剥削和异化的复杂网络。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恢复在生产中主体性/智能上的行为能力。沿着这条脉络，人们不难发现在今天“无形资本”（研究与开发、软件，但首先是教育、培训和健康）超过了有形资本在全球资本存量中的比重(Lucarelli and Vercellone 2011, 87)。固定资本现在看起来是在身体之内，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也服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就更为如此。这些工作不是与工人相分离的物质产品的凝结，而是仍然被纳入大脑，不能脱离人而存在。最后，Laurent Baronian (2013) 强调，通过回归《资本论》及其中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身体和心灵的力量被一般化在与固定资本的资格要素相联系的数字中。固定资本在这里是社会合作。在这里，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界限（即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彻底变得模糊不清了。

确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894）中关于这个问题总结的那样，如果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在流动资本这一名目之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同一的。并且，如果说对于资本家来说唯一本质的区别就是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区别，那么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在固定资本这一名目之下，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同一的，唯一本质的区别就是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因此，可变资本对重新占有各种需要的兴趣就要集中在固定资本上。

因此，活劳动合作的解放条件投入并占有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的空间和职能。

仍然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来跟进 Carlo Vercellone 和 Christian Marazzi。所谓的非物质资本或智力资本实际上本质性地体现在人类身上，因此它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对应于劳动力的智力和创造能力。在我们从工业资本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不变资本和资本的有机构成概念被推翻之前，我们发现了自己。在数学上表示资本的有机社会构成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c

/v 的关系中，恰恰是 v (劳动力) 表现为主要的固定资本，并重复 Christian Marazzi (2006) 的表述，表现为“身体-机器”。Marazzi (2006) 阐述为，这是因为除了包含劳动力外，劳动力也扮演了固定资本、生产资料的典型功能的容纳者的角色，只要它们是被编了码的知识的沉淀，历史地获得的知识，富有成效的基本原理，经验，简而言之：过去的劳动。

## 六、机械主体性

例如，可以将自发地进入数字化世界的青年描述为拥有机械主体性。我们不仅是在不同于手工操作的意义上设想机械，而且也是将其设想为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一种技术性现实。加塔利解释说，尽管在传统理解中机器问题在与工艺和技术问题相比而言时被认为是次要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机器的问题是主要的，随后才是技术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明白机器的社会性本质：“由于‘机器’向机械环境开放，并且与社会构成部分和个体的主体性保持各种关系，因此，技术机器的概念就应该被扩大到机械组合。”(Guattari 1995, 9)

机械从来都不是指一个个别的或孤立的机器，而是指一种组合。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先考虑机械系统，即连接到其他机器上并被纳入其中的机器。然后，我们再添加人类的主体性，并想象人类像被纳入人体和人类社会那样被纳入机械关系和机器。最后，加塔利与德勒兹一起将机械组合视为递进的，融入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因素以及人与非人类的单一性。加塔利与德勒兹(1987)的机械概念以及福柯的生产概念以不同的形式，在唯心论者的同一性之外，强调发展知识和行动的主体性的需要，以及展示它们是如何出现在物质上联系的生产中的需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固定资本被劳动力重新占有，也就是说当物质和非物质机器以及凝结了过去社会生产的各种知识一起被重新整合到当前合作与生产的社会主体性中时，机械就会明确地显现在主体性之中。因此，机械组合就部分地嫁接到人为的生产的概念上。一些更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 Robert Boyer (2002) 到 Christian Marazzi (2005)，都通过聚焦于与“通过商品生产商品”的传统概念 (Sraffa, 1960) 相区别的，“通过人对人的生产” (Boyer, 2002, 192)，描绘了当代经济生产的新颖性，以及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生命形式和主体性生产在资本主义增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逻辑直接导向认知的和生命政治的生产概念。机械进一步扩展了人为的模型，以便在其产生的组合中纳入各种非人类的单一性。更准确地说，当我们说固定资本由工作着的主体重新占有时，我们并不意味着它只是成为他们的财产，而是说它融入了构建主体性的机械组合之中。

机械是一个组合，一个人类和其他存在的动态组合，但是这些新的主体性的力量直到在公共财产和社会合作中得到实现和表达之前都只是虚拟的。的确，如果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也就是通过将私有财产从一个个体转给另一个，那就只是拆东墙补西

墙，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当固定资本的生产力和财富是社会性地占有时，那就是从私有财产转变到公共财产，这样机械主体的力量以及他们合作的网络就可以完全实现。机械组合的动力，合作生产性的形式以及公共财产的本体论基础就以最密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专注于公共财产，被他们合作中的机械活动规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抵制。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会产生抵抗。资本被迫承认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资本可以在经济上巩固由资本从中榨取价值的主体性所产生的那些公共财产的发展，但是公共财产只能通过抵制形式和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过程来构建。这一矛盾变得越来越清晰。资本对生产性的主体性说：“剥削你自己”。他们回答说：“我们希望自我增殖，从而支配我们自己生产的公共财产”。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没有虚拟的障碍，可以阻止冲突的到来。如果资本只能从主体性的合作和这些对剥削的抵抗中榨取价值，那么资本就不得不提高控制程度，并且为了从公共财产中榨取价值而实施比以前更多的专制和暴力的行动。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这个主题将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时期。

## References

- Baronian, Laurent. 2013. *Marx and Living Labour*. Abingdon: Routledge.
- Boyer, Robert. 2002. *La croissance, début d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ehlen, Arnold. 1980.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attari, Félix. 1995. On Machin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the Visual Arts* 6 (8): 8-12.
- Haraway, Donna. 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149-181. Abingdon: Routledge.
-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 Lucarelli, Stefano and Carlo Vercellone. 2011. Welfare Systems and So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Systematic Cri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7 (1-2): 77-97.
- Marazzi, Christian. 2006. L'amortissement du corps-machine. *Multitudes* 27: 27-36.
- Marazzi, Christian. 2005. Capitalismo digitale e modello antropogenetico di produzione. In

- Reinventare il lavoro*, ed. Jean-Louis Laville, Michele La Rosa, Christian Marazzi and Federico Chicci et al, 107-126. Rome: Sapere.
- Marx, Karl. 1857/1858. *The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867.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885. *Capital Volume II*. London: Penguin.
- Marx, Karl. 1894. *Capital Volume III*. London: Penguin.
-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Google's Page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In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ed.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152-162.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Plessner, Helmuth. 1924. Die Utopie in der Maschin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 31-4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Popitz, Heinrich. 1995. *Der Aufbruch zur artifizialen Gesellschaft. Zur Anthropologie der Techni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 Simondon, Gilbert. 2017.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raffa, Piero. 1960.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当代危机与价值的不合时宜

莫伊什·普殊同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苏振源 译 黄璐 校

I

正如英国脱欧公投和横扫欧洲的民粹主义右翼浪潮那般，唐纳德·特朗普之当选是自由民主制政治合法性深层危机的表现，其影响之深远，其潜在之危险，堪比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interwar period）。

作为不受全球新自由主义和威权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nationalism）待见的对立面，这种政治性危机有其根源，它可追溯到过去数十年的总体（overarching）结构性转型，并因 2008 年经济危机和其余波变得明显起来。除了在许多国家引发诸如“占领”（Occupy）等社会运动和民粹主义的浪潮外，这场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也促使人们尝试着批判地和包容地理解当代历史的发展。与此相关，“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也被重新引入到更为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如今，对一般智力这个概念的讨论，似乎比战后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性”概念更具分析性。

尽管如此，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并不总是自明的。我认为，不应仅仅把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视为不平等问题的规定形式，或者与此相关，视为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剥削体系，视为在近些年间频频与性别和种族结合起来的身份认同和压迫的范畴。

相反，尤其从当前的有利形势看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形式，其特征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抽象统治形式所勾勒出来，这种抽象统治形式在世界历史的运动过程中得到体现。此种生活形式在西欧偶然地兴起，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面貌，并且还继续改变并建构全世界。换言之，不同于许多广为流传的假说，这种生活形式并不内在地或本质地是西方的，而是凭其自身重新塑造了西方。因此，从文化主义的角度并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它。与此相反，我认为基于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重新解读，可以严密地建立一套恰如其分地把握这种社会生活形式之运动特征的理论。

苏联解体和中国的改革标志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適切性的终结，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没落也通过其他理论方法（比如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登场而表现出来，这些理论试图批判统治性（domination），将统治性视为宏大

人类解放道路上的陷阱。

然而，当前的全球性危机已然很清楚地揭示出，那些试图把握当代世界的新方法——包括跟那些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切入的思想家们（比如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相关联的方法——的根本局限。[它同时也暴露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所谓“文化转向”的片面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征之一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持续性存在、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这最近激起了大量右翼民粹分子的反应）、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区域（那些通过集权主义实现国家资本积累的方式仿佛已不再可能之处）发生的“过早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持续加剧的社会生活的金融化，外加民众的普遍贫困、全球范围的结构性剥削、不平等现象的显著增多以及首当其冲的由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working society*）空心化所带来的双重危机：这些问题令人质疑新自由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高唱的凯歌。“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垮台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繁荣，都无法充分满足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需要。

不过，认为可以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就像在 20 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马克思被普遍理解的那样）是会误入歧途的。不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退场，还是日益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诸多不切实际之处，它们都扎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表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解读马克思。

## ||

我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运动特征的关注，是试图去回应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总体转型模式（*pattern*）。众所周知，诸如皮凯蒂（*Piketty*）等研究者，其关注点是不平等问题，他们最近已然建立起一套关于不平等现象的总体性的、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历史演变模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剧烈的不平等，演变为 20 世纪中叶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减少，随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又出现了急剧的不平等现象增加的回潮。

这个模式不仅揭示了当今世界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度扭曲，也促使人们质疑用线性发展观（*linear terms*）衡量现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例如像现代化理论论证的那样。

重要的是，这个关于不平等现象的演变模式跟另外一个总体性模式有着平行的结构。比如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速率在上世纪前半叶来说相对较低，随后在 20 世纪中期翻了一番——这也是不平等现象最少的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不平等现象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增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 GDP 的变化率也遵从类似的模式。

这些模式（以及其他的模式）似乎有着内在关联。它们可被视为对一个范围更广的模式参照——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ic*）对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压制：从一战和俄国革命开始兴起的福特制资本主义（*Fordist capitalism*），到二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其顶点，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迈入衰退，随后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反压制。

这条运动轨迹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全球性特征。它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去殖民化国家都囊括在内。尽管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形势有利的转折点处产生了显著的差异，但这些差异看起来更像是一般模式中的变调（*inflections*），而非根本性的改变。这并非说该模式就是均质或者模块化的（*modular*）。对其中不平衡性（*unevenness*）的理解，取决于对现代性总体历史发展的理解。

从偶然性的角度（*contingent terms*）看来，这个一般发展过程的存在性并不能令人信服地阐明。偶然论者强烈主张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之决策的一般结构性限制的存在，以及不能完全臣服于政治控制之动力（*dynamic forces*）的存在。

[这些一般的模式也表明，过去数十年间对行为主体及偶然性的理论关注，跟被它所取而代之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是片面的。如果说后者是国家中心资本主义的通货，那么前者在新自由主义阶段也发挥类似功能。此两者都未将其自身与其历史语境的关系主题化（*thematized*）。批判理论应不同于这些方法，应使自身历史情境问题化（*problematize*）。换言之，批判理论应当是反思性的。]

这些总体性的模式表明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结合的重要性，因为关于历史运动和全球结构性转变的总问题，在此批判中处于核心位置。尽管如此，如同我们上面提到的，上世纪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一种合适的批判理论应当根本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我说的是那种一般的解释框架：把资本主义放到根植于私有财产、并被市场所调节阶级关系里边，对它加以本质性的分析，同时把社会统治首要地理解为阶级统治和剥削。

在这个基本框架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并由此衍生出强有力的经济、政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尽管如此，随着 20 世纪历史的发展，此总体性框架本身的局限也日渐变得明显。这些历史的发展包括“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义”的非解放特征、跟国家干预资本主义（*state-interventionist capitalism*）亦步亦趋的上升和下降的历史运动轨迹——这表明它们有着历史同构性（*similarly situated historically*）、重要性日益增加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似乎引起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关注）、对科技进步和发展日益增多的批判（这与多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相对立）、以及重要性日益增加的非阶级的社会认同。它们一道表明，传统的框架已然不能再当作一套合适的批判理论的出发点。

我确实认为，在过去数十年的批判性政治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框架已然给人带来一种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的感觉（至少潜在地如此）。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危机中，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个建立在工业劳动上之社会的观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设想，开始在诸多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的想象界中失去阵地。这种不合时宜感被频繁地察觉到却未被清晰地理论化。但是我要说的是，它在如下情境中被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劳动和工业增长的普遍批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支持率的下降、这些政党日渐迷失其前进方向、重新定位革命主体（比如在反殖民化运动中）的尝试。

其中仍然难以捉摸的是对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新型想象，这不仅牵扯到重新估量分配关系（包括财产关系）的问题，也包括生产关系本身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劳动的本质问题。这种想象的缺场拖了进步运动的后腿。

把这些问题暂且搁置，我现在要说的是，基于对描述过去一个世纪的一般历史模式的考量，肯定劳动和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将历史本质理解为偶然性的后结构主义都备受质疑。尽管如此，这种考量并不必然否定尝试以偶然性的方式分析历史的批判性视角——被理解为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展露（*unfolding*）的历史，勾勒出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这种不自由的形式（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对象，它把历史运动的特征和现代世界的结构性变化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具体的、历史的强制性和限定性条件上。远不同于把历史看作自我确证的，马克思把其有方向性的运动过程建立在资本范畴上，并由此从统治形式、从他律性（*heteronomy*）的角度予以把握。

在这个框架里，马克思不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站在历史和劳动的立场上着手进行批判。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以及看似本体论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劳动，已经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同理可得，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不再试图成为一种关于历史社会生活的超历史性（*transhistorically*）有效的理论，它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并且引起人们对任何宣称其自身为普世的、超历史有效的方法的质疑。[较之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些马克思分析方法的核心维度，使得它更能契合我们当下的历史语境。]

应当指明根据我们的解读，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批判性推进在一些方面跟结构主义者的方法颇为相似，因为前者也涉及对总体性和历史辩证逻辑的批判。然而马克思是把这些概念当作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手段，而后结构主义者则通过强调本体论上偶然性的优位来否定其的有效性。以马克思对他律性历史的批判视角看来，任何试图否认或遮掩资本动态的统治形式，通过强调偶然性找回历史主体的方式，讽刺而深刻地说来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disempowering*）。

### III

这些争论，是以重新解读和重新思考马克思最为基本的诸范畴为基础的，那些范畴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他律性运动过程的成熟批判中。在传统框架里，马克思的诸多范畴——例如价值、商品、剩余价值和资本——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范畴，传统框架把劳动看作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并以此论证阶级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

这种解释认为马克思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以一种超历史性的理解姿态，把劳动当作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按照传统理论的思路，因为资本主义把剩余价值分配给资产阶级，劳动便受到了剥削。由此劳动受到财产关系的妨碍而不能完全实现自身。那么解放必须在这样的社会才能实现：在那里，超历史性的劳动已然以调节社会原则的公开姿态登场。这个观念毫



无疑问是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跟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在此间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

然而，对于马克思成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解读，使得我们去质疑传统解读里这种超历史性的解释。马克思在《大纲》(Grundrisse)中明确指出，他诸多的基本范畴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根据他的说法，即便某些范畴（诸如货币和劳动等）由于其抽象性和一般性特征，看起来是超历史性的，但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抽象一般性(abstract generality)才有效。

这使得我们反思许多对马克思诸范畴的解读。我将简要地提到《资本论》第一卷，以勾勒一种异质于传统解读之理论的大致轮廓。这部著作从商品(commodity)范畴开始讲起，但它并不谈及各种不同社会的具体商品(commodities)。相反，马克思用商品这个术语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调节和结构化(structuring)原则的基本形式。按马克思的理解，这个形式通过历史的、具体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勾勒出来。随后，他试图通过这个基本结构化形式的二重性来展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和内在运动过程。他分析过程的核心理念是，劳动在资本主义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社会调节功能，这种功能并非超历史地内在于劳动活动(laboring activity)中。

在商品作为基础性的整体结构化范畴的社会里，劳动及其产品并不依据传统的规范加以分配，或者像在其他社会形式中那样，公然暴露它同权力及统治的关系。相反，劳动自身构成了一种新的相互依赖的形式，人们不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而反过来，他们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只是作为一种准对象化的(quasi-objective)、从他人那里获取产品的手段。作为如是手段，劳动及其产品事实上替代部分显明的社会关系发挥功能；他们是调节一种社会联系的新形式。

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里，劳动在社会生活占据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并非是个超历史性的预设。相反，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历史的、具体的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调节形式，这个形式从根本上勾勒出社会的面貌。通过展现这种调节方式，马克思试图以社会性的视角建立并阐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比如其总体性的历史运动过程。

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既是我们超历史地和常识意义上理解的劳动，也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调节活动。因此，劳动生产出来的诸对象(objectifications)——这里我指的是商品和资本——既是具体劳动产品，也是社会调节的对象化形式。按照他的分析，最能从根本上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那些社会关系，迥然不同于那些具体定性的(qualitatively specific)、形态多样的(variegated)和彰明较著的(overt)社会关系(比如亲属关系或人格关系或直接的统治)，后者勾勒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由劳动构成的，它们有着奇特的准对象性和形式化(formal)特征，并且是二重性的——既有抽象、一般、均质化(homogeneous)的维度，也有具体、特殊、异质化的(material)维度，这两个维度都看似“自然”而非社会的[以及影响着自然实在(natural reality)的社会

性概念]。

马克思认为,把财富跟这些关系联系到一起的形式,就是价值——这个概念也是历史的、具体的。许多研究者仍然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混同于斯密或李嘉图的价值范畴,后者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构成财富的超历史性范畴。马克思有意地改良并使得政治经济学激进化,通过使用它的范畴,以证明剥削的存在。然而这种通常的理解是建立在根本性的误读上面的。马克思并不简单地改良并使得政治经济学激进化。他不是要写一部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而是对政治经济学提出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换言之,它转换了分析的对象和本质。它最重要的并不是交换或者甚至是不平等的交换及剥削。相反,马克思运用这些范畴去揭示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分析其动态发展及其可能的走向。

在他的成熟著作里,马克思明确区分价值——作为资本主义中历史的、具体的财富的结构化形式——和他所称的物质财富,其中后者是通过已生产的总额(amount produced)来衡量的,并且除了劳动以外,发挥着知识、社会组织和自然条件的功能。按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它是单独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构成的。

在马克思分析的框架内,区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形式二重性产生出一种辩证互动,它导致一种复杂的时间性运动的产生:这种运动驱使价值向前发展,并最终使其日益不合时宜。宣称价值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历史的、具体的,意味着宣称不仅仅只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不由价值所结构化,也意味着宣称后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不需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这反过来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价值将变得日益不合时宜。

现在我要开始作进一步阐明,我从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量开始说起。这个说法并不简单是描述性的,而是勾勒出社会现实中一般的强制性规范。倘若要获取其产品的全部价值,生产就必须服从这个时间性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单位(比如一个小时)被建构为独立的变量。每个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是这个单位时间独立的功效;不管是在个体变量层面还是生产力层面皆是如此。由此可以推出——在此间价值的特性是作为财富的时间形式——尽管个别生产力的提高使其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总量提高,它只能在短期内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价值量。一旦生产力普遍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价值量回落到其原来的水平。其结果宛如一台跑步机(treadmill):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导致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并不能长期、均衡地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价值;这将倒逼更进一步的生产力的提升。

此种跑步机式的运动过程体现并建构了社会统治的新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是《资本论》中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统治抽象形式的首要决定性条件:它以时间统治人,以历史的、具体的时间性形式(form of temporality)——抽象的牛顿物理学时间——历史地通过商品形式被构建起来。

但是单单从牛顿物理学时间的角度——即将其视为空洞的均质化时间(如同本雅明那样)——来看待资本主义中的时间性问题是片面的。一旦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其时间性形式将使

得生产力实现持续提升。可是这些提升，如同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并不改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但是它们确乎改变了如何计算单位时间的规定要素。单位（抽象）时间是持续不断的；同样单位的时间产生同样的价值量。然而对生产力的改变重新规定了时间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它向前推进。这个运动是时间的运动（one of time）。因此我们不能从牛顿物理学时间的框架来把握，而需要可容纳牛顿物理学时间框架的更高层级的框架。这个时间的运动可被命名为“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对这种抽象的、持续的单位时间的重新规定的同时，也重新规定了跟此单位联系在一起的强制力。于是乎，时间的运动打开一个必然性的维度。历史时间在此并不代表对抽象时间的否定（如同卢卡奇那样）。相反，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辩证地关联在一起。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个框架里，两种时间性形式都不单纯建立在文化上；相反，它们都是历史性建构过程中的诸环节（moments）。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它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发展而浮出水面，借助于资本主义中的环节它们被建构为统治的结构。

比起把时间性看作一个预先给定的、不变的框架，并将所有社会生活的形式安置其中，上述的理论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它以此种方式建构自身历史的、具体的时间性；它由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各种社会调节形式所建构，而这些社会调节形式本质上就是时间性的。这些形式构成特定的历史运动，这个运动既是历史的、具体的，也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并不是外在于其自身，而内嵌于其起着结构化作用的各种社会形式本身。

这种历史上新型的社会统治形式将人置于非人的、日益理性化的、结构性的强制和限定中，这些强制和限定并不能完全从阶级统治的视角加以把握，或者更一般说来，从具体的社会群体或者国家（以及/或者经济）的建制性机构的统治加以把握。它没有决定性的支点，尽管它由确定的社会实践诸形式所建构，却看似不在社会之中。我要说的是，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分析内容比起福柯试图以权力概念把握的现代世界的东西，要更为缜密和明确。除此之外，马克思所分析的统治形式不只是跟福柯那样是细胞性和空间性的，而且是过程性和时间性的——它产生出一种历史运动的过程。比起预先假定历史的本质，马克思如今试图把持续不断的历史运动过程的基础建立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上面。换言之，它把历史总体（History）历史化了。

处于这个分析核心的，是我已经勾勒出来的特殊的跑步机式的运动过程，它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运动过程的基础，这个运动过程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一方面，它为持续不断的、甚至是加速发展的生活领域（生产、科技、居住模式、交通、交流、教育和人际关系的形式）里面日益增多的转变所勾勒。可是同时，它重构着它自身的基础：价值仍是财富的本质形式，以及因此，不管生产力层面如何，创造价值的劳动也仍处于体系的核心位置。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再生产（regenerating）着“相同”东西的同时，也无休止地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我将进一步说明，它同时产生另一种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方

式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它又阻碍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由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辩证法所产生的运动过程是资本范畴的核心，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指的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反，它是运动的范畴，马克思称之为“自我增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它没有凝固不变的物质化身，而是在我们上面简单勾勒出来的转换和重构的辩证运动中展露自身。

在这个框架里，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关系”是社会调节的诸形式，它们在诸如商品、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中体现出来。这些范畴并不是财富的诸范畴，后者是通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的目标。与通常看法相反，这些范畴内在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即作为一个复杂运动过程之基础的、时间上运动的、富有矛盾性的社会调节诸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第一次介绍资本范畴的时候，他描述资本时所使用的语言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及精神的语言是相同的——自我运动的作为主体的实体。马克思通过这种方式表明，黑格尔那种历史因循逻辑、作为大写主体（Subject）在辩证运动中展露自身的观念确实是有效的——但只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有效。除此之外，马克思并没有把大写主体跟无产阶级或者甚至跟人类等同起来。与此相反，马克思把它与资本等同，把它视为抽象统治的动态结构，这个结构尽管由人类所建构起来，却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产生某种历史运动过程。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成熟批判，并不涉及对后者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一种人类学倒置。相反，马克思如今明确主张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恰是其唯心主义的特性。它体现出一种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由关系所建构，这些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获得了一种准独立性（quasi-independent）的存在，对他们产生一种强制的形式，并由于其二重性，它们有着辩证的特性。

在这个框架里，黑格尔所展现的总体历史是历史的、具体的。它不是人类社会生活普适性的特征，而是被历史的、具体的实践形式所建构起来的，它又反过来调制和限定这些实践形式。这表明，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不能超历史性地被勾勒出来，不管是黑格尔那种总体逻辑的方式，或者以尼采那种超历史性的偶然。相反，一种内在驱动的、有方向性的运动过程，是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需要在此指出，历史的大写主体、总体性和建构它们的劳动，已然成为马克思成熟理论的批判对象，而非其逻辑起点。]

如上勾勒出来的对资本主义复杂运动过程的理解，有助于驱散当代双重危机（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的退场）的阴霾。马克思剩余价值和资本的范畴，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增长轨迹的批判性（而非技术性的）社会分析。价值的时间性维度，特别是马克思所称的相对剩余价值，构成了“增长”决定性模式的基础，这种“增长”模式由持续不断的、甚至是加速发展的生产力的提升的推力而驱动着。这导致相对于剩余价值（它仍在资本主义中作为实质性的剩余形式）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加倍增长；这还导致了对原材料及能源需求的增加，

并集中地带来对自然环境的加速破坏。在这个框架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危机四伏；相反这种增长形式本身就成问题。这表明，倘若生产的最终目标是产品数量的增加而非剩余价值的增加，增长轨迹将有所不同。

从这个理论框架内部看来，在这个问题植根于价值；价值作为财富的时间性形式，它把生产转化为一个特殊的过程，借助于这个过程，物质被转化为抽象的时间单位。作为财富的时间性形式，资本试图实现无边界的扩张，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忽视了其自然环境，其所在的星球的必然性边界。

这个理论方法通过考虑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为社会性地分析其社会劳动和生产的结构提供基础。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生产力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导致生产中科学与技术重要性的上升。这里所涉及的是社会一般智力的迅速积累，这也是由资本的运动过程所推进的。那个把生产奠基于劳动时间（即奠基于价值、奠基于工人阶级的劳动）上面的历史发展趋势变得日渐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这也在社会上开启了更大范围的对劳动时间的普遍减少，以及在自然和社会劳动组织中的根本性改变，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扬弃并不涉及工人阶级的自我实现，而涉及其自我扬弃（self-abolition）<sup>1</sup>。

可是，由于转化和重构的辩证运动不仅仅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也重新建构价值，因此它也结构性地重新建构着创造价值之劳动（也就是无产阶级劳动）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日渐超越无产阶级劳动的必要性，同时它又在重构着这种必要性。它既产生出另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也掩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这种张力扭曲了历史可能性登场的形式。最终，持续不断重构资本的基本形式导致扬弃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性以一种倒置的形式呈现出来：日渐增加的过剩劳动，范围日益增大的过剩工作人口，不断增多的待业者、永久性失业者和不稳定无产者（precarariat）。扬弃无产阶级劳动的可能性，以及在一个剩余价值生产不再必然地建立于下层阶级之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中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同时意味着一种灾难性发展的登场：日渐增多的过剩劳动表现为日渐增多的过剩人口，这牵涉到令人不安的种种政治可能性。

我所勾勒出来的这种理论方法表明，可如是理解当前资本主义构型（configuration）：在其中创造价值的劳动变得日渐不合时宜，但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又是必要结构。这或许也可阐明当前金融化的中心问题。它或可表明，金融化的某些维度也超出了资本主义之外（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悖论）——比如在这些真正全球化手段的发展进程中：协调生产和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神经系统和肌肉、非国际性而是超国家性质的全球协调网络。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并没有指向资本主义之外，而是相反，它们可被视为在资本主义遭遇到限制时仍努力维持资本存在的形式。

我想要提议——所有的这些都不过只是个提议——我们可以把高效生产的、后战争时期

---

<sup>1</sup> 英文中 abolition 与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不同，但此二者在 1888 年的《资本论》英译本被混同起来。本文作者也在此意义上使用 abolition 一词：“日渐超越工人阶级劳动的必要性，同时它又在重构着这种必要性。”故而在此译为“扬弃”，以下译为“扬弃”的地方俱是 abolition。——译者注

凯恩斯-福特制 (Keynesian-Fordist) 的资本主义构型四面楚歌的下场, 看作是价值增值现实危机的体现。面对这个发展状况, 资本不仅仅试图颠覆 (reverse) 先前福特制下的劳动所得, 而且还要寻找新的产生财富的形式。然而在此框架下, 现在的金融化也不同于过去的金融化, 因为当前债务经济的扩张, 会在对抗剩余价值生产停滞的背景中出场。

为了应对这种停滞, 广为人知的诸多措施包括: 弱化联合体 (weakening of unions)、生产向低工资水平地区转移、用技术取代劳动。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在这些变化当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经济债务的扩张视为一种开发新的生财之道的尝试。这种方式本身不必然是新的。然而马克思对价值变得不合时宜的趋势的分析, 能够让我们看清当前金融资本的构型。宽泛地说来, 债务指的是表意明确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信用票据。它的潜台词是, 假定未来的某个时刻, 能够有足够的财富偿清债务。但是, 如果在应对剩余价值生产停滞的背景中理解当前债务经济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金融资本可视为一种重新构建其财富生产王国的尝试。被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信用票据以及元信用 (meta-promissory) 的“工具”正朝着未来的地平线迈进。然而在价值理论框架内, 这条地平线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停滞而逐渐隐退; 在作为基础的价值形式中, 最终没有足够的财富可被生产出来偿还债务。

其造成的结果之一, 就是日渐狂热地将所有可能的东西转化为未来财富资源的尝试。曾经清晰明了并且直截了当的债务形式——例如抵押——变得“金融化”了——即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财富的原材料来对待, 这种财富被假定能在未来得到开发。生活越来越多层面的内容——从抵押贷款到基础设施——被转换为这个所谓新财富形式的内容。

在这个解释性的框架里, 价值生产的危机被金融性调节的措施所遮蔽; 这些措施意在把生活越来越多层面的内容转化为价格和利润的“原材料”——转化为所谓财富的形式, 而这种财富被假定能够担保日渐复杂的所谓的金融产品 (financial instruments), 仿佛这种“财富”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的。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所称的“剥夺式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是对这个发展过程的宣示。然而, 我认为它没有涵盖价值的积累, 而只是抽离所谓财富以填补这种积累之空缺 (absence) 的理论模型。它可被理解为一种在由价值所构建的框架中扬弃价值的无意识 (unintentional) 的努力。价值积累的速度越慢, 就越要绞尽脑汁地搜刮财富, 就像自免疫 (autoimmune) 病症——它开始蚕食社会和自然的根基。

## IV

我所描述的是一个根本性的体系危机, 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基础, 在变得不合时宜的同时又保持着其自身的必要性。这产生巨大的阻断性压力 (shearing pressures), 并潜在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也表明, 诸如阶级 (或性别或种族) 等范畴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流变不居, 被资本主义的动力流建构和重新建构。

顺带一提，在这个框架里，除了资本主义之外，社会生活其他的可能形式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的。它不是源自于不同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文化交往或者人种学研究；也不建立在如是的经验性假设上：我们先前社会秩序的道德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破坏了——尽管这种经验性假设也确实产生出了对立面。然而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并不必然性地超出其界限。它能够（而且也经常已经被）资本自身所吸收，或者搁置一旁，认为不再能够应对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相较于指向转变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分析不太言及“抵抗”的发生（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是含义不清的）。它试图勾勒这样一种生活形式：作为资本主义运动过程的结果，它由某种历史可能性所构成，然而却还受限于特定的运动过程不得实现。这个“是”(what is)和“能够是”(what could be)的鸿沟，使得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可在历史上日渐成真。它揭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历史的具体的特征——不仅面向过去或另一种社会，而且面向可能的未来。

正是作为人类能力的对象化的资本产生了这种未来社会的可能性。然而它同时又通过毁灭自然和劳动人口的方式来实现。在此处勾勒出来的框架内，在缺乏共识性的超越价值之未来（即后无产阶级未来）的想象的情况下，价值日益不合时宜的特性已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上带来规模巨大的毁灭性后果。正是资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迫使我们面临日渐严峻的选择：社会主义或者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

[容纳另外一种社会形式的矛盾，也允许存在着想象另外一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这建立在当下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又力图超出这个基础。换言之，它允许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批判理论的可能性。通过把当前现实把握为矛盾的运动过程，这个理论变成自反思性质的。它通过把握其对象的相同范畴，建立自身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批判的条件和转变的条件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样一套理论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的尝试置于批判理论之下，它们能够考虑其自身存在条件的历史可能性。]

[根据我所描述的，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越了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传统批判。它不仅仅批判剥削以及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分配；相反，它把现代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自身看成资本家，并首先从抽象的统治结构、个体劳动和个体存在日益加剧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以及盲目的、失去控制的发展逻辑来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它把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而非其否定性的具身化（embodiment），并从扬弃无产阶级和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基础上之生产组织的角度，以及从扬弃资本主义抽象强制运动体系的角度，含蓄地将社会主义概念化（conceptualizes）了。]

[通过把批判的焦点从跟市场及私有财产的外在关联中转移开来，这个理论方法能够提供如是一种批判理论的基础：它把那些“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一种替代性的（以及失败的）资本主义积累形式，而不是对资本的历史性否定（不管是多么不完美的形式）。]

[通过从只根据不平等分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理解资本主义的视角中抽身而出，这个理论方法表明全球性的不平等不应当只从分配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而要从我们

上面简要描述的运动过程来指明。]

我还没有在此进一步说明，这些范畴不应只从经济的角度解读，用马克思的术语，它们还应从存在形式（Daseinsformen），从存在方式的诸规定（Existenzbestimmungen）<sup>1</sup>来解读，这意味着他们也被理解为文化范畴，比如这些范畴包括规定性的世界观和人格概念。但我想说的是，通过把超越资本和超越无产阶级劳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解释能开始触及后无产阶级的自我理解及其主体性的历史登场。它打开一种理论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能够历史地反映近几十年来新型的社会运动和在其中表现出来的、被历史地建构的世界观。它也能够分析“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s）在全球范围的抬头，它是一种作为民粹主义，迷恋于跟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对立的诸多形式，这些新形式把其自身误认为古老的和可靠的。

## V

回过头来看，如下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资本霸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构型在历史上是多种多样的——从重商主义，经过 19 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和 20 世纪的国家中心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每种构型都遭受许多入木三分的批判——比如，对剥削和不平等的批判，对不均衡发展（inequitable growth）的批判，或者对技术化官僚制的批判，或者对日渐增多的不平等现象的批判。

然而每种批判都是偏颇的。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构型。

尽管有些复杂，我已经在这两种理论方法中作出区分：一种最终立足于对资本某种历史性构型的批判；另一种是将资本理解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并将它跟表面上形态各异的构型分离开来。

以上这两种方法的区分已经变得日趋重要。将两者混同起来已经导致严重的误认。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主张：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不能像早前的革命那般盯着过去不放，而误认其自己的历史语境。在此意义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比如瓦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天使，即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退回到一个它没能把握住的未来。比起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它包藏着一种误认：盯着私有财产和市场不放，把资本跟 19 世纪的资本构型混同起来。其结果是暗地里认同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构型。

---

<sup>1</sup> 依据该作者另一篇论文（Postone, Moishe. Lukács and the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A]. in *New Dialec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3.pp.78-100）的说法，Daseinsformen(forms of Dasein)和 Existenzbestimmungen(determinations of the mode of existence)两个术语引自 Penguin 出版社 1973 版的《大纲》第 106 页，作者对英文翻译作了改动。查阅英文版原文只能找到前一个术语，在此对应中译本译作“存在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 30 卷，261 页）；后一个术语根据作者英文意义译出。——译者注



到更晚近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对资本主义新构型的认同，在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反对黑格尔、回到尼采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体现出来。这种思潮同样是回到一种它不能充分把握的未来。通过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暗中认同的国家中心的秩序，它在批判性地把握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这种秩序已然超越国家中心的资本主义，超越东方和西方之别）中未能一视同仁。

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性转变并非只是暴露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各式各样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形式的软肋，也表明了今天资本主义批判对于批判理论的核心性意义。

通过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的概念，将其视为区别于表面构型的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我试图对今天有待完善（robust）的资本主义批判做些重构的工作，去解开其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它历史上的其中一种构型）概念上的束缚，使其尽可能地更切合我们的社会经验现实。

# 电子评估的数据，相互关联的自我

温迪·全

(美国布朗大学现代文化媒介中心)

雷禹 王嘉译

- 1、相关性，相关性，相关性 (correlation)
- 2、习惯的同质性 (Homophily)
- 3、共同联系 (co-relation) vs. 相互关联/相关性 (correlation)

感谢会议组织者！

今天，我将透过大数据的镜头来思考数字技术和计算资本问题：

- 尤其是透过“用户生成”的价值 (user-generated value) 的镜头，即作为价值的用户

我的论证如下：只有通过一种能够储存和相互关联的庞大装置，数据才具价值

- 一台算法相互关联的装置，它将所有的行为——以前被认为是独特的甚至是噪音行为——连接到一种集体的、习惯性行为的颤动的网络之中
- 一个多头嵌合体网络

这种相关性的碎片与它的联合一样。

- 因此，现在如果我们看起来面临正在升起的怒火、恐惧和憎恨→如果现在看起来可能说出点什么，这在 10 年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 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

部分是由于以下原因：

关于爱的深刻转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友情和邻里关系

- 友情和邻里关系两者在线上和线下把我们分隔开，这不是以恨之名，而是以爱之名

这种相互关联并不新奇——在相互关联的自我的背后，发现潜在的相似性和结果的梦想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所以，让我来用这个——一个我后面还会再回来讨论的东西——与大家开个玩笑吧：

第一个图表用来建立作为统计整体的相关性

- 被弗朗西斯·加尔顿 (Francis Galton) 先生所绘出，为生物统计学家和有声学家所注意

- 这处于卡尔·皮尔森的遗传特征的规律 (the law of inherited characteristics) 的“发现”的核心

- 是皮尔森关于相关性 (correlation) 研究的核心

- 也是皮尔森为繁衍更加优秀的人口而呼吁的民族主义优生学的核心

必须清楚的是：我认为任何使用统计学或相关性都不是天生的优生学，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已经嵌入进其默认状态的历史

- 这种历史——这些工具——虽然是与美国社交媒体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已经扩展得远远超过了它

- 他们已经成为了网络科学的默认状态了。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想象新的工具：

- 创造新的算法，新的默认状态

- 形成跨越所有学科的广大联合，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 我们必须努力应对这些方式，这就是我们已经在所谓的大数据的剧本中已经成为的角色的方式。

OK！那么以这个框架准备就绪，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

相关性，相关性，相关性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大数据界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 《经济学人》最近宣称：数据就是新石油

- IBM 宣称：如果 20 世纪是大科学的时代，那么 21 世纪就是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依赖于相关性：

- 依赖于发现和运用经常隐藏的（潜在的）变量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 依赖于确定互相依存关系

大数据，据称是如此的大(BIG)，如此的与众不同，因为它利用的是相关性(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性 (causality) 来预测未来

- 通过揭示“就在那里”真正存在着的联系，据称它打开了一扇扇新的门和各种可能性

这个观点是被奇怪的编辑克里斯·安德森 (Chris Anderson) 最富争议地提出来的，他认为：由于我们拥有了“所有的数据”，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科学的方法：

- 理论已死

争议较少的观点由库基尔 (Cukier) 和迈尔-勋伯格 (Mayer-Schoneberger) 提出，

他们认为：在我们能够处理整个的数据集（dataset）的情况下，大数据就将使我们关心的焦点从为何（why）转移到了如何（how）

- 理论已死源于因果性已死
- “大数据的相关性将一贯地用来证明我们的因果关系的直觉是虚假的，这表明如果结果与其假定的原因之间任何的统计性关系并没有什么关系。”
- 取代原因，我们拥有的是实际的相关性，确实存在着相关性，能够让我们预测未来
- 大数据将我们从人类的偏见——因果性理论——中释放出来
- “大数据泰然自若地重塑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考的方式。一种建立于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之上的世界观受到了具有数量优势的相关性的挑战。拥有知识曾一度意味着是理解过去，现在却正意味着能够预测未来。”

然而，这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相关性所带来的影响？

库基尔和迈尔-勋伯格谈到了谷歌研究，这表明某些检索与流感的传播有很强的相关性

另一种具体的、更小的数据的例子如下：

一个最近的研究表明，基于他们的脸书的点赞（facebook likes）功能，预测一个人的种族、政治观和性别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正如科辛斯基（Kosinski）以及其他研究者在 201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一篇很高引用和很大影响的论文中所揭示的那样

- 基于公共可得的信息，来确认（鉴定）——用户的种族、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真的是很容易的
  - 2013 年脸书的点赞是公开的→私密的
- 重要的是，他们得出的预测不仅是针对身体特征
- 种族和性别

而且也针对心理特征：

- 58466 名志愿者填写了关于个性的问卷，研究者随后将其关联为不同的个性类型

现在，如果这些类别看起来很眼熟，且科辛斯基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很耳熟，那是因为由于他的研究涉嫌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有相关而变得声名狼藉

- 当然，基于科辛斯基的工作，剑桥分析公司曾被指控通过他们的心理分析而对英国脱欧和 2016 年美国大选施加影响
- 剑桥分析公司已经否认了这种关系

现在，为了获得这些结果，研究者主要创建了一个广阔的用户点赞矩阵（user-like matrix），并随后将其分为 100 个最具关联的成分。

这里，你将看到对“智商”最具相关性的“点赞”（likes for IQ）：

- 更进一步地观察
- 阶级、性别

重要的是→你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你的行动是孤立的，而是因为你的行动与他人相关联：

- 当且仅当以被视为“喜欢你”来认证赞成或反对他人的时候，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对于预测和身份证明来说也是有用的
- 通过你的邻居——被视为喜欢你的人，他们喜爱你所喜爱的东西（厌恶你所厌恶）——即他们使处于沉默，用户也被俘获了。

科辛斯基利用一组初始参数（initial training）的用户和点赞，以提出加权的相关性矩阵（weighted correlation matrix）

- 随后这将被用于预测他人的身份

在他们 2015 年的文章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在文中，他们为匹配个性类型而展示了他们的方法论

- 使用他们 90%的数据来作为一个训练集，以建立一种线性回归模型
- 以剩余 10%的数据来测试
- 通过测定这些明显的行为，他们以此预测你的身份——个性类型（潜在阶级）

因此——在线的自我是独立的，同样，离线的自我却并不孤单：

- 你（YOU）总是单数的复数（singular plural）
- 你（YOU）总是单数的复数，是因为你的行为与喜欢你的人相关

你的身体从来不是简单的单数，而是复数，因为在这种数据算法中，相似点和相关性相符合

正是由于此，从来就没有什么噪音（noise），有的只是信号（signal）

正是出于此，因果性不再被相关性所取代，而是因果性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传统的因果性就是相关性，相关性，相关性！

也就是说——我要为这个问题的晦涩抱歉——因果性，正如休谟所论证的，只是出于习惯（habit），不再是与个人的习惯有关，而是与整个邻里的习惯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休谟能够论证，那是因为习惯是基于“总是”（always）：

- 所以休谟在他解释因果性的时候，在经验和习惯之间做了区分

对于休谟和德勒兹来说，因果性——这里我将引用德勒兹对休谟的解读《经验与主体性》（*Experience and Subjectivity*）——并不遵循“确定性的基础”（不是基于“直观”（intuition）或“证明”（demonstration））而是遵循着“可能性”（probabilities）的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因果性来源于可能性，而是说因果性是逐渐地、习惯地形成的。

习惯是理性的根源。习惯允许心灵超越经验：推出经验，“因为习惯将信念（belief）

转化为关于理解的一种可能的行为。”

因此，因果性既是“相似对象的联合，也是从一个对象到另一对象的脑力推理。”

至关重要的是，尽管习惯和经验并不是——确实不是——总是联合在一起的，对于休谟来说，习惯能够歪曲经验：它能撒谎

这就是可能性和经验介入之处：

为了改正这些信念，理解通过一个矫正的原则介入，这个原则将信念限制在过去经验的界线之中——限制在“哲学可能性的规则或者概率分布（calculus of probability）的规则”之中，因此，尽管“信念、推论（inference）和推理（reasoning）的特点是超越经验以及将过去转化为未来；……然而信念的对象依然有必要与过去的经验保持一致。”

但是这种过去的经验——矫正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在集体的规模上是习惯的

因此，大数据——更一般地，数据分析（DA）——并不消灭因果性，毋宁说它通过使得经验变为集体的习惯性而扩展了因果性：

- 将我们相互联系为一个巨大的嵌合体
- 以至于一个单一的行动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表明了一个更大的状态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正如“街坊”（neighborhood）这一术语所阐明的那样，这种相互联系——网络科学及作为其源泉的大数据——通过深远的聚集和隔离（clustering and segregation）来实现。

#### 1、网络科学和习惯的同质性

Ok！因此——十分简短地说——什么是网络科学呢？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网络科学抓住——也即是说，分析、链接（articulate）、施加、利用、阐述——的是联系（connection）。<sup>i</sup>

- 这是一种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管理、分析、解释和呈现的研究。<sup>ii</sup>

被描述为基础性地跨学科，它将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

- 它将定量的社会科学与物理和计算机科学融合在一起。

现在，代表网络科学的宣言并不谦虚。

根据备受欢迎的网络科学家巴拉巴斯（Barabási），网络科学免除了人类对心理学的需要：

- “过去，如果你想要理解人类的所为以及它们为何为之，你就必须要成为拿着卡片心理学家。但是今天，你也许只用获得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学位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与“逐渐渗透的数字技术”相结合的网络科学将我们置于“一个巨大的研究实验室中，这个实验室在规模、复杂性和细节点上都超过了以往科学所能遭遇到的一切。”

并且这个实验室将“生活的节奏揭示为人类行为中一种更深层次的秩序的的证据，这种秩

序可以被探索、预测，而且毫无疑问可以被利用。”<sup>iv</sup>

网络科学揭示了一个包裹在数字媒体的玻璃鱼缸中的巨大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nonconscious）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网络科学能够成为精神分析的私生子的原因：

- 在网络科学的世界里，没有意外，也没有口误。
- 每一个行为都是症候的
- 每一个行为揭示——指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无意识模式

网络科学是一种詹姆逊曾经想象为的认知图绘的一种扭曲的形式：

而不是一种已经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艺术形式，这种形式是与“发展新器官的信念、把我们的感官和身体扩大到某些新的，还不能想象的，也许最终只是不可能的维度的信念联系在一起。”<sup>v</sup>

通过将世界变为图绘形式，网络解决了很多后现代的困惑——可信的真实（the authentic）与真实（the true）、个体经验与系统真理的不兼容性。

- 通过将真实性（authenticity）还原为系统真理的证明（authentication）

所以，就像詹姆逊所预想的认知图绘，通过揭示个体与她/他居于其中的总体之间的联系，网络科学解开了后现代的迷雾。

不同于詹姆逊的想象，网络科学并不能使人类生长出新的器官，而是将世界联系为一张地图：

- 它迫使一种模式的真实性塑造为人工智能的真理
- 它使得世界成为了实验室
- 它的述行语（performative）：
- 通过把我们融入一个以习惯为中介的巨大嵌合体，它规定了它所描述之物

这种图绘取决于几乎是卡通般的简化，随后被视为普遍的。

这种“被发现的”关系是对广大简化的广大简化，在网络理论的每一阶段——初始抽象/代表，紧随其后的数学建模——生产出了它自身的抽象类型。

首先是“应用的”和“认识论的”：

- 它表明和解释了，“对于给定的研究领域，如何将现象抽象为网络。”

第二，是“纯粹”网络理论，它处理的是网络再现的形式化层面

- 在这个阶段，相关的理论则是数学——网络理论——模型

并且在这个阶段，模拟就是真理：

因果性就是从第一阶段抽取出来的再生产出再现的东西

网络科学的核心是同质性原则：其公理就是，“相似点孕育出联系”、“物以类聚”（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sup>vi</sup>

○ 喜爱表现得像喜爱

○ 麦克佩尔森 (McPherson)、史密斯-洛文 (Smith-Lovin) 和库克 (Cook): 相似点孕育联系

同质性成为协同过滤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的基础

- 协同过滤将用户和对象结成街坊, 此街坊以相同的特征或观点为基础

同质性又超出了协同过滤→通过创建簇群来组织网络;

- 以这样的方式, 它同样使得网络变得可以搜索和可预测。<sup>vii</sup>

但是它又创建了隔离的簇群

- 基于喜欢和不喜欢的簇群

如此思考, 网飞公司 (Netflix) 对协同过滤的使用:

- 在相关文献中, 网飞公司是如此的重要——几乎每一篇论文都引用到——因为在早期就使它的部分数据库可以作为“网飞公司挑战” (Netflix challenge) 的一部分而被获得。

网飞公司有庞大的数据——它有数百万的订阅者和电影:

- 然而, 与此同时, 它推荐的数据库却是极少的;
- 有数百万的订阅者和电影, 但并没有那么多的推荐;
- 大多数人根本不评价电影, 而一些人会评价很多电影 (幂次定律);
- 根据其使用, 这种评价不是必需的——尽管是协作。

因此, 网飞公司极好地提出了一个挑战:

- 提供大块的数据和大量的金钱给能够改进其推荐的系统的任何人
- 在 Mung Chiang 的教科书——《网络化的生活》 (*Networked life*) 里面, 这确实是某种很好的轮廓。

现在, 成功的算法不仅把平均分数 (大量分数) 和因素用来补偿用户和电影偏差, 同样一种电影之间基于强烈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的邻域预测 (neighborhood predictor):

- 也就是基于人们如何以及在哪里最为强烈地从标准中、从媒介中产生偏离

换言之,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例子:

- 通过比较电影和用户之间余弦系数 (the cosine coefficient) 的大小
- 因此, 这些线索或者能够代表不同的用户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 或者能够代表由同一用户对不同的电影做出的评价。

• 通过比较这些余弦坐标的大小, 我们能够创造一种电影或用户大量的差异与同一的邻近关系。

我们可以结合一种公式, 这种公式能够基本地预测这种评价去为协同过滤创造粗略的基础, 这种评价是基于用户和电影偏差 (由优化理论决定的) 的平均值和因素。

现在, 关于基本的算法及其验证的一些事情:

基于网飞公司的奖励——一般而言, 这些算法——成功是不可证实的, 除非参照过去:



- 为了赢得这个奖励，人们必需成功地预测过去——追算（handcast）
- 所提供的是一种训练集——一种训练数据的集合（也就是提出偏差项，并决定其相邻项）——一个检测这种训练的调查集合

- 一个检测这种集合的考察集合，然后决定奖励的最终检测集合

存在着一个可能的违反常情的可验证性“难题”嵌入在系统中，据称这些系统都是关于验证的（或者是经由用户验证运行），因为没人知道这些系统真正的效率如何：

- 换言之，有多少人本应该订购一个 DVD 或直播流媒体

第二：在这里基本的假设是邻域应当加以隔离：

- 邻居应当像我们自己那样
- 我们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字面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我们自己

因此，事实是，NA 产生了 RL——回音室（echo chambers）——这不会惊讶到任何人：

- 一个真正倒退的同一性政治推动了同质性

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同质性的定义，它来自于网络科学科学中一本最受尊敬的教科书

- 深深地尊重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及其工作

## 2、同质性

控制社会网络的结构最为基本的概念是同质性——其原则是，我们倾向于与我们的朋友相似。典型的是，你的朋友不像是一个潜在人口的随机的例子：集体地观察，一般说来，在种族的（racial）和族群的（ethnic）维度上，你的朋友与你相似；他们的年龄也相仿；他们在一些特征上也相似，这些特征或多或少是易变得，包括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们影响的水平，以及他们的兴趣、信仰和意见。清楚的是，我们大多数有着特殊的跨越所有边界的友谊；但是归结起来，流行的事实是，社会网络中的链接倾向于连接与其他人相似的人。

考虑一下这个陈述中的所有设想。

现在，同质性与隔离之间的链接是深奥的和深刻的。

同质性最先是在 1954 年由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默尔顿（Merton）创造出来的——在同一章节中，他们也创造出了异质性这个词汇。

不出所料——对他们的著作（大部分引用……）的所有参照完全被清除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尔顿的文本研究了美国的种族隔离。

- 同质性起初是两个种族隔离案例研究

- 分析两个小镇中的友谊模式：“手工镇，新泽西中一个七百万家庭的项目，山城，西部宾夕法尼亚中关于八百万家庭的一个代表两种人种的、低档的项目。”<sup>viii</sup>

关键地，拉扎斯菲尔德和默尔顿不把同质性假定为一个基础的原则，他们也没有找到作为“自然的”礼物的同质性。

毋宁是，既记录同质性，又记录异质性，他们问道：“动态程序是什么，通过这些程序，价值的相似或对立形成、维持和毁坏了亲密友谊？”<sup>ix</sup>

同质性在他们大量引用的但明显未阅读的章节中是一个友谊构型的实例或代表。

当前的网络科学的形式，在其中同质性从难题转向了方法，这种形式已经忘记了这种历史。

同质性再也不是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了，毋宁是某种需要“自然地”解释和证明在表面上平等的系统中的不平等性的持久性。

- 它已经成为自明的、也就是常识。

但是作为出发点的同质性决定了它所发现的落脚点。

- 如果同质性是假定的，那么隔离是所重新找到的东西。

同质性——作为基础的原则——强加且自然化它所发现的隔离。

考虑一下同质性的自然性证据。

克莱因伯格和伊斯利（Easley）指出了与居住有关的隔离

• “同质性其中一个最为容易感知到的效果是城市中民族和种族的同质性邻域的构型。”<sup>x</sup>

为了去解释隔离如何出现，他们转向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著名的隔离模型，据称这解释了当地的同质性如何能够推动全球的隔离模式。

- 通向隔离的力量有多么粗鲁。

在这种模式中，有两种代理类型：

- X 或 0
- 根据某种不变的特征如种族、民族、原产国、母语，X 或 0 会不同。

在这种模式中，每一个代理都至少想要作为邻居的其他代理。

- 它们关心是否至少拥有某些其他同样类型的邻居

因此，在每一个阶段不开心的代理是会移动的：

- 在这里你会看到第一步，如果  $t=3$
- 现在， $t=3$ ，代理愿意成为少数派。
- 所发生的是，整合（integration）极其困难产生。

你会看到当  $t=4$  时会发生什么

据称这证明了——在一个不基于隔离的过程中（代理愿意成为少数派）——隔离是最为可能的结果。

正如克莱因伯格和伊斯利所解释的，问题在于：

- 从一个随机的开端开始，聚集代理去发现整合的模式，这是非常困难的。
- 更为有代表性的是，代理将会依附于像它们一样的其他群簇，这些群簇将会像其他跟随它们的那些代理一样成长。

间歇

也许，但是这种模型和解释只有在我们擦除——不知道——整个美国种族隔离的历史的

时候才会有效。

- 没有任意的开端

那种没有成为一个少数派的欲望并不是无罪的。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种族隔离的历史（强制隔离）——这种欲望不是成为一个少数——一旦邻居变化这是会移动的——用“白人航班”（white flight）来界定：

- 反对废除种族隔离（民权运动）

进一步，同质性重新界定了作为爱的恨：

- 在这里爱的证据是什么？你如何展示你对同一之爱？→逃离他人……
- 爱作为内在地对同一之爱，作为想要去逃离的爱——证明了白种至上主义的现代定义

义

- 不要声称讨厌他人，而是爱他们自己

展示他们的爱？憎恨他人

这种模型和解释提出了看不见的制度性的基础设施和责任制。

- 这就是谢林最初的出版物实际上弄清楚的东西

现在，经典的“种族隔离的动力模型”于1971年出版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恰好在民权运动的中心，并且是在强制性的学校种族隔离的开端。<sup>xi</sup>

- 它明确处理的是白人航班或邻域倾斜

在他的文章中，谢林公开承认，他故意排除了两个主要的种族隔离运动：

- 有组织的行动（它甚至不用提及奴隶制度和合法执行的种族隔离的历史）
- 经济隔离，即使：“经济隔离可能从统计学上解释了某种最初的种族隔离程度。”<sup>xii</sup>

进一步，我们必须认识到关联的行动和寻找相关性如果没有其令人烦恼的历史的话就什么也不是。

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在许多的推荐系统中用来决定相似性——例如，由科辛斯基（以及其他人所使用的线性回归作为工具用来“理解”人类遗传。

皮尔逊和加尔顿都是优生学家，他们提出的统计学方法一直用来决定对于诊断“向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关联。

因此，加尔顿发展了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现在用来决定散乱点之间的最适宜的路线——为的就是理解偏差。

- 最简单地，线性回归假定了一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如  $Y=mX+b$ ， $m$  和  $b$  是常量。

有趣的是，加尔顿的线性回归概念在目的和秩序方面不同于现在的标准程序。

- 当研究香豌豆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大小的差异以及人类的父母异常的高度及其后代的高度之间的差异时，加尔顿特别表述了这个线性逆转概念。

- 他画了一条线，试图决定这个倾斜度，但这不是在一个给定的图表上的两个点之间（考虑到父母的高度来说后代的高度），而是测量他们来自于平均数的偏差之间的线。

- 对于加尔顿来说要紧的事是，如果他们没有小心翼翼地繁殖的话，异常的特质是如何一代一代地失去的。

皮尔逊和加尔顿是生物统计学家而不是孟德尔学派（Mendelians）→特别是皮尔逊把相关性作为补充因果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

- 对于相关性超过因果性（补充），他的论证怪异地与当前作为某种“理论自由”的关联产生了共鸣。

并且基于这些“理论自由”——孟德尔自由——的观察，皮尔逊提出了他的“遗传特征法则”和优生学程序。

由恐惧所扰乱，“大众”将削弱人口，他为了一个国家制度而争论道，在繁殖中排除不健全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和鲁莽的人：

好。那么对于所有的这些该做些什么呢？

- 我们如何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如此我们不会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十分简短

### 3、共同相关不是相关性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回应室的增殖是不可避免的

- 隔离是不可避免的
- 我们绝不接受隔离或歧视

虽然这将会需要更多不同的网络算法，这些算法是一个开始的地方。

因此，假使我们采取了乔安妮·西松（Joanne Sison）和沃伦·萨克（Warren Sack）的挑战来建立民主搜索引擎将会怎么样呢，换言之，搜索引擎给予用户最为多样的而不是最为普遍的结果？<sup>xii</sup>

- 这些挑战将如何假定“幂次定律”（富裕的人变得更富裕；贫穷的人变得更贫穷），这是由这些算法促成以及发现的？

- 假使我们得到了最少的阅读而不是最多的阅读会怎么样呢？

假使我们赞成不同的限制、不同的初始前提会怎么样呢？

假使总是被给予，我们认为我们会喜欢什么呢——而不是持续的安慰

并且重要的是，同质性常常根据安慰来讨论：

- 尽管事实是，同质性产生的安慰是极度可疑的
- 愤怒→被隔离的团体
- 相似性排斥

如果连接不代表同质性，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 如果簇群代表差异而不是相似性，还有什么其他的世界会出现？

FN.

- 假使我用异质性来建立模型会怎么样→与吸引相对立
- 基本的 EM 原则

甚至更好，假使我们基于共同的无差异来建立网络会怎么样呢？

- 还有什么其他的航行和推荐模型将会得到揭露呢？

假使我们在这些模型中嵌入历史会怎么样呢？

你们会看到维·哈特（Vi Hart）重新思考谢林：

- 推动系统→废除种族歧视
- 揭示初始条件的历史重要性
- 历史和政治嵌入进我们个人行动和习惯的方式

不过，仍然使我们已代理的身份出现：

• 指出这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在拿个戏剧中我们是人物角色，不是牵线木偶，我们如此地称为大数据

- 指引我们朝向一种不同的未来，在这种未来中，我们拥抱这种网络的表现性

最后，我们把这些程序的种族主义的结果用来作为基础以表达更大的问题。

因此，我的最后的例子

面部识别软件不能够识别非裔美国人

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图书馆充满了名人和大学生（模型）：

- 那里缺乏多样性

因为视觉技术给予白皙的肌肤以特权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事实，模型产生未来和现在，我们不想去改变世界

这是全球气候改变模式的前提

•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是真的（真实），我们将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他们将不会是可证实的

- 模型→自我取消预言→如此重要

模型预言和现实之间的缝隙→政治行动

因此→让我们拒绝偏执狂的幻觉，这种幻觉会把政治宣传和现实合并在一起：

- 引起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 留有空间去创造新的习惯、新的世界和新的网络

谢谢。

## 参考文献：

- i See the five stages of capture, articulated by Agre.
- ii Ulrik Brandes, Garry Robins, Ann McCranie, and Stanley Wasserman, “What is Network Science,” *Network Science* 1:1 (February 2013): 1-15, 2. *Emphasis in original.* 这些网络科学的编辑者们在其介绍初始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以下主张：  
主张 1：网络科学研究网络模型。  
主张 2：这些事关于网络再现的理论和关于现在的网络理论：二者构成了网络理论。  
主张 3：网络科学应当是经验的——尽管不完全是这样，但却是一贯的——其价值评估反对选择性再现。  
主张 4：是网络数据分开来的是其领域的发生率结构？  
主张 5：网络科学的核心之处是依赖性的，在变量之间以及内部。  
主张 6：网络科学本身正在演变成数学科学。  
主张 7：网络科学本身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网络，是一个从大爆炸扩大的范式。
- iii Ibid, 3.
- iv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Bursts: The Hidden Patterns Behind Everything We Do, from Your E-mail to Bloody Crusades* (New York: Plume, 2010), 11.
- v Ibid, 39.
- vi Miller McPherson, 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 Cook,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415-44.
- vii Peter V. Marsden, “Homogeneity in Confiding Relations,” *Social Networks* 10 (1988): 57-76.  
Matthew O. Jackson, “Average Distance, Diameter, and Clustering in Social Networks with Homophily,” *Internet and Network 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WINE 2008*. Eds. Christos Papadimitriou and Shuzhong Zhang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8): 4-11.
- viii Paul F. Lazarfeld and Robert K. Merton, “Friendship As Social 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Eds. Mor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and Charles H. Page (Toronto: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54), 18-66, 23, 21.
- ix Ibid, 28
- x Ibid, 96.
- xi In 1972, the NAACP files a class action lawsuit against the Boston School Committee., a city contiguous with Cambridge MA, which is where Harvard is located.
- xii Thomas C. Schelling, “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

(1971): 143- 186.

xiii Jo Ann Sison, "What Makes a Search Engine Good for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Poll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Software," presented at Tools for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on,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Dir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Advanced Computing; Conference on Online Deliberation (DIAC-2008/OD2008) Berkeley, CA., June 26-29, 2008: pp. 13-22.

# 作为知识型以及熵纪的资本主义

贝尔纳·斯蒂格勒

(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与研究所主任)

许煜 译

(德国吕纳堡大学)

## 一、这次讨论的工作计划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进化在各个领域壮观地肯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所提出的假设，包括自动化，知识的经济功能的进化，以及价值关联式的转变。

在一八五七年，直至恩格斯去世的时候，要完善马克思所预期的进化的详细功能分析，还欠缺一些关键的概念，而这些进化在目前经由科技的资讯化以及计算式的转变正在具体化，这些科技主导了今天的固定资本的构成。我建议由以下的十三点来描述以及处方这个巨大的转变：

1、经由网络化的生产工具的固定资本，资本主义建构了一个物质化的知识型。这个知识型霸权式地重置了所有的计算的工具有，将它们功能性地整合为统计的、测量的、模拟的、设计的、观察的、生产的、物流的、移动的、定向的、书目计量的、科学计量的、市场的、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等的工具<sup>1</sup>。

2、资讯是这个知识型的变化的 (allagmatique)<sup>2</sup>操作者，计算的技术完美地与以计算主导的资本主义同质，计算建构了市场以及所有的交易，其中包含了心理以及社会的生活。通过计算而形成的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正是建基于作为所有知识形式的基本范式的认知主义。

3、认知的知识型是一个反知识型：它的发展意味着一个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sup>3</sup>。大数据相关主义式的神话，例如克利斯·安德森在《理论的终结》中所说的<sup>4</sup>，是一个完美

---

<sup>1</sup> 西蒙东所形容的“功能性整合”是具体化的过程，这也发展成了西蒙东所称的缔合技术地理环境 (*milieux technogéographiques associés*)，至于这个概念在西蒙东之后的最新发展请参见：《重予世界以魅力》、《自动化社会》、《在颠覆中》、《超越熵纪》。

<sup>2</sup> 请参考西蒙东《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译注：希腊词 *allagma* 意思是变化或变异，*Allagmatic* 的思考同时包括了结构和过程，结晶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结构又可以重新变成过程，后者是一种调控 (*modulation*)。

<sup>3</sup> 详见《自动化社会》的第一章我以格林斯潘为例的发展。

<sup>4</sup> 请参考《Wired》编辑 Kevin Kelly 的回应，以及我在《自动化社会》对此的评论。



的例子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塑，同时经由认知主义的范式以及市场营销<sup>1</sup>，而后者本身便是网络化、模仿式以及计算式的。

4、认知主义者的反知识型施加了一种绝对的非知识（“后真相”的时代）：它将所有的知识在计算中以及通过计算来溶解，如此它完成了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将所有的价值都贬值了。具体化了的绝对非知识的反知识型作为固定资本将其贡献给了熵。思考（*penser*）它以便超越它，也就是说疗伤（*panser*），需要一种对黑格尔的新批判，同时也是对他的辩证的新批判，它涉及的是以一种药学来跨价值化，这种药学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的《斐德罗篇》、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房》、以及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中找到<sup>2</sup>。

5、这种绝对非知识的具体化的历史与人类纪的历史重叠。而今天它破坏性的加速已达到极限，并证实为熵纪<sup>3</sup>。标记这个熵纪的是知识的退化，它被竞争取代之后，（也就是说适应系统以及由系统实现的功能的能力），跟之又被算法所取代；算法构成了固定资本的普遍化的自动化，引致了受薪者，罗斯福以及凯恩斯所说的就业的熔解，后者是源自于“创造性破坏”的增长的条件。

6、创造性破坏的代价在于知识的破坏，导致了绝对的非知识，进而产生了熵纪，因为被破坏的知识正是劳动，通过后者，康吉莱姆所说的技术生活<sup>4</sup>形式关怀了它的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知识-由生物学开始-是一种关怀，在其中技术生命与它的技术及人工器官无可避免所产生的熵抗争，然而有生命的自然相反自发地（缺乏“知识”）保存了局部的负熵的能力。

7、熵纪是人类纪破坏性的呈现，它达到了生命力的极限<sup>1</sup>，因为世界性的技术系统，也就是说网络化的固定资本功能性地短路化了所有的社会系统，进而短路化了所有的决议性的过程，以及所有它们所依靠的知识，以及所有它们所培养的关怀的形式（正义、法律、教育、文化、城市性等）。在生命领域的末日论，同时也是熵纪当中，资本主义面对了熵性的矛盾以及收缩，这是它纯粹的计算性的发展中所承载的，同时不断地败坏为混乱的位相，不同形式的社会退化是世界中随处可见的症状。

8、我们需要跳过这个熵性的状态，将这种混乱变成一个新时代的开放的分支，我们称之为负人类纪。进入负人类纪需要对知识（*épistémè*）和技术（*tekhne*）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全新重估，而重估的基础来自一种药学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它的工业技术的转型的重估，马克思称后者为“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大工业”，海德格尔则称之为“现代技术”以及座架（*Gestell*）。工业技术经由我们以下所称为的数码第三持存进行了普遍化的网络化（*réticulation généralisée*），它内里的网络以及数据的架构的设计是以股东获利为前提，固定资本变成了纯粹资讯性以及计算性的。

<sup>1</sup> 关于意识形态以及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请参考《民族阵线的药学》。

<sup>2</sup> 关于德勒兹和药学，请参考《震撼状态：二十一世纪的愚昧与知识》。

<sup>3</sup> 请参考 Ch. Bonneuil et JB. Fressoz, 《人类纪事件》（法：Seuil, 2015），《人类纪震撼》（英：Verso, 2016）。

<sup>4</sup> 请参考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生命的知识》。

9、对于计算性的无产阶级化的绝对非知识的批判必须基于一种对信息理论的批判，因为它总是将资讯定义为一种可计算的讯号。当信息这样被理解的时候（主张每天都看报纸的黑格尔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来临），它溶解了知识，虽然后者无法被简化为计算。在怀德海所称为的理性的功能里，综合的理性不会在分析的理解中溶解，而知识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是不大可能的（improbables）分支的生产者，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计算的。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在一个增长中的宇宙（univers en concrescence）才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被视为过程，当中生物通过创造在地性来延迟熵的增长作为失序的增长，然而技术生物（也就是说生产者，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称之为生产者）通过对它的环境（milieu）的人化（anthropisation）来与熵作战，这令致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夏热带》<sup>2</sup> 结尾提倡将人类学取代为熵学。

10、生产者首先是他自己的器官的生产者，因此他是体外化的。对于体外化的存在来说，这里的关键是超越薛定谔指出的生物反熵特征的观点：在他对生物的分析中，他指出了后者通过生产体内化的器官（除了病之外），这是器官是自发以及全面地反熵的（anti-entropiques），也就是说可以将保存生物的完整性。对于体外化的生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外生物（exorganismes）来说，因此生产出来的器官都是人工品，它们所产生的新的熵的可能性，和负熵的新的可能性一样多。然而，我们必须分开热动力熵以及生物负熵的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是信息理论里所理解的熵和负熵的矛盾的可能性，当中的矛盾来自信息理论无法理解外生物以及它们的体外化器官的特殊性。这也是为何我们可以谈人 / 熵（anthropie）以及负人 / 负熵（néguanthropie）。

11、对抗人 / 熵化是负人类学的对象，它自身是基于对熵、负熵，以及反熵的概念的重新评估，而这个评估的基础则是来自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在一九四五年发展出来的体外化的观点。

12、要克服计算性以及网络性的资本主义的人 / 熵的未日式的倾向，需要重构一种知识型，从被固定资本整合的第三持存以及它所造成的熵纪出发，产生新的形式的知识，也就是负人类纪的特征，自身构成了一种治疗性的处方的组合（经济性地配置了新的知识），以便将被平台资本主义所整合的机械的、模拟的、数码的第三持存的药的社会化（socialiser）。

13、这个计划首先要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特征有仔细的分析。它需要一种对于数据以及网络架构，以及下层的建筑原理的批判，来便来找到器官学的发明（invention organologique）的原则，它有益于负人类学潜能的强化，以及制约相应产生的人 / 熵的倾向。许煜的研究正采纳这种进路，而那些“加速主义者”却混然不知问题在哪里。

## 二、对认知主义的补充

---

<sup>1</sup>如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以及更大规模的科学家团体所说的。

<sup>2</sup>详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夏热带》，我在《自动化社会》以及《在颠覆中》也有评论。

随着概率数学在数据经济应用的最新发展，不同意义的认知主义<sup>1</sup>变成了新的计算主义。这正是新的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所发展的，在去年十二月在巴黎庞比度中心发行的会议上，我们分析为人工愚蠢（*bêtise artificielle*），它是阿尔维松（Alvesson）和史碧沙（Spicer）所称的功能性愚蠢<sup>2</sup>的增强版，这正是认知资本主义的现实（*Wirklichkeit*）。

人工以及自动化的愚蠢是反知识型的具体化，它是由纯粹而直接的计算性（基于算法以及网络的）资本主义所构成的，后真实（*post-truth*）的考验被强加为普遍化的去思维过程（*dénoétisation généralisée*），此后者来自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特别是当我们进入人类纪，或者英国的《卫报》所称为特朗普纪（*Trumpocène*）的时候。

要在会议期间展开这些要点，我们需要回到三个问题：

- 认知资本主义；
-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负力量（*puissance du négatif*）的概念，
- 主人 / 奴隶（*Herrschaft/Knechtschaft*）的辩证

### 三、认知资本主义的药学

计算以及信息资本主义正是东尼·内格里（以及其他作者）所称的认知资本主义。它来自超工业社会的数码化。数码化是语法化过程的最新状态，我们必须详细地研习。从一九九三年，随万维网开始而普遍的数码化，构成了西蒙东所称的缔合环境（*milieu associé*）。在这个缔合环境里，出现了两个矛盾的倾向：

• 一方面，各范围的贡献式实践（这是自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自由软件运动所展示的），它打破了一开始就存在于无产阶级化中，以及工业经济核心的结构性以及序列性的对立，包括计划、生产、消费等。

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化是一种去无产阶级化，首先是由下而上的创新（*bottom up innovation*），然后是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其正外部性（*externalités positives*）也出现了，特别反映在维基以及社交网上，超出了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模式。

•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技术-地理性的缔合环境，作为功能性的整合程序，吸纳了所有的人，它是一个极端以及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它将所有种类的活动简化为一连串的可用算法来处理的信息程序，这通过强度计算，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网络化人工智能等进行，它接近光速而且幅盖全球，它将我们在前面所描述为贡献性实践的逐

---

<sup>1</sup>认知科学是建基于图灵机，也就是说计算主义，而以神经网络为原形的联结主义，人工生命，多智能体系统及神经科学等，都在不同的程度反对原始计算主义者的简化主义。

<sup>2</sup>详见 « A Stupidity-Based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ume 49, Issue 7

点逆转。由万维网所实现的新的缔合环境对操作这个系统的贡献者所做的，就好像马克思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六年的《资本论》没有发表的第四章所描述的，我们可以将工人这个字换成贡献者。

然而，当我们检查价值化过程的时候，所有都变了。在这里，它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工具，而是生产工具使用工人。有生命的劳动并没有在作为它的客体器官的物质劳动中被实现，而是物质劳动自我保持和增长，吸纳了有生命的劳动，以至它变成了制造价值的价值，运动中的资本。

这里我们见到了一种关系颠倒的重覆，这种关系我们不称之为有生命的劳动以及物质劳动或者无生命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方面第一以及第二持存、预存，以及另一方面第三持存、预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颠倒的重覆正是一种新的药所引起的效用的特征。

固定资本的新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隐晦不明，很大部份的设备被像消费品一样“私有化”了，就好像，它以全球规模根据基建的组织来重新调整，而后者在人类纪中变成了生物圈式的：我们必须讨论的是模糊的或者软的，或者流动的资本，如果不是液化资本的话。

要超越熵纪，后者通过固定资本的网络化构成在功能上具生物圈规模的全球外生物，我们必须分析已变成有弹性以及可塑性的固定资本的药学双重性，一方面经过云端计算的高度中心化，另一方面经过体外化的器官的元分配化（*archi-distribué*），这些器官今天是智能电话，而如果我们相信伊隆·马思克的 Neuralink 计划的话<sup>1</sup>，那明天可能就是植入物。然而这一切需要重新回到药的问题，回到西方哲学的古希腊源头。

药的问题，如苏格拉底在五世纪末所提出的，是第一个对无产阶级化作为去个体化的理论化。知识需要药，因为它必须由差异的劳动<sup>2</sup>来外置化以及空间化（也就是说物质化）。通过这个分别，也就是思维的分别，构成第一以及第二持存和预存的知觉以及时间流<sup>3</sup>都被外置化了，空间化了，在内置化的过程中上上下下被重新组织了，而后者产生了知识。我们需要产生一种外置化，来容许一种内置化的到来，这种内置化如黑格尔所说的有两个“契机”：

- 一方面，内置化如学习，也就是说将继承的思维活动内置化；
- 另一方面，内置化如思维，也就是说如新的思维过程的第一契机（这是《精神现象学》

中的“感知的肯定性”一开头所说的），组成了我们和工业技术（*Ars Industrialis*）所称的跨个体化的路线或循环<sup>4</sup>。

我不会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这是我的理论的出发点，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都讨论过了<sup>5</sup>。

---

November 2012 Pages 1194 - 1220.

<sup>1</sup>参见 <https://www.neuralink.com/>

<sup>2</sup>这是从德里达的意义上说的，而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黑格尔。

<sup>3</sup>这些词（持存和预存）来自胡塞尔。

<sup>4</sup>参照《*Ars Industrialis* 的词汇》<http://arsindustrialis.org/vocabulaire-ars-industrialis/trans-indivuation>

<sup>5</sup>详见《政治经济的新批判》

相反，我必须说，如果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话，特别是在工业的形式中<sup>1</sup>，也就是说它经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来实现对所有经济功能（计划、生产、物流、消费）的逐步控制，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经由多种形式的语法化的过程所形成，它是基于以下四种失忆的第三持存（记忆技术）：

1、书写印刷的第三持存（这是韦伯所描述的来自宗教改革以及具备相容性失忆的资本主义的条件）。

2、机械的第三持存（与瓦特的蒸气机的结合，沃康松的自动玩具变成纺织机，然后是一般的自动化机器，其中包括了巴巴治的差异机器）。

3、模拟的第三持存（容许文化工业的发展，以及经由它的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的社会知识以及阿玛蒂亚·森所称的能力的剥削），

4、数码的第三持存（它将所有东西都重新编码，将所有的经济功能转化，整合到实时运作中，这有赖于维诺在一九四八年所发展出来的反馈的（feedback）概念，然后具体化（从西蒙东和怀德海的意义上来讲）成数字经济、智能化以及工业 4.0，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巨型实验室）。

通过将第一和第二持存和预存的第三产业化（tertiarisation），无产阶级化也就出现了。这构成了：

1、《共产主义宣言》所肯定的，它将知识的命运描述成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它摧毁了知识，将它转化为固定资本，也就是说第三持存的计算系统，它变得柔软，有弹性，可塑性，以及最后液态，也就是说思辩以及无法偿还的，它产生“液化”的代价就是将所有一致性的存在（consistances）的大规模以及系统性的摧毁。

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瞻性地分析了自动化的后果，而固定资本结构性动态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它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而现在只有劳动的革命才能来跨越它。（至于这个对于“机器论片断”的理解是片面与否是很明显的：这正是这个会议所要提出的，就是有必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推进一步，我们必须引进体外化以及负人类学的问题作为新的准则来超越熵纪）

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同时承载着两种不同的现实：

•一方面，数码第三持存构成了资本的知识型以及作为知识型的资本，它是一种反知识型，因为作为超控制以及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工具，它构成了一种资本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最先进的状态，也就是说知识的摧毁。

•由资本发展出来的数码第三持存，作为固定资本的新基础（这一点马克思并无法预见），正是一种容许扭转这种以事实治理的药，它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的法治，这不必然是说有教化作用的社会公义，而是有必要找到一种新的经济理性，它可以引导一种劳动的价值化以

---

<sup>1</sup>这个从始于宗教改革的资本主义开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对于因为印刷术而出现的新的会计工具的使用。

及价值的重估。

最后一点必须经过尼采，但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或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再回到这点。

## 四、甚么是革命？

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必须发展出三个要点，它们可以打开一种新的经济视野，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出口，而是要在面对同是囫圇路的特朗普纪时刻，寻求在熵纪中打开另一条道路。这另一条道路，也是负人类纪的道路，如新的革命性计划，它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策略性的政治，包括互联网+，普遍化的自动化，智能城市，以及负人类 / 负熵的工业，基础是一种贡献性的经济，它建立在过渡往负人类纪的投资上。

以下是三个要点：必须全面地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 否定性的力量
- 无产阶级
- 被误称为主人（Herren）和奴隶（Knecht）的辩证

1、我们先从最后一点出发：Knecht，并不是奴隶（Sklave），而是通过劳动而发展出超越他的主人的知识的人<sup>1</sup>。他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奴隶。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匠，从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村落，成立了城市，最后涌现了各种工业革命，间接地将资产阶级建构为革命阶级，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所描述的。将无产阶级当成 Knecht，同时将它定义为否定的力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将自己禁锢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中：如果无产阶级是被语法化剥削了知识，也就是说被机械的失忆的体外化，后者剥夺了这种知识并将它注入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中，然而在任何情况之下，这无产阶级者无法成为否定的力量和革命者来超越资本主义。

2、问题应该是通过贡献式地逆转来进行去无产阶级化，它不是一种辩证式地翻转，而是一种类因的占为己有，我们说的类因是德勒兹从斯多葛学派<sup>2</sup>以及尼采那里所理解的。

问题是类因式地将扭转书写的、机械的、模拟的以及数码的失忆第三持存的游戏，这些第三持存被数码以及它所实现的网络化功能性地整合起来（由协定与格式所容许的联合操作性<sup>3</sup>），这个游戏变成了一般智力（intellect général）的基建，构成了思维的新时代（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思维被实现为康德和怀德海意义上的理性的功能和官能的体外化过程，这是我在二零一六年十月份在柏克莱的研讨会上所论证的<sup>1</sup>）。

组织一种基于去无产阶级的经济，或者说贡献性经济，正是我们现在在巴黎以北的郊外的塞纳-圣但尼省，一个拥有四十一万居民的区域所做的实验，它想要做的是将劳动价值化，

---

<sup>1</sup>我要谢谢 Pierre-Jean Labarrière，他将 Knechtschaft 译为劳役（servitude）而非奴隶制（esclavage）。

<sup>2</sup>详见德勒兹《意义的逻辑》

<sup>3</sup>例如 TCP-IP, HTML 和 HTTP 等协定和格式。

特别是当就业作为工资的向量（凯恩斯视之为增长的功能来应对福特泰勒主义）已被马克思早于一八五七年所预期的进化所质疑的时候。

3、这种进化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基于新的知识型以及认知论的基础上重新发展数据以及网络的架构<sup>2</sup>，后者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如班雅明·布拉顿<sup>3</sup>所分析的。我在庞比度中心举行的 Next Leap<sup>4</sup>项目的一个研讨会上所论述的，在这里我主要指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这种固定资本的另类设计正在瓦解，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多元的地域化的贡献性平台，构成知识的合作，重读洛特卡<sup>5</sup>对斯密、乌尔（Ure）以及马克思的理解，也就是说，通过以生物学以及超生物学的（*extrabiologique*）角度来重新激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命题，而关于这点我们必须经过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分析<sup>6</sup>。

•另一方面，价值必须整体地被重新定义来投放进负人类纪，这样后者可以从新的知识理论出发构成外器官生命的功能，如康吉拉姆定义生物学在技术生活中的角色一样，它生产的不只是负熵来在地地对抗熵流，后者来自宇宙扩张的过程（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中所排斥的，我在二零一六年在南京的研讨会也讨论过），然而负人类 / 熵，因为关照体外化器官来限制它们的人类 / 熵的效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效果，来增强负人类 / 熵的效果，其相对的是知识。

至于这个，我们必须通过将学院的器官完全地重新架构化来开始，好像尼采在不同的文章中所勾勒出来的<sup>7</sup>，我们现在在共同体（Plaine Commune：注巴黎以北的圣丹尼省的一个地区）用这些贡献性的注解平台也做的，我们也会用来编辑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

## 五、结论

固定资本以及一般智力的问题因为对于第三持存的问题的忽视，而缺乏记录以及理解，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册中的主张比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要落后，特别是他谈到蜜蜂与建筑师的时候：这也是我在《自动化社会》最后一章尝试指出的。

如果我们想要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假设，并且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的话，问题不是无产阶级者作为否定的力量，而是药的逆转作为正面的力量，这个逆转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疗法，也就是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说“肯定的逆转”比“正面的逆转”更佳，因

---

<sup>1</sup>将在期刊《*Qui parle ?*》中发表。

<sup>2</sup>这种认识论以及知识型的新的基础的重建是为发展一种新的数码器官学，这也是创新研究所于二零一三年在庞比度中心所成立的数码研究网络的目的，详见 [digital-studies.org](http://digital-studies.org)。

<sup>3</sup>详见 Benjamin Bratton, *The black stack*, *E-flux Journal* #53 March 2014.

<sup>4</sup> <https://nextleap.eu>

<sup>5</sup>这是我们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到四月份的 *Pharmakon.fr* 的课程所描述的。

<sup>6</sup>二零一六年 *Pharmakon.fr* 的春天课程里，我们也有处理正面批判的问题。

<sup>7</sup>详见尼采《论教育部置的未来》（*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我在将出版的《超越熵纪》（*é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也会论及。

为正面仍然落在正与否的相反的辩证里面，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肯定”构成了另一个问题，那是尼采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必须借助尼采，特别是基于以下原因：

- 一方面，纯粹的计算性的资本主义完成了虚无主义，
- 另一方面，它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虚无主义变成负熵的平均化。

马克思主义将观念主义者的黑格尔式辩证逆转，但是因此也保持了它形而上的特征：因为忽视了药性以及悲剧的维度，意识不到问题不在于否定的力量，而是将固定资本逆转为去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后者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描述的自动化的逻辑来实现，但却被黑格尔主义者，以至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维度给阻碍了。

认知资本主义其实在要求以及开启一个去无产阶级化的革命性的运动，要不然就不是内格里以及维切朗尼（Vercellone）所说的“认知”<sup>1</sup>，然而同时，面对由纯粹的计算性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其实现状，这个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法治的目标，可能是因为要重新质疑“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力量”（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或者劳动者，它常和就业和受薪混淆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而且沉重的操作，而首先我们必须重新质疑统治 / 奴役（Herrschaft/Knechtschaft）之间的辩证。

统治 / 奴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辩证的关系，而马克思和黑格尔都错过了对于第三持存的思考；在这个误解背后，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甚么是知识型？如果事实上是 Knecht 作为生产者产生了知识，而哲学却经常提出说是主人想要空闲的时间（希腊文：skholè，拉丁文：otium。）今天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知识型是否定的，以及构成了一种绝对的非知识，也就是说一种反知识型（anti-épistémé），以及一种毒性的末日式的极限，它产生了熵纪以及特朗普纪，因为它将知识当中无法计算的都溶解在计算当中。这无法计算来自容许分支（bifurcation）的负人类学潜能，它给予我们可以走出变成特朗普纪的熵纪的希望，而这是一场思维对抗去思维（dénoétisation）的仗的关键。

去无产阶级化，也是去重新建立一种总是有限的、多元的、分布性的、非单纯的知识，因为它是药性的，暂时的，负人类学的，也就是说总是在人类 / 熵性的教条形式下生成成为一种非知识，它的重建基于贡献性经济以及负人类 / 负熵的政治。

---

<sup>1</sup>详见 *Multitudes* 2008/1 (n° 32) *Capitalisme cognitif: la démocratie contre la rente*



# 内在性的诸众和超越性的人民

## ——奈格里与拉克劳根本对立的革命主体性模式

宋晓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对主体性问题的反思和质询构成当代西方左派回归政治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逻辑参照系。其中,福柯和德勒兹与拉康和德里达在差异、主体、形而上学、伦理和政治等核心环节的交叉、分化甚至对立在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的主体理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根本上看,奈格里主要遵循前者的内在性脉络和充足本体论路向,而拉克劳则基本归属后者的超越性传统和缺失本体论阵营。整体而言,虽然同属后结构主义的后主体范畴,且都摇摆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但它们却有着完全无法通约的逻辑构成。前者基于内在性、个别性、肯定性和充足性原则,通过纯粹差异的一元论,创建了一个作为唯一本源生产-解放力量且只能立足自身存在和需求的集体主体性模式:完全自主和自我充盈的诸众。后者则本着超越性、缺失性、外在性和否定性机制,借由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玷污关系,将总是携带否定面向的人民之“自主”条件诉诸于一个准先验的他治性:运行在不可抵达的实在界激进的异质性、不可能性和偶然性。前者拒绝在政治上的一切普遍性和同一性形式,构想了一个具备丰富历史-政治-伦理规定的实体框架,并对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框架有着实质性的保留。后者则意图调和同一性-差异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关系,完全采取一种去实体化的纯粹形式化理解,彻底消除所有的社会内容和伦理意义,并全面摈弃阶级政治。概言之,因对内在性平面、绝对差异和平滑政治思想的迷恋,奈格里固守一个绝对没有外部的未分化的或一体的平滑空间以及排除了任何超越性和调解性的非-代表性/表象性/再现性的政治。相反,因总是求助于创构性的缺失和外在性观念,拉克劳则一直都将代表/表象/再现当成政治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如何,二者都无法充分回答政治的规范性以及多样化的社会-政治当事人如何有效实现集体行动的问题。

**关键词:** 诸众 人民 内在性 超越性 差异性 同一性

## 引言：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内部双重理论轨道的对峙

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状况和新社会运动多元化根基的明确判定，后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的思想谱系在深入批判传统主体模式的基础上，普遍主张一种后主体的政治主体理论：抛弃被设想成“意义生产的起源和中心”和“透明而和谐的总体”的自由而自主的主体<sup>1</sup>，走向立足异质性、分散化和偶然性的社会代理人/行动者。他们聚焦于“主体之后谁将到来”这一根本问题，直接造成对“内在性、自我存在、意识、统治和本质的个人或集体所有制”以及“位置（基体、实体和主体）的坚实性与权威和价值（个人、人民、国家、历史和工作）的必然性”的集中批判或实质解构。这自然会使主体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一个具有形而上学概念的价值，另一个则具有一个“个殊的单一物”的价值，“它很少向自身呈现，而是更多向一个历史、事件、共同体、作品或另一个‘主体’呈现”。<sup>2</sup>在他们看来，传统政治-哲学思想中以某种独断形式出现的诸多主体范畴在当代需要被完全废弃。伴随全球化时代后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确立，它们均已被“具备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语言游戏、同一性和体验模式之增值”所克服。无论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或是自由主义以普遍人性为本质的人类个体，都建基于理性主义传统及其必然导致的主客二元构架。这在本质上实为主体预先设定了一个全然自足的自我透明性/同一性/认同根基和既定的现成状态。而在以多样性、流动性、变易性和混杂性为基石的后现代主体视域中，连贯的或统一的自我经验以及由其理性和自觉意识引导的统一而自主的主体，分别被偶然的和碎片化的实体以及各种流动而混杂的同一性和正处在连续生成过程中的生命观念彻底取代。

整体而言，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质询主体性问题的众多路径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批判策略。一个以福柯和德勒兹为代表，力图使主体消解在权力和欲望关系之中，以把欲望从主体的中心性中解放出来。另一个则突出表现为拉康对笛卡尔式主体之问题框架的复活，他明确主张这种主体模式根植于无意识的怀疑而非理性的确定性，意求在保留主体概念的同时，将它从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解中摆脱出来。前者立足一个纯粹差异/特殊主义的立场，透过人类潜能的内在展开过程，强调政治上一切普遍性/同一性和传统主体的完全消解。后者则根据一个向不同“同一化和政治斗争”开放的“中心化的空无”或“创构性的缺失”，将主体视为排除了普遍主体观念的空位，并从个殊性或不可预料的事件，以偶然性的方式来揭示普遍政治维度的产生。<sup>3</sup>

福柯的权力系谱学向我们集中展示了权力中的主体的含糊性：权力以无数方式实施对主体的控制，调控其运动和活动，同时权力运作本身又拥有一个主体化的效果，真实地将个人

---

1 Johannes Angermuller,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 Subjectivity in Enunciative Pragma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140-141.

2 Jean-Luc Nancy, "Introduction", *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 Eduardo Cadava and Peter Connor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4-5.

3 Saul Newman, *Unstable Universalities: Poststructur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66-70.

构建成它可以实施操控的主体。正是通过主体的日常活动及其对“真理体制”的遵循，它才能成为权力的主体，这些实践只能把个人束缚在分散的同一性之上，相应地，这能够使权力更加有效和顺利地发挥功能。晚期的福柯则意图通过自我关切的伦理策略来彻底改造主体范畴。他在严格的伦理操练、规训和戒律中发掘个体摆脱屈从状态、建构自身主体性和创造自由模式的可能方式，认为主体始终遵循着某种生命的禁欲密码：将自我的沉思和问题化视为对象的伦理和自由的实践。从这个角度看，自我关切的策略可以被理解为主体在被社会禁止的道德规范之外构造自身同一性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图式。这种从反抗权力的政治领域保守地退回自我反思、自我提升或自我赋权（道德寂静主义）的私人生活来塑造主体性的方式，必然会导向一个完全去政治化的主体。

作为一个逃避权力之主体化效果的替代性方案，德勒兹则提出了一个废除主体范畴的更加激进的版本。他认为，力量的斗争和不同的力量关系构造了一切社会关系、同一性甚至包括物质性的身体，单个的身体不是与心灵相分离的物质实体，不再拥有恒久不变的基础和本质，而是力量或能量交互作用的“强度平面”或聚合体，是不同异质性力量的偶然汇聚和任意连接。在推进尼采力本论的基础上，他把主体定位在一个内在性的欲望领域：欲望不是主体的内部属性，相反，主体性自身却是欲望的效果，欲望的聚合不断生产力量的强度和情感的状态，直接构造了社会-政治领域。欲望本身就是生产，欲望生产构成社会生产的惟一形式，也即社会生产自身。它既是异质因素的功能性配置、对接和联合，又是反权力和反主体的个别性事件。固定的主体形式不过是权力操控的结果，主体化过程的有效性只有在逃离知识和权力时才能出现。欲望则拥有本体论上的绝对充足性，它是主动的实现关系而非被动的满足关系，试图摧毁一切阻碍流动性和自由生产性的权力秩序和编码制度。积极的和生产性的欲望只能根据内在的绝对肯定性来理解，它是一个相互并存的异质性力量的关系领域，总是追求永远的变动、同一性的分裂和众多不同聚合的无限连接。在欲望-机器的隐喻中，主体被完全分解和消散在由异质性序列的流动和生成所形塑的碎片之中，主体性已经变成多种多样的强度和生成以及与不同社会聚合的无穷序列的连接。显然，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混合主体形象，它始终处在永恒的流动和生成状态，总是与不同的聚合相连，并散布在无限的欲望和逾越之中，连贯的同一性、稳固的欲望和统一的空间便再无可能。

与他们相对，在拉康通过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拓扑学变换和以无意识主体、能指主体、言说主体和欲望主体为形式所揭示的主体真理中，主体的存在和形式均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其一，人类自身总是渗透着一个内在的原初缺失，主体则在努力弥合和填补这个本体性和创构性的缺失的基础上得以建构。其二，主体绝对不能根据某种超验的理性/逻各斯和所有本质性的基础观念来理解，并不存在于一个生物维度或本质实体中而意指一个充满活力基质或任何自足的实体，也不拥有既定、稳固和完结的静止状态和封闭结构。其三，主体总是逃避一切形式的确定性、完备同一性和完整实现，因而以一个非实体化的创构性的不可能性、去本质化的基础性的缺失以及去根基化-非空间化的激进的外在性-离密性为固有属

性。其四，主体在本质上实为一种借助它可以使我们从既定的肯定性秩序中通达真理-事件或霸权的行动或决断，又是“建基于肯定性本体论秩序的偶然性”，即本体论的裂缝和本体性的缺失本身，而非后来介入这一本体论界域并活跃在它的空隙中以填充和缝合其裂缝的主体化行动或姿态之结果。<sup>1</sup>这些方面充分展现出主体性自身不可化约的恶性循环：作为本体论裂缝的主体只能藉由不断创造其不稳固性的主体化姿态来缝合自身永远无法修补的原始创伤和原初分裂/阉割状态。换言之，处在实在界中的主体本真存在的不可理解和无法抵达以及主体自我同一性的不可能性和不完备性，只能使主体（需要）和他者（要求）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和错位，使原初对象失落的主体对任一对象的欲望注定以失败告终。这既直接宣告了运行在主体性和客体性层面绝对的本质性同一的必然失败，又意味着主体本身作为抵抗象征化、中心化和结构化的纯粹空洞性、创伤性、缺失性和剩余物，驱动了另一个连续的同化（主体化）过程。围绕这个不可化约的空无同一性只能得到部分地构造，我们在现实中获得的社会和政治认同/同一性/身份必然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不连贯的。在此，主体的可能性正建基于原物的不可通达性这一不可能性和原初创伤性之上，它始终与其真相保持一定的距离，永无完全实现自身。

对拉康而言，以福柯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观念实为成功的主体化的代名词和“一个作为审美整体的自我构造的同义词”。<sup>2</sup>在他们共同的理论视域中，“主体通常被化约为所谓的主体化，它被设想为根本就是非主体过程的一个结果”<sup>3</sup>与之不同，拉康则将主体与主体化的结果严格区分开来。他“把主体和主体化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对抗的关系。通过‘主体化’，主体（预先）设定了一个符号网络的存在，这个符号能够让他把世界经验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并确定他在其中的位置，即把他自己认同为象征空间当中的位置……主体化揭示的是挫折，是它的空无——主体化是一种躲避空无的方式，空无就‘是’主体；主体化最终是一种对主体的防御机制。”<sup>4</sup>换言之，主体化不过是主体在象征秩序中占据的一个位置，它旨在通过主体历经的主体位置之丰富性（不同的主体化模式）来掩盖、填充和缝合符号结构或象征秩序的原初缺失/空位/虚无，而非“前主体或超主体的书写过程”，而主体正是这一本体论的缺失-不可能性、存在秩序的本体论基础或本质性的实在本身。它先于主体化或在某一主人能指中形成的颠倒性认同。作为意指过程之剩余物和“自我再现之失败的回溯性效果”，“其再现的失败恰恰构成它的积极条件”，主体之关键正在于由认同失败所开辟的空隙、短缺或裂缝而非意义的丰富性。<sup>5</sup>总之，福柯和德勒兹以认同的僭越为中心，强调主体分化完全取决于众多能指的多元性秩序或意指体制（话语），拉康则立足基于

---

1 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9, p.158.

2 Slavoj Zizek,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83.

3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4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242页。

5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p.197-198.

僭越的认同(创建于自身之不可能之上的认同),确认主体正是由这个作为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而非众多能指(A Multitude of Signifiers)的多元性-非表象以及意义-意指、主体-表象之间的创构性缺失/裂缝来构造。<sup>1</sup>

从逻辑根基看,虽然这两种主体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通过寻求能够确保所有社会之完全同一的本体中心之不可能性,力图实现差异相对于同一性的优先,但它们却各自根植于充足本体论-内在性和缺失本体论-超越性两端。德勒兹立足一种本体性的自在差异、自由的多元主义和差异自身的不断差异化过程,强调物质性关系网络的连续变易、充足的生产性力量之强度平面、能量的自由流动和虚拟的无限生成运动。由此出发,德勒兹式的本体论构想拒绝根据结构化的失败来界定激进差异的自我增值,始终向绝对开放的肯定性和创构性民主想象和政治机制敞开。拉康则将差异视为同一性或意指之内核的固有缺失,把差异的经验、意指的实现和主体的认同完全归结为一个无尽的填充过程及其永远失败的问题。以它为起点,拉康式的左翼必将借由霸权的闭合秩序来描述革命规划的形成,而在未来的替代性政治图景中引入某种超越性的调解形式。这种区分明确体现在当代法国哲学两条相对的理论轨道之上:一个是新尼采主义(福柯、德勒兹和利奥塔)基于内在性和肯定性原则对斯宾诺莎和尼采哲学的复兴,突出存在之自我构造和自我表现的无限创构运动,另一个则遵循否定神学的传统,彰显存在领域自身的非充足性和不可能性(拉康、德里达和列维纳斯)。<sup>2</sup>

其一,德勒兹的后现代主义欲望政治和欲望主体理论在批判和推进拉康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共同回归尼采具备高度创构性张力的肯定性哲学(如权力意志、强度和情感等),重新展开对欲望和政治之关系的讨论。对他而言,精神分析学虽然给予欲望经济这一基本概念以重要地位,却使其始终归属于表现性的无意识状态,没能彰显“生产性无意识的构造”<sup>3</sup>。因此,拉康虽然发掘了无意识符码领域和意义链条的丰富内容,却藉由将意指链依附于暴虐的能指,力图重新闭合俄狄浦斯/象征的奴役,从而将欲望变成只能根据缺席或缺失之能指的表象中的意指。<sup>4</sup>以此出发,他们拒绝以否性性的缺失/匮乏来界定欲望以使其最终接受意指符号系统的暴政,而是借由力本论(Dynamism)和生机论(Vitalism)之高度张扬,揭示欲望-机器、欲望-生产之连接中肯定性创构力量的充足、自由开放的能量流动和生产过程、与物质流片段化多样化的接合以及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分离的内在性综合(反生产性内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无器官的身体),以兼具否性性和肯定性解放重任的精神分裂学取而代之。

其二,以德勒兹和德里达为例,虽然他们都将关注视角聚焦于对以同一性和二元论为核

---

1 Saul Newman, *From Bakunin to Lacan: Anti-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islocation of Power*,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1, p.140.

2 Lar Tønner and Lasse Thomassen,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Radical Democracy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Radical Democracy: Politics between Abundance and Lack*, Lar Tønner and Lasse Thomassen ed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8.

3 Biodun Iginla, "Deleuze and Lacan: Close Encounters", *Journal of the Twentieth-Century/Contemporary French Studies*, Vol.1, No.2, 1997, p.573.

4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38, p.83.

心的形而上学批判之上,藉由不同的姿态和策略一并强调一种先于任何辩证式的二元对立和统一的激进差异概念以及差异得以不断产生的无限生成运动,共同致力于以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形而上学彻底颠覆那个使经验现实之多样性同质化的超验总体话语,但二者在差异、政治和本体论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诸多无法通约之处。第一,在差异问题上,前者意在通过“直接的二元性”(相异性)突显一个本体性的自在差异或无任何中介的纯粹差异,后者则试图借助“中介的统一”(相似性)构想一个超越存在和存在者的中介的本源差异。以二者对作为原初摹本缺失的重复/形象之仿像(Simulacrum)概念的理解为代表,德勒兹拒绝原初性超出复制或再现的优先,主张任何事物本身即为一个复制-原初的混沌,均始于一个混乱和无形式的深渊:它是自身的原初,并且它的原初正是其自身的复制,因而仿像只能存活于存在自身的内在差异。进而,他把它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个殊性/内部化的差异、非形式性/不可成形的事件/混沌以及无限的生成。相反,德里达却借由将相似性引入内部的纯粹性,从根基上设定了原初的本源性,认为所有事物都始于对同一的再现。他通过赋予仿像以普遍性/内部的相似性、形式性/同一和超越存在之存在/非在场-非存在的特性,将它界定为对双重化为两种相反意义且必须能够被重复或可迭代之原始统一的模仿、复制的复制或重复的运动。由此,他们分别把形式和非形式、在场和非在场、意义和无意义的差异视为基于异质性的直接性和基于同质性或玷污关系的中介,并将二者的关系构想成一个非场所或被解除的折叠(存在/差异本身自我展开的平面:它的内部和外部连续而直接地相互面对,但从未被缝进对方而形成中介)以及中介/居间的场所或交叉的和向内的折叠(存在和非存在、在场和非在场相互玷污对方并聚合为一的完全的他者领域)。一个意味着生成中的直接二元性,另一个则隐含了走向那个超越存在的存在(原文字/延异/踪迹)之中介的统一。<sup>1</sup>由此,德勒兹提供了一个关于本体性差异的内在性分析:本体论自身正是由差异原则内在地建构而来,差异只与经由差异自身的那一差异相关,存在即是差异。但德里达首先关注的是限制差异的相似性运作,即差异只是一个超出和异于本体论或比存在和存在者之存在论差异更具原初性的关系。<sup>2</sup>显然,前者基于充足的在场力求阐明一个肯定性的绝对差异思想,后者则根据缺席的否性性来思考差异,并最终将它归结于同一范畴。<sup>3</sup>

第二,在形而上学和存在观念上,他们都实质性地延续和拒斥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问题框架及其复兴本体论的相关主题,但各自本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出相异的本体论规划:前者力求创建一个绝对内在性的本体论,后者的解构则必然在一个超越性形式结构的基础上运行。德勒兹拒绝任何的超越性观念,并基于纯粹的内在性将形而上学及其封闭结构视为从未耗尽自身可能性的绝对开放性。他始终以纯粹的形而上学家自居,主张哲学的任务不是彻底克服

1 Leonard Lawlor, "The Beginnings of Thought: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in Derrida and Deleuze",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Paul Patton and John Protevi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p.67-81.

2 Daniel W. Smith, "Deleuze and Derrida,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Two Directions in Recent French Thought",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Paul Patton and John Protevi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51.

3 Todd May, *Reconsidering Difference: Nancy, Derrida, Levinas, and Deleuze*,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形而上学,而是积极创建一个全新的本身即为动态的和处于持续生成中的差异和流变形而上学。德里达则借助潜在的超验运动在形而上学的内部预留了一个从不在场的超越性形式结构,并将它看作形而上学自身的准先验性前提,以此为基础直接采取了一种去本体论的瓦解立场。他强调对于形而上学传统而言没有外部,因而无法完全走到形而上学之外,只有从其内部破除由这种超越运动招致的结构封闭性。换言之,克服形而上学的规划预示着一不可能性,正是它才保证了从内部对其实施解构的可能性。基于此,在主体方面,尽管他们都对本质主义的主观主义传统及其先验主体模式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但前者沿着萨特以纯粹的意识领域批判超验性自我的基本思路而建基于内在性的经验之流自身,后者则遵循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围绕自我与他人问题所指示的逻辑路径而诉诸于他者或他性的超越性。<sup>1</sup>

第三,在伦理和政治方面,前者永远充斥着斯宾诺莎-尼采式的强大生命之无限愉悦和充足能量,后者则总是贯穿着一种精神分析学和否定神学式的原始性的无尽缺失和创伤经验与不可能性和无能内核。德勒兹透过与欲望-情感的自由生成和无限创构性、指向纯粹潜能的生命形式和社会躯体之自我充足性和无限激情以及展现创造性力量强度的内在性平面相适应的政治物理学、欢愉伦理学和快乐实践的游牧精神形象,直接发展出一种力比多唯物主义、“生产性实践的本体论”<sup>2</sup>和纯粹流动状态的游牧政治。德里达则依据否定神学(超越性)的路径,从去社会历史维度的文本性和话语构造空间以及以虚无-绝对他者-缺席为基本属性的超验运动出发,力求创建一个立足纯粹语言事实和意识经验领域的文本主义、建基于不可判定性和不可能性的超越性之形式结构及其二难悖论状况、以本质性的认同缺失和空洞的民主承诺为基础的两难政治和忧郁伦理学与失落颓废的流放精神形象。于是,他必然转向带有明显被动性、消极性和乌托邦特性的幽灵学、弥赛亚性、纯粹礼物、正义的无限召唤、对他者的绝对责任等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洞政治话语,极力避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风险,只能诉诸一种创建性和现实性维度极度缺乏的解放承诺。

总之,福柯和德勒兹与拉康和德里达在上述重要环节上的汇合、分化甚至对立在当代后现代主义新左派差异政治的思想谱系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方面同样构成深入思考奈格里和拉克劳政治本体论和革命主体理论关系模式的核心线索和基本原则。从根本上看,奈格里和哈特等人主要遵循内在性脉络和充足本体论路向,而拉克劳、墨菲等人则基本归属超越性传统和缺失本体论阵营。

---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5.

1 Daniel W. Smith, "Deleuze and Derrida,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Two Directions in Recent French Thought",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Paul Patton and John Protevi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p.46-63.

2 Eugene W. Holland, "Marx and Poststructuralist Philosophy of Difference",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96, No.3, 1997, p.532.

## 一、绝对的内在性、自主性、充足性和肯定性：奈格里的平滑政治和诸众

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旨在确立马克思经济学语境的政治性-主体性根基，恢复革命主体性话语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并将从生产方式框架中摆脱出来的阶级斗争引向后现代主义视域。他始终立足直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以劳动和劳动力为主线，聚焦于劳动-欲望-主体相对于资本-权力-结构的优先性，在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中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从中发掘一个自我组织和自我制度化的全新革命主体性模式以及绝对自主和积极充足的革命规划。他拒斥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政治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批判其通过“解放知识分子精英而遗忘主导力量”的天真革命政治思想，保留“‘进步’和代理人”观念，并提出批判-解构的，建构的-伦理政治的双重方法路径。<sup>1</sup>他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寻找某种历史和逻辑的连续性，通过引入一个围绕活劳动-工人阶级-诸众且得到实质性变革的全新革命主体性和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借由解放叙事之否定性和创构性面向的内在一性，既在尊重前者活劳动-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分析框架之合理性的前提下，极力消除其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辩证法和目的论范式，又在坚持后者分散化、多元化、非连续性、偶然性和开放性之逻辑基调的基础上，意图摆脱其单纯的解构性维度所引发的虚无化和乌托邦倾向。总之，这个解释政治逻辑的本体论路径不为创建一个基于结构自身和结构之间自我生成和客观演进过程的纯粹结构层面的历史分析：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世界或历史，而是重在“发现社会现实生产的方式和力量以及驱动它的主体性”<sup>2</sup>：一个由新主体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驱使和推动的历史变迁。

总体来说，奈格里的革命主体性理论主要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对世界范围内激进社会运动的最新发展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教条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他以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和五月风暴激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为现实基础，并基于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旨在通过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彻底颠倒工人阶级-劳动和资产阶级-资本的力量关系，恢复工人阶级的本源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幻象和革命乌托邦残余。第二个阶段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流亡法国巴黎之后，他透过一个后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规划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主体所做的全新构想。他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政治哲学及其复兴尼采和斯宾诺莎的内在性路径视为谋求政治本体论转向的决定性思想资源，并立足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转型，特别是生产过程和主权形式的根本变化，在全方位地重构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绝对差异性、内在性和肯定性原则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主体理论。显然，尽管这两个阶段

1 Paul Thompson, "Foundation and Empire: A critique of Hardt and Negri", *Capital & Class*, No.86, 2005, p.74.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Biopolitics: A Reader*, 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在逻辑上并不存在完全连续性，但奈格里通过对劳动和劳动力形式的持续关注来发掘新的本体力量和政治主体及其组织形式的核心路径却贯穿始终。

在第一个阶段，奈格里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出发，创建了一个回归工人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学的阶级构成理论。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视野“不以生产力的目的论发展为中心，而是集中关注创造者和占有者的冲突。在其核心部分，存在着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众所周知的分析：一个剥削关系，在它之中，与生产工具分离的工人被迫出卖活的劳动力，由此资本家才抽取剩余价值。”<sup>1</sup>进而，他们在彻底颠倒劳动和资本力量关系的基础上，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完全的自主性和首要性地位，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前提，奈格里阶级构成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是立足工人阶级立场并完全以工人阶级为中心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将努力解释长期隐匿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的阶级行为”，“从反对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孪生暴君开始，力图发掘“劳动力商品中的‘政治运动规律’”<sup>2</sup>。它彻底扭转对资本-资产阶级立场的固守，并将历史分析的基础转向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非对称的阶级对抗之上，重在讨论工人阶级如何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当作自身阶级对抗的客观基础，如何打破生产过程中原有组织形式，重新占有生产力，充分实现自身自主的主体性生产。它彻底拒绝列宁主义式的先锋政党模式和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充分展示工人阶级不断抛弃外在组织形式、规划自我管理和自我决定的新组织基础。其全新的政治语法使阶级对抗重新返回到经济生活的中心，直接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哥白尼革命”<sup>3</sup>：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被重构为基于工人阶级力量首要性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

在第二个阶段，奈格里借由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极其复杂的交叉和碰撞，回归斯宾诺莎哲学，实现了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转向，并通过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构架和全新的本体论规划，力图全面突破早期阶级构成框架和政治策略（如拒绝工作、自我价值稳定过程）所遭遇到的困境。他在深入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基础上，重新界划了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在当今时代的合理性边界，并在福柯的主体谱学和德勒兹的欲望主体的共同影响下，提出了一个以内在于性的诸众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主体理论。这主要由两个方面共同促成。其一，他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现代社会状况：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从传统的工业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并把目光重新锁定在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形式的最新变化之上。其二，他通过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激烈遭遇，在政治领域全面复兴内在性、建构性和差异性原则，并将它们与早期基于活劳动的阶级构成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无产阶级

---

Sitze ed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15.

1 Nick Dyer-Witheford, *Autonomist Marxism*, Canberra: Treason Press, 2004, p.7.

2 Steve Wright,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4.

3 Yann Moulier, "Introduction",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19.

革命的政治性-主体性话语充分连接起来，力图为后者提供一个更具积极性和创建性张力的本体论基础。由此，奈格里将政治主体从之前归属阶级斗争框架的社会工人推进为直接基于后现代主义主体模式的诸众政治。

首先，诸众政治拥有多重与之紧密关联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语境。第一，它斯宾诺莎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三位一体的内在性理论传统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和德勒兹）基于绝对内在性和差异性的形而上学构架一脉相承。它们都以内在性-平面性-差异性-开放性取代超验性-等级性-同一性-封闭性为前提，以超验性的调解权力-内在性的创构力量的对抗语境为基础，将批判视角集中在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二元论、超验论、决定论、目的论和辩证法之上，强调以主体性-创造性-动力性-开放性为本质的创构性本体论、从个人到集体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创造过程、立足唯物主义视域和世界直接性的力量展开原则、超越权力异化的反司法主义、绝对-自由之链的开放关系、绝对民主的诸众配置、去中心-去等级-去总体化的内在性平面、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不可预见性-个殊性-虚拟性-偶然性自由生成的事件哲学以及新存在不断再生产的未来学和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时间形而上学。第二，它直接对立现代性图式下国家-主权-人民的政治逻辑。在现代的政治思想史（特别是从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的历史连续性）中，主权-国家-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在面对现代性内部的危机时，国家通过宣告先于主权来补充主权逻辑，人民则作为民族国家的产物，强化和神秘化国家和主权力量的同一性根基。在这个模式中，超验的人民概念是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它旨在使多样性和共通性归属于国家-主权的“太一”。个殊性从而被完全转变为对公共性和普遍性之物的创建，主权和人民的统一也构成民主理论的基础。诸众并非属于一种人种学意义上的分类法，而是一次试图逃离国家-主权逻辑和创建全新人类学的尝试，其首要目的是重新激活被超验的主权-国家-人民压制和取消的多样性和内在性。从人民到诸众的转换意味着从司法-主权模式走向身体-欲望模式，从国家-主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数走向破除权力意识形态操控的少数，从法律主体走向生命主体，从普遍性和同一性转向个殊性和共通性，从超验的绝对主权走向内在的自由生成的生命-身体。第三，它与生命政治理论视域中身体/生命/主体的可治理性和可塑性密切相关。对奈格里而言，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表现形式，诸众的人类学必然与生命在主权决断中的情境存在着实质性的联系。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权力将身体/生命/主体全面纳入政治领域，既可以使它成为被权力机器捕获的首要对象，又能够让它在彻底破除权力操控和全面塑造充足性的基础上展现自身无限肯定和积极自由的自主形式。本着这个线索，诸众的躯体只能由一个创造自由生成运动的生产性潜能、纯粹的解放力量和无限开放的政治聚合过程来承担，其原初模型始于生命政治领域，在它之中，身体和生命是同一的，它们的可治理性和可塑性不再仅仅表现为被动回应权力的无生命力的血肉之躯，而是本身就蕴含了充足生机和无限活力的解放潜能和创造力量。

其次，诸众的真实内涵具备多重本质面向。第一，诸众是内在性的称谓，是个殊性的集合或主体性的多样性。在现代性的主流传统中，霍布斯-卢梭-黑格尔从主权的超验性出发，

一方面抽取出“个殊性的多样性”，并以超验的方式将其统一在人民概念中，另一方面，又将作为个殊性整体的诸众，消解在作为个人整体的“人群”（Mass）中。相反，“诸众不是统一的，而是复数的、多元的。这就是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认为人民可以作为主权权力进行统治而诸众却不能的原因。诸众由一系列的个殊性构成，通过个殊性我们意指一个社会主体，它的差异不能被化约为同一，或保持差异的差异性。人民的组成部分在其同一性中是无差别的；它们通过否定或搁置其差异而变成同一性。诸众多元的个殊性因而对立立于人民无区分的同一性。”<sup>1</sup>人民只提供统一意志和主权行动，是走向主权逻辑的既成性综合，并与“现代性的超验的目的论的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它将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归结为同一性和同质性，同时排除外在之物。相反，诸众则是不可公度的个殊的多样性、具体的普遍性、“非表象的”个殊性平面和开放的关系系列，它提供众多的意志和行动，是不确定的、创构性的开放关系。其内部是由异质性素构成，超越了个体-集体、私有-公共的二元区分，并建基于共享的共通性之上，因而“绝非支离破碎的、无政府主义的和非连贯的”，而是一个主动的新的集体性和社会主体。第二，诸众是一个非工人阶级的阶级概念。一方面，作为社会阶级的诸众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剥削的对象，它“总是生产性的，并始终处于运动之中。从共时的-时间的观点来看，诸众在生产中被剥削；从历史的-空间的观点来看，就其创构生产性社会和生产的社会合作而言，诸众也遭受剥削。”<sup>2</sup>另一方面，诸众又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诸众不会成为一个阶级，恰当地说，诸众不是一个阶级，尽管在其多样性之中，它确实包含着工人阶级的全部特征，饱受剥削、不幸和异化。我们必须超越工人阶级作为人民这样的话语，因为不管是从分析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它都过时了，我们必须抛弃对这种革命主体所抱有的怀旧情绪。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保留它的丰富性、它的力量、它反抗剥削的意志、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以及创造美好未来的能力。”<sup>3</sup>事实上，奈格里的诸众意在充分认识产业工人逐步丧失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赋予所有的劳动形式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反抗机会，并将无产阶级概念拓展为在资本统治之下的所有从事劳动和生产的人。第三，诸众是本体性力量（Potenza）的代名词。诸众谱系学的危机-趋势-转型代表着革命性的生命形式和本体性的过渡，“从构成它的个殊性观点来看，诸众的力量能够揭示自身充足、一致性和自由的动力。”<sup>4</sup>因此，诸众和制宪力之间存在不可破除的连接纽带，必然通过本源性的制宪力来表达自身。从根本上看，制宪力便等同于“诸众的共同目的的行动”，它构成诸众的组织动力。作为制宪力的诸众通过主体，以偶然和非连续的形式不断地重新创构自己，创构新的社会现实，其虚拟性远比真实更加真实。<sup>5</sup>诸众和制宪力的连接必然使作为本体性力量的诸众及其个殊性，不能被化约为权力或宪制权和同一性，正是这种非目的论的创构能力才创造了无超验实体的

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99.

2 Antonio Negri,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15.

3 哈特、奈格里：《大众的历史》，《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译文有改动。

4 Antonio Negri,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18.

5 Antonio Negri,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p.109-110.

个殊性和共通性，“内在性目的”和非目的论原因的唯物主义构成主体性生产的基石<sup>1</sup>。第四，诸众是超越度量的、实在的、创构的和变革的虚拟性。其超越度量的虚拟性源自科学、知识、语言、情感、沟通和合作的生命政治力量及其解放性的流动、游牧、混合和逃离。诸众的游牧、流动和混合的本性赋予其最富创造性的动力，它代表了虚拟性通过可能性走向实在的变革过程，并直接通向逃离帝国统治的绝对去辖域化过程和即将到来的自由空间：诸众的虚拟性操控了可能与实在之间的联系，它不仅作为颠覆性和解构性的武器而处在度量之外，而且作为创构性的制宪力而超越度量，于是，“虚拟和可能作为不可化约的变革和革命机器合二为一”。<sup>2</sup>

最后，诸众是帝国时代唯一的革命主体和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第一，诸众是后福特主义无产阶级劳动力的新构成。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大工业生产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在更高层次的抽象化社会化生产中，从根本上造就“劳动之自主政治组织”的现实基础。计算机定义的人工智能和通讯技术根本地改变了传统劳动过程的性质，确认了人类新的存在境况。智力或语言性的劳动总是带有分析型的创造性和符号性的日常象征。指向身体模式生产的情感劳动则关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生产、组织和调控。劳动过程日趋智能化更加要求高度知识化的生产主体，自主的社会劳动力或智识型无产阶级既可以组织自身的生产，又彻底独立于资本结构。科学、沟通、知识的沟通和合作构成后福特主义无产阶级劳动力形式的主要特征。劳动力的交换不再发生在资本的过程中，相反，活劳动的交换和相互协作构成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它不断创造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控制的无产阶级自主生产力，并指向彻底逃离资本主义的革命潜能。在后福特主义的社会体系中，人民甚至“武装起来的人民”概念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或“非物质劳动者”，它不仅带有大众智能、自主性和创构性的性质，而且构成通向共产主义现实化的基础。第二，作为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体或自我组织，诸众是共通性和个殊性相统一的人类学。非物质的、情感的和认知的劳动与生产的信息化既以共通性为基础，又不断通过日益增长的合作、沟通和联合创造出这种本体性的共通性。因此，共通性既是被生产的，也是生产性的。个殊性的社会性互动、沟通和合作以共通性为基础，反过来，它们的社会沟通又不断生产共通性，而具体表现为一个共通的物质结构，非物质的、认知的和合作的生产通过它才能主宰和约束其他生产形式。在当今社会，作为所有社会价值稳定的条件和主体性的组织形式，共通性的生产和生产性已经越出政治领域走向经济和生命政治领域，“必须能够不只是决定现存社会身体的变革，而且决定它们在诸众的生产性肉身中的彻底转型。”<sup>3</sup>共通性实践的全面渗透和主导使建基于共同的自由表达和生命的激进民主成为可能，保证了诸众内部的个殊性和差异性的相互沟通和统一行动。“诸众正是形成于这个个殊性和共通性的动力的主体性”<sup>4</sup>，因此，诸众的人类学

---

1 Antonio Negri,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11.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69.

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99.

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即“个殊性与共通性的人类学”：“同一和差异的矛盾性概念组合不是理解诸众组织的充分框架。相反，我们是个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并同时分享共通的全球存在”<sup>1</sup>。第三，诸众是内在于帝国生成且颠覆它的本体性的生产力量，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帝国的核心建造民主政治装置的历史主体。正是诸众的力量才造就帝国的成形，它是不可抑制的力量，帝国只是被动的寄生物。同时，它也是内在于帝国并与它直接对立的替代之物，诸众携带的解放潜能意味着帝国的创建也即是自身的覆灭。“诸众的创造运动带给帝国的创建以新的存在意义，或者说，诸众作为替代性范式一直都存在于这个过程中。它内在于帝国，推动着帝国的创建，而不是作为创建肯定的否定或其他类似的辩证解答。相反，它作为绝对肯定的力量发挥作用，推动支配权力走向抽象而空洞的统一，而它自己则作为独特的替代物。”<sup>2</sup>它既是彻底解构帝国体系的否定性力量，又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它作为去辖域化的力量既维系着帝国的再生产，不断地摧毁帝国生存的根基，又时刻展现未来替代性的生命形式和人类共同体。

综上所述，奈格里从阶级构成转向诸众政治的革命主体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均遵循了马克思的内在性思路：通过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生产活动（活劳动/劳动力）来界定革命主体性，即诸众只有凭借生产活动中的连续转型才能在政治上出现，其劳动的本质（技术构成）为它的政治构成提供了基础。同时，他早期的阶级构成理论在逻辑构架上又十分接近于福柯围绕主体的问题化或主体自我形构的内部转型运动而展开的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从知识主体到权力主体再转向伦理主体）。二者都以建构“主体转型的未定条件和可能性”为目的，排斥先验/先天的主体理论及其赋予主体的一切中心化、总体化、普遍化、同一化、本质化、固定化和实体化的绝对形式，致力于在社会历史领域不同的力量关系和多元的话语实践中，挖掘和展示主体如何不断塑造自身主体性进而实现自我转型的动态转化过程。而成熟时期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帝国内部的诸众则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德勒兹欲望主体、差异哲学和游牧政治的痕迹。作为个殊性的聚合整体和本体论的创构力量，以不可度量和无法表象的差异性、内在性、虚拟性、生成性、混合性和游牧性为根本特征的诸众及其主体性模式，其实就是对德勒兹完全抗拒层级化、固定化和规范化的政治组织原则且建基于异质性序列之无限连接、拆解、聚集、布展、流动和生成的内在性平面、个殊性和虚拟性的事件、欲望机器的变形、欲望的聚合、快乐政治的身体、分子实体、战争机器、块茎、去辖域化、逃逸线、生成-少数等核心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转型背景下进行的综合性改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拥有彻底消解主体的后现代根基和绝对的差异性本质，但诸众在本质上仍然表现为一个“阶级的”主体性，只不过它已经对阶级政治的传统边界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重构和无限度的拓展。

---

Press, 2004, p.198.

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27.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2.

## 二、创构性的外在下、他治性、缺失和否定性：拉克劳的代表政治和人民

较之于奈格里与马克思、斯宾诺莎、福柯和德勒兹内在性哲学的亲密关系，拉克劳对革命主体性模式的重新构想则主要是他对拉康主体性理论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运演、应用和拓展。本着拉康主体理论的核心路径，拉克劳主要专注于话语分析来展开他对传统主体概念的批判和替代工作。他将集体政治主体性的构想直接诉诸于“话语的同一性”，认为它“只能作为（总已是）政治行动的结果而存在”，即被层级化地组织成一个政治的-霸权的-斗争之结果”。<sup>1</sup>整体来看，他的革命主体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发展阶段。其一，在早期著作中，拉克劳把战略联盟视为革命政治问题的核心，并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共同推动下，发展出一个和围绕人民的民粹主义话语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拒绝阶级概念的主体理论。其二，自《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之后，拉克劳更加激化了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逻辑的质疑，从阶级模式中完全退出，诉诸话语分析，最终创建了一个基于话语同一性/认同-创构性的缺失、以民粹主义为政治获取新针对性的范式逻辑和以人民为集体政治主体的革命主体性理论。

在他看来，任何客体的统一性或客观性都由话语的接合实践所形构，都具备一个偶然性和不完备性的本质。一切社会的同一性/认同/身份都没有先验的中心，它们不过是借由接合而达成的暂时的享有特权的结点，并不具备必然的先验和本质地位。一切话语对象的连贯性或稳固性总是不断地受到逃避连接实践的因素的威胁，它们始终都被未能成功整合的因素所萦绕，定会以一个无法象征化、符号化、中心化或结构化的不可化约的剩余物或内在缺失为标志。<sup>2</sup>总之，为了给政治留出空间，拉克劳必定会在作为意指系列之关系整体的话语中引入限度或断裂维度，因而拉康意义上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辩证法以及实体和本体的裂缝和间距（包括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和德里达处理内在-外在的创构性的外在下观念）始终发挥着极其关键作用。在话语分析的框架中，霸权和对立-错位则分别处理话语的统一和限度问题。霸权不过是不同主体位置以占据特权的方式所实现的总是遭遇瓦解威胁的部分性的稳定化，即“努力填充那个政治的‘不可填充的’位置的政治运作”<sup>3</sup>。相应地，主体意指霸权运作的这个位置：特殊因素与这个普遍性之空位的同一化正是主体化的环节，但是它又包含着一个去主体化的层面，卷入政治斗争的各种群体在他们自身的需求和同一性之间日益分裂，他们必然会求助于一个更加广泛的力量联盟，以努力表现他们力求占据的普

1 Dani-Gurion and Uri Ram, "Marxism after Postmodernism: Rethinking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al Subject", *Current Sociology*, Vol.62, No.3, 2014, p.304.

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5, pp.105-111.

3 Saul Newman, *Unstable Universalities: Poststructur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5.

遍性维度。换言之，作为一个形式上的空位/虚空，普遍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不能被填充，只能自我表现，但正因如此它才产生了在不同的特殊政治同一性中填充或表现它的欲望，而每一特殊的同一性、断言或需求绝对不能被自我封闭在其差异之中，它必须逐渐形成与其他群体或同一性的联盟，建立将其特殊断言的设定为表现不能以本身出现的普遍性的等价链条。通过对抗和错位概念，拉克劳又向我们展示了以下两点。首先，任何特定的客体/同一性都被一个作为阻断其完全缝合的“外在”障碍的根本性对抗经验所渗透，对抗关系展示了结构的不完备性和特定同一性的限度，因而发挥着一种威胁其自我存在的“揭露性功能”<sup>1</sup>。其次，先于对抗的错位概念则将主体定位在特定结构的裂缝中，把不可化约的内部限度（创构性的缺失）一并给予结构和主体。在它的视域下，任何完整构造的结构和主体都不再可能，它们总是被绝对的偶然性贯穿其中，既非完全被决定，又非彻底自我决定。由此，主体产生在一个错位结构的裂缝中，并透过它与结构缺失之物的同一化来构造自身。这意味着它既不完全内在于又不完全外在于结构，而是产生于结构内部的空无或裂缝中。

依照他的理解，拉康建基于本体论的缺失和创构性的不可能性的主体理论为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政治确立了逻辑基调和核心脉络。一方面，政治现实中的本质问题不是同一化，而是同一化及其必然失败，另一方面，本体-实体、普遍性-特殊性、（政治性/政治本身的）“定序”（Ordering）和（社会-政治的）事实秩序（Actual Order）之间不可弥合的界限、裂缝和距离始终处在根基之处。创构性的缺失及其不可化约的绝对的否定性/偶然性/外在性/不可能性本体论维度既是任何社会-政治同一性/认同得到部分创建的必要条件，又是导致其完整自我构造过程终将失败的根本的背景参照。任何“实体——客体性并不打算完全构建自身”，总是以一个缺席的充足性或原初创伤和不可能的内核来揭示自身的在场，因而社会网络和不同话语实践中不稳固的、多样的和偶然的主体位置恰是“它在结构的中心进行分裂时的位置”<sup>2</sup>或“错位的位置”：一个错位结构的原始裂缝。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并非结构的一个要素，而是如此构成结构的不可能性的结果”<sup>3</sup>。总之，如果彻底消除所有的裂缝和空无，那么政治性的定序和同一化都将不再有任何余地，这等于直接宣告了主体的死亡。而将主体直接化约为相对的主体位置，又无法展示主体得以产生和瓦解客观性之绝对总体性假象的阻断、对抗和错位的根本性环节。<sup>4</sup>显然，拉克劳从主体位置到缺失主体的转变，意图将在拉康主体理论中同一性/主体和同一化/主体化之间的不可化约性、距离或绝对界线，<sup>5</sup>以及在它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不可能性、不完备性、缺失、空无和裂缝等核心概念，视为他重构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根本前提。

---

1 Andrew Norris, "Against Antagonism: On Ernesto Laclau's Political Thought", *Constellations*, Vol.9, No.4, 2002, p.554.

2 拉克劳：“序言”，[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4 Ernesto Laclau e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pp.35-37.

5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00, pp.1-2.

延续上述逻辑，他在《论民粹主义理性》把人民视为当今时代取代社会阶级概念的霸权斗争的政治主体或政治主体性的主要形式：政治的和集体的行动者，并将它用来构想社会同一性/认同/身份的构造。对拉克劳而言，民粹主义话语实际上在霸权政治构造中占据了普遍性的位置，它定会将一个激进的和创构性的外在性-否定性-偶然性-不可能性、内部边界或绝对的异质性当成寻求社会-政治认同（“民众的同一性/认同”）的必然前提。<sup>1</sup> 当一个社会需求未被满足时，其他同样没有满足的需求便可能开始相互连接。如果这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不能以差异化的方式（彼此互相独立）来满足时，它们便连接在一起，并结成一个暂时的统一性，等价链条就得到成功创建。这导致了一个“内部边界”的确立，它将这一等价链条与不愿或不能解决它们的制度秩序分离开来，而之前的“民主的”孤立需求现在发展成为一个“民众的”集体需求。显然，构造等价链条的关键因素在于特殊话语和将众多需求缝合起来的“结点”，只有通过二者的互动和介入，民众阵营的最初团结才能转变为一个“稳定的意指系统”，也正是借由一个等价的符号形式所实现的民众需求之统一化，才确立了革命主体性产生的基础。<sup>2</sup> 当“一个排除性边界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时，即当众多异质性需求的接合以与某个主体位置相关的其中一个特殊需求将自己视为“唯一合法的总体”或对普遍性的再现为形式发生时，人民被建构为一个集体的政治主体，它不过是霸权政治斗争（或等价链条构建）的结果。<sup>3</sup>

本着这个思路，拉克劳更进一步地专注于人民构造过程中的内在限度问题。在他看来，在民粹主义观念中，人民的出现正导源于一个封闭的、连贯的和统一的秩序（客观性、同一性、总体性和普遍性等）的不可能。因此，为了想要拥有民粹主义的这种表达，就必须确立等价链条的普遍性以及“我们”（人民）和“他们”（人民的敌人）之间的对抗性边界。于是，人民并不指现存共同体的总体，而是一个努力把缺失连接其中的追溯性的能指或名字，既可以又不可以被给予产生在内部边界创建之后的集体主体性。它只能产生在对共同体之充足的永远无法实现的寻找中，其自身又只是创构性的社会对抗的结果。正是这个对总体性或闭合性的渴求，以一个根本性的界限而非基础为形式，推动了主体连续的同一化行动。在此，不可消除的裂缝同时存在于再现形式的内部和再现自身的本质之中。<sup>4</sup> 拉克劳将描述再现限度之特征的这个激进的“外在性”称为“社会的异质性”：“系统的局外人，弱者”<sup>5</sup>。它完全不同于处在话语中的对抗，后者因对系统构造来说是偶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而假定了某种“话语铭刻”。作为实在的原质或意指过程的剩余物，它无法在话语上被铭刻，而是发挥着拉康意义上的对象a和剩余快感的功用，不能内在地或外在地被放置，而是处在离密性（既内在又外在、既可能又不可能）的节点之上。它指向“对抗性边界包含的无法得到辩证弥补

---

1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4, 2006, p.648.

2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74.

3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1.

4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1996, pp.98-99.

5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40, p.50.



的异质性他者”，虽然可以出现在等价要求的特殊性之中，但这个不可消除的特殊性不仅恰恰构成等价关系得以构建的基础，而且还是阻断等价链条的自我完备性和连贯性之物。1它并不意味着差异的形成需要一个它从中得到表现的空间，而是预设了那个共同场所的缺席。如他自己所言，“在一个异质性的世界中，除了把局部的同一性视为更加广阔的民众意志之构成的核心和起点，有意义的政治行动都将不再可能”。2以此为基础，它解释了社会的构成和人民的结构，实为人民的霸权建构中的根本性的异类或他者，即“抵御象征化整合的‘人民’的实在（Real）”3。作为一个类似于“命名之必然的副产品”，它代表了一种“命名过程自身的错位”，因而正和人民一样，它的出现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同一性都不能被先验地预言。4正是在这一点上，主体由于只能在“共同体之（不可能的）完备性与表现地点的特殊性之间的非均衡性”中出现，因而总是一个“缺失的主体”。5

概言之，人民的出现直接建基于特殊制度秩序的缺失或结构错位，这是建立内部边界、等价链条与空洞能指之行动性维度的先决条件。社会空间中的分裂、对抗和错位越大，就越需要一个在差异/特殊性中缝合和连接统一性的更具空洞性和包容性的政治主体。以此为前提，人民因始终受制于一个原初欠缺/分裂状态，首先应是一个创设了内部边界的潜在的追溯性能指。同时，由于社会的异质性创建了人民从中产生的内部边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模式实际上必然依赖于一个以绝对的外在性为形式的“局外人”（Outsider）。正是这个不可化约的创构性的基体或剩余物，才是理解人民之政治构造的关键环节。这即是说，拉克劳既去除了人民的历史规定，又将它与一切创造共同体之有意识和有规划的努力完全分离：人民是去实体化的，并不拥有任何具体的社会或伦理内容，同样也不能等同于任何阶级或社会阶层。显然，拉克劳的人民具备“双重表现”：一个被理解成创建内部边界和构造等价链条的回溯性的空洞能指，另一个则是担负了更加根本角色的“命名政治主体的决断”：“政治主体得以从它开始的赌注（Wager）”6。但是，他对人民之名的借用并不徒有修辞学的意义，人民的修辞就其“总是消解调用和部署它的任何利益或政党的教条内容”而言也是创构性的，它既包含着作为争斗特殊性之差异领域的异质性他者，又标志了它们再现的限度。7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根植在创构性的不可能性、缺失、异质性和实在的（以绝对的外在性-否定性-偶然性为本质面向的）人民观念，必然与霍布斯那种基于理性个体自然权利的让渡和由象征性契约缔结的想象统一的人民概念完全不同。对他而言，因为一切客观性和同一性中都渗透

---

1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51.

2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4, 2006, pp.674-6755.

3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52.

4 Oliver Marchar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opulist Reason and the Subject of the Political", *Diacritics*, Vol.35, No.3, 2005, pp.17-18.

5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4, 2006, p.655.

6 Oliver Marchar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opulist Reason and the Subject of the Political", *Diacritics*, Vol.35, No.3, 2005, p.11.

7 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and the trope of the 'People' in Ernesto Laclau's *On Populist Reason*",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s.2-3, 2012, p.202.

着一个不可能性和异质性的原始创伤内核，所以在产生自客体社会之不可能性的人民中，根本不会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总体性、特定的内在性、完全的在场、任何种类的一切本体论的优先性、社会空间中的同质性或特别是，作为太一之人民的可能性”。<sup>1</sup>然而，尽管人民不只是表现为一个“超验因素”的“领导者形象”，但绝不意味着拉克劳完全放弃了超越性逻辑。遵循拉康、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等人基于去根基化的根基或去在场化的在场来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主义路径，他只是把超越性转变为“在不是虚无的虚无中对结构的超越”，从而将人民视为一个扎根于“空无的超越性”且“拥有超越自身之物的结构”。<sup>2</sup>以此出发，人民绝非一个能够完全自我决定的自主实体：“为了在其存在中被决定，它无需超出自身”<sup>3</sup>，相反，“为获取一个共同的身份和意志，它必须确认外在之物：立法性的局外人”，需要借助一个以完全的自我决定为名的他治性关系，以“他治性和自主性的永久协商”为形式，来确保自身的自主性。<sup>4</sup>

总的来说，拉克劳拒绝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与他致力发展的人民观念，认为二者代表着两种构想社会同一性/认同的完全不同方式，无法真实并存和相互通约，只能选择其一，或根据与之对立的替代性视角对它进行重新界划。<sup>5</sup>他借由使意识形态和政治自主于任何社会基础，以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阶级之间的对抗，以话语/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力图完全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模式，并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彻底去除。<sup>6</sup>他把主体范畴重构为话语结构中的“主体位置”和总是具备原初创伤内核的缺失主体，摧毁了所有主体认同/身份中的绝对同一性、普遍性和总体性形式，强调其碎片化、偶然性、多样化和流动性的本质。他创建了一个由多元异质性话语构成的“人民同盟”<sup>7</sup>或大众主体的全新政治主体理论，不再把它当作具有普遍意志的统一实体，也不主张其内部存在阶级关系或占据决定性地位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个后结构主义式的政治-主体理论虽然突显了创构性的异质性在社会同一性/认同构造中的首要性，但它“不是对在逻辑上是可决定性之过程的真实颠倒”，而是通过一个准先验模式的引入（“实在界的侵入”或由异质性对同质性所实施的瓦解和阻断），确立了政治在创建社会关系中的优先地位，并以霸权构造（霸权接合的连续性）取代了作为“真正自制式的总体性”的生产方式概念。<sup>8</sup>因

---

1 Gloria Perelló and Paula Biglieri, "On the Debate around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Multitude or The People",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s.2-3, 2012, p.323.

2 Gloria Perelló and Paula Biglieri, "On the Debate around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Multitude or The People",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s.2-3, 2012, p.326.

3 Ernesto Laclau, "Democracy between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Democracy Unrealized: Documenta11\_Platform1*, U.M. Bauer, M. Nash, O. Enwezor, O. Zaya eds., Germany: Hatje Cantz, 2002, pp. 377-378..

4 Kevin Inston, "Representing the Unrepresentable: Rousseau's Legislator and the Impossible Object of the Peopl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9, No.4, 2010, p.396.

5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4, 2006, pp.646-647.

6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pp.1-2.

7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8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4, 2006, p.672.

此，尽管它极力避免对激进的差异性-多样性-异质性进行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化约，但并未彻底放弃普遍主义原则而走向纯粹的特殊主义，而是通过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介入和彼此颠覆，来对普遍性-特殊性的关系作出新的表达。<sup>1</sup>

## 结语：后结构主义差异政治中完全不可通约的主体理论

纵观奈格里和拉克劳的革命主体性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它们同属后结构主义式的后主体范畴：都拥有反先验论和本质论的多样化、分散化、非固定性、偶然性和混合性本质和形式，都拒绝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以及同一性-差异性的二元论来界划政治主体/社会行动者，但二者却存在着在根基上完全相反甚至彻底对立的本体论模式。前者基于绝对的内在性、多样性、肯定性和充足性原则，通过纯粹差异的一元论，创建了一个作为唯一本源性生产-解放力量且只能立足自身存在和需求的集体主体性：完全自主和自我充盈的诸众或后福特主义的无产阶级。后者则基于后基础主义的超越性、缺失性、外在性和否定性机制，借由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玷污关系，将总是携带根本否定性面向的人民之“自主”条件诉诸于一个准先验的他治性：运行在不可抵达的实在界激进的异质性、不可能性、外在性和偶然性。前者立足纯粹的差异性立场，拒绝在政治上的任何普遍性和同一性形式。它构想了一个由特殊性-多样性-异质性因素聚合而成且具备丰富历史-政治-伦理规定的革命主体性的实体框架，并在解构传统主体范畴和阶级本体论的前提下，对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框架有着实质性的保留。后者则以准先验的和超越性的模式，遵循对同一性-差异性、普遍性-特殊性的调和路径（被特殊化的普遍性和以普遍性为可能性条件的特殊性）。它通过本体-实体层面之间的本体论裂缝和可能性-不可能性的辩证法，对集体的政治主体性采取了一种去实体化的形式化理解，完全摈弃了它的社会内容和伦理意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层面的普遍性和同一性原则预存了运行空间，但它却在替代而非彻底消解传统主体观念的基础上，走上了完全背离阶级政治的道路。

其一，虽然他们都对客观主义模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发起了批判和超越，力图彻底清除一切带有决定论、本质论、目的论和先验论色彩的历史-社会-主体理论，但二者分别拥有不尽一致的批判对象和解决方案。奈格里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矛盾的传统分析框架及其导致的经济主义、自然主义和机械因果论倾向，借由一个摆脱客观主义之必然性-目的论-决定论模式的全新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及其在社会转型和历史演进中的根本地位，提出了一个基于创构性力量之内在展开和政治直接性的纯粹内在性的政治主体性模式。拉克劳则致力解除马克思主义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生产方式构架（确立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优先性和生产力的中心位置）及其必然招致的本质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和内在主义的对抗-危机-矛盾观，

---

1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通过确立摆脱任何社会基础（经济领域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创建了一个基于创构性缺失性和政治调解性的激进外在性的政治主体性模式。

其二，虽然他们均通过从主体转向社会的行动者概念来拒绝主体/行动者/代理人-客体/结构/实体的二元论，都不再单纯拘泥于主体-客体、行动者-结构以及自由意志-决定论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也都反对结构对主体的完全吸收，但二者对结构和主体关系的处理有着相互冲突的路径和结论。奈格里把结构和主体的辩证法理解为从客观结构的内在危机向绝对自主的革命主体性模式的转变。他始终坚持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中寻找新政治主体和社会本体力量，认为革命主体源自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内在矛盾和结构性危机，即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生产活动或活劳动/劳动力。进而，他又仅仅立足革命主体的自我转型过程来揭示它自我组织化的本体论领域，最终将其作为客观基础的结构形式彻底化为绝对充足的革命主体性自身创构力量展开的内部环节和直接结果。拉克劳则否认革命主体内在地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自身，强调资本主义的错位并不完全归因于资本的客观矛盾：它不但是复杂因素的多元决定的结果，而且还创造了仅能引发其政治接合的不确定的效果，而实施政治接合的主体恰恰外在于这个错位的结构，它们同一性形式的获得和改变则只是接合实践的结果。由此，他拒绝把结构当成主体的要素，而是将只能产生于结构自身的内部裂缝、缺失和空无的主体视为不可判定的结构和决断，即实体/客体/客观性之自我构造的必然失败。换言之，主体本身始终表现为一个“作为潜能的可能性，其效力总是从一个新社会结构或象征秩序内部被追溯性地认识-现实化”<sup>1</sup>。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一定会把拉克劳具备原初缺失性和激进否定性的政治主体视为资本主义的同路人，而拉克劳则又会将奈格里自足而肯定的革命主体性话语判定为唯意志论的代言人和另一先验主体模式的当代变种。

其三，虽然他们都强调一个基于多样性、偶然性和非固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主体形象（人民联盟和诸众），且他们的集体的政治主体性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法有效建立政治沟通机制的缺陷，但二者在关键问题上包含了根本分歧。奈格里的政治主体理论实为一个拒绝辩证否定观的“个殊性政治”<sup>2</sup>或纯粹的差异政治。在此，与多样性存在内在关联的个殊性主要包括三个本质维度：所有的个殊性就其不能脱离与其他个殊性的关系单独存在而言都是关系性的，即任何一个个殊性都指向外在于自身的多样性，并被它所界定；所有的多样性必然是内部分化的，并且这个分化不但没有破坏它，反而实际上构造它的那个多样化存在；由于每一个殊性在内部和外部都是个殊化的，所以它们始终处在持续的流动或不断的差异化状态。<sup>3</sup>由此出发，首先，他主张诸众的革命主体性绝对不能借由其统一性而只能根据它从中得以聚合的个殊性之特异构成来理解。其次，他将真正的政治主体性视为拥有充足现实基础和无限创造力量的真实存在。这是一个完全自我决定的自主而充足的实体，既具备不断流

---

1 Yong Wang, "Agency: The Internal Split of Structure", *Sociological Forum*, Vol.23, No.3, 2008, p.481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0.

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38.

动和混合的物质性肉身或社会躯体，又表现出多种形式的典型形象。诸众的阶级构成是一种拥有必然性历史条件和异质性构造的实体框架：“在解放的政治条件下，诸众是一个由欲望、语言、斗争实践以及理论等构成的实际主体”<sup>1</sup>。因拒绝承认政治上构建任何普遍性和规范性的可能性，奈格里尽管一再申明诸众由共通性保证的集体性面向，但革命主体性内部定会受制于其绝对差异化的本性，而缺乏构筑政治互动和政治沟通的有效方式。对他而言，拉克劳通过同一性（Identity）来强调统一性（Unity）只能冻结多样性，因而最终摧毁了诸众的力量之源。同时，他基于外在性和超越性模式的霸权政治和民粹主义逻辑在绝对内在性的生命政治生产中也是完全不切实际。因为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性根植在以共通性之中的集体性知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相互”之中，所以由霸权驱动的政治规划将只会破坏生命政治生产自身的需要。<sup>2</sup>拉克劳的政治主体理论则是一种带有原初创伤内核的分裂-缺失-话语的主体性模式以及建基于多样性和偶然性的“认同/同一性政治”：一种规避了本质论化约且总是被偶然性和多样性所渗透的话语同一、身份政治和“姿态政治”<sup>3</sup>。他将主体限制在立场、位置或身份意义之上，重在强调主体完全成为自身的不可能性，即立足匮乏的缺席或错位的主体身份构造，把革命主体之间的协同斗争理解为不同主体身份/位置/认同之间的链接实践与十分松散的“人民阵线”、“人民同盟”或“阐释的战争”<sup>4</sup>，即由多元话语所决定和暂时的霸权接合所结成的松散的政治认同体。尽管他通过调和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方式，以它们之间相互依赖和彼此颠覆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摆脱绝对普遍主义和纯粹特殊主义的政治模式，规避唯意志论和相对论的风险，但依然因具备差异化、离散化、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根基的政治规划，无法在空洞的形式化的人民内部达成一个实质性的合作、阵线和联盟。在他看来，因对普遍性和规范性的完全剔除，奈格里的纯粹内在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理论构架不但缺乏对于充分说明政治逻辑至关重要的水平化的政治连接环节，<sup>5</sup>而且终将沦入一个由绝对的差异体系导致的绝对的同一体性或封闭的总体性之中。事实上，拉克劳的主体理论同样无法充分回答与内部边界相关的规范性悖论：因为急切强调社会的开放性和偶然性，结果使他无法为政治提供任何有效的规范基础，直接造成他著作伦理-政治维度的难以捉摸。<sup>6</sup>这与他坚持不懈地应用“政治的形式化和几近结构主义式的说明”关系密切。<sup>7</sup>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都批判霍布斯的人民概念，但二者对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

---

1 奈格里、张君荣：《访安东尼奥·奈格里：“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的传统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日。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05.

3 Antony Cutler, Barry Hindess, Paul Q. Hirst and Atlas Hussia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II, London, Henley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78, p.316.

4 [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5 Ernesto Laclau, "Can Immanence Explain Social Struggle?",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P.A. Passavant and Jodi Dean ed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8.

6 参见 Norman Geras, "Po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163, 1987, p.69, pp.76-77; Michael Rustin, "Absolute Voluntarism: Critique of a Post-Marxist Concept of Hegemony", *New German Critique*, No.43, 1988, p.173; Mark Anthony Wenman, "Laclau or Mouffe?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29, No.5, 2003, p.582.

7 Christian Lundberg, "On Being Bound to Equivocal Chains", *Cultural Studies*, Vol.26, Nos.2-3, 2012, p.304.

理解。拉克劳拒绝将人民视为绝对充足的自主实体，并对它做出了一种完全排除历史规定和政治内容的去实体化和形式化的解释。他诉诸于一个以完全的自我决定为名的他治性，即为了达成某种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或实现人民的霸权建构，必须确认一个能够为之立法的绝对的外在性。因此，产生于客观秩序之不可能性或结构错位的人民，只能展现共同体缺失的充足性和完备性，绝对无法形成完全的内在性、完备的总体性和自我充足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作为社会异质性的主体性（人民）定位在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边界，同时还为它预先设置了一个超越性的政治调解机制。与之相反，奈格里则明确主张任何所谓的“人民”都指向“一个与主权的过时形式、愈发多余的代表模式和（私人的）所有制的压迫形式相连的统一性”<sup>1</sup>，并将它当成现代民族国家主权范式的根基：诸众只能通过契约和代表这一外在性和超验性因素的调解才能成为人民。它是与诸众的内在性完全无关的超验性建构，只会展示社会封闭的同一主义原则。它创造了一个得到无限拓展从而完全吞没一切个殊性并使一切东西统一化的同一性，从而与诸众奠基其上的存在的完全性、绝对的多样性和自我组织（政治直接性）原则彻底对立：“诸众之多元的个殊性与人民之无差别的统一性完全相反”<sup>2</sup>。因此，人民的革命主体性绝对无法与诸众之阶级构成的特异性相协调，作为绝对的异质性他者的诸众只能在帝国统治或权力秩序的核心位置来构想，它绝对不可能作为一个无法达及和不可理解的本体性限度和界域而在客观秩序之外出现。

其四，虽然他们都主张从对立政治到对抗政治和从同一政治到差异政治的转变，但二者却分别拥有相互抵触的问题框架和逻辑基础。拉克劳力图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本质主义，根据政治偶然性和多样性的逻辑来定位社会斗争和对抗，奈格里则聚焦于生产力以及劳动和劳动力形式的变化所包含的解放潜能，直接将社会斗争和对抗的可能性条件置于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改变以及新社会行动者的出现造成的一系列错位效应之中。由此出发，前者通过揭示工人阶级概念和阶级政治视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基础而完全抛弃它们，至多把劳动和资本的对抗看成围绕政治认同之众多斗争的其中之一。后者则仍然建基于一个得到实质性改造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他将阶级视为生产的物质范畴的宽泛概念，不把阶级斗争归结为传统的工人阶级观念，而是将无产阶级与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斗争的无数异质性的行为主体联系起来。同时，他们都将资本主义当成各自政治本体论得以实现的历史中介，但拉克劳立足话语-霸权实践将政治逻辑（社会冲突和对抗）从生产关系中分离，奈格里则根据诸众的创构力量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中摆脱。前者认为，因为所有的社会、客观性、同一性或意指系统都拥有一个创构性的和绝对的外在性和缺失本质，所以应把对抗的基础从历史的必然性转向政治偶然性的不可化约性。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并不直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依赖在它之外且能够调动起来反对它的因素，而社会变化的最终

---

1 Oliver Harrison,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 Post-Marxist Thought: Laclau, Negri, Badiou, Surrey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14, p.82.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99.

动因在本质上只能是话语之差异的无限嬉戏，而非资本主义或其他动力，它们反而都是社会生命的特殊的霸权接合。后者则主张，由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界划的生产性的诸众彻底自主于日具寄生性的资本主义体制。作为本体性的制宪力之现实化身，它完全是自我组织的、自我决定的、自我制度化的和自我价值增值的，构成所有真正的变革、想象、自由和创造性之根源。在这里，与拉克劳不同，对抗不再被偶然性政治话语的接合或其他任何调解界定，而是内在于资本吸纳的社会生命的所有因素之中，因而是直接的和未经调解的。

概言之，因建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创构性的缺失（拉康）、外在性（德里达）观念，拉克劳始终都将代表/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当成政治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坚持一个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政治空间。相反，因诉诸于后结构主义的内在性平面和平滑政治思想（德勒兹），奈格里则固守一个绝对没有外部的未分化的或一体的平滑空间以及排除了一切超越性、同一性、等级性和调解性机制的非-代表性/表征性/再现性的政治，它们均建基于共产主义诸众的完全内在性以及制宪力和宪制权、诸众和帝国之间的非均衡性力量关系。在拉克劳看来，就诸众的自主性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才能实现而言，奈格里仍然固守一个经济主义的目的论和经济的必然性逻辑，而他将政治革命构想为诸众自主性的实现也等于默认了政治的总体性闭合。但对奈格里而言，任何集体同一性的政治建构行动和代表性行为都是对诸众之自由、创造性和自主组织的限制，拉克劳那种通过话语框架设想的类似链条纽结的同一性之连接或霸权的接合实践实为压制诸众之制宪力和生成的宪制权或重新引入超验等级性和先验目的论的他治性机制。相反，诸众自身即是一个排除了一切必然性和调解性的“恰当的政治组织概念”。从这个角度看，拉克劳必然认为，霸权的接合实践或水平的政治连接在奈格里理论框架中的缺失，使他无法充分解释反抗的产生，更不能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连贯的集体政治主体性模式，其诸众理论也会否认和化约话语差异游戏的政治偶然性维度。而奈格里则又势必主张，拉克劳的话语理论以及随之产生的接合和代表/表征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等级性和中心化的主权配置，它遏制和消解诸众的创构性力量及其逃离和抵抗固定秩序和制度的固有趋势。

[作者简介] 宋晓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mail: felixsong@henu.edu.cn.

# 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sup>□</sup>

孙乐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机器论片断”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其中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此时他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也没有准确揭示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致使他把“魁奈之谜”当作资本主义崩溃的根本依据，未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解剖。而《资本论》则全面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实现了对这一片断的内在超越和发展。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从纯粹主体逻辑出发，将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进而将《资本论》视为它的历史倒退时，不仅夸大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地位，抹杀了《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意蕴，而且也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实质。

**关键词：**机器论片断；《资本论》意大利自治主义；历史辩证法；阶级斗争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沉寂百年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构马克思哲学的主导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sup>1</sup>一节（这也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被他们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sup>2</sup>。由此出发，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主义流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们这里，《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视为是这一手稿的历史倒退，进而将《大纲》与《资本论》完全对立起来。针对这种解读，国内外学界也积极地做出了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澄清，即“机器论片断”能否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或者说，该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这一片断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资本论》中，他全面超越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建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内在依据。就此而言，完整地把握从“机器论片断”到《资本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sup>□</sup>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401）“《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0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10页。

<sup>2</sup> Franco Pipern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ntimental Educatio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为我们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公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主观公式”（即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重要启示，而且也能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 一、作为“圣经”的“机器论片断”：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 对马克思形象的政治重构

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则相对滞后，直到1939-1941年才首次在莫斯科公开出版，并于1953年由东柏林狄茨出版社再版。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当时这一著作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直到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出版，才使西方学者认识到《大纲》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了这一著作在西欧的传播与研究。<sup>1</sup>但就当时的反响来看，它在意大利产生的轰动效应尤为突出。

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莱尼奥洛·潘兹尔瑞、马里奥·特隆蒂、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等。与其他左翼思潮不同，这一流派的直接指向并不是为了反抗右翼势力，相反，而是为了对抗意大利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哈里·克里弗指出：“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量工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强大共产党的对抗和拒斥。在美国，‘回到马克思’是在反抗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影响下出现的；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和法国，它是在对抗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中生长起来的。”<sup>2</sup>在他们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完全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成为资本力量的帮凶，企图镇压工人的反抗运动。也是在此背景下，自治主义者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工人的解放，就必须摆脱一切幻想，既不能依靠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工会组织，更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家，相反，惟有依靠工人自身，才能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上。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那种强调客观规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脱离工人运动的纯学术研究，主张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哲学。这种工人中心主义构成了这一左翼思潮的核心特征。如特隆蒂所言：“我们的工人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官方工人运动的真正区别在于，工人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sup>3</sup>

而《大纲》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就像奈格里指出的那样：“一方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

---

1 [意]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2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2000, pp.64-65.

3 Mario Tronti, "Our Operaismo",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2.

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sup>1</sup>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幻想，从《大纲》出发，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被他们称为“机器论片断”的这一手稿恰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维尔诺指出：“在西方，当英雄遇到巨大困境时，他们经常会从《旧约》中引出一段经文，或者来自《诗篇》或者来自《以西结书》，并把它们从各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顺其自然地将其融入到当下的偶然处境中，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被阅读和引用的。”<sup>2</sup>可以说，这一片断在整个自治主义运动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

20世纪60-70年代，工人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反抗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传统，从而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轴心的激进政治哲学，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决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是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的产物，相反，而是现实主体对抗和工人自治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解读一开始就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即为真正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一点在奈格里的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中得到了充分体现。<sup>3</sup>他指出，与充斥着客体主义的《资本论》不同，《大纲》完全“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sup>4</sup>，其中到处充满了对抗。如果说在价值和货币阶段，这种对抗还是潜在的，那么，经过剩余价值阶段，这一逻辑最终在“机器论片断”中彻底成熟。因此，如果说《大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那么，“机器论片断”则是《大纲》的顶点。“《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断’……结束，因此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性达到完满”<sup>5</sup>，这一片断“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sup>6</sup>在这里，奈格里重点抓住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义哲学。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引入，不论是从价值增殖形式还是从物质形式来看，劳动都不再像前期那样是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而是沦为生产过

---

1 [意]内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肖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内格里即奈格里，音译不同——引者注）

2 Paolo Virno, "Notes on General Intellect",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265.

3 1978年，美国学者古尔德出版了她对《大纲》的系统研究著作《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正是基于这一手稿的解读，她建构了一种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的、强调偶然性和个人主体能动性的自治哲学，与奈格里的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参见[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5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6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程的一个次要环节。这就意味着，在机器大生产阶段，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结果，“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sup>1</sup>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量”<sup>2</sup>，只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时间就永远是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源泉；但另一方面，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又竭力把劳动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会遭遇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最终趋于崩溃。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想通过资本的矛盾运动，来论证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崩溃的可能性（这一论证还存在重要缺陷，下文将着重分析）。然而，奈格里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径直将其转化为主体对抗的生成逻辑。他指出，第一，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意味着劳动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资本对立的自治主体；第二，既然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这就意味，要推翻资本主义，无需发动革命，只要每个自治工人有意识地拒绝劳动，就可以达到了，“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sup>3</sup>。于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不再是客观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再是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是工人自主选择、自我建构的结果，“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sup>4</sup>正是基于“机器论片断”，奈格里颠覆了马克思的传统形象，重构了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建立了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革命主体政治学，打开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自主之路，完成了对“机器论片断”作为一种圣经式文本的全面论证。

也是在此基础上，奈格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重点批判了两种倾向：一是以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把《大纲》视为是马克思完成“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一部不成熟的幼稚著作，“这个文本只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中已经提出的观点。《大纲》只是一个散发着唯心主义和个体式伦理臭味的草稿；我们在‘机器论片断’中找到的对共产主义定义的描绘只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sup>1</sup>二是以罗斯多尔斯基为代表，奈格里指出，他仅仅把《大纲》看作是《资本论》的准备材料，一味地强调它们之间的线性连续性，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断裂和异质性，把《大纲》所散发出来的、具有天才性质的主体政治学消融于《资本论》的客体逻辑之中。这种解读实际上是以一种目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3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4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5-196页。

论预设为前提的，即“《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sup>2</sup>，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方法”<sup>3</sup>。这两种观点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完全贬低了《大纲》的历史地位。与此不同，奈格里认为，《大纲》既不是早期逻辑的延续，也不是《资本论》的准备草稿，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部具有独立地位的革命性著作，其中彰显出来的对抗逻辑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精髓，只有从这一文本出发，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也正是基于此，他将《大纲》视为“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sup>4</sup>。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即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决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罗斯多尔斯基那样，把《资本论》预设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以此来解读《大纲》，这样不仅会阉割后者的革命意义，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资本论》的客体主义倾向，相反，必须抛弃这种目的论预设，以《大纲》为轴心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我们就能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理解（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sup>5</sup>而克里弗的《政治性地阅读〈资本论〉》（1979）就是这一理论努力的积极尝试。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福特制转向了后福特制。如何理解这一转型的本质，并为这一时期的工人自治运动提供理论指南，就是摆在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背景下，他们再次回到了“机器论片断”来寻找灵感。如果说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更多地集中于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那么，此时他们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也翻译为“普遍智能”）的论述。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知识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固定资本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明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而导致“一般智力”的形成，“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sup>6</sup>实际上，此时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智力决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必然会把这种一般智力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

---

1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2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3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4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5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sup>1</sup>结果，就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资本对一般智力的追求，直接危及到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财富生产本身。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sup>2</sup>。于是，一般智力也就摆脱了资本的限制，成为未来社会财富生产的基础，“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sup>3</sup>届时，每个个体都将成为一般智力的主人，实现了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的内在统一。

在所有著作中，这是马克思惟一一次提到“一般智力”概念。而自治主义者就紧紧抓住了这一概念，将其建构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不过，与20世纪60-7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不再是基于对这一片断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式阅读，而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一般智力范畴的重构。维尔诺指出：“马克思完全把一般智力（即作为主导生产力的知识）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内化为机器体系的‘客观科学力量’。结果，他完全忽视了今天绝对居于主导的另一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sup>4</sup>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越出了固定资本的限定，不再表现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是表现为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思考能力和潜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习惯和‘语言游戏’。”<sup>5</sup>也是基于此，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解，变成了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潜能，即“智力一般”。其次，是对劳动范畴的重构。他们指出，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曾预测到，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将逐渐下降，最终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证明马克思预言的虚假性：在后福特制时代，普遍智能已经实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而是产生了一种更加稳定的统治形式。<sup>6</sup>马克思为什么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呢？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劳动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他所理解的劳动完全是一种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这种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自然会逐渐趋于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因为一般智力的发展孕育了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即非物质劳动。与前者不同，它不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生产非物质化的思想、智力或信息等内容。拉扎拉托指出：“非物质劳动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101页。

4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106.

5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106.

6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Multitud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100-101.

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南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sup>1</sup>不过，哈特、奈格里指出，拉扎托完全忽视了情感劳动，因此认为他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定义了这一范畴，将它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语言或智力劳动以及情感劳动，<sup>2</sup>彻底实现了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再次，是对新型统治形式的思考。他们指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形成，资本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马克思仅仅强调物质劳动，因此，在他那里，资本的统治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在生产场所对工人身体的规训，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统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控制，将整个生命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在生命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为权力追逐的猎物。”<sup>3</sup>最后，对革命主体和解放道路的再思考。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完全是以从事物质劳动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在后福特制中，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物质劳动，成为当代社会劳动的主导形式，因此，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必须要从非物质劳动出发，重新建构革命的主体政治学，这也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大众概念。从内涵上讲，他们所理解的大众实际上就是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人，它不再像工人阶级那样拥有相同的身份认同和阶级意识，或者说具有同样的本质属性，相反，大众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性，因而是一种多样性的集合。那么，大众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呢？前期的那条自治对抗逻辑再次登场了。维尔诺指出，既然一般智力已经转化为每个个体自身具有的潜能，这就意味着，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同一，个人已经转化为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社会个人”，即一般智力的主人；于是，他们就实现了“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全部占有，从而也就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治主体。这恰恰也是奈格里“大众智能的苏维埃”<sup>4</sup>的逻辑基础。

这一时期，他们正是通过对“机器论片断”的批判性重构，实现了自身理论逻辑的当代转向。不过，从最终导向来看，他们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一片断，而是力图在当代语境中重塑这一片断的理论生命力。如一些学者所言，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之所以批判这一片断，“其目的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简单超越或否定。相反，透过对马克思的超越和否定，他们希望最终在转变了的社会现实条件之上，重新召回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

---

1 [意]拉扎托：《非物质劳动》，霍炬译，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2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8. 实际上，哈特、奈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解也存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帝国》中，他们把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和象征性劳动，三是情感劳动。到了《大众》中则删掉了第一种，保留了后两种，并主张用生命政治劳动来称谓它们。

3 [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引文所有改动。

4 Antonio Negri, "Constituent Republic",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219.

预测或愿景。”<sup>1</sup>就此而言，“机器论片断”依然是给予他们灵感和启示的一部“圣经”。

## 二、“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局限性与《资本论》的超越

2000年，随着《帝国》一书的出版，自治主义已经越出了地域局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一股左翼思潮。针对这一流派，国内外学界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客观评估了它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然而，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澄清，即究竟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地位？或者说，能否把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准？这种“圣经式”的比喻固然突出了它的重要性，但也过分夸大了它的历史地位。实际上，这一片断只是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积极尝试，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也必须看到，他这里的分析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回应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对马克思形象的重构，首先必须实现对“机器论片断”的祛魅，准确定位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但如何理解机器大工业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此时他尚未给出科学的分析，而是像舒尔茨、拜比吉等人一样，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生产，这决定了他必然无法科学解剖机器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只能从分工入手引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尤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做了重要推进，但此时他并没有实现了对机器大生产或自动工厂的科学认知，仍将分工视为后者的核心构件，显然是不准确的。<sup>2</sup>

经过《伦敦笔记》的洗礼，到了《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的认识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这一片断的开头，马克思一上来就引用了拜比吉和尤尔关于机器和自动工厂的论述。<sup>1</sup>这使他充分意识到，与工场手工业不同，在现代工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劳动分工，而是资本与科学力量的联合，是机器体系之间的协作。在这里，分工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工人也随之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但马克思又强调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机器体系决不只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同时也表现为价值增殖的手段，表现为由资本所决定的特殊存在形式，即固定资本。因此，后者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机器大生产阶段。“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

---

<sup>1</sup> 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sup>2</sup> 参见拙文：《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

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sup>2</sup>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机器大生产已经消除了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因此，要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就不能再像前期那样从分工入手来引出资本主义的矛盾，相反，必须站在机器大工业这一制高点上，来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做了一些积极尝试，试图从资本对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的追求，进而导致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来论证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这也就是上文中被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奉为“圣经”的那些段落。

不得不承认，与前期相比，“机器论片断”的确做出了重要推进：它超越了前期的分工逻辑，从资本与科学的联合入手，客观分析了现代工厂的运作机制，并试图站在机器大生产之上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能否把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最成熟的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矛盾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尝试，其中还包含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点，笔者所强调的历史局限性与哈贝马斯和自治主义者关于这一片断的认知存在本质区别。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类的历史是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按照这种设想，在先验意识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技术史。”<sup>3</sup>换言之，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整个分析完全是建立在技术决定论之上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同样，自治主义者始终将这一小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这本身就忽视了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关系维度，潜在地将其扭曲为一种技术史观，而他们对这一片断的批判和重构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实际上，这些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在这里，马克思从未想过要建立一种技术史观，更没有单纯地从技术维度或工艺学出发来论证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而是始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可能性。他指出：“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sup>4</sup>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一直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同样，他也始终坚持从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双重维度来分析机器体系，明确区分了作为物质资料的机器体系和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并坚决反对单纯地根据前者来认识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分析了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在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历史作用，而且也从生产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94页。

3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关系入手分析了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吸纳过程,揭示了后者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倒置为统治工人权力的根本原因。以此来看,所谓技术决定论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马克思无须负责。<sup>1</sup>

那么,这一片断的局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大纲》中,这一节出现在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而在《资本论》中则被放在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标题下。这种位置上的调整,反映了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新的思考。在此,笔者就通过《资本论》与“机器论片断”的比较分析,来细致挖掘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和发展,为我们清晰定位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财富尺度和劳动二重性学说。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sup>2</sup>但随着机器体系的采用,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更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赋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sup>3</sup>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做了一个重要推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sup>4</sup>一个全新的社会即将到来。

这些论述正是20世纪60-70年代被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奉为圣经式的段落,也是国内外学界经常反复引用的段落。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却很少有人去反思这些段落的缺陷。在这方面,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sup>5</sup>我以为,这一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sup>6</sup>,而这种区分首先是“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sup>7</sup>。其中,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有用的具体劳动,而生产价值的劳动则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就前者而言,任何使用价值都是自然物质

---

1 就此而言,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用“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命名这一片断,是非常准确的,它完全克服了“机器论片断”这一称谓的内在缺陷。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9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5 Michael Heinrich, "The 'Fragment on Machines': A Marxian Misconception in the Grundrisse and its Overcoming in Capital",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pp.207-2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和劳动的结合，“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sup>1</sup>，“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sup>2</sup>。就后者而言，价值并不取决于直接劳动量，而是由抽象劳动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根据这一理论，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的分析还存在明显的历史缺陷：此时他把直接劳动视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将直接劳动时间理解为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源泉，这一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这里的财富是指物质财富，那么，直接劳动从来都不是它的惟一源泉，这里面还应包括自然界；如果是指社会财富（价值），那么，抽象劳动才是它的价值实体，而直接劳动也从来都不是它的尺度和源泉，更不消说是惟一的尺度和源泉了。因此，马克思据此所做的推论，即一旦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交换价值生产就要崩溃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要解体了，恰恰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推论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直接劳动做出的，虽然他力图基于质和量的辩证法，来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但实际上二者的参照系却是一样的，即都是直接劳动，或者说，是后者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与后来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所体现的质（具体劳动）和量（抽象劳动）的辩证法完全不同。这表明，此时他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二重性理论。<sup>3</sup>

第二，“魁奈之谜”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此时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分析了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一方面广泛唤起自然科学和一般智力，使财富创造不取决于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用劳动时间来衡量这些力量创出来的财富。于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惟一尺度和源泉。”<sup>4</sup>那么，这一矛盾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最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回答》中指出：“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约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sup>5</sup>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明确指认了这一点，并将其称为“魁奈之谜”。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将其指认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5页。

3 一些学者可能会引用《大纲》的如下段话来反驳这一观点。在“资本章”中，马克思说：“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关……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的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4-255页）这段话似乎表明，马克思已经建立了科学的抽象劳动理论，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的抽象劳动只是就劳动逐渐丧失特殊技巧而言的，它在本质上仍被界定为一种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物质的活动”，这显然与后来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存在本质差异。只是到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1-42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5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并认为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最终趋于崩溃。而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机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缩短了“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价值”，使商品的价值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sup>1</sup>使剩余价值得以提高。“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解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sup>2</sup>在这里，马克思把这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称为相对剩余价值，并根据提高方式的不同，划分了三种形式：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完成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面建构。那么，反过来，在《大纲》中，他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这恰恰是与他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指出：“工场手工业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同时使用许多工人……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sup>3</sup>换言之，此时马克思还是从绝对剩余价值入手来理解工场手工业的，那么，什么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呢？答案是机器大工业，它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惟一形式。由此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实际上是根据固定资本或机械化的发展程度来区分二者的<sup>4</sup>，这一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这表明，此时他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缺陷也妨碍了他对魁奈之谜的解决。在此，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为什么此时他会这样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尚未完全克服尤尔的影响。后者从生产力维度出发，明确地将机器大生产（机器推动的生产力形式）与工场手工业（分工推动的生产形式）严格地区分开来，超越了舒尔茨、拜比吉等人用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缺陷，这是尤尔的重大贡献。也是基于此，马克思后来评价到，说尤尔是“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sup>5</sup>的人。但尤尔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忽视了生产关系维度，因此，他看不到机器大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的内在统一性，即都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有效形式，而是一味地站在生产力维度，将二者对立起来，进而认为只是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只不过是它的前史。<sup>6</sup>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甄别这一判断的错误之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站在机器大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原因。

第三，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问题。此时马克思指出，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1页。

4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6页。

6 Andrew Ur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 pp.19-20

最终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而大工业就是它崩溃的临界点，“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sup>1</sup>这些观点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直接劳动被扬弃为社会劳动，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消失了吗？恰恰相反，这种转化，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是它崩溃的依据。其次，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能够危及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sup>2</sup>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改变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事实，后者更不会因为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就自动消失。这表明，单纯从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来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这种分离的产生过程，并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准确定位了这一分离的历史地位。他指出，“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sup>3</sup>，“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sup>4</sup>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分离，不仅不会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生产机制；同样，机器大工业也决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自由时间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财富的源泉是直接劳动，而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的发展会把这个源泉缩减到最低点，从而为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出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sup>5</sup>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必然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10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会“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sup>1</sup>，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机器悖论问题。不过，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直接劳动出发来确认这一悖论的，他的主要参照系仍是直接劳动或具体劳动。这就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自由时间与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2</sup>。这里的“工作日”概念不单单是指生产使用价值的直接劳动时间，而且也是生产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时间。<sup>3</sup>因此，真正的自由时间决不是指直接劳动时间的缩减，而是对抽象劳动的扬弃。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么，这种自由时间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自由时间。比如，那些被机器体系排斥的产业工人（马克思将他们称为“产业后备军”），他们的直接劳动时间已经降低为零，他们获得自由了吗？或者说，他们的时间是自由时间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这种时间本身就是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制造出来的，并没有真正摆脱资本的强制，“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段。”<sup>4</sup>这表明，抛开抽象劳动或生产关系限制，单纯从具体劳动维度来理解自由时间还是不够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机器论片断”本身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当自治主义者把这一片断誉为“圣经式的文本”，并以此为据，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无疑夸大了这一片断和《大纲》的历史地位，完全抹杀了《资本论》的理论贡献。这表明，完全秉持目的论思维，线性地解读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发展，固然有错，但完全以断裂性思维为原则，彻底否定《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此，当他们把“机器论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并以此为据来重构马克思哲学时，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缺陷。

一方面，他们的种种建构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这一片断的误读之上的。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论证交换价值制度崩溃的可能性，虽然这里的论述还存在局限性，但它至少反映了此时马克思的思路，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来解剖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自治主义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径直将它翻转为一种主体对抗的生成逻辑，实现了从历史辩证法到真正对立的转变，从而建构了一条劳动与资本、大众与帝国的自治对抗逻辑。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本身就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出发的，而是基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sup>1</sup>通过这种嫁接而建构出来的哲学，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能是一种充满伦理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政治学。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建构并没有真正克服这一片断的内在局限性。此时马克思把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视为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并试图从中引出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这一逻辑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局限性：一是内在局限性，这点上文已经分析过了；一是外在局限性。当年马克思所强调的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分离过程，主要是针对机器大生产阶段而言的，自然不可能涵盖一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到来，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出现了重大变化，一般智力与劳动的融合已经取代了二者的分离，成为这一时期劳动过程的主要特征。这一点恰恰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批判和重构这一片断的现实基础，也是他们建构大众智能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客观依据。他们的理论贡献自然不能小觑，但他们的缺陷也不容忽视。由于抹杀了《资本论》对这一片断的超越和发展，他们自然也看不到这一片断的内在局限性。因此，当他们立足于后福特制时代，通过一般智力与劳动的融合来重塑这一片断的当代生命力，并从中引出当代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时，恰恰犯了与“机器论片断”同样的错误。

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对马克思物质劳动理论的超越和发展。这一语境表明，他们所理解的非物质劳动仍然停留于直接劳动或具体劳动层面，是不包含任何生产关系的一般主体性劳动。当他们从这种具体劳动（“多”）来界定新的革命主体时，必然会得出一种没有内在同一性的、多样化的大众群体；而当所有大众联合起来时，他们自然也就认为，前者实现了对一般智力的全部占有，成为与帝国和资本相对立的自治主体，届时，后者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实际上，这整个逻辑与“机器论片断”一样，都是建立在对直接劳动的分析之上的，完全忽视了抽象劳动。马克思后来指出，抽象劳动才是整个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内在基础，这种劳动“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sup>2</sup>不论直接劳动采取什么形式，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只要它生产剩余价值，那都是一种雇佣劳动。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中做出了深刻分析。他举例到：“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多。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sup>3</sup>这清楚地表明，所谓非物质劳动只不过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新形式，它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抽象劳动的控制。就此而言，要想真正终结帝国和资本的统治，就不能单纯停留在直接劳动（非物质劳动）领域的变革和联合，也不能简单诉诸于一般智力的大众化（大众智能的苏维埃），更不能寄希望于主体（大众）的自治，相反，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

1 [意]奈格里：《帝国与大众》（上），黄晓武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3页。

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所开出的药方无疑是一种乌托邦，而他们在实践中的全面失败，正是这种乌托邦的最好证明。对此，齐泽克评价到，“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sup>1</sup>，而是单纯地诉诸于主体权利，企图建立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这在本质上又重新退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中了。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戳中了他们的要害。

### 三、“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的辩证法：《资本论》

#### 哲学意义的再思考

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之所以抬高《大纲》和“机器论片断”，过分贬低《资本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资本论》完全是客体化的逻辑，无法为主体政治学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撑，惟有回到“机器论片断”，才能为这种主体逻辑找到合法基础。<sup>2</sup>相较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对立，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无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对立，即《大纲》与《资本论》的对立，这也就是“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up>3</sup>等标题流露出来的真实内涵。综观这些对立论，虽然文本不停地在变，但核心观点却一直没变：《资本论》完全是一部客体主义的著作，到处充斥着客观规律，没有为主体和阶级斗争留下丝毫空间。在这些指责的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或者说，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著名的“客观公式”与“主观公式”的关系问题。惟有科学解答这一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回应自治主义者对《资本论》的批评，才能准确定位《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政治意蕴。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指出，在革命理论上，马克思没有发明权，他完全承袭了布朗基，因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者。“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sup>4</sup>。结果，马克思成了布朗基和雅各宾式的革命恐怖主义者了，这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最大歪曲。针对这种革命恐怖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曾做过尖锐批判：“这些密谋

1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 21 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何吉贤译，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5 页。

2 阿根廷学者吉多·斯塔罗斯塔也认为只有回到“机器论片断”，才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最终依据，但他的论证逻辑与自治主义完全相反：奈格里是因为《资本论》缺乏主体逻辑，进而主张回到“机器论片断”；而斯塔罗斯塔则是因为《资本论》关于资本辩证法的分析存在重大缺陷，不足以支撑整个阶级斗争理论，进而主张回到这一片断。虽然他们的认知逻辑存在严重对立，但结果殊途同归。（Guido Starosta, "The System of Machinery and Determinations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 the Grundrisse and Capital", 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 Riccardo Bellofiore,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pp.236-237.）

3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ed.,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 [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sup>1</sup>与这种革命密谋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反对从抽象人性的角度对革命事业进行思辨论证，也反对任何超越历史进程而人为地制造革命的做法，相反，他始终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来探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可以说，这一思想贯穿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在后面的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随着这一矛盾的爆发，“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sup>2</sup>。到了《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他开始从生产关系入手，来揭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sup>3</sup>。这些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似乎更突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些学者（比如，莱尔因）将其视为“主观公式”的经典之作，进而将其与“客观公式”对立起来的重要原因。<sup>4</sup>实际上，这恰恰是错误的。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强调到，这一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sup>5</sup>。以此来看，阶级斗争决不是外在于客观公式的一条独立逻辑，而是始终奠基在后者之上的。柯尔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所谓主观公式只是对客观公式的补充和说明，是“同一事物的如实表达。”<sup>6</sup>因此，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逻辑界定为一条与客观公式相对立的独立逻辑，恰恰是站不住脚的。经过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历史反思，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sup>7</sup>换言之，只有将革命奠基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上，这种革命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

1965年，第81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

4 [英]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6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1页。



但是，我们能否说这里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彻底成熟了？笔者持保留态度。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一般历史观层面，一是具体社会形态层面。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力图从中引出阶级斗争的客观基础，这对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和革命唯意志论而言已经足够。因此，从第一个层面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已经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但一旦立足于第二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分析显然还不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毕竟只是一个科学抽象，用这一抽象“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sup>1</sup>。因此，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超越一般层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那么，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是否已经成熟了？显然还不能这样认为。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此时他还是从分工入手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在由分工所导致的工人的片面化发展之上，虽然这与思辨主体逻辑存在本质区别，但这一思路还是不够的，因为单纯从分工入手是不可能科学解剖所有制形式演变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这反映了他当时掌握的经济史知识还完全不够，就像后来恩格斯反思的那样：“在这篇稿子（指《费尔巴哈论》——引者注）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sup>2</sup>再比如，在《共产党宣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虽然此时他明确提出了只有当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但这种矛盾的标志是什么呢？答曰：工商业危机。<sup>3</sup>此时他显然把危机当成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病理性”标志，从而在革命与危机之间建立了直接依赖关系。

1857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促使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sup>4</sup>。而这次研究的结晶，就是后来的《大纲》。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货币理论、劳动力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商品二重性理论等等。但就“机器论片断”而言，如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显然还存在重要缺陷，虽然它已经超越了前期的分工逻辑，力图站在机器大生产的高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矛盾，但他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把资本对一般智力的追求，进而导致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依据，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此时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除了劳动二重性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还没有真正克服革命与危机的依赖模式。在这一片断中，他指出，资本对科学技术和一般智力的普遍追求，必然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页。

会提高生产率水平。就使用价值生产而言，这就意味着，人们只需要“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sup>1</sup>。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届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剩余劳动也就失去了存在条件。<sup>2</sup>关于这一点，他在《大纲》的另一处说得更为明确：“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sup>3</sup>以此来看，此时他不仅把危机视为交换价值崩溃的基础，而且也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解体的重要依据，因此，他自然会把危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后，他就热切地期盼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到来。但遗憾的是，这场危机并没有引发一场“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更没有导致交换价值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促使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1859年“序言”中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4</sup>在此之后，他再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写下了数量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超越了《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内在局限性，完善了他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内在矛盾的分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公开阐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革命逻辑既不是基于人性做出的推论，也不是单纯依靠主体能动性制造出来的密谋运动，而是始终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离开客观逻辑，抽象地谈论阶级斗争，或者说，单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引出阶级斗争，都是非法的。这是马克思对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辩证关系的科学认知，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更无法将其与革命的庸俗派和唯意志论者区别开来。就此而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大纲》再到《资本论》的发展历程，决不是莱尔因断言的那样，是主观公式与客观公式的断裂过程，更不是奈格里所说的从纯主体逻辑向纯客体逻辑的倒退过程，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是他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解剖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革命条件学说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的出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马克思“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sup>5</sup>所进行的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晶。

那么，《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客观基础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器大生产与阶级斗争的普遍化。大卫·洛威尔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完全是基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建构出来的一种抽象神话，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sup>6</sup>实际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4页。

6 David W. Lovell, *Marx's Proletariat: the Making of a Myth*,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214-215.

这一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上的，这就为他的无产阶级概念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础：所谓无产阶级不再是法权意义上的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的总称，而是那些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而剩余价值理论则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在阶级利益上的对立，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单纯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工人就能自觉地形成普遍化的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恰恰相反，这种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水平。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分工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时工人必然无法超越劳动等级的限制，达到普遍性高度，“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了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sup>1</sup>而此时工人联合起来同资本家斗争，“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sup>2</sup>，这种斗争还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则彻底消除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sup>3</sup>一方面，它用大量妇女和儿童取代了成年工人，造成了庞大的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也就为超越等级的普遍化无产阶级的生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消灭了一切手工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存在基础，把他们统统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也就“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sup>4</sup>，为工人超越单纯的经济行为，上升到普遍化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资本的运作机制与拜物教意识的解构。马克思认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工人也必然会像资本家一样受到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意识”<sup>5</sup>。那么，工人如何才能超越这种歪曲观念，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首先，从本质层面而言，他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奴役之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7-258页。

的札格纳特车轮下。”<sup>1</sup>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种奴役化的生产实践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破除对资本的一切美好幻想，进而“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sup>2</sup>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分析了资本本质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种种现象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并最终“三位一体”公式固定下来的。通过这种探讨，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历史分析，为工人认识各种颠倒观念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有力武器。以此来看，工人要想摆脱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单纯依靠主体自觉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以资本的运动和发展为客观前提。

第三，资本的内在界限与革命时机的诊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不再把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灭亡的病理性标志，而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生理周期，“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sup>3</sup>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达到了彻底成熟的程度，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了，相反，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理阶段，因此，决不能把经济危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时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危机：一是由剩余价值实现所导致的外在危机，一是由于剩余价值生产所引发的内在危机。前者的原因具体包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量的限制等等，虽然它们在本质上也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这种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发展活力。第二种危机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sup>4</sup>引发的内在危机。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sup>5</sup>它们共同表明，资本生产永远无法克服生产力的绝对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是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sup>6</sup>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届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2页。

4 在《大纲》中，马克思从固定资本的发展引出了两条崩溃逻辑：一是“机器论片断”中的“魁奈之谜”；二是在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的东西”中提出来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在后来的发展中，马克思放弃了第一条逻辑，坚持了第二条逻辑。不过，必须注意一点，《大纲》中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与《资本论》第3卷中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还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在《大纲》中，马克思还没有科学解决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没有澄清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注1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1</sup>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本论》本身包含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导向，是全面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真切表述。”<sup>2</sup>因此，当詹姆逊将《资本论》解读为一部没有政治结论的、纯粹关于失业的书时<sup>3</sup>，恰恰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论》的政治意蕴和实践旨趣。另一方面，这些分析也表明，《资本论》决没有抛弃阶级斗争，而是始终从资本的客观运动中引出阶级斗争。对此，柯尔施正确地指出，《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革命逻辑既不是忽视阶级斗争的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单纯强调主体能动性的革命唯意志论，而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这种前提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良好领导、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去取代”。<sup>4</sup>因此，当第二国际正统以此为依据，将马克思哲学诠释为经济决定论时，恰恰忽视这一著作包含的阶级斗争意蕴；而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和莱博维奇<sup>5</sup>批判《资本论》没有为阶级斗争留下任何空间时，恰恰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彻底否定了革命逻辑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主体性活动。而当克里弗仅仅依据这种主体性来重构《资本论》时，恰恰把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整个客观基础彻底刨掉了。不过，对自治主义者而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革命本来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恐怖袭击活动，完全是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当代意大利的延续，而奈格里本人就是“红色恐怖主义”的鼓吹者。有了这一点，他们的一切理论建构自然就一目了然了。

通讯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南京大学哲学系[210023]

联系电话：13813359248

Email: sunleqiang05@163.com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74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 页。

<sup>3</sup> [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11 页。

<sup>4</sup>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年，第 161 页。

<sup>5</sup> [加]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二版序言第 4 页。

# 拜物教、拜物教化与反拜物教

——约翰·霍洛威基于资本主义“分离论”的解放理念重构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200241)

**摘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不仅体现在劳动与资本,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如何瓦解这种分离,约翰·霍洛威在区分了“固化的拜物教”与“过程的拜物教”的基础上,批判了立足于前者,必然只能陷入“劳作与劳动结果分离”这一封闭的同一化运动之中。依此思考的前提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稳定的、强化的、“已经完成了”的事实,从而革命被导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如果将拜物教理解为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那么,解放便是“裂缝斗争”,是资本对劳动、无产者身份对个人的同一化过程的反向运动,进而,主体不断否定工人阶级的身份,革命便从针对“资本”转向“自我的解放”。

**关键词:**拜物教;过程;政治理念

在《重读〈资本论〉》一书中,詹姆逊曾提示过这样一个信息,“通过《资本论》,甚至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文本,乃至知晓其经济学或哲学文献的前历史,追踪动词‘分离’(Separate)是单调乏味的,却是富有教益”。<sup>1</sup>依据学术文献来看,对这种教益的领略要数居依·德波给我们的更多,在对“景象社会”的研判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景象的所有秘密不过就是“分离”,“工人与产品的普遍分离已经终结了劳动结果(Done)的任何全面的看法,以及生产者之间个人的直接的交往”。<sup>2</sup>就现代世界的整个图景来讲,无论是在“富足的资本主义西方以及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方,欲望与思想之间的断裂,几乎是每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sup>3</sup>不过,如何能够弥合这种“分离”,无论是詹姆逊还是德波都未能在《资本论》的阐释中展示出真正称得上激进变革的可能图景。就这一点来讲,与那种传统马克思主义教义简化版的“革命”理念,即“以阶级革命的方式重新打破资本霸权”的流行看法相比,实质上并无差异,因为后者依然在“如何消除分离”的道路上争论不休。除去颠覆分离社会的陈旧政治设想之外,当今颇为诱人的学术景观是各种激进左翼的讨论。但是,这些激进左翼始终在三个问题上纠结: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时机;反权力的权力链接。无论各种言说多么卖力地吆呵,权力既没有能够被反掉,革命主体也未见真正地建构起来,打不完的口水仗遮蔽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围绕权力的反抗”永远沉浸在分离的社会中。因为一旦从权力、资本这些否定人的、分离人的“关系物”出发,人作为分离社会的产物(被否定的、异化的人)

---

作者简介:孙亮,哲学博士,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文本、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德国哲学。

<sup>1</sup>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1. 110.

<sup>2</sup>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Zone Books, 1995, P.20.

<sup>3</sup> 格雷尔·马尔库塞,《情境主义国际的漫漫征途》,张一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即成为了分析的前提。对这一“怪圈”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从未严肃地思考过，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代表人物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sup>1</sup>秉持“拜物教是马克思的权力及改变世界的任何讨论的核心”的理念，试图以“拜物教化”（Fetishisation）重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政治设想，倡导在“反拜物教”基础之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重构，从而革新了消除“分离社会”的理论尝试。

## 一、拜物教：封闭了“劳作与劳动结果分离”的同一化运动

表面看来，在《无须夺权改变世界》这部成名作之中，霍洛威用了近八十页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拜物教问题，但实际上，霍洛威在《裂缝资本主义》、《身在其中，反抗与超越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资本的危机》等著作、论文中均可看到借助拜物教批判寻求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出路的种种构想。在目前学术界，拜物教这样一个术语不要说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是缺乏的，就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当前的《资本论》研究中依然重视不够，这表现为将拜物教仅被看作为一种哲学或文化批判，由此，拜物教批判的力量便丧失了。但是，依照霍洛威的看法，拜物教概念的力量就在于它挑明了“劳作的自我否定”。<sup>2</sup>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拜物教这个概念，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的“Entfremdung”或“Entäusserung”两个术语相关，这也是黑格尔左派乃至费尔巴哈在《基督教本质》中关于宗教异化论述的直接框架，<sup>3</sup>不过，诚如默斯托所说，《资本论》中的拜物教与早期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疏离（Entfremdung）此类概念显著的区别在于：第一，拜物教不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不是思想的事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权力、一种统治的独特形式，这种权力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客体翻转为主体的结果从而成就自身。第二，马克思拜物教在一种严格的历史性生产真实中显示自身，即雇佣劳动的真实。<sup>4</sup>这两个判断极为准确，但却不够精细。霍洛威则从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异化分析开始，然后进入到《资本论》给予了详细的分析，依他之见，资本论一开始就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分离”，分离的核心则是“劳作”（Doing）与“劳动结果”（Done）的分离。这体现在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Gegenstand）、一个物（Ding），<sup>5</sup>虽然由我们所生产，却在我们之外“独立”存在。商品逐渐地祛除了产生的“根源”，劳作的结果已经否定了与自己相关的“劳作”。

因而，霍洛威认为，《资本论》正是对这种“劳作的自我否定”（self-negation of doing）展开研究的。但是，马克思不再以异化来阐述这种“分离”，而是将这种“分离”视为拜物

<sup>1</sup> 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爱尔兰人，现在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中文著述已经霍洛威授权由本人译介，关于其思想研究的系列成果于2017年起陆续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

<sup>2</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43.

<sup>3</sup> Marcello Musto. *Marx for today*, Routledge, 2012. p.92. 中文版参见，笔者译本，《今日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sup>4</sup> Marcello Musto. *Marx for today*, Routledge, 2012. p.113.

<sup>5</sup> Karl Marx, *Das kapital*, Berlin: Dietz, 2008. S.49.

教。因为，在论述拜物教的一节中，马克思在描述商品的神秘性质时，指明其并非来自使用价值，而是来自商品形式自身，即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生产劳动采取了商品的形式。显然，霍洛威触及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个最为深层的方法论，即通过对劳动为何采取如此“表现”的形式进行追问。<sup>1</sup>对此，霍洛威首先从我们的思想的起点入手，认为这是建构我们的拜物教化的世界，我们一出生就被抛进劳作分离的世界中，“劳作”与“劳动结果”的分离渗透到世界的所有领域，我们的世界观在我们开始批判性的反思之前已经预先形成，因此，“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控制权渗透到我们的存在、渗透进我们的思想习惯以及与其他人的全部关系中的核心”。<sup>2</sup>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生产当然只能是去维护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然也就不可能被看作是短暂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无视批判对象的历史，由此，霍洛威在继承由拉宾（Issak Rubin）在《马克思价值理论论集》（1928年出版）一书中所开启的“价值形式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被拜物教思维侵染，对形式问题熟视无睹，因为形式具有了客观的对象形式。诚如卢卡奇所看到的，“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他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sup>3</sup>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即将其看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时，作为社会关系价值、货币或资本这些形式才作为问题。<sup>4</sup>这种对形式问题的忽视，也反证了为什么马克思《资本论》中反复讨论的都是“形式范畴”，诸如货币形式、商品形式、资本形式。

如今，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的日常语言，乃至人的存在本身都驻守在这些形式内，“这些形式冻结或僵化了人们之间存在关系的模式”，因而，霍洛威认为，我们需要从形式出发，形式是呐喊的回音、是希望的讯息。我们呐喊的抵抗指向的“是其所是”之物它并非永恒的，而仅是历史性凝固的社会关系形式。在此，霍洛威认为拜物教完成了人们对形式的误判，从而使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制造的生存模式是共谋的，革命也变得异常困难了。同时，资产阶级理论也采取主客体颠倒的辩护方式，即其理论基础正是社会关系的拜物教形式。因而，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是资本主义行动的支持方，其更在劳作与劳动结果之间的断裂关系中生产思想形式，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也就顺理成章地建构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基本意识。<sup>5</sup>这样一来，霍洛威点明了当下时代的困境：一方面急切地需要改变这个糟糕的世界；另一方面改变的可能性仿佛不再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之后思想家们努力去破解的学术方向，这一方面，在我看来恰恰构成了拜物教的理解史，一部从卢卡奇的物化到当代后马克思反复讨论的主题。不过，阶级抗争始终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主要看法，之所以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受阻是由于意识形态、霸权或者虚假意识，工人阶级之所以没有起来抗

<sup>1</sup> 孙亮，《资本论》与“景象社会”——基于“表现”到“景象”逻辑生成的批判性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15.6

<sup>2</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50.

<sup>3</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3页。

<sup>4</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50.

<sup>5</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p.52-53.



争是因为他们深陷市场意识形态之中、统治阶级的观念是霸权的、工人阶级遭受虚假意识，虚假意识等等已经与“劳作与劳作结果的分离”相割裂了。由此而来的便是认为，工人阶级拥有错误的意识，我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启蒙“他们”。<sup>1</sup>这只是对拜物教思考的一个方面，也是目前主流的看法。但另外一个层面是拜物教的思考并非是一种“启蒙”，而始终是与资本同一化相反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霍洛威的创新之处。这种同一性体现在劳动结果对劳动行为的“同一化”，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夺。活的劳作被限制在一定的同一性中，在一种角色或特色的面罩之中。诸如医生群体的分类并非是基于将他们的劳作编织在一起，而是强加于他们作为医生这样一种特色的面罩。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概念总是专断的：任何身份都能够被打包成一个小包之中，整合起来放进大的容器内，等等”。<sup>2</sup>正是这种身份的同一性原则不仅构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化的形式，也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构建自身组织化的原则。看似矛盾的地方恰恰反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需要不断的反省，因为，“同一性是相互共识、友谊与爱的反题”。<sup>3</sup>要知道，我们在同一化的过程的活动（比如在黑格尔总体性原则下去建构无产阶级，又或我们每个人被导向一个同一性的原则之下），将犹如我们在生产劳动结果，但是这个劳动结果转而抵抗我们的劳动一样。

## 二、拜物教的“过程化”：以范畴内在否定维度弥合分离

当霍洛威将传统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视野设定为拜物教之后，如何解决拜物教的问题便成为了重思革命理论的首要环节。在他看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拜物教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固定的拜物教”(Hard fetishism)，另一个则是作为“过程的拜物教”(Fetishisation as process)。所谓固定的拜物教就是将拜物教看作一种已经建立的资本主义的稳定的、强化的“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后者则将拜物教理解为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这样的区分显然带来不同的理论与政治的影响。

实质上，“固定的拜物教”理解方式一直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上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当然主要受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阐述的影响。霍洛威通过卢卡奇对阶级意识论述的前后矛盾以告知人们，这种拜物教所基于的阶级意识依然是“非解放”的革命观念。我们知道，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出现的，他的存在形式竟是这样的，……以至于物化(Reification)在这些形式中必然表现得最明确，最强烈，造成着最深刻的去人性化(Dehumanisation)。因此，无产阶级就和资产阶级一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物化了”。<sup>4</sup>但是，当无产阶级作为“纯粹的、赤裸裸的客体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

<sup>1</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55.

<sup>2</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63.

<sup>3</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68.

<sup>4</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28-229 页。

“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sup>1</sup>为了给予说明，卢卡奇还以“奴隶制与农奴制”这种“更自然的形式”为例加以对比，在这些形式中，“统治形式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直接的动力，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全部人格没有分裂，因此就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sup>2</sup>由此，“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由于，工人正是以赤裸裸的被商品化这种“直接性为前提的”，从而，“商品结构的拜物教形式也就自然崩溃了：工人认识了自身，认识了在商品中，他自己和资本的关系”。<sup>3</sup>不过，按照霍洛威的看法，这里虽然卢卡奇在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寻找理论根基，然而，却并非充足。这一点，卢卡奇自己在上述讨论之后，紧接着表达了这种疑虑，“如果有人试图在这儿把一种直接的存在形式赋予阶级意识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神秘之中：一种神秘的类意识”，另一方面，“对共同的地位和利益的认识而觉醒和成长的阶级意识，抽象地说，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有的”。<sup>4</sup>

那么，阶级意识或者说真正突破拜物教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这一规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把阶级意识同经验实际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的差异”。<sup>5</sup>显然，卢卡奇并非认为人们通过实际生活的经验便能够突破拜物教，因而，霍洛威进入到反思卢卡奇最为重要的一个判断中，即卢卡奇所述“党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因为，“党把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播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按照口号行动的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自觉地和坚定地加入有组织的先锋队行列”。<sup>6</sup>显然，卢卡奇所阐述的克服拜物教的路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并无差异，霍洛威认为，通过卢卡奇我们能看到这种“固定的拜物教”，即其讨论都限定在特定的范畴之内，而这些范畴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诸如先锋派、无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夺取权力，<sup>7</sup>他将这些范畴及其它类似的拜物教产物看作是一种事实，因而，卢卡奇本身已经被“拜物教化”了，这种拜物教必然导致如下的结果，“反拜物教的唯一可能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外部，无论是卢卡奇借助于党派、霍克海默尔的知识分子优先性、马尔库塞的局外人与遗弃者。拜物教意味着反拜物教，但两者是分离的，拜物教统治日常生活，反拜物教则在另外一方，在边缘”。<sup>8</sup>此种思路，在霍洛威看来，依然无法解释反拜物教的阶级意识优先性的来源，任何试图将无产者作为“他们”，并对其进行灌输的

<sup>1</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51-252 页。

<sup>2</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52 页。

<sup>3</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52 页。

<sup>4</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58-259 页。

<sup>5</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05 页。

<sup>6</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94 页。

<sup>7</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 84.

<sup>8</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 88.

意识本身同样需要进行来源勘察，况且，这种“非平等”的阶级意识灌输结构本身违反了解放的本意。

另一种则是霍洛威担心落入拜物教陷阱而加以重新理解的“过程的拜物教”。这是基于阿多诺辩证法的理论创新。<sup>1</sup>之所以要提出过程拜物教事实上源自霍洛威反复追问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使得主体完全对象化、拜物教成为了固定的、事实的，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可能批判拜物教的”，<sup>2</sup>因而，霍洛威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的呐喊、批判完全是日常普通的事情。原因在于，拜物教的反面并非是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异化的“家”扎根在我们心灵深处，而是在日常实践中对异化的抵抗、拒绝、与反驳，由此，仅仅在非（或更好是反）异化，或非（反）拜物教的基础上，才能够构想异化或拜物教真正的内涵。很明显，霍洛威对拜物教的理解从资本对劳动的“同一性”的道路上逆反，将拜物教看作恰恰是拒绝“同一性”。如果拜物教与反拜物教是并存的，那么，它仅能作为对抗的过程，拜物教就是拜物教化的过程，一种主体与客体，劳动(Doing)与劳动结果(Done)分离的过程，也总是为弥合这种分离，重新聚合主客体、劳动与劳动结果而斗争。那么，显然抵抗拜物教不再需要一种“先锋队”的党派给予灌输，而仅仅是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日常呐喊，如此一来，固定的拜物教便溶解了，拜物教变成了日常的抵抗、呐喊，日常周遭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国家）也表现为一个可以抵抗的过程，这些范畴内部就蕴含着斗争，固定的范畴被打开了。<sup>3</sup>霍洛威之所以如此设想在于，他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作为资本主义牺牲的客体而存在，我们也不能在资本主义形式之外存在，没有免于资本主义的领域，没有非拜物教化的生活的特权地带，我们选择抵抗、拒绝资本主义并非是一个阶级意识的问题，它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压迫、异化的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表达。我们抵抗资本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们在资本中存在对其不断的否定。<sup>4</sup>

毫无疑问，这种作为过程的拜物教试图摆脱“固定拜物教”所带来的“先锋主义”的阶级意识困境，使得反拜物教成为支撑日常生活成为可能的一个基础。诸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将所有的行为都朝向“交易”这一标准进行思考，而是力图在工作之外，让自己的行为温暖家庭、滋养自身，否则，根本没有什么生活可言，这恐怕就是叔本华如下呐喊的缘由，“我们看到许多人像蚂蚁一样，整体劳劳碌碌，忙着不停以聚集财产。除了只知搞钱外，其它便一无所知，这种人的心灵空白一片”。<sup>5</sup>正是基于这种生活的信念，霍洛威后来在解读资本论中的术语时关注到的人的自身丰富性(Reichtum)这一概念。<sup>6</sup>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动中所赖以存在的、理所当然的货币、国家、价值、权力等等，现在都被揭示为肆虐的血腥战场。在此意义上，每一个原先被拜物教化的范畴现在都“过程化了”，诸如“货币开始货

<sup>1</sup> John holloway, Fernando matamoros, sergio Tischler, eds.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 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London: Pluto Press, 2009.p.95.

<sup>2</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88.

<sup>3</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89.

<sup>4</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90.

<sup>5</sup>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张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sup>6</sup> John Holloway.Read Capital: The First Sentence.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23, Issue 3,2015.

币化、价值变得价值化、商品则商品化、资本也资本化、权力成为权力化、国家也国家化，等等，每一个过程都意味着它的反面，由此，社会关系的货币化除非被看作为抵抗它的反面，即基于非货币的社会关系创造的不断运动，否则没有任何意义”。<sup>1</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范畴，不再被理解为事实，而是理解为这些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Processes of forming），比方说，如果价值不被理解为一个经济范畴，不是作为统治人的日常生活的形式，而是作为斗争的形式，显然，范畴（社会形式）的意义取决于斗争的方面，即它们“不是作为客体化社会关系的表达，而是对客体化社会关系的斗争”。但是，要记住的是，对于同一性意义上的“拜物教是确定的，反拜物教却是非确定的”，这是霍洛威继承阿多诺对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法批判基础上的指认，当然，这一指认直接朝向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斗争与解放的必然性”的批判。在霍洛威看来，人类的宿命就是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与任何否定之否定的美好终点的承诺是不一致的。<sup>2</sup>说的明白一点，作为“过程的拜物教”坚决抵制从资本社会的外部进行批判，而主张基于人本身丰富性、人性之上的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

### 三、“阶级的过程化”与“反拜物教”：革命对象的逆转

显然，霍洛威借助于将拜物教给予“过程化”之后，反拜物教则是对原先“拜物教”所内涵的“同一化”的相反运动，即“非同一化”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对主体来讲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呢？又带来怎样的革命变化呢？

**显然，霍洛威所勾勒的主体解放是主体的“非同一化”运动。**我们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主体的讨论中，往往基于“预先构成的拜物教的（Fetishied）形式”的假设，依此看法，资本与劳动，或者说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被看作是一种从属关系，并且后者依附于前者。因而，反抗的主体便被首先定义为从属于资本的人，或者进一步说是从属于拜物教的各种形式，诸如“价值、资本、国家、政治”等等，这是一个已经被资本所闭合了的世界，工人阶级不过就是人们之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工人阶级被看作是一个肯定的概念，并且这一身份也格外重要，该身份的联合正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sup>3</sup>但是，这种身份的同一化无法处理那些并不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中的一部分人，“定义或者阶级化的过程是基于阶级与非阶级运动、阶级与斗争的其他形式、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盟等等无休止的讨论”，因而，问题都产生于阶级身份“同一化”这种定义方法。<sup>4</sup>霍洛威认为，如果我们不从这种预先构成的社会关系出发，那么，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阶级观念呢？他的方法与上述处理“拜物教化”一样认为，“阶级，像国家、货币、资本

<sup>1</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91.

<sup>2</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98.

<sup>3</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1.

<sup>4</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1.

一样，必须被理解一个过程”，<sup>1</sup>这一过程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分离在主体领域的体现，即阶级构成被视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资本主义就是主体与客体日常重复的暴力性分离，是作为产品的客体从创造者主体中抽象出来，从行为者那些夺权的不仅是行为结果，而且包含行为本身、他的创造力、主体性以及人性，<sup>2</sup>这种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阶级作为过程伴随于资本主义自身分离这一特征。不过，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来，阶级被预先制定的(pre-constituted)，并从工人阶级从属这一事实出发分析阶级斗争的可能性。然而，“冲突不是在已经建立从属关系或社会关系的拜物教了的形式形成之后的开始的”，阶级斗争并不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构成的形式之中”，而是“这些形式的构成自身就是阶级斗争，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一种不断的对抗”。

由此，阶级斗争便是异化与非异化、定义与反定义、拜物教与去拜物教之间的一种无休止的日常重复对抗，即一方面主体被拜物教了的、不正当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同一化”，另一方面主体又试图反抗—超越这些资本主义形式。这一重复对抗的核心就是主体反对被定义、被资本同一化，“只有我们生产资本、崇拜货币、只有我们参与到主体与客体分离的创造中，我们才被同一化为阶级，只要我们作为人本身，我们同时反对我们的阶级化(class-ification)”。<sup>3</sup>因而，它不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那样，是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抗，无产者要对抗的是他自己本身，这是反拜物教的核心。由此，霍洛威的政治理念表现在，我们不是作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反对作为工人阶级、反抗被阶级分类化，我们的斗争不是朝向抽象劳动的斗争，它是反对抽象劳动的斗争。斗争并非源自我们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事实，而是产生于我们是与不是工人阶级，我们作为工人阶级存在，但是对抗并超越这一存在，资本想规训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被规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并非是一个“好”的、值得珍视的身份，而是一个“坏”的，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反对的“归类”，工人阶级的同一化应该被看作是“非同一化”，<sup>4</sup>

正因为上述理由，主体否定了工人阶级的身份，革命便从针对外在的“资本”转向内在的主体自身。在以往的马克思研究中，人们过于重视“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吮吸工人的劳动”，但是，却没有重视这句话的前提，“死劳动”即过去劳动“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sup>5</sup>这里的“似乎”一词毫无疑问表达的是，“死劳动”是依赖于“活劳动”的，作为资本的“死劳动”的支点正是“活劳动”本身。这样的理解有何意义呢？

在霍洛威看来，“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讨论其实蕴含着马克思对权力社会不稳定机制的重大秘密，其中“死劳动”被霍洛威理解为一种权力的主要来源，而活劳动当然是无权的一方面，这显然是马克思“资本是一种权力关系”论断的自然推演。由此，霍洛威认为，

<sup>1</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2.

<sup>2</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3.

<sup>3</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4.

<sup>4</sup> John Holloway.Chang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press,2010.p.144.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不稳定来自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依赖，在任何的‘宪定权’（Power-over）体制中，存在着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sup>1</sup>可是因为拜物教视野的缘故，这种实质的状态“似乎”表现为被统治者依赖于统治者的单一向度。因此，统治阶级的地位取决于被剥削者，正如拉博埃西在《论自愿的奴役》一书中所述的，“所有这些降临到你们身上的浩劫、灾祸和毁灭不是来自异国的仇寇，而是来自这样一个敌人：他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予的”，“他拥有的权力只不过是你们赋予的用来毁灭你们的权力”。<sup>2</sup>霍洛威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他就是要人们不要忘记，在我们所咒骂资本主义、咒骂资本所建构起来的各种权力的时候，想一想，这些异己之物正是我们自己亲手制造的。与之相应，革命便不是针对“异己力量”，而是朝向自己本身。当然，霍洛威的这一判断并非仅是书斋式的推论，而是对以往针对资本、针对抽象劳动的革命的现实给予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从那些过往的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一个这样革命结果最终不是再次被卷入到资本逻辑之中，如今依然是资本的世界。与一些并非严肃的学者以此来声明马克思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不同的是，霍洛威认为这并非是马克思政治理念的失败，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判定错误所致。“但因为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的劳工运动只是在劳动反对资本的过程中失败了，它将有可能开启反对劳动被抽象化的行动（Doing）。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这就不是阶级运动的失败，而是一个走进更深层的阶级斗争的转向。”<sup>3</sup>

这种“转向”即是霍洛威认为的，立足于资本对劳动的“抽象化”或“同一化”的相反运动，同时也是“无产者”对“每个人”身份的“非同一化”过程。集中一点讲，霍洛威的整个阶级斗争或者说革命所发生的转向便是“非同一性”的运用，由此，他提出了“裂缝”的概念。裂缝即资本逻辑同一化运动的断裂、统治的组织过程的断裂。由于统治是一种活动过程，因此裂缝便不可能静止不动。不管裂缝是否参与其他裂缝运动中，也不管它们是否填充或拆解其他的裂缝运动，总之，它总是不断地在同一化之中实现着断裂。裂缝理论必定是批判的、反认同和不断否定的。其中，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对资本持有自觉断裂，诸如，“我们不应该屈从于资本，我们应该干些别的事情”。因而，这个世界不能被悲观地看作为是资本封堵了世界，世界图景指的不仅仅是统治图景，还指裂缝扩张、抵抗、运动、参与、愈合，多元化的反抗图景。我们越发关注裂缝，别样的世界图景将越发呈现，一种反抗地理学的图景越发容易呈现。<sup>4</sup>由此看来，霍洛威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外在革命的方式，转向了内在主体的自我革命、自我身份的瓦解。在这条道路上，霍洛威远离了马克思对革命与解放的真正内涵。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电话：18516092338

<sup>1</sup>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London: plutopress, 2010. p.178.

<sup>2</sup> 拉博埃西、布鲁图斯：《反暴君论》，曹帅译，译林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7 页。

<sup>3</sup> John Holloway.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

<sup>4</sup> John Holloway. *Cracks and the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2010. 4.

#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哲学意义

唐正东

**摘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经济学维度是内在统一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尽管是在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内涵上它比后者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对劳资关系的解读上也要准确得多。对马克思来说,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恰恰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剩余价值理论不但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而且还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理解为数量维度的科学理论以及把剩余价值理论仅仅解读为马克思为分配正义而提出的伦理主张等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维度;哲学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两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不管是在理论维度的丰富性还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上,马克思都远远超过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但是,西方学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屡屡试图模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们通过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割裂开来,把前者划归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只把后者界定为“科学”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李嘉图等人仅在数量维度上展开的劳动价值论等同起来,从而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解读为只是工人为分配正义而提出的伦理主张。西方学界的另一些学者则在这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化理解的基础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体论基础的层面上,并由此而展开后人本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上。因此,厘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准确内涵,不仅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准确评价当代西方学界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也是很有帮助的。

—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不同,那就是它在理论维度上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性维度与经济学维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虽然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一些简单流通关系中的交换价值问题,但他真正关注的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来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的。而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则是在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作天然的、永恒的经济形式的前提下来探讨劳动价值论的,因此,他们必然只会从经

济数量的角度来展开探讨。而这恰恰正是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推进理论困境之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解读。在他看来，斯密明显地是从一般商品交换关系的层面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会看到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等于该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但问题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当他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时，面对客观存在的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形式，他不得不承认劳动价值规律在这一阶段失效了。马克思指出，斯密的长处就在于敏锐地看到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使劳动价值规律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即不再是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但其理论的短处也在于此，“他的理论的短处在于，这个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规律如何运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时候也把他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力量。”<sup>1</sup>明明是跟交换价值规律没有关系的，可斯密非要说劳动价值论已经不适用于劳资交换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只具有数量维度的劳动价值论。

在斯密那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与从数量维度来理解劳动价值论是相互呼应的。他的解读重点是在分工和交换的前提下我的劳动与他人劳动之间的对等交换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只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论。当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交换问题时，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质点：此时的劳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具体的社会劳动。“亚当忽略了一点：连我的劳动，或者我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已经被社会地规定，已经根本改变了自己的性质……。”<sup>2</sup>正是这种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的劳动，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陷入了理论困境。他没有看到在劳资交换的前提下，劳动价值论其实没有问题，只是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才导致劳动价值论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本应该发现这一点并找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的方法论路径，而不是面对表现形式的疑惑而使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停留在二元论的层面上。但客观地说，缺乏社会历史性维度的亚当·斯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从深层的角度来看，斯密的这种观点是以维护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的。因为如果只是在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中，商品的交换者同时是该商品的所有者，因此，商品中所内含的劳动量当然等于它所支配的劳动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出卖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这是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普通交易的形式来理解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那实质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当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看待，或者像马克思批评詹姆斯·穆勒时所说的，“穆勒最大的特点是：在他看来，货币只是为了方便而发明的一种手段，同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样，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也是为了方便而想出来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为了‘方便’而发明出来的。”<sup>1</sup> 1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作法真的会带来方便，相反，它只会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就是在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时只能止步不前，因为此时的劳动由于在自身性质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它不仅必然以社会化劳动而不是单一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因为其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使与它相交换的资本在本质上只是这种劳动本身的再生产过程的异化式结果而已。这么复杂和丰富的内涵显然不是斯密的那种基于数量维度的劳动价值论所能参透的。

大卫·李嘉图是想要弥补斯密劳动论的二元论缺陷的，因为他关注的已经不是斯密的那种在分工和交换前提下劳动的对等交换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特性在于他真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他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内含的劳动量这一观点严格地推进到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交换问题的分析之中。对李嘉图来说，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要做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在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润。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李嘉图具有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所，李嘉图就冷酷无情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sup>2</sup> 也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和矛盾到什么程度。”<sup>3</sup> 从表面上看，他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已经天衣无缝了，实则不然。他的最大问题是仍然是从数量维度来理解劳动价值论，他所讲的劳动价值仍然只是劳动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没有上升到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及其交换价值的复杂性的理论层面上。

马克思说，“李嘉图胜过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并没有把他弄糊涂。但是，他不如亚·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因此价值规律随着资本的形成而发生的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更没有促使他去研究这个问题。”<sup>4</sup> 马克思的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贯彻到底了，但他同样也没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特殊性质进行研究，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3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8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3 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 页。

来的。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只谈论价值量，就是说，只谈论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sup>1</sup>劳动价值论缺少了社会历史性维度所能产生的理论效应在李嘉图这里也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他始终不可能搞懂的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其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阐明和提出的各种范畴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对立或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表面运动与作为这个制度的生理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对立或矛盾，而是后者为什么必然会以前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应该说，只有上升到这种理论层面，劳动价值论才能越出单纯的数量维度，上升到质的维度（即社会历史维度）与量的维度的辩证统一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也只有在这种理论层面上，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批判才可能从对数量维度的分配公平等问题的剖析，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本身的剖析的层面。这样，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内涵才可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 二

马克思在形成唯物史观之后的确曾经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做出过很高的评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sup>2</sup>但我们切不可认为马克思此时完全站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层面上，因为他在这个文本中同时还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sup>3</sup>其实，马克思此时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层面上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贡献，他从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对这一理论作出全盘肯定，因为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的观点是不可能承认的。因此，我们至多只能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把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之理论前提的批判与对其理论内容的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在往后的思想发展中，他努力做到的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劳动价值论及与此相关的剩余价值理论。

进入《资本论》手稿的写作阶段之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思路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交换问题，既不能像斯密那样简单地认定这一理论在结果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简单地用这一理论来判断现实经济范畴或经济运动的合法性，而是应该深刻地解读使这一理论在表面上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及劳动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的性质变化。在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劳资交换的问题时，马克思不再像过去那样停留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公平交换的理论层面上，而是明确地指出这种交换“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要以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灭亡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与这种关系的前提同时产生的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下面分析这种关系时自然会说清楚”<sup>1</sup>。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说清楚了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还把它揉进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层理解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把这一理论的经济学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一旦我们关注到上述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那就不难看出，劳资交换并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看到的任何一种劳资交换，都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商品所有者或劳动条件所有者所从事的劳动，而是劳动资料已经被剥夺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此时的资本也不再是某种简单商品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已经拥有了包括雇佣劳动在内的所有劳动条件并且能自我增殖的特定的商品，它只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自己，但其内涵不是简单商品概念所能涵盖的。由此，马克思首先在劳动性质的改变问题上深化了自己的认识。他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交换价值只可能是它本身所内含的劳动量，即再生产它这种商品本身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导致这一点的原因不是李嘉图所说的要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所决定的。对于已经被剥夺了劳动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来说，他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像一般的商品所有者那样拥有运用自己的劳动资料来从事劳动活动的的能力。因此，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来界定雇佣劳动的“劳动”是不准确的，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当然，要想看出这一点，显然不是站在数量维度上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能做到的，即使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也不例外。马克思用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劳动力商品概念来取代了雇佣劳动层面上的劳动价值，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推进。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转换为资本”一节在谈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后，加进了对劳动能力的价值进行论述的一个小节，这是以前的文本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没有的。这标志了马克思在对劳动力商品的内在价值的理解上有了更深的领悟。他明确地指出，“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作为工人的自身，作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归结为由于生产那些维持和繁殖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而必须花费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即耗费的一定量的劳动。”<sup>2</sup>站在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仅从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作法感到不满意了。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在批判詹姆斯·穆勒的观点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时指出，“所有这些拐弯抹角的说法都丝毫不能帮穆勒的忙，就是说，丝毫不能帮助他回避解决这个问题：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李嘉图以及追随他的穆勒等人就是这样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的）如何同直接与它矛盾的价值规律相符合。”<sup>1</sup>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后指出，“从以上的阐述可以得知，‘对象化劳动’这个用语以及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同活劳动的对立，能够引起很大的误解”<sup>2</sup>。

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关注使马克思对资本内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商品和货币本身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资本，但如果撇开这种历史条件而在一般意义上把它们与资本等同起来，则是错误的；劳动资料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资本，但如果撇开这种历史条件而一般地把它赞同于资本，则是错误的。“当资本还只是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或货币的时候，资本家也表现为商品占有者或货币占有者这种众所周知的特征形式。但因此，正像商品和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本身也不是资本家。正像商品和货币只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也只是在同样的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家。”<sup>3</sup>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简单地理解为作为商品的积累劳动和作为商品的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所以才无法真正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解读之中。

马克思指出，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重要性，就不难看出，资本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不管是在交换价值还是在使用价值维度上都表现出了普通商品所没有的独特性质。对普通商品来说，我们从其交换价值中只能读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无法知道这种对象化劳动来自于谁。但从资本品的交换价值中却能够清楚地读出其中的一部分是有酬劳动而另一部分则是无酬劳动。每一个作为资本的商品不单单是作为物的商品本身，而且还是资本的价值及剩余价值的承载者。由此，作为资本的商品“实际上作为已经自我增殖的资本的转化形式，现在出现在为了实现旧资本价值以及上面讲到的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发生的出售范围，出售领域中。而旧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决不能通过各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单个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售来达到的。”<sup>4</sup>就使用价值维度来说，普通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对该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但资本由于不仅把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种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如机器等）并入其自身，而且还把劳动的主观条件即雇佣劳动也并入其自身，因此，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还是资本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从表面上看，此处的论述颇具吊诡性。劳资之间的交换居然是以较多的活劳动与较少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的对象化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这也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无法彻底解决的理论魔咒。客观地说，斯密等人把资本说成是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时，他们的确已经意识到了资本的增殖是借助于活劳动来完成的。但是，“在这方面，它的缺点在于：第一，他们不能证明，较多活劳动同较少对象化劳动的这种交换怎样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第二，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sup>1</sup>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只有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说，劳资交换这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商品交换，虽然是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但它却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不是概念上的诡辩，而是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看出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所谓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本质上不但不与劳动价值论相违背，而且还是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我实现。“就商品来说，人们只支付它的交换价值。人们买油，只支付油中包含的劳动，而不是支付油的质，买酒也是这样，人们只支付酒中包含的劳动，而不会为喝酒或者为他在喝酒时得到的享受进行支付。因而，同样，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是支付它的交换价值，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但是，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本身又是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实体，所以下述情况与商品交换规律没有任何矛盾：劳动能力的现实消费，即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现实使用所创造的劳动，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本身作为交换价值所包含的劳动。”<sup>2</sup>现在很清楚了，吊诡的不是马克思此处的理论表述，而是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内涵。正是凭借这一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剖析，马克思越过了英国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劳动价值论而展开的对劳资分配不公现象的批判视域，进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层面，并把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 三

应该承认，国外左派学界的确有学者也是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相通性的角度来展开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研究的。譬如，德国学者罗斯多夫斯基（Roman Rosdolsky）就曾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对从前者向后者的辩证转换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资本的产品，因此，价值规律必定发生变形。“因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决定因素起作用，它仅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一切经济主体必定显示出人们作为商品交换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但是，抽象的决定因素不能直接应用于‘进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页。

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它们必须首先处于某种中间地位。而这种中间地位被生产价格确立了。因此，‘价值规律的转换’——这种从劳动价值（或简单商品经济）到生产价格（或资本）的辩证转变，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演绎，而只是理解具体（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方法。”<sup>1</sup>从表面上看，罗斯多尔斯基此处的论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上述这种观点，应该可以发现罗斯多尔斯基明显地把从劳动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与劳动价值规律的转型简单地混同了起来。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确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范畴，但它本身的转型并非劳动价值论的最主要内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要说明为什么劳资之间的关系既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又是能导致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

罗斯多尔斯基看不到这一点，这使他只能从价值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抽象性中简单地推演出劳动价值规律的抽象性，并认为这种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一种抽象的决定因素，只是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作为商品交换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他看来，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方面，属于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是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读的，而只能运用生产价格等概念来加以解读。我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确强调了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的重要性，但这跟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一码事。虽然罗斯多尔斯基也强调了对生产价格的研究必须追溯到对价值这一内在的、隐藏的原因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对资本的剥削逻辑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说明。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虽然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明确地关注了对资本剥削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十分清晰的社会历史性维度，从而使他始终忙于去思考劳动价值规律是否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方面直接对应。一旦发现不能直接对应，就索性把它界定为抽象的决定因素。他不知道，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吊诡性，在于劳资之间看似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其实恰恰是符合劳动价值论所讲的等量劳动进行等量交换的规律的。

当然，对这一点的强调更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相互割裂开来的作法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这里首先是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对他们来说，分析生产和分配的社会问题、探讨和评价以此为基础的阶级关系，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属于‘意识形态’、‘思辨’的范围。十分明显，在他们看来，科学只是把握了特殊的社会经济内容的各种经济学概念的理论化。”<sup>2</sup>显然，这种观点首先是把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维度去掉，然后再把剩余价值理论中所体现的基于社会历史维度的经济学维度也去掉，最后再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主观的情感判断，而其劳动价值论仅仅是数量化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说实话，如果基于这样的理解而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是依然具有科学性的观点，不仅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原意相差很大，而且还有很大的负面理论效应，因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了只是马克思

<sup>1</sup> [德]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坝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1 页。

<sup>2</sup> [德]曼弗雷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钱学敏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 页。

从与斯密、李嘉图等人相同的基本理论（即数量化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而已。如此一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就无处安身了。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时，要对这些观点始终保持清晰的辨析及批判能力。

作者简介：唐正东，男，1967年生，江苏常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马克思“现实抽象”批判三维度

汪行福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

——马克思

马克思的“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范畴在当今左翼理论家中受到极大的关注, Albert Toscano 在《现实抽象的公开秘密》中说:“无论我们是否关心揭开商品拜物教的面具、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关于异化的话语,都很难忽视马克思的背景(Marxian matrix)的力量——与当代论抽象的话语经常依赖于复杂性和信息概念相比——它依赖的是把资本主义描述为真正的文化抽象(abstraction of culture *par excellence*),描绘为这样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由抽象实体真实地推动的,是被抽象权力穿越的。”<sup>1</sup>因为“马克思的方法论革命,他对社会的、文化的、理智的抽象物的表述是建立在价值形式、货币和抽象劳动的现实抽象基础上的。”<sup>2</sup>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家 Enzo Paci 也强调,现实抽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具体地起作用”,<sup>3</sup>抽象范畴象就像具体东西那样活着,范畴是主体,而人不过资本的抽象范畴的面具。

以往对马克思的抽象现实范畴的讨论往往强调它的认识论意义,即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抽象价值形态发掘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基础和根源,从而揭示它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这一批判当然仍然有其意义,但随着资本主义从商品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现实抽象”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具有了更加强烈的科学分析和社会病理学诊断的价值。马克思说:“现在我们受抽象统治,而过去我们是相互依赖的。”<sup>4</sup>抽象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抽象劳动、价值和货币等抽象物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前提,是资产阶级权力关系的中介。当今西方学界对现实抽象的批判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即把这一概念普遍化和非历史化,不仅用它来解释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且解释人类一切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特征。在此仅举两个代表性的案例。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雷特尔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不仅运用这一概念解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唯心主义观念论哲学的起源和基础,而且强调人类的“意识形式,我们在理性的意义将之称为‘知识’的形式,源自存在

<sup>1</sup>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273

<sup>2</sup> Albert Toscano, Fanaticism, p. 190

<sup>3</sup> Enzo Paci, Il filosofo e la città. Platone, Whitehead, Husserl, Marx, cited from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274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4页。



于商品交换之中的物化（Verdinglichung）。”<sup>1</sup>在他看来，不仅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而且一切时代的概念思维和系统化的知识形式，甚至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现实抽象的结果。托斯卡诺在《宗教迷狂》中把金钱与宗教都置于现实抽象基础上加以研究。他指出，“无论我们处理的金钱还是宗教，关键的错误是把现实的抽象视为人类反思的‘任意的产品’。这是18世纪热衷的解释类型：以此方式启蒙思想家试图……去除由那些他们无法看透的人类关系所产生的神秘外观的陌生性表面。而宗教的陌生性是不能把它归之于牧师的阴谋或心理幻觉而驱逐的，也是不能通过教育而医疗的。”<sup>2</sup>宗教和金钱拜物教当然有相似之处，甚至“拜物教”（fetishism）本身就起源于宗教，它的核心特征是赋予平常物以神圣性。但是，把宗教与金钱视为同样的事物是错误的，金钱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是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结构化原则，而宗教在现代社会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宗教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任意幻想，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结构决定并承真实的社会功能的幻想，而它的基础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真实抽象，反而是具体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的具体。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真实抽象基础上的理念的 and 概念的抽象物只是存在于被交换关系统治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资本主义是相对近的现象，只是几个世纪前才真正成为全球的（或全球化）的生产模式。”<sup>34</sup>因此，我们需要限制现实抽象范畴运用的范畴，避免地其滥用和过度发挥。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抽象现实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关，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模式普遍化和霸权化有关。在马克思那里，对现实抽象的批判有三个面相：一是它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知性思维的社会认识论批判的工具，二是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象的根源和本质，最后，它是对资产阶级特殊的权力关系和统治秩序的政治批判。今天我们应该沿着这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一范畴及其当代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首先我们需要讨论现实抽象的本体论地位，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现实抽象首先是现实存在，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的逻辑特征。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就现实抽象的认识论批判、异化论批判和社会权力批判三个具体维度进行探讨。

## 一、“抽象现实”的现实存在

人们对现实抽象的讨论往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在那里指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这种方法表面上是正确的，但更仔细地考察起来，

---

<sup>1</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sup>2</sup>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184

<sup>3</sup>

Laurence Wolf Ross, *Real abstraction: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an idea*

<https://thecharnelhouse.org/2014/04/21/real-abstraction-on-the-use-and-abuse-of-an-idea/>

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

<sup>1</sup>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具体到抽象，第二道路是从抽象到具体。“第一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种抽象是一种知性的思维，它把具体的事物分解为它的要素，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sup>2</sup>马克思特别指出，自己的研究与黑格尔哲学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sup>3</sup>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所获得的抽象仅仅是思维的抽象，它不具有真实存在的本体论地位。

当然，科学研究本身不是自足的，它依赖于现实本身所创造的条件。马克思针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了简单的具体和发达的具体。“不管怎么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sup>4</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抽象，一类是人类通过对直观和表象进行思维加工所获得的抽象概念，如生产、劳动等一般概念，它们是人类社会都存在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sup>1</sup>而另一种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抽象概念，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2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43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

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sup>2</sup>这段话表明，抽象范畴不是头脑和思维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不论是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抽象，还是特定的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概念抽象，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的抽象，是头脑中的抽象，它们是人们科学地把握人类一般生活或特定的历史总体的概念环节和理智中介。

而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实抽象”不是上述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抽象，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这种“现实抽象”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发现，对这一特征的揭示，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核心，而且是对资产阶级文明进行诊断的核心。Roberto Finelli指出，马克思成熟思想最具特色的是他提出了“现实抽象”社会本体论，“在当代社会中，抽象物通过它自己的特定内容，即无性质的劳动，获得了完善客观的地位”<sup>3</sup>。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和过程，由各种因素构成，而联结它们的节奏和环节的恰恰不是逻辑，而是极其实实在在的现实抽象事物本身。在这里，“现实抽象”不是概念拜物教式的观念，一种可以用意识形态批判和理智启蒙可以消除的幻想，而是现实态的抽象物。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真实抽象的悖论性特征及其复杂的历史性后果的反思，才深刻地真正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它的特殊性。

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抽象”的物质性特征许多学者都做过分析和讨论。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就说，他研究的“不仅仅是经济（经济学）而是由现实的抽象对价值的全部现实进行建构的社会本身。”<sup>4</sup>而这一现实的抽象物就是货币。席美尔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而“纯粹的关系投射入特殊的对象乃是精神的伟大成就之一，当精神之中被具体化时，这些对象就成了运载工具赋予精神以更加活跃与更加广泛的活动。构成这样的符号对象的能力在货币之中达到了最伟大的胜利。”<sup>5</sup>货币作为抽象价值，不是概念，而是像商品一样的真实存在，“货币已经被定义为‘抽象的价值’。作为一个可见的物体，货币乃是体现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物质”<sup>6</sup>。席美尔之所以重视货币，是因为与商品相比它具有更抽象的性质，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理论理解为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他指出，“对象通过可交换性获得的价值，……这一事实，马克思把它阐述为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为了有利于交换价值而取消了使用价值——但是这一发展看起来并没有达到它的圆满完成。惟有货币，从纯粹概念的角度看，已经达到了这最后的阶段，它是可交换性的纯粹形式。”<sup>7</sup>因此，货币哲学不仅仅是对商品拜物教这一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是对作为抽象价值本身的货币的现实抽象的批判。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

<sup>4</sup>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p.78.

<sup>5</sup>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sup>6</sup>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sup>7</sup>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阿多诺在《社会学导论》也指出：“我们所关注的抽象不是先进入到社会学理论家的头脑中，然后他们就提供某种浅薄的定义，即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这里所说的是人们去看交换过程本身真实地特定的形式，是社会化由之出现的深层社会事实。如果你想让两个东西相交换——正如交换一词（exchange）所暗示的——如果你想平等交换，如果没有一方得到比另一方面多，那么，他们就必须把商品的某种方面抛在一边。……因而，抽象不是在社会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社会本身之中。”<sup>1</sup>雷特尔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也指出，“一种源于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的意识形态是以一种作为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Abstraktionsprozeß）为条件的。只有这一事实才能使‘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这一表述所指的内容变得可以理解。”<sup>2</sup>

总而言之，“现实的抽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的情况，它仅仅是指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它们的可交换性本身。商品的交换和它依赖的抽象价值相等，并不仅仅发生于那些交换者的头脑中，它们就出现在现实性的层面之上。现实的抽象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社会存在范畴。对真实抽象的批判首先需要区分现实的抽象与观念的抽象，成为马克思理论核心的不是对抽象观念的批判，而是对真实态的现实本身的批判。下面我们将从现实抽象与政治经济学、与主体的异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三个维度，全面地讨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作用。

## 二、现实抽象与现代经济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这一原则的方法论意义，雷特尔明确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纯粹的思想本身呈现为思想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sup>3</sup>思想的抽象性是以现实本身的抽象化为基础的，这一论断对理解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起源和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个人，根本不是自然状态的人，而是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sup>1</sup>其实，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才出现的。一方面它意味着个人特殊性的权利的实现，“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和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另一方面，它是以外在普遍性为

<sup>1</sup>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p.31-32.

<sup>2</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sup>3</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特征的社会结合形式。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把自己当作目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了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的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sup>2</sup>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也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性特征。“只有到 18 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sup>3</sup>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本身的变化相联系的，重商主义把创造货币的商业劳动视为真正的劳动，重工主义和重农学派把创造财富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视为真正的劳动，而“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sup>4</sup>因此，“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sup>5</sup>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般的抽象概念是因为现实本身出现了使之可能的抽象现实形式。“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sup>6</sup>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切经济学概念，如商品、价值、劳动、货币、资本等等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被确认为一般的范畴，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劳动和交换关系本身已经脱离了共同体生产和交换的特殊形式，获得了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特征。

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概念在西方左翼学术界重新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受雷特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的刺激。他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抽象的历史存在奠基的。不仅如此，马克思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纲领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拓展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连贯性依赖于这样的可能性，即继续推进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直至这样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上，拜物教的整个机制超越了特殊的资本主义拜物教，也就是说，因其有效性，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揭示贯穿了整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5 页。

<sup>2</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范扬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第 197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9 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5 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5 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6 页。

个所谓的文化史，也就是直至古典时代，甚至更早。”<sup>1</sup>

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意识形式，我们在理性的意义将之称为‘知识’的形式，源自存在于商品交换之中的物化（Verdinglichung）。”<sup>2</sup>一切观念的抽象都可以追溯到现实的抽象，或者说，在现实的抽象中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一切商品交换都依赖于货币，货币一开始必须是实在的，“货币的实在性也必须与其要购买的商品物的实在性是在同等程度上的，因而必须具有物的（dingliche）、时空的同一性。”<sup>3</sup>但是，货币不仅仅是对我，而且对于参与所有货币交流的人来说具有一种一般的实在性，不仅如此，就其客观约束力来说，它是可以想象的最高的实在性。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交换社会，而商品交换依赖于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人的劳动力集中到同一交换场所的价值规律，而这种价值规律正是“生产的先天之物”（Apriori der Produktion）正如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依赖于思维的先天形式一样。不仅如此，《纯粹理性批判》的先天形式、《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意志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抽象的结果：“在历史上，知识的先天论解释发生于这样一个时间点，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机制成功地形成了一个自在相关的、似乎是自动的体系（selbsttatiges System），因而不再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挥作用，且不再依赖于国家的帮助，而是通过在市场上形成的交易定价，以及将劳动归摄于生产场所（Produktionsstätten）中的机器之下，这种竞争机制开始完全实现其特别的合规律性。随着资产阶级获得了其经济上的自主，它便也成功实现了外在的、政治的解放，康德哲学便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sup>4</sup>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与货币确立交换价值的形式同一性相联系的。推论性的理性思维是商品社会的货币功能所限定的意识形式，理性知识是交换规律决定的社会生产在观念上的再生产。

雷特尔还认为，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揭秘”，而且能够用于把握一切哲学相信思维和概念具有自我同一性的哲学思维。现实的抽象与思维的抽象都立足于本质上的形式同一性，而这种形式同一性就已经包含最早的铸币之中。决定铸币之为货币的不是它的质料，而是它作为现实抽象的形式要素。爱奥尼亚是最早铸造钱币的地方，也是最早出现哲学的地方。在他看来，不仅马克思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全部哲学和科学的抽象思维、概念和普遍原理都包含在货币这一“现实抽象”的特征之中。雷特尔说：“更一般地说，合乎知性的思想的一般哲学概念的形成，在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现实抽象中，也就是在第二自然中，有其形式的和历史的根源。”<sup>5</sup>他甚至说：“成为唯心主义从中发现的人类精

---

<sup>1</sup>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111 页。

<sup>2</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132 页。

<sup>3</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49 页。

<sup>4</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129 页。

<sup>5</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48 页。

神自律的顶点，是以文明人的报告能力为前提的，是以某种程度的物化为前提的，这种物化的尝试和不透明性(tiefe und Undurchsichtigkeit der Verdinglichung)连马克思都没有完全认识到。”<sup>1</sup>

关于雷特尔假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起码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基本原因在于，虽然货币、交换价值很早就存在，但是，只有在成为人类的普遍交往形式和构成性因素时，才能对全部思想产生它的规定性力量。正如前面所引证的，马克思所说：“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但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范畴，并没有脱离人的具体生活背景和关系而抽象化，只有到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它才成为一个复杂的抽象范畴。”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18世纪发达的市民社会中形成的观念投射到过去，相信人一开始就是孤立的单个的个人、鲁宾逊式的原子个体，那么，雷特尔的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错误，即把发达的货币交换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和思想投射到不发达的商品交换社会之中。

### 三、现实抽象与社会物化

马克思《资本论》最著名的段落无疑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奥妙和神学的怪诞。”<sup>2</sup>其根源在于，人的具体劳动及其社会关系采取了商品和抽象价值交换形式。“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化，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sup>3</sup>基于商品拜物教对人的劳动及其关系的认识的扭曲，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是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不非偶然。……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的原型。”<sup>4</sup>由于在市场经济的商品运动中，不仅个人失去一切有机的社会联系，变成原子式的个体，而且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价值规律的强制命令来行动，“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的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成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

<sup>1</sup> [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候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sup>4</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6页。

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sup>1</sup>但是，商品拜物教不是马克思物化批判理论的所有内容，甚至也不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商品拜物教的核心特征主要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相互间直接关系的物化，在这里，与其说是人受现实的抽象的统治，不如说它是受商品和他们之间直接交换关系的统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发生关系，不是因为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等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是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sup>2</sup>商品固然已经是现实的抽象，但它并没有脱离其感性的形式，没有丧失其物质性，因此，它只是现实抽象的初级形式，正如象形文字是抽象语言的初级形式一样。

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著名论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sup>3</sup>这一论断不是在商品拜物教批判，而是在货币拜物教批判中才真正获得其全部意义的。马克思明确地说：“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sup>4</sup>因此，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奈格里曾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商品的——引者加）价值面前，而是置身于由货币构成的世界之中。”<sup>5</sup>与《资本论》不同，马克思在《大纲》中不是从商品开始，而是从货币开始的，因为货币把人直接地带到现实抽象面前。如果说，商品拜物教主要表现为单个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直接交换关系的物化，货币则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关系及其调节机制的物化，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主张区分出物化（Verdinglichung）批判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批判两个层面。<sup>6</sup>按照这种区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属于物化，而货币拜物教则具有了物象化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就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而言，“货币从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sup>7</sup>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而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生产，交换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最后必然发展为以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的价值形式，货币的起源包含着商品的起源，但货币不能还原为商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一切商品最终只有转化为货币才最终实现其价值。

关于货币的起源，马克思在《大纲》中说：“交换一般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而货

<sup>1</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7页。

<sup>2</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4页。

<sup>4</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sup>5</sup> [意]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1年版，第42页。

<sup>6</sup> 刘森林：物象化和物化：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再思考，《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3页。



币作由交换本身所产生的尺度、交换手段和一般等价物，不是在内部交往中，而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民族等等之间的交往中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sup>1</sup>任何共同体都存在着劳动交换，但是，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不是价值交换，而是像毛斯所说的是一种礼物交换，一种互助性的关系。货币交换起源于共同体之间纯经济的联系，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货币起源于共同体之间的交换，然后向共同体内部渗透，并最终瓦解共同体，并最终形成货币交换的社会。在古代社会，货币并不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在罗马帝国，即使货币交换处在其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甚至“在16世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幼年时期，货币也主要是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清偿国际债务——引起各国和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特别注意。”<sup>2</sup>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解体后成为原子式个体时，货币才会成为人与人联系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一开始就是社会关系异化的产物。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应该以货币这一现实的抽象为焦点。

马克思对货币这一现实抽象的物化和异化后果有大量的分析和讨论。首先，货币是一切客观价值的溶化剂，在这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价值都相对化和功利化了。在货币面前，“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以让渡的，因为一切薪酬都可以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的、不能抵押的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sup>3</sup>一切事物失去了自在的价值，成了“为他的存在”，它的价值归根到底由货币来衡量，也是为了货币而存在，货币成了商品的绝对目的。“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再出来时都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sup>4</sup>甚至“有些东西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sup>5</sup>

其次，货币交换是个人的非人格化。马克思指出，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一种悖论状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有了普遍的联系，同时又使这种联系变成纯粹偶然的联系：“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一切人所占有，而个人能否占有某种东西则取决于偶然情况，因为这取决于他所占有的货币。”<sup>6</sup>货币的悖论性质在于，它既是一般财富的实体化，又是商品价值一般的抽象，在这里，“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86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sup>4</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sup>5</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sup>1</sup>货币是道德的溶化剂，在它面前一切东西都变质了，“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收买是一回事。”<sup>2</sup>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货币已经取代了上帝成了有魔力的东西，“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着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工和外在化的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因此，“凡是我作为人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sup>3</sup>

第三，现实抽象的人格化。现实抽象的社会影响有许多层面，最直接的层面是具体的人被转化为抽象的社会规定，而抽象的社会规定也拟人化为人，这一人与物的颠倒特别形象地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三位一体”公式之中。马克思说：“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货币收入——引者加）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sup>4</sup>人的非人格化和物的似人化成了物化的典型形式。

第四，现实的抽象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显著和恶化。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不仅关心商品和货币对人的物化，而且从当时刚刚出现的信用和股份制中看到现实抽象的螺旋式上升和不断强化的趋势。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先出现的是单个的资本，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社会化，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了。“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生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sup>5</sup>正如货币是价值的进一步抽象化，同样，资本在信用和股份制形式中，也越来越抽象化。“**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为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较高级的中介形式到处都作为资本把较低级的中介形式又表现为劳动，单纯地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来源。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于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相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sup>6</sup>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最远离生产的抽象资本越表现出资本的本质和其疯狂的特征。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出现的资本抽象化形式，如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3-174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3页。

<sup>3</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sup>4</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0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4页。

义，使人卷入到越来越抽象的现实之中，因此，也就表现得比马克思时代更加疯狂、更加荒诞。

#### 四、现实抽象与社会权力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流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没有像对剥削的批判一样，建立一个权力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说：“即使人们把阶级冲突的机制归结为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基本矛盾’上，物化过程也并不必然仅仅在引起物化的领域即劳动的领域中出现。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金钱调节的经济过程通过管理系统而得到功能上的补充。”<sup>1</sup>在他看来，“物化影响能够以相似的方式产生于公共的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官僚化和货币化。”<sup>2</sup>其实，马克思并非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只是他比别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并不是独立于财富关系的独立领域，而是深深地嵌入在货币占有和交换之中。马克思指出，“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的关系，而这种对于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sup>3</sup>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sup>4</sup>货币在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关系的结构化力量，而且是现实的权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sup>5</sup>在《大纲》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越是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产品同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越是发展。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sup>6</sup>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sup>7</sup>由于“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sup>8</sup>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有个体化和实体化为货币，才获得其可以捉摸的对象化形式，作为“商品的上帝”，货币就是直接的社会权力。马克思有段话特殊形象地说明了货币占有

<sup>1</sup>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342.

<sup>2</sup>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343.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4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4页。

<sup>5</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5页。

<sup>7</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3页。

关系的权力性质：“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一件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sup>1</sup>在马克思那里，抽象统治在货币的魔力中得到充分地体现。货币不仅是“商品的上帝”<sup>2</sup>，是驱动资本“周而复始的永动机”<sup>3</sup>，而且还是自然“万物的结晶”<sup>4</sup>，社会运行的“先验的权力”<sup>5</sup>和人与人关系“社会的抵押品”<sup>6</sup>。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批判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权力关系的批判。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马克思对现实抽象批判不是浪漫主义的怀旧式批判，他并没有要人们简单地抛弃商品、资本、货币等抽象交换媒，回到人与人直接交换的阶段，或者在简单的劳动交换关系基础上恢复被资本主义瓦解的社会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取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sup>7</sup>在马克思看来，留恋所谓前现代的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原始丰富性是可笑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性。”<sup>8</sup>在一定意义上，现实抽象的作用是辩证的现象，是一种创造的破坏和破坏的创造相交织的过程：“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的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sup>9</sup>“如果我们在现代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sup>10</sup>这属于马克思对现实抽象批判的另一维度，即对现实抽象的解放论的批判，在此不做讨论。

从上面讨论可以看出，“现实抽象”是马克思的重要发现，其意义不亚于剩余价值理论，它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本质和特征的重要理论工具，而且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的理论武器。我们不应该像雷特尔和托斯卡诺那样把这一理论概念无限制地加以泛化，而是应该紧紧地扣住资本主义现实本身。这里就是罗陀斯鸟，就在这里跳吧！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10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2-153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2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7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0页。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7页。

<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2页。

<sup>9</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5页。

<sup>1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9页。

# 《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王南湜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人们的自然反应是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不例外。于是，一大批各式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参照系的新理论便应运而生。这些新理论基于对现实世界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敏锐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予世人以警醒，这比之那种抱残守缺的迟钝僵化态度，无疑是值得嘉许和尊敬的。但在嘉许和尊敬之余，我们却也不能不感到，这些创新性的理论在以《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参照系进行理论创新之时，却也往往是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的，而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反而由于这种误读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为此，便有必要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开放出新的可能性。

## 一、被误读的《资本论》批判主旨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便不断遭到不同方面的误读。一种是体现于那些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流派及其后继者，基于其理论立场而对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的误读，如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人在对马克思有关理论的批判中的误读。这类误读主要发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因而其主要特点是仍从经济学层面提出问题。另一类误读的特征则与之相反，主要不是从经济学层面，而是从哲学层面提出问题，将《资本论》主要理解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之存存历史的批判，其根本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剥削之奥秘，以唤醒无产阶级之对自身历史地位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实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理性社会。这类误读虽然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如克罗齐、约瑟夫、斯科特、林赛等人<sup>1</sup>，但更主要且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于《资本论》批判主旨的误读。这一误读的主要模式，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回归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论分析和批判，或者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去理解和阐释《资本论》。对这一误读模式之影响作一简单巡查，就不难发现，其影响所及，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支配了对于《资本论》的理解。尽管这种阐释方式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的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未能抓

<sup>1</sup> 参见张亮：《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重的〈资本论〉：批判的再评价》，《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

住《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最为深刻、最为有力的批判，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哲学理念层面，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只是试图基于道义层面的某种价值原则，如平等原则或其他原则，去从事批判，而遮蔽了以《资本论》的方式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能性。因此，我们这里将主要针对对于这一误读模式展开讨论。

人们知道，这样一种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现。在这部影响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中，卢卡奇在未见到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借助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并结合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而将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物化过程，并将这一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意识理解为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从而得出了与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内容却颇为相似的结论。在卢卡奇看来，正是由于深陷于这种物化意识，无产阶级才无法自觉到其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难于实现。因此，解决之道在于揭示出商品生产之作为物化过程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物化意识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弥漫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但其最高表现则在哲学之中，而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其二元论的克服的努力，也正是尝试对于物化意识的突破。但这些努力由于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终究功亏一篑：“因此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一点在古典哲学本身中只是以这些没有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们当然意味着是对那些二律背反的最深刻、最伟大的思想表述。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古典哲学给以后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所能留下的遗产只是这些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sup>1</sup>基于其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但它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而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这就是，“古典哲学道路的那种转变至少在方法论上开始超越这些局限性。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并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sup>2</sup>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之克服物化意识而达于对于自己历史地位之认识的无产阶级意识。而这，正是《资本论》之批判主旨。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实际上是将《资本论》解读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

---

第3期。

<sup>1</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7—228页。

<sup>2</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8页。

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对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sup>1</sup>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写道：“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sup>2</sup>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sup>3</sup>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sup>4</sup>。基于此点，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sup>5</sup>

另外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尔施，也是通过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完全一致而将《资本论》作了哲学的解读。在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路程”，但是，“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知。”<sup>6</sup>而“马克思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明确地不仅是予以批判，而且在经济学上肯定地与之相联系……是采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sup>7</sup>但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观察，而是“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会明了下述特殊意义，即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对于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对它压迫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工人作为纯粹的商品这种实际状况与在意识形态中同样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善良意图与纸上声明（按其观点工人不

<sup>1</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37，646—647页。

<sup>2</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48页。

<sup>3</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49页。

<sup>4</sup> 参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98页。

<sup>5</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69—670页。

<sup>6</sup>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sup>7</sup>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应当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看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的表述将导致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它在实际上对维持这种矛盾状况的利益,反对它在理论上对保持那种拜物教现象的利益……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sup>1</sup>

卢卡奇、柯尔施对于《资本论》的解读具有典范意义。受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大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者虽然转而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解读马克思,但由于主要地仍是从一种劳动本体论的行动者视角去阐释《大纲》的,而不是从科学逻辑的旁观者视角去理解的,因而从总体上看,仍是卢卡奇等人解读方式延续或发展。这是因为,与《资本论》相比,在《大纲》与《手稿》之间,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仰海峰教授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sup>2</sup>

这一解读方式虽然不像林赛等人那样,将《资本论》直接理解为一种“自然权利理论”甚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sup>3</sup>,而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发展的存在论,但这种解读方式归根到底却也不能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这是因为,这种解读一般而言预设了一种历史目的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上是或应当是和谐圆满的,而其发展道路却必须通过原始圆满的破裂走向分化对抗这种异化形式,但历史最终必将走向扬弃异化之圆满结局的理想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之必经阶段,但另一方面其异化现象又是道德上的缺陷,因而《资本论》作为一种存在论,就一方面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存在本质的客观揭示,但这种揭示既然包含着对于其道德缺陷的揭示,那么,它同时在本质上就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且是更为深层的道德批判。而作为历史解释学和道德批判,则其功能便主要的是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即使得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的理想社会的责任。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资本论》能不能首先被归结为一种哲学著作,归结为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呢?

---

<sup>1</sup>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sup>2</sup> 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sup>3</sup> 参见张亮:《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重的〈资本论〉:批判的再评价》,《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



## 二、《资本论》的批判主旨何在？

毫无疑问，《资本论》绝不能被归结为一本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正如所有伟大的科学著作，如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划时代的著作其中必定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创新，从而不能被归结为单纯的科学著作一样。而卢卡奇等人的哲学式解读就其揭示出了《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纠正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解读而言，对于人们全面理解这部伟大著作亦居功至伟。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如其副标题所明示的那样，《资本论》的确并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而同时是一部批判之作。但问题是《资本论》批判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归根到底的道德批判呢，还是别有所指？如果《资本论》主要地是一部道德批判之作，那么它所具有的那种巨大力量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本人那里，看看他是怎样看待《资本论》属性的。

我们知道，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性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写下了一段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著名的话：“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1</sup> 这里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其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人们也往往基于此而将之理解为一种归根到底的道德批判。但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却又特地地做了这样的声明：“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sup>2</sup> 这一声言似乎又明确地拒绝了将《资本论》理解为一种道德批判。那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两段话呢？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所说的这两段话都是有效的，而不忽视对其中一句的话，那么，一种可能的理解就是这里所说的批判只能是指超越了道德批判的狭隘视界，而是一种道德批判之外或超道德的批判方式。

那么，一种超道德的批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批判呢？如果我们记得康德哲学是以批判哲学而闻名的话，那么，我们当能从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康德哲学是由三大批判构成的，而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原本就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虽然定名为《资本论》，但却保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名称作为副标题。两位伟大思想家都

---

第3期。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将“批判”作为自己主要著作的名称，这在思想史上恐怕不能说是巧合，而是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而这一关联当正是理解《资本论》之超道德批判的关键之处。康德哲学批判的目的是基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划界，主要针对的是旧形而上学之理性的超验使用所产生的那些超验的理念，通过指出理性的超验使用必定带来理性的二律背反而证明了那些超验理念只不过是一种先验幻相而已，从而达到划定理性之有效性之界限的目的。与之相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之为自然的，从而是非历史的永世长存之物这种背离了科学逻辑的先验幻相的揭示<sup>1</sup>。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那段名言之后，紧接着便谈到了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之意谓的内容：“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sup>2</sup>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批判，当是揭示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但马克思是如何揭示这一矛盾运动的呢？

基于对“批判”概念的狭窄理解，对于《资本论》对此一矛盾运动的揭示之批评论意蕴，人们往往也是从一种价值原则去加以阐释的。当人们在论述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根源而展开批判的时候，对于这里所说的“批判”的理解，所指的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趋势出现了严重冲突，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则不仅被理解为一客观规律，同时也被悄悄地理解为一价值原则了。当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被视为一种价值原则，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通向理想社会的基础条件为前提的，而理想社会按照设定最终又是符合全人类最终利益的。这当中暗含的意思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便是先进的、革命的，从而是道德的，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则是反动的、不道德的。以这样一种观念为阐释背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解释之为辩证法之批判本质的例证，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这样一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揭示，也就从根本上被纳入道德批判的范畴了。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如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被归结为了这样一种批判，一种以科学方式出现的道德控诉，那么，它还能够具有它已经产生过且仍在继续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吗？果若如此，马克思所主张的经验的“历史科学”又如何能够与他所极力批判的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区分开来？显然，这种对“批判”的理解仍未摆脱“道德宣判”的狭隘视界，因而，我们还必须寻找对《资本论》批判主旨的适合的理解。

对马克思关于批判观念的适合理解，可从他对李嘉图称赞中见出：“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

<sup>1</sup> 关于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请参见拙作：《〈资本论〉的辩证法：历史化的先验逻辑》，《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5页。

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sup>1</sup>显然，马克思之称赞李嘉图，正是因为他不像斯密那样在其理论中混杂着“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与“非科学的观察者”，即“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而是单纯从科学的观察者视角去看待并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只能从“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从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如此理解的“批判”便不可能再是一种“道德宣判”，而只能是一种“社会生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宣判”，甚至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医学宣判”，而这种宣判，并不是像法庭上的公诉人那样，通过指责资本主义的非法性、非道德性，诉诸人们的道德和法律良知，以求取历史法官对其罪责的惩罚性判决，而是依据科学的病理学所指明资本主义“生命”的“大限”，直接宣判了资本主义之“死期”。而这一宣判就集中展示于马克思如下论断之中：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sup>2</sup>在稍后几页，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基于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有限性之所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 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sup>3</sup>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内含的这一内在矛盾，因而它便不可能是永恒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即是一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趋于灭亡的社会历史阶段。具体说来便是：“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7—278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7—288页。

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sup>1</sup>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做的“宣判”。它宣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存的“临界点”，为之颁发了“死亡通知书”。这一宣判中并不包含道德上的义愤，而是以“科学的观察者”的名义进行的，因而这一批判所具有的力量，便是由客观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而非主观的道德义愤力量所能比！

### 三、如何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曾指出：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sup>2</sup>对于这一规律，马克思还说过，“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sup>3</sup>迄今为止，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尽管人们对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一规律也进行了诸多研究，但能否说已经做到了真正的理解，尚未能令人感到乐观。诚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从马克思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个规律涉及的许多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异议甚至不乏斥责。围绕资本有机构成是否提高，一般利润率是否趋于下降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争论，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不同的观点、方法和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分歧，甚至形成了争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局面……有的学者缺乏整体性的视野，在还没有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情况下，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然否定它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有的理论观点，由于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影响，偏离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新的理论观点必然会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产生激烈的争论。”<sup>4</sup>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一些学者由于其对马克思理论存在着误解，而将利润率的波动解释为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同。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利润率的变化是一种趋势，因而没有很好的解释一般利润率变化趋势理论。”<sup>5</sup>似乎可以说，这些“观点不是缺乏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了解，就是出于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8—289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年版，第267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年版，第267页。

<sup>4</sup> 鲁保林：《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与现实》，博士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第11页。

<sup>5</sup> 刘纪楠：《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研究》，硕士论文，吉林财经大学2013年，第8页。

论的误解，因而是不能成立的”<sup>1</sup>。这种争论在金融危机之时，甚至还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就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期间，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危机爆发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利润率是否呈现下降趋势、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否能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得到经验证明的利润率下降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危机前利润率呈持续上升趋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无助于危机的解读。”<sup>2</sup>还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不仅‘未能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而且始终对该论断抱有怀疑。《资本论》第三卷所呈现出来的基于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只不过是恩格斯裁剪的结果，而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完整的危机理论。”<sup>3</sup>

那么，问题是如此重要的“最本质的规律”为何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认可？这其中的缘由恐怕在于，一方面，《资本论》在哲学上被卢卡奇等人解读为一部存在论著作，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上，人们又将之与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放在同一层面，视之为单纯的经验研究，而忘记了《资本论》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迄今为止，《资本论》所宣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并未得到经验上的验证，这大概也就是人们不愿从这一立场去理解《资本论》之批判主旨的一个缘由。当然，也有学者从经验上通过统计分析对这一规律做了讨论，并得出了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这一规律的结论。新近有两位作者指出：“整个 20 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垄断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上升阶段交替出现，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促使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因素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表明了垄断时期，特别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阶段性的利润率上升以事实说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和对外贸易等因素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使其具有趋势的性质，垄断时期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出现。”<sup>4</sup>另有学者也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行的现象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sup>5</sup>

对于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论》最为关键的理论结论进行一种经验性的分析研究，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是，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经验验证是否具有合理性，即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证明或证伪这一规律？

这一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来的。但由于马克思所采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即便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还

<sup>1</sup> 彭必源：《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分析》，《当代财政研究》2011年第3期。

<sup>2</sup> 周思成：《利润率与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危机的阐释与争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sup>3</sup> 参见谢富胜 汪家腾：《马克思放弃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了吗》，《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sup>4</sup> 鲍金红、倪嘉：《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探析——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sup>5</sup> 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未达到具体存在状态，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便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便在这里，马克思论述这一规律时所设定的前提仍是抽象的单一市场，而非实际的世界市场。不仅如此，就实际情况而言，世界上的市场之间迄今仍是存在着种种壁垒，远未达致单一的全球市场，因而这一验证便不具有适宜性。而要能够合理地验证这一规律，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理论逻辑上，进展至世界市场这一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具体形态，另一是在实际的世界历史发展中达到或趋向于一个全球单一市场，只有这样，所进行的经验验证才能够是合理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才可能是具体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而将马克思的抽象阶段的论证，当作具体的结论，从而试图与现实经验相对照而予以肯定或批判。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错解了马克思的方法，从而也都是无效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并未完成，他所计划的六分册写作方案，最后也只有第一分册的内容大致完成，而作为他所设想的最为具体的关于世界市场的分册，更是只有一些初步构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展露出了其全球性，但毕竟在经验上尚未显著化，从而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去进行科学分析。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想的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正在趋于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资本帝国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和扭曲，但其指向却日益清晰。而这样一种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就与马克思在论证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定的单一均质市场十分接近了。如果全球化果真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则以往由于种种外部条件的影响而被扭曲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便会将其本真面目呈现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将会趋于不受其他条件影响地发生作用，从而在此条件下，由于利润率的下降所导致的资本家投资欲望的降低以至于消失，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继续存在。

因此，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根本之点，并非在于抓住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而仍沿着道德批判之路去建构新的批判模式，而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抓住其科学批判之实质，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科学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这里只是强调了从科学观察者视角的客观逻辑方面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重要性，而对流行的单纯从道德批判角度去阐发《资本论》进路做了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是要否定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更不是要人们全然放弃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在此问题上，笔者的基本主张是，无论是单一的科学批判还是单一的道德批判，都是不充分的，而必须使两者互相补充，协同进行，方能达致最为有效。这也就是说，要达到超越资本主义之目标，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继续存在，可视之为社会主义存在之客观可能性或客观条件，但单纯的客观条件并不会自动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由于任何历史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因而，其之实现还需主体方面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体的自由意志。但由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乃是能够充分实现人类自由发展之本性的社会存在方式，因而而是为人们所普遍意愿的社会理想，

从而在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存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同时具备了主客观条件。

# 马克思《大纲》中的空间思想<sup>1</sup>

王志刚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大纲》从总体性视野出发，阐明“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而且是空间性的存在。人的发展的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就是不断打破空间界限，由“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的空间化过程。这种空间性变迁背后闪烁的是资本的魅影。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等经典命题对资本关系展开了空间批判，并且在资本的“创造性破坏”逻辑以及“流动性”与“自我固定化”的空间性矛盾中，看到了解放的希望，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但相比“空间”而言，“历史”无疑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更为根本的维度。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空间”被更多地赋予了自主性力量的今天，如何正确地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对于回应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诉求、诠释当下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现实的个人；时间消灭空间；资本关系；空间解放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因其突出的全球空间效应而异常复杂。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其导致的公共福利支出的消减和财政紧缩，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新一波工人阶级斗争和反抗运动。这种后危机时代阶级对抗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理论研究。学者们纷纷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等经典文本出发，来理解、诠释当下生存与发展的境遇。

《大纲》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理论界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哲学层面，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事实上，《大纲》涉及了超越经济学视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空间政治学等众多宝贵的思想资源。近年来，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与艾伦·M·伍德（Ellen M. Wood）在帝国分析的模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预设的那种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并重的全球资本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依赖的就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所阐述的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大纲》有关“时间消灭空间”等论述，开启了批判地理学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这充分地证明《大纲》等文本具有独特的魅力，是“能够引起重大关注的著作”。<sup>2</sup>本文试图阐明《大纲》中的

<sup>1</sup>[作者简介]王志刚，法学博士，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空间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67）阶段性成果。

<sup>2</sup>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空间思想及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

## 一、“现实的个人”与空间

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离开了空间的人类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审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境遇时，人们日益发现空间在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和总体性地位，它日益从一个对象性的实体范畴转变为一个带有方法论意蕴的理论范畴。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W. Soja）将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性的重新发现，并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范畴这种现象，称为“空间转向”。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空间主题理论化的过程中，诸如索亚、哈维、史密斯（Neil Smith）等人都指责马克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地理）理论。索亚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sup>1</sup>哈维则提出“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的未完成因素，“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sup>2</sup>事实上，“空间”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及《资本论》等文本中，空间虽然不是最核心和基础的概念，但并没有被简化为一种拜物教和虚妄的意识，相反始终被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来对待。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之所在，就是其“克服了对历史的进化论式的庸俗理解，确立了一种具体总体性的视野，这个视野有一个特定的维度即空间性。”<sup>3</sup>

就《大纲》的方法论思想而言，马克思十分重视从总体性的视野——结构（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来讨论问题。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做了说明。我们以为，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特质是，既注重对社会及其众多内在因素的历时性考察，也注重对社会进行共时性的结构考察，即对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说明。这种把社会各个要素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阐明生产在一切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分析，在确切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空分析。《导言》的开篇，马克思表明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生产。这种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生产发展所带来的分工规模的扩大以及交换空间范围的扩展，使得“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呈现为“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的空间化转变——人类活动空间的社会性重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只是作为隐性逻辑存在的空间向度，在《大纲》中开始显现出来。笔者以为，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其

<sup>1</sup>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页。

<sup>2</sup> Davi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A]. in Gregory and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C]. London: Macmillan, 1985, p. 141-143.

<sup>3</sup>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实都与空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现实的个人”不仅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空间性的存在。这种区别于纯粹自然物理空间的空间性是“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生活空间”。马克思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人的存在问题，但是他们的缺陷在于悬置了人的具体生存发展条件，总是以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把人的存在命题诠释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虚构的观念，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sup>1</sup>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sup>2</sup>与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范围及条件。这种“空间”首先是自然空间的存在。但纯粹的物理空间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经过人类实践加以改造，形成“人化的自然空间”，才能成为人现实的生存空间。并且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越广，“人化空间”也就越大，同样，人类改造活动的程度越是深刻，所形成的“人化空间”也就越符合人的需要，空间的具体形式越是摆脱自在状态。以至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拒绝区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在他看来“（物理）自然空间正在消失”，<sup>3</sup>空间就是社会空间。

其次，“现实的个人”的空间性存在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它呈现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相对静止的“空间性社会结构”。马克思哲学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这样的个人并非抽象的无社会性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本身可以说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sup>4</sup>即社会与个人是同体的。因此，作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性也自然地会烙上社会关系的印迹。现代社会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并非先于那占居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建构”。<sup>5</sup>就是说，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体现着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

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了土地（空间）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社会属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只作为劳动者的“天然实验场”、为创造使用价值服务不同，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后，由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差异而形成级差地租，“土地”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里弥漫的是社会关系。再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集”场所的城市，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重要条件而存在的。马克思说：“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 页。

<sup>3</sup>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1, p.30-31.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8 页。

<sup>5</sup>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7 页。

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sup>1</sup>早在农业文明社会中城市空间就开始形成，但其建构主要基于政治因素考量，“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反映的是古典宗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要求。而现代工业文明下城市与乡村分离的空间构型，则是资本关系推动的结果，更多地反映了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需要。

再次，“现实的个人”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就是不断打破地域空间的局限，由“地域性存在”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空间化过程。《大纲》对三大社会形态几个时段的划分，即“对人的依赖性和自身的非独立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sup>2</sup>在实质上表明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会经历“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等阶段，而“空间”在此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sup>3</sup>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人的交往由孤立的地域空间走向全球空间的过程。在“人的依赖关系”状态下，人的空间被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人的交往范围受制于一定的“空间壁垒”，如部落、氏族和国家等。在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段，人的交往空间的范围有所扩大，逐步走向世界历史的时代，如马克思所言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联系的时代”。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必然导致“空间的异化”与个人异常的孤立。唯有到了第三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sup>4</sup>，才能扬弃物化空间，营造真正属人的社会生活空间。

##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的资本逻辑批判

对于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资本无疑是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了政治的、地域（空间）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对自然的崇拜。”<sup>1</sup>正是资本本性——“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sup>2</sup>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人的交往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层面，交往关系也因此高度地丰富化和社会化。

然而，资本的本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殖。这种本质的历史狭隘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下交往空间的扩展及其交往关系的丰富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受物的力量支配下的人的联系。这种“物役性”力量当然也包括空间。人们用双手生产出来空间，却往往被空间抛到场外，“现实的人”的发展呈现“单向地被社会空间决定”的状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空间对立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空间隔离与异化的意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等文本中，也批判了城市空间内部的异化、排斥及其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作为工人阶级营造出来的城市空间，那些位置优越、环境适宜、交通便利之地理往往是资产阶级居住空间，自身则被排斥在城市的中心之外。在实质上，资本逻辑最终建构了城市空间的区域和功能划分，创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居住空间。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要想破解空间的秘密，必须深入到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中。

《大纲》中，马克思基于空间视角对资本关系展开批判，最为直接的表述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个命题。在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时候，马克思指出，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流通时间表现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增殖空间，“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sup>3</sup>即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4</sup>并且，为了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必须不断生产“时间消灭空间”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正像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需要的一切劳动一样，交通运输工具是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哈维用“时空压缩”一词十分深刻地描述了当代空间的特征，他说：“我将经常提及‘时空压缩’的概念。……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sup>5</sup>事实上，空间障碍日益被消除，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空压缩”现象在马克思当年已经出现了，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村落，资本生产和流通便利，增殖的速度成倍增长，这是“时间消灭空间”最直接的后果。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sup>5</sup> 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0页。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二是，空间在资本生产中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弭，相反空间越来越重要，资本正是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马克思说：“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地中，或者扎根在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献。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地体的各种当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sup>1</sup>这里马克思表达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及其存续主要是来自“历时性”的积累。而现代资本则把不断突破空间壁垒、征服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内在积累危机的重要途径。确实，“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sup>2</sup>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三是，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成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塑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全球空间，它使得卷入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切元素，无论是土地/空间、矿产等自然物质资源还是劳动主体本身，都作为资本而存在。并且一旦这些领域被资本的同质性力量所吸纳，面临的就永无止境的破碎和重组。18世纪产业革命带来人口向城市的空间集聚，其背后正是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因此获得了大量人口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聚集。不仅如此，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3</sup>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4</sup>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都是同质的概念，都是资本打破地域界限在空间层面的拓展。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城市空间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物质景观的后果”。<sup>5[14]</sup>而“‘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sup>6</sup>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四是，资本在塑造同质化全球空间的同时，亦使整个空间充满了对立和矛盾，即不平衡地理发展构成了资本全球积累的前提、结果和重要机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更多地依靠城市对乡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而现代资本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3页。

<sup>2</sup>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sup>5</sup> 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sup>6</sup>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更多地借助于国家、区域、部门的不平衡发展来实现。这种不平衡性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出城市空间内部两级化的空间构型、一定区域内的城乡分裂（一部分人变成了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乡村动物）；又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生产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断裂性（“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間性体系。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sup>1</sup>尽管由于资本的流动特质，“中心—边缘”的结构体系常常处于变动之中：一旦资本从中心流出，中心很快就蜕变成边缘；一旦资本汇聚郊区，边缘瞬间就可以成为新的中心。但可以确定的是，欠发达国家在“中心—边缘”结构的边缘地位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并不会有所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伊曼纽尔（Argir Emmanuel）、阿明（Samir Amin）的“不平等交换”以及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弗兰克（Andre G. Frank）的“依附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 三、阶级斗争与解放政治的空间维度

《大纲》表明资本积累本身具有完整的时空意义。在实质上，作为“时间消灭空间”结果之同质化全球化空间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现象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资本的秘密在于它既有流动性，更需要一种自我固定化。固定性是资本总得附着于某一地域空间，而流动性却具有“去地域化”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构成了资本的深层悖论。正是在资本的空间性矛盾中，马克思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资本主义城市化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了空间的聚集，无产阶级恰恰在这种聚合的城市空间里意识到了共同利益，而现代交通体系则把地方性的阶级斗争汇聚成全国性的斗争。并且，生产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建立，逐步消灭着“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在确切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本身内蕴着空间/地理维度。

在当代语境下，空间与政治更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在空间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统治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并且更多地经由对日常生活、微观身体等领域的“殖民”施行着一种隐形的、非暴力的统治，“逃避批判视线，并不断地生产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sup>2</sup>列斐伏尔、哈维等左翼空间学者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弱者抵抗的武器。谁要想扩大自身力量，就必须夺取空间的控制权，即支配空间的优势开始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革命，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

<sup>2</sup>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6页。

左翼激进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资本空间批判精神的继承以及剖析现实空间问题上彰显出来的理论竞争力，“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发掘马克思资本批判思路中被长久压抑的空间视域，释放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空间批判与研究的潜能”，<sup>1</sup>这是我们讨论《大纲》空间思想的一个主旨。但同时，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对空间维度的过度诠释。如福柯认为，空间关系已经取代了时间关系成为把握人类现实的核心范畴；列斐伏尔试图用“空间生产”替换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声张一种空间辩证法，以及索亚的“第三空间”及其后现代地理学理论，都过分地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与总体性意义。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更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事实上，“空间生产”的凸显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意味着当代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表现形式的调整。以列斐伏尔为例，其“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梅洛庞蒂和尼采式的“身体化、生命化的生产”。这种身体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积累策略的身体，而是一种剩余能量与激情的表现。在列氏看来，只有剩余的能量才具有创造力，才能让生命从苟延残喘状态中挣脱出来，才能导致新空间的诞生。这无疑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和“空间”理论图式的越界式的阐释。

左翼空间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在今天发生了“空间的转向”。斗争主体由传统的劳资双方日益转向为被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压迫和边缘化的人群——“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等”。<sup>2</sup>斗争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围绕“城市空间”展开，即以争夺“城市权”和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权为焦点，而非以传统的工资和利润为中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而从“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列斐伏尔的“差异性日常生活空间”、德塞图（de Certeau）的“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以及哈维2010年的新著《反抗的城市》（the rebellion city）中提出的“空间正义”口号，都是试图从权力以及权力范围的空隙处，谋求一种新的解放政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空间革命表达的是对边缘立场的偏好，是一种基于新文化政治背景以激进姿态反抗霸权的边缘空间想象。左翼坚信，在边缘立场中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中心地位和永久的全局性地位，但事实上采用边缘空间作为斗争的落脚点，并不能实现解放政治的诉求，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仍然来自于物质生产环节，而不是发挥边缘作为一个地点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给予了空间自主性的结构力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产物。

就《大纲》而言，空间与历史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视角，但两者之中历史无疑是更为重要的维度。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Debra Satz）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

<sup>1</sup> 林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空间视域》，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sup>2</sup>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0页。

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sup>1</sup>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才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以至于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2</sup>《大纲》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来看，首先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来把握，强调它的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次才是把它作为空间性的存在，研究其中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历史辩证法强调一切事物都在流动，一切都是历史的结果，任何存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空间的认识也当如此。“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重新结构和转化。”<sup>3</sup>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等直观的唯物主义在社会空间生成的问题上缺乏历史敏感性，他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sup>4</sup>“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sup>5</sup>

马克思的历史性主要指涉的是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关系，他多次强调，构成其理论出发点的是特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物质生产，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谜都必须在对特定生产方式主导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寻找答案。“现实的人”的解放也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6</sup>“自由人的联合体”既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也代表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不再受物（包括空间）的奴役，而是重新驾驭了物的力量，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表现为各自独立，相互利用，而表现为相互联合，共同发展。这种要求从社会制度本身消除异化的社会现实的历史解放理论，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永恒正义论，也不同于现代哲学内在自由平等体验式的“无知之幕”，更不同于后现代解放政治非理性的“草根”情怀，它体现着马克思解放政治独特的理论图式。

在《大纲》创作 150 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建立在空间殖民化基础上。更加关键的是，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在地理上瓦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得“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sup>1[13](44)</sup>从而难以组织统一的工人运动。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在思考方式上进行彻底的转变——努力将空间作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植入到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建构一种能够包含对各种规模层面的剥削和压迫与反抗形式进行整体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大纲》

<sup>1</sup>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8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 页。

<sup>3</sup> 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0-111 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 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0 页。



只是初步展开了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概念框架,也难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地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及其规模政治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的关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境,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空间理论,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作者简介:

邮寄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志刚收

邮编: 212013

邮箱: jswzg79@163.com

手机: 13775358921

---

<sup>1</sup>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页。

# （你并不被）欢迎来到“特朗普纪”。

在一般智力的过去与未来之间

保罗·维诺拉

（厄瓜多尔瓜亚基尔文科大学）

苏振源 译

对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批判性分析,往往跟人类纪(Anthropocene)的生态-政治话语接合而铺陈开来。人类纪被设想作人类成为气候变化和地球系统转化过程之主要责任者的地质时期。在诸多例子里,提及本雅明·布莱登(Benjamin Bratton)、马迪欧·帕斯克内里(Matteo Pasquinelli)、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汤姆·科恩(Tom Cohen)和马肯兹·瓦尔克(Mackenzie Wark)便足够了。<sup>1</sup>就此而言,杰森·摩尔(Jason Moore)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资本纪(Capitalocene)的定义看起来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更为精准的谱系学,其他对人类纪的批判视角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sup>2</sup>

在这篇论文里,我将讨论斯蒂格勒的独特视角,他认为人类纪本质上可视为一切物种多样性熵毁灭的现象,这不能离开数字资本主义和政治-文化的问题来理解,这些问题是由系统的运算法则(algorithms)所导致的。产业以及数字化标准“似乎将当前的人类纪引向生命的毁灭,而代之以差异的繁衍增生——比如生物多样性、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心理多样性”<sup>3</sup>。正如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毁灭着生物多样性,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italism)的技术手段正在促进无产阶级化,这将通过知性的、感性的和认知的共同作用导致文化均质化,以及一切知识的均质化或者毁灭。

基于对21世纪资本主义这两个方面的思考,我的论文将试图阐明一些对于重新思考人类纪概念来说颇为实用的要素。我不仅把人类纪当作资本纪,更重要的是当作“特朗普纪”(Trumpocene)——这个术语是美国2016年大选后汤姆·科恩、斯蒂格勒和我都使用过的。

<sup>1</sup> 参见 B.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MIT press, 2016; N.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2017; M. Wark, *Molecular Red*, 2016; M. Pasquinelli, “The Automaton of the Anthropocene: On Carbonsilicon Machines and Cyberfossil Capital”,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6:2, April 2017, pp. 311-328; B. Stiegler, *Dans la disruption.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s*,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6; T. Cohen, “Makes Anthropos Great Again! Notes on the Trumpocene”, «Azimuth», n. 8, 2017 (“The Battlefield of the Anthropocene”, ed. by S. Baranzoni and P. Vignola).

<sup>2</sup> 参见 J.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D. Haraway,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Chthulucene*. Donna Haraway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tha Kenney, in *Art in the Anthropocene. Encounters Among Aesthetics, Politics, Environments and Epistemologies*, edited by H. Davis and E. Turpin, OpenHumanityPress, London 2015, p. 251.

<sup>3</sup> 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lated by D. Ross, Cambridge, Polity, 2016, p. 31.

<sup>1</sup> “特朗普纪”并不是一个地质时期，或者一个新世代，而恰恰是新世代的缺场：这也是斯蒂格勒描述当前情况的方式，他借鉴了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sup>2</sup>的设想。如同许煜<sup>3</sup>（Yuk Hui）所言，我们可以将这个新时代的缺场称为“虚拟世代”（digital epokhé），它是一种悬置，这种悬置将提供一个空间和距离，我们透过它以估量持续进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的转型，从而激发出有关如何构建我们诸种制度、主体性、认识论和生命形式的新观念。

## 在系统算法内外迈向斗争

特朗普纪的概念明确地将平台资本主义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考虑在内——包括特朗普的推特，以及假新闻、大数据经济、社交网络和他们模仿性的意识形态。对特朗普纪的思考力图将所有的这些置于一个非批判而是症候（symptomatological）的话语（dialogue）中，并结合由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ti）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实施，关于系统算法、固定资本、一般智力和活劳动间关系的最新成果予以分析。将这些分析症候化意味着在这四角关系里找出使国家健康或生病、使主体（the subject）或主体性（subjectivities）姿态得以可能的诸条件，即如托尼·奈格里主张的，寻找“既适合当下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也适合未来（to come）共产主义期冀的伦理和/或政治主体”<sup>4</sup>。

我们把如下的观念当作这个话语的起点：倘若马克思在《大纲》（Grundrisse）提及的一般智力已然成为财富真正的生产力和生成力<sup>5</sup>，那么我们可以说系统算法就是“固定资本”，也就是由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资料；人们把一定的社会知识编码加密，使得这些知识被转化为价值并积累起来。如同安德里·弗马加利已经指出的，作为固定资本的系统算法，是一般智力的表现方式（phenomenological expression），是对活劳动本身形式以及真实的吸纳，同时它们还构成了生产过程积累和增殖的基础。<sup>6</sup>在此，基于对这种现象必然伴随着症候的预设，我将仅仅对这些定义的第一点予以证明，也就是说通过对一般智力的健康状态的诊断。

工人主义主要的的设想就是，在数字化劳动中，活劳动主要是脑力的，它同时既是固定资本也是可变资本：“在认知工作中，活劳动，除了那些固定资本的部分，当其生产能力发展起来后，能够被用以投资，由是（如同固定资本那样）既构成实体也构成活动的引擎。”<sup>7</sup>

<sup>1</sup> 参见 the three contributions published in «Azimuth», n. 8, 2017.

<sup>2</sup> 参见 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I. The Future of Work*.

<sup>3</sup> 参见 Y. Hui, “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the Neoeactionaries”, «e-flux», 81, April 2017.

<sup>4</sup> 参见 A. Negri, “Appropriazione di capitale fisso: una metafora?”, <http://www.euronomade.info/?p=8936> (March, 3, 2017).

<sup>5</sup> 参见 K. Marx, *Grundrisse*, pp. 690-712.

<sup>6</sup> 参见 A. Fumagalli, “Platform Capitalism: oltre la dicotomia uomo-macchina”:  
<http://effimera.org/platform-capitalism-oltre-la-dicotomia-uomo-macchina-andrea-fumagalli/>

<sup>7</sup> 参见 A. Negri, “Appropriazione di capitale fisso: una metafora?”, <http://www.euronomade.info/?p=8936> (3 marzo 2017).

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活劳动和固定资本能够同声共气。马克思对此早有预见，如同托尼·奈格里宣称：“一方面，人类活动以及其以往智力被积累起来，结晶为固定资本；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可以逆水行舟，将资本吸收进他们自身和社会生活里。固定资本在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是‘人本身’。”<sup>1</sup>政治行动或会因此通过活劳动的自我决定和自治过程存在于积极地对固定资本的再分配中里。较之工人身外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在数字劳动时代应着力对那些被机器所吸收的东西——根据奈格里对机器的定义，就是智力和知识——进行再分配。

这些明晰的表述无疑代表了将马克思主义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诊断理论化的坚实基础。然而，此处尤待解决的是，在这个新的、特定的资本主义阶段，实现自治之可能性所需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斯蒂格勒将此阶段描述成完全计算机化（computational）的时代，这种**总体性**（totality）牵涉到类似于柔性极权主义（soft totalitarianism）的东西。用斯蒂格勒的话说来，我们正见证着“以一种柔性极权主义构成的、通过产业化和数字化剥削潜藏在其底下的种种情感冲动（impulses）和仿古主义（mimetic archaisms）的、建立在永恒而虚无缥缈的总体化之上的智慧型资本主义”的诞生。

要充分理解此表述，需要对彼得·梯也尔（Peter Thiel）那种基拉尔（Girardian）式的模仿意识形态做些细致的解读：在大量的模仿实验中，其数字化的实现就是脸书；以及基拉尔的替罪羊逻辑——通过这一逻辑，所谓的保守主义势力正在国内外建立他们自己虚无主义的权力欲望。模仿和替罪羊逻辑确实是今天民粹主义抬头的两个基本要素，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他或会被梯也尔认为是后保守主义大师<sup>2</sup>——的发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时间在这些问题上作过多探讨，再者比如最近丹·罗斯（Dan Ross）也作了类似分析，因此本文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可被视为这种柔性极权主义的症候，它标识出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一种新型原始积累，其目标是一般智力再分配，由此实现知识和政治的整体结构重置。对其特征的把握，我们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 一般智力的无产阶级化

我们可以把数字资本主义的平台理解为一般智力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承担者。一般智力即是处在循环中的知识的全部，它们既滋养、引入也同时使用（以及隶属于）固定资本，即“机器”。为了理解平台资本主义体系的策略性筹码，首先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思考。它指的是我所称的作为原初掠夺的圈地运动（捕捉公共的农业用地以备私人用途），它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史前时期，为其出现创造条件。<sup>3</sup>接下来我们该考虑一系列原始积累，每种都带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对象；我们也该考虑这些积累的内在关联性

---

<sup>1</sup> 同上。

<sup>2</sup> 参见 D. Ross, “Protentional Finitude and Infinitude in the Anthropocene”, «Azimuth», 8, 2017.

<sup>3</sup> 参见 K. Marx, *The Capital*, 1867, chap. 26-33.

(simultaneity)<sup>1</sup>：比如说，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已经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原始积累随着金融危机加剧而发生，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人道主义行动”(humanitarian operations)、自然灾害(休克经济, Shock Economy)和数据经济(Data Economy)所共同导致的。

但是这种新原始积累如何运作？这种原始积累首先既非关于自然资源，也不特别针对金融资本，而是虚拟数据。根据此处提出的前提，这种积累运作在创造金融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条件中，尤其存在于一个巨大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数据库中。从神经科学到医药和合成生物学的纳米机器人，这些条件和数据库是为神经产业(neuro-industry)市场以及斯蒂格勒认为的内造-人工躯体化(endo-artificial somatization)而设，它穿越了新的外在化

(exosomatisation) 门槛——把技术人工制品植入身体和脑中。<sup>2</sup>最终，所有的这些技术人工制品都为第三期的积淀(tertiary retentions)组成或弥漫在其中。所谓第三期积淀，即是对知识加以塑形的不在场轨迹，这些知识流淌在我们记忆、语言、学科、行为和已被凝固和空间化的时间中，并通过成千上万的人而外化。在我描绘的或可称为“再度内造躯体化”(second endosomatisation)的过程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外在和外部性以产业化的方式对内在性编程。换言之，固定资本，即马克思那里说的“死物”最终以从其内部控制的方式调整活人的特定状况。

潜在的问题涉及外在化过程里的步骤，它改变着内造躯体化的特性，它是具有深度且多种多样的，我们决不能否认这种现象基本的政治隐喻。并不能确定这种原初积累的新形式既能用于宏观政治或微观政治，也能用于纳米政治(nanopolitics)——一种赛博政治

(cyberpolitics)，我们的身体即是其承担者：这样一种可能性或会明显改变另两种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缘故，人们可能会想断言，平台资本主义把我们钉在一个由我们的知识和痕迹组成的现在-过去(我们在播撒中丢失了它，因它掉进网眼里)和被肉体重构之轨迹设定的现在-未来(present-future)之间。我们面临两种倾向间的张力，我们正在或者试图在数字化的悬设中生活，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看起来是对此悬设的关键描述符。

根据安东妮特·卢富华(Antoinette Rouvroy)的看法，算法治理术包括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其目标在于去预测、调节和筛选个体的行动及欲望，以确保具体行为的发生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相对于市场规律来说不合理的表现。所有的这些，被预设能够通过由于用户增多而得以在数字网络中大量产生的公众数据和元数据的归档、组建和监控来实现。换言之，算法治理术的主要目标是预测以及提前框定个体的未来，也就是它“剥夺了人类基本的潜能，这是他们成为个体和集合主体(collective subjects)的能力”<sup>3</sup>。这让我们想起德勒兹(Deleuze)

<sup>1</sup> 参见 S. Mezzadra, *The Topicality of Prehistory. A New Reading of Marx's Analysis of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3 (2011).

<sup>2</sup> 参见 B. Stiegler, *Dans la disruption*, cit., § 47.

<sup>3</sup> Antoinette Rouvroy, "The end(s) of critique: data-behaviourism vs. due-process,"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 Ekatarin De Vries (eds.), *Privacy, 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 Philosophers of Law Meet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61.

“碎片化”（dividual）<sup>1</sup>的概念，它描绘出因数据化捕捉（digital capture）以及通过社团控制方式对社会和情感生活编码所带来的后果：个体变成仅仅可被索引的实体（indexable entities），或者成为有利于资本新一轮原始积累的、人格层面以下的（infra-personal）数据集合。

在《自动化社会 第一卷》里，斯蒂格勒直接谈到算法治理术，他尝试着把个体描述为技术过程的结果，此过程与他所称的“超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的方向相反，后者是指社会意义和知识的建构，这些意义和知识总是通过被技术互动所调节的集合过程而产生的。<sup>2</sup>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斯蒂格勒的超个体化就是一般智力得以构成的过程，也正是基于此缘故，今天一般智力的症候学是通向奈格里当前唯物主义本体论和未来共产主义神学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骤。

当个体受到由平台资本主义催生的“关系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relationships）的影响时，斯蒂格勒主张这些个体变得原子化、碎片化了，以致于超个体化被体系性地中止。随后带来的是“超碎片化”（trans-dividuation），一种由于语言、实践和自治（它导致个体间的去整合化和对个体以及集合性个体化原子式的调制）的技术性短路所造成的意义丧失。<sup>3</sup>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说的无产阶级化，它如是地由数字技术所引发；法国哲学家把它同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定义为 24/7<sup>4</sup>的资本主义联系到一块：24/7 说的是每天工作 24 小时，一周工作 7 天，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无时无刻不在剥削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资源。在此意义上，通过摧毁集合性个体化，算法治理术将个体和一般智力抛入各种各类经济、金融和政治的囚牢。这是通过那些紧紧掌控在平台资本主义寡头的装置实现的，在引入纳米政治之前，这些寡头正操纵着全世界范围的宏观和微观政治。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意义上一般智力和社会知识的算法调制允许把各个知识领域内部各种的社会机制（学校、大学、实验室等等）和各种形式的认知工作<sup>5</sup>退化为原子化的讯息，退化为数据和元数据，它们被用以重新组合，不仅出于金融和投机的目的，也用于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新维度和新型政治，这取决于捕捉生命的新型机器序列。欢迎来到特朗普纪，在此间一般智力发现它自己已彻底被无产阶级化。

## 加塔里的回到未来

事实上，在特朗普纪里似乎没有人受欢迎，意思是它表达了一种环境和建制、民族和国家、媒介和心灵，意识和无意识的普遍不满。更一般地说来，特朗普纪表达出加塔里（Guattari）

---

<sup>1</sup> 参见 G.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Trans. by Martin Joughin. October 59 (Winter 1992): 3-7.

<sup>2</sup> 参见 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1.*, cit.

<sup>3</sup> 同上，第 130 页。

<sup>4</sup> Crary,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New York, Verso, 2013.

<sup>5</sup> 参见 C. Anderson,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23 June 2008) and Stiegler’s comment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utomatic Society 1.*

三种生态学的不满。至少，这就是加塔里本人在其同名的书中预测的。他在书中描绘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图景，并预测人类纪-资本纪和寡头财团（corporative oligarchic）都会向平台资本主义过渡：

在社会生态学的领域里，像唐纳德·特朗普这般的人被允许不受限制地货殖，像某种水藻，接管了整个纽约和大西洋城；他通过提高地租来“再发展”（redevelops），由此带来成千上万家庭的贫穷，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无家可归，相当于环境生态学里的死鱼。更进一步的货殖在对第三世界野蛮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中是显而易见的，这同时影响了他们的文化语境、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的免疫系统、气候等等。<sup>1</sup>

在加塔里的意义上，今天发生的在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和文化领域跟特朗普有关的一切，正是这样一种生态学：心理、社会和环境生态学。事实上，加塔里通过年轻特朗普的形象诊治出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症候，揭示出今天特朗普管理体制背后的结构性危机。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不能脱离过去三十年自由民主制的历史来衡量其价值：相反，它是它们最好的生态学产物，是资本纪策略性的里程碑；在今天，它由否认气候变化主义（climate change denialism）的大杂烩、后真相（post-truth）政治制度的抬头，自由保护主义（libertarian protectionism），以及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对种族边界的压抑性政策。正是在此意义上，以及从地理-生物-心理的角度把特朗普总统的宣言考虑在内，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生气盎然的时代，或者正对应斯蒂格勒所称的“负熵纪”（Entropocene）的成熟阶段，也确实有人忍不住把它称为特朗普纪。另一方面，特朗普那些欧洲的民粹先驱和模仿者只是确信这种资本纪新阶段表演性的、模仿性的、自动化的和因此“虚有其表”（performatic）的特征。正是在特朗普纪，在气候变化否定主义、后真相主流话语、边界的规范性肯定和由平台资本主义寡头组织的力比多的捕捉之间，活劳动的自治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期冀遇见他们最大的困难：如何登场并且跨域系统算法的边界？

特朗普纪标识出我们时代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转用海德格尔的用语，一般智力把自身显现为在自身中离开其自身的东西（presents itself as what, in itself, leaves itself），因此它需要持续不断的关照，持续不断的症候化。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一般智力需要在这个时代的空场际解决的问题至少是双重的：一方面存在于人口个体化或主体化的算法治理效应上，另一方面是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正是在这些积累中一般智力面临最巨大的风险，即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令其自身存在条件消亡的风险，以及/或者进入到系统算法自行主宰政治的纳米政治维度的风险。

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分配毫无疑问是必要且紧急的，以避免它对人类活动的直接驱动。一旦固定资本被强行植入我们的器官，人类活动将不再当得起政治的名义。这或是马克思“死物抓住活人”（The dead seize the living）最终形态，一种潜在的形态，我

---

<sup>1</sup> F.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London, Continuum, p. 29. For a first comment of this quote, related to the Anthropocene, see A. Saldanha, H. Stark, *A New Earth: Deleuze and Guattari in the Anthropocene*, «Deleuze Studies», Vol. 10, 4, pp. 427-439.

们要趁着尚有能力的时候，提前采取抗争措施。



# 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

吴晓明<sup>1</sup>

—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激荡变化，人们开始不无忧虑地谈论起“民粹主义”的话题。虽说这个术语或许并不准确，但似乎总是意指某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指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之失范所形成的乱象。不唯如此，最近在欧洲又出现了“后真相时代”之来临的惊叹。所谓“后真相”，无论其具体的所指所用如何曲折隐晦，却总意味着真相、真理的消退隐遁，意味着坚实的客观性已然坍塌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虽说我们对这类现象尚未做过全面而专门的研究，但从哲学上来说，它们却决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只有对现代性完全非批判的观点才会对此感到莫名惊诧，仿佛那是来自外太空的邪恶入侵了尽善尽美的现代世界。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所谓的“民粹主义”还是所谓的“后真相”，都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无限制的主观性即“坏的主观性”——它潜在地包含在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形而上学中——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指证纳粹主义乃是启蒙的辩证后果和理性主义的极致一样。

“坏的主观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术语，用以表示主观性的无限制扩张，用以表示主观主义的极致，用以表示主观性通过“坏的无限性”来拒斥实体性的内容，并以此来取代或冒充客观性。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性植根于真正的普遍者；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者既不是主观性的无限集合，也不是它的平均数。举个浅近的例子来说，可以有一千种甚或一万种主观意见，但这些主观意见的集合或平均数并不就是真理；即便我们将这样的主观意见置放到“坏的无限性”之持续不断的扩张之中，在那里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决不是真理。因此，在理论上试图通过单纯主观性的集合来建立普遍者或客观性的意图从一开始便陷入到幻觉之中——这是一种特别属于现代并因而在现代世界中有其根源的幻觉。社会契约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卢梭的贡献在于提出意志作为国家的原则，然而他所谈论的意志，不过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的意志（费希特亦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一来，许多单个人之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但契约并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sup>2</sup>。换言之，社会契约论只是以一种主观性的集合来冒充普遍者罢了。关于这种理论的情形，马克思说得更加明白深透：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

<sup>1</sup>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sup>2</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5页。

点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猎人和渔夫），乃是 18 世纪关于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而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乃是以同样的虚构为前提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 16 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 18 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sup>1</sup>

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首先在西方文明的轴心期奠基中见其端倪：苏格拉底正是由于将这一点道说出来，由于这种被道说出来的主观自由与希腊的伦理传统相冲突而被判处死刑的；而柏拉图则是由于见诸这种主观性的巨大威胁，“为谋对抗计”，亦即为维护国家的实体性本质而写下了他的《理想国》。主观自由的一个更为持续和深远的教化过程通过基督教的发展而得以缓慢地实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那解除了一切血缘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种种关系方始成立的“原子式个人”，是通过长期的基督教教化而为其做好准备，并在现代世界中以特定的方式而被巩固地建立起来。“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 1500 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是昨天的事。”<sup>2</sup>如果说，我们终于看到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世界中的繁花盛开（其最突出的标志便是作为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哲学），那么，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只是在现代世界中才得到其最充分和最彻底的发展，并在特定的阶段上趋于极致——“民粹主义”和“后真相”等等不过是其极致上的诸表现罢了；另一方面，这种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且尤其可以在观念形态上被简要地看作是一千五百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现代世界把握为“基督教的世俗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的“人的主权”，在政治民主制中乃成为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sup>3</sup>；政治民主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sup>1</sup>。

## 二

主观性或主观自由在现代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开辟出崭新的历史纪元，而且创造出无比丰硕的文明成果，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世界的一切伟大的奇迹、业绩和收获，都是与之本质相关的。贯穿于现代文明之始终的主观性原则，并非从一开始就纯全立足于“坏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sup>2</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70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9 页。

的主观性”之上。虽说古典哲学时代的某些理论构造似乎以“坏的主观性”为前提，但就哲学思想的总体而言，就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生活的总体而言，主观性或主观自由的发展尚未无限地激进化，它依然使自身保持在与真理、现实、实体性和普遍者的张力和统一之中，依然或多或少地守护着哲学上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莱布尼茨乃是第一个试图调解传统形而上学与近代科学的思想家：他一方面以其全部天才将新的科学思想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又认为古代经院哲学关于实体形式的教义乃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试图将科学和哲学、主观性和实体性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把握的巨大努力一直持续到黑格尔。就此而言，“19世纪天真的特性就在于，它把对知识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文明的信仰建筑在社会确认的道德程序这个稳固基础之上。……然而在今天，这种对社会现实恒定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sup>2</sup>。正是在这样的稳固基础和恒定性意识隐退消逝的地方，社会生活以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观念等等才在总体上从属于“坏的主观性”。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将“坏的主观性”看作是一个价值判断，它只是指主观性被置放到“坏的无限性”（即可以不断向外扩张并因而是永远达不到的无限性）之中，并且用这种抽象的和形式的主观性及其集合来代替和冒充真正的客观性。只是在现代世界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时，“坏的主观性”才成为笼罩和支配一切的现实力量，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处可以见到其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而所谓“民粹主义”或者“后真相”等等亦不过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的极致后果罢了。

标志“坏的主观性”在总体上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把一战定义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因为正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一种真正划时代的意识。这种意识是表示：在以往，“……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sup>3</sup>。换言之，这种划时代的意识是表示：那个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获得信念支撑的整个观念体系，特别是其实体性的内容——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永久和平的理性设计、经济和科技之合乎理性的无限制发展，以及在一切领域中的“公理战胜”——第一次全面地、不可挽回地陷于瓦解状态中了。与这种瓦解状态相适应，标志“坏的主观性”之全面扩张的哲学格言通过尼采之口被道说出来——“上帝死了”。这位先前曾默默无闻、甚至被看成疯子的哲学畸人，在大战之后很快被当作先知而受到推崇，事实上乃是其哲学之意义被重新发现了。正如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上帝死了”并不只是某个无神论者的意见，它在尼采那里意味着：“超感性世界”——在包括现代形而上学在内的二千多年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作为真理、理念、本质出现的整个实体性领域——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尼采的思想是以虚无主义（Nihilismus）为标志的，而“‘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sup>2</sup>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sup>3</sup>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句中：‘上帝死了!’”<sup>1</sup>

随着超感性世界的崩坍垮台，随着超感性世界中一切实体性本质的消遁隐匿，随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虽则不同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对此会有不同取向的回应，但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以及一般的知识领域，似乎只剩下单纯的主观性在活动 and 起作用了。正是这种时代境况推动了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从而使“坏的主观性”在历史的现实中也观念的形态中占据主导的和支配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对所谓“后真相”或“民粹主义”等现象的研判和讨论，就其哲学上的深入而言，不能不使之在根源上归结于“坏的主观性”，并且不能不首先将其作为“欧洲虚无主义之降临”的一部分来把握，尽管此种现象之波澜所及和萌动发越决不仅限于欧洲或西方。

### 三

关于“后真相”的议题，看来是与公共舆论的境况所发生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而这种转折又特别是与媒体手段的变革（即“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相表里的。在这样的转折过程中，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取向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并且在怎样的程度上使我们处于所谓“后真相”的境域中？如果我们就此来回顾一下黑格尔关于公共舆论的讨论，将会是很有裨益的。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以实体性的理念为根据，而且在于人的主观自由这一原则获得了重要性和意义，因此，公共舆论尤其在现代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然而，公共舆论乃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共舆论一方面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等，并且正是这种实体性的东西构成公共舆论之内在的东西；但“在这个内在的真理进入意识并表现为一般命题而达到观念的同时，……一切偶然性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再现了”<sup>2</sup>。因此，公共舆论的实存乃是经常存在的自相矛盾；在其中，实体性的真理和无穷的主观错误是直接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由此很容易理解到的一点是：当实体性的东西在公共舆论中瓦解交替之际，这个领域也就为“坏的主观性”所占据，以至于到最后完全成为各种主观意见的集合，成为它们彼此之间冲突驰骋的战场。用“后真相”一词来标志此种状况可以是合适的，因为所谓真理、真相总是同普遍者、同实体性的东西内在关联的。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坏的主观性”的批判乃是完全正确的，其哲学的偏谬则是在另一方面。关于这一点，洛维特说得对：马克思之所以捍卫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而马克思之所以反对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把普遍者或实体性的东西神秘化了<sup>3</sup>。因此，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观察到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种种表现，那并不是因为神秘的绝对理性在自我活动的行

<sup>1</sup>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66-767 页。

<sup>2</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332 页。

<sup>3</sup>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27 页。

程中通过“坏的主观性”来达到其实体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市民社会”的现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哲学上表现为主观性的无限制发展，并在其特定阶段上抵达或可称之为“后真相”的极致。

所谓“民粹主义”的问题境况大体也是如此。在关于政治制度的哲学讨论中，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一般来说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原则的，但这应当被理解为“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应当被理解为作为实体的善“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sup>1</sup>。在黑格尔之前，无论是在现代的政治哲学还是在现代的政治实践中，实体性与主观自由的调和在历史的客观态势上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建立在“坏的主观性”之上的理论构造，也从来不缺乏使之与实体性相勾连的各种资源。我们知道，虽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免于“坏的主观性”之幻觉的批评，但他还是区分了所谓“众意”（诸主观性的集合或平均数）和“公意”（具有实体性内容的普遍性）。毫无疑问，黑格尔非常正确地意识到：“坏的主观性”乃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并因而是使自身趋于瓦解的东西；但黑格尔力图使之与实体性相调和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一方面由于其哲学的思辨性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历史的实际进程。正是马克思彻底纠正了黑格尔：“坏的主观性”的观点即“原子论”的观点并不是什么“令人诧异的东西”，也不是可以用思辨理性的观点就可以改变的东西；如果说某种观点是原子论的（即立足于“坏的主观性”之上的），那只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原子论的，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的<sup>2</sup>。因此，事情的本质乃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及其客观的历史趋势，而这种趋势不能不表现为“坏的主观性”达于极致并使自身进入到终结阶段。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现代选举和选举改革（作为趋势）时指出：选举是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直接的和实际存在的关系。“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因此，选举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这个国家解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sup>3</sup>没有什么比这一论断更简要地揭示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势及其历史限度了。那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种种现象，如果不是“坏的主观性”即“原子化”之抽象的完成，又会是什么呢？

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所谓“后真相”和“民粹主义”等现象，显然还需要做许多专门的研究，才能对之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然而从哲学批判的视野来看，它们乃是现代性发展在特定阶段——终结阶段——上的产物，其本质方面应当被把握为“坏的主观性”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sup>1</sup>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65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0 页。

# 《资本论》哲学的方法问题

## ——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实在主体”

吴晓明

(一) 时下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虽说成果不少，但却似乎并未真正形成对我们学术整体来说的积极动力。就像黑格尔去世以后虽说出现了许多研究者，但他们却在那个庞大的体系面前束手无策——他们在学院式的烦琐研究中几乎完全迷失了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决定性批判，才真正开辟出一条深入于社会-历史现实的道路，才为批判地理解和把握我们面前的世界注入了持久而强大的积极动力。

(二) 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整体来说，强调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意义是完全正确的。就此而言，卢卡奇的极端说法是有启发意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的方法即辩证法（它特别地与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有关）却并未从根基上得到真正的阐明。就像普列汉诺夫只是能一般地在形式上谈论辩证法一样，卢卡奇虽说颇为深入地提示了辩证法的诸多要义，但却主要是从主观方面即自我意识的方面来对之加以发挥的。

(三) 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形是，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方法，即科学方法论主义的方法。殊不知辩证法只能意味着实体的自我运动，因而只能是实体性内容展开自身的形式；任何一种试图排除内容而在形式上得到阐述的“辩证法”都毋宁说是反辩证法的。海德格尔说得对：“黑格尔也把‘思辨辩证法’径直称为‘方法’。用‘方法’这个名称，他既不是指一个表象工具，也不仅仅是指哲学探讨的一个特殊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这一点无论对黑格尔来说还是对马克思来说都是确凿无疑的。

(四) 因此，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到处见到生动丰沛的实体性内容之展现——这种内容无非就是实体的自我运动，而这种自我运动也就是辩证法。问题在于，对黑格尔来说，这样的实体性内容乃是把握在思想中的理念，而真正的、唯一的实体乃是绝对者——上帝。例如，历史哲学最终完成的乃是“神正论”。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所以马克思在1873

年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学生的同时，声称其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这一声音看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当流俗的观点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般地从黑格尔那里“翻转”过来并驱走其绝对实体时，却使之滞留于单纯形式的规律或空疏的范畴变换中了。

**（五）**既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单纯形式的（重申一下：单纯形式的方法乃是反辩证法的），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也必然是“实体”的自我运动，是实体性内容本身的展开过程。虽说马克思坚决拒斥黑格尔的绝对者即思辨的实体，但这决不意味着辩证法可以作为形式的规律而被加诸于任何内容之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辩证法也就成为抽象的“外部反思”了。这只能意味着主观意识之观点的恢复，亦即将抽象的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内容；换言之，只能意味着辩证法的实际终止，意味着黑格尔所谓“诡辩论的现代形式”。

**（六）**《资本论》哲学的辩证法显而易见地强调了马克思的“实体”观点，亦即全部实体性内容之自我展开的那个基石或枢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将之称为“实在主体”，并且恰恰以之从根本上取代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思辨实体。这个“实在主体”或“主体”也就是社会，在指证黑格尔陷入的幻觉即是把实在理解为思维之自我运动的结果之后，马克思说：“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七）**这里所谓的社会，作为“实在主体”，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首先——亦即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意味着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意味着某个特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的自我展开过程；而绝不意味着把某种形式的规则强加到这种内容之上。很明显，在这里出现的不是逻辑学的“外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应用的逻辑学”——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便是“应用的逻辑学”，而这种情形是与黑格尔将作为主体的实体神秘化一事本质相关的。

**（八）**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的是：“实在主体”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立足于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这一立足点既不把特定的社会当作单纯的质料，也决不把形式的规律或范畴先验地强加到作为质料的特定社会上去。再重申一遍：辩证法唯立足于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至于这里的辩证法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唯取决于这个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如何展开。“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时才开始存在的”。

（九）很显然，被称作“实在主体”的乃是“一定社会”，即“既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究的实在主体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然，根据研究对象的主题变换，这样的“实在主体”也可以是凯撒时代的罗马社会，可以是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社会，还可以是1840年代的中国社会。马克思的辩证法立足于这种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并且正因为如此才使之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由于实在主体具有特定的实体性内容，所以它必然与其他的实在主体有差别；既然这样的差别不可能来自黑格尔绝对实体的“自我差别”（差别的内在发生），那么，在理论方法上使主体（即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就意味着必须“实证地”研究这个实在主体本身，以便从其实体性内容中去把握那些实际存在着的差别。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只是在着手研究特定对象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十）在这里，既提示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现实”概念的接近，又标志着两者的分离。现实是“本质与实有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这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是一致的。但在黑格尔那里通过理念和绝对者的自我活动来获得最终论证的现实性，在马克思那里则要求通过对“实在主体”即特定社会之自我运动的研究去获得，而辩证法不过是这一自我运动过程的展开以及对之进行理论的描述（叙述）而已。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首先意味着“实在主体”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意味着作为现实的“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意味着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把握这一辩证过程并将之辩证地叙述出来。

（十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科学任务却被长久地耽搁下来，因而未能对我们的整体学术形成强大的积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雷隆·阿隆对20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指出，萨特和阿尔图塞的理论只是提出了中学生的问題——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他们未曾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当时的欧洲社会，尤其未曾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过当时的法国社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当代哲学”的批评是正确的：现今的哲学只是跟在



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睬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

**(十二)** 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契先生的下述说法乃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理应包括《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不去研究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同他们照面的“实在主体”——即特定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转型，就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无论它是否采用“变化的观点”和“流动的概念”。因为在这里出现的，根本不是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而只是抽象原则——无论这样的原则是否承认发展变化——之外部反思的运用，也就是说，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去先验地强制任何一种实体性的内容。这只能意味着“实在主体”的取消，意味着“自我活动”的终止，意味着真实的内容被阉割而不再是实体性的，因而只能意味着辩证法的反面。

**(十三)** 只有当马克思的“现实”概念被真正确立之际，只有当“实在主体”的观点在辩证方法中的优先地位被牢牢地把握之际，对于辩证法的思辨理解（神秘的理解）和单纯形式的理解（反辩证法的理解）才会烟消云散。从而，《资本论》的方法才会对我们的学术整体产生出强大而恒久的积极动力，才会真正瓦解和洞穿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壁垒（这种主观主义在现代性的知识理想即知性科学中有其强大根基，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则以其毕生的辩证法研究与之进行斗争），才会使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能够取得作为其立身之本的思想利器。

**(十四)** 一个非常简单的初步尝试：关于中国社会及其变迁之性质的一般判断

对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来说，黑格尔所谓“伦理的观点”（即社会现实的观点）所提示的不过是一个出发点，一种哲学理论上的准备。而当我们试图通过现代中国社会之变迁去真正把握我们民族及其时代境况的总体特征时，困难才刚刚开始出现。毫无疑问，为了能够切近地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之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乃是绝对必要的，但哲学上的澄清和指引不仅同样必要，而且应被视作当务之急。因为任何一种实证研究都不可能摆脱作为其前提的哲学立场，也不可能缺失作为其理解筹划的主导取向——只是这些先行的预设常常滞留在晦暗中罢了。因此，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伦理的观点”带入研究的视野中，通过这种社会现实的观点来揭示以民族和时代特征为本质根据的边界条件，并通过决定性的边界条件来把握中国社会之变迁的基础定向。

大多数学者不仅观察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特点（作为比较性的差别），而且也意识到

这样的特点往往作为传统而将其影响一直贯注到当今中国社会。例如，按照谢和耐的说法：“中国的基本传统（政治、宗教、美学和法学的）都与印度社会、伊斯兰世界、西方基督教社会完全不同。……中国根本不懂先验论的真谛、利己思想和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观念”。“至于她今天显示出的面貌，则确实是其悠久历史的产物和结果”。那么，根据“伦理的观点”即社会现实的观点，应当如何来把握中国社会之总体的和基本的性质呢？如果说黑格尔把抽象法和主观法的本质性归结到伦理世界（亦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领域），而马克思又将政治国家的本质性置于市民社会之内部冲突的基础之上，那么，将中国社会——即便是当今中国社会——作为“市民社会”来理解，这样的看法将会是正确的吗？不，它一点都不正确。因为这样的看法只是佯言皈依了“伦理的观点”，但却无批判地把对伦理世界的某种划分作为机械的公式来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它完全不顾及特定社会依其实体性内容而来的具体化，结果只是把自己的任意和武断强加给中国社会。除非我们充分把握了“市民社会”的性质、来历和基本特征。否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藉此思想成果来分析中国社会，来揭示中国社会之当代变迁的基础定向。

作为简要的先行提示，中国社会之最根本的总体特征，毋宁说正是在同“市民社会”的比照中得以显示的。并且或多或少依循这样的比照，中国社会时常被称为“宗教社会”、“伦理社会”或“熟人社会”等等。姑且不论这些名目底下的内容如何，它们总以某种方式力图使中国社会在性质上同市民社会分别开来。按我的意见，“伦理社会”应该是一个指称中国社会较为可取的命名，因为“伦理”一词，总意味着实体性内容的持存，意味着主观性形式的不尽发越，意味着风尚、风俗、习惯、家礼等等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本质重要性。至于市民社会，虽说居于伦理的领域中，但它恰恰是作为伦理世界的“反题”出现的，因而总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表示着所谓“伦理因素”的实际解体。这样一些说法目前还难免抽象，所以理应得到有内容的证明。

市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首先是个人——原子式个人——的产生，从而导致家庭的原则即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陷于瓦解。个人不是自然的结果，

而是历史的产物，换言之，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就像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黑格尔曾以一句阿拉伯短语（“一个古莱西人的儿子”）来表明：特定的人并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原子个人的产生，是在实体性的共同体关系——血缘的、半血缘的，宗法的、半宗法的，伦理的、半伦理的——之原则全然解体的基地上方才成为可能的。这样的基地，唯独出现在基督教世界中，因此原子个人的生成也可以较为切近地被看作是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就像黑格尔把原子个人（其原则是抽象人格和抽象主观性）看成是基督教-罗马世界的产物一样，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

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这一说法清楚地表明，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原子个人的存在，是原子个人组成的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决定性分离，而这又是通过或伴随着基督教的统治实现的。

只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市民社会方始作为反题处在伦理领域的中心。所以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概念表述为：（1）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2）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3）市民社会的原理是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约言之，“市民社会的定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很明显，这样的战争是以原子个人为前提的战争，因而是 在一切伦理性的亦即实体性关系的瓦解之际发生的。只是在这样的基本态势下，伦理世界的构成方能被表述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把这样的公式现成地移用到中国社会的分析中来，乃是一种完全无头脑的外部反思。当中国的伦理社会根本未曾彻底解体而产生出原子个人时，便开始煞有介事地谈论“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等等。无异于指鹿为马。作为比照，分析中国社会之变迁的伦理世界或许可以被表述为：家庭——伦理社会——国家。这个提示意味着家庭伦理的直接实体性强有力地遏制着原子个人的产生，意味着这种实体性有效地渗透并贯穿于伦理性质的社会之中，而且还意味着这一社会与国家未曾分离，并保有特殊的实体性联系。事实上，如此这般的情景是不难被我们观察到的。只要不带偏见，只要能稍稍穿透表象并识破表面所指的东西，只要能将某些只是辞令上和观念上的东西同人们血液中和骨髓中的东西区分开来，便很容易识别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的伦理性质。那种仅仅知道把市民社会及其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中国社会分析中的做法，并不是“伦理的观点”或社会现实的观点，而是它的反面，即主观意识的观点。

然则中国社会不是正在现代性的趋迫下发生重大改变吗？是的，正是如此。那么，这一改变难道不正应当是从伦理社会变成市民社会吗？似乎“应当”是如此，但现实并非如此。且让我们最简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原子个人的产生，但是，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这一判断从总体上意味着：不仅今天的中国不存在市民社会，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产生市民社会。因为，第一，原子式个人的成立，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表明的，乃是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难道我们现在有可能来开始进行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以便最后站在中世纪的废墟上看到像堂吉诃德或浮士德这样的“个人”诞生出来？基督教被中国化是可能的（这种中国化想必是依循特定的伦理社会之原则来定向的），但是我们经过千余年纯正的基督教教化来形成原子个人，却是不可思议的。第二，西方伦理社会的解体，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在希腊轴心期文明的发祥时已露端倪。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与之有关（他的第一条罪名是“毒害青年”，即教人“不敬父母”，于是悲剧性的结果便源于同希腊传统伦理的冲突），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与之有关：“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描绘了实体性的伦理生活的理想的美和真，但是在应付独立特殊性的原则（在他的时代，这一原则已侵入希腊伦理中）时，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即提出他的纯粹实体性的

国家来同这个原则相对立,并把这个原则……从实体性的国家中完全排除出去。”我们知道,轴心期经典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反映的是人民生活之最根本的状况和原初定向,如果我们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见到希腊伦理社会之被主观特殊性入侵的情形,那么,我们在孔孟老庄时代的经典中却会发现全然不同的社会取向及其思想表现。第三,以为现代世界(确切些说,西方世界、日耳曼世界第三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一种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降临都会彻底夷平其伦理社会并造就出原子个人来,仿佛中国人因此就会变成黄皮肤黑头发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似的——这样的观点同样是皮相的和没有根据的。因为它至少严重忽略了一点,即任何一种所谓现代制度(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或观念形态的),当它有可能来改变中国社会时,它本身必然反过来遭遇中国特有的伦理社会之同样的、有时甚至是更加强有力的改变。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看来也着实屡见不鲜。无论我们对此在主观上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客观态势中实际出现的积极的东西,乃是“文化结合”之锻炼的广阔场所,是“中国道路”的现实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中国社会之现代变迁的一个最一般的边界条件,即:中国的伦理社会正在发生改变,而且是发生非常重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可能趋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因而并不归结于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如果说这样一种描述中国社会之现代变迁的边界条件还是非常一般的,那么,其内容的展开将至少包括以下诸项:(1)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须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尽管这种占有决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社会唯独在变成西方社会时方才可能,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特定的社会现实所规定的具体道路可以千差万别,但任何一种有希望的前景总在于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2)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将重新发现、通达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传统并不是已死的东西,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去。海德格尔说得对: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轴心期文明的真正优越之处正在于那个总能被重新发现并且永不枯竭的丰沛源头。(3)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必经历黑格尔所谓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早期希腊人既有自己的固有传统,又面对着事实上更高的和强势的东方文化(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和闪族的等等),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同样将这种文化结合的任务揭示出来,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必须从社会的根基处接受这一艰巨任务的考验。(4)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将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能够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重新通达其伟大传统的源头,并且能够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获取其再度青春化的强大活力,那么,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就将转变成一种优势,就将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同时成为超越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也就是说,使这一变迁越过“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卡夫丁峡谷”,并直接成为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社会基础。

我们只能将上述规定仅仅看作是一些由“伦理的观点”而来的初步指引,而它们在内容上的充实则有待于对中国社会及其现代变迁的各种为深思所贯彻的实证研究。

#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提纲）

郝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近代思想史上，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深刻的传承转化关系。而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从现代分化到当代再整合的客观趋势，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研究必须开启政治哲学视野。

在政治哲学视域中研究《资本论》首先涉及的问题是，《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既然《资本论》的理论定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就无法忽视在其中限定着经济学的政治维度，进而也无法忽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与政治的总体性、经济生活的政治规定性，尤其是生产关系的统治功能与劳动过程的解放潜能。可见，从理论性质上看，《资本论》是一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为政治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规范的“政治哲学”。《资本论》实则是马克思阐释和论证其政治理念的理论总体。

## 一、《资本论》观照政治哲学问题的独特方式

《资本论》可以理解为何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笼统地说，《资本论》阐发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内生的政治属性，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再现为一个“政治世界”。

首先，社会性与政治性！权力支配的政治！《资本论》分析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权力支配关系（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劳动动物。斯密“看不见的手”：政治与经济的分化，重新激活发现经济领域的政治！剥削压迫的政治！

其次，权力支配关系-压抑性-生产性-解放的政治、劳动的政治、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

《资本论》具有切入政治哲学问题域的独特方式在于：不拘泥于仅仅从政治本身来理解政治，而是集中探究人类政治生活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基础，其政治哲学思想扎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并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的总体。其中，资本逻辑批判是根基，意识形态批判是结果，而物象化批判是沟通上述二者的中介。由此，马克思切入政治哲学的特殊方式也就具体体现在这三重批判之中。

第一，资本逻辑批判再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矛盾，奠定了政治哲学

的社会存在论基础。资本逻辑批判是对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批判性阐明，从“生产域”到“流通域”再到“分配域”再现了现代世界的社会存在论结构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的转化生成过程。正是从资本逻辑批判出发，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对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考察才得以可能。可见，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对脱离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政治概念的抽象推演，而是深深扎根于现代社会的存在结构之中。

第二，物象化批判呈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本质与浅层表象的矛盾关联，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在资本逻辑批判基础上，物象化批判再现了从社会的内部联系到表层“物象”的颠倒表现过程，揭示了从生产域投射到流通域的“简单流通”表象，从生产域投射到分配域的“三位一体”表象。物象化批判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存在论，只是它再现的不是资本逻辑的转化生成过程，而是拜物教的颠倒表现过程。物象化批判祛除了笼罩在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的神秘化、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外观，将其内在矛盾和历史暂时性暴露出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象化批判便摧毁了传统政治哲学赖以维系的“制度拜物教”基石。由此，以扬弃拜物教为前提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才得以成立。

第三，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观念表现的幻象形式与现实内涵，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又一种方法论前提。不同于物象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再现的是流通域与分配域的“物象之表象”或“表象之表象”，也就是说揭示了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精神生产过程。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扎根于资本主义的流通域和分配域，是“简单流通”表象和“三位一体”表象的“另一次方”而已。意识形态生产的原材料是拘泥于上述表象中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社会心理，并经由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理论表现，生成为“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以及“自由”、“平等”、“所有权”等经济的或政治的意识形态观念。综上，政治经济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再现，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

## 二、《资本论》对“古今之争”问题的扬弃

具体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哲学的奠基作用，需要在古今政治思想史脉络中对《资本论》进行定位，在政治哲学“古今之争”的现代性问题域中把握《资本论》的思想史意蕴。

### （一）施特劳斯派马克思解释模式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现代性三次浪潮”中的“马克思”：

施特劳斯注意到马克思隶属于从卢梭开始的现代性第二波即历史性思潮中。

然而，这种解释模式：

1. 强调“历史性一般”思路，把马克思与卢梭、康德、黑格尔抽象等同起来，没有抓住马克思历史性视野的特征，没有理解马克思“人类的实践和社会关系”、“历史性特殊（历史性定在）”概念，更没有理解马克思的“作为趋势的规律”“作为可能性的必然性”等独特的

历史性概念。

2. 从“历史性”向“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逻辑推导也是一种任意的不合理的思想史抽象（“观念杂耍”）。

3. 片面强调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自然正义、至善政体）的正统垄断地位，割断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家政与政体、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有机关系、政体演变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的关系。

其实，马克思（经由黑格尔）对政治现代性的超越，对古今之争的某种意义上的调和与超越，恰恰借用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

### （二）阿伦特的马克思解释模式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阿伦特注意到了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继承关系。

1. 拘泥于人类活动类型的外部划分，没有对人类活动进行内在分析；错误的指责马克思混淆了劳动与行动、经济行为与政治实践；没有理解马克思对劳动与交往、“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区分，对人类活动的等级秩序的重申，对劳动中工具性内涵与自我实现内涵的区分。

2. 不合理的推导：劳动与行动的混淆，经济与政治的混淆，导致了暴力论，产生了极权主义的萌芽。哈贝马斯的局限性，根源在于阿伦特。

3. 认为马克思力图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活古希腊民主制城邦的理想（“世界城邦”）。没有理解马克思区分三种社会发展形态的深刻意蕴：以人为目的的片面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的全面发展趋势、以人本身为目的的全面生产。

### （三）马克思对古典政治哲学基本观念的批判继承：

1. 人性（人的自然-政治社会性）标准：人类相对于动物的“自然优异性”与“历史优异性”：思辨与实践

2. 人的共同体：城邦伦理、公共生活与自由人联合体

3. 人类活动（合乎人类本性的）的等级秩序：自然和教化而成的“思辨高于实践高于劳作”，历史地形成的“自由王国高于必然王国”；

4. “自然正义”与“历史正义”。

### （四）马克思对近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批判继承：

1. “自然性（前政治性）”与“似自然性”：自然人、自然状态、自然规律的经济内涵——市民社会的规律的似自然性；

2. “自然个人”与“现实的个人”：主观特殊性求获满足的法权；

3. 人类活动的平等多元与人类活动的等级秩序；

4. 自然法权体系与人的发展：“自由权利”与“自由个性”、“平等权利”与“消灭不平等的运动”、“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

### （五）马克思对“古今之争”问题的扬弃：对古今差异点、冲突点的扬弃与超越！

1. 从古今自然性到社会历史性；
2. 从共同体与个人的对立到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个性；
3. 从活动秩序的自然等级到活动领域的历史性跃迁；
4. 从自然正义、自然权利到历史正义。

### 三、《资本论》与政治价值规范问题

《资本论》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具体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哲学的奠基作用，还需要回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流派，深入探讨它们针对《资本论》提出的关键问题。

《资本论》的价值规范问题。近代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扎根于经验事实与价值规范的二元分离，而《资本论》则拒斥了这种外在对峙的二元论模式，更深刻地探究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

具体来看，一方面，《资本论》揭示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法权体系或正义体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内涵，并力图再现其内在矛盾和自我逆反，由此实现辩证扬弃。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立足于“自我所有权”的价值规范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这种观点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相混淆，遮蔽了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立足于自我所有权展开社会批判的，而是把自我所有权及其经济形式即“商品生产所有权”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象，从而揭示出生产关系的表象与实质的内在冲突、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的深刻悖谬。关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探讨表明，劳动者在商品生产交换中的自我所有权与劳动者因资本剥削而丧失自我所有权这两者之间既彼此冲突又相互支撑。显然，马克思并不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并保留或实现其表象，而是要总体地扬弃这种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对立统一结构，而以新社会的根本不同的新矛盾取而代之。尽管马克思曾提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克服资本主义“名实不符”的对抗性，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权体系或正义体系的观点，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新社会不得不保留的“旧痕迹”，仅仅是一个即将被扬弃的发展环节，而绝非发展之目的。

另一方面，《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全新的政治价值。这种价值规范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在其具体内容上、提出方式上都超越了自由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作为与事实对峙的价值悬设而存在，而是扎根于历史过程和客观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作为历史趋势的“人的发展”与作为价值规范的“人的发展”二者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统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中蕴含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进而，这种客观趋势一经理论再现，就被合理抽象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规范，构成评判历史进步的标准和尺度，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要言之，历史规律产生历史趋势，历史趋势提升



为价值规范。政治哲学内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扎根于历史科学。

#### 四、《资本论》与政治行动主体问题

《资本论》的政治主体问题。当代法国激进政治哲学围绕政治主体或革命主体的形塑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但却始终无法突破革命行动与资本逻辑之间外部对峙的新康德主义“二元论”框架。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现，其核心是对现代性的历史主体的再现。这种再现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揭示出主体自我扬弃的规律。表面上看，《资本论》中存在着两种主体即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因而探讨的是资本统治下政治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深层地看，实际上只有一种自我扬弃的主体，那就是资本主体不断生成出的革命主体。作为客观规律的资本逻辑与作为能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在社会存在层面具有自在的统一性，但同时又具有一种自为的差异性。

问题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如何从资本支配下的价值创造主体发展为革命主体、解放主体？如何能够实现这种质的转化？转化的中介机制是什么？说到底，还是在于资本逻辑中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的二重性。劳动主体与资本主体是内在地纠缠在一起的。劳动主体深套于资本逻辑并构成其内在方面，但同时又创造着自我解放之可能性。资本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劳动主体的支配，却激发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生产出有史以来最多的自由时间。从现实性上看，剩余价值生产意味着压迫、剥削，但从可能性上看，剩余价值生产又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有可能转化为自由时间即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场域。“剩余”意味着一种历史趋势、历史潜能的将要实现。可见，《资本论》的历史潜能论抓住了从资本逻辑向革命行动、向新社会的开放性生成，比僵硬的“二元论”更有助于把握政治主体问题。

#### 结语

综上，我们应当也能够以一种“超学科”视野中重新看待《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将其理解为一种“大写的”政治哲学。《资本论》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构建，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更是内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逻辑批判为主轴、以人类解放为主题的政治哲学。对于这一新型政治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新使命。

# 资本概念的跨越式批判

夏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以资本概念为考察主线,梳理了马克思对于资本概念的三重理解;它们分别为:作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的资本;作为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的资本;以及作为作为资本家的资本。三重资本概念并非依次递进,相关扬弃的关系,而是在三者之间构筑了两重移动的跨越性批判:其一,在“私有权”与“资本一般”之间的移动,马克思以此来批判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国民经济学家;其二,在“资本一般”与“资本家”之间的移动,马克思以此来完成对资本概念的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的整合,从而构筑了一个包含着界限以及对界限之扬弃的资本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概念自身包含着激进性。早期激进的马克思与晚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因此没有根本的差异。

**关键词:**资本、私有权、资本一般、资本家、对象性

美国学者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中曾经做出这样一种感叹:“我的结论是《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sup>1</sup>这一需要解释的悖论或可被重述如下:对于资本主义的颠覆问题,早期马克思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理论批判更多地诉诸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晚期马克思在其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却似乎更多地诉诸于资本体系,作为一种特有的经济制度,这一资本体系将在其如铁一般的自然律的发展过程中自我崩溃。自此,马克思的思想中的激进性由主观激进(无产阶级的斗争)转向了客观激进(经济规律的自我演进)。这意味着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承认了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某种断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本文考察资本概念的问题域。

资本概念,并非仅仅出现于晚期马克思的思想中,它从1844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于马克思各类文本当中。对于这一概念,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面对多个资本概念的界定,我采用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构造的一个独特的方法——跨越性批判(transcritique)的方式来展开讨论。这一方法所蕴含的批判立场,意味着“批判”是一种不断的移动,因而不能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立场之上。<sup>2</sup>这种批判方式适用于那些徘徊于对立思想“之间”的思想家。如果说康德的哲学始终处于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则处

<sup>1</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sup>2</sup> 柄谷行人:《康德与马克思:跨越性批判》,赵京华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于了一种唯物论与观念论“之间”，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似乎处于庸俗的经济学家与国民经济学家（同样也是观念论）“之间”。这种“之间”的立场，在柄谷那里意味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差异”，<sup>1</sup>但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却是坚持革命性理论倾向的必然归宿。任何一种革命性理论都不会向任何一种固定的立场妥协，它需要一个活动（革命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敞开，就思想而言，是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给出的。我借用柄谷的跨越性批判的概念来考察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形成，不仅在于揭示出其资本概念的不断“移动”，同时更意指着在这种移动中，资本概念获得了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内涵。

## 一、“私有权”向“资本一般”的移动

资本作为马克思的核心概念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全过程。在其发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之后，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资本，作为国民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从《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开始就已经引发了马克思的关注。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而言，“资本”在劳动的话语语境中被展开：“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sup>2</sup>（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因此也就是“积蓄的劳动”<sup>3</sup>。这种界定彰显了其思想的两个向度：其一，此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一般看法，以劳动作为衡量资本的一种中介，这意味着资本概念还未达到“资本一般”。因为劳动所具有的主体性原则，必然使得此时的资本概念带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其二，此时的马克思仅仅指出了资本的积累性，而并没有指出这种积累性形成的内在机制，因为他还未能发现“剩余价值”的产生机制。马克思在此所做的仅仅是笼统地指出劳动的积累与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有关。但也正是通过将“积累”与“支配权力”联系起来的做法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与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区分开来：对于斯密而言，资本就是“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sup>1</sup>这只是一个无价值倾向的描述，它近乎一个科学定律，一种简单的量的积累。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已经意味着一种支配权力，一种对于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换言之，带着某种非合理性的占有，这不是对某一中性规律的发现，而是一种剥削理论的构建。只是此时的马克思用以讨论剥削的理论工具仍是人本主义的话语语境，其所能形成的也仅仅是异化劳动及其扬弃的哲学畅想以及富有原则高度的共产主义理论。最终，马克思所能构筑的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宣言，而非对现实的颠覆之路的探寻。

马克思在扬弃了异化劳动的批判语境之后，资本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一般”的概念。这是一次理论的飞跃，它不再对具体劳动的占有，而是意指着“每一种资本作

<sup>1</sup> 柄谷行人：《康德与马克思：跨越性批判》，赵京华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sup>2</sup>这种资本一般，是资本生产的辩证过程的概念形态。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为脱离劳动话语而做出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包含着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一次隐形回归，即通过对于“资本一般”的概念形态的分析来替代对于现实资本所蕴含的剥削关系的分析，马克思直接指认了这种“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sup>3</sup>这种逻辑与现实的直接同一彰显着马克思特有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似乎是科学分析无法回避的一种理论手段。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手法的运用使得马克思在表述资本概念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描述性的转变，即此时的资本，不再直接意指一种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关系，而是重新在量的积累的意义上获得说明，资本，在此成为一种生产中的价值增值：“迄今为止，资本都是从它的物质方面被看作简单生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值的过程。”<sup>4</sup>

这究竟是对斯密传统的回归，还是马克思对于自身思想的推进？这个问题关涉到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是否存在断裂的问题。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资本作为价值增值的一维，我们必然会将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仅仅视为一种科学研究，资本成为了一种生产的普遍形式，其价值的增值自然也成为无可厚非的现实。资本概念内在包含的剥削关系似乎消失殆尽。这是资本概念摆脱劳动的人本主义话语，走向科学话语（资本一般）可能带来的第一个理论的危险。

其二，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进一步的论述，将这种价值增值的资本同时视为一个包含着固有界限的生产过程，是否能够帮助马克思避免这种思想断裂的可能性？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在对这种资本的生产及其界限的表述中揭示给我们的仍然似乎是一个价值生产的自发过程。其中无需人的能动介入，资本似乎面临着一个自我崩溃的内在趋势。此时的资本就其概念而言已经成为了生产和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sup>5</sup>对于这一矛盾的展开过程，马克思做了如下的推演：

当资本概念被意指为一种价值增值的时候，它的这种内在趋势将表现为一种进步强制：“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sup>6</sup>在这一过程中，货币转变为了资本。但资本本身却是一个包含着自身限制的生产。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是资本概念自身所有的，因此也是无法去除的。这种界限甚至构成了资本概念的自身规定性。<sup>7</sup>这些必要的限定包含着“（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限制；（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

---

<sup>1</sup>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sup>5</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

<sup>7</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是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sup>1</sup>而资本每一次试图突破自身限制的尝试，都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

在此，马克思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自我矛盾的资本概念，对这一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借助于“资本一般”的抽象完全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式来加以推演，甚至演算。其结论虽然是富有激进性的，但这一激进的维度却依赖于资本的自我崩溃，这一客观性、科学的维度，在我看来却可能有利于马克思的后继者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的阐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后继者们大多持有这种观点，甚至包括罗莎·卢森堡，她在强调了资本积累带来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的同时，将这种转变导引向资本的自我崩溃。由此资本主义如同一架自我运转的永动机，而人不过是这架永动机上一个个小小的配件。这不仅可能从根本上否定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更会在等待资本的自我颠覆的过程中磨平马克思思想固有的激进性，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随之由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契机的分析变成成为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诊断。概而言之，“资本一般”的抽象为马克思思想“科学化”、保守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如果要离开这样一种阐释路径，我们需要转变分析方式，将马克思对于资本概念的两个界定——作为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私有权的资本与作为价值增值的资本一般——进行一次跨越性批判。将资本的这两个概念视为马克思思想的一次“移动”。在这次“移动”中，在我看来，包含着马克思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双重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唯物论者们）对于资本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的洞见先于马克思，并更为激愤。但情绪化的指责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它所带来的只能是乌托邦的幻灭。因此，当马克思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革命事业之际，这种激愤与谴责自然需要转变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冷静客观的分析。资本是基于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私人占有，但同时也是一种有效增值的生产方式。生产，需要有所剩余。剩余的积累构成了财富的积累。对于晚期马克思来说，当他运用着政治经济学家一般的眼光来追问社会财富如何增长的时候，资本作为增值的货币有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维。这一维度是不可否认的。当然，马克思从未停驻于国民经济学家式的追问，他需要再前进一步，即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一批判表现在为资本的增值划定一个界限，这一工作确与康德为理性划界的工作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因此这里的“批判”也应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获得其基本内涵：批判，对于马克思而言从未意味着简单的否定，而是意指着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所有概念的历史性解读，这一解读意味着为任何概念划定其试用的范围，并谨慎杜绝一切可能的超验性使用。当国民经济学家仅仅将资本视为一种积累的劳动或者增值的货币之时，他们已经在将资本永恒化，自然化，这样的资本概念超出了资本自身的界限。从这意义上说，当马克思提出资本一般的概念，并展开资本生产的自我界限的时候，他一边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虚幻性，一边又杜绝了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超验性。这种“之间”的思维方式是跨越式批判特有的思维路径。马克思在这一路径上走出的道路应该能够同时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情节与实证化的国民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倾向。但问题在于当我们仅仅驻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足于自身包含界限的“资本一般”的概念之时，我们却并不能开出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第三条道路，反而有让其折回到国民经济学家的基本立场的风险。

## 二、资本即资本家

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对于晚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过于实证化的解读，放弃了其固有的思想“移动”的特质，马克思关于资本作为资本一般的界定，在我看来不过是观看资本概念的一个视野。它是资本的客观存在样态。这种客观存在样态在其自我增值的过程中敞开了一个可被颠覆的客观情境。在这一情境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有了可能性的空间，但这种情境也仅仅是一个可能性空间，它的自我颠覆性如果仅仅依赖于其作为物质存在样态的资本是无法完成的。在此，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讨论资本的视野，这就是观看资本的主观性视野，在这一视野之下，资本获得了其人格化的表现，即“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sup>1</sup>

马克思在对资本的主观性维度的分析中重新运用《1844年手稿》期间的对象性话语方式。对象性，是早期马克思用以突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件理论利器。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对象化，仅仅作为一个中介，成就了三段论式的辩证跃进。由此，逻辑起点与终点实现了一种封闭性的完成。对象化，这一观念切入现实的一维最终仅仅作为对观念的确证被整合入逻辑体系当中。1844年时期的马克思坚持着对于现实工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将思辨的否定还原为人的现实的劳动，并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根本无法确证劳动者，现实的私有制并没有让黑格尔的思辨想象得到完成，它使得任何的对象化过程无法实现复归，对象化被转变为了“对象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对象化，是费希特式的自我设定非我的逻辑推演，在此非我仅仅确证了自我的存在。而对象性，却是与异化劳动共生出的一种自我与非我的对抗性关系，非我（对象）不是确证自我，而是否定自我。从概念的简单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象性关系包含着马克思对于现有私有制的批判，它较之“对象化”概念更富有现实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象化的复归，本质上只能完成于一种主观的思辨，而对象性的存在却是任何现实的存在物，包括人都一定会具有的存在样态，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sup>2</sup>就现实的人而言，“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sup>3</sup>在此，当马克思谈到“设定并不是主体”，马克思批判的是费希特，正是基于这一思辨哲学的起源，黑格尔的思辨辩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证法得以确立。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非我（对象）并不是被主体设定出来的，而是外在于主体而存在的对象物。这一对象物的现实性决定了与之对立的主体的现实性。因此主体能够设定异己的对象，是因为对象本来就对象性的方式存在于主体之外，简言之，“我”的存在只有在与“他人”相对立当中才能看到我自身，这种对象性关系的非复归性是现实事物，特别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前提。

这一看似抽象的理论设定包含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突破，其中对象性关系成为了打碎黑格尔封闭体系的有力方式。因为在对象性关系中，观念并不能把握现实，现实有其特有的对抗性关系，它无法被任何一种思辨的否定所囊括和消解。这种对抗性关系在资本概念中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同时生产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家。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sup>1</sup>

在此，马克思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的生产联结到了资本自身价值增值之上，这种联结的合法性在于资本的价值生产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即劳动原则。这种劳动原则所表现出的是工人的“非对象性”，也即工人的劳动产品是其自身本质的外化，因此应是对工人本质的确证，但在资本的无限增值当中，这种确证变成了异化，表现为了一种工人相对立的另一个主体。它对于价值增值有着无限的欲求，因此变成了一种在工人之外的异己的意志。资本家不过就是这个异己意志的人格化表现。由此“对象化的活动”在资本的客观规定下变成了与工人对立的“对象性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工人总是处于这种对象性关系当中，处于与资本家的真实对立当中。

在此，对资本的客观规定获得了其承载的主体——资本家。由此，现实的资本所彰显的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某种“惊险的一跳”。即从资本的客观增值跃入资本的主观人格化。两者的衍生关系彰显了从对象化关系向对象性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彰显的是资本概念的内在对抗性。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此对于资本概念的分析又出现了一次“移动”，只是此时马克思思想的移动不是发生于两种思潮（空想社会主义与国民经济学家）“之间”，而是发生在资本自身的客观一维与主观一维“之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在此并没有被固着在任何一个维度之上，相反，它始终在两种界定“之间”游弋。一方面，马克思富有创建的提出资本概念包含着其客观条件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自我增值的整个过程，这一个过程包含资本的积累与借贷，这种说法，曾被马克思指认为对资本概念的错误理解：“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起来并不包含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手法中，资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sup>1</sup>对于这种跨越性的批判，马克思自身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他明确指出：“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sup>2</sup>这种看似充满矛盾与对抗性的规定恰恰准确概括了马克思思想中资本概念的移动性特征。

概而言之，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就这一点而言，晚期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推翻早期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早期马克思在将资本界定为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私有权的时候所触及的已经是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在资本被直接人格化为资本家的时候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彰显。其次，这种特定的对抗性关系需要一个特定的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一方面决定了资本内在的对抗性关系得以产生，同时还决定了这一对抗性关系得以被颠覆。这一客观条件即为资本作为价值的自我增值及其可能遭遇到的界限。后一规定是前一规定的保障，而前一规定是后一规定的变革性要素。如果没有资本的人格化，没有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现实对立，资本的自我颠覆的界限即便已经达到了，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变革，革命的爆发，抑或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晚期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基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而非任何的盲动。这种旁观者与行动者的辩证整合，赋予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以决定性的现实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晚期马克思是否是一个失去了激进性维度的经济学家？从资本概念的两次跨越性批判，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坚持一种“移动”式的视角来分析资本概念，我们将看到资本从来都是包含着固有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概念。只是较之早期马克思，晚期马克思更为关注革命的条件以及可能性。因此，面对资本概念的多个界定，我们无需将其按照时间的序列排列起来，从而认定后期的界定是对前期界定的扬弃；相反或者我们应该将资本的多个界定平行来看，而我们对于资本概念的准确把握依赖于始终在多个平行界定之间的“移动”。

### 三、资本发生史的重重话语：激进性维度的渐次强化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把资本放入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其发生与发展。在我看来，这一工作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所必需的一个理论维度。马克思从不孤立的、抽象的考察一个概念的内涵，而总是试图将这一概念投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发现其发生、发展与死亡。这一历史性的维度保障了其对任何一个概念的非超验性的解读。资本概念，作为其进行现代社会分析的有效切入点，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一资本发生史的梳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说明——这仅仅是资本概念的客观维度——同时，更看到马克思在探寻资本发生史过程中不仅没有失去，反而越来越强烈的激进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性维度。

对于资本的发生，我们一般都非常关注《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相关论述。并且发现了在这两个文本中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所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它们构成了资本发生史的两套相对独立的话语。但在我看来，资本的形成过程绝非是其晚期的理论兴趣，早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以分工为轴心的诸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就已经提出了一个资本诞生的话语，这构成了资本发生史的最初版本。在此我们将对这三套话语中的相关分析做一个简略对比性梳理，在其中，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渐次激进的批判基调。

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本对于同一问题的关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首先，资本究竟是贯穿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定生产关系，还是仅隶属于资本主义本身？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回答不同于《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在后两个文本的讨论中，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各形态并不存在资本，它们被称之为“资本的洪水期”。其中所产生的剩余资本构成资本的历史前提，“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sup>1</sup>而“资本一旦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sup>2</sup>尽管《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对于社会各个阶段的讨论方式略有不同——例如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形式：它们分别是单个的个人只表现为偶然因素的亚细亚的所有形式、仅仅强调统一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个人与共同体互为前提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并同时考察了三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向现代世界（资本社会）过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sup>3</sup>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仅仅关注于日耳曼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但在这两个文本中资本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发过程，因此社会转变的关键也就在于资本，这一特殊的财富积累形式的生成。<sup>4</sup>

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本却在各个分工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在行会盛行的城市中，存在着以住房、手工劳动工具等形式而存在的资本形式，他们可以世代相传，因此被马克思称之为“等级资本”。<sup>5</sup>而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促使了商人的出现，而商人资本的活跃极大的推动了资本的流动性，马克思认为这个时代的资本带有了现代资本的特色，形成了所谓的“活动资本”。<sup>6</sup>资本由此似乎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sup>3</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34页。

<sup>4</sup>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3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不是一个在近代才得以发生的生产，而是始终贯穿于人类经济交换行为当中。

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发生史两种不同态度所折射出是马克思的批判性维度的深化。如果资本如同早期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种财富积累模式，那么资本就具有一种如同自然规律一般的存在合理性。它成为人类生产、交换的一种常态模式，那么对于资本的扬弃也就变得不可能了。换言之，如果不同的分工阶段对应于不同的资本模式，那么未来的社会的演进只需构筑不同类型的资本，而无法从根本上否定资本的存在。因此早期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模式显然会引发社会改良的理论旨归。但如果按照晚期马克思对于资本发生史的基本看法，情况完全不同。资本成为了一个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特殊模式，它附着着隐形剥削形式最为隐蔽和彻底，因此对资本的扬弃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其次，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究竟来源于什么，晚期马克思分别在《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明。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给出的说明是模糊不清的。他并没有明确地将其作为一个需要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而提出来，只是在讨论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和条件过程中，轻描淡写地指出资本家成为资本的前提在于“把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创造出来的价值”<sup>1</sup>包括“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sup>2</sup>投入到流通中，购买自由的劳动力，进入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当中。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承认了国民经济学家的基本结论，即第一个资本家的资本获得依赖的是个人的勤劳致富。这种说法使得资本的诞生失去了非正义的根源，反而带有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剥削只是发生在进入资本运行之后的生产。在其中雇佣工人自身所生产的剩余资本成为了吞噬雇佣劳动的不竭动力。

但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新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资本的原始积累却失去了道德的光辉：“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sup>3</sup>换言之，资本的原始积累绝非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设想那样源于勤劳与节俭的美德，相反，对于此刻的马克思而言，资本的第一桶金只有一个明确的来源：暴力。“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sup>4</sup>对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掠夺，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等等都包含着对财产的暴力侵占。由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5</sup>这样充满了斗争气息的讨论方式已经绝非一个冷静的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描述方式。但却也正是这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sup>3</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页。

<sup>4</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页。

<sup>5</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份不冷静成就了马克思对于资本发生史的独特见解。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资本，早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生产，一种纯粹的价值增值与财富积累，它的血腥意味着资本发生史本身必然隐含着—部人类的阶级对抗史。这是资本概念在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之间的移动所带来的一种审视视角：联结了资本的价值增值与阶级的产生及其斗争，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样，须臾不可分离。

通过以上我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与资本发生史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思想主张。马克思的思想内在的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分析与主观的革命指向，两者在马克思思想中始终并行不悖，从未有任何—方占据主导，它们始终平行存在着，而马克思则在两条平行之间移动着他分析的视角，并在这种视角的张力中构造了一个独特的哲学概念——资本，在其中，资本的激进性维度是其理论旨归，因此西方学者试图阐发两个不同的马克思的说法，显然在对资本的跨越式的批判中自行消解了。

# 论机器的跨个体性

——与西蒙东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

许煜

(德国吕纳堡大学)

这个讲座想要通过对固定资本的形式以及它的内在动态的分析来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断”。这所关涉的既是机器的存有论也是它的存有发生论。固定资本总是两方面的：它即是资本又是工人的工具。作为资本它与流通资本一起配合来取得更高的剩余价值；作为工具，它真接与工人，并且在工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理-身体 (psychosomatic) 的关系。基于固定资本的双重性，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如何上演他的辩证法。固定资本根据科技 (technoscience) 的新发现而不断地转变，马克思早在 1857 年的“机器论片段”中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将会决定一般的社会知识在何种程度会变成直接的生产力。然而，我们必须留意虽然马克思将机器理解为历史范畴，但他对机器的分析却止于经济范畴，正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磨机给我们的社会封建地主，蒸汽机则给了我们工业资本家”。我们可以接着指出说“网络化的数码机器给了我们平台资本主义”。在这种对称的比较中，马克思将机器规范到一个有限的数量级来分析，也就是说政治经济；而这个讲座的其中一个目的在于展示我们必须超过这个数量级来完成马克思的分析。我提议不要将固定资本理解为实体，而是根据不同的机器的运作图式所组织在一起的跨个体关系。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形式决定物质，意识形态决定内容的哲学主张，而是从个体化的角度来理解机器与人的关系。

跨个体化关系或者跨个体性这个词来自法国哲学家吉尔别·西蒙东，他指出马克思了解到经济作为异化的原因，但他却看不到工人和机器之间还拥有更深远的关系，如果说经济是上层结构，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基础。固定资本的形式正在变成环境式的，如我的同事澳大利亚哲学家埃里赫·贺尔所指出的。固定资本从工厂走向智能电话、智能家具、智能城市，这种固定的环境化标志着福柯所称的治理术呈现出来的最新形式，同时也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在当前认知资本主义中的进一步具体化，它通过不同的传感器来进行量化，数据分析以及预测算法来调控跨个体关系以及将它们价值化，同时建立了新的真理政权。质问固定资本的形式容许我们根据技术性的发生的进展，从工作机到蒸气机再到今天的数码控制论机器，来对劳动本身以及工人这个范畴进行历史性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希望能重新理解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尝试推进的、但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出路的辩证，也就是说从剩余劳动到自由时间的扬弃。这场讲座将通过西蒙东的跨个体性概念来阅读马克

思，以及与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诸众语法》的辩论来剖释上述问题。

# 探析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理论

薛稷<sup>1</sup>

**摘要:**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随着资本运动由“形式吸纳”转变为“实质吸纳”,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帝国时代。帝国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具有流动性、非中心性、平面性、危机性等特征。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取代物质劳动,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劳动霸权形式,对其他劳动形式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劳动形式主要表现为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与“情感劳动”,包涵社会性、合作性、交流性、创造性等具体内容,既彰显了当前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新形式,也预示着劳动者反抗资本斗争形式的新发展。这种斗争形式的发展主要借助于帝国时代的主要反抗主体即“诸众”。“诸众”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新主体,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集合体,是颠覆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丰富而且充实的新主体。奈格里推崇的“帝国理论”对认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变化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其片面强调主体性的力量,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因而不可避免地浸染了一定的空想色彩。

**关键词:**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 非物质劳动 诸众

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新特征与新问题,如何正确认知当代世界的存在方式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奈格里认为,当今社会实质上已经演进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它超越以民族国家与殖民地为主的帝国主义时期而进入帝国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sup>2</sup>这种新的主权形式既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又兼具自己的特征,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阶段,“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sup>3</sup>

---

本文系2017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英国伯明翰学派新兴文化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sup>1</sup> 薛稷(1980-),男,山西吕梁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邮编030006

<sup>2</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xi.

<sup>3</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xi.

## 帝国：当代世界的存在方式

帝国是帝国主义的否定形式，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奈格里明确地指出，帝国范畴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即帝国是一种新的历史存在形式，它既存在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之外，“对我们而言，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实际指的是现代性的核心危机的终结。这一贯存在于现代之中，并界定着现代性的冲突，构成了现代主权的基点……而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终结了。”<sup>1</sup>帝国恰恰是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终结之后的社会历史存在形式，同时，帝国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历史对象。在他看来，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正是帝国兴起之时，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是旧的权力形式，所提倡的新权力形式恰恰正是帝国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其理想正是帝国存在的现实。

帝国是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自由主义是推动帝国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资本从依赖大型工业转向依赖新形式的生产，包括更多非物质的、自动化的劳动形式、灵活的、不固定的雇佣形式以及越来越以文化和大众传媒标准所界定的商品……其次，这个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政策（必要时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推行）迫使原来由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私有化，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福利政策体系。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也许是新自由主义的引领者，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很快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sup>2</sup>

资本运动形式因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要向非资本主义地区进行渗透扩张，将非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纳入资本体系中，这属于一种形式吸纳；而到帝国主义后期，世界资本化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资本的形式吸纳失去了原有作用，于是资本又开始了另一种运动即实质吸纳，即在资本主义内部挖掘资本增殖的因素，逐渐将社会的一切都纳入资本运行机制当中，由此形成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还是一个控制社会，资本不但控制社会物质财富，而且试图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行为，“在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孜孜以求的一切社会力量互为影射的关系得到全面实现，马克思曾确认某种类似的东西，他称之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过渡。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也分析了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过程—文化（以及社会关系）被吸纳入集权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被吸纳入畸形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sup>1</sup>因此，在帝国时代资本吸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生命，社会的一切都笼罩于资本的阴影之下，“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可以说资本不仅吸纳了劳动，而且吸纳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产过程的要

<sup>1</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9.

<sup>2</sup> Paolo Vim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4.

素，也是其产品。”<sup>2</sup>人是一种文化存在，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印证了自身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实质吸纳已经将人们的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都纳入资本体系，资本成为笼罩在全球之上的一张网，构成当代人类存在与实践的基本方式，帝国就是当代世界存在的现实形式。

帝国替代了帝国主义时代但并未消除资本的统治，这种统治更加具有分散性与普遍性，“与帝国主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帝国并不建立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疆界或壁垒。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去地域化的统治工具，并且逐渐将全球领域并入其开放与扩张的整体中。透过调节指令所构成的网络，帝国管理着混杂的认同、灵活的层级与多元的交换。同时，帝国的全球彩虹也融化了帝国主义世界中不同的国家色彩。”<sup>3</sup>这种分散性和普遍性起源于帝国时代劳动形式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积极改变着产业结构，“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弃了等级结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sup>4</sup>新兴科技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兴起导致人们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界限的模糊，“在后工业社会里，‘自由时间’也要受到计量和分配所支配。那些活动中的‘时间收益’是和工作时间的收益处于同等地位的。……人在闲暇时间里就成为了经济人。”<sup>5</sup>这种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模糊却演变成了资本剥削的新形式，使得“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并且，也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发生颠覆性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殖。”<sup>6</sup>帝国时代资本统治了人们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们所遭受到资本剥削从未减轻反倒呈现出更加全方位的态势。

因此，帝国时代是一个资本控制一切，剥削一切的社会历史阶段，“剥削和支配的对象已不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也就是抽象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力量。”<sup>7</sup>

## 非物质劳动：帝国时代的劳动霸权

有关非物质劳动，奈格里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初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以下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指涉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譬如解决问题、符号的和分析

---

<sup>1</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

<sup>2</sup>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sup>3</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xii.

<sup>4</sup>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8页。

<sup>5</sup> [美]丹尼·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20页。

<sup>6</sup>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sup>7</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9.



的工作以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像及其他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形式是‘情感劳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既指涉肉体，也指涉精神。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决定其他产业的劳动霸权形式，那么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成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主导劳动形式，从而形成了非物质劳动霸权形式。

事实上，像快乐和悲伤这样的情感所揭示的，是整个个体组织中的生命现状，它既表征了肉体的某种状态，也表征了思维的某种模式。”<sup>1</sup>按照这个定义，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形式。但奈格里并不满足于这种解释，他进一步指出，非物质劳动更是一种新的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与人们的智力因素与性感因素紧密相连。“新的概念诸如‘非物质劳动’、‘大众知识分子’、‘一般智力’等等都试图抓住合作和创造力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都关涉当代社会生产——一种由控制论、知识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所界定的集体性的生产。”<sup>2</sup>这种新的生产形式既生产出非物质性的商品，满足人们交流与沟通需要，也生产出一种资本关系，这种资本关系表明人们的文化与情感同物质性资料一样，都会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是资本增殖的新工具。

非物质劳动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劳动形式与生产方式，而且还是帝国时代的生产的基础，或是劳动霸权形式，决定着社会生产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非物质劳动已经存在，可在生产方式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sup>3</sup>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非物质劳动在整个生产方式中发挥的作用越加明显，开始逐渐取代物质劳动，成为当代劳动的本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我们社会的劳动正在趋向于非物质劳动——智力的、情感的和科学技术的劳动，半机械人的劳动。日益复杂的劳动合作网络、关爱劳动融入生产领域以及劳动过程大范围的计算机化都是当前劳动本质的特征。”<sup>4</sup>

非物质劳动在当代劳动形式中的本质地位，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

首先，非物质劳动是一种决定性的劳动形式。奈格里指出，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物质劳动仍然存在并占据很大的比重，非物质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并非量上的比重，而是质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在说非物质性劳动占据霸权地位的时候，指的毋宁是非物质性劳动在质量上占据了霸权地位，并给其他劳动形式以及社会本身施加了一种倾向性影响。……今天，劳动和整个社会都得进行信息化要变得更智能化，更可交流化，更情感化。”<sup>5</sup>非物质劳动将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未来趋势，逐渐渗透于其他劳动形式之中，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

<sup>1</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8.

<sup>2</sup> Paolo Vim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5.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sup>4</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9.

<sup>5</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9.

响正如同150年工业劳动所发挥的作用，都会成为其他劳动形式的重要构成基础。

其次，非物质劳动是未来劳动发展的趋势，是理解当今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参考标准。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与基础，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的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确切地说，由于今天非物质生产的统治地位，我们可能通过对过去的观察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从由非物质生产统治的经济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而以回溯的方式观察，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认识重新思考历史的方位。”<sup>1</sup>奈格里认为通过观察非物质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及其本质，就在于这种劳动形式是当今帝国时代的霸权劳动形式，体现着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本质属性。

再次，非物质劳动决定了全球的劳动分工，本身并且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传统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劳动决定世界的等级秩序，而到了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则成为主导劳动形式，并决定着世界生产体系的形成。“如今所有的经济活动均倾向于受到信息经济的统治，并在质上被其转化。全球经济的地域差异不是不同阶段发展的共存的迹象，而是新的全球生产等级的类别。”<sup>2</sup>在全球化劳动分工中，非物质劳动居于顶级层次，其他劳动形式则处于从属地位，“非物项性劳动的霸权决定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某些非物质性生产形式被局限在全球的强势地区内，同时，许多工业和制造业生产部门却转移到了全球的一些从属地区。”<sup>3</sup>正是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成为一种劳动霸权，对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形式具有一种优越性。

最后，非物质劳动之所以是帝国时代的霸权劳动，更是因为其不仅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当代社会矛盾冲突的主线。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是资本剥削与压迫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广大非物质劳动者反抗资本霸权的主要手段，代表着劳动者反抗帝国统治的最新形式，“无论是从系统的生产力的角度还是从反抗帝国权力、寻找替代力量的角度出发，我们都无法想象不把非物质劳动置于帝国的中心。”<sup>4</sup>

“恰如工业化进程改造了农业并使之更加多产一样，信息革命也将通过全新界定与激活生产过程来改造工业。”<sup>5</sup>从工业劳动霸权向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过渡转化是帝国形成的本体论基石，正是在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基础上，帝国才得以最终形成。作为领先于工业劳动的主导劳动形式，昭示了帝国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与发展，成为帝国时代的劳动霸权，它既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也构成反抗资本统治的根柢。

---

<sup>1</sup> [美]尼古拉·布朗、[美]伊莫瑞·泽曼《什么是群众？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访谈录》，王逢振译，《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第108-117页。

<sup>2</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7.

<sup>3</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14.

<sup>4</sup>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内格里：《大众的历险》，陈飞扬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第38-41页。

<sup>5</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85.

## 诸众：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而到了帝国时代，由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呈现出分散化与流动化的特征，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遭到削弱，“今日的无产阶级所经历的贫困，事实上不仅仅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不断下降的工资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的贫乏，而且还指我们作为人类的能力，尤其是我们的政治行动能力的越来越严重的被剥夺”。<sup>1</sup>这种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能力的削弱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来理解无产阶级，重新理解反抗的社会主体。“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的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sup>2</sup>“马基雅维利的自由、斯宾诺莎的欲望、马克思的活劳动，这些都是包含真正改变力量的概念，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并超越既有生存条件的力量。之所以这些批判概念的力量能摆脱它们自身同现代性的暧昧关系，这主要在于它们被作为主体的需求而提出。”<sup>3</sup>他们一起成为了内格里挖掘无产阶级政治主体的核心概念。

那么，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呢？奈格里指出，重新理解与把握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关键在于把握当前资本剥削的新形式，以此来探索反抗这种剥削新形式的抗争形式，并由此寻找反抗主体。“当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事物的当前样态时，我们不仅要关注统治及剥削的新形式，而且还要强调拒绝这种剥削并因此而有效地提供了社会统治的替代方案的那种对抗的新形式。”<sup>4</sup>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基础上，“诸众”这种新的反抗主体应运而生。“非物质性生产霸权导致的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也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减弱了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也为我们称之为诸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sup>5</sup>

诸众是一种社会个体的集合体，是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霸权形式之下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体现了社会反抗主体的统一性，又没有取消社会个体差异性与独立性，“诸众由内部的种种差异构成，这些差异决不会缩减成统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欲。诸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sup>6</sup>奈格里认为，诸众是帝国时代的劳动者与生产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诸众才是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生产力量，而帝国仅只是一件用来俘获的

<sup>1</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Declaration, Distributed by Argo Naris Author Services, 2012, p. 32.

<sup>2</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2.

<sup>3</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6.

<sup>4</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5.

<sup>5</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14.

<sup>6</sup> 罗岗：《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工具,远离大众的活力。”<sup>1</sup>对奈格里而言,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人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是一个建构的范畴,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抹平了劳动者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多众作为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作为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者,其独立自主性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语言、知识、情感等生命政治劳动变得日益具有自主性,并且变得与资本主义管理和控制日益具有对抗性,资本越来越难以将劳动整合进其统治结构中。”<sup>2</sup>

诸众成为帝国时代反抗的革命主体,是由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劳动形式转变过程中劳动者抗争的结果。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有两个主体:资本主体和劳动主体,二者的斗争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与劳动互相作用的结果,“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相互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sup>3</sup>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的辩证运动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的主体,其主体意识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寻求自身解放的必要阶段,“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sup>4</sup>

由此,奈格里深度考察劳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其创造性,将其视为颠覆资本主义、走向未来社会的动力,“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sup>5</sup>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既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劳动主体反抗的反映,劳动者的革命活动决定着资本主义的走势。“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sup>6</sup>而这一趋势的发展就在于必要劳动时间对资本主义劳动时间的抗争,这种劳动主体的反抗逼迫资本主义不得不作出调整和改变。

奈格里认为帝国的出现不是资本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劳动大众反抗的产物,“当帝国的行动是有效时,这不应归功于它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它是被反对帝国的民众抵抗的反弹所驱动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应该说,抵抗实际上是先于权力的。”<sup>7</sup>抵抗先于权力充分证明劳动主体对于资本主体的反抗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线,在这条主线的指引下,奈格里从帝国的现实生产中去探寻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从而发现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即诸众。诸众究其实质就是帝国时代反抗资本主义的“新主体”。由于非物质劳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征,导致诸众这一反抗主体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劳动作为本质

---

<sup>1</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2.

<sup>2</sup>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5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sup>5</sup>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sup>7</sup>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0页。

的、共同的、非神话化的共产主义劳动的问题，而不是说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颠覆是彻底的，绝不允许任何妥协。这是个新主体，丰富而且充实的新主体。”<sup>1</sup>这一新主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非物质劳动领域，“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sup>2</sup>而这种作用就是生产共产主义的基础，“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sup>3</sup>

在非物质劳动中，劳动不再受制于资本的外在控制与组织，内在地获得了社会性与合作性，劳动主体逐渐发挥自身的革命性作用，颠覆资本的统治，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式。奈格里得出结论，在当前非劳动霸权情势下，诸众成为帝国时代的反抗主体，借助于非物质劳动的内在交流性与合作性特征，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通过“拒绝工作”的形式远离资本主义的劳动体系，在现实的劳动领域内建构出新的社会形式，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一事实同时也赋予了主体性及批判理论一种新的任务：把社会主体自身建构成社会存在之肯定性生产的一种新动力，而这种社会存在没有表征性的内涵，只有体现为一种新建构物，一次激进的革命”<sup>4</sup>。

## 结语

马克思指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sup>5</sup>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今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获得解放，反而更加深陷于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中。这样的窘况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产生怀疑，动摇人类解放的信心，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情绪。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理论具有两难性，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sup>6</sup>因此，当代一些左翼理论家不得不将人类的解放置于生产之外，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试图从所谓的“审美意识”中去寻求人类解放的途径。

奈格里的帝国理论从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霸权形式出发，再次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阐明作为帝国存在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特征。通过

---

<sup>1</sup>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

<sup>2</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

<sup>3</sup>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4.

<sup>4</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1.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sup>6</sup>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探析当今世界新的劳动形式即非物质劳动，他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的统治逻辑以及劳动主体的反抗相结合，在揭露帝国统治方式本质的同时，挖掘出非物质劳动主体——诸众的反抗潜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鲜活地应用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复兴。同时他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革命新主体内在联系起来，以此来预示说明共产主义运动趋势，揭示出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革命主体的积极促进作用，对于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悲观论的影响，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自行灭亡的，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及其主体即诸众的主观力量再强大，也不会凭借一腔反抗的热血就能推翻资本的统治。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同时，也对其重要文本进行主体政治学的扩展，“这一扩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方面的扩展。它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向包括语言、主体性、情感和欲望的生产——哈特和内格里称之为生命政治的生产的历史转变。二是本体论方面的扩展。生产的再定义，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的生产，而是关系和主体的生产，作为世界的结构。”<sup>1</sup>可是这一理论拓展有些过于强调了主体的意义，着力从情感、欲望以及语言等主体性因素去建构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反抗主体理论，妄图通过建构一个帝国反抗主体——诸众，来充分激发劳动民众的潜能，达到颠覆资本主义的目的，由于其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身规律性，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与科学性内涵，因而不可避免地浸染了一定的空想色彩。

---

<sup>1</sup> Jason Read. The Hidden Abode of Biopolitical Production:Ernpiie and the Ontology of Produ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01, 13(3/4), pp. 24-30.

# 论大卫·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 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摘要：**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化所引发的新的危机，大卫·哈维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中七个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性障碍的探究，指出尽管资本主义采取各种手段来化解危机，但却无法彻底克服资本自身的局限性。不仅如此，资本在进行全球扩张和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还制造了不平衡地理发展，从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规模上积累着新的危机。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从空间维度再次论证了资本主义自身蕴涵着无法被克服的危机，这对于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资本积累危机      资本流动性      不平衡地理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的问题上，历史上形成了三大思想阵营，分别是利润挤压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消费不足理论。利润挤压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力的稀缺或顽抗的劳工组织斗争造成实际工资水平上升从而使利润受到挤压；利润率下降理论则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竞争规律的共同作用使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理论则强调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导致经济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sup>1</sup>在哈维看来，任何一种主导性的危机理论都是无法有效解释资本积累危机的。因为资本循环是一个整体，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货币、劳动力、市场、技术都可能是潜在的危机成因，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减缓或者干扰资本流动的连续性，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哈维对资本积累危机问题的研究“依赖于对在流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限制和障碍的分析；对克服或回避这些限制和障碍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策略的研究；对在一个节点上障碍被克服或回避，从而引起在另一个节点上出现了新的障碍的途径的谨慎观察。”<sup>1</sup>那么，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将遇到哪些限制和障碍呢？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克服或回避这些难题的呢？

## 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限制和障碍

哈维通过考察资本循环过程，揭示了七个影响到资本积累的潜在障碍，这七个对资本积累来说必须解决的难题分别是：

第一，原始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要投入初始货币资本，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是通过暴力、掠

<sup>1</sup> 哈维，2011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115-116页。

夺、窃取和诈骗等手段来完成的。在资本完成了原始积累后，资本积累似乎不必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充满血腥和罪恶。但哈维指出，事实上，直到今天，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而且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他把当前的资本积累方式称之为“剥夺性积累”，主要包括以下手段：将公共资产私有化（水、能源、电信、运输、教育等）；进行大范围兼并、收购及各种实现资产剥离的操作；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比如庞氏骗局、股市崩盘、公司倒闭等来劫掠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基金。当前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这些强取豪夺的方式继续进行着资本的积累。

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资本持续积累的前提条件是有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储备，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性。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存在足够的和可获得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还必须符合特定的素质要求（灵活、易掌控、掌握必要的技能）。为此，资本家主要从扩大劳动力供应和减少劳动力需求两个方面来应对劳动力供给的有限性的难题。就前一方面来说，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挖掘那些尚未成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农民、女性劳动者等）。就后一方面来说，资本家采取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创新。由于劳动力市场在地域上是分割开来的，因此劳动力紧缺总是局部性问题。一旦劳动力能够在不同地域间流动起来将极为有效地为资本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下，技术的革新、资本流动性的提高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大量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形成了一支全球流动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因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工骚乱、劳工阶层内的种族歧视以及反移民浪潮。

第三，生产资料的供应与调节分配。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扩大，除了需要资本、劳动力以外，还需要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掉的中间产品（各种能源和原材料等，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的消费”）；另一类是机器、固定设备及包括交通运输、管道和港口等支持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为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廉价的生产资料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资本主义想方设法确保其在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大量为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城市基础设施被建造出来，城市空间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供应链内部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由于将利润转化为新增资本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可供利用，二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满足新增工人需要的工资商品，因此马克思区分了两大生产部门，一个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在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应该是在这两大生产部门中合理有效的分配从而实现利润均衡化，但实际情况却是“单个资本家都是单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竞相追逐利润”<sup>2</sup>导致资本在两大生产部门之间出现系统性错配。这种失衡和比例失调正是哈维提出的第一级危机理论所导致的后果。

---

<sup>1</sup> 哈维，2014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361页。

<sup>2</sup> David Harvey, 2001,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79.



也就是说，在资本初级循环中，单个资本家为了追逐超级利润总是使资本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而不顾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均衡发展。单个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

第四，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资本主义像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sup>1</sup>土地和自然资源同劳动力一起构成财富生产的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与自然产生尖锐的矛盾。因为单个资本家总是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并且受竞争强制规律的推动，从而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索取。再者，资本持续积累过程也将给自然资源的供给、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在此，资本主义遭遇到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制约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第一大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见，资本的持续积累不断向自然提出新的要求，不断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自然稀缺性而产生的资本积累的障碍不断得以解决，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障碍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会受到自然界、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且还受到自身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制约。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第二自然”主要表现为公路、运河、港口码头、写字楼等各种城市建筑环境。在哈维看来，城市建筑环境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成为吸收大量过剩资本的重要途径。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又需要有更新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于是“资本须要在某一个时点创建一个足以满足其自身要求的世界——第二个自然，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为了满足自身进一步积累的要求，对这个世界又进行改造。”<sup>2</sup>可见，资本主义是为克服过度积累的危机而创造出空间、场所、环境等第二自然，但这些空间、环境本身又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五，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竞争机制促使资本家对技术及组织形式不断进行创新以求获得超额利润。但是，随着资本日益增长的集中和垄断，自由竞争的机制会不断弱化，从而减缓了技术革命的步伐。与此同时，作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的工人通常会强烈反对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这些都干扰和阻碍了技术和组织形式创新的进程。技术和组织形式创新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及其社会关系的稳定性造成损害。比如，旧有的技术及组织方式尚未完全折旧就要被抛弃；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劳动者所需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不断变换所引致的失业问题；交通和通信手段的革新引起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布局等等。其次，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从长远来看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的技术，而节省越多的劳动，就有越少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sup>3</sup>因此，劳动节约型创新将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从长期来看势必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58页。

<sup>2</sup> 哈维，2011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88页。

<sup>3</sup> 哈维，2014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347页。

对利润率产生反作用。最后，大量过剩资本向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带来了投机风险和“专家法则”风险。随着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大量过剩资本疯狂涌入新技术领域，导致创新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环节越来越简化，投机性也越来越强。而当代技术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信任专家，遵循“专家法则”。一旦专家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为自己谋利，而不顾普通公众的利益，我们就陷入了“专家法则”风险。总而言之，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创新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又可能带来创造性毁灭的危机。

第六，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还取决于资本家指挥和控制劳动者的能力。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就是认识到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不过是组织者，工人才是真正掌握主动权的创造者。尽管从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在政治权力和法律制度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却依附于劳动者。<sup>1</sup>因为如果工人拒绝工作，摧毁或逃离机器，资本家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如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所强调的，拒绝合作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致命打击。对此，资本家也充分认识到只有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这种关系有时是通过暴力、高压和法律的手段来实现的，但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和相互妥协而建立起来的。哈维指出，当前资本家为进一步加强劳动过程的控制采取了一种新的“分化策略”。资本家根据性别、种族、语言、政治、宗教信仰等来对劳动者进行分类，通过充分调动和利用各个劳动群体之间的不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力被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中，从而削弱了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权。

第七，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上我们谈到的资本积累的几大障碍都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而资本家要获取利润还必须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成功出售，这时资本积累的最后一个潜在障碍就出现了，即有效需求问题。由于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人们对商品有需求，因此激发和引导人们的需求欲望，充分挖掘潜在的市场成为资本家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就催生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庞大的广告产业。价值实现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们对商品有充足的购买力。购买力最直接的来源是工人。但是工资总额总是少于处于周转过程中的资本总额，因此，工人的购买力显然是无法支撑社会的总产出的，它远不能解决价值实现的问题，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寻找新的购买力。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向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潜在的和可调动的购买力，这也就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和统治。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本性要求不断向新的国家和地区扩张，可供价值实现的非资本主义地域将越来越少，随着这些地区的财富被不断掠夺，消费能力也逐渐减弱。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问题，而发展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试图借助殖民活动来寻求新的市场和消费主体的可能性将越来越渺茫。

哈维指出，对于有效需求的谜题，解决之道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资本家的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及奢侈品和服务，另一部分是进行再投资。就提升有效需求

---

<sup>1</sup> 哈维，2011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102页。

来说，前一部分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后一部分即马克思所称为的“生产性的消费”才是关键所在。因为今天再投资所带来的额外需求将吸收昨天生产出来的过剩的生产资料和工产品。这样一来，消费不足问题就转化成了为昨天生产的部分剩余寻找再投资机会的问题。<sup>1</sup>而要实现再投资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对顺利开展再投资的信心。马克思在对萨伊定律（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所谓“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它是用来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的批判中提到，不存在一个强制性规定要求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后必须马上由货币转化为商品。资本家可以进行再投资，也可以持有货币，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剩余产品能否通过再投资被有效吸收这一信念。哈维指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扩张是以信念和信用为基础的新教徒的做法，凯恩斯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心理期待和预期分析要远远超过技术层面的分析。第二个条件是昨天的过剩产出与今天的再投资之间的时间差需要信用体系来弥合。信用体系对未来购买能力的预支成为提升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虽然通过借贷活动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生产的持续性和剩余产品的消化吸收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信用体系也在积聚着风险。一旦信用体系破裂，将会使资本主义陷入深渊。第三个条件是再投资的领域必须是实体经济。资本家可以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进行其他的资产投资活动。显然，前一种投资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制造出新的产品，催生新的需求，而后一种对股票、房地产、基金等的投资成为当前资本家最青睐的投资，这种投资活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对有效需求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提升。第四个条件是必须维护竞争的强制法则。资本主义只有处于竞争状态才能保持生产的永久性扩张，竞争程度的减弱将带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就是不断强化的垄断及资本的集中所导致的。总之，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难题再次证明了资本周转和循环对资本主义生存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稀缺、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同部门之间比例失调、自然因素的制约、非均衡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劳动过程的无纪律及有效需求的不足，任一因素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即使解决了其中的某一个障碍，资本积累还可能会碰到其他难题。事实上，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危机总是以创造新的障碍为代价来超越现有障碍。例如，20世纪70年代，通过造成大范围失业缓解了劳动供给危机，与此同时却严重打击了对产品的有效需求。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又在工人中不断扩张信贷供应量，最终酿成了信贷危机。应该说，资本积累的本性和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危机无法彻底根除，它只能从一个节点转移到另一个节点。这同时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哈维认为，马克思正是认识到资本主义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才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直击其要害。因此，我们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思路，把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时空逻辑中所发生的深层构造性转换在表面上的爆发，找出经济危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是如何具体发生的。

---

<sup>1</sup> 哈维，2011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110-115页。

## 二、资本积累危机与不平衡地理发展

哈维认为，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各种潜在性障碍的研究并不是对危机形成机制和化解方法的最终分析，还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哈维指出，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必然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一方面，资本在地理空间上时而集聚，时而分散的不稳定趋势造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在地理上的积聚能有效实现资本积累。这是因为，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到某个地理空间，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而且也可以缩短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从而加速资本积累。但是，这种积聚的趋势并不是没有物质和社会的界限的。交通拥挤成本、物质基础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不断僵化、空间的缺少，这些给资本积累带来的不利方面远远超过了规模经济所能抵消掉的影响。同时，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积聚激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争夺空间的矛盾和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又越来越趋向于地理空间上的分散。对高利润的期望吸引资本家多方向搜寻开发，将资本分散投资于各个有利可图的空间中。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与分散这对矛盾使资本主义地理景观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另一方面，资本要扩大积累必须打破阻碍其流通的空间障碍和区域差异，征服和逾越任何形式的地理壁垒。与此同时，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资本家又不得不积极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制造出新的地理壁垒和区域差异，这些区域差异又会成为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障碍。因此，不平衡地理发展既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地理景观，又是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途径。“不平衡地理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令资本的系统缺陷得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他处。”<sup>1</sup>一旦资本积累在某一地理空间中陷入危机时，它可以通过“空间修复”策略迅速发生转移，在新的空间中重启新一轮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资本无疑将失去活力，屈服于它的僵化、垄断和专制倾向。因此，哈维一再强调不平衡地理发展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

但是，不平衡地理发展在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的同时，也为资本积累自身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从而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规模上积累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和危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新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所引发的城市危机以及不平衡的全球空间结构所导致的反全球化运动。城市建筑环境虽然能吸收大量盈余资本和劳动力，但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很难在短时期内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出去，这样资本家本

---

<sup>1</sup> David Harvey,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Great Britain: Profile

来是为了克服空间障碍而建立了相应的空间基础设施,但它却很快成为限制和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之间进行两难选择。”<sup>1</sup>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城市处于不断地破坏和重建中,从而引发了固定资本贬值、失业增加、劳动者生存空间被剥夺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全球空间生产虽然使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都能在全球化空间中得到不断调整和重组,但却造就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资本的全球拓展加剧了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进一步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哈维对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之间关系的揭示进一步证明了资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危机是无法被彻底解决的。

### 三、哈维资本积累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核心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围绕着这一课题主要是从文化、政治、技术、生态等层面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大卫·哈维则坚持从研究“资本”本身出发,通过对《资本论》长达十年的潜心研究,一方面重申了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内在的局限性和危机,另一方面论证了在全球化、城市化和金融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自身的局限性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制造出了新的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和结构。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无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第一,坚持和重申马克思辩证法的要义和精神。哈维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要义有两点:一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二是这种总体性不是静止和封闭的,而是流动和开放的,是处于持续的变化状态中。正是运用这一辩证法使马克思解开了资本之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被视为具有某种质和量属性的资产(物)。而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资本被建构为一种过程或关系而不是“物”,“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离出来,自行增殖着……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sup>1</sup>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不是一个固定事物,而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承认资本是以“物”的形

---

Books LTD., p. 163.

<sup>1</sup> David Harvey,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163.

式而存在，而是强调如果不在资本产生、重构、维持、贬值和破坏的过程中来理解资本，就无法理解作为整体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要求增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资本循环过程就是价值流通的过程。“资本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sup>2</sup>这就说明资本循环过程的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出现中断，资本的价值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通过将资本理解为价值流通的过程，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的流动性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哈维遵循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并将其阐释为过程辩证法，强调辩证思维对过程和关系的理解必须优先于对要素和物的分析。哈维指出，这种过程而非“物”的优先性承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再清晰不过的说明。马克思对资本流动性本质的揭示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无限的积累和无限的增长为基础的，而资本积累的无限性势必会和物质活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就蕴涵着危机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哈维始终坚持在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过程中来探究破坏资本流动性的潜在性障碍，这使他对资本积累危机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

第二，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了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但马克思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应付或延迟这一危机的办法了。由此，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及三级危机理论”。资本在初级循环中出现的第一级危机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是工业资本大量贬值，许多公司企业破产，以及工业用地废弃。资本主义通过时间修复策略推迟资本价值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级危机。但当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时，也会出现普遍的过度投资趋势。在次级循环中，危机表现为城市人造环境中各种固定资本和消费投资项目的贬值。在第三级循环中危机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各种社会开支的危机（健康、教育、军事镇压等），消费资金形式的危机（住房），技术和科学的危机等等。另外，由于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顺利流通依赖于复杂的金融体系和虚拟资本，社会支出依赖于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信用危机以及国家财政危机。哈维把这种由资本“时间修复”策略而引发的危机称为第二级危机。为解决第二级危机，资本主义

---

<sup>1</sup> 《资本论》，2004年，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80-181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181页。

又采取了“空间修复”策略通过空间地理扩张来吸收过剩资本。由于资本在全球的空间布展是不均衡的，各区域之间，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最终会引发全球危机，即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这就是哈维所称的第三级危机。可见，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入和扩大，资本过度积累和贬值的危机也进一步深化，并在规模和范围上不断扩大，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正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频繁爆发的城市危机、空间危机、金融危机等新的危机现实，哈维从空间维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而突破与更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局限性，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第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研究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显然，马克思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分析和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从而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发展方向。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题和批判主旨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换。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兴起都未能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阿尔都塞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进行反思。他们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危机。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从马克思所处时期的政治暴力统治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统治，资产阶级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使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文化秩序以及道德价值观念，从而丧失了革命主体意识；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庸俗解读，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正是在反思西欧革命失败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二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调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运用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贫困化的状况有所改善，经济危机不再频繁发生。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促使资产阶级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由此出现了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消费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化将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进一步强化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危机在客观上要求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哈维强调马克思主义批判价值功能的发挥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新自由主义”意识

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深入到资本的逻辑中，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可能探寻到一条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不同于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等人从文化、政治领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迂回回归，哈维是直接切入到“资本”本身来探究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及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因此，哈维对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危机的诊断要比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具挑战性，也更贴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道主义关怀。哈维在《资本的界限》《资本的空间》《资本之谜》《读〈资本论〉》《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等一系列著作中，坚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辨识资本运作的逻辑及矛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发掘人类社会的未来出路，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可以说，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为我们探讨当前经济危机挑战下全人类的命运与可能的替代性前景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重要的理论支撑。



# 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与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

张 梧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有一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时间维度为主导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显然更为关注时间维度, 如必要劳动时间、流通时间、自由时间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显性逻辑”; 相较而言, 马克思并未形成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 空间维度的相关批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处于从属性的地位, 因而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性逻辑”。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来看, 这种批评意见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对于这一批评,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回应是深入挖掘并呈现马克思理论中有关空间批判的相关思想, 由此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并未出现“空间的空场”。对此, 本文认为, 空间批判之所以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性逻辑”凸显为当代空间批判话语中的“显性逻辑”, 在根本上是由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性变迁所决定的。换言之, 马克思理论中之所以出现“空间的空场”, 并非是马克思本身的理论缺陷, 而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使然。所以,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是空间批判理论从“隐性逻辑”凸显成为“显性逻辑”的关键要素。

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 前者与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对应, 后者与资本的现代积累相对应。在“资本的现代史”中,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现代积累模式推动了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马克思指出: 首先, 机器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同质化过程。其次, 资本主义的生活空间服从于生产空间, 进而被整合进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总体空间之中。最后, 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组完成后, 资本主义同质性空间向全球扩展。值得注意的是, 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 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因为时间维度直接关系到价值的量化, 直接关系到资本的生产过程。由于资本积累是空间整合的内在动力, 因此在马克思之后, 无论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列宁和卢森堡, 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列斐伏尔和哈维, 资本积累理论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现象的一把钥匙。

在马克思之后, 空间批判话语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批判, 亦即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剥削, 这是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对立。帝国主义的出现, 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

形态从自由竞争时期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掠夺式积累模式引发了资本异质性空间的对抗。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批判话语，帝国主义现象分别被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从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加以批判：列宁主要是从资本形态的演变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剥削关系；而罗莎·卢森堡主要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异质性空间的依存关系。与列宁相比，由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更加凸显空间维度，从而对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空间批判话语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

卢森堡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全球空间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空间与非资本主义空间。但是，对当代全球化而言，资本积累已经涵盖了全球化范围，真正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不复存在。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和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两种异质性的矛盾，而是每一个空间内部的异质性（即差异化）的矛盾。所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弹性积累模式导致了资本差异性空间的生产。当所有空间都被纳入到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之后，由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在各个空间内部开始了差异性空间的再生产。这种差异性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总的来看，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不仅是空间批判话语不断嬗变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彰显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于批判当代空间现象的理论价值。从马克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空间批判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马克思所理解的空间扩展主要是指资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同质化扩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对抗（如殖民地问题），而当今世界的空间扩张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异质性空间的对抗，而是在同质化的空间内不断生产出新的差异化的社会关系；其次，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and 再生产；最后，马克思更多地是在流动资本的意义理解空间的流动，而当今世界的空间现象使得固定资本理论得以凸显，在资本、技术、信息等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固定资本不断地参与到空间重组过程中，从而完成自身的价值增值过程。

虽然空间现象及其批判话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资本积累的观察视角仍然有效。第一，交换价值的生产是空间物化和抽象化的内在机制。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第三，资本的再生产是空间布局的内在机制。所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始终是空间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积累 空间批判

晚近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因其所具有的双重批判维度,而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了复杂的态度:一是在社会现实的维度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此维度上的批判显然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资本批判理论;二是在思维方式的维度上反思历史决定论思维,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sup>1</sup>,旨在恢复空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后一维度上,空间批判理论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一种服从时间霸权、凸显历史时间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进而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缺失了空间批判的维度,“马克思经常在自己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sup>2</sup>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存在“空间的空场”?

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对马克思的理论责难,我国学界的回应方式主要是深入挖掘并呈现马克思理论中有关空间批判的相关思想,由此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并未出现“空间的空场”。毫无疑问,这些学术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解,呈现出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然而,这种致思路径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毕竟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显然更为关注时间维度,如必要劳动时间、流通时间、自由时间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显性逻辑”;相较而言,马克思并未形成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空间维度的相关批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处于从属性的地位,因而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性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致思路径往往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直接与当代空间批判话语嫁接,由此忽略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当代空间批判话语之间深刻的时代差异。面对这样的困境,本文认为,空间批判之所以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形逻辑”凸显为当代空间批判话语中的“显性逻辑”,在根本上是由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性变迁所决定的。根据这一思路,本文旨在从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变迁透视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历程,并试图证明,所谓的“空间空场”并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罪,而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反映,最终证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在当代空间批判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 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同质性空间的建构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依据资本原始积累与现代积累两种模式的区分及论述,着重勾勒了资本对社会空间确立统治关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同时是社会空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转变为资本空间的过程,即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将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资本积累蕴含着深刻的空间

<sup>1</sup>苏贾:2007年:《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31页。

<sup>2</sup>苏贾:2007年:《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100页。

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sup>1</sup>。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原始要素与资本的结合，不仅意味着空间被纳入到资本积累过程之中，更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释放出来的空间必须要按照资本积累的要求而加以改造，即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

在讨论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积累：一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种则是资本的现代积累。二者的区别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将非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这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展开的积累过程；而资本的现代积累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成的资本积累，体现的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对原始积累的讨论中，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指出原始积累主要通过暴力的方法完成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之间的强制分离。除了暴力手段之外，资本主义社会还通过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完成了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原先的前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也被整合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sup>2</sup>换言之，前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是自然界所形成的，其特征是分散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空间结构就必须要把这些分散的空间整合成为一个内在统一的生产空间，即通过协作、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形成了资本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提出一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观点，即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资本的形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sup>3</sup>。根据这一区分，前资本主义空间在原始积累驱动下向资本主义空间的转变和改造仅仅是“资本的形成史”的产物。空间在资本的形成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在资本的现代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等量齐观。在资本的形成史中，传统社会土地关系的解体是资本关系生成的前提；而在资本的现代史中，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关系的前提，也是资本关系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土地和空间就不再是资本关系不断再生产的物质前提，而是资本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环节。换言之，在资本的现代史中，资本已经确立了对土地和空间的统治地位。于是，马克思在资本现代积累的视野中把握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逻辑：

首先，机器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同质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详细梳理了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69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872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51页。

等问题，这些环节作为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的环节，也带来了空间的压缩、集中和重组，由此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空间。出于资本的增殖本性，资本在机器化大生产中“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sup>1</sup>。这是机器化大工业重塑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最为直接的表现。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活空间服从于生产空间，进而被整合进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总体空间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sup>2</sup>由于生活空间服从于生产空间，所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具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中世纪的城市中，由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空间是依附于生活空间而布展；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空间则统辖了工人的生活空间，工人的生活空间乃至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这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描绘的悲惨图景。

最后，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组完成后，资本主义同质性空间向全球扩展。随着世界市场关系的全面布展，世界市场空间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生产空间，而且使得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空间开始植入全世界各地，由此形成了“世界工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同质性空间对外扩张的动力机制是“时间消灭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sup>3</sup>。所谓“时间消灭空间”，并非是指空间维度的彻底消解，而是指空间在加速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得以重组。

所以，在资本的现代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从地区空间到世界空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变成了资本主导的同质化空间，这正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效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为重要。这并非出于马克思对所谓“历史决定论”的偏好，而是出于资本积累逻辑的现实考量，因为时间维度直接关系到价值的量化，直接关系到资本的生产过程。

由于资本积累是空间整合的内在动力，因此在马克思之后，无论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列宁和卢森堡，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列斐伏尔和哈维，资本积累理论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现象的一把钥匙。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虽然资本积累的模式在不断变化，空间图景也随之改变，但是资本积累理论对于社会空间的支配作用仍然有效。因此，无论资本逻辑的现实展开过程如何变化，只要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空间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深刻思考，就仍然适用于当代的空间批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546-547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年，第531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538页。

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为当代社会的空间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 二、垄断资本主义掠夺式积累与异质性空间的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空间现象的内在关联，但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未完全预见到随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的时代特征。在马克思之后，空间批判话语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批判，亦即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剥削，这是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对立。帝国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从自由竞争时期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根据资本积累理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对立，其根源是资本的掠夺式积累模式。

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批判话语，帝国主义现象分别被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从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加以批判：列宁主要是从资本形态的演变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剥削关系；而罗莎·卢森堡主要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异质性空间的依存关系。

列宁依据资本形态的演变深刻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的资本形态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从等级资本到商业资本，继而再到工业资本的资本形态的跃迁过程，认为其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而在列宁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已经从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这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正如列宁所说，“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sup>1</sup>

正是由于从金融资本出发，与马克思在资本现代积累理论中的殖民地批判相比，列宁对帝国主义殖民地批判具有鲜明的特色。马克思就现代资本积累方式和夺取殖民地空间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是在商品资本意义上展开的，而列宁则是在金融资本意义上讨论殖民地问题。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争夺原料产地。在殖民扩张下，帝国主义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剥削关系：“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sup>2</sup>列宁从资本形态的演变出发，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空间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召唤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为此，列宁在帝国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革命策略，比如殖民地解放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策略，

<sup>1</sup>列宁，2001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38页。

<sup>2</sup>列宁，2001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74页。

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进行革命的策略等等。

如果说列宁是从资本形态的纵向维度批判帝国主义，那么，罗莎·卢森堡则是在资本积累的横向维度批判帝国主义。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重要的是解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要有不断增长的生产资料和消费的需求，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只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社会，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随后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物质形态的生产、消费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或者说，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以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和必备要素。正因如此，资本的发展必然要求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排斥简单商品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sup>1</sup>

与列宁相比，由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更加凸显空间维度，从而对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空间批判话语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

首先，卢森堡注重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出发来看待帝国主义。这是卢森堡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对于全球化而言，从资本的生产的一般性分析是无法真正揭示出全球化的经济机制和内涵的，必须要从再生产出发，也就是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出发。此后，以列斐伏尔、苏贾、哈维、杰索普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均是在改造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概念的基础上对全球化空间实践加以理论阐发。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仅仅是物质资料层面的扩大再生产，而没有看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正是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概念的基本缺陷所在。如果忽略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维度，那么资本积累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按照这种逻辑，卢森堡就势必推演出资本主义崩溃论。事实上，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几次危机之后并没有崩溃，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已经涵盖了全球化范围，真正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不复存在。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和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两种异质性的矛盾，而是每一个空间内部的异质性（即差异化）的矛盾。而这种空间异质性矛盾的内卷化，则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实现的。

同时，卢森堡的批判路径是资本积累理论。正因为全球化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因而，资本积累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看到，许多后来的空间批判理论家都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无非他们在资本积累的内涵上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概念有所改变而已。在卢森堡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是以异质性空间为前提而展开的，即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这样资本积累才得

---

<sup>1</sup>卢森堡，1959年：《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376页。

以可能，殖民地问题才作为空间转移的表现形式而得以凸显。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刚性积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被弹性的资本积累所替代。

虽然卢森堡的理论在其生前饱受批判，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却被重新激活并加以改写。公允地说，卢森堡从资本积累出发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哈维的空间批判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理论环节。正是由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成为批判当代空间现象的有效工具，所以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家们注意沿着卢森堡的道路继续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空间背后的资本积累机制。

### 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弹性积累与差异性空间的生产

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逻辑又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中进行空间布展。对于这一社会历史阶段，詹姆斯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维度的凸显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空间领域中的主题不再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现象，而是空间的生产、流动和重组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空间维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重心正在从“物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超于地理空间限制，从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的过程。如果说异质性空间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形态，那么差异性空间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形态。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的弹性积累将在世界范围内重组空间格局。对于资本而言，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异质性不复存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均质化的空间。然而，均质化空间的出现并非意味着资本积累的终结，恰恰相反，均质化空间是资本积累改变模式的前提。当所有空间都被纳入到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之后，由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在各个空间内部开始了差异性空间的再生产。这种差异性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是完全一致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差异性空间的生产经由如下的环节进行的：

首先，后福特制的资本积累危机要求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空间修复”，“空间的生产”由此出场。所谓“空间的生产”，不同于“在空间中的生产”，是指空间本身根据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律被再造出来，表现为空间的重构和重组。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因为资本的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充分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就能安然度过危机。列斐伏尔注意到，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空间成为吸纳剩余资本的最佳载体。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城市建设等固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由此也就形成了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过程。这就是列斐伏尔的资本次级循环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

其次，后福特制的资本弹性积累模式要求空间与时间相分离，此即“时空压缩”现象的出现。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由“更加灵活的积累模式”所导致的时空体验方式的变化。



他认为，生产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加速周转，这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而空间的障碍也因为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而崩溃。正是因为时空的高度压缩，使得空间本身不断被抽象出来，有利于空间的快速重组，这与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是相一致的。正如哈维所说：“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sup>1</sup>

最后，后福特制的资本弹性积累模式进一步要求空间与具体场所相分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空间的流动性。詹姆逊指出，“我们所称的后现代（或者称为跨国性）的空间绝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sup>2</sup>。与前两个发展阶段不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本身变成了自由浮动的东西，从它产生的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sup>3</sup>。场所与位置不再固定，恰恰相反，空间呈现出了流动性，因此资本积累具有“去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sup>4</sup>，“为资本的转移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隔阂”<sup>1</sup>，大大提升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覆盖范围。

作为资本积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形式，弹性积累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差异化空间不断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被生产出来，从而重新结构化为一种新的空间总体，从而满足资本的价值增殖需求。正如詹姆逊所说，资本的全球扩张既生产着标准化，又伴随着去中心化、差异化和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弹性生产的空间布局，原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矛盾和对立现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对立具有总体性特征，即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双方在空间上对抗。然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这种空间对抗模式不再是总体性对抗，而是差异化的空间对抗。资本的全球布展使得全球性与本土性相互交织在一起，本土性所具有特殊性与其说是对全球性普遍化力量的对抗，毋宁说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是物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是差异性的再生产，这必然会影响到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生产，即使空间生产在生产出差异性的同时符合总体性的布局。与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交织的态势相呼应，资本逻辑在空间布局上也呈现出了总体性与差异性相互交织的局面。

从马克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空间批判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所理解的空间扩展主要是指资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同质化扩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对抗（如殖民地问题），而当今世界

<sup>1</sup>哈维，2002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370页。

<sup>2</sup>詹姆逊，2004年：《詹姆逊文集》第4卷，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95页。

<sup>3</sup>詹姆逊，2000年：《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8页。

<sup>4</sup>詹姆逊，2000年：《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50页。

的空间扩张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异质性空间的对抗,而是在同质化的空间内不断生产出新的差异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形态从“人的相互依赖性”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过程中的空间转型,他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and 再生产;马克思更多地是在流动资本的意义上理解空间的流动,而当今世界的空间现象使得固定资本理论得以凸显,在资本、技术、信息等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固定资本不断地参与到空间重组过程中,从而完成自身的价值增殖过程。当今世界的空间现象的新特征与经典的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是时代所造成的,而非马克思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

进一步来看,即使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对于当代空间批判仍然具有理论穿透力,其价值与启示主要体现为:

第一,交换价值的生产是空间物化和抽象化的内在机制。空间要想不断地流动和重组,其前提条件是空间本身要被物化和抽象化。只有当空间被物化后,空间才能被作为商品买卖,进而作为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而加以利用;只有当空间本身被抽象化后,空间才具有同质性、空洞性和流动性,才能在资本增殖的本性驱动下被加以不断地重组。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根源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内在的丰富性都被抽象为可以计算和交换的“量”。只有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中,空间才能作为物化和抽象化的东西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中,参与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也正是因为空间被同质化和抽象化后,资本才能实现“脱域”机制。

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代表了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的出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着眼点在于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而非工作日时间的无限延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越来越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率以及不断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有效手段。在此意义上,空间的集聚过程意味着工人通过集体劳动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消费,以及由此在一定场所内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管理模式,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服务。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如果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得以重塑的内在动力,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全面变革就必须要在资本积累的意义上加以把握,在资本积累的运行过程中,生产空间不仅是被简单地定型,而且也进入到了流动过程中,全面地介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图景才能得以完整地呈现。

第三,资本的再生产是空间布局的内在机制。空间一方面在集聚,另一方面,空间又在分离。空间的分离和集聚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空间布局的两种形式,二者看似对立,都内在于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局过程之中。资本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就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因

---

<sup>1</sup>詹姆逊,2000年:《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9页。

此，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特征，这必然导致空间中生产的扩张。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重置和集中就是城市化。这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社会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纵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分离等布局，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化形式。

总体而言，正是由于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空间批判从原先的“隐形逻辑”逐步凸显为“显性逻辑”。无论资本积累模式如何变迁，空间批判话语如何嬗变，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始终是空间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理论地平线。

# 商品美学：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的新维度

张晓萌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在技术设计的作用下日益呈现出“美学”特征, 浮华的外观和诱人的宣传构造的商品幻象通过与消费体系和资本市场紧密结合, 重构了人的价值观和行动逻辑, 使得人们在追逐物质商品的享受中失去了批判和反抗的能力, 造成人的生存异化局面。商品美学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型统治策略的真实呈现, 透过消费社会现象追问消费行为体系背后的生产体系和资本逻辑, 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不仅是关乎人性的哲学主题, 也是建构现代社会正义的制度议题。

**关键词:** 消费社会 商品美学 生产 正义 意识形态

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及技术理性的发展, 使得商品在技术的设计下披上了“华丽的外衣”, 日趋呈现出“美学”特征。诱人的外观和夸张的宣传所构造的商品幻象, 通过与消费体系和资本逻辑的合谋, 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了成功地重塑。商品美学的感官形象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也更加具有吸引力, 因而对商品美学的批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在《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一书中, 透过高科技资本主义闪亮的商品美学表象, 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 并思考其背后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豪格认为, 人们不应该在商品幻象的迷宫中失去自我, 需要识破商品幻象, 保持主体独立。

## 一、 消费社会中的商品美学与内在价值属性

商品美学是什么?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认为, 追溯商品美学的起源, 首先需要着眼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矛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性, 在每一次的商品交换过程中, 交换的双方处于对立的立场上, 一方想要获取使用价值, 另一方想要获取交换价值。当货币作为中介被引入到交换过程, 虽然使得原先的交易过程便捷化、普遍化, 同时也加剧了原先就存在的二重化矛盾, 使得商品成为了一方追求的目标和另一方换取货币的手段。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形态, 货币所有者需要通过让渡货币, 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商品所有者则需要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 从而得到货币。

交换关系的利益对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激烈。因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

产,使得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求,而为了及时地出售商品,成功地换取货币,换取代表抽象意义上财富的金钱,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购买者消费,例如他们常常夸大商品的效用、对商品进行精美地设计和包装。在出售和购买的这个体系中,美学外观开始出现,商品以一种夸张的外表形象登场,商品的使用价值承诺被设计为独立的销售功能,成为换取货币的手段。

这里所使用的美学概念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艺术概念,艺术概念的使用方法容易引起误解,所以他本人“主要使用这个概念在学术体系中曾被赋予的含义,即感性的认知,也就是将美学这个概念用来表示由感知所获得的认识。”<sup>959</sup>从这个含义出发,商品美学具有双层规定:“一方面是‘标准美’,也就是说作为意义的表现方式应该与所表达的含义相匹配;另一方面,是在交换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美,并且是印刻在商品之上的那种美,从而引起旁观者拥有这些商品的欲望,并导致购买行为的发生。”<sup>960</sup>商品因为其某种美好之处吸引着人们,如外观的华丽、设计的精美等等,从而引起他们的感性兴趣,并推动着人们去购买、去消费。

商品美学的核心在于通过特定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将感性的事物世界逐渐塑造为人们的感官愉悦。”<sup>961</sup>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日益兴盛,使得体现商品美学的外表逐渐从商品中剥离,其最终意指是与商品的实质内容即使用价值彻底分离。商品生产者和设计者通过研究人们的感性世界,并通过大众传媒、现代科技等手段使商品“实现各种外观的改变,并将商品塑造成各类可能的感知形象,经过乔装打扮后的商品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具有自我欺骗性的意识——精美的包装和华丽的外表愈发具有吸引力,借助强大的技术而实现的完美外形使得人们误以为商品具有被高度承诺的使用价值,几乎没有人能够对这种极致与完美无动于衷,于是逐渐形成选择偏好并自由主动地进行商品消费。因此,商品美学是商品外观通过技术所呈现的幻象的表达,人们对商品幻象的关注稀释了对商品真实使用价值的关心,最终导致消费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满足感。人们对直接的使用价值的理解转变为对商品的联想和感觉,并以此驱使自己的消费行为。”<sup>962</sup>

商品生产者和设计者成功地制造了感性的商品世界,通过外观精美的设计、夸张诱人的口号宣传,使得消费者不断地追求消费时尚和流行产品,讲究商品外观的美感分量和符号象征价值。进而,作为商品首要属性的使用价值退居其后,商品的外观优先于商品的内在品质,消费行为本身以及代表的文化符号从过程转化为人的目的。对此,鲍德里亚指出,今天符号价值的消费已经构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流通、购买、销售,对

<sup>959</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 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页。

<sup>960</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 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页。

<sup>961</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 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页。

<sup>962</sup> 张晓萌. 正义维度下的消费社会批判——兼论沃尔夫冈·豪格的商品美学理论[J]. 理论视野, 2016 年第 4 期。

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sup>963</sup>在消费社会中，商品蕴含的符号构筑了意义的世界，外在形式和宣传“话语”虚构了美学的世界，商品的真实性愈发稀薄，人们在意义和美学的世界里追逐商品的符号价值，在消费行为中获得自我满足并洋洋自得。

商品美学的运作逻辑用光鲜的表象掩藏了现实的残酷性，大众陶醉于技术所营造的繁荣景象而难以自拔，沉溺于人为制造的商品世界与感官享受而无法超脱，沉浸在资本所鼓吹的众多需求而盲目追逐，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性、批判性，最终在消费的过程中沦为被动的、受操纵的客体。置身于消费社会，大众需要消费行为和商品本身来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在无穷无尽的消费行为中，从一个商品符号滑向另一个商品符号。

## 二、商品美学是资本逻辑的真实外化

商品美学作为消费社会统治逻辑的真实呈现，一方面受资本逻辑的主导，另一方面又对大众意识形态进行控制。豪格继承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通过控制幻象和人的感官而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商品美学所带来的变化是一种以幻象为基础的生产、交换、消费体系的重新组合，它使得商品生产的方式、交换买卖的过程以及消费体验的行为都有了新的形式。所有这些变化都总是与商品美学新的跨界形式以及新的权力运行机制相伴而来的。商品美学要真正发挥作用，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运作，更需要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合谋。

资本的逻辑使得商品被赋予了某种进攻性，商品美学成为了贪婪和掠夺的化身，主动地向消费者发起看似“美学化”的实则“暴力性”的攻击。通过大众传媒和现代技术手段，资本对某些特定的态度产生影响，建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消费方式。这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也是权力逻辑和统治逻辑的真实呈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资本那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观专断，除非它能够支配钱财。”<sup>964</sup>

资本不断扩张和增殖的内在动力敦促甚至裹挟着人们无限扩大消费的边界。为了让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本不断增殖，资本家就需要大量地生产并出售商品，并通过借助于技术手段吸引消费者去购买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而且购买得越多越好。“在消费被控制和引导的社会中，个人的欲望被创造和操控，人客观地沦为与商品同等地位的存在者。然而商业化的手段却制造一种幻象，将人们捧为自由消费的‘主体’，大众也乐意接受这种意识上的控制，仿佛自身就是消费的主人，享受所谓的‘自由’。”<sup>965</sup>人们更为主动地加入到对

<sup>963</sup>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福、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1 页。

<sup>964</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 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 [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7 页。

<sup>965</sup> 张晓萌. 正义维度下的消费社会批判——兼论沃尔夫冈·豪格的商品美学理论 [J]. 理论视野, 2016 年第 4 期。

感性商品的追逐之中。表面上看人们的消费是出于自由自愿地选择，视消费为主动的、非控制化的自然状态。但事实上，在这个感性的世界和与它保持协调的主观感觉系统后面，是资本的“多头巨兽”在真正发挥作用。“优胜劣汰”是资本世界的生存法则，每个资本个体都想尽可能多地吞掉其它个体，资本如果停止了扩张和增殖，便无法实现自身的生存，以获取利润为目标是消费社会运作的根本动因。豪格认为，正是资本个体在努力扩张和增殖而普遍存在的相互对抗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由多彩的外表和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发挥着吸引购买者和他们的钱财的作用。”<sup>966</sup> 身处此种状态下的消费者其实并不是基于自己真实的需要而购买，仅仅是充当了一种购物和消费的机器，为了购买而购买，为了消费而消费。

对此，马克思通过“商品的惊险的跳跃”（The salto mortale of the commodity）<sup>967</sup> 深刻地做出回应。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客观规律要求它自身必须不断地开辟新的市场，永不停滞地开发人的新的需求，引诱着人们在永无尽头的消费活动中放逐欲望的同时，也为生产创造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追求欲望的消费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享受性活动，更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些膨胀的欲望、伪造的需求又是如何来的？豪格认为，“美学革新承担着需求再生的功能，它简直成了影响人类的力量和机构，也就是说，美学革新不断地改变着人类这一物种的感官组织：不仅是在具体的设施和物质生活方式方面，而且也在感觉、需求满足和需求结构上。”<sup>968</sup> 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的文化成功地塑造了人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念。高科技资本主义借助广告媒体等现代技术载体，对美学文化持续不断地革新，通过设计新的商品外观，引导新的消费潮流，从而刺激人们新的购买欲望。资本主义借助于现代技术为载体的商品美学的持续革新和消费文化的成功塑造，人们对消费的追逐便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以及态度行为模式。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在商品美学、技术媒介、文化塑造的彼此推动中，形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

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消费形式以及文化媒介、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使得人们陶醉于商品构筑的符号与景观，沉浸在对物质的享受和迷恋中，不仅丧失了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也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和反抗性，成为异化的、“单向度”的人。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刺激人的欲望和需求，引导着新的消费时尚潮流，人们不得不做出新的牺牲，沦为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sup>969</sup>

<sup>966</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7 页。

<sup>967</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137 页。

<sup>968</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3 页。

<sup>969</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23-224 页。

### 三、人的主体性回归与消费正义重构

商品美学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合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工业。在商品的过度宣传和包装中，人们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念被重构，人们的真实生活和幸福的标准被商品符号所定义，被一种盲目而无所适从的，甚至是一种自我感知为“多样化的自我表现的机会”的消费状态所界定。“消费主义使得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念被重构，‘真实的消费’”和‘想象的欲望’之间边界消失，人们对商品蕴含象征价值和意义的关注超越了人对主体精神的关注，进而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sup>970</sup>“购买者们以处于社会性的不安全中为代价，获得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多样化的自我表现的机会，以及对日常文化的过度消费。”

971

“商品美学只是用表象来满足人们，因此与其说它让人们感到饱足不如说给人们带来了饥饿。”<sup>972</sup>商品世界作为一种幻想意义的载体开始凸显，人的世界因欲望的角逐而开始堕落，商品美学世界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被批量化制造，在幻象的空间内增生繁殖，继而在充分刺激和满足人的感官欲望的同时，让消费者主动地享受这场充满虚拟幻象的精神狂欢。商品美学制造的美好的梦幻世界，使得对幻象的拟制代替了生活的真实，对欲望的追逐代替了真实的需求，人们困陷于自己制造的没有出口和边际的“商业迷宫”，在这里，“墙”是“由图画和出自图画的图画所构成，因此图画上的‘奶酪总是不断地再翻倍’”。这样的世界在它的正式结构中总是那么‘使人受到扰动，如同它在内容上空洞无物的枯燥。’”<sup>973</sup>人类在自己所构建的“商业迷宫”中迷离徘徊，原先的精神家园不复存在。

要想抵制商品美学的侵蚀作用，首先必须弄清楚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工商业资本对大众的欺骗最终还是通过大众的自我欺骗，才可能发挥作用。“没有百姓自己的鸦片，就没有给百姓的鸦片。”<sup>974</sup>对消费者的哄骗是否能够最终诱骗消费者进行消费，商品美学的意识形态价值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都取决于消费者的青睐和选择。商品美学使得人的消费逻辑被成功改造，人的批判意识被彻底抹平，人们开始接纳商品美学的诱惑，放逐自己的欲望，并主动迎合资本的需求，甘愿成为被控制的对象。

商品美学导致人的消费异化并受到否定，就在于它不仅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扭曲和异化了需要，使之成为欲求。只有当我们的消费不是基于“我渴望要”，而是“我真的需要”

---

<sup>970</sup> 张晓萌. 正义维度下的消费社会批判——兼论沃尔夫冈·豪格的商品美学理论[J]. 理论视野, 2016年第4期。

<sup>971</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64页。

<sup>972</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7页。

<sup>973</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26页。

<sup>974</sup>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43页。



时，才能逐渐摆脱被剥夺自主权、被控制的危险。商品美学批判正是重拾哲学批判的传统，将批判的对象直指消费社会的幻象化、欲望化、符号化。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认为，人们不应该在商品所构建的景观社会中迷失原有的价值，丧失原有的社会风尚和传统。消费社会必须接受正义的审视，重新构建一种基于正当需要的消费伦理。

以批判的思维审视消费社会，不仅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主题，也是建构现代社会消费正义的制度议题。雅克·卢梭在谈到财富时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sup>975</sup>消费正义要求人们能够理性区分正当的需求和伪造的需求，人们只有掌握消费的自主性和决定性，并积极地融入社会，达到个性和和社会性的平衡，才能够实现一种自由的和创造性的生活。

当然，对商品美学所导致的人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从根本上对消费行为进行彻底解构和抛弃，而是抵制过度享乐和纵欲式消费主义的盛行，抵制被商品美学、技术理性等伪造的需求所操纵，避免人类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共同构筑的“商业迷宫”中迷失方向。商品美学和技术理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目的意识和控制力度，塑造了新型的适应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人。当技术从手段蜕变成目的，当需求从基于真实蜕变为基于欲望，当商品从生活的必需品蜕化为炫耀的消费品，这些不仅导致了人的生存境遇的异化，使得人沉浸在对物质的享受和追求中而无法自拔，更导致人们失去了对崇高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追求，面临人的价值的迷失和社会风尚的堕落。面对资本所制造的商品美学幻象，人们应当重拾批判性、自主性，走出商品美学所制造的“文化迷宫”并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一切安宁和一切欢乐都是有意识调节的结果，都是自主性和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sup>976</sup>因此，人的有意识的调节，人的自主性和批判性的回归，使人得以超越自身的欲望和虚假的需求，建构基于正义的社会伦理和消费文化。

作者简介：张晓萌，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sup>975</sup> [英] 阿兰·德波顿. 身份的焦虑[M]. 陈广兴、南治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7 页。

<sup>976</sup>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88 页。

# 二律背反的金融化世界

## ——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哲学反思

张 雄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20世纪人类的历史，从前50年的世界性战争，走向后50年的全球理性化社会转型。殊不知，一些对资本金融高度敏感的国家，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智能化资本运作工具创新的全球战略：以投行金融为主导，以全球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流动性和金融合约为特征的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打造与实施。毫无疑问，如此金融战略的拟定，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21世纪，可谓是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卡兹所言：“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呈指数增长。”“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通常而言，经济金融化是指全部经济活动总量中使用金融工具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它是经济发展水平走向高端的显现。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位置。社会在诸多方面受到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并产生实质性影响。毋庸置疑，金融化世界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标志，其积极的正能量作用不可低估。但过高的社会成本，过度虚拟和无节制衍生带来的生存风险，利益冲突引起的结构性社会矛盾，短期投资行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创巨痛深的。

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金融化的生存世界是个高度经济理性、高度世俗化、高度价值通约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二律背反的生存世界：人的精神本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异化更趋深重，金融的“让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因此，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世界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创新，人类自从有了经济活动，也就有了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本质上是人类追求自然历史化的意志显现，是人类根据自身实践需要而不断开拓生存时空资源的诉求。但现实的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已偏离了本质。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相比，21世纪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秉性没有变；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没有变；资本的财富杠杆效应没有变。但是，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以资本金融为主的现代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分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资本金融与传统的货币金融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它特有的强势和控制力：一是通过从传统的债权关系

向股权关系的跨越，使生存世界的关系交往，变得更灵活便捷、更值得利益期待。二是资金来源从个体到全社会的配置，更强化了金融对社会的穿透力。三是融资模式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变化，大大提升了资本的渗透性和流动性，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21世纪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已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率远远不及资本的收益率，劳动报酬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资本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率为什么能如此偏离全球经济正义的轨道而狂奔？为什么能如此脱离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规制而任性？鲁道夫·希法亨早在《金融资本》巨著中就得出重要结论：“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这说明，金融资本发展的脱域性极易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利与资本的交易必然带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收益率高倍增长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乃是金融化世界最深刻、最普遍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在全球资本高倍收益率的背后深藏着马克思所忧患的社会劳资关系对立的性状，金融资本实质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证明了相关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人权发展的不平等性。金融资本，它的私向化程度愈严重，其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愈充分，金融与人民的对抗性矛盾愈尖锐。

总之，随着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

公允而论，金融的正常体验与人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但过度充盈的金融意志、行为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已构成现代人必须与自己进行自我交战的深刻根源。首先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直接导致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和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日趋衰减，导致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难以通融。其次，生存世界的金融合约化极易导致人类历史化意识淡薄，金融结构的语义系统与金融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构成系统发生认识论断裂，意义世界被彻底地平面化了。再者，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和任性。通过对金融化世界的精神现象学解读，可以深层揭示21世纪人类精神本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相异化的问题，从而为客观理解21世纪资本范畴提供精神向度的思考。

对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是将人类引入更为深刻的形而上的问题思考。首先，它需要我们从未加反思状态进入反思状态。只有通过反思才能把握比金融更抽象的社会存在论的思辨道理。现代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归属现代性发展的高级形态，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深藏其中：欲望与理性的对立、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等。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触及现代性与金融化资本主义本质的关联性。金融在场性的缺陷，本质上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的实践局限、理论局限和制度局限的反映，它证明了主观精神与精神的客体化沉沦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更深刻地证明了那种靠马基雅维利的“欲望动力论”、斯密的“社

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哈耶克的经济个人主义教条的历史进化模式以及价值观，延续至今，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世界文明的整体主义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摧毁。世界期待着新的价值观的整合，期待着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进步意义的精神引导，期待着具有整体主义精神对碎片化地球的整合。其次，21世纪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已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冲突，金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而“金融与好的社会”的结合，它深层次关联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在场性。最后，根本上解决世界两极分化问题以及资本发展的主观性、任性和脱域性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人民性和政党的先进性相一致的政治理性框架中，才有可能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效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从追求人类利益的共同体上升到追求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融资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中国资本的创新模式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唤醒的学术事件。从斯密的《国富论》到今天中国试图创造的《人民财富论》，这是一个十分艰辛而又伟大的制度创新，它有可能超越金融化资本主义制度范式，但理论上是容易的，实践是困难而又漫长的，其间充满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至少有两个视域的问题值得研究：（1）大力促进社会主义资本发展在何种意义上是积极的、有效的、正能量的？让资本在社会主义阳光下最大化运行，重要的是解决哪些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和改革实践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生关系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内生关系如何认知？在社会主义，资本发展独特的制度优势、精神资源优势是什么？（2）资本金融如何从金融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即把追求经济最大化效益扩延为追求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效应，回归金融本质的目标：不是“嫌贫爱富”，而是服务民众。如果目标是霸者恒霸，如现代美国的金融目标：让全球资本流向华尔街。不考虑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机会共享、利益共享，那么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但是如果它能够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金融将是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当然，这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为世界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历史期待。

# 非物质劳动与创造性剩余价值

## ——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1

张一兵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210093)

出版于千禧之年的《帝国》<sup>2</sup>已经是一本老书，它的作者奈格里<sup>3</sup>和哈特<sup>4</sup>如今也都已经当红的左翼批判理论家。也因为这本书是面对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率先对这一现象的政治层面进行理论化”<sup>5</sup>的尝试，有人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高尔丁死结”<sup>6</sup>的新的破境尝试<sup>7</sup>，所以这本书一时间引起了广泛关注，齐泽克甚至用了“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疑问<sup>8</sup>。现在，最初关于这一文本最热闹的讨论似乎逐渐消失在风中，连奈格里和哈特自己也开始寻求新的话题了。我倒觉得，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sup>9</sup>经典文本之一——《帝国》可以读得更好更深一些，进而有可能说清楚它的根本性失误，甚至突现出一些作

<sup>1</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sup>2</sup>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中译本由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sup>3</sup> 安东尼·奈格里 (Antonio Negri, 1933-): 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 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 世纪 60 年代曾参与组织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Autonomia Operaia)。1967 年获得教授资格。1978 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 1979 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大纲课程：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1979 年，奈格里因牵连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后流亡法国 14 年，在法国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1997 年，在刑期从 30 年缩短到 13 年后，奈格里回到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一批有影响的著作。1994 年，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酒神：国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之后，二人又相继合作出版了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Empire*, 2000)；《诸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11) 等。

<sup>4</sup> 哈特 (Michael Hardt, 1960-): 美国当代左翼学者。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题为德勒兹研究，1986 年遇到奈格里，他也是奈格里的学生和后来的主要合作者。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除去与奈格里合作的论著，1993 年出版博士论文《德勒兹：哲学学徒期》(*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sup>5</sup> Mark Poster,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e*,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101-118. 中译文参见杨玲译稿。

<sup>6</sup> 高尔丁死结 (Goulding knot): 此词用来比喻无法解开的疑难问题。出自流传于古亚细亚的一则寓言，相传弗吉尼亚的戈迪亚斯王在其牛车上系了一个用套辕杆的皮带奇形怪状地纠缠起来的复杂结子，并声称，谁能解开这个奇异的“高尔丁死结”的人就会成为亚细亚之王，但所有试图解开这个结子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

<sup>7</sup> [美]拉史可：《作为全球化》第一哲学家“的彼德·斯洛特戴克”，载《生产》第 11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6 页。

<sup>8</sup> Slavoj Žižek, *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13:3-4, 190-198.

<sup>9</sup> 晚期马克思主义 (Late Marxism) 是我在 2000 年提出的概念，它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见拙文：《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2000 年第 4 期；《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者本人也没有达及的可能性构境中去。这里，我试图从一个新的构境论视角切入《帝国》的激进思想构序，以重新激活这一“片面深刻”的批判话语的生命力。我认为，《帝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将意大利晚期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之下的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研讨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界。其中，尤其是关于非物质劳动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以及这种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和新的本质特征的讨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网络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这种非物质劳动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支配关系的根本改变，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共产主义要求。

## 1、信息革命与后现代工业

应该说，奈格里和哈特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99年，奈格里在一封书信中这样谈到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说，

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我仍然如此。那么，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里，有一个创造性的概念，它既体现为生产的过程，也体现为再生产的过程——既体现为商品的建构，也体现为生命的发明。在马克思那里，活生生的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并且，随同历史性存在，它也是一切创造性的母体。在马克思那里，就如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由生产建构的。<sup>1</sup>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奈格里的思想构境中，马克思所指认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为社会历史存在的根本性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被坚持的，他也明确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令我惊异的是，他竟然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二人在“存在是由生产建构的”上的一致性，不过，生产在后者那里被哲学化为**打交道的关涉**（*Sorge*）。所以，从生产和生产方式来观察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自然是奈格里和哈特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前提。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古以来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生产方式：第一是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第二是通过超出自然存在的工业生产耐用品的商品经济，第三则是今天以信息生产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经济。这是基本准确的历史判断。

自中世纪以来三个独特时期的经济范式的延续，每一个均受主要经济部门的界定：在第一个范式中，农业与原材料的开采（*extraction of raw materials*）是经济的主体；第二个

<sup>1</sup> [意]奈格里：《艺术与诸众》，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范式中，工业与耐用品的制造（manufacture of durable goods）占据着优势地位，在第三个即目前的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providing services and manipulating information）则是经济生产的核心。<sup>1</sup>

显然，从形式上看，这不算什么新观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sup>2</sup>就已经指认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sup>3</sup>后来被记者托夫勒<sup>4</sup>通俗地表述为人类社会文明中的“三次浪潮”。<sup>5</sup>但从内容上看，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还是其独特的地方，他们坚持了**生产对象被加工的构序方式**决定经济范式的正确构境意向。自然原料的开采和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然经济的性质；超自然的工业生产方式和耐用产品决定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而处理信息和服务式生产方式则决定了后工业经济的到来。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从第一种经济模式到第二、三种模式的转换，有一个递进的历史过程。但当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居主导地位时，前一个模式并不是被消灭了，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内居于新的模式之中。这倒真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中的观点。比如，当工业生产模式成为主导时，农业生产模式并没有消失，“它依旧是现代工业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但它现在是一个改造后的工业化了的农业”。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造了与重新定义了所有社会层面的要素。当农业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时，农场逐渐变成工厂，随之而来的有所有工厂的纪律、技术、工资关系等等。农业就此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更普遍的是，社会自身缓缓地受到工业化，直到改变人的关系和人性本质（human relations and human nature）的程度。社会成了工厂（factory）<sup>6</sup>

这是对的。经济模式的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存在本身，特别是人的**关系存在**。工业化是使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成为工厂生活。农业现代化的同时，更多地是从自然存在方式中转换为人工物质塑形方式中来。当然，奈格里和哈特突出强调工业经济主要是生产耐用物品可以从双重反向构境中衬比：一是自然经济的产品多为易损的动植物类的自然物，二是之后后工业经济中为了被替代的**技术缺陷商品**。技术缺陷商品是指今天商品生产中被故意设置的缺陷，并不一定真是一种质量上的问题，它们往往是在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关系中被显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28-329 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p.280.

<sup>2</sup>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代表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73);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6) 等。

<sup>3</sup>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锴等译，新华出版社 1979 年版。

<sup>4</sup>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28—2016): 美国未来学家。代表作为:《未来的冲击》(1970);《第三次浪潮》(1980);《权力的转移》(1990) 等。

<sup>5</sup> [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 1980 年版。

<sup>6</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29 页。中译

摆出来的凸状式弱点。这种技术破坏的结果，是无意识地让你人为地更新时尚物品。

很明显，奈格里和哈特此处论说的重点是从第二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的转换。他们断言，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走向终结**（*modernization has come to an end*），整个西方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化或信息化的进程之中。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更替，当然也是资本帝国建构的经济基础。依他们的看法，“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的劳动’”。<sup>1</sup>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断言了。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更明确地指认过这一转换发生的具体时间，他说，“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非物质劳动’”。<sup>2</sup>依他们的理解，“从工业的统治到服务和信息的统治过程称为一个经济**后现代化**（*economic postmodernization*）过程，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信息化**（*informatization*）”进程。<sup>3</sup>后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生产带来的革命进程。这一进程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服务业和信息化。

其一是**服务业**（*Services*）的兴起，突出表现为劳动力开始从工业向服务工业(第三产业)的迁移。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出现的实事是，

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与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mobile*）的，涉及到各种灵活的技巧（*flexible skills*）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knowledge, information, affect, and communication*）为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称后工业经济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sup>4</sup>

这是说，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的特征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知识、信息和情感的交往，这种交往又摆脱了工业生产的凝固性，成为一种高度移动的信息化劳作和更加灵活的技能。这当然是指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高级阶段出现的状况，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行业中，并非都是信息化的知识经济。

其二是**信息化**（*informatization*）带来的社会革命。其实，这个观点也是拉扎拉托提出来的，他明确认为，“后工业企业和经济都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操纵之上的”。<sup>5</sup>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信息化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它的本质是“灵魂生产（*production of soul*）”，这是“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控制论智能（*cybernetic intelligence*）来代替工业机器的传统技术”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的技术层面上，新型的信息化生产是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

---

文有改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p.280.

<sup>1</sup> [意、美] 奈格里、哈特：《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sup>2</sup> [意]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29页。

<sup>4</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272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p.280.

<sup>5</sup> [意] 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控制论智能”取代了传统工业生产中的物性机器运转；二是信息化生产被从哲学上定义为“灵魂生产”，它甚至创造了人类活动的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将信息化的本质定义为“灵魂生产”是不准确的，灵魂概念属于诗性话语，而不是科学的规定。相比之下，奈格里和哈特的哲学修养还是弱一些。在维利里奥那里，远程登陆的网络信息技术被定义为**存在论上的远程在场论**。维利里奥认为，在海德格勒的存在论中，在场总是此在当下的在此，在及物的关涉操持中，我们上手事物，自然通过向我们涌现而解蔽为真理，功能性的上手操持结构之链接则环顾为周围的世界。然而，今天的网络信息化远程登陆的即时在场却总是在远程他处，它破坏了在场的在此性。<sup>1</sup>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恰如工业化进程改造了农业并使之更加多产一样，信息革命也将通过全新界定与激活生产过程来改造工业”。这也就是说，信息化首先是要通过改变生产过程本身来变更全部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且，再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变全部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的认识方式。这是对的。因为，信息技术的“互动的和控制论的机器（Interactive and cybernetic machines）融入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眼球晶体，从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义肢（new prosthesis），通过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本身进行了再定义。计算机空间的人类学实际是对新的人类境况（condition）的一种认可”。<sup>2</sup>由计算机技术开辟出来的新空间中，信息技术创造出来的电子化装置更新甚至取代了我们的感官，电脑替代了人脑，正生成一种新的电子化义肢人类学。很显然，当奈格里和哈特讨论到自然科学的问题时，明显气短一节。波斯特<sup>3</sup>就认为，“他们在使用‘高科技’一词时，其实对‘高科技’并没有基本的了解”。<sup>4</sup>这个判断基本上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知识背景显然不如斯蒂格勒。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系统地说明了技术义肢特别是网络技术化条件下的数字化义肢问题。<sup>5</sup>

依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在这种人类境况的改变中，计算机的应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互动式的思考（increasingly think.）而通讯技术和它们的互动模式（model of interaction）越来越成为劳动活动的中心。计算机的一个新方面在于它能够持续地通过应用来修改（modify）其自身的操作。即使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最原始的形式也允许计算机在其和用户及环境的互动（interaction with its user and its

<sup>1</sup> [法]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38 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p.291.

<sup>3</sup>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1941-）：美国社会批判理论家。1968 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代表论著：《信息方式》（1990）、《第二媒介时代》（1995）、《互联网怎么了》（2001）等。

<sup>4</sup> Mark Poster,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101-118. 中译文参见杨玲译稿。

<sup>5</sup> 可参见拙著《技术义肢与数字延异——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nvironment) 的基础上扩展与完善操作。同样的持续互动性成为广泛的当代生产活动的特点, 无论直接涉及到计算机硬件与否。生产的计算机和通讯革命已经改造了劳动实践 (laboring practices) 以至于它们都趋向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模式 (mode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sup>1</sup>

这里的分析着眼处是正确的, 今天的计算机技术根本改变的首先是生产劳动实践的方式, 其重要特点为**互动性**和**自我修正**。在生产过程中, 原来通过劳动者之间在使用工具和塑形对象上的主体合作现在转型为计算机用户及复杂生产环境的互动, 此处的生产环境自身就包括了**自动机器与生产对象互动**的复杂加工系统, 原来必须通过劳动者的经验判断所实施的校正和纠错活动, 现在被替代为**人工智能的自控**。这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为, 传统的工人劳动者现在被边缘到流水线旁的**动作人格化**客体, 而真正构序和构式财富的**创造性活动**却退出了物质生产过程。这就引出奈格里和哈特特别想发挥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在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经济中起基础作用的**非物质劳动**的问题。

## 2、非物质劳动的本质特征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 作为资本主义后现代经济核心转变中的服务业和信息化, 很重要的一个质性变化出现在“劳动力质量和本质的一种变迁”。从劳动力的质量和本质的改变, 也就是从劳动的性质重构入手来分析经济结构的新质性, 这是对的。他们说, “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 ——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 (*immaterial good*) 的劳动, 如一种服务, 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sup>2</sup>应该承认,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非物质劳动问题的讨论, 是二战以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思考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因为, 它既涉及关于生产方式的本质重构问题, 也会很深地牵动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非物质劳动的原初定义, 奈格里和哈特给出了来自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sup>3</sup>的出处。<sup>4</sup>后来在一次访谈中, 哈特坦言此刻在《帝国》中使用这一概念时, 并不真正知道它的具体所指。他说, “我们使用了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 这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 杨建国、范一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第 338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 杨建国、范一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第 337-338 页。

<sup>3</sup>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作有:《非物质劳动》(1996)、《债务人的形成》(2013)、《符号与机器: 资本主义与主体性生产》(2014) 等。

<sup>4</sup>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在那里, 拉扎拉托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文化内容的劳动”。他表述非物质劳动的两个方面为: 一是工业和第三产业中以信息为主体的劳动过程中的改变, “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控制论 (*cybernetics*) 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 (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 二是与文化相关的劳动, 即“文化与艺术、时尚、消费指南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中译文参见[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 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罗岗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39 页。

一概念，但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劳动，它究竟是欧美的特例，还是可以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subordinate countries）。<sup>1</sup>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否也为奈格里的反省。

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所谓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主要是依据上述他们关于后工业经济中信息化和服务业所生产的产品的**非物质性**推导出来的。<sup>2</sup>后来，也因为受到众多批评，奈格里和哈特对非物质劳动还进行过两个特设说明，一是，“所有非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仍然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这与此处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二是，“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个很小部分，而且集中在地球上的支配性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成为霸权，并且决定了其他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sup>3</sup>这一保护性特设说明让他们的观点具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当然这是后话。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

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是组成我们人类学的虚拟性（anthropological virtuality）的基本力量，并在帝国的表面上展开。这一展开延伸到一般语言学领域，后者标志着生产与生活间的交叉。劳动愈加变得非物质化，并通过一种单一而延续的生产创新过程（process of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实现其价值；它日益精于以一种更加高级而互动的方式消费或使用社会生产的服务。智力与情感（或者真正的与身体共同延伸的大脑）就在它们成为基本生产力之时，使得生产与生活在它们运作的层面上巧合，因为生活就是整套身体与大脑的生产和再生产。<sup>1</sup>

这里有这样几层构境意向：一是以“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为核心的非物质劳动建构了一个**虚拟性的存在**，它正好对应了奈格里和哈特所指认的信息化、符号操作、情感服务和互动式四种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这恰恰是资本帝国生存的主要生产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具体讨论。二是说，非物质劳动的所涉领域由于语言这一知识和情感交流的主要手段，造成了传统的**生活与生产边界的消解**。生活就是生产，或者说，生活决定了生产。三是说，当劳动变得非物质化，它就不再是对物的具体塑形，而表现为持续的**纯粹的非及物的生产创新和价值创造**。四是说，当智力和情感成为非物质劳动和生产过程中

<sup>1</sup> [意]迈克尔·哈特 秦兰珺：《概念的革命与革命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sup>2</sup> 将信息产业指认为非物质劳动的观点，受到了波斯特的质疑：“联网数码信息系统没有任何非物质之处。实际上，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恰恰是因为物质性的新形式（new form of materiality），这些系统的电子和机械层面的语言，才使得系统能得以正常工作。只有那些对新媒体无知的人才会将其描绘为‘非物质的’。如果一开始就假定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物质的，那我们就不能发展出一个关于新媒体的批判性理论。”Mark Poster,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101-118. 中译文参见杨玲译稿。可是，波斯特更加反对的是奈格里和哈特将信息生产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信息方式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构架。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观点可参见[美]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2页。

的**基本生产力**时，生产就成为人的身心生活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也由此，奈格里和哈特得出了两个重要的质性判断：第一，是在今天的资本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中，劳动价值不再仅仅由马克思所指认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创造，而更多地是由非物质劳动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创新过程”所生成，甚至是由所谓的情感劳动所创造。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物质劳动生产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sup>2</sup>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它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中通过及物的劳动塑形所生成的使用价值，所以，今天的

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surplus）——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智力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增殖（excess of value）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sup>3</sup>

于是，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的劳动价值论就被所谓的**知识和情感劳动价值论**取代。对此，我的基本判断是，第一，奈格里和哈特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概念，它并不是直观的实体物质，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劳动和资本都不是一种物质，但却是一种非实体的**客观关系存在**。第二，他们也根本没有认真阅读和弄懂马克思中晚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创立的新型劳动价值论，特别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更不要说进一步去深入理解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事物化和三大经济拜物教**学说了。关于这一点，我赞成哈维的观点，他说，“我更希望，哈特和奈格里能够更加认真地对待马克思‘非物质但却客观（immaterial but objective）’的论述，并且更多讨论‘客观的’这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客观化（对象化）尤其通过货币形式的生产，会引起物化（reification）、拜物教和异化。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些关键概念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却被忽视了”。<sup>4</sup>我觉得，哈维的对奈格里和哈特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哈维这里的“非物质但却客观”一语如果准确地改为**非实体但却客观**，就会是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境的入口，而物化和拜物教批判则是找到今天资本主义新型奴役关系的透视法，可这一切，都从奈格里和哈特的指缝中流逝了。这会使得他们的资本帝国批判，好看而不中用。

第二，是当一般智力和情感因素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力时，生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416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439 页。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417 页。

<sup>4</sup> [美]哈维：《哈特与奈格里的〈大同世界〉》，《艺术论坛》2009 年第 10 期。中译文参见王行坤译稿。

活与生产的关系就被颠倒了，不再是生产决定生活，而是相反。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中“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产生在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sup>1</sup>依奈格里和哈特在此的学术构境，当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工厂中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时，原来被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的生活里许多事情都会成为创造价值和非物质财富的源泉。比如今天坐在家就可以进行的网络写作、网店销售和软件编程，以及种种在线的咨询、教育和直播娱乐活动。对此，我觉得奈格里和哈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今天网络信息化的条件下，从事非工业生产的其他工作从刚性的工业体制中脱域出来，这只是新型劳作的一种方式 and 弹性时间的改变，这并不足以得出生活决定生产的结论。况且，生活决定生产的断言毫无实质性的意义。

### 3、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上，依奈格里和哈特的见解，今天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驱使服务部门处在信息经济（informational economy）的顶端”的非物质劳动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和符号（symbolic）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creative and intelligent manipulation）另一方面成为程序性的符号（routine symbolic）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和需要（affect and requires）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sup>2</sup>

这里新关键词是信息经济和处于顶端的服务业，非物质劳动的第一种形式是奈格里和哈特已经讨论过的信息化技术对物质生产的改造，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劳动者在自控机床和机器人旁成为智能终端的操控者；并且，生产耐用商品的物质生产更多地走向于非物质劳动和短命的非耐用品。二是从事创造性的符号产生的人员，这又分别指软件行业的编程人员和在虚拟网络信息平台上从事种种创新设计的劳作者。三是服务业中的涉及情感和其他非物质需要的工作。这三种非物质劳动，被指认为今天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将非物质概括为四种，他说，“在后福特和后工业时期，随着非物质劳动（比如智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417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0页。

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资本积累的改天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sup>1</sup>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后两种劳动的具体所指。依我的推测,所谓关系劳动可能是指由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发生的交往活动;而语言劳动则接近上述第二种创造性符号生产的劳动。不过这里,他指认了非物质劳动将成为新的价值创造中心。在2014年11月29日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针对学术界的批评,奈格里曾经专门说,“我和哈特不想否认工厂的存在,也不想否认遭受生产链折磨的工人身体的存在。我们只想强调,生产的核心已经改变了。今天,价值来自社会主体化过程,来自于共同性和联合行动”。<sup>2</sup>这就是说,物质劳动、工厂和劳动者的身体仍然是实在的,但生产的核心开始偏向非物质劳动,并且剩余价值更多地来自于非物质劳动中的共同协作。而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则做了如下的补充:一是强调非物质劳动“并不意味着汽车、钢铁那样的物质性商品的生产就消失了量上减少了,而是说这些物质性商品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非物质因素和商品”。这里,奈格里和哈特承认物质劳动和物质商品的客观存在,只是强调物质生产更多地依赖于非物质劳动。二是“生产这些非物质商品(或者物质性商品的非物质方面)的劳动形式,可以称为心脑劳动(labor of head and heard),其中包括、情感性劳动以及认知劳动”。<sup>3</sup>显然,在对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判断上,他们后来的观点是有所后退的。

依他们的看法,与马克思的经典劳动概念相比,今天的非物质劳动突显出三个重要特征:首先,非物质劳动的**均质化**特征。在今天以信息化生产为主导的后现代工业中,出现了“劳动过程的一种真正的均质化(real homogenization)”。在马克思那里,不同劳动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比如裁剪和纺织的具体劳动中,“不同的劳动活动只有从它的具体的活动中抽象出来才能被聚集在一起和以均质的方式进行观察,不再被看作裁剪和纺织,而是普遍的人类劳动的支出,即**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r)”。<sup>4</sup>这个说法来自拉扎拉托,他将“非物质劳动”视作一种“抽象的活动”。<sup>5</sup>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是充分劳动分工之上商品**交换**的结果,并且,抽象劳动的本质不是均质化,而是**客观抽象**发生的价值等价关系。有的时候,一旦奈格里和哈特的讨论涉入到更深层次时,就会暴露出自身方法论的缺陷,特别是他们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无知。也难怪齐泽克会说,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是想写成一本“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可是从其结果上看,它却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sup>6</sup>在更深一层方法论的构境中,我原则上赞同齐泽克的评价。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随着今天计算机化的生产,具体劳动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concrete labor)已趋于减少,而工人正不断地远离她或他的劳动客体(object)。计算机化裁

<sup>1</sup> [意]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sup>2</sup> [意]奈格里:《奈格里: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是人的创造性》,赵益民(澎湃新闻特约记者)2014年12月5日。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sup>4</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39页。

<sup>5</sup> [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sup>6</sup> [斯]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新〈共产党宣言〉了吗?》,《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

剪和计算机化纺织的劳动可能完全涉及到同样具体的活动——即操控符号和信息

(manipulation of symbols and information)”。<sup>1</sup>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其实，只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自动化生产**中，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已经将劳动者从塑形对象的直接劳作中解放出来，而转换为相同的智能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被同质化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个误认的抽象劳动的错误缘起。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不同于过去不同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工具，比如裁剪和纺织劳动中的剪刀和织布机，现在“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过它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sup>2</sup>这里的错误有二：一是计算机不是新型的工具本身，而是自动化工具系统中的智脑，它又可以细分为真正起操控作用的软件系统和对象化运作的硬件系统，智能终端只是自动工具的后端，真正代替人手的部分还有十分复杂的机械臂等机器前端；二是操控智能终端的工作并不是马克思在特定构境中使用的抽象劳动，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却真是**具体的**智能劳动。这些重要的理论边界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都是一笔糊涂帐。

其次，非物质劳动的**情感性**特征。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affective labor*)”。这是奈格里和哈特时常自以为得意的观点，似乎也是他们觉得超出了以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关于非物质劳动讨论既有成果的地方。有趣的是，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开始将情感性劳动指认为“劳动的女性化”(feminization)<sup>3</sup>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中，也再一次强调了情感性劳动的女性化特征。<sup>4</sup>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比喻。在下意识构境中，带有理性主义父权制的他性歧视。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表征，即其情感性表征“很好地延伸并超越了由计算机所定义的智能与通讯的模式”。这是说，情感性劳动恰恰是由信息化造成的均质化劳动建构的，但却又超越了信息技术中的冰冷物性状态。这似乎是说，情感性劳动是**主体性的关系存在**。

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诸如“亲自服务”或“就近服务”等范畴经常被用来鉴别这种劳动，但它真正根本的在于感情的创造和控制。这种情感的生产、交换和交流大体上和人类交际相联系，而这种交际像娱乐工业那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sup>5</sup>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奈格里和哈特所谓情感性劳动的具体所指，即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说它是非物质劳动，原因之一是它的产品的“不可触碰”，是一种带来“放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4-85 页。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39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39 页。

<sup>3</sup> [意]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1 页。

<sup>4</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6 页。

<sup>5</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39 页。

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由于他们并没有具体例举这种感性生产和交换的劳动，我们无法知道此类劳动到底指什么。我推测，这可能是泛指服务业中的“非生产性的劳作”，其中又集中于倾注了感情关系的“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与广告”等工作。当然，这些非物质劳动并不是说不再包括物质对象，而只是强调这种劳动中突显的情感关怀互动。在此，他们还特意使用了“关怀的劳动（Caring labor）”一语。

关怀的劳动当然完全浸润在物质和肉体之中，可它生产的感情却是非物质的。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此处人们也许再一次认识到经济生产的工具行业已与人类关系的交际行为相结合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没有被削弱，而生产已被丰富到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sup>1</sup>

这里的关键词是“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注意到，奈格里和哈特曾经专门交待过他们的一个哲学构境背景，即哈贝马斯<sup>2</sup>的交往理论，特别是“尤根·哈贝马斯在诸如《交往行为理论》之类作品中提出的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间的概念区分”。<sup>3</sup>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理想化的未被异化的主体际交往关系，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价值悬设。在这一方面，相近的观点还有阿伦特<sup>4</sup>在《人的条件》<sup>5</sup>中对具体性劳动和活动的区分。我觉得，奈格里和哈特是跟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错误构境进入了一个幻象之中。一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只要资本关系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就不可能有真实主体交往中的情感关怀，因为其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要加以**变卖**的。二是即便是服务性行业的劳作，当然也是必须以现实中的客观感性行为为前提，所以它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情感交流关系。健康、教育和交通一类服务性工作，首先就是物质活动，其次它们不可能仅仅集中于情感关心，而会蕴含更复杂的智力传递、能力培养、治疗保健和财物流转等。

其三，非物质劳动的**内在的合作和互动**特征。在2001年的一封书信中，奈格里提出，“在后福特主义里，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非物质，越来越协作化”。<sup>6</sup>相比之物质生产，人们在非物质劳动中更多地进行信息化的交流和协作。奈格里和哈特认为，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40 页。

<sup>2</sup>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出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51 页注 16。

<sup>4</sup>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年），德裔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哲学家。1906 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流亡巴黎，1941 年到了美国，1951 年成为美国公民。自 1954 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人的条件》（1958）、《精神生活》（1978）等。

<sup>5</sup> [美]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sup>6</sup> [意]奈格里：《艺术与诸众》，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2 页。



在这些形式的每一种非物质劳动中，合作完全内含于（inherent）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立即涉及到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换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cooperation is completely immanent to the laboring activity itself*）”。<sup>1</sup>

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只是被看成“可变资本”，它只是“受资本激发与聚合的一种力量”，劳动力之间的合作仅仅被理解成资本家发动的外部联合，“资产阶级的作用像乐团指挥或战场上的将军一样，负责部署和协调共同劳作中的生产力量”。<sup>2</sup>其实，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即便在早期工业生产劳动中，劳动分工之上的协作当然也是工业生产的内部要求，特别是到了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劳动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更是内嵌于机器系统之内的。马克思只是在评论资本家的管理作用时，使用过乐团指挥的例子，但绝非是指工业生产劳动之间的合作是外部强制的。而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中，合作是内嵌于劳作之中的，知识性操作和情感服务，无不依存于劳动者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协作是非物质劳动的内在要求。这个观点也是来自拉扎拉托，他将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视作“能动的主体”并且，指认这种劳动已经转变为“牵涉到主体性投入的决策能力的过程”；其中，劳动者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和团队精神。<sup>3</sup>说在非物质劳动中，人与人的协作由于网络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加便利和内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 4、脱地域化的网络生产与新的共产主义可能性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中非物质劳动地位的突现，必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结构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即是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主要依存基础的**超地域性的网络化生产格局**的生成。

首先，网络生产中的**脱地域化**空间结构。奈格里和哈特说，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现代化的进程和通向工业方式的过程激起了生产力的猛烈增加和劳动力向如曼彻斯特、大阪与底特律等成为工厂城市的地方集体迁移”。<sup>4</sup>这是说，以密集劳动为核心的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和近邻关联，比如，

大工业工厂对劳动合作圈（*circuits of laboring cooperation*）的界定主要通过生产场所（*shop floor*）里工人的物理分布。单个的工人和他的近邻工人进行交流，而交流普遍局限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40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51 页注 22。

<sup>3</sup> [意]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0-141 页。

<sup>4</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41 页。

于物理上的邻近（physical proximity）生产地点中的合作也需要物理上的邻近，既协调生产的循环，又将正在生产的商品的运输费用与成本最小化。例如，煤矿与钢铁厂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运输与通讯线路的效率，都是钢铁生产的整体效率中的重要因素。<sup>1</sup>

你看，这里直接出现了他们上面忽视的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协作，只是在此，奈格里和哈特强调了这种合作的物理邻近关系。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劳动密集、机器密集和工厂密集，这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要求。也因此，工业资本主义通常是与丹尼尔·贝尔所指认的集中化、标准化、规模化与机械化联系在一起。可是，随着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的兴起，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地关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大规模（large scale）成为一种限制。电讯和信息技术的进展已使得生产的脱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成为可能，后者有效地分散了大众工厂，撤走了工厂城市；通讯与控制可在相当距离内有效地实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非物质产品（immaterial products）在全球运输上可以用最少的延误和花费。

2

后工业经济中的生产不再直接与规模相关，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规模反倒成了自身迅速转型升级的局限。并且，集中化也不再是非物质生产的要求，因为在后工业化企业的生产中，“几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能在一个单一商品的同步生产中得以协调，以便工厂可以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在某些部门工厂厂址本身甚至可以被放弃，因为它的工人们单独通过新信息技术进行交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生产空间布展的状态，即资本支配劳动的**脱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网络生产。这可能也是非物质劳动的主要依存方式。

奈格里和哈特断言，在今天资本主义经济通往信息化工业的道路上，传统福特制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已被作为生产的组织模式的网络所代替”，网络化的信息通讯使得生产合作和效率不依赖于近邻和中心化，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可以有效地从遥远的地方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合作，脱离了具体地域的“劳动过程可以以一种几乎完全与通讯网络相协调的方式进行”，劳动者甚至可以在家里上班，生产的非地域化的趋势更加显现。于是，信息网络将生产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无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距离有多远，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距离怎样，网络都能使他们直接相关。<sup>3</sup>更重要的是，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也可以通过网络信息传输来便捷地完成，资本控制的指令和非物质劳动的产品提交，只需要电脑和智能手机终端上的一次点击，就会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实现。

其次，网络生产中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流动性弹性布展**。奈格里和哈特说，在传统的“工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1-342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1页。

<sup>3</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2页。

业化大生产的福特组织时代，资本受制于一个具体的区域，并进而必须按合同与一个有限的劳动人口打交道”，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都受制于一种有限的空间和资源。而在今天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情况发生了改变：

生产的信息化与非物质生产的的增长的重要性已倾向于将资本从地域与交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通过将场所移到全球网络的其他点（another point）资本可以退出和一个有限的本地人口的谈判——或者仅仅通过使用迁移的潜力作为谈判的一种武器。已享受过相当稳定性和合约权力的全体劳工人口由此发现自己处于日益动荡的就业形势中。一旦劳动的交易地位遭到削弱，网络生产可以容纳各种旧形式的无保障的劳动（non-guaranteed labor.）诸如自由职业、家庭工、兼职工和计件工。<sup>1</sup>

在以非物质劳动为主体的网络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获得了彻底的改变。资本流动的空间不再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信息化的生产劳作关系使得它在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找到廉价劳动力；而劳动者则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地位，因为大量新的可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其他劳动力会进入到网络化的国际劳动力市场。显然，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劳动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之中。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也是在这种新型的网络生产中，必然会出现资本全球化控制的新形式。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网络生产中出现的“离心运动”，或者说，“生产在地理上的分散已开创了对日益中心化的管理与计划的一种需求”，这也就是说，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必须有新形式。他们认为，“内在于生产体系中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工人们从中心的远距离所在进行更加广泛的监控。对劳动活动的控制可以潜在地个性化（potentially be individualized）。并在网络生产的虚拟环形监狱（virtual panopticon）中继续下去。然而，控制的中心化从全球的视角（global perspective）看甚至更加清晰”。<sup>2</sup>这里，福柯的全景监控概念<sup>3</sup>出现了，但这已经是通过网络信息化重新建构过的**电子化虚拟环形监狱**了。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网络生产中，今天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全球化的电子监控系统完成了对国际化劳动分工中的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关于网络信息的虚拟性问题，波斯特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互联网的“物质结构就根本不是虚拟的。相反，互联网是由无数颇为物质的电线、电缆、卫星组成的，它们连接着千千万万台电脑，每一台电脑的位置都可以在空间中找到。互联网之所以是虚拟的，不是因为它缺乏地域性，而是因为它的时/空配置和早期的通讯形式迥然相同。它所提供的虚拟在场（virtual presence）的含义是，它将交际中的距离和时间因

<sup>1</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43 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第 343 页。

<sup>3</sup> 关于福柯的全景监控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拙著：《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三篇，第十一章。

素缩减为零”。<sup>1</sup>这是对的。然而，可以为奈格里和哈特辩解的是，在我们讨论虚拟空间和现实的时候，肯定都不是指它所依托的物质网络结构，而是指由不可见的信息操作生成的数字化构序现象和突现式构境。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是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一种新的激进观念，即网络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也正在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生产过程中，

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非物质劳动力，immaterial labor power)赋予劳动维持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大脑与身体仍需要他者(others)产生价值，但它们所需的他者并不必然由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来提供。如今，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social surpluses)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互动性的合作形式(form of cooperative interactivity)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spontaneous and elementary communism)提供了潜在可能性(potential)<sup>2</sup>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表述。一是说明非物质劳动中出现了更深的互动合作的内在需要，这是对的。二是比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更宽泛的“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导致劳动对资本的真实吸纳的生产率，都取决于“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互动性的合作形式”。这一观点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它涉及到剩余价值新的来源问题。可以明确，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判断的。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可能的确出现了新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但它并非生成于“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的合作，而来源于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构序活动。并且，它并非是取代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而是成为今天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决定性的方面而已。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三是这种新的非物质劳动的互动式的合作形式是一种新的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的翻转基础。这也就是说，资本帝国的全球后现代布展本身完全可能翻转为一种后现代式的新型革命。这种观点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与他们在前面对后现代思潮进行批判的观点是直接相佐的。波斯特也曾经指出过哈特论述中存在的类似混乱，他提出，“既然后现代身份在帝国的语境里是保守的，哈特/奈格里为什么偏偏还把他们的抵抗希望寄托于这种流动的、碎片化的自我呢？在把诸众(multitude)当作革命行动者(revolutionary agent)的概念里(这是一个有深刻缺陷和争议的概念)他们吊诡地把典型的后现代特色纳入了革命者的特征”。<sup>3</sup>发生的情况是，请拿你的

<sup>1</sup> Mark Poster,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e*,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101-118. 中译文参见杨玲译稿。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0-341页。中译文有改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2001, p.294.

<sup>3</sup> Mark Poster,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e*, Cultural Politics, 2005, 1(1):101-118. 中译文参见杨玲译稿。

予戳你的盾！其实，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再一次说明了这种翻转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非物质的，认知的和情感的——正在变形，它正在变为**生命**（*bios*）变成生命政治的劳动，变为一种对生命形式进行再生产的活动”。<sup>1</sup>这里的意思是说，当劳动通过非物质存在方式变成人的生命活动时，生命政治本身就是实现一种内在的解放要求。

当然，我们还需要听一下奈格里和哈特自己的进一步阐释。他们说，非物质劳动中内在蕴含的互动和合作，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开放式拥有，都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今天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人们已经不断地参与到由“通讯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和共同语言”建构的非物质生产之中，而网络信息化条件下非物质产品的根本属性恰恰是**反私人占有的**。这是说，当财富只能通过唯一的物性存在方式被生产出来的时，它是可以独占的，但当我们面对的数字化产品都可以轻易被复制生产的时候，一个独占的私有制就会土崩瓦解了。所以，奈格里和哈特才会认为，当我们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数字化网络产品时，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的概念日益变得荒谬。越来越少的商品能在此框架内被占有和专有使用；集体在生产，并在生产的同时受到再生产和再界定。对私人财产的经典的现代概念的基础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后现代的生产模式中被解体”。<sup>2</sup>在后来一次访谈中，哈特曾经这样谈及这个问题：“知识的生产，或者其他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例如编码的生产，图像的生产，并不是某个天才一人就能胜任的，而是在一个广阔的网络中举众力完成的。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按照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自身的逻辑，知识的主人就应该是生产它的整个网络，而不是作为某人或某公司的个体”。<sup>3</sup>如果说，网络化、数字化的产品本身就是一种超出了私人占有制的**公共财产**（*commons*），那么，数字化生产的本质就是共产主义的。

---

<sup>1</sup> [意]奈格里：《艺术与诸众》，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sup>2</sup> [美、意]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48页。

<sup>3</sup> [意]迈克尔·哈特 秦兰珺：《概念的革命与革命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 好莱坞文化殖民的隐性逻辑

##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构境论解读<sup>1</sup>

张一兵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210093)

**摘要:**斯蒂格勒认为,他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隐性意识形态霸权中好莱坞文化殖民的秘密装置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电影蒙太奇的拼接中使个体意识结构发生无意识的改变,从而无我地认同意识形态他者的意志。远程登陆的电视传播,让亿万观众通过电视的远程在场的方式,异地异时地同一化于一种时间客体中的接受意识共在,这已经生成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支配性意识巨流之链,这大大加剧了美国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隐密控制的精神灾难。

**关键词:**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先将来时 电影蒙太奇 意识形态共在  
好莱坞文化殖民

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sup>2</sup>,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sup>3</sup>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此书的第三卷中,斯蒂格勒从哲学上讨论第三持存,再由此深入到电影的话语分析,其目的并非是艺术研究,而试图从根子上剖析在当代资本主义隐性意识形态霸权中好莱坞文化殖民的秘密装置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他认为,电影装置支配人的隐密机制在于一种存在论上的先将来时的动人酵素。并且,在电影蒙太奇的拼接中使个体意识结构发生无意识的改变,从而无我地认同意识形态他者的意志。无所不在的远程登陆的电视传播,则大大加剧了这种美国式文化意识形态隐密控制的精神灾难。

<sup>1</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sup>2</sup>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狱,后来在狱中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1992年在德里达指导下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技术和时间》)。于2006年开始担任法国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主要代表作:《技术和时间》(三卷,1994-2001);《象征的贫困》(二卷,2004-2005);《怀疑和失信》(三卷,2004-2006);《构成欧洲》(二卷,2005);《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等。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来到南京大学,我与他就马克思的工艺学理论和当代技术批判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形成了一些可合作研究的方向。2016年,他再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开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从人类世纪说的角度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课程,并与我们共同举行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工作坊。本文的写作得到他直接的帮助。

<sup>3</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卷,赵和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 1、电影装置中先将来时的动人酵素

斯蒂格勒承认胡塞尔在时间客体研究中的巨大贡献<sup>1</sup>，但也批评后者将**第三持存** (*réentions tertiaires*)<sup>2</sup>仅仅作作为图像意识 (*conscience d'image*) 排除在内时间现象学研究之外的不妥。斯蒂格勒说，胡塞尔当时给出的例子是关于一幅 19 世纪创作的油画的记忆，画家关于油画的构序和实际创作中的直接体验只会是画家本人的记忆痕迹，这种记忆不会成为观众的共同意识体验，或者说，物化在油画中的记忆是无法像一首经典交响乐作品那样让所有听众产生共同的时间客体中的意识体验。对此，斯蒂格勒是大为不满的。他认为，胡塞尔会因此丧失观察由外部**义肢性** (*prothèse*)<sup>3</sup>第三持存 (记忆) 所重构的原生记忆和第二记忆之间的深刻关系。因为，当录音-摄影-电影摄影-摄像技术发展起来之后，由人的头脑之外的第三持存 (记忆) 将拟造所有过去只能在现场发生的一切时间客体，这包括一切音响中的言说、音乐和影像记实，这种新的数字化技术方式将彻底改变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构序结构。我倒认为，胡塞尔的观点并不错，而是斯蒂格勒自己转换了构境对象。第一，油画并非只是创作过程记忆，而是画家通过独特的美术“韵味”在世，人们观赏一幅油画艺术品，不会获得画家的个人创作记忆，而是受到艺术的心灵震撼。油画的画布和油彩虽然也是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存，但它们并不直接突现艺术构境本身。第二，油画的观赏不是以流动的**时间客体** (*objets temporels*)<sup>4</sup>的方式发生的，所以胡塞尔将其排除在时间现象学之外自然是合理的。斯蒂格勒的构境域转换，是将非时间性的第三持存硬嵌入到时间客体的构序中来了。

我们不难看出，当斯蒂格勒自己正面阐述观点的时间，他所指认的第三持存及其作用是在流动性的时间客体这一特设构境域之中的。他说，当数字化记录技术开始将音乐和影像“一成不变地记录下来”的时候，音轨和数字化影像的物性“**机械流** (*flux machinique*) 和**时间客体的时间流**相互叠全，对以该客体 and 该记录过程为对象的**意识流**产生了过去与现实 (*de passé et de réalité*) 相结合的真实效应 (*effet de réel*)”。<sup>5</sup>你看，此处的数字化第三持存所记载的音乐与影像都是在时间流动之中的时间客体，而非油画一类固化的持存。因而，斯蒂格勒对胡塞尔的上述批评显然是**错位构境**。由于此处斯蒂格勒的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思辨了，我们可以举个感性一些的例子。比如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由电影胶片转制而成的数字化影像资料，当我们看到一段几十年前金陵大学学生毕业典礼的记录影

<sup>1</sup> [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sup>2</sup> 这是斯蒂格勒原创的概念，他从胡塞尔的意识时间现象学中的第一记忆/持存 (当下体验) 和第二记忆/持存 (回忆) 出发，指认了外部物质载体中的第三持存。

<sup>3</sup> 斯蒂格勒原创的概念，*prothèses* 也可译作代具，义肢，即一种人造的实体性器官。

<sup>4</sup> 时间客体是斯蒂格勒模仿西蒙栋的技术客体而创造的概念。其中，他将胡塞尔停留在主体当下听觉体验中的第一、二记忆中的可以连续发生的时间性持存，扩大到人体之外的义肢性第三持存 (记忆) 之中。如 CD 和数字化存储器中保存的可重新播放的音像数据。

<sup>5</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 页。

片时，这一数字化第三持存上的记忆直接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历史时刻。在我们观看这段当时中国唯一的电影教学专业的老前辈拍摄的影片时，我们获得了并不在现场经历的原生记忆（观看时）和第二记忆（比如当下写这段文字时），当这一影片片段被我放进校史馆的金大时期的多媒体介绍中时，这一第三持存上的时间客体则会不断改变观众的原生持存和第二持存。由此，过去发生的现实则变成今天的**真实看见**，过去的不可能便成为可能。斯蒂格勒特别让我们关注这种由数字化第三持存造成的新的可能性空间。

为了说明这一新的可能空间，斯蒂格勒先退了一步，即返回到非时间客体的照片思境重构中。他说，在第三持存记录工业中，特别是摄影技术出现之后，存在论中则生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即**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他甚至断言，任何第三持存的记录都是会一种**先前已经完成的逝去**，而相片的记录则会生成一种已经逝去的将要发生。为了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奇异性的构境，斯蒂格勒以巴特在《明室》一书中的一个描述为例，即当巴特看到一幅刘易斯·佩恩<sup>1</sup>临刑前几个小时拍摄的相片所产生的震撼。他看到的是：

**这就要发生**（*cela sera et cela a été*）我同时解读出两点：“这即将发生”和“这已经发生”。我惊恐地注视着关于死亡的先将来时。照片的曝光给我的是过去时（也即不定过去时）它告诉我的是将来即将发生的死亡，而刺伤我的正是二者之间的对等。<sup>2</sup>

拍摄相片时，佩恩还活着，他将要死去；看照片时，佩恩已经死去。斯蒂格勒想让我们意识到的事情是，所有第三持存记录一个事件的时候，都已经包含着它的逝去。所以斯蒂格勒夸张地说，“所有照片所述说的都是关于死亡的先将来时——这一先将来时也是一切叙事、一切戏剧、一切电影情感的剧情推动力”。<sup>3</sup>这也就是说，由今天的数字化第三持存保存下来的叙事、表演和电影故事的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这种**先将来时中的已死性**。其实，斯蒂格勒的这一生动而深刻的断言，只是对**存在的历史性记忆**才是精准的。因为，在虚构的故事片特别是科幻片中，影片中的一切即不是历史发生的真实，也没有将要发生的现实可能。它至多只是在时代共性的模拟上会形成一种群体个性化记忆。

为了加深这一特定构境的感染力，接下来，斯蒂格勒带着我们进入费里尼<sup>4</sup>所拍摄的《会面》（*L'intervista*）更加复杂的构境之中。我们知道，这是一部由先将来时突显的时间间隔建构起来的**戏中戏**电影构境。《会面》中，费里尼自己出境并邀请意大利著名演员马塞洛·马

<sup>1</sup> 刘易斯·佩恩，1865年试图刺杀美国时任国务卿W.H.西沃德而被处以绞刑。此处巴特讨论的是美国摄影家亚历山大·加德纳在执行绞刑前为佩恩拍摄了一幅著名的照片。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sup>3</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sup>4</sup>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及作家。1920年出生于意大利里米尼市。费里尼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导演之一。费里尼一生曾赢得四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一次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两次威尼斯银狮奖和七座大卫奖，第42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1963年，自传式电影《八部半》诞生，该片多次入选各地影评人评选的影史十佳。1993年，费里尼被授予奥斯卡终生成就奖，同年10月31日病逝。



斯楚安尼和安妮塔·艾克伯格共同观看他们自己 30 多年前曾经出演的剧情故事片《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sup>1</sup>。在这部影片中，斯蒂格勒让我们关注作为真实自己的安妮塔观看 30 多年前在故事片中所饰演的虚构有年轻明星西尔维娅 (Sylvia) 时发生的复杂时间叠境。一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在时间客体 1 (第三持存胶片上的《会面》) 上记载的时间客体 2 (双重第三持存胶片上的《甜蜜的生活》) 的关系；二是真实的安妮塔在看 (曾经的原生记忆和第二记忆的重构) 西尔维娅虚构表演中的真实的青年生命存在；三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影片时的多重先将来时的逝去：安妮塔看自己在 30 年前《甜蜜的生活》中的逝去，我们今天再思考另一个 30 年前《会面》中的双重逝去。这正是大师此作品的精妙之处，它将电影的构境本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斯蒂格勒认为，《会面》中发生的事件是“演员的生命与电影记录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原生持存、第二持存和第三持存融合在同一事件**，也即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事件**之中”。<sup>2</sup>而当观众再去观看电影《会面》时，则会发生一个更复杂的构境：

1、它是一个**第三持存** [是一个人为记忆的支撑 (support de mémoire artificiel) 该载体的一个片段，也即影片的一个小段落，在另一部影片中被放映，被另一部影片的段落所记录]；

2、它还是一具**曾在并再次被观看 (revu) 的时间客体**，而后此刻正被《会面》的观众又一次观看；

3、它还是该观众的**第二记忆**，属于他过去时刻的、此刻被激活 (réactivé) 了的意识流；

4、它还是该观众逝去**生命里的 90 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影片《甜蜜的生活》作为持续不断和持存而被体验，也就**将原生持存不断地保留住**，构成某一流逝中的叙事的现在时刻，这个叙事的标题 (它的整体) 就是《甜蜜的生活》此刻，观众看着这个叙事的一个段落，也就是此时已包含在《会面》的影片流中的那个段落……

5、……“包含在《会面》的影片流中”即“也包含在安妮塔此刻**正在流逝的意识流** (flux de la conscience passante) 之中”。<sup>1</sup>

这是一个在电影观看过程被建构起来的多层次历史情境重构和意识构境。首先是**客位视位中**电影放映中发生的复杂事件：双重第三持存 (《会面》电影胶片中记录的《甜蜜的生活》的胶片放映) 中存在的**戏中戏** (安妮塔看自己的表演)，这是一个双重物性记录中的真实人物与她的表演的叠境。这种叠境的效果既是骄傲的又是伤感的。其次是观众**主体视位**

<sup>1</sup> 《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是由费里尼于 1960 年执导的剧情片，该片获第 13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60)。主要演员为马塞洛·马斯楚安尼 (Marcello Mastroianni) 和安妮塔·艾克伯格 (Anita Ekberg)。片长 174 分钟。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 页。

**中的多重被观看：**曾经年轻的电影人物西尔维娅被 30 年后的演员安妮塔观看，这一观看的时间客体再被观众所双重观看。其三，这一观看本身还构成了观众的第二持存，因为 30 年前的故事会将观众对那一时代的群体生存记忆重新激活，“观众也看着自己在流逝”。这是对的，就像今天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观看电影《刘三姐》或《五朵金花》的时候，一定会将自己带回到那个年代，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流逝。非历史纪实性故事片的历史记忆通常是这种时代性的群体个性化经验重构。其四，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真的消逝了自己的一段不可再重来的时间（“90 分钟”）。我们不难体会到斯蒂格勒的用心，他指认到，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在此已经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réalité et fiction），无法区分感知和想像（perception et imagination）。**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大家**心中都想着：**‘我们在其中流逝’**”。<sup>2</sup>而更重要的却总是被忽略的事实是，**电影在打动我们的同时将很深地捕获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捕获才是斯蒂格勒让我们格外留意的东西。它将导引出下面的电影意识形态支配问题的讨论。

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到斯蒂格勒对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批评上来，就比较容易入境了，因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原初记忆（持存）和第二记忆（持存）的时间客体上，是无法理解电影这一复杂时间客体的。斯蒂格勒说，在对电影这个奇特的复杂时间客体观看中，表演与现实边界消失，生活与蒙太奇虚构同质化，感知和想象换位，原生记忆、第二记忆与第三记忆（持存）相互混合，当我们在《欲望号街车》和《乱世佳人》中看到费雯丽的出场时，我们有谁会被她所饰演的角色和情境所打动，她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她的感受替换了我们的感受，虚构战胜了现实，在那个构境瞬间，“我们怎会不感到自己也变成了疯子，被美国疯狂的宏伟蓝图所攫取？这项蓝图一面让我们开怀大笑，让我们年前为命运泪流满面，一面则抓住一切时机，向我们兜售‘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美国》！”<sup>3</sup>电影构境的动人之处，正是隐性意识形态支配布展的酵素。在电影打动我们的那个先将来时的瞬间，我们都成为无意识中的美国人。

## 2、无意识的蒙太奇构境与他性时间中的隐性奴役

第一个方面，斯蒂格勒认为，电影之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内心里捕获我们，瞬间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者，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意识本身的结构**也具有广义的电影特质（cinématographique）。他说，这里的所谓电影特质也就是对“**由运动构成的（constitués par leur mouvement）时间客体进行蒙太奇剪辑（montage）**”的构境存在。这也就是说，意识本身具有复杂时间客体的特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断言。

---

<sup>1</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 页。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 页。

<sup>3</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美国，美国》系

我注意到，斯蒂格勒曾经很专业地讨论了电影观看背后的影片生产中的“库里肖夫效应（l'effet Kouleitchov）”<sup>1</sup>。所谓库里肖夫效应，是指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可能生成的一种独特格式塔心理构境效应，它对应于影片生产制作中导演对所拍摄的电影素材的蒙太奇（montage）剪辑和拼贴。斯蒂格勒认为，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的意识“会不断把位于这些客体之前（précède）的物体形象投射（projette）到这些客体之上”，他的意思是想说，这可以通过胡塞尔那个重要的意识**意向填充**——感知连续统中的预存和前摄来理解。我觉得，在影片生产和观看的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库里肖夫效应”完形构境应该是更为复杂的，因为这种观众心理和视觉影像持存的情况既可能是预存的，也完全可能是**后摄**的。前苏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曾经列举过这样一个影片剪辑中的试验。导演手中有三个拍摄完成的画面，一是一个男人微笑的脸，另一个是他惊恐万分的脸，第三个片断是对着这个人瞄准的手枪。可以有两种将这三个画面剪辑构序：第一个构序是先播映微笑的脸，其次是手枪，最后是那张害怕的脸；而第二个构序我们先将惊恐的脸首先表现出来，其次是手枪，最后才是微笑的脸。从第一构序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那个人是一个懦夫；而在第二个构序中那个人就成为一条好汉了。这也只是一个预存和后摄的构序问题，但电影生产的本质是**综合构境**。不仅是画面，还有节奏（快闪是紧张，慢镜头是平静）和音效（特别是音乐）共同建构了电影情境。

在这里，斯蒂格勒专门交待说，电影与音乐一样都是可以重复面对的现象。如果原来只是胶片和留声机，而现在则是便捷的数字化贮存器。每一次面对这样的时间客体，它所呈现的不同情境都会很深地改变人们的意识，进而改变人的生活，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电影“**为什么能够使全世界接受大写的‘美国的生活方式’**（*adopte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u monde entier*）”<sup>2</sup>之所以斯蒂格勒在这里全部用大写字母标出的美国生活方式，是想特别提醒我们，他这里的对第三持存的研究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好莱坞意识形态文化殖民本质的揭露。

如前所述，录音和电影摄制都可以让一个时间客体中的事情（一段音乐或一个生活情境）不走样地保存下来，并在第三持存的帮助下得以重复呈现。这里，斯蒂格勒特别让我们关注同一个时间客体在复现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改变。他说，胡塞尔虽然并没有直接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后者对“第二记忆是怎样通过想象主动地重复之前曾被感知过的时间客体”的微观

---

伊利亚·卡赞在 1963 年执导的一部电影。

<sup>1</sup> 1929 年 2 月 3 日，蒙太奇理论的创始人、前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大师普多夫金在对英国电影协会的讲演中，曾经具体说明过他与库里肖夫所做的剪辑试验：从某一部影片中选择俄国著名演员莫兹尤辛的几个静止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特写镜头。然后将把这些完全相同的特写镜头与其他影片的小片断蒙太奇式地拼贴为三个组合。在第一种组合中，特写镜头后面紧接着桌上的一盘汤的镜头；第二个组合是，特写镜头与一个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女尸的画面紧紧相连；第三个组合是这个特写后面紧接着一个小女孩在玩着一个滑稽的玩具狗熊。当观众看到这三种不同的组合时，他们从那盘桌上汤中看出了莫兹尤辛的沉思的心情；从他看着女尸时那副面孔中看到了沉重悲伤；而看到他在观察女孩在玩耍时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微笑，观众也跟着高兴起来。显然，这种看到的效应完全是后续素材对无表情特写的反向构境。所以，所谓库里肖夫效应即是通过拍摄素材的恰当的构序和特定的时间节奏蒙太奇剪辑，导致特定的观看构境效应。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 页。

机制有了初步的意识。这是说，胡塞尔已经发现在对一段音乐聆听的回忆中的**复得** (*recouvrement*) 现象，即在想象中自由地将原先已经聆听过的旋律给予自己。可是，胡塞尔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复得已经不再可能是原先聆听的那段音乐的简单被给予。为什么呢？因为在斯蒂格勒看来，无论是在自己的回忆还是通过第三持存重新播放自己听过的一段音乐，我们都不会再是简单地获得“再次被给予之物 (*re-donnée*)”！

事实上，时间客体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持存，还包括**预存** (*protentions*) 也即期待 (*attente*) 因此当我第二次聆听，一段音乐的时候——要么借助第三持存，要么通过想象对它进行复制，即借助于第二记忆，但**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在第一次聆听时尚处于空白状态的“期待”都已不再是贞洁的 (*vierge*)<sup>1</sup>

这是对的。斯蒂格勒这里的思想构境在某些层面上类似阿尔都塞文本学中的“有罪阅读”<sup>2</sup>在后者那里，对阅读发生隐性作用的是先在的问题式。当然，阿尔都塞的文本学更接近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作用，而斯蒂格勒此处的时间客体复现中的“不洁”则更接近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比如，当我第二次聆听已经听过的斯美塔那<sup>3</sup>的“我的祖国 (*Mávlást*)”时，我的音乐构境空间中对此并不是一个空白，原先的第二记忆中对“我的祖国”的聆听经验已经预存其中，它必然使我的第二次聆听发生改变。然而，斯蒂格勒特别想强调的是，预存于第二记忆中的聆听经验已经发生了无意识的“遴选和遗忘 (*sélection et oubli*)”。就像我自己对“我的祖国”特别是第二小节“沃尔塔瓦河”旋律的记忆中，总有特别令我感动的几小节旋律，也有感受不强烈的段落，而在我每一次重新聆听“沃尔塔瓦河”时，音乐空间构境中总会无意识地突现几个我自己的高峰体验。其实，我们听一部欧洲古典交响乐或者我们民族经典音乐作品的每一个当下，都在进行一种整体的驻持和记忆联想的音乐空间构境，听出一种调式、一段优美的旋律和令人落泪的音诗画卷。在其中，你实现自己内心的隐秘冲动。在音乐中，你只能听到你自己的灵魂，你独有的生命经历，你秘不示人的深深痛苦、忧伤和欢乐。斯蒂格勒的结论是，在已经发生的对时间客体的第二记忆的意识中，总会发生某种无意识的遴选，这种无意识的自动改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与个体自身的长期形成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情怀都不无关系，这种综合因素导致意识持存中出现的某种类似电影剪辑中的蒙太奇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总是在原生记忆、第二记忆和第三记忆之间一种矫作的蒙太奇** (*la conscience est toujours en quelque manière montage de souvenirs primaires, secondaires et tertiaires les uns par les autres*)。”<sup>4</sup>这是深刻的理解之境。

<sup>1</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sup>2</sup> 关于阿尔都塞的文本学研究可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章。

<sup>3</sup> 斯美塔那（）：捷克著名音乐家。

<sup>4</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Éditions

依斯蒂格勒的见解，记忆同时也就是遗忘，它总是对“曾经发生之事的剔减”，人们总记住那些想记住的东西和摆脱不掉的东西，比如一段幸福时光或一段被深深伤害的经历。这也就意味着，人的意识中的记忆总是存在一种隐性的选择，将自己喜好的经验进行无意识地拼接，以达及蒙太奇的效果。它就像是电影导演后期对影片素材的剪辑，可这个意识中的**无脸**导演正是每一个人内心里压抑着的无意识。电影所要捕获的，正是这个看不见的意识活动中发生的“**后期生产中心** (centre de post-production)”。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说，“电影是梦的构序 (Le cinéma est de l'ordre du rêve)”。<sup>1</sup> 电影的秘密在于捕捉无意识，它通过蒙太奇式的梦境编织改变人的意识。所以，在这个构境意向中，“所有电影都具有好莱坞性 (hollywoodien)，所有影片都在等待它的‘遴选’的及其代价”。<sup>2</sup> 这是斯蒂格勒特别想凸显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电影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在改变我们的意识，在心理机制上还有一个隐性构式过程，即我们的时间在电影观看过程中无意识地被他者的时间 (*autre temps*) 所替代。这是一个拉康式的断言。在拉康那里，我的自我建构是从作为**小他者**<sup>3</sup>的镜像反指开始的，而人的主体建构则是将自己认同于一个象征域的符码**大他者**<sup>4</sup>而完成的。对此，斯蒂格勒专门解释到，依拉康的构境逻辑，我们所有的人，

只有在自我 (soi) 中才能找到他者；只有在自我中迂回于一个或真或假 (réel ou fictif) 的他者去找到一个等同于自我的他者，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是对自我的追寻，也是对历史的追寻 (poursuite de l'histoire) 而所有他者都是这一历史的增补篇章的拼贴可能和契机 (l'occasion et la possible greffe d'un épisode supplémentaire)。<sup>5</sup>

这是一段很深的思考构境。一是说，如果所有人的自我建构中，都已经是对他者的无意识认同，那么，自我确立的支点恰恰在不是自我的他者中，所以，他者就是自我。二是他者

---

Galilée, 2001, Paris, p.54.

<sup>1</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Éditions Galilée, 2001, Paris, p.54.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Éditions Galilée, 2001, Paris, p.59.

<sup>3</sup> 小他者 (other)，拉康哲学术语，意指一个人在其成长的初始阶段中，由外部镜像反向建构的虚假心理自我。在拉康看来，在镜像阶段中，幼小的个人心理最初建构的自我，只不过是借助镜像（小他者  $\bar{a}$  形象）而无意识获得的一种先行性篡位的反射性凝滞幻觉，进而，他人之面容（小他者  $\bar{a}$  意象）强制性地建构出个人自我深一层的关系构架中的无意识想象自居（认同）。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章。

<sup>4</sup> 大他者 (Other)，拉康用语，意指由语言符号系统生成的无脸他者，经过文化教化的主体通常将其无意识地内居为自我本真性指归，个人主体即大他者的质询建构结果（阿尔都塞语），个人主体存在即面对大他者无脸观看的卖力表演。最可悲之处，是所有主体都将这种表演认同为本己性存在。

<sup>5</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Éditions Galilée, 2001, Paris, p.59.

的意向建构了历史的**增补** (*supplément*)<sup>1</sup> 构架, 一个追逐理想投射的过程永远会是他者的故事。这是拉康加德里达。

斯蒂格勒认为, 依从拉康伪自我-伪主体的他者关系构境,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加上上述蒙太奇式的意识隐性改变机制, 我们往往会无意识地将电影叙事中的构境误植为自己的本真性存在来认同。这样, 观众在看电影时渡过的

我的时间总是他者的 (*Mon temps est toujours celui des autres*) 电影以其特有的性质揭示了这一点。由于意识流是对时间的压缩, 因此在电影被接受的过程中, 我的时间在电影的时间里变异 (*devient*) 成了另一种时间和他者的时间 (*devient le temps d'un autre et un autre temps*)<sup>2</sup>

显然, 这里的时间也会是海德格尔存在论构境中的概念, 它表征了存在的历史有限性。斯蒂格勒这里的讨论过于形而上学, 让我们以美国著名电影《猎鹿人》<sup>3</sup> 一片的观看叠境为例。对于曾经生活在 1960 年代的中国人来说, 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可能会有一种坚不可移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偏向。但我们在电影院中观看由电影大师迈克尔·西米诺执导的这部影片时, 德尼罗和斯特里普这样一些演技派大师的出色表演会让我们会不自觉地沉入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活动中, 这种并非甚至是我们曾经反抗的东西却无意识地替代了过去的憎恶, 侵略者慢慢地蒙太奇式地拼接成有血有肉的正义者, 杀人罪行逐步地获得了我们的认同和同情, 甚至在影片结尾时, 杀死越南军人的时刻, 却会激起我们可耻的快感。这样, 好莱坞的美国意识形态的时间就替代了我们的时间, 他者的意志悄无声息地变异和建构了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他性叠境**。

所以, 斯蒂格勒指出, 在我们观看电影的过程中, “我的时间在建构的过程中, 被嫁接到它从他者时间那儿提取 (*prélève*) 的时间——与此同时, 在各种‘流’交织 (*entrelacement*) 而成的网络中, 我的时间也将它自己赋予他者的时间”。<sup>4</sup> 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sup>1</sup> “增补” (*supplément*) 一词来自德里达对卢梭教育是对天性的增补观点的重构。他先是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 后来在《文字学》一书第二章“危险的增补性”中具体讨论了它。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中, 存在的在场总是被延异, 被形而上学假设为具有理性内在结构的本文原初意义则在延异中成为一个开放的边界涂抹过程, 本文原有的意义延异化, 而本文外面的东西不断加入进来进行增补, 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本文的“意指链”。“增补补充自身, 它是一种过剩, 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 是存在最充分的限度”, “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 倘若它充填, 就好像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 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这样, 固定意义上的那个收信人 (诠释者) “死了”, 理解原初语境的权威“死了”, 本文的历史则成了解构式的不断增补的历史。由此, 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彻底地坍塌了。[法]德里达:《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 方尔平译, 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0 页。中译文有改动。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Éditions Galilée, 2001, Paris, p.59.

<sup>3</sup> 《猎鹿人》是由环球影业 (美国) 制作的战争片, 于 1978 年 12 月 8 日在美国上映。该片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 罗伯特·德尼罗、克里斯托弗·沃肯、梅丽尔·斯特里普等。英语, 片长 184 分钟。先后获得第 51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音响等五项大奖, 第 36 届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第 33 届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摄影奖, 第 3 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等。

<sup>4</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 方尔平译, 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0 页。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是被无意识地带入故事情节并认同于他者的时间的。

于是，这也就解释了处于海德格尔所指认的常人的极度无聊状态时，人为什么会等待他者的到来，因为他者的时间已经成为我的时间，如果没有他者的时间**填空**，我只剩下“空壳如也的躯壳（coquille vide）”。

在那些郁郁寡欢的周日午后，电影与电视的消遣之所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他者，那是因为电影流为我作出了选择。电影的到来使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使我的渴求得到了满足（使我放松）它使我脱胎换骨（它是兴奋剂，remontant,）它给了我通往他者的入口，而这个他者首先处在自我中，他在等待生命，等待电影，等待着具有生动的形象，为的是投映在电影中，在电影中运动起来。<sup>1</sup>

他者通过电影和电视到来，他使常人的生活重新充满乐趣，他的时间就是常人们的时间，他的生活世界就是常人们的世界，如果有一种寄居在电影构境中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也会成为常人们深深认同的本己性。这就是好莱坞的文化殖民的秘密生产逻辑。而当这种文化殖民的他者时间通过远程登陆的智能手机和电脑终端让我们随时随地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可怕的隐性意识形态支配和他性叠境就更深地发生了。

### 3、远程在场的电视所造成的“精神灾难”

斯蒂格勒说，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电视开始登场。1954 年时，法国只有 1% 的家庭拥有电视，而到了 1990 年，已经有 94% 的家庭有了电视。而今天，电视已经通过卫星和数字化智能终端覆盖了全世界。这意味着什么？过去，无聊的常人们必须到电影院才能找到填空的他者时间，而现在，他坐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前，低头于自己的智能手机时，这种对他者时间的欲望则会以更便利、更多元、更丰富多彩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实现。电视已经成为常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远程在场的生存方式**。

这里，斯蒂格勒让我们先回顾从摄影技术出现以来的影视编程工业的发展历史。如果说，人们看一张照片的时候，最能抓住人的就是相片所记录下的“曾经存在”，人们相信这一影像的客观性，相比之下，电影特别是记录影片除去客观地记录“曾在”，而且“还具有时间长度：画格的前后更迭和视觉暂留现象使电影成为一个时间客体”，它可以点对点（point par point）地塑形观众的意识流。依他之见，数字化时代的电视除去摄影和电影所持有的这一切特点之外，它还获得了全新的决定性的特征：

首先，通过无线微波传送、今天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卫星技术，电视已经成为**远程他**

<sup>1</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3 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 页。

**者时间的即时送达**，这种远程在场突破了电影院中的特定空间和时间限制。

作为远程传播技术，电视使某一观众群体得以**在领土各个角落同时观看同一个时间客体**（*regarder simultanément le même objet temporel en tous points d'un territoire.*）使诸多大型时间客体（即媒体节目表）的构建成为可能。在电视节目表中，不同视听时间客体的绵延一个接着一个地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巨流**（*archi-flux*”）的链条，即电视频道。<sup>1</sup>

电影院也有观众群体，但因为受到地点和时间上的限制，这种群体总是有限定的。而电视观众则突破了任何地点和时间上的限制，现在通过卫星通讯传播和互联网，全球各地的观众都可以直接看到同一个电视传输中的时间客体，如果再加上延迟录播和回看功能，那么这种远程登陆中的他者时间推送则是无所不能和随心所欲的。依斯蒂格勒的看法，这种可以让亿万观众通过电视的远程在场的方式异地异时地同一化于一种时间客体中的**接受意识共在**状态，这已经生成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支配性意识叠境的巨流之链。

其次，与电影生产不同，电视制作具有当下的现场直播功能，它使得时间客体与个人意识流的模拟式的**点对点对接**成为现实。“电视具有信号捕捉技术和现场直播技术，它使观众群体得以在某一事件发生的同时，在领土的各个角落集体体验这个被捕获的事件。此时，电视所传播的是一种即时性时间客体。”<sup>2</sup>原来，一些事件只是一个区域中发生的事件，比如奥斯卡金像奖只是美国电影学院的一个表彰，可是当它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制造出一个与亿万观众意识流点对点的即时塑形时，美国事件就被制造成一个改变全世界电影艺术观念的全球叠境事件，隐含其中的美国文化意识形态也就作为大他者时间渗透和替代了我们的时间。

斯蒂格勒说，远程登陆的电视所具有的这两大特征改变了个人的体验方式和事物存在的性质。一是电视共在改变了所有人原先隐密的生活体验。克尔凯郭尔曾经在反对黑格尔的类本质哲学时，指认过隐密体验的绝对个人性（“个人的痛苦是不可替代的”），而在电视时代，个人体验越来越成为电视布展中公众性的共时性状态。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个人隐私甚至成为商业性网红的变卖对象。二是电视共在改变了一切存在事件的性质。因为，它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编程工业（*industries de programmes*），这个编程工业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所批判的那个**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的当代主导结构。所以斯蒂格勒说，“编程工业使构成文化的**历时性要素，即意识，突然间急剧地共时化**（*synchronisation subitement accrue des diachronies*）。这个过程构成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命名的文化工业批判的基础”。<sup>3</sup>如果说在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讨论的文化工业的核心还是历时性的线索，而在远程登陆的电视时代，意识结构的构境发生则更多地成为一种共时性的突现。在此，存在（在场）本身在现场直播中被重新塑形了，一切存在都在电视观看的即时电子在场中被重

<sup>1</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sup>3</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新建构和发酵，电视在场成为真实在场的前提。如果说，1967年德波<sup>1</sup>说，一个事件，如果报纸三天不讨论它，它就是不存在的；而现在则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存在事件，如果几天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就是不存在的。今天在中国则是在智能手机的微信上的在场。

同时，这可能也是斯蒂格勒特别想引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学术血缘联接，即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联。因为，他总自诩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继承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认可斯蒂格勒的这一指认，但这只是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般批判理论逻辑的构境中，而不包括《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对现代性的拒斥和批判新境。斯蒂格勒说，早在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已经从广播和好莱坞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精神的灾难(sinistre de l' esprit)’的逼近，它是一种异化装置(dispositif d'aliénation)的产物，机制中的‘汽车、炸弹和电影使机制的体系更为严密’，正是这种异化装置使劳动者的业余生活在意识形态控制的构境中更加‘具有意义’。”<sup>2</sup>斯蒂格勒让我们知道，今天远程登陆的电视使这种精神的灾难大大地加剧了。他有些打趣地说，这两位哲学家好像提前描写了今天法国工人的生活，“这些人每天都要在电视屏幕前渡过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而再到当下已经出现的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新的远程登陆状态下，这种精神灾难会发生什么样的畸变呢？

毫无疑问，数字化网络将在不远的将来从深层次上震撼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它将把电视纳入一个新的体系，或许正是两位哲学家所预见的全球范围的“异化装置”在这一装置(dispositif)中，随着电视变成远程行为，“电视社会”的时代终将到来，并将易如反掌地实现欧洲社会民主人士所谈论的“市场社会”。<sup>3</sup>

斯蒂格勒的意思，是说电视时代的出现会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预见的那个文化工业中的异化装置以远程登陆的方式更快地使资本的逻辑以30万公里的速度实现全球化布展。由此，这种精神灾难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意识到了吗？

---

<sup>1</sup> 德波(Guy Ernest De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他于1957年组建情境主义国际，主编《冬宴》、《情境主义国际》等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电影《赞成萨德的嚎叫》(1952年)，《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1954年)，《异轨：如何运用》(与乌尔曼合作1956年)，《异轨的理论》(1956年)，《关于情境主义国际趋势行动和组织状况的报告》(1957年)，《文化革命提纲》(1958年)，《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与康泽斯合作1960年)，《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1961年)，《关于艺术的革命判断》(1961年)，《关于巴黎公社的论纲》(与范内格姆合作1962年)，《对阿尔及利亚及所有国家革命的演讲》(1965年)，《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针对沃茨的种族暴乱》(1965年)，《景观社会》(1967年)等。1973年，德波根据自己的《景观社会》一书拍摄了同名电影。1988年以后，德波写出了半自传体的著作《颂词》，并继续完成了其《景观社会》的姊妹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1988年)，进一步完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1994年，德波与布瑞吉特·考那曼合作，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影《居伊·德波——他的时间和艺术》。影片完成之后，当年11月30日，德波在其隐居地自杀身亡。享年63岁。

<sup>2</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sup>3</sup>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 公共财富还是地租？（讨论纲要）

## ——评哈维与哈特、奈格里之间的分歧

周嘉昕

2009年,《公共财富》甫一问世即在西方左翼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卫·哈维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奈格里同年在《艺术论坛》上所进行的争论。本文阐释从这一争论出发,回到双方立论的根据中去,阐明二者的分歧所在。进而,作者将在重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给出自己的评判:面对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哈维提供的分析路径格局更大,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 一、围绕《公共财富》的争论

(一)哈维对于《共同财富》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解,二是如何将有关未来的乌托邦落到现实。要求二位作者“来点具体的提议,现实的政治组织和真正的行动”。

在评论的开篇首先回顾了奈格里作品的理论主题并概述了《共同财富》一书的核心要点之后,哈维就其中的革命策略问题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第二,两位作者或略了地方认同的问题;第三,在对待资本主义等级制问题上应更加谨慎。

进一步,哈维从斯宾诺莎的讨论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并且认为“非物质劳动”同样体现了这一倾向。因为尽管在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中包含“象征价值”和“主体性作为生产对象”两个方面的思考,但这在马克思那里并不足为奇,同时在二者有关“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发现中,忽视了马克思对作为“观念的物”的价值的对象性(客观性)、现实性维度的考察。因为价值本身在今天涉及到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所以哈维认为二者忽视了虚拟资本的重要性而过度关注生命政治问题。

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强调:尽管在主体性生产问题、可变资本流通方式变化、公共性的商品化私有化问题的分析上,《公共财富》有所贡献;但是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是方法论上引入斯宾诺莎的问题,特别是奇异性概念的使用问题;二是就共同性问题的探讨而言,虽然二者将共同性的占有从资本原始积累、垄断租等问题扩展到语言、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领域,但是到底如何理解“共同性领域的斗争”,即奇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以及二者所列举的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

(二) 针对哈维的评论, 哈特和奈格里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这一回应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与阶级的关系和斯宾诺莎的奇异性阐释两个问题上, 进而对哈维的核心要点虚拟资本作出了说明。

有关阶级问题, 二人从作为奴役而非剥削的资本出发, 强调问题不在于比较或排序现实中那些奴役性的力量, 而是说明资本如何与殖民统治、种族主义、性别等机制“连接”起来的。就奇异性而言, 二人强调斯宾诺莎已经成为阿尔都塞以来当代左翼的重要理论资源, 奇异性是分化的或多元的, 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关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分析与之相类似。具体到虚拟资本问题上, 二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认为与其批判金融为虚拟性的, 毋宁通过全社会夺回金融占有的财富, 去改造共同产品的财产权。

(三) 2011年, 哈维在《激进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性的未来》, 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发。

哈维从哈丁的《公地悲剧》谈起, 认为既有的狭义“共同性”讨论往往关注个体私有财产和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而忽视了“格局”问题, 因而没有看到: 一种共同性的存在往往依赖于另一种共同性的支出; 由于不是所有的共同性都是开放的, 也就产生了“阶级-垄断租”; 真正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所论证的个人私有财产在实现共同利益方面的失败。

相应的, 中心问题是: 作为价值生产性的社会劳动要求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所有权, 共同性并非曾经失去的, 而是被持续生产出来的东西; 关键是改变世界, 发现能够运用社会劳动创造公共利益的新的方式。

## 二、哈特和奈格里如何化解“阿尔都塞的尴尬”?

(一) 哈维与哈特和奈格里之间关于《公共财富》的分歧, 可以概括为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哲学方法论依据、革命斗争策略三个方面。

(1) 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来看。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的是消费社会之后, 资本主义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时代, 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主导性的劳动形式。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在非物质劳动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含义, 这就是为新的公共性获得的可能, 即为超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与共和国的二元对立, 实现对“共同财富”的新的占有方式奠定了基础。作为其理论支撑的, 一是关于信息经济和知识产权的分析, 二是有关经济活动外部性的理论, 三是布罗代尔对于资本家生产方式的分析。

与之相关又略有侧重点的差异, 哈维强调全球化和金融资本, 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角度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尤为关注以都市发展为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寻租”过程。

(2) 从哲学方法论依据来看。

哈特和奈格里继承并发展了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传统, 尤其是从斯宾诺

莎唯物主义的视角反对黑格尔辩证法，激活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在此过程中，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探讨构成了二人直接的思想来源；同时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分析、柄谷行人关于康德哲学的视差解释也成为了其理论参照。

从哈维自己的表述来看，他力图回到马克思，坚持并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然而，根据其自身经历及表述。哈维对《资本论》的阅读是从资本的流通过程着手的，并且在辩证法和价值理论的理解上直接受到了奥尔曼“内在关系”辩证法和艾尔森“价值劳动论”的影响。

（3）从革命斗争策略来看。

哈特和奈格里从新的主体性生成的视角将“百姓”作为超越资本、实现另类现代性的革命性力量，并且强调了“爱”和“幸福”的意义，这带有强调的意大利自治主义的含义。

哈维尽管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在他的分析中强调了“阶级”的重要性。只不过这种“阶级”更多具有地方认同的含义。

（二）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而言，我们有理由将哈特和奈格里看作是对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在直接的意义，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二是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直接相关的主体性生产问题。更进一步，这也是对阿尔都塞反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理论方法的贯彻和推进。再进一步，这又涉及到阿尔都塞自身的理论尴尬问题。

在《论再生产》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仍然尝试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分析出发，建构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阶级斗争策略的说明。然而，在逻辑起点问题上，阿尔都塞却不得不从一个“理论的空无”出发。在阿尔都塞的分析中，所谓“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并没有实质的内容，而不得不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环节的展开。这实际上揭示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自身困境：无法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从抽象到具体地“叙述”或“述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纵观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述，不仅没有化解这一尴尬，反倒以更为碎片化的方式将这一尴尬推到极致，以平面化的论述再现了一幅当代资本主义的平面化图景。甚至于说在若干概念，如共同富裕等的讨论上存在含混和歧义。对于这一点，哈维在他的评论中也已经指出了。

### 三、从“租的艺术”到“价值劳动论”：跟随哈维发现《资本论》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哈维在2016年下半年专门讨论“价值”问题的初衷：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一种科学的叙述方式，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语境中“重述”《资本论》。

（一）正如有学者（Nancy Hartsock）指出的那样，《资本的界限》一书最突出的成就

是有关“地租”问题的分析。在该书中，哈维并未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问题予以专门的关注。这是同他从人文地理学研究出发，关注资本流通和空间问题直接相关的。

正如哈维在该书 2006 年新版导言中提到了，《资本的界限》是当时第一部将金融资本分析同空间理论结合起来的著作。因此，该书集中大量笔墨讨论了固定资本、货币信用和金融、金融资本、地租理论、空间理论、危机理论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哈维在都市研究中所提出的阶级-垄断租可以看作是将金融资本分析和地租理论结合起来的绝佳案例。

沿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面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地租理论在理解资本剩余的吸收和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对于虚拟资本、都市发展、商品美学、知识产权来说，地租理论构成了理解资本剩余生产和分配的关键性理论工具。同时，这一分析也契合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和知识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新一轮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探讨。

在这个意义上，哈维的阶级-垄断租的批判可以直接对应于奈格里和哈特有关共同财富的分析。不同格局内部共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依赖于阶级-垄断租的存在。更进一步，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来源于社会”的“租”，以虚拟资本、房地产业、商品美学、知识产权等表，当代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以不同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建构了形形色色的新的“第二自然”。

（二）出于系统“叙述”或“述行”全球化金融资本的需要，并受哈特和奈格里著作的影响，哈维回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正如哈维自己所说，在其早期研究中，对于价值问题的思考主要受到了艾尔森“价值劳动论”的影响。尽管谢博文曾经在抽象劳动方面批判了哈维思想中的这一理论资源，但艾尔森的影响是十分显见的，即强调价值本身只是资本的抽象表达，需要到资本主义生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流通过程中去理解价值问题。但就《资本的界限》来说，“价值劳动论”足以支撑其相关分析。

就近年来哈维对价值问题以及《资本论》第一章的探讨来说，尽管有学者（豪格）从德文术语与英文译文的辨析出发，对其进行了批评，但结合哈维的思想演进，我们认为：从虚拟资本和阶级-垄断租的探讨回到价值问题的考察，为哈维接近并重新激活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科学的路径。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都是在对政治经济学体系有了总体的认知之后才重新回到价值问题，并以之作为抽象的叙述起点的。

只不过，我们仍然担心的是：在哈维的分析中，是否能将全球格局内国际分工充分纳入到自身的分析框架，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起点的意义上辩证“叙述”或“述行”当代世界中这一“幽灵般的对象性”。

## 四、马克思会怎么办？

最后，我们尝试回到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去，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对哈维与哈特和奈格里争论中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这一回到主要涉及共同财富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地租与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三个方面。

（一）在《共同财富》的讨论中，哈特和奈格里经常回到现代市民社会兴起的思想史理论中去，寻求理论的解答。正如哈维所指认的那样，二人的讨论准确地把握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的私有财产与财产的共和国之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财富的背后其实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

回到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已经在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共同财富”的资产阶级占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既有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忽视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存在的“财产”和“财富”概念的差别，或者将二者等同起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背后存在的“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当黑格尔以斯密式的财富（德性）积累来论证国家超越市民社会的合理性时，不过是以“折中主义”的方式将“共同财富”通过地产转移到虚假普遍性的地主阶级手中。

正是对地产（地租）的批判和对工业（动产）的认知，推动马克思走出了古典哲学的“共同财富”幻象，走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因而，当蒲鲁东致信马克思，提出“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的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的时候，马克思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

（二）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看到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和虚拟资本的充分展开，但是对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来说，地租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它涉及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对资本利润的解释这一本质问题。在185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获得了“地租理论家”的称号，但是关于地租的分析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通过绝对地租理论的制订，解释平均利润律的形成进而对剩余价值的现实表现作出全面的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哈维有关阶级-垄断租的说明契合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诉求，即意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物化机制中，私有财产如何以一种“似自然性”的方式，通过“来源于社会而非土地”的租攫取了作为“共同财富”的剩余价值。当然，问题是今天这样一种“第二自然”已经扩展到虚拟资本、都市空间、商品美学、知识产权、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和历史中对“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进行更为辩证的“多层次”、“大格局”考察。

（三）隐含在哈维和奈格里、哈特争论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这就是有关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在哈维那里，显然是强调辩证法之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空间问题的分析的。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却在后阿尔都塞的语境中，在反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强调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这也是他们推崇斯宾诺莎的原因所在。然而正如有

学者在评论巴迪欧是所指的,这样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意在反对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性以及作为这样一种总体性化身的“资本逻辑”。回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理论语境中去,哈维的辩证法和奈格里的唯物主义系出同源,批判了后福特制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新形态。在后金融危机的今天,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滥觞,我们不妨重新尝试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

#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积累

庄友刚

(苏州大学哲学系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不能仅仅从一般社会生产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在非物质劳动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上,并不是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而是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需要刺激和促进了非物质劳动的发展。非物质劳动当代霸权地位的形成是资本积累方式创新的结果。因此,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本质。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 资本积累; 劳动与资本关系

“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这一概念既是对当代社会实践新特点的概括,又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丰富。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内涵及其理论意义学界已经有了诸多的分析,从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角度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也是深刻的。然而,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不单纯是社会生产一般发展趋势所造就的结果,实质上也是资本摆脱原有积累方式的危机、创新其存在形式的根本要求。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与其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转型的原因不如说是资本的历史形态创新的结果。澄明了非物质劳动与资本积累方式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非物质劳动霸权下的革命主题问题也就有了明晰的把握。

## 一、资本的历史本性与当代发展的危机

阐明当代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首先要澄清资本的历史本性及其历史发展进程。这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内在根本矛盾的历史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sup>1</sup>资本的存在需要两个基本的历史前提:一是交换的存在。资本主导下的经济是交换经济,没有交换活动也就不会有资本关系的发展。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进入交换。“最大的交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sup>1</sup>“一旦劳动人口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不再出卖劳动产品，而是出卖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那么，生产就会在整个范围内，在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商品生产。”<sup>2</sup>劳动力成为商品用于交换不仅是市场经济与一般商品经济区别开来的标志，也使资本真正成为“资本”。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特殊价值的阐释指明了剩余价值的源泉。

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值，这种增值不是来自于交换领域而是来自于生产领域。因此，最大限度增值的需要必然驱使资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另一方面，尽管资本的增值源自于生产领域，但是资本积累的实现又离不开交换，而这最终又是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资本不仅要求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同时也要促进最大限度的交换和消费。最大限度增值和积累的需要造就了资本的创新本能和冲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3</sup>

资本的创新本能首先在生产上表现出来。由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自然限制，绝对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运动的中心，相对剩余价值才是满足资本无限增值需要的根本源泉。为此，资本总是千方百计的提升生产能力和劳动效率。这不仅表现在劳动者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升上，更表现为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和分工协作规模的扩张。“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正如资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一样。……资本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sup>4</sup>由此就可以理解，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为什么资本更为重视管理、重视科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资本无限生产的需要不仅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生产力，“资本的趋势，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sup>5</sup>，而且造就了生产全面化的趋势，“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的全面性。”<sup>6</sup>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7</sup>资本最大限度地积累还需要最大限度地交换和消费来实现，资本的创新本能也在这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市场的扩张来完成既有积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趋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8</sup>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或生产部门）使用价值的多样化，亦即生产的全面性来更大程度地占有市场。

植根于资本无限增值的历史本性，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生产的这种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

<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页。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5—926页。

<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市场的有限性之间必然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伴随着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资本通过市场的扩张和占有市场方式的变革，一次又一次地缓解了经济危机，造就了资本的历史发展中一轮又一轮的繁荣神话。然而，市场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市场有限性的矛盾是资本无法治愈的痼疾，在每一次繁荣之后又总是会遭遇同样的限制，这成为资本发展的根本历史界限。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由资本的发展需要造就的。过度的生产需要又过度的消费来维系，否则，资本的增值就无法实现，资本积累就不能完成。生产的不断扩张势必造成社会消费的不足，这时资本就千方百计地引导需求、创造需求。消费社会的形成是资本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然而，资本增值的要求具有无限性，随着资本积累规模越来越大，消费社会也无法让资本超越其固有的历史界限。

当代资本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其历史的界限方面，也表现在自然的界限方面，即生态危机。物质生产当然需要物质资源和环境的支撑。在工业资本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生产必然也是对物质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最大限度的消耗。在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自然界的运动所抹平。随着生产的发展，当这种消耗远远超过了自然界所能够承受的限度时，就必然造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问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是相对有限的。在这种状况下，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能够保持合理的界限。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则是为了占有，具有无限的性质。因而这样的生产必然是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最大限度的消耗和破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反思当代生态危机问题要追溯到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危机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也是对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限制。生态危机表明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无法再给资本所追求的无限生产提供充分的支撑，这实质上是对资本无限增值本性的遏制。在这样的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样，都是资本危机的表现。

## 二、非物质生产的发展根本上是当代资本积累方式创新的结果

在当代资本发展遭遇重大危机，但这尚不意味着资本关系行将消亡。资本的创新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创新其存在形态，扩大积累的空间，寻找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非物质生产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地位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资本积累的完成立足于两大基点，一是资本增值的生产，一是资本增值的实现。简言之，生产和交换，消费是制约交换状况的根本因素。在工业资本形态下，具体生活资料（首先和主要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资本增值的主要的基本的形式。其他各种社会生产只是资本积累的补充形式或是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条件，比如空间生产。在这样的前提下，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而进行的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然的界限和历史的界限。就资本生产来说，生态危机根本上表明的是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而言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相对有限性，因此生态危机是对资本生产无限扩张要求的限制亦即对资本无限

增值本性的限制。生态危机越严重表明这种限制程度越大,从而资本危机程度越严重。从消费方面来说,虽然资本能够通过市场的创新与扩张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一次次地缓解经济危机,但始终逃脱不了市场最终走向饱和从而追求无限利润的本性遭到遏制的宿命。随着这两个方面限制的加剧,造成了资本发展发展中日益严重的危机,由此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危机。生态危机等各种社会危机的形成和加剧,表明资本的原有积累方式遭遇了危机。

资本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来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增值,至于劳动力商品在哪个部门消费、如何消费则无关紧要。因此,资本追求的是一般形式的财富而不是具体财富。“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sup>1</sup>哪个生产部门能够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就会流向哪个部门的生产,怎样使用劳动力能够带来最大限度的增值资本就会怎样使用劳动力。当以具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主要积累方式遭遇危机的时候,创新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寻求新的积累方式。既然原有积累方式在资本生产方面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那么在新的积累方式中就要尽可能地摆脱或减少这种限制。同样,既然原有积累方式在交换和消费方面总是很快遭遇市场的界限,那么新的积累方式就要尽可能增加消费的弹性空间。在这样的发展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逐渐形成和凸显。

“非物质劳动”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最先对这一概念做出分析的是意大利学者莫利兹奥·拉扎拉托。哈特和奈格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清晰地阐释,“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sup>2</sup>尽管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本人所指出的那样,非物质劳动概念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sup>3</sup>,但是对于阐明当代劳动方式的变化及其与工业社会中物质劳动的区别是有积极价值的,正如唐正东教授指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其实是不排斥后福特式劳动、知识劳动、智力劳动、服务性劳动等概念的,哈特和奈格里只是想强调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或者说强调与工业社会的物质劳动之间的区别才使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的。”<sup>4</sup>这一概念有助于阐明当代资本积累方式变化的一般趋势。这里不打算就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内涵给予阐释或评析,而主要想指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当工业资本形态下依赖具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来实现增殖的积累方式再也无法充分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即这种增殖方式本身发生危机的时候,摆脱对原有积累方式的依赖寻找新的增值路径就已经成为资本运动所努力的方向了。就是说,工业社会中那样的物质劳动形式仍然是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但不再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或者说日益为其他的更利于资本积累的劳动形式所取代。“非物质劳动”就是概括这些新劳动形式的一个概念。随着非物质劳动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性的形式(即所谓非物质劳动“霸权”),资本积累方式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sup>2</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8.

<sup>3</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09.

<sup>4</sup> 唐正东:《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的后果也随之发生的相应的变化。首先，“非物质劳动”形式更强调劳动本身的消费而不再是劳动的物质成果，资本积累就不再需要通过工业社会中物质生产那样的形式，这样一来，资本增值过程中就有效解决了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性限制之间的矛盾。尽管在当代资本主导下的大量生产仍然是物质生产，但是非物质劳动代表了当代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展现了资本积累的新趋向。当资本积累日益诉诸非物质劳动过程的时候，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无限消耗就不再成为资本增值所必需。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缓解自然生态条件对资本无限增值要求的制约和限制，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增值空间。同时这也造就了资本条件下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趋势。其次，同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相比，消费者对于非物质劳动的消费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与传统的物质生产相比，非物质劳动带给消费者的是以文化、知识、信息、技术、服务等形式呈现的劳动产品或者是劳动本身。相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而言，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更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一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更易受到自然条件（如生理条件）的制约，而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在这方面受到的限制要相对少得多。一个人的自然饭量是一块牛排，一顿给他两块可能就吃不下，但是在消费服务性劳动时却可以成倍地增加。另一方面，对非物质劳动的消费更易受到社会性的引导和建构，更容易被转变成为符号化的消费（鲍德里亚）。尽管在当代消费社会条件下，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也在日益被引向符号化的消费，但非物质劳动消费的社会性、被建构性更加显著和突出，更容易被社会性地建构和引导。高技术社会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比如手机型号、功能的革新，电脑软件的升级换代等等。这样一来，当资本积累日益转向以非物质劳动为基本途径的时候，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资本的历史界限即市场有限性的限制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实现增值的空间。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劳动本身的消费，实际上，这也符合资本运动的一个基本趋势，“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sup>1</sup>对劳动本身的消费完美地实现了“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由此可见，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不能仅仅从一般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不能看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进程，而恰恰是资本运动和促进的结果。明确了这一点，关于非物质劳动发展的社会后果也就有了合理的澄明。

### 三、非物质生产的发展没有改变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历史本质

表现为非物质劳动的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必然给资本运动的具体过程带来重大变化，因而在历史向度上也必然造成一些新的社会后果，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讨论：既然劳动范式转型了，是否意味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主题的变化？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必然造就当代资本运动的一些新特点、新趋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势,这些新特点也必然或多或少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具体演进过程和革命主题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比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人道化了,劳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空间。再比如,劳动的高度分散化必然会对革命主体的组织性产生相应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造成革命主题更加复杂化的状况。但是,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与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关系来看,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实质,革命主题的核心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非物质劳动的角度来说,劳动范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资本历史本质的变化,也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历史本质和地位。第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值,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具有无限的性质和趋势。从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物质劳动范式向当代非物质劳动范式的转型对于资本的历史本性而言没有任何触及和削弱,恰恰相反,这种转型是对资本历史本性的顺应和强化,是遵循了资本历史本性的结果,是资本历史本性的当代表现。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这种转型更有利于资本本性的实现。第二,与资本的这种历史本性相联系,资本实现积累的根本方式没有变。资本运动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积累。劳动范式的转型只是劳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根本方式,在把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路径。实际上,劳动范式的任何变化都与资本积累的根本路径没有直接的关联,是否以商品化的劳动作为增值路径与劳动采取怎样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后者影响前者完全是一种误解。第三,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劳动的性质和地位。传统的物质劳动范式也好,当代的非物质劳动范式也好,都是劳动的具体形式,在资本面前都表现为劳动力商品,都“直接生产资本”<sup>1</sup>。资本追求的是一般形式的财富,劳动的特殊效用对资本而言并不重要,只要能够给资本带来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就行。只要能够实现最大化增值,雇佣一个工人在工厂生产裤子与雇佣一个歌女在剧院唱歌,对资本而言并无本质的区别。劳动力商品形式和使用方式的变化也不改变劳动的地位。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劳动,只要处在交换关系中就必然为资本所制约、所控制,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就处于从属的地位。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强调非物质劳动性质和效用的特殊性来说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断言非物质劳动已经不再是雇佣劳动,得出非物质劳动超越了资本的控制的结论,这是不成立的。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本质。如果仅仅从劳动范式的转型就断言资本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进而宣称革命主题的变换是草率的。

其次,就革命主题的内容而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根本改变消灭劳动与资本矛盾的历史目标与历史路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主题的论述与论断是从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视角来阐释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地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位是由资本的历史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雇佣劳动的历史性质所造就的。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亦即资本积累具体方式的变化）相适应，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表现得更加人道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被雇佣的地位。仅仅根据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某些变化就断言无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所谓革命出题变迁的问题，是西方理论界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同样，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没有根本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没有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性质。就此而言，社会革命的主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方面，革命的历史目标没有变化，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雇佣劳动仍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根本指向。另一方面，革命的根本历史路径也没有变化，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性质，资本关系也不会因为具体积累形式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仍然实现劳动解放的根本历史路径。

当然，强调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没有根本改变革命主题的内容与性质，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革命的主题没有任何影响。比如，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大工业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特点。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情感劳动总是直接建构劳动关系。观念、景像及知识的生产不仅基于公共性而被组织起来——没人真的会单独地思考，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与过去及现在的其他人思想的合作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一一而且每一种新的观念和景像还会激发和开启新的合作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合作关系的生产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sup>1</sup>劳动者之间关系的这些新特点必然会对革命主题的展开及其具体进程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也正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劳动”理论的价值所在。

## 结语

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的劳动）理论的提出，一个重大意义在于看到了当代资本积累方式的新变化，引导我们去思考这种新变化对于资本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地把握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另一方面应注意的是，不能过分抬高资本积累方式的这种历史变化，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过时了，原来的革命主题失效了。哈特和奈格里先验地认定了资本的非物质劳动积累方式与工业社会条件下物质劳动积累方式之间的质的区别，把这种变化看作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不合适的。“哈特和奈格里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与工业社会时代的物质劳动理论区分开来，把自己的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剥削与危机理论与

---

<sup>1</sup>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 147.

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与危机理论区分开来,这使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去谈论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理论及新主体性理论。”<sup>1</sup>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到劳动形式的任何变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不是外在于资本的。并不是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而是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需要刺激和促进了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及其霸权地位的形成。

---

<sup>1</sup>唐正东:《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剥削及危机的新形式》,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